

列寧主義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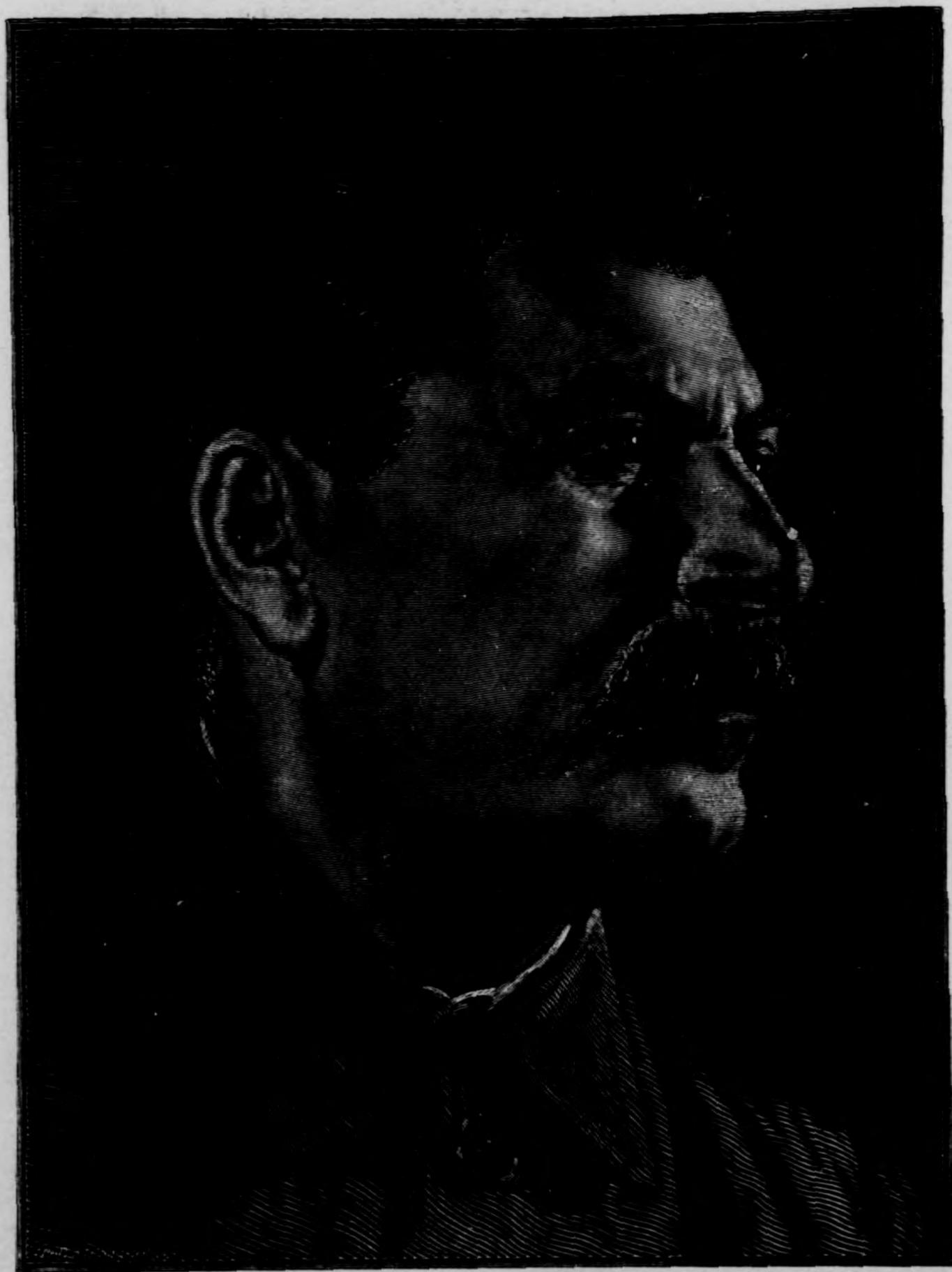
著 林達斯

譯 古師莫

斯達林著
莫師古譯

列寧主義問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



林 達 斯

目 錄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維德洛夫大學裏的講演）	一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五
二 方法	一四
三 理論	二五
四 無產階級專政	五〇
五 農民問題	六八
六 民族問題	八八
七 戰略與策略	一〇二
八 黨	一二七
九 工作體裁	一四八
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在到十月革命的道路上——這本書底序言）	一五三

錄 目

一 十月革命底國外的和國內的環境.....	一五三
二 關於十月革命底兩個特點；或者是十月革命與託洛茨基同志底不斷革命論.....	一五七
三 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策略底幾個特點.....	一八三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	二〇四
關於列寧主義問題..... 二一三	
一 列寧主義底定義.....	二二三
二 列寧主義底要點.....	二二七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二三〇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二三四
五 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黨和工人階級.....	二三九
六 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	二七九
七 爲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鬥爭.....	三〇一
關於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給 <u>佛·斯基</u> 同志的回信）.....	三二一
關於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底口號（給 <u>S·波克洛夫斯基</u> 同志）.....	三二一

的回信).....	三四一
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三五九
一 代表團底問題與斯大林同志底回答.....	三五九
二 斯大林同志底問題和代表們底回答.....	四〇七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爲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而作).....	四二二
糧食戰線上的問題(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紅色教授學校,共產主義學院以及斯維德洛夫大學學生們談話底一部分).....	四三九
列甫和關於與中農聯盟問題(給S同志的回信).....	四五九
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演說辭).....	四七九
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全體會議上的演說辭底一部分).....	五〇一
一 階級的變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五〇一
二 關於共產國際方面的意見分歧.....	五二三

三 關於國內政策方面的意見分歧.....	五三二							
(1) 關於階級鬥爭問題	(2) 關於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問題	(3) 關於農民問題	(4) 關於新經濟政策和市場關係問題	(5) 關於工業發展速度和薪式協約問題	(6) 布哈林同志是怎樣的理論家	(7) 是五年計劃呢，還是兩年計劃呢	(8) 關於耕種面積問題	(9) 關於糧食採辦問題
四 關於與右傾鬥爭問題.....	五九六							
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	六〇一							
再論民族問題.....	六一一							
與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六二五							
關於工農政府問題（答特密得利夫同志的信）.....	六五九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	六七一							
農業區黨的工作的任務.....	七二七							
應當使集體農民變成小康者.....	七四七							
與霍瓦爾德底談話.....	七七一							

在蘇聯第八次全國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上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	七八九
幹部決定一切	八四一
斯大哈諾夫運動的歷史意義及其今後的任務	八五一
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派及其他兩面派份子的辦法	八七七
在聯共中央全會上的結論	九一三

關於列寧主義基礎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維斯德洛夫大學裏的講演——

我把這本書供獻給那些在列寧死後做收黨員時

加入黨的同志們。——斯大林

列寧主義基礎，是一個大題目。要盡量說明這個題目，必須要著作一整本書。甚至於要著作好幾本書。因此，我的演講，自然不能是列寧主義底盡量的說明。這些演講至多只能是列寧主義基礎簡略的大綱。但是，我還是認為，敘述這個大綱，以便指出幾個為有成效地研究列寧主義所必要的基本出發點，是有益處的。

敘述列寧主義基礎，這還不是敘述列寧底世界觀底基礎。列寧底世界觀與列寧主義底基礎——這兩個東西底範圍並不一樣。列寧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世



界觀底基礎當然就是馬克思主義。但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敘述列寧主義應當從敘述馬克思主義底基礎開始。敘述列寧主義——這就是說，敘述列寧著作中的那些由列寧所放進到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裏的，而自然是和列寧底名字相關的特別的和新的東西。我在自己的演講中，不過就是按照這個意思來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的。

那末，列寧主義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環境特殊條件中的應用。這個定義是有一部分真理的，但是牠還千萬沒有說盡全部真理。列寧的確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了俄國的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很巧妙。但是，假如列寧主義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特殊環境中的應用，那末，列寧主義就是純粹民族的，而且僅僅是民族的，純粹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國際的現象，牠在整個國際發展中有自己的根源，而不僅僅是俄國的現象。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以為，這個定義犯有片面性的毛病。

另外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革命原素底復活，而與四十年代以後各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據說四十年代以後各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已變成溫和的，不革命的了。如果把這種將馬克思主義分爲革命部分和溫和部分的愚弄而又庸俗的意見除開不說，那末，就應該承認，就是這個完全不充分的和不能完全令人滿意的定義，也有一部分真理。這部分真理就在於，列寧的確恢復了馬克思主義那個被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所埋沒了的革命內容。但是，這只是一部分的真理。關於列寧主義的全部真理是在於：列寧主義不只是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一步，在資本主義底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新條件下面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地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革命（我們所說的是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時期，當時還沒有

已經發展的帝國主義，他們生活在準備無產者們去作革命的時期，當時，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直接的實際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列寧呢，馬克思與恩格斯底這位學生呢，則生活在已經發展了的帝國主義底時期，生活在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開展的時期，這時，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在一個國家裏取得了勝利，已經打破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已經開闢了無產階級民主制底紀元，蘇維埃底紀元。

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底向前的發展。

人們通常指出，列寧主義帶有非常戰鬥的和非常革命的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列寧主義之所以有這種特性，是由於以下的兩個原因：第一，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牠不能不帶着無產階級革命底痕跡；第二，列寧主義是在與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搏戰過程中間長成和強壯起來的，而與這個機會主義鬥爭，曾經是，並且現在還是為戰勝資本主義所必要的先決條件。不要忘記，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而和這個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鬥爭，曾不能不是列寧主義底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底條件下面長成和形成的，這時資本主義底矛盾達到了極點，這時無產階級革命成了直接實際的問題，這時準備工人階級去革命的舊時期已經走到盡頭而轉變到了向資本主義直接衝擊的新時期。

列寧稱帝國主義爲「垂死的資本主義」。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矛盾底緊張程度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着便是革命底開始。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有以下三個：

第一個矛盾——這是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工業國家裏壟斷性的托拉斯和新迪加，銀行和財政寡頭底無上威權。與這種無上威權鬥爭時，工人階級底通常鬥爭方法——職工會和合作社，國會政黨以及國會鬥爭——已經是完全不夠的了。或者向資本搖尾乞憐，依舊過着非人生活並每况愈下；或者是運用新的武器，——這就是帝國主義向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提出的問題。帝國主義推動着工人

階級走向革命。

第二個矛盾——這是各個財政集團間及各個帝國主義列強間爲爭奪原料產地，爲爭奪別國的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就是爲要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猛烈鬥爭，就是爲要重新瓜分已經瓜分過的世界而進行鬥爭，就是那些「日光下的地盤」的新興財政集團和列強進行特別劇烈的鬥爭，來反對那些不肯放鬆自己的贓物的老大財政集團和列強。各派資本家集團間這種猛烈鬥爭底特點，就在於牠包含着「一種不可避免的原素——帝國主義的戰爭，爲掠奪別國的領土而進行的戰爭。而這種情況底特點又在於牠使帝國主義者們互相削弱，使整個資本主義底陣勢都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機接近，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實際必要的事情。

第三個矛盾——這就是爲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十數萬萬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對最廣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內十數萬萬人民施行最殘暴的剝削和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便是這種剝削和這種壓

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的時候，不得不在那裏建築鐵路，工廠，及工業的和商業的中心。無產階級底出現，本地智識界底產生，民族覺悟底興起，解放運動底加緊，——這些便是這種「政策」底不可避免的結果。在所有一切殖民地及附屬國革命運動底加強，便是顯然證明這一點。這個情形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為這個情形根本掘動資本主義底陣地，把殖民地及附屬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軍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軍。

一般地說來，帝國主義底主要矛盾，把舊的「興盛的」資本主義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便是這樣。

十年以前爆發過的帝國主義戰爭底意義，就是在於，牠把所有這些矛盾都集合在一塊，結果就加速了和便利了無產階級底革命戰鬥。

換一句話說：帝國主義不僅已經使革命成了實際上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已經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良好條件。

這便是產生列寧主義的國際環境。

有人會向我們說：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這種情形，對於當時並不是，而且也不能是模範式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俄國，有什麼關係呢？這種情形，對於首先是在俄國工作，而且首先是爲着俄國而工作的列寧，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恰好是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發源地，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底故鄉呢？

因爲，俄國會經是帝國主義底這一切矛盾底集合點。

因爲，在俄國，革命醞釀底程度，曾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厲害，因爲這樣，所以祇有俄國會能夠用革命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

首先要講的，是沙皇俄國是各種壓迫——資本主義的壓迫，殖民地的壓迫及軍事的壓迫——底最無人道而最野蠻的形式底發源地。誰不知道，在俄國，資本底無上威權是與沙皇制度底專橫暴虐混合着？誰不知道，俄國民族主義底侵略是與沙皇政府對於非俄羅斯民族的屠殺互相混合着？誰不知道，對土耳其，波斯，中國底整批區域的剝削是與沙皇制度對這些區域的侵佔互相混合着，是與侵佔領土的戰爭互相混合着？列寧說得很對：沙皇制度是「軍閥封建的帝國主義」。沙皇制度把帝國

主義底一些最壞的方面都總合起來，而且使之加倍厲害了。

其次，沙皇俄國是西方帝國主義底最大的後備軍。這不僅是說，牠放任了外國資本自由進口活動，讓外國資本操縱了俄國國民經濟中如燃料和冶金業這樣有決定作用的部門；而且是說，牠會能用千百萬兵士來供給西方帝國主義者。試回想一下，一千二百萬俄國軍隊，為保證英法資本家底極高度的利潤，在帝國主義大戰底前線上流血的事實。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僅是帝國主義在東歐的看門狗，而且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代理人，牠從倫敦、巴黎、柏林、布律塞爾得到了借款而替牠們從人民身上榨取幾萬萬元的利息。

最後，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國主義在瓜分土耳其、波斯、中國等方面最忠實的同盟者。誰不知道，帝國主義戰爭是沙皇制度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行的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是這次戰爭中的一個重要份子呢？

所以沙皇制度底利益是與西方帝國主義底利益互相結合了的，而且終於融合成

爲帝國主義利益底一個整體。西方帝國主義是不是能夠不預先用盡一切力量來和俄國革命拼命決戰以圖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就甘心喪失像舊時的沙皇資產階級俄國這樣在東方的強大的支柱，這樣豐富的人力和物力底貯蓄器呢？當然，是不能夠的！

可是由此可見，誰會想打擊沙皇制度，他就會必然要去打擊帝國主義，誰會暴動起來反對沙皇制度，他也就會應該暴動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因爲誰要是實際上會想不懂打碎而且還要永遠消滅沙皇制度，那麼他推翻了沙皇制度，他也就會一定要推翻帝國主義。這樣，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便接近了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接近了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且會應該轉變爲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的革命。

而同時，在俄羅斯興起了最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個革命是由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所領導，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有俄國革命農民這樣重大的同盟者。這樣的革命曾經不能半途中止，在勝利的時候，牠曾經應該向前進展，高舉反帝國主義的暴動旗幟，——這點難道還須證明麼？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俄國會經是帝國主義各種矛盾底集合點，這不僅是說，因爲這些矛盾在俄國帶有特別醜惡，特別難堪的性質，所以最容易暴露出來，也不僅因爲俄國會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主要支柱，牠將西方財政資本與東方殖民地聯接起來；而且是因爲，祇是在俄國才曾經有真實的力量，能夠用革命方法解決帝國主義底矛盾。

可是由此可見，俄國革命不能不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牠不能不一開始發展便帶着國際性，這樣，牠不能不震動帝國主義底根基。

在這種實際情況之下，俄國共產黨人曾經能夠把自己的工作僅限於俄國革命底狹隘的民族範圍以內嗎？當然，是不能夠的！正是相反，無論國內的（深入的革命危機）和國外的（戰爭）環境，都曾經推動他們的工作超出這個範圍，把鬥爭轉變到國際舞台上，揭穿帝國主義身上的爛瘡，證明資本主義破產底必然性，打碎社會大國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最後，推翻本國的資本主義，並替無產階級鍛鍊出新的鬥爭武器，——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爲的是便利着全世界無產者推翻資

本主義。

俄國共產黨人曾不能不這樣行動，因為祇有在這條道路上可以希望國際環境內產生某種變化，足以保證俄國不致有資產階級制度底復辟。

因為這些原因，所以俄國便成了列寧主義底發源地，而俄國共產黨人底領袖列寧，便成了列寧主義底創造者。

這裏俄國和列寧所「遭遇的」，差不多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國和馬克思格斯所「遭遇的」一樣。當時，在德國，是醞釀着資產階級的革命，正好像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一樣。當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寫道：

『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德國身上，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底前夜，因為德國將在一般的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之下，和具備着比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完成這個革命。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序幕。』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已經移到了德國。

恰巧是德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底故鄉，而德國無產階級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底創造者，這件事情底確實原因正是馬克思在上面這段話內所指出的一種情況，這未必是可以懷疑的。

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也應該這樣說，而且更應該這樣說。俄國在這時期會處於資產階級革命底前夜，牠會應當在歐洲更進步的條件之下和具備着比德國（英法更不用說了）更發展的無產階級，來進行這個革命；並且所有一切的事實材料都已經指明，這個革命會經歷當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酵母和序幕。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當俄國革命還剛才萌芽的時候，在他所著的做什麼？這本小冊子內，就說過以下的預言，這事實不能認爲是偶然的。他說：

「歷史現在向我們（即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註）提出了一個迫近的任務；這個任務與任何國家裏的無產階級底迫近任務比較起來都是最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把歐洲的，而且也把亞洲的反動勢力底最強大的支柱破壞，這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

二頁)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會應當轉移到俄國。

大家知道，俄國革命底過程已經綽綽有餘地把列寧這個預言證明了。

既是這樣，那末，作過了這樣的革命和具備着這樣的無產階級的這個國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底故鄉，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這個無產階級底領袖，列寧，同時也成了這個理論和策略底創造者以及國際無產階級底領袖，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二 方法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爲要說得確切起見，我應該補充說，這裏所指的，不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統治，而是機會主義在實際上的統治。在形式上，當時領導第二國際的，是「忠心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正統派」——考茨基及其他等人。可

是，在事實上，第二國際底基本工作，當時都是按照機會主義底路線進行的。機會主義者當時由於他們迎合性的小資產階級的天性而迎合了資產階級，而「正統派」也是爲着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爲着維持「黨內和平」起見而迎合了機會主義者。結果便弄成了機會主義底統治，因爲，資產階級底政策和「正統派」底政策間的鍊條已經聯貫起來了。

這是資本主義底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即所謂戰前的時期，那時，帝國主義底將要引起大災難局面的矛盾，還沒有來得及完全明顯地暴露出來，那時，工人的經濟罷工和職工會還多少「照常」發展着，那時，選舉鬥爭和國會黨團還產生了「衝昏頭腦的」成效，那時，人們把合法的鬥爭形式頌揚得高入雲霄，想要用合法手段來「打死」資本主義，——總而言之，那時，第二國際底政黨一天一天長得肥胖的，不願意認真想到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羣衆底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論，而是脫離了羣衆底實際革命鬥爭的和變成了死板教條的自相矛盾的理論觀點和理論斷片。爲要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想起馬克思底

理論，可是，爲的是要剷去這理論中的活潑的革命的精神。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態度和畏縮的政客手腕，議會的外交手段和議會的拉攏行爲。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時也會通過革命的決議和口號，可是，爲的是要把這種決議和口號擱置起來。

不是使黨在自己的錯誤中領受教育和學習正確的策略，却反而小心躲避迫切問題，掩蔽和抹煞這些問題。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自然也會不嫌說到緊急問題，可是，爲的是要用一些『橡皮性的』決議來敷衍了事。

第二國際底面目，牠的工作方法，牠的武庫，就是這樣的。

而同時，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戰鬥底新時代，却已經到臨。在財政資本無上威權面前，舊的鬥爭方法，已經是顯然不夠的和軟弱無力的了。

當時，必須重新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工作，牠的整個工作方法，必需驅除庸俗態度，狹隘觀點，政客手腕，叛徒行爲，社會大國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當時，必須審查第二國際底整個武庫，拋棄一切生鏽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式的武器。當

時假如沒有做這種預備工作，那末就根本莫想去與資本主義作戰。當時假如沒有做這種工作，那末無產階級遇到新的革命鬥爭時，就一定會遇到武裝不足或者簡直沒有武裝的危險。

這個把第二國際底污濁馬廐拿來做一番總審查和總清洗的光榮任務，便落到了列寧主義身上。

列寧主義底方法，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出來和鍛鍊出來的。

這個方法底要求是怎樣的呢？

第一，是要在羣衆的革命鬥爭火燄中，在具體的實際工作火燄中，去審查第二國際底各種理論教條，這就是說，要恢復那個已被破壞了的理論和實際間的一致，要消滅這兩者間的分離狀態，因為，祇有這樣，才能造成那具備有革命理論的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

第二，是要不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決議和口號（牠們的決議和口號是不可相信的），而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實際工作去審查第二國際政黨底政策；因為，祇有這

樣，才能獲得和值得無產階級羣衆底信任。

第三，是要根據新的革命的精神，根據教育羣衆及準備羣衆從事革命鬥爭的精神，去改造黨的全部工作，因爲，祇有這樣，才能準備羣衆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第四，是要無產階級政黨進行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政黨在自己的錯誤中受訓練和受教育，因爲，祇有這樣，才能教育出黨的真正的幹部和真正的領袖。

這就是列寧主義方法底基礎和實質。

這種方法在實際中怎樣應用了呢？

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們有一些理論的教條，他們總是死守成規，總是拿這些教條來做一切行動底出發點。試舉其中幾條來看吧。

第一個教條：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條件。機會主義者要人相信，無產階級如果在本國人口內不佔大多數，牠就不能夠而且不應該奪取政權。一點證據也沒有，因爲，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沒有可能來辯護這個荒謬的觀點。列寧回答第二國際底先生們說，我們就假定是這樣吧。可是，如果造成了這樣一種歷史環境

（戰爭，農業危機等等），在這種環境之下，無產階級雖在人口中佔少數，可是牠有可能來把極大多數的勞動羣衆團結在自己的週圍，——那末，爲什麼牠不應當去奪取政權呢？爲什麼無產階級不應當去利用順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來衝破資本主義底戰線，並加速總爆發底到來呢？難道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說過，如果德國當時會有所謂『農民戰爭底再版』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情況當時就會『很好』了嗎？難道大家不是都知道，當時德國的無產者要比一九一七年俄國的（比方說）無產者相對地少些嗎？難道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實際還沒有證明，第二國際英雄們底這一個得意的教條對於無產階級是絕無絲毫實際的意義嗎？羣衆革命鬥爭底實際正在打擊和打倒這個陳腐的教條，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第二個教條：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數的現成的能夠治理國家的文化人材和行政人材，牠就不能保持政權，——起初必須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造就這種人材，然後才可以奪取政權。列寧回答道，我們就假定是這樣吧，可是，爲什麼不能把事情

這樣弄轉過來，起初先奪取政權，給無產階級發展造成一種順利的條件，然後便一日千里地前進，以便提高勞動羣衆底文化程度，以便造就很多由工人出身的領導人材和行政人材。難道俄國底實際還沒有證明：在無產階級政權下面，工人出身的領導人材底增長，要比在資本政權下面迅速百倍和澈底百倍嗎？羣衆革命鬥爭底實際把機會主義者底這一個理論的教條也在無情打倒，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第三個教條：政治的總罷工的方法，無產階級是不能採用的，因為這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沒有根據的（請參看恩格斯底批評），在實際上是危險的（能破壞國家經濟生活底常態，能虛耗職工會底基金等等）。這種方法不能代替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議會的鬥爭形式。列寧主義者回答說：好吧，但是，第一，恩格斯所批評過的並不是任何的總罷工，而只是某一種總罷工，即無政府主義者爲代替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而提出來的無政府主義者經濟總罷工；——這與政治總罷工的方法有什麼關係呢？第二，什麼人和什麼地方證明過，議會的鬥爭形式是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呢？革命運動底歷史難道不是證明，議會鬥爭僅僅是組織無產階級在

議會以外的鬥爭的學校和助手嗎？難道不是證明，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運動底基本問題，是要用暴力，用無產階級羣衆直接鬥爭，用他們的總罷工，用他們的暴動來解決的麼？第三，關於以政治總罷工底方法來代替議會鬥爭這個問題，是從那裏找來的呢？主長政治總罷工的人，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曾企圖用議會以外的鬥爭形式來代替議會的鬥爭形式呢？第四，俄國的革命難道還沒有指明：政治總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最偉大的學校，是在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前夜動員並組織廣大無產階級羣衆的一個不可替代的工具麼？這與關於破壞經濟生活底常態及工會基金等等庸俗思想的怨言，有什麼關係呢？革命鬥爭底實際把機會主義者底這個教條也打得粉碎，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還有其他許多的諸如此類的教條。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列寧說過：『革命的理論不是教條。』『革命的理論只是在與真正羣衆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密切聯繫中，才能最終形成起來。』（請參看幼稚病）因為理論應該供實際使用，因為『理論應該回答爲實際所提出的

問題」(請參看人民底朋友)，因為理論應該被人拿實際材料來考驗。

至於講到第二國際政黨底政治口號和政治決議，那末，祇要想起「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口號底歷史，就足以了解這些政黨底政治實際是何等虛偽和腐敗了，牠們以漂亮的革命口號和決議來掩蔽牠們的反革命的工作。大家都還記得，第二國際在巴塞爾大會上作過盛大的示威，曾威嚇帝國主義者說，要是帝國主義者們敢於開始戰爭，那就免不了要遇到暴動底一切慘狀，並且提出了「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嚇人的口號。可是誰不記得，不久以後，在戰爭正要開始的時候，巴塞爾的決議却已拋在腦後，而向工人們提出了新的口號——為資本主義祖國底光榮而互相殘殺。革命的口號和決議，假如不加以實行，那就一個錢也不值，這難道還不明顯嗎？祇要把列甯底那個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政策拿來和第二國際在戰爭時期的叛徒政策比較一下，便能懂得機會主義的政客是何等卑鄙，列甯主義的方法是何等偉大。我不能不在這裏引證列甯底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本書裏的一段，在這一段內，他無情地痛罵了第二國際首領考茨基底機會主義企圖，這企圖就是想不按政黨

底實際行動而按政黨底紙上口號與文件去估計政黨。列甯說：

「考茨基所實行的是標本式小資產階級的庸俗的政策，以為……提出口號便可以改變情況。整個資產階級民主派底歷史都揭破這種空想：爲了欺騙民衆起見，資產階級民主派過去和現在都總是提出各種各樣的「口號」。問題是要考察他們是否誠意，把他們的言語拿來和他們的行動做比較，不要以唯心的或騙人的空話爲滿足，而要澈底找到階級的實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七七頁）

我更不用說第二國際政黨之懼怕自我批評，不用說他們的各種手腕——如掩蔽自己的錯誤，抹煞迫切問題，用關於百事大吉的虛偽話頭來遮掩自己的缺點，這種話頭消磨活潑的思想，阻礙黨在自己的錯誤上去領受革命教育。這些手腕曾受到列甯底譏笑和辱罵。列甯在他所著的幼稚病這本書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底自我批評說：

「政黨對於自己的錯誤所採取的態度，就是最重要的和最可靠的標準之一，根據這個標準就可以看到這個政黨是不是鄭重做事和是不是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暴露這個錯誤底原因，分析這個錯誤產生時的環境，仔細討論改

正這個錯誤的方法——這便是鄭重的政黨底標誌，這便是政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然後也就是教育和訓練羣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一頁）

有些人說，揭破自己的錯誤和實行自我批評，這對於黨是危險的，因為敵人可以利用這一點來反對無產階級底黨。列寧曾認為這種反駁是不鄭重的，並且是完全不正確的。關於這一點，還在一九〇四年的時候，當我們的黨還是幼弱微小的時候，列寧就在自己的進一步退兩步這本書上面說道：

「他們（馬克思主義者底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的爭論，便幸災樂禍和鄙視譏笑；他們爲了自己的目的，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地利用我這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是專門談論我們黨底缺點和失錯的）中的個別地方。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戰鬥中已經受够了鍛鍊，不致爲這些小小的針刺所驚動，能够不管這些針刺而繼續其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地揭破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底發展而被克服。」（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列寧主義方法底特點，大體上就是這樣的。

列寧底方法中所給出的東西，在馬克思底學說中大致已經都有了，這個學說，照馬克思自己的口氣來說，「實質上乃是批評的和革命的學說」。正是這一種批評的和革命的精神，自始至終地貫注着列寧底方法。但是假如以為列寧底方法僅僅是馬克思方法底恢復，那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列寧底方法不僅只是馬克思底批評的和革命的方法底恢復，不僅只是馬克思唯物辯證法底恢復，而且是這個方法底具體化和往前發展。

三 理論

從這個題目內，我要拿出三個問題來講：第一，就是關於理論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意義；第二，就是關於對自發「論」的批評；第三，就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

第一，關於理論底意義。有些人認為，列寧主義是實際重於理論，就是說，在列寧主義裏，主要的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化爲事實，就是「執行」這些原

理，至於說到理論，那麼，他們認爲列寧主義是不關心的。大家都知道，普列漢諾夫曾經屢次嘲笑列寧對於理論，特別是對於哲學的「不關心」。同樣大家亦知道，現在許多列寧主義的實際工作者不很注意理論，特別是因爲他們由於環境的關係不得不一天到晚忙於實際工作。我應該申言，對列寧及列寧主義的這種非常奇怪的見解，是完全不正確的，而且是絕對不合於事實的；實際工作者忽視理論的傾向，是違反整個列寧主義底精神的，而且對於工作是包含着大的危險的。

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歸納起來的經驗。當然，理論假使不和革命的實際聯繫起來，就要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際如果不受革命理論底指示，就要變成盲目的實際。但是假如理論是在和革命的實際密切聯繫中形成的，那末，牠就能夠變成工人運動底極偉大的力量。因爲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能夠給運動以確信力，給運動以確定方針的力量和對於四周事變底內部關係的了解。因爲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能夠幫助實際不僅去了解目前各階級行動底道路和方向，而且去了解在最近的將來這些階級行動底道路和方向。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說過和幾

十次重複說過一個著名的原理，就是：

『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革命運動。』（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列甯比誰都更是了解理論底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我們這個黨，因為這個黨是擔負着國際無產階級先進戰士底作用，而又處於四圍這種極複雜的國內和國外環境之內。還在一九〇二年，他就預先看到了我們黨底這種特殊的作用，在那時候他就已經認為必須指出：

『祇有爲先進理論所指導的黨，才能執行先進戰士底作用。』（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現在當列甯關於我們黨底作用的預言已經化爲事實的時候，列甯底這個原理是有特別的力量和特別的意義，這是無需證明的。

在唯物主義的哲學方面，把從恩格斯到列甯這時代中科學上最重大的發明綜合起來，並從各方面去批評馬克思主義者隊伍裏的反唯物主義的派別，這是一個最重大的任務，執行這個任務的不是別人，而是列甯；這件事實也許可以算做列甯異常

重視理論底最明顯的表現。恩格斯說：『每一個偉大的新發明出現後，唯物主義便要採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甯，在他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這本出色書籍裏面替當時執行了這個任務。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是喜歡嘲笑列甯『不關心』哲學的，而這個普列漢諾夫，却甚至於沒有敢於認真着手去執行這個任務。

第二，對自發論的批評，或關於先鋒隊在運動中的作用。自發論是機會主義底理論，是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理論，是實際上否認工人階級先鋒隊——工人階級政黨——底領導作用的理論。

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底革命性質，反對工人運動向着反對資本主義底基礎這方面來進行。牠主張工人運動完全祇向着那些爲資本主義『可以執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那方面去進行；牠完全主張『阻力最少的路線』。自發論是工聯主義底思想。

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使自發運動帶着覺悟的和計劃的性質。牠反

對政黨走在工人階級前面；反對政黨把羣衆提高到有覺悟底程度，反對政黨領導運動。牠主張運動中的覺悟份子不要妨害運動按照自己的道路前進，牠主張政黨祇聽從自發運動，做這種運動底尾巴。自發論是減低覺悟份子在運動中的作用的理論，是『尾巴主義』底思想，是一切機會主義底邏輯的基礎。

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這個理論就已經出現於舞台了，這個理論，在實際上曾經弄到使牠自己的信徒，所謂『經濟派』，否認了在俄國有獨立的工人政黨的必要，反對了工人階級爲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鬥爭，鼓吹了運動中的工聯主義的政策，總而言之，把工人運動交給了自由資產階級去領導。

舊火星報底鬥爭和列甯在做什麼一書上對『尾巴主義』理論所作的精彩的批評，不僅打倒了所謂『經濟主義』，而且創造了俄國工人階級底真正革命運動底理論基礎。

假如沒有這種鬥爭，當時就莫要想去創造俄國的獨立工人政黨，就莫要想由這個政黨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了。

但是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不僅是俄國的現象。牠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政黨裏都是廣泛流行的，雖然表現的形式是稍微有些不同。我所指的是第二國際首領們所慣用的所謂『生產力』論。這個理論辯護一切事物，調和一切人，牠當某些事實早已爲大家聽得討厭以後，才把牠們指出來並加以解釋，指出以後，牠就安心下去了。馬克思說：『唯物主義的理論不能祇限於解釋世界，牠還應該要改造世界。』但是，考茨基和他的伙伴們却不管這一點，他們甯願停留在馬克思公式底前半段上。請看應用這個『理論』的許多例子中的一個例子罷。人們說，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第二國際底政黨曾經發表恐嚇的言論，說假如帝國主義者開始戰爭，他們便宣佈『以戰爭對付戰爭』。人們說，在戰爭正要開始的時候，這些政黨就把『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個口號拋在腦後，而實行了一個相反的口號——爲帝國主義的祖國而戰爭。人們說，因爲這樣變更口號的結果，使幾百萬工人犧牲了性命。但是如果以爲這裏有什麼人犯了罪過，某人叛變了或出賣了工人階級，那就想錯了。絕對沒有過這樣的事情！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事情，都好像是必然要這樣發生的。第一，因

爲第二國際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第二，因爲在當時所有的那種『生產力底程度』之下，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這是『生產力』底『罪過』。考茨基先生底『生產力論』正是這樣向『我們』解釋。而誰不相信這種『理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黨底作用呢？黨在運動中的意義呢？但是，黨對於像『生產力底程度』這樣的決定因素，能有什麼辦法呢？……

這種假冒馬克思主義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大堆來。

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以掩飾機會主義底真面目爲使命的假冒的『馬克思主義』，祇是這樣一種『尾巴主義』理論在歐洲方面的變形表現，而列寧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就已經向這種理論作過鬥爭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打破這種理論上的假冒，乃是在西方創立真正革命政黨的先決條件。

第二，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從三個基本原理出發的。

第一·個·原·理·：資本主義先進國內財政資本底統治；發行有價證券是財政資本底主要營業；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是帝國主義底基礎之一；財政寡頭底無上威權是財政資本統治底結果，——所有這些，便揭露出壟斷的資本主義底粗鄙的寄生的性質，使資本主義的新迪加和托拉斯底壓迫更加百倍令人難受，使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基礎的義憤加強地增長，使羣衆趨向無產階級革命而把無產階級革命當作他們唯一的救星（請參看列寧著的帝國主義）。

從這裏便要得出第一個結論：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在「宗主國」國內的無產階級的戰線上爆發底原素日益增長。

第二·個·原·理·：向殖民地 and 附屬國加緊輸出資本；擴大「勢力範圍」和殖民地領土，直到包括全世界；資本主義變為由極少數的「先進」國對於世界上極大多數人民施行財政資本的奴役和殖民地政策的壓迫的世界系統；——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單個的民族經濟，單個民族領土，變為所謂世界經濟這條條鍊子底各個環節，另一方面，將全世界的人民分成兩個營壘：剝削和壓迫廣大殖民地 and 附屬國的那極少數

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和迫得要作鬥爭以求解脫帝國主義的壓迫的那極大多數的殖民地及附屬國（請參看帝國主義）。

從這裏就要得出第二個結論：就是在殖民地國家裏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在國外的殖民地的戰線上反帝國主義的義憤底原素日益增長。

第三個原理：『勢力範圍』和殖民地底獨佔；各資本主義國家底不平衡的發展，這種發展，引起已經搶得領土的國家和希望得到自己的『份額』的國家中間爲重分世界而起的猛烈的鬥爭；帝國主義戰爭，這種戰爭是恢復那已經破壞的『平衡』的唯一手段，——所有這些，便使得第三條戰線——即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線緊張起來，便減弱着帝國主義底勢力，並使頭兩條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即革命的無產階級戰線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戰線，易於聯合起來（請參看帝國主義）。

從這裏就要得出第三個結論：就是在帝國主義之下，戰爭是不能避免的，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聯合成爲統一的世界的革命戰線，以對抗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線。

這也就是統一戰線的基礎。

列寧又將上面這一切結論，綜合成爲一個總的結論，就是：『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一頁）

因此，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革命底性質，範圍，深度，以及革命底一般方案這些問題的觀點，亦隨着改變。

從前，通常都是從某個單獨國家底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去分析無產階級革命底前提。現在，這種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必須從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或大多數國家底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從世界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去觀察這個問題，因爲各單個國家與各單個民族經濟已經不是自顧自的單位了，已經成了所謂世界經濟這條鍊子底各個環節了。因爲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即是那爲數極少的『先進』國對地球上極大多數的人民施行貳政資本奴役和殖地政策壓迫的全世界系統。

從前，通常都是說在某些個別國家裏，或者更確切些說，在某一個發展了的國家裏，有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底客觀條件存在。現在，這個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

在必須說，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個統一的整體底整個系統中，已經有革命底客觀條件存在。而且，如果，或者更確切些說，因為整個系統已經成熟到革命程度，那末這系統中的某幾個國家工業不甚發展，並不能成為對於革命的一種不可征服的障礙。

從前，照例總是說某一個先進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把牠當作一個單個的自願自的現象，而以單個的一國的資本戰線為敵手。現在，這種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必須說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各單個的國家的資本戰線已經變成了所謂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線這條鍊子底各個環節了，必須拿各國革命運動底總戰線來對抗這個世界帝國主義戰線。

從前總是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純粹是某一個國家內部發展底結果。現在，這種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應把無產階級革命首先看做是帝國主義世界系統中矛盾發展底結果，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這條鍊子在某個國家裏破裂的結果。

革命將在那裏開始呢？資本底戰線首先會在那裏，會在那種國家裏被衝破呢？

以前，人們照例總是都回答道：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地方，在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在民主精神較多的地方。

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反駁道：不，不一定要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資本戰線將在帝國主義鍊子較弱的地方被衝破；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這條鍊子在他的最弱的地方破裂的結果。而且，可以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開始了革命的國家，衝破了資本戰線的國家，是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比較低的國家，而其他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却依舊留在資本主義底範圍以內。

在一九一七年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的鍊子，在俄國是比其他各國要薄弱些。這鍊子就在這裏被衝破了，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爲什麼呢？因爲，在俄國會展開了以革命的無產階級爲首的最偉大的人民革命，而無產階級有了千百萬爲地主所壓迫和剝削的農民這樣重大的同盟者。因爲，在俄國與革命對立的曾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帝國主義最醜惡的代表，牠沒有絲毫精神上的威信，而爲一般人民所痛恨。雖然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底程度，會比較——譬如說——法國或德國，英國或美

國低些，然而帝國主義的鍊子却原來比較薄弱些。

在最近的將來，這鍊子將在什麼地方被衝破呢？仍然是在比較薄弱的地方。比如說，這鍊子也許會在印度被衝破，這不是沒有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印度有新興的奮勇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有民族解放運動這樣的同盟者，——這無疑義的是一個偉大的和重大的同盟者。因爲，那裏與革命對立的是大家所知道的這個敵人，即外國帝國主義，這個敵人沒有精神上的信用，而爲印度一般被壓迫的被剝削的羣衆所痛恨。

這鍊子也許會在德國被衝破，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比方，那些在印度活動着的因素，在德國也開始活動着，同時，很明顯的，在印度與德國之間，發展的程度有莫大的差別，這不能不影響到德國革命底進程和結局。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列甯說：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正在完成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並不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中平衡的『成熟』，而是經過一些國家之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過在帝國主義戰爭

中第一個戰敗國家之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之被剝削。另一方面，正因為這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東方各國就最終地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地被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底總漩渦。（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六頁）

總而言之：帝國主義戰線底鍊子照例應該在牠較薄弱的環節上被衝破；但無論如何，也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較發展的地方，不一定要在工人佔百分之幾，農民佔百分之幾等等的地方。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關於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人口總數裏所佔百分數的統計數字，在解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時，並沒有什麼非常的意義，而第二國際裏的那些不懂帝國主義而又懼怕革命如瘟疫的書獃子們，却喜歡把這種統計當作有非常意義的事情。

其次，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曾經肯定說（而且現在還是肯定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有一個無底的深淵，或者至少是有一座萬里長城，這座萬里長城使這兩個革命彼此隔着一個多少長久的距離時期，在這個距離時期中，

得到了政權的資產階級，發展着資本主義，而無產階級則積聚着力量和準備着反資本主義的「堅決鬥爭」。這個距離時期通常是以好幾十年來計算，或者更長久些。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底環境內是毫無科學根據的，牠祇是，而且不能不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慾望底掩蓋和粉飾。顯然用不着證明，在包含着許多衝突和許多戰爭的帝國主義底環境內，在「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底環境內，當「興盛的」資本主義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而革命運動在全世界所有一切國家裏發展着的時候；當帝國主義聯合所有一切反動力量（直到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為止），因而使一切革命勢力（從西方無產階級運動起到東方民族解放運動止），都必須聯合一致的時候，當非是與帝國主義作革命鬥爭便不能推翻封建農奴制度殘餘的時候；——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種條件之下，在一個多少發展了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和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起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的革命史已經顯然證明了，這個原理是正確的和不容辯駁的。無怪列甯還在一九〇五年時，在俄國第一次革命底前夜，在兩個策略這本小冊

子裏，就已經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條鍊子底兩個環節，看做俄國革命發展規模底一致的和完整的表現：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爲要做到這點，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和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爲要做到這點，就要把人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和麻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這便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火星派在其關於革命底規模問題的一切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如此狹隘。』（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我還不去說列甯底其他的，比較晚些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關於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這個觀念，比在兩個策略中更說得明顯。這個觀念就是列甯的革命理論底基礎石之一。

而有些同志却以爲列甯在一九一六年時才得出這個觀念，以爲列寧在一九一六年以前還認爲俄國革命將停滯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於是政權也將從工農專政機關

手上轉到資產階級手上，而不是轉到無產階級手上。聽說這種說法甚至流傳到我們共產黨的報章上來了。我應該說，這種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完全不合於事實的。

我可以引證列甯在我們黨底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裏的著名演說，他在這篇演說中，把工農專政，即民主革命底勝利，不是當作『秩序底組織』，而是『戰爭底組織』。（請參看列甯全集第七卷，第二六四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甯關於臨時政府這篇著名論文（一九〇五年）；在這篇論文裏，他在描寫俄國革命底發展前途時，給黨提出以下的任務，就是：『務必使俄國革命成爲多年的運動，而不是幾個月的運動；務必使這革命不僅達到現時執政當局底小小讓步，而要達到完全推翻這種執政當局』，在這篇論文裏，他並且更把這個前途發揮下去，把牠和歐洲革命聯繫起來，而繼續說道：

『假如能够做到這一步，那時……那時革命的火燄將燃起歐洲；在資產階級反動下疲困了的歐洲工人也將發動起來，並向我們表明「這件事情應當怎樣做」；那時歐洲的革命

高潮會反轉過來影響俄國，使幾年的革命時代變成幾十年的革命時代。」（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九一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甯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發表的著名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說：

「無產階級在現時，而且在將來還要不惜犧牲地爲着奪取政權，爲着成立共和制度，爲着沒收土地……爲着吸收「非無產階級的民衆」去參加那個使資產階級的俄羅斯擺脫軍閥封建的「帝國主義」（即是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將立刻利用資產階級的俄羅斯擺脫沙皇制度和擺脫地主土地權力而得到解放的這件事情，這不是爲着幫助富裕農民來反對農村工人，而是爲着聯合歐洲無產階級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二八頁）

最後，我還可以引證列甯所著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小冊子裏的一段著名的話，在這段話內，他引了兩個策略中的一節（即我們在上面引證過的，關於俄國革命底規模這一節）而得到下面的結論：

「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底進程證明了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與『全體』農民一塊來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然後與貧農一塊，與半無產階級一塊，與一切被剝削者一塊，來反對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鄉村富人，富農，投機商人，所以革命就變成社會主義的。除了無產階級底準備程度及牠和鄉村貧民的聯合程度之外，企圖用其他的東西來分隔這兩種革命，企圖在牠們之間建立一座人造的萬里長城，這便是對馬克思主義作極大的曲解，使牠鄙俗化，以自由主義來代替牠。」（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一頁）

大概已經夠了罷。

有人會向我們說：好吧！但是既然這樣，那末列寧爲什麼會和『不斷革命』觀念作鬥爭呢？

因爲，列寧主張『用盡』農民底革命能幹，徹底利用他的革命能力，以便完全消滅沙皇制度，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斷革命』派則沒有懂得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輕視農民革命能力底力量，輕視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

量和能幹，因此便妨害了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事業，把農民團結於無產階級周圍的事業。

因爲，列寧主張以政權之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上，來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派却想直接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開始，他們不懂得他們這樣便是不願看見像農奴制度殘餘這樣的『小事情』，便是沒有顧到像俄國農民這樣的重大力量；他們不懂得，這樣的政策祇能妨害無產階級去進行爭取農民的工作。

可見，列寧當時與『不斷』革命派鬥爭，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斷性問題，因爲列寧自己就是站在不斷革命觀點上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即無產階級底這個極偉大的後備軍——底作用，而是因爲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領導權底觀念。

『不斷革命』這個觀念並不是一個新的觀念。這個觀念最初是由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在他的著名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一八五〇年）中提出來的。我們的『不斷革命派』也就是從這個文件中取得了不斷革命這個觀念。應該注意到：我們的『不斷革命派』從馬克思那裏把這個觀念拿來以後，就稍許使這個觀

念改變了樣子，改變了樣子以後，就把牠「弄壞了」，使牠不適用於實用了。曾需要列寧底熟練手掌來糾正這個錯誤，取得馬克思底不斷革命觀念底真相，而使牠成爲自己的革命理論底基礎石之一。

請看馬克思在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中關於不斷革命所說的話。在這裏，馬克思在列舉了共產主義者應該爭得的許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後，說道：

「民主派的小資產者，是希望極端迅速地和至多是只要一實行上述的要求就結束革命，可是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却在於：要使革命成爲不斷的，一直進行到一切大的或小的有產階級已經被撤消統治地位的時候，一直進行到無產階級已經爭得國家政權的時候，一直進行到無產階級的聯合不僅在一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統治國家內，已經發展到能使這些國家底無產者們間的競爭歸於停止的程度的時候，一直進行到至少是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已經集中到無產階級手裏的時候。」

換句話說：

(一) 馬克思並沒有主張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革命事業直接從無產階級的

政權來開始，這和俄國的『不斷革命派』底計劃相反。

(二) 馬克思祇是主張以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來完成革命，一步一步地接着把各派資產階級從政權底高峯上推倒下去，以便在達到無產階級政權以後，再把革命火燄燃遍於全世界。這與列寧根據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而教導了我們的以及他在俄國革命過程中所實行過的完全相合。

可見，俄國的『不斷革命派』，不僅是輕視了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不僅是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權觀念底意義，而且改變了（改壞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觀念，使牠不適用於實用。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會嘲笑我們的『不斷革命派』底理論，稱牠為『新奇的』和『漂亮的』理論；責備他們不願意『想一想，為什麼實際生活在整個十年內都繞過這個漂亮的理論而前進了。』（列寧底這篇論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寫的，恰巧在『不斷革命派』底理論在俄國發現以後已經過十年的時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七頁）。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列寧曾認爲這個理論是半孟塞維主義的，他說，這理論「從布爾塞維克那裏拿去的是號召無產階級作堅決的革命鬥爭和奪取政權，而從孟塞維克那裏拿去的是「否認」農民底作用。」（請參看同一卷上的論文關於革命底兩條路線）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觀念，關於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來「立刻」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觀念，就是這樣。

其次，以前認爲，在一個國家內，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爲要戰勝資產階級，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的，或至少是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底共同發動。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根據這種勝利是可能的這點來出發。因爲帝國主義環境內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發展上的不平衡的和躍進的性質，帝國主義內部那種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得在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國革命底歷史，已經直接證明了這一點。不過這裏我們必須要記住：只有一些完全

必要的條件具備時，才能有成效地推翻資產階級；沒有這些條件，就簡直莫要想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請看列寧在幼稚病這本小冊子內怎樣說到這些條件：

『爲一切革命，局部地爲二十世紀俄國三次革命所證明了的革命底基本定律，就在於：只是被剝削的和被壓迫的羣衆覺悟到不可照舊生活和要求改革，這對於革命還是不夠的；對於革命，還須要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管理下去。只有在「下層」不願意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和管理下去的時候，只有那時候革命才能勝利。這個真理若換句話說就是：沒有全國的（使被剝削者和剝削者同時都受到牽動的）危機，革命是不能的*。這就是說，對於革命，必須：第一，達到使大多數的工人（或者至少是大多數有覺悟的，有思想的，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了解革命是必要的並且已決意爲着這個革命而舍身拚命；第二，要統治階級受到政府的危機，這危機甚至把最落後的羣衆都牽引來參加政治……，使政府軟弱無力和使革命者得以迅速推翻牠。』（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三頁）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但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這還不算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革命已經勝利的國家裏的無產階級，既鞏固了自己的政權並領導着農民，就能夠而且應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不是說，這樣牠便會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的，最後的勝利呢？換句話說，這是不是說，牠單靠一國底力量能夠最後鞏固社會主義並完全保證國家不受外國的武裝干涉的危險，也就是說，完全保證不受復辟的危險呢？不，不是的。爲要達到這點，至少要有幾個國家內的革命底勝利。因此，發展及幫助其他國家的革命，乃是已經勝利的革命底一個重大任務。因此，革命已經勝利的國家不應把自己看作自願自的東西，而應把自己看作是加速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助手和工具。

列寧用兩句話表明了這個意思，他說，已經勝利的革命底任務就是：『最高限度地施行在一個國家裏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世界各國底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一般地說來，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底特點，就是這樣。

四 無產階級專政

在這個題目中，我提出三個基本問題來講：（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武器；（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

（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武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首先就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這革命底運動，規模，成績，祇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武器，是革命底機關，是革命底最主要的支柱，牠的使命就是要：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底反抗和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將革命進行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這是革命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能夠做到的。但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底相當階段上創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特殊的機關以作爲自己的基本支柱，那麼牠就不能夠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不能夠

保持勝利和向前進展到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

『革命底基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列寧）這是不是說，事情祇限於取得政權，奪取政權呢？不，不是的。取得政權——這僅僅是事情底開始。資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被推倒之後，由於許多原因，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牠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因此全部任務都在於要保持政權，鞏固政權，使牠必勝不敗。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應該怎樣辦呢？爲要做到這一點，至少是必須執行下面三個任務，這些任務在革命勝利後『第二天』便要擺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

（一）撲滅那些爲革命所推翻了的和所剝奪了的地主和資本家底反抗；消滅他們謀恢復資本政權的一切的任何的企圖。

（二）用團結一切勞動者於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來組織建設工作，並使這工作向着那準備消滅和肅清階級的方向進行。

（三）將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底軍隊，以便與國外敵人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

爲了執行和完成這些任務，便必須要有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說：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是整個的歷史時代。當這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必然還希望復辟，而這種希望便變爲復辟的嘗試。在第一次嚴重失敗之後，被推翻了了的剝削者——他們不會料到會被人推翻，他們不相信這點，沒有想到這點——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起來鬥爭，謀恢復他們的已被奪去的「天堂」，謀他們的家庭幸福——他們的家庭從前過着多麼甜蜜的生活，而現在則被這般「下賤人」弄得破產和貧困（或者弄到從事「下賤的」勞動……）。而在剝削者資本家後面，有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跟着。幾十年來各國歷史的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是猶豫不決和動搖不定的，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則因革命底困難而恐懼，因工人底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經錯亂，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在兩個營壘間跑來跑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五頁）

而資產階級做復辟底嘗試是有牠的根據的。因爲資產階級在被推翻以後，在長時期內還比推翻了牠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

列寧說：

『要是剝削者僅在一國內被打倒了——而這一點當然是普通的事情，因為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乃是少有的例外，——那末他們仍舊還是比較剝削者強有力些。』（請參看同上一卷，第三五四頁）

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底力量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就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就在於資產階級底國際聯繫底力量和結實性。』（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第二，就在於『在革命以後，剝削者在長時期內還保存着許多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金錢（立刻消滅金錢是不可能的），還有某些動產（往往是很多的），還有相互的聯繫，組織底和管理底技能，還有一切管理『秘訣』（習俗，方法，手段，機會）底知識，還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並接近於高等的技術人員（那些過着資產階級式的生活與抱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人），還有比較大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技能（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第三，『就在於習慣勢力，就在於小生產的勢力，因為，可惜得很，小生產在世界上

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則經常地，每日每時，自發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爲「消滅階級，這不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已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還是消滅小的商品生產者，而這種人是不能驅逐的，不能鎮壓的，應該和他們共居，能够（而且應該）改造他們，教化他們，而且只能用很長久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來改造他們，教化他們。」（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和一九〇頁）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要反對強有力的敵人起見，爲要反對資產階級起見而進行的最厲害的，最尖銳的，最殘酷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將因牠自己之被推翻而增加十倍，」……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

（見同上卷第一七三和一九一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要在短時期內來完成這些任務，要在幾年內實行這一切，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不應該把無產階級專政，把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

渡，看做是一個很短的時期，看做是一些『最革命的』動作與訓令，而應該把牠看做是整個的歷史時代，在這時代中充滿着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堅忍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守，勝利和失敗。這一個歷史時代之所以需要，不僅是爲了創造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底經濟和文化的先決條件，並且是爲了使無產階級能夠：第一，教訓並鍛鍊自己成爲一種能夠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教化並改造小資產階級的階層，以便保證社會主義生產底組織。

馬克思曾告訴工人說：

『你們應當經受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鬥，不僅是爲了改變現存的社會關係，而且是爲了改變你們自己和使你們自己變成爲能夠進行政治統治的人材』

（請參看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五〇六頁）。

列寧繼續了和更加發展了馬克思底這個思想，他說：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須要教化成百萬的農民和小業主，成十萬的職員，官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使他們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

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樣，也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上，在長期的鬥爭中來教化無產者自己，他們不是立刻便能脫除他們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成見，不是用奇術，依聖旨，一提出口號，一通過決議，一公佈法令，便能脫除這些成見的，只有與大批的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作長久的，艱難的羣衆鬥爭，他們才能够擺脫這些成見。」（請參看列寧

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八和二四七頁）

（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從上面的說話中，已經可以看到，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不侵犯舊的經濟與政治制度的條件下面更換政府人員，更換「內閣」等等。各國的孟塞維克與機會主義者，非常懼怕專政，好像懼怕洪水猛獸一樣，他們因為懼怕得太厲害，便把所謂「爭取政權」的觀念來代替專政的觀念，他們通常把「爭取政權」歸結為更換「內閣」，歸結為由謝德曼和諾斯克，麥克唐納爾和亨德遜這一類人來組織新內閣和登台執政。用不着解釋，這種以及諸如此類的更換內閣，是與無產階級專政，與由真正的無產階級爭取真正的政權，毫無相同的地方。麥克唐納爾和謝德曼在保留着資產階級制度的條件下掌握政

權，所謂他們的政府，並不是別的，而不過是資產階級手中的御用機關，祇是帝國主義瘡癩底遮蓋物，祇是資產階級用以反對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底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方便，就不順利和難於剝削和壓迫羣衆的時候，牠就需要這些政府來做屏風。當然，這種政府之出現，乃是「他們那裏」（就是說，在資本家們那裏），在「希普喀」那裏，情況不安底象徵，但是無論如何，這種政府免不了仍舊是資本底加了粉飾的政府。麥克唐納爾或謝德曼底政府與無產階級爭得政權是相隔這樣遠，正好像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政府底更換，而是新的國家，這個國家有新的地方政權機關和新的中央政權，是在舊的國家——資產階級的國家——底廢址上面產生起來的無產階級的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在資產階級秩序底基礎上產生出來的，而是在推翻資產階級之後，在破壞資產階級秩序的過程中，在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是在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拿來社會化的過程中，在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把對於資產階級施行的暴力拿來做依據的革命

政權。

國家是由統治階級運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底反抗的機器。在這個關係上，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與其他任何階級底專政都沒有區別，因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是鎮壓資產階級的機器。但是這裏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一切舊有的階級的國家是少數剝削者對多數被剝削者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多數被剝削者對少數剝削者的專政。

總而言之：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這統治不受法律所限制，依靠着暴力，而得到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們底同情和幫助（請參看國家與革命）。

從這裏便要得出兩個基本的結論：

第一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是給一切人的，也給富人，也給富人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應該是新式的民主國家——給 * 無產者和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一般窮人以民主的國家；應該是新式的專政國家——爲反對 * 資產階級而施行專政的國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三頁）。考茨基及其夥伴們底言論，說什麼普遍的平等，『純粹的』民主，『十足的』民主等等，這都是以資產階級的精神掩飾這樣一件無可疑義的事實：就是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是不能有什麼平等的。『純粹』民主底理論，是爲帝國主義強盜所收買的和象養的工人階級上層份子底理論。這理論底使命，就是要來掩飾資本主義底瘡癩，粉飾帝國主義和賦與牠以精神上的力量來反對被剝削的羣衆。在資本主義之下，被剝削者沒有得到而且沒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這至少是因爲房屋，印刷所，紙料堆棧等等——爲着利用『自由』權起見所必須的東西——都是剝削者底特權。在資本主義之下，由被剝削羣衆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的事情，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這至少是因爲在資本主義底條件之下，甚至於就是在有最民主的制度的國家裏，政府都不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是由人民所指定的，而是由路特希理德和司丁尼斯，洛克費爾和摩爾根這般人所指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是剝削者的少數人底民主，是依靠於限制被剝削者的大多數底權利的，是用以反對這大多數人的。祇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被剝削者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無產者和農民才有可能去真正參加國家底管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被剝削者的大多數人底民主，是依靠於限制剝削者的少數人底權利的，是用來反對這少數人的。

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底發生，不能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底結果，——牠的發生祇能是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破壞資產階級的軍隊，破壞資產階級的官僚機關，破壞資產階級警察的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國內戰爭底序言上說：

『工人階級不能夠簡單地佔有現成的國家機器和運用牠來達到自己本身的目的。』

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給顧格爾曼的書信內又說：無產階級革命應該：

『……不像向來一樣，把官僚軍閥的機器，一手傳一手，而應該將這架機器打破……』

——這是歐洲大陸上一切真正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

馬克思在這裏只說到歐洲大陸，這樣便給了各國機會主義者和孟塞維克一個藉口來喊道：可見，馬克思會假定說，資產階級的民主，經過和平道路來發展到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可能的，至少對於歐洲大陸以外的幾個國家（英，美）是可能的。的確，馬克思會假定說有這種可能，也曾有根據來假定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美兩國有這種可能性，因為當時還沒有壟斷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帝國主義，由於特殊的發展條件，這些國家中還沒有發展的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發展的帝國主義未出現以前，情形曾經是這樣。但是經過三四十年以後，這些國家中的情形已根本改變了；在這個時候，帝國主義已發展並普及到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時候，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英美也已經出現了；在這個時候，英美和平發展底特殊條件已經消滅了——把這些國家看作例外，這也自然應當失去時效了。

列寧說：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種例外要失去

時效了。美國和英國，本來是英吉利撒克遜「自由制」——在沒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底最大的和最後的代表，現在，牠們已經完全墮入一般歐洲式的，征服一切和壓制一切的官僚軍閥機關底這個污濁的，血腥的泥潭中了。現在，無論在英國，無論在美國，「一切真正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就是打破，破壞「現成的」（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間，造成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善地步的）「國家機器」。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頁）

換句話說：關於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規律，關於以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器作為這種革命底先決條件的規律，乃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裏的革命運動底必不可免的規律。

當然，在遙遠的將來，假如無產階級在最重要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獲得勝利，假如現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形勢將由社會主義包圍的形勢所代替，那時候，某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些國家裏的資本家們因感覺到國際環境「不利」，會認為最好是「自願地」向無產階級大讓步。但

是這種推想祇是關於遙遠的和可能的將來。對於最近的將來，這種推想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是絕對沒有任何根據的。

因此，列寧說得對：

『如果不用暴力來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和不用新的來代替牠，那末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四二頁）

（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就是壓倒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明顯的。但是要利用什麼組織才可以完成這種巨大工作呢？在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基礎上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底舊式組織，對於這種工作是不夠用的，——這是無容懷疑的事情。究竟是無產階級底那種新式組織能夠成為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底掘墓人，不但能夠打破這架機器，不但能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夠成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基礎呢？

無產階級底這種新式組織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與舊式組織比較，牠的優點在那裏呢？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最包括一切的羣衆組織。因為牠，而且祇有牠才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這樣唯一的羣衆組織，就是牠包括所有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工人和農人，陸軍兵士和海軍兵士，因此，在這個組織中，羣衆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可以最容易地和最完全地實現牠對羣衆鬥爭的政治領導。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羣衆革命鬥爭，羣衆政治發動，羣衆暴動底最強有力的機關，是有本事去打破財資本底無上威權及其政治附屬物的機關。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羣衆本身底直接組織，即是羣衆底最民主的，也就是最有威權的組織，牠能盡量便利着他們參加新的國家底建設和管理，牠能盡量展開羣衆在爲破壞舊制度，在爲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的鬥爭中的革命毅力，倡導性和創造能力。

蘇維埃政權就是由各地方的蘇維埃聯合起來和形成起來的總的國家組織，無產

階級……牠是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底先鋒隊，牠是統治階級……底國家組織，就是說，聯合起來的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正是從前受地主和資本家壓迫的那些階級底最廣泛的和最革命的組織，現在是『整個國家政權，全部國家機關底經常的和唯一的基礎』，正是『這樣一些羣衆，這些羣衆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在法律上雖有平等權利，而在『實際上，則被千百種方法和詭計所排擠而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的權利和自由，而現在，這些羣衆則被吸收來經常地和一定地，而且是起着決定作用地參加對於國家的民主管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三頁）。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蘇維埃政權是國家組織底新形式，牠與舊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和會議主義的形式有原則上的差別。牠是新式樣的國家，這個式樣的國家不是適合於剝削和壓迫勞動羣衆的任務，而是適合於使他們完全解除一切壓迫和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

列甯說得對：蘇維埃政權一出現，『資產階級民主議會主義底時代就完結了；全世界歷史底新章回：無產階級專政底時代，就開始了』。

蘇維埃政權底特點在那裏呢？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是在有階級存在的條件下一切可能的國家組織中的最廣泛的和最民主的國家組織，因為，牠既然是工人和被剝削的農民在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聯絡和合作底場所，牠在自己的工作中既然依靠着這個聯絡和合作，所以牠就是大多數人民統治少數人民的政權，就是這大多數人民底國家，就是這大多數人民的專政底表現。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是階級社會底一切國家組織中最有國際性的組織，因為，牠既然是破壞一切的民族壓迫而依靠着各民族的勞動羣衆底合作，所以牠就使這些羣衆聯合在統一的國家聯盟內的事業，易於做到。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按其本身結構來說，就能夠使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羣

衆底先鋒隊，就是說使無產階級，就是說使蘇維埃底最有團結的和最有覺悟的核心，易於領導這些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羣衆。

列甯說：『一切革命和一切被壓迫階級運動底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經驗，教訓我們知道：祇有無產階級才能夠統一和領導勞動的和被剝削的人民中零散的和落後的階層。』（請參看列甯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四頁）蘇維埃政權底結構，使這種經驗底指示易於實行。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將立法權和行政權合併爲統一的國家組織並以生產的單位——工廠，來代替地域的選舉區，這樣，牠就把工人和一般勞動羣衆與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繫起來，教育他們去管理國家。

就是在於，祇有蘇維埃政權才能夠使軍隊擺脫對資產階級的指揮部的服從，將牠由在資產階級制度下面壓迫人民的壓迫工具變爲使人民從本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底鐵蹄下面解放出來的解放工具。

就是在於，『祇有蘇維埃的國家組織，才能夠一下子和最終地破壞舊的機關，

就是說破壞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和司法的機關。」（請參看同上的地方）

就是在於，蘇維埃形式的國家，吸引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羣衆組織來經常地和無條件地參加國家管理，祇有牠才能準備國家組織底衰亡，這種衰亡就是將來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底基本成份之一。

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就是經過長久的尋找而終於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這種形式的範圍中，應該完成無產階級底經濟解放，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是這種形式底萌芽。蘇維埃政權是牠的發展和完成。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甯說：

『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式樣的民主機關底形式……而且是唯一的能够保證最順利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一頁）

五 農民問題

在這個題目內，我提出四個問題來講。（一）問題底提法；（二）資產階級民

主革命時期的農民；（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四）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

（一）問題底提法。有人以為，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和農民底作用及其比重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問題。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祇是附屬的問題。

但是，這種情況，絲毫也不使農民問題喪失牠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所確有的重大的，迫切的意義。大家都知道，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開始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在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底前夜，那時，關於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全盤擺在黨面前了，而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就帶着迫切的性質。大家都知道，俄國的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帶着更迫切的性質，這時，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關於爭取和保持無產

階級專政的問題，就使人遇到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這本是理所當然的：誰要去執掌和準備去執掌政權，誰就不能不注意關於自己的真正的同盟者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底一部分，牠這樣也就是列寧主義底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政黨之所以對農民問題取冷淡態度，甚至簡直取否定態度，不僅是因爲西方各國有特殊的發展條件。這首先是因為這些政黨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並不想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懼怕革命，誰要是不願意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誰就不會注意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了，在他看來，關於同盟者的問題是不關痛癢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對於農民問題的譏諷態度，在他們那裏認爲是文禮家風底表現，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底表現。事實上，這裏一點馬克思主義底氣味都沒有，因爲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對農民問題這樣重大的問題取冷淡態度，這在實際上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無疑義地

是表示背叛馬克思主義。

問題是這樣：因為農民生存底某些條件而隱藏在農民裏面的革命可能性，是不是已經用完了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不是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呢？是不是可以將農民，將農民中被剝削的大多數，由資產階級底後備軍——在西方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他們曾是這樣的，而且現在還是這樣的，——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就是說，承認大多數農民有革命的能
力，並且可以爲着無產階級專政底利益來利用這種革命的能力。俄國三次革命底歷史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一點的結論。

由此便得出實際的結論，就是說要援助，一定要援助勞動農民羣衆爲反對奴役及剝削的鬥爭，爲解脫壓迫及貧困的鬥爭。自然，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應該援助任何的農民運動。這裏所說的是援助這樣一種農民運動和這樣一種農民鬥爭，這種農民運動和農民鬥爭能夠直接或間接便利無產階級解放運動，能夠這樣或那樣助長

無產階級革命底力量，能夠促進將農民變為無產階級底後備軍和同盟者的事業。

(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這一時期是從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起到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止。這一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擺脫自由資產階級底影響，離開立憲民主黨，而轉到無產階級方面，轉到布爾塞維克黨方面來。這一時期底歷史，乃是立憲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與布爾塞維克黨人（無產階級）彼此為爭取農民而鬥爭底歷史。國會時期就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因為四次國會底時期給了農民一個實際的教訓，而這個教訓明白告訴農民說，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是完全幫助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是擁護沙皇的；農民只可以指望唯一力量底幫助，這唯一力量就是城市的工人——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僅是證實了國會時期底教訓，使農民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完全陷於孤立狀態，因為幾年的戰爭，證明了希望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的同盟者那裏得到和平，這完全是虛幻的，完全是欺騙的。沒有國會時期底明白教訓，無產階級底領導權就會沒有可能。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便是這樣形成起來的。在爲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鬥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便是這樣形成起來的，這種領導權結果弄到了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各國（英法德奧）底資產階級革命，曾經是按照另一條道路進行的。那裏，革命中的領導權，並不是屬於當時還由於自己的幼稚而沒有成爲，並且不能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的這個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那裏，農民脫離農奴制度而得到的解放，並不是從當時人數尙少而且又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裏得來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裏得來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與自由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舊制度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資產階級後備軍。因此，在那裏，革命底結果使得資產階級底政治力量大大加強了。

在俄國，恰恰相反，資產階級革命給了直接相反的結果。俄國革命底結果，沒有使資產階級底政治力量加強，反而使牠削弱了，沒有使牠的政治後備軍增加，反而使牠喪失了基本的後備軍，就是說喪失了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自

由資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無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牠把數千百萬農民團結到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周圍。

這一點，也就是以下這件事實底原因之一，這事實就是：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比較短促的時間內就轉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領導權，曾經是無產階級專政底萌芽和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俄國革命為什麼有這種在西方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沒有看見過的特殊現象呢？這種特殊現象是從那裏得來的呢？

這是因為在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當時是在比以前西方各國更發展的階級鬥爭條件下面發展着的，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到這時候已經成了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自由資產階級則因懼怕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喪失了任何革命性的氣味（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訓以後），並與沙皇及地主聯盟起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必須注意以下的一些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情況：

（一）革命前夜俄國工業底空前的集中。比方，大家知道，俄國全體工人底百

分之五十四是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裏做工的，而在美國這樣的工業發展的國家裏，在這樣的大工廠裏做工的工人不過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顯然用不着證明，光是這一個情況，在具備有像布爾塞維克黨那樣的革命政黨的情形之下，就使俄國無產階級變成了全國政治生活裏的最偉大的力量。

(二) 企業裏的惡劣無比的剝削形式，加上了沙皇衛戍兵底難堪的警察壓制，——這種情況便使工人底每一個嚴重的罷工都變成了偉大的政治行動，並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爲革命到底的力量。

(三) 俄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萎靡不振，到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竟變成了沙皇政府底傭僕和公開的反革命派。這不僅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把俄國資產階級拋到了沙皇制度底懷抱，而且是因為俄國資產階級直接依賴於政府的定貨。

(四) 當時在鄉村中存在着最惡劣的和最難堪的農奴制度殘餘，更加上地主底專權，——這種情況就把農民捲入了革命的漩渦。

(五) 沙皇制度壓制了一切有生機的東西，牠的專橫更加深了資本家底和地主

底壓迫，——這種情況就把工人和農民底鬥爭合爲整個的革命的巨流。

(六)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這一切矛盾匯合成了深刻的革命危機，並給革命以莫大的進攻力量。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農民趨向那裏去呢？農民向誰求得援助來反對地主底專權，反對沙皇底專橫，反對那個害死人的，破壞了農民經濟的戰爭呢？向自由資產階級嗎？但是牠是敵人，——四次國會底多年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向社會革命黨人嗎？社會革命黨人當然比立憲民主黨人『好些』，他們的政綱也是『適合的』，差不多是農民的政綱，但是如果社會革命黨人祇想依靠農民，如果他們在敵人勢力底主要來源地點的城市中沒有力量，那他們能幹出什麼事情呢？什麼地方有一種新的力量，無論在鄉村或城市中，都能不顧一切，勇敢站在前線上與沙皇及地主作戰，並幫助農民擺脫束縛制，擺脫沒有土地的地位，擺脫壓迫制，擺脫戰爭呢？在俄國，一般說來，當時是不是有這樣的力量呢？是有的，這就是俄國無產階級，牠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就已經表示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鬥爭到底的能力，自己的

勇氣，自己的革命性。

無論如何，別的同樣的力量，是沒有的，並且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取得別的同樣的力量。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農民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親近社會革命黨人的時候，同時就懂得了必須服從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勇敢的革命領袖底領導。

這就是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一些情況。

(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這一時期是從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起到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止。這一時期比較不長，總共祇有八個月；但是，從羣衆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上看來，我們敢說這八個月是等於平常的立憲發展時期底幾年，因為這八個月是革命底八個月。這一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於社會革命黨人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而從新轉到無產階級這一邊來，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澈底的革命勢力，唯一能夠把國家引向和平的那個勢力。這一時期底歷史，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產階級民主

派)和布爾塞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之間爲爭取農民，爲爭取農民大多數而鬥爭的歷史。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的，是聯合政府時代，克倫斯基統治時代，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拒絕沒收地主底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主張繼續戰爭，前線上的六月進攻，兵士死刑底法令和鄂尼洛夫底暴動。

如果在前一時期內，革命底基本問題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權，那麼在現在這時候，在二月革命後的時期中，在沙皇已經沒有了，而綿延不斷的戰爭，又將國家經濟破壞到底，使農民完全破產的時候，關於消除戰爭的問題，就成了革命底基本問題。重心顯然從純粹內部性質的問題轉移到了基本問題——關於戰爭的問題。『結束戰爭』，『擺脫戰爭』——這就是疲困於戰爭的全國人民，而首先就是農民所發出的一般的呼聲。

但是當時爲要擺脫戰爭，就必須要推翻臨時政府，必須要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必須要推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政權，因爲，他們，而且祇有他們，在當時總是延長戰爭，要把戰爭延長到所謂『勝利的結局』。當時，除了推翻

資產階級以外，在實際上竟沒有別的可以擺脫戰爭的道路。

這會是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這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最後一派——極左派底政權，即社會革命黨底和孟塞維克黨底政權，以便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底政權，主張以革命鬥爭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主張民主和平的政黨，布爾塞維克黨來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當時都贊助了工人爲着爭得和平及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當時，對於農民，是沒有別的出路的，而且也不能有別的出路的。

這樣，克倫斯基統治時期，就是對於勞動農民羣衆的一個最大的實驗的教訓，因爲牠明白指明了：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政權之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是也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不過是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許諾，實際上他們所施行的也就是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祇有蘇維埃政權，才能是唯一能夠領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底繼續延長，不過是更加證實了這個教訓底正確，催

促了革命，推動了千百萬農民羣衆和兵士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底週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孤立，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實。假如沒有聯合政府時期底明白教訓，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沒有可能。

那曾經使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易於完成的情況，就是這樣。

在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造成了的。

(四) 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如果以前，在革命底第一個時期裏，主要的問題是推翻沙皇制度，而以後，在二月革命之後，主要的問題却是經過推翻資產階級，來擺脫帝國主義的戰爭；那麼在現時，在國內戰爭消滅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底問題就成了首要的問題。加緊和發展國有化了的工業；爲着這一點而利用受國家所調節的商業來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繫起來；以糧食稅代替糧食徵收制，以便然後逐漸減少糧食稅底定額，而把事情弄成工業製造品同農民生產品的交換；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制，使千百萬農民都加入合作制：——這些便是列寧

所擬定的，在建成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的道路上的經濟建設底任務。

有些人說，這些任務，對於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或許會是不能做到的。有些懷疑派甚至說，這種任務簡直是空想的，是不能執行的，因為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由小生產者組成的，因此不可利用他們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底基礎。

但懷疑派是錯誤了，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到在這裏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在這些情況中，主要的情况是：

第一，決不可以把蘇聯的農民和西方各國的農民混爲一談。蘇聯的農民是不能不與西方各國的農民不同的，因為蘇聯的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底教訓，與無產階級一塊並且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得到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而西方的農民，却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作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得到了土地，並因此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的農民，慣於看重自己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底意義，而且因為有了這種

親善和這種合作才得到了自由，——這一點不能不是他們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作的非常順利的條件。

恩格斯說：『社會主義黨爭得政權，已成了最近將來的事情』，『爲要爭得政權，黨應當首先就從城市裏跑到鄉村裏去而成爲在鄉村裏有勢力的黨』（請參看恩格斯底農民問題）。他說這段話的時候，是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而他所指的是西方各國的農民。俄國共產黨人在三次革命中已經在這方面做過了巨大的工作，已經在鄉村裏造成了西方各國的同志所夢想不到的影響和支柱——這點還須要證明麼？這個情況不能不根本使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經濟合作事業易於辦好，——這點怎麼能夠否認呢？

懷疑派總是說小農是與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相容的一種原素。但請聽恩格斯關於西方各國底小農所說的話罷：

『我們堅決地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盡可能設法來使小農生活改善，來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合作經濟，要是他們願意的話；如果那時他們還不能同意這一點，那末我們就要努力

給他們以多量的時間，使他們在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上去把這點想一想。我們所以將要這樣做，不僅是因為我們認定獨立勞動的小農可以轉到我們這方面來，而且也是爲着黨底直接利益起見。被我們救全着而沒有降落到無產者地位的和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引過來的農民人數愈多，則社會的改造亦愈是迅速和愈是容易實行。如果我們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到處發展到極端的結果，等待到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小農民都變成大資本主義生產犧牲品的時候，才來進行這種社會改造，那是沒有益處的。爲了農民底利益，而不得不用社會公款來担负些物質犧牲，這從資本主義經濟底觀點上看來，好像是白費金錢，但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爲這樣担负犧牲，在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時，或者可以節省十倍金錢。因此，在這個意思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又請參看恩格斯底農民問題）

恩格斯這些話是指西方各國的農民說的。但是他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夠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實行得這樣容易，這樣完全，難道這點還不明顯嗎？現在祇有在蘇維埃俄羅斯，才能立刻實行並完全實行使『獨立勞動的小農轉到我們這

方面來』，實現爲這點所必要的『物質犧牲』，實現爲這點所必要的『對待農民的慷慨』，這些以及同類的有利於農民的辦法，已經在俄國實行，這些難道還不明顯嗎？這種情況也應當便利着並推進着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建設底事業，這點怎麼能夠否認呢？

第二，決不可以把俄國的農業和西方各國的農業混爲一談。西方的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這時候，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各國，分裂和解體完全是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俄國，單是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重要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都收歸國有這兩個原因，農業底發展就不會走這條道路。在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別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社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廣大合作制，而由國家以優待的借款來幫助的這條道路。列寧在他的關於合作制的論文中，很正確地指出，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新的道路，就是說，經過合作社來吸引大多數農民加入社

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底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開始在農產品底銷售方面，然後在農產品底生產方面。

因有農業合作社底工作而在農村中所產生的幾種新的現象，在這方面是極有意義的。大家知道，在農業合作總社內產生了新的巨大的以農業生產部門（如麻，馬鈴薯，油類等）為單位的組織，這些組織有偉大的前途。譬如「麻業合作社總會」包括了許多種麻農民底生產合作社。這個「麻業合作社總會」供給農民以種子和生產工具，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所有的麻的生產品，大批銷售於市場，並保證農民得以分沾利潤，這樣就是經過農業合作總社，將農民經濟與國家工業聯繫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照我的意思，這是農業方面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大生產底家庭農業系統。這裏我說的，是國家的社會主義生產底家庭農業系統，是與資本主義在紡織業——比方說——裏的家庭工業系統相比擬而來的，在資本主義底紡織業裏的家庭工業系統中，家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裏領得原料和工具，並把所有的生產品交給資本家，因此，他們在事實上就是在家庭裏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是

指明我們這裏的農業發展究竟應該走那條道路的許多實例之一。其他農業部門中的其他的同樣的例子，我已用不着說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的農民，既然拋開了那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和破產的道路，他們當然很願意去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我們的農業發展道路所說的話罷：

『實際上，一切大的生產資料歸國家管理，國家政權操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個無產階級與千百萬的小農及最小農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這難道不是一切必要的條件，來經過合作制，而且祇是經過合作制（我們以前曾鄙視合作制為營業性的東西，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制），——難道這不是為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條件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但這却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條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列寧往下又說到必須用財政及其他的方法幫助合作制，因為合作制是無產階級

專政下面的「新的人民組織原則」和「新的社會制度」，他說：

「每個社會制度的發生，必須要有某個階級底財政幫助。「自由的」資本主義在牠產生時費了多少萬萬盧布，這是大家知道的。現在我們應當了解和實行的，就是：現時我們應該特別幫助的一種社會制度，就是合作制度。對於這種制度的幫助，應該是真正的幫助，就是說，把這種幫助看作是贊助任何的合作社的週轉，這是不夠的，——應當把這種幫助看作是幫助有真正羣衆底真正參加的合作社的週轉。」（請參看同上一卷，第三九三頁）

這些情況是說明什麼呢？

這是說明，懷疑派是不對的。

這是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為列寧主義認為勞動農民羣衆是無產階級底後備軍。

這是說明，執政的無產階級能夠利用而且應該利用這些後備軍，來把工業和農業聯絡起來，來提高社會主義建設，來給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這樣一個必要的基礎，

如果沒有這個基礎，那末，就沒有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上去。

六 民族問題

在這個題目內，我提出兩個主要問題來講：（一）問題底提法；（二）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一）問題底提法。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有了許多極大的變化。第二國際時期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是大不相同的。不僅就牠們的範圍來說，而且就牠們的內部性質來說，都是大不相同的。

從前，民族問題通常總是限制在一些大半祇是關係於『文明』民族的問題底狹隘範圍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及歐洲其他的某些民族——這些便是第二國際英雄們所曾經加以注意的幾個主權不全的民族。遭受着最粗暴和最殘酷的民族壓迫的幾千萬和幾萬萬的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落在他們的視線以外。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他們是不肯拿來

相提並論的。第二國際底要人所能用以誇口的，不過是他們所通過了的那兩三個空洞的敷衍了事的，竭力躲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案。現在，民族問題上的這種兩面性和不徹底性可以說是已被消滅了。列寧主義揭露了這種極端不符合的情形，毀壞了那個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中間的，歐洲人和亞洲人中間的，帝國主義底『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中間的牆壁，這樣便使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來。這樣一來，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了世界問題，關於使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民族解脫帝國主義底壓迫的問題。

從前，民族自決的原則，通常總是被人曲解，常常被縮小到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底某些首領甚至於走到了這樣的地步，就是把民族自決權變成了文化自治權，即被壓迫民族有設立自己的文化機關的權利，而全部政權則仍保留在統治民族手中。這種情況便使民族自決觀念曾經有從反對吞併政策的武器變成辯護吞併政策的武器的危險。現在，這種昏亂的思想可以說是已經被克服了。列寧主義擴大了民族自決底概念，把牠解釋為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民族底完全分立的權利，是各民族

底獨立的國家的存在權利。這樣，就使人完全沒有可能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爲民族自治權來替吞併政策辯護了。從前，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民族自決底原則，無疑義地是由社會大國主義派運用來欺騙民衆的工具，現在，牠却變成揭破一切帝國主義貪慾和揭破一切大國主義陰謀的工具，變成用國際主義精神給羣衆以政治教育的工具。

從前，關於被壓迫民族的問題，通常都被看作是純粹法權上的問題。第二國際底政黨會拿來誇耀的，就是冠冕堂皇地宣佈『民族平權』，發表無數的宣言來鼓吹什麼『民族平等』，同時却抹煞了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批民族（少數的）靠剝削別一批民族而生存的時候，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現在，民族問題上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法權觀點應當認爲是已經被揭破的了。列寧主義已把民族問題從冠冕堂皇的宣言底天空中拿到實地上來了。牠指出，如果無產階級政黨不直接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則關於『民族平等』的宣言不過是空洞的和虛偽的宣言。這樣一來，關於被壓迫民族的問題，就變成關

於援助，幫助，真正地經常地幫助被壓迫民族去反對帝國主義，以爭取真正的民族平等，爭取牠們的獨立的國家的存在問題了。

從前，民族問題會被人以改良主義的精神來看待，被人看待爲單個的獨立的問題，與關於資本政權，關於推翻帝國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沒有關係的問題。這些人會經暗中設想，以爲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可以不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聯合起來而得到勝利，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可以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底大路，不要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而從容地『自流地』得到解決。現在，這種反革命的觀點，應當認爲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證明了，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則證實了：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絡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底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各國革命勝利底道路，須經過與殖民地 and 附屬國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的革命聯盟。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底一部份，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底一部份。

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家底革命解放運動內部所含蓄着的革命可能性，是否已

經都用完了？如果沒有都用完，那麼，是否有希望和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去利用這些可能性，將殖民地 and 附屬國，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就是說，承認被壓迫國家底民族解放運動內部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利用這些能力來推翻共同的敵人，來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底關鍵，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完全證實着列寧主義對於這點的結論。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必須幫助，堅決地和積極地幫助被壓迫和不獨立民族底民族解放運動。

當然，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一切個別具體情形上，對於任何的民族運動都要加以幫助。這只是說幫助那些力謀削弱並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而不是那些力謀鞏固並保持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可以有這樣的情形，就是某些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會和無產階級運動發展底利益相衝突。在這種

情形之下，當然談不到什麼幫助。關於民族權利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和自願自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這個總問題底一部分，牠服從這個問題，並且要從這個總問題底觀點上去觀察。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曾贊成波蘭人底和匈牙利人底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斯拉夫人底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捷克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是『反動的民族』，是『俄國在西歐的前哨』，是君主專制制度底前哨，而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當時却是反對君主專制制度的『革命的民族』。因爲在當時，幫助捷克斯拉夫人底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就是間接幫助沙皇制度，幫助歐洲革命運動底這個最危險的敵人。

列寧說：

『民主運動個別要求，民族自決也在內，不是一個孤立的東西，而是總的民主主義的（現在是總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運動底一部分。也許在個別的具体情形之下，部分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應該拋棄這個部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到二五八

頁）

如果不是從形式的觀點上，不是從抽象的法權觀點上，而是從具體的革命運動底利益上來估量個別民族運動，那末關於個別民族運動問題，關於這些運動底能有的反動性質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也應當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之毫無疑義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之可能的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別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間，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並不一定要這個運動有着無產階級份子底參加，並不一定要這個運動有着革命的或共和的政綱，並不一定要這個運動有着民主的基礎。阿富汗國王為阿富汗底獨立而鬥爭，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不管這個國王及其戰友是抱着君主制的觀點，因為這種鬥爭是削弱着，破壞着和消磨着帝國主義；而這樣『激烈的』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革命家』和共和派，如克倫斯基和蔡雷特利，倫諾德爾和謝德曼，齊爾諾夫和唐恩，亨德遜和克萊因斯，他們在帝國主義戰爭時的鬥爭，却是反動的鬥爭，因為這種鬥爭底結果是粉飾和鞏固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取得勝利。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謀埃及

獨立的鬥爭，因為同樣的原因，客觀上却是革命的鬥爭，不管埃及民族運動底首領是由資產階級出身，是帶着資產階級的名稱，不管他們是反對社會主義；而可是英國工黨政府爲保持埃及底附屬地位的鬥爭，因為同樣的原因，却是反動的鬥爭，不管這個政府底閣員是由於無產階級出身，帶着無產階級的名稱，不管他們『贊成』社會主義。我還不用說其他較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如印度和中國底民族運動了，這些國家在解放道路上的每一步驟，甚至於如果是違反着形式的民主底要求，也還是給帝國主義的嚴重的打擊，即無疑地是革命的步驟。

列寧說得很對：對於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不應該根據形式的民主底觀點去估量，而應該根據反帝國主義鬥爭底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去估量，就是說，『不應該孤立地去估量，而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去估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頁）。

（二）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解決民族問題時，是從下面的原理出發的：

(1) 世界已分成兩個營壘：一個營壘就是為數極少的文明民族，這些民族佔有財政資本並剝削地球上絕大多數的人民；另一個營壘是殖民地和附屬國底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民族，就是說，絕大多數的人民。

(2) 被財政資本所壓迫的和所剝削的殖民地和附屬國，是帝國主義勢力底最偉大的後備軍和最重要的來源。

(3) 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民族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是他們擺脫壓迫及擺脫剝削的唯一道路。

(4) 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底道路，這種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5) 先進國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利益，要求把這兩種革命運動聯合為一條共同的戰線，來反對共同的敵人，反對帝國主義。

(6) 如不建立和不鞏固共同的革命戰線，則先進國工人階級底勝利和被壓迫民族之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都是不可能的。

(7) 如壓迫民族裏的無產階級對於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不加以直接的和堅決的援助，來反對『祖國的』帝國主義，那麼共同革命戰線建立是不可能的，因為『壓迫着別民族的民族，是不能成爲自由的民族的』(馬克思底語)。

(8) 這種援助，就是主張，擁護和實行這樣一個口號：民族底分立權，民族底獨立的國家的存在權。

(9) 假如不實行這個口號，則不能建立各民族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和合作，這整個世界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基礎。

(10) 這種聯合祇能是自願的，是根據各民族間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友愛關係而發生的。

由此而有民族問題上的兩個方面；兩個趨向：一種趨向就是趨向於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政治解放和組織獨立的民族國家，這種趨向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殖民地剝削底基礎上發生的；另一種趨向就是趨向於各民族間的經濟的接近，這種趨向是因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底形成而發生的。

列寧說：

『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在民族問題上有兩個歷史趨向。第一趨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底激發，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民族國家底創立。第二個趨向，就是民族間各種聯繫底發展和頻繁，民族界線底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底國際統一之創立。這兩個趨向都是資本主義底世界規律。第一個趨向盛行於資本主義發展底初期，而第二個趨向則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並走向於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時的特點。』（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三九到一四〇頁）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個趨向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非剝削殖民地，非以暴力將殖民地束縛在『單一的整體』底範圍內是不能夠生存的，因為帝國主義祇有靠吞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相接近，不然牠就不能成爲帝國主義了。

對於共產主義，恰恰相反，這兩個趨向不過是一件事情底兩面，就是說，是使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這件事情底兩面。因爲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整

個世界經濟中的聯合，祇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有可能；建立各民族自願的聯合的道路，就是由殖民地離開『單一的』帝國主義的『整體』而分立，就是由殖民地變為獨立的國家。

因此，必須與統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裏的『社會主義者』底巨大強國的大國主義作堅忍的，不間斷的，堅決的鬥爭，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意與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做鬥爭，不願意幫助『他們的』殖民地底被壓迫民族為擺脫壓迫，為謀得國家分立的鬥爭。

不與這種大國主義作這樣的鬥爭就不能夠以真正國際主義底精神，以接近附屬和殖民地裏的勞動羣衆的精神，以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的工人階級。如果俄國無產階級沒有獲得舊俄帝國內各被壓迫民族底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國革命就不會勝利，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也就不會失敗。但是為要獲得這些民族底同情和援助，俄國無產階級會應該首先就打破俄國帝國主義底鍊子，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的壓迫。不做這個工作，就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就不能建立

真正國際主義，就不能創造各民族合作底絕好組織——這組織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組織就是各民族將來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底具體的模型。

因此，必須進行鬥爭，以反對被壓迫國家裏社會主義者底民族的閉關主義和狹隘觀點，孤獨思想，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意走出自己的民族的觀念，不了解本國底解放運動和統治國底無產階級運動的聯繫。

沒有這樣的鬥爭，就不能保持被壓迫民族裏的無產階級底獨立的政策，就不能保持牠和統治國裏的無產階級間的階級聯合以推翻共同的敵人，推翻帝國主義。沒有這樣的鬥爭，國際主義是不可能的。

這便是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的和被壓迫民族裏的勞動羣衆的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共產黨的這個以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工人的兩面工作所說的話罷：

「這種教育……，在大的，壓迫的民族和小的，被壓迫的民族裏，在侵略的民族和被

侵略的民族裏，能夠具體相同嗎？

顯然不能的。目的是相同的，即所有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極密切接近，日益更加融合，但要達到此目的，却顯然要走各種不同的具體道路，這正好像從一張紙底左邊和右邊走向這張紙的中心點一樣。如果大的，壓迫的侵略的民族中的社會主義者一般地主張民族融合，同時却忘記，那怕就是一刻兒忘記「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第二，喬治，彭加勒等也主張與小民族「融合」（用侵略手段）——尼古拉第二主張與加里西亞「融合」威廉第二主張與比利時「融合」等，——那麼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在理論上就是膏藥子，在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底幫手。

在壓迫的國家中，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教育底重心，必須在於鼓吹和堅持被壓迫國家有分立的自由。不然，便不會有國際主義。壓迫的民族裏的社會主義者，如果不做這種宣傳，那末我們就有理由而且應該鄙視他，稱他為帝國主義者，稱他為惡棍。這是一個無條件的要求，那怕在社會主義未成功以前，分立底機會祇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實在的」……

反之，小民族裏的社會主義者應當把自己鼓動底重心放到我們的總公式底後半節上，

即各民族底『自願聯合』。他可以也贊成本民族底政治獨立，也贊成本民族與鄰近任何國家合併，而並不違反他的國際主義者底義務。但無論如何，他必須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主義，孤獨思想，他必須主張顧全整體和總體，他必須主張部分的利益服從全體的利益。

沒有思索過問題的人，會以為壓迫民族裏的社會主義者主張『分立自由』而被壓迫民族裏的社會主義者主張『聯合自由』，這是有矛盾的。但祇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知道，要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融合，要達到這個目的，別的道路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六一到二六二頁）

七 戰略與策略

在這個題目中，我拿六個問題來講：（一）戰略與策略是指導無產階級鬥爭的科學；（二）革命底階段與戰略；（三）運動底來潮退潮與策略；（四）戰略的指導；（五）策略的指導；（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

(一) 戰略和策略是指導無產階級鬥爭的科學。第二國際統治時期，主要的是在比較和平發展底環境中編成和教育無產階級軍隊的時期。這是以議會主義爲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的時期。關於各階級底偉大衝突問題，關於準備無產階級去作革命戰鬥問題，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問題——當時都似乎不是急待解決的問題。當時的任務祇是歸結於利用一切公開發展底道路來編成和教育無產階級的軍隊，適應着當時的條件，——在這條件之下無產階級仍然站在，並且似乎應當仍然站在反對派的地位——去利用議會主義。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時期和在這樣了解無產階級任務的情況之下，不能有完整的戰略，也不能有籌劃週到的策略。那時候祇有過關於策略和戰略的一些片斷的零碎的觀念，可是完整的策略和戰略是沒有的。

第二國際底該死的罪惡並不在於牠當時實施了利用議會鬥爭形式底策略，而在於牠誇大了這種鬥爭形式底意義，牠差不多把這種鬥爭形式看作唯一的形式，而一到公開的革命戰鬥時期，當非議會的鬥爭形式問題已成了首要的緊急問題的時候，

第二國際底政黨就退避新的任務而不去接受這些任務。

祇有到了下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公開發動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期，當關於推翻資產階級問題已成了直接的實際問題的時候，當關於無產階級底後備軍（戰略）問題已成爲迫切問題之一的時候，當一切鬥爭和組織底形式——議會形式及非議會形式（策略）——已經完全確定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祇有到了這個時期才能定出無產階級鬥爭底完整的戰略和籌劃精密的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戰略和策略的明哲思想，一向都是被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所埋沒了的，正是在這個時期，纔被列寧發掘出來而公佈於世界。但列寧不僅只是恢復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個別的戰略的原理。他還更加發展了這些原理，補充了一些新的意思和原理，將這一切聯合成了領導無產階級鬥爭的規則系統和原則系統。列寧著的做什麼？兩個策略，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幼稚病這一些書籍，無疑地都是放進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馬克思主義底革命軍械局去的一種最貴重的東西。列寧主義底戰略和策略是關於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科學。

(二) 革命階段的戰略。戰略就是根據當時的革命階段來決定無產階級底主要打擊方向，規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及次要的後備軍）底相當佈置計劃，在這個階段底整個過程中爲實現這個計劃而鬥爭。

我們的革命已經過了兩個階段，在十月革命後已進到了第三個階段。戰略也隨着改變過。

第一階段。這階段包含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目標是推翻沙皇制度，完全消滅中世紀制度底殘餘。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軍是農民。基本打擊底方向就是使自由派的君主派的資產階級孤立，這個資產階級想抓得農民並想用與沙皇制度妥協的方法來取消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爲要做到這點，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和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第二階段。這階段包含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目標是推翻俄國

的帝國主義和擺脫帝國主義的戰爭。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の後備軍是貧農。鄰國底無產階級是很可能的後備軍。戰爭底拖延和帝國主義底危機是順利的時機。基本打擊底方向就是使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孤立，這些民主派會想抓得勞動農民羣衆並想用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方法去結束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無產階級和貧農聯盟。『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爲要做到這點，就要把人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和麻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同上）

第三個階段。這階段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開始的。目標是鞏固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專政，利用這專政作爲支柱，以便推翻全世界內的帝國主義。革命已超越一國底範圍，世界革命時代開始了。革命底基本力量是：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專政，全世界一切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主要的後備軍是：先進國家內的半無產階級和小農羣衆，殖民地和附屬國家內的解放運動，基本打擊底方向就是使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孤立，使第二國際底政黨孤立，這些黨派是與帝國主義實行妥協政策底

基本支柱。力量底佈置計劃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與殖民地及附屬國底解放運動聯盟。

戰略是關涉到革命底基本力量及這些力量底後備軍的。牠因革命階段底過渡而起變化，而在每個現有階段底整個時期內，大體上是不變更的。

(三) 運動底來潮退潮與策略。策略就是無產階級在比較短促的時期內，在運動底來潮或退潮時期，在革命底高漲或低落時期內行動路線底決定，就是以新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代替舊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以新的口號代替舊的口號的方法，以及用配合這些形式等等的方法，來為實現這條路線而進行的鬥爭。戰略底目標是要戰勝——比方說——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要把反沙皇制度的或反資產階級的鬥爭進行到底；而策略底目標就沒有這樣大，因為牠的任務不是在於取得整個戰爭底勝利，而是在於取得某些搏戰底勝利，某些戰鬥底勝利，有效地實行某些適合於當時革命底高潮或低落時期內的具體環境的運動與發動。策略是戰略底一部分，是服從於戰略和服務於戰略的。

策略隨着來潮退潮而變。在革命底第一個階段中（由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戰略計劃並沒有變更，可是策略却變更了幾次。在由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這個時期內，黨底策略是進攻的策略，因為在這時候是有革命底來潮，運動是向上升的，所以策略也應當根據這個事實來決定。同時，與這個情形相適應的，就是鬥爭底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適應革命來潮底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罷工，政治示威，總的政治罷工，抵制國會，暴動，革命的戰鬥的口號——這就是這個時期內互相交替的鬥爭方式。當時，組織底形式也隨着鬥爭底形式而有了變更。工廠委員會，農民革命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蘇維埃，多少公開的工人政黨——這就是這個時期內的組織形式。

在由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二年這個時期內，黨不得不變到退守策略，因為那時候是有革命運動底低落，革命底退潮，策略也就不得不顧及到這個事實。同時鬥爭底形式以及組織底形式也適應着這個情形而變更了。不是抵制國會而是參加國會，不是公開的國會外的革命活動而是國會內的活動和國會內的工作，不是總政治罷工

而是局部的經濟罷工或者簡直不作聲息。當然，黨在這個時期內不得不要秘密起來，而羣衆的革命組織也就由文化教育組織，合作社，保險社及其他的合法組織所代替了。

關於革命底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也應當這樣說，在這兩個階段中策略變更了幾十次，而戰略却始終沒有變更。

策略是關涉到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及組織形式，關涉到這些形式底更換和配合。策略在革命底每個現有階段基礎上可以隨着革命底來潮或退潮，高潮或低落而變更幾次。

(四) 戰略的指導。革命底後備軍可有直接的和間接的：

直接的：(1) 本國的農民及一般過渡階層，(2) 鄰國的無產階級，(3) 殖民地與附屬國的革命運動，(4) 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品和獲得物，而對於一部分勝利品和獲得物，無產階級——只要是保持着自己的力量上的優勢——是可以暫時放棄的，這爲的是要收買強有力的敵人和取得一個暫時休息的機會。

間接的：（1）在本國各個非無產階級間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與衝突是可以被無產階級利用去削弱敵人底力量 and 加強自己底後備軍的，（2）與無產階級國家敵對的那些資產階級國家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戰爭），這些矛盾，衝突和戰爭是可以被無產階級在進攻時或在迫不得已而隨機應變地實行退守時所利用的。

關於第一種後備軍，是用不着說的，因為牠們的意義是大家所知道的。至於第二種後備軍底意義却不是常常都很明白的，關於這種後備軍，我們應當說，有時牠們對於革命底進程具有頭等的意義。例如在第一次革命時及革命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社會革命黨人）和自由派的君主派的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人）間的衝突，在使農民擺脫資產階級底影響這個事情上是發生了作用的，這種衝突底偉大意義是不可否認的。在十月革命底時期，各基本的帝國主義者集團間拚命戰爭底非常重大的意義，更是不可否認的，那時候帝國主義者忙於相互間的戰爭，沒有功夫集中力量來反對新起的蘇維埃政權，而無產階級却正因此得以乘機組織自己的力量，

鞏固自己的政權及準備撲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很有把握說，現在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日益加深，他們彼此間的新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的事情，在這個時候，這種後備軍對於無產階級將有日益重大的意義。

戰略的指導底任務，就是要正確利用這一切後備軍來達到革命在其現有的發展階段上的基本目標。

怎樣才算正確利用後備軍呢？

就是要實行幾個必要的條件，在這些條件中，主要的條件就是：

第一，當革命時機已經成熟的時候，當進攻以全力進行的時候，當暴動已急待發動的時候，當調動後備軍去緊緊跟上前鋒已成爲勝利底決定條件的時候，在這個決定勝負的緊急關頭，應當把革命底主要力量集中在使敵人最易受傷的地方。這樣利用後備軍底最好例子就是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這時期內的戰略。無疑義的，在這時期內使敵人最易受傷的地方就是戰爭。無疑義的，黨正是在這一個基本問題上把極廣大的民衆集合到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底周圍。黨在這時期內的戰略就是

以示威遊行等方法來訓練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去作街道上的發動，同時經過後方的蘇維埃和前線的兵士委員會去調動後備軍，使其緊緊跟上前鋒。革命的結局證明了，後備軍曾經是利用得正確的。

爲要說明這個在戰略上利用革命力量的條件，列寧用自己的話敘述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暴動問題的著名原理，請看列寧底這段話罷：

『無論何時都不要把暴動當兒戲，而既然要開始暴動時，那就應當牢牢知道，暴動是必須進行到底的。必須在決定勝負的關頭把大大超過敵人的力量集合在決定勝負的地點，不然，那末，準備得比較好些和組織得比較好些的敵人就會把暴動者消滅下去。暴動既已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來幹，並且一定要和絕對要轉爲進攻。『防守就是武裝暴動底死路』。應當努力抓得良好時機，應當趁着敵人的軍隊還是一盤散沙的時候，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猛擊。每一天（如果祇是一個城市底暴動，就可以說是每一小時）都要取得至少是小小的勝利，無論如何都得保持精神上的優勢。』（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

第二，選擇實行致命打擊的時機，開始暴動的時機，這種適當時機就是當着危機已達到高點，先鋒隊已有戰鬥到底底決心，後備軍已有幫助先鋒隊的決心，敵軍隊伍內底情形已極度混亂的時候。

列寧說：

「如果一切與我們敵對的階級力量已經充分混亂，他們彼此間已經打够了，如果他們因為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已經把自己弄得充分精疲力竭了」，如果「一切動搖的，不堅定的，不穩固的中間份子，就是說，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已在民衆面前充分揭穿了自已，已經因實際上的破產而充分丟了臉皮」，如果「在無產階級內部，羣衆贊成進行最堅決奮勇的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這種情緒已經開始並且猛烈高漲；那末，『決戰時機就可算是完全成熟了。』那時候，革命時機就成熟了，那時候，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正確地顧計了上述這一切……條件，正確地選擇了時機的話，就有保證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二〇至三二二頁）

十月革命底進行可以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

違背這個條件就要弄出危險的錯誤，弄到所謂『失掉常度』，就是黨落在運動進程底後面，或者過於跑到前面，這樣就造成失敗底危險。有一部分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企圖由逮捕民主會議底代表來着手開始暴動，這就是這種『失掉常度』底例子，就是不會選擇暴動時機的例子，因為那時候在蘇維埃內部，還感覺着動搖的情緒，前線還在猶豫不決，後備軍還沒有拉來趕上先鋒隊。

第三，一往直前地實行已經決定的方針，不顧道路上的一切艱難和阻礙而向着目標進行，這個條件之必要，是爲要使先鋒隊不致失去鬥爭底基本目標，使羣衆不致迷失道路，而向着這個目標走去，努力團結在先鋒隊底周圍。違背這個條件就要弄出極大的錯誤，就是海員們所熟知的『失掉方針』的錯誤。我們的黨在民主會議以後，立刻通過了決議，決定參加預備國會，這種錯誤的行爲就是這種『失掉方針』底例子。那時候黨似乎忘記了預備國會是資產階級想把俄國從蘇維埃道路轉移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道路上去的企圖，黨如果參加這種組織，就會混亂全局，就會使那些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口號下作革命鬥爭的工農羣衆迷失道路。後來布爾塞

維克退出了預備國會，這個錯誤就糾正了。

第四，當敵人力量強大，退守必不可免，受敵人強迫而去迎戰是顯然不利的時候，當在某時的力量對比之下祇有退守才能使先鋒隊免受打擊而且保留其後備軍的時候，——那時候就要很巧妙地運用後備軍，以便作正確的退守。

列寧說：

『革命的政黨應當補習補習。牠們已經學習怎樣實行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了學會進攻以外，還必須學會怎樣來正確些實行退守，應當瞭解——而且革命的階級正根據自己的辛苦經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守，是得不到勝利的。』（請參看

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七頁）

這種戰略底目的——就是要贏得時間，瓦解敵人，養精蓄銳以圖後來向敵人進攻。

締結布列斯特和約，可以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這和約曾使黨有了可能去贏得時間，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瓦解敵人底力量，保存跟着自己走的農民，養

精蓄銳來準備向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進攻。

列甯在那時候說道：

『我們締結單獨和約，這樣，我們就在現時可能的最高限度內擺脫雙方彼此敵對的帝國主義的集團，利用牠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阻礙着牠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利用來取得相當的手足自由的時間，以便繼續和鞏固社會主義的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九八頁）

列寧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三年以後說道：

『現在就是最蠢的傻子都看得到，「布列斯特和約乃是加強了我們的力量而分散了國際帝國主義底力量的一種讓步。』（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七頁）

這就是保證能有正確的戰略指導的主要條件。

（五）策略的指導。策略的指導就是戰略的指導底一部分，牠是服從戰略指導底任務與要求的。策略指導底任務就是要熟悉無產階級所有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而日要保證正確地運用這些形式，以便在現有力量底對比中得到最高限度的爲

準備戰略的勝利所必要的效果。

怎樣才算是正確運用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呢？

這就是執行幾個必要的條件，在這些條件裏，主要的條件就是：

第一，首先就應當注重的，正是這樣一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這種形式因為最適合於當時的運動來潮或運動退潮底條件，所以能便利着和保證着引導羣衆到革命陣地上去，引導千百萬羣衆到革命戰線上去，能便利着和保證着把這些羣衆佈置在革命戰線上。

問題底本質並不在於使先鋒隊覺悟到保存舊制度底不可能和推翻這個舊制度底不可免。問題底本質是在於使羣衆，千百萬羣衆瞭解這一點並表示有決心去幫助先鋒隊。但是，羣衆只有經過本身的經驗才能瞭解這一點。任務就在於，使千百萬羣衆有可能根據本身的經驗來瞭解推翻舊政權底不可免，並提出這樣一些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這些形式可以使羣衆易於根據經驗來認識革命口號是正確的口號。

黨在當時如果沒有決定參加國會，如果牠沒有決定集中力量去進行議會的工

作，並根據這工作而發展鬥爭，以便利着羣衆根據自己的經驗來瞭解國會底無用，立憲民主黨口惠底虛偽，與沙皇制度妥協底不可能，工農聯盟底必要，——如果在當時沒有決定這樣做，那末先鋒隊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與羣衆的聯繫。如果沒有羣衆在國會時期的經驗，那末，立憲民主黨就不會被揭破，無產階級底領導權就不會有可能了。

召回派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他們要使先鋒隊脫離自己的成千百萬人的後備軍。

如果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時候遵照着左派共產主義者底口號而去暴動，那末，黨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牠在廣大的農民和兵士羣衆中的影響，因爲，在那個時候，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沒有完全揭破自己是擁護戰爭和帝國主義的人，羣衆還沒有根據自己的經驗來認清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關於和平，土地，自由的演說是帶着騙人的性質。如果沒有羣衆在克倫斯基統治時期的經歷，那末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也就不會孤立起來，無產階級專政也

就會沒有可能。因此『耐煩解釋』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錯誤並在蘇維埃內部作公開鬥爭，這個策略，在當時是唯一正確的策略。

左派共產主義者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他們有把黨由無產階級革命底首領變成一小羣虛空而沒有根基的陰謀家的危險。

列甯說：

『單靠一支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抱定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至少是抱定對先鋒隊採取好意的中立態度的立場的時候……却叫一個先鋒隊去作決定勝負的戰鬥，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要使真正是整個階級，真正是廣大的勞動和受資本壓迫的羣衆都走上這樣的立場，光是宣傳，光是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底親自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底基本定律，這個定律現在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德國都得到了非常有力的和明顯的證明。不僅俄國文化落後的和往往不識字的羣衆，就是德國文化程度高深的和個個識字的羣衆，也會經須要根據親自的經驗來認識：第二國際勇士們底政府是何等懦弱無能，多麼沒有氣節，

如何沒有辦法，怎樣向資產階級盡忠效勞，如何卑鄙醜惡，來認識：如果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便必然有極反動派（俄國的郭尼洛夫，德國的賈卜及其同類人物）底專政，——會須要根據親自的經驗來認識這些事情，以便堅決地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九到二三〇頁）

第二，要在每個現有時機內找到事變過程鍊子上的這樣一個特別的環節，一抓住這個環節，便可以掌握着整條鍊子而準備那些爲達到戰略勝利所必要的條件。

問題底本質是在於，應當從黨的當前許多任務中間挑出這樣一個當前的任務，這個任務底解決便是工作底中心點，這個任務底實行便能保證有成效地解決其餘的當前的任務。

我們可以用兩個例子來表示這個原理底意義：一個例子是很久以前的（黨底形成時期）事實，另一個例子是最近的（新經濟政策時期）事實。

在黨底形成時期，那時候，無數的小組和組織還沒有彼此聯繫起來，手工業工作方法和小團體制度腐蝕了整個黨，而思想離異竟成了黨內生活底特點——在這時

期，整個鍊子上的一个基本環節，擺在黨面前的各項任務中最基本的任務，就是創辦全俄的秘密報紙。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那種條件之下，祇有經過這一種全俄的秘密報紙，纔能造成黨內這樣一種意見一致的中堅幹部，這種中堅幹部能夠把無數的小組和組織統一起來，準備思想的和策略的統一底條件，並這樣來建立組織真正政黨的基礎。

在由戰爭過渡到經濟建設的時期，那時候，工業正處在破壞的狀態中，農業正苦於城市工業品底缺乏，那時候國家工業與農民經濟間的聯絡已變成了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底基本條件，——在這時期，事變過程鍊子上的基本環節，所有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發展商業。爲什麼呢？因爲在新經濟政策底條件之下，工業和農民經濟祇有經過商業才能聯絡起來；因爲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之下，祇有生產而沒有銷路，就是致工業於死命；因爲祇有用發展商業的方法去擴展銷路才能擴展工業，因爲祇有在商業方面鞏固了以後，只有掌握了商業以後，只有抓住了這個環節以後，才可以希望把工業與農民市場聯絡起來，和有成效地解決其他的當前任務，以造成

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

列甯說：

『僅僅一般地做一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底信徒，還是不夠的……須要善於在每個時機裏找出這樣一個特別的環節，對於這個環節，應當用所有的力量把牠抓住，以便握住整條鍊子並穩固地準備過渡到以下的一個環節。』……『在現今的時候……這樣的環節就是在國家的正確的節制之下來振興國內的商業。商業——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底一些過渡形式中，在歷史事變底鍊子上須要用所有的力量來抓住的一個環節。』（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二頁）

這就是保證能有正確的策略指導的主要條件。

（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革命的策略與改良主義的策略有什麼區別呢？

有些人以為，列甯主義是根本反對改良，調和及妥協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對於這一點布爾塞維克並不比任何別人知道得壞些，他們知道：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有一點總比完全沒有的好些』，在某種條件之下，一般改良，特別是調和及妥

協，乃是必要的而且有益的。

列甯說：

『以推翻國際資產階級爲目的的戰爭，要比各個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的最堅持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同時却預先就不願意使用看風轉舵的手段，不願意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那怕就是暫時的矛盾），不願意與各種可能的（那怕就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妥協與調和，——這豈不是可笑到極點麼？這豈不是正像我們在攀登一座艱難險阻的，還沒有被人考察過和從來爲人跡所沒有到過的高山的時候，我們却預先就不願意有時曲折前進，有時回頭退後，不願意變更已經選定過一次的方向，不願意試用各種的方向，是同樣可笑嗎？』（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一一頁）

事情顯然不是在於改良或調和與妥協，而是在於人們怎樣應用改良與妥協法。由改良派看來，只要改良就完了，革命的工作只是掛在口頭上空談，用來轉移視線。所以，改良主義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底條件下面，必然要

變成爲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要變成爲瓦解革命的工具。

由革命家看來，便恰好相反，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家看來，改良乃是革命底副產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底條件下面，自然要變成爲瓦解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變成爲鞏固革命的工具，變成爲向前發展革命運動的撐支點。

革命家之所以接受改良，爲的是要利用牠來做連環鉤，以便把公開的工作與秘密的工作聯貫起來，爲的是要利用牠來做一個掩飾物以便加緊秘密工作，這種秘密工作底目標，就是用革命精神準備羣衆去推翻資產階級。

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來以革命精神利用改良與利用妥協底實質。

相反的，改良派之接受改良，爲的是要拒絕一切秘密工作，破壞那準備羣衆去革命的工作，安息於『恩賜的』改良之下。

這就是改良主義策略底實質。

關於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改良和妥協問題就是這樣。

可是，在帝國主義被推翻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情形就稍微改變了。在某種條件下，和某種環境下，無產階級的政權也許不得不暫時放棄用革命手段改造現存秩序的辦法，而採用逐漸改造現存秩序的方法，就是說用列寧在關於金子底意義這篇著名論文裏所說的『改良的辦法』，採用繞道前進的辦法，採用改良和向非無產階級讓步的辦法，以便瓦解這些階級，給革命以暫時休息的機會，養精蓄銳和準備再行進攻的條件。不能否認，這種辦法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改良主義的辦法。只是應當記着，這裏有一個根本的特點，這特點就是：這裏的改良是從無產階級的政權那裏出發的，這種改良是鞏固着無產階級的政權，給無產階級政權以必要的暫時休息機會，這種改良底使命不是瓦解革命，而是瓦解那些非無產階級的階級的。

這樣一來，在這種條件之下，改良就變成相反的東西。

無產階級政權之所以能夠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因爲，而且只是因爲，在前一時期內革命規模是充分巨大，這樣，牠便造成了充分廣闊的地盤，使得有餘地可以實行退守，用暫時退守的策略，繞道前進的策略，來代替進攻的策略。

這樣一來，在從前，在資產階級政權之下，改良是革命底副產品，可是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改良底來源便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勝利品，便是留在無產階級手中的由這些勝利品所構成的後備力量。

列寧說：

「祇有馬克思主義才確切地和正確地決定了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但同時，馬克思只能從一方面，就是說祇能在當時這樣一個環境裏看見這種關係，在這個環境裏，無產階級甚至於在一個國家裏都還沒有獲得第一次的，多少穩固的，多少長久的勝利。在這樣的環境內，正確關係底基礎就是：改良是無產階級底革命的階級鬥爭中的副產品……當無產階級甚至於光是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在改良對革命的關係上，就發生一種新的東西。在原則上還是與以前的一樣，可是在形式上已發生了這樣的變化，這個變化是馬克思本人所不能預先見到的；可是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和政策才能瞭解這個變化……。在革命勝利以後，牠們（即指改良，——斯大林註）在國際範圍內照舊還是副產品，除此以外，對於取得了勝利的國家，當這個國家底精力在極緊張地用過以後而弄得顯然不够去

用革命手段實行這種或那種過渡的時候，牠們就是一樣必要的和應有的暫時休息機會。勝利給我們以這樣的「後備力量」，使我們甚至在迫不得已而退守的時候也有把握可以支持下去，——在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都能够支持下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四到八五頁）

八 黨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當時，第二國際底政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議會的鬥爭形式，算是基本的形式——在這種條件之下，政黨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牠後來在公開的革命戰鬥條件中所具有的那種嚴重的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在反對別人攻擊第二國際而替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底政黨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發動時期，便沒有力量採取什麼嚴重的辦法。這是完全對的。可是這樣表示什麼呢？這就是表示，第二國際底政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是沒有用處

的，他們並不是無產階級底戰鬥的政黨——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政黨，而是一種遷就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在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不是政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政黨在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務人。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在這樣的政黨領導之下，當然是談不上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然而，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乃是公開的階級衝突底時期，無產階級的革命發動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一些新的任務，即關於把整個黨的工作改造到新的革命的軌道上，關於以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訓練工人，關於準備和整頓後備軍，關於與鄰國無產階級聯盟，關於與殖民地 and 附屬國解放運動建立牢固的聯繫，以及其他等等的新任務。誰要是以為這些新任務可以由在國會主義底和平環境內培植出來的舊社會民主黨底力量來解決……這就

是使自己必然陷於絕望的地步。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地步。有這樣的任務在肩，而以陳腐的政黨為領導，——這就是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情況。因此，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狀況的。

因此，就必需要有新的政黨，戰鬥的政黨，革命的政黨，這個政黨要這樣勇敢，以至於足以引導無產階級作奪取政權的鬥爭，要這樣有經驗，以至於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要這樣敏捷，以至於足以繞過一切橫在達到目標的道路上的暗礁。

沒有這樣的政黨，就甚至於莫想要推翻帝國主義，莫想要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新政黨，就是列寧主義底政黨。

這個新政黨有什麼特點呢？

(一) 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黨首先應該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牠應當吸收工人階級底一切優秀份子，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精神和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大無畏的忠實。可是要成為真正的先進的部隊，黨就必需用革命的理

論，對於運動規律的知識和對於革命規律的知識，來把自己武裝起來。沒有這一點，牠就沒有力量來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來引導無產階級。倘若黨只限於登記工人階級羣衆底日常生活及思想，倘若牠跟着自發運動作尾巴，倘若牠不會克服自發運動底消極性和政治冷淡性，倘若牠不會超出於無產階級底暫時利益之上，倘若牠不會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程度上，牠就不能成爲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底前面，牠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牠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是跟着自發運動做尾巴。第二國際底政黨是鼓吹『尾巴主義』的，這些政黨是資產階級政策底執行者，這種政策把無產階級弄成爲資產階級手上的工具。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的部隊底觀點上的，並能夠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程度上的政黨——只有這樣的政黨才能使工人階級脫離工聯主義底道路而將牠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工人階級鬥爭底困難，鬥爭環境底複雜，戰略與策略，後備軍與隨機應變，進攻與退守。這些條件底複雜程度，即使不比戰爭條件底複雜程度

大，至少也不比戰爭條件底複雜程度小。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羣衆以正確的方針呢？無論那一個在戰場上作戰的軍隊，要是牠不願意使自己必然遭受失敗，牠就一定要有經驗豐富的參謀部。無產階級如果不願把自己交與兇惡的敵人去吞食，那麼牠就更其一定要有這樣的參謀部，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可是這種參謀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底革命政黨，才能夠成爲這樣的參謀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這就等於軍隊沒有參謀部。黨就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參謀部。

但是黨不能僅僅是先進的部隊。同時牠應該是階級底部隊，階級底一部分，應當在自己生存底一切根蒂上與階級緊相聯繫。當階級還沒有消滅的時候，當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來補充的時候，當整個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去提高到先進部隊底程度的時候，先進的部隊與其餘工人階級羣衆的區別，黨員與非黨員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種區別變成了隔離，如果黨自己閉關自守和脫離了非黨羣衆，那麼黨就不成其爲黨了。

如果黨不和非黨羣衆發生密切關係，如果在黨和非黨羣衆中間沒有聯絡，如果

這些羣衆不接受牠的領導，如果黨在羣衆中沒有精神上的和政治上的信用，那麼黨就不能領導階級。不久以前，我們的黨從工人中招收了二十萬新黨員。最可注意的事實，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跑來加入黨，不如說是由所有其餘的非黨羣衆派來加入黨的，這些非黨羣衆曾積極參加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而且不得他們的贊同，根本就沒有過接收新黨員。這件事實證明，廣大的非黨工人羣衆，都把我們的黨看作他們自己的黨，看作親近的和自家的黨，他們認為黨底發展和強固是與他們的利益血肉相關的，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信託於黨底領導。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種不可捉摸的精神上的線索，把黨與非黨羣衆聯結起來，那麼黨就不會成爲本階級底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列寧說：

「我們是階級底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則完全是整個階級）底行動都應該受我們黨底領導，都應該盡可能地密切接近於我們的黨，可是如果以爲在資本主義之下，有什麼時候，差不多整個階級或者是整個階級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

進部隊底程度，自己的社會主義政黨底覺悟性與積極性底程度，那就是癡想主義和「尾巴主義」。還沒有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主義者懷疑過：在資本主義之下，甚至職工組織（比較原始的，比較容易爲落後羣衆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者是完全整個工人階級。如果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牠的一切羣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的責任是在把日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先進部隊底程度，那末，這就是欺騙自己，不願看見我們的任務底重大性，縮小這些任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頁到二〇六頁）

（二）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倘若牠想真正領導階級底鬥爭，牠應當同時還是本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黨的責任是非常偉大和繁雜的。黨應當在內部的和外部的發展底非常艱難的條件之下，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當環境需要進攻時，牠就應該領導無產階級去進攻，當環境需要退守時，牠就應該領導無產階級避開敵底打擊，牠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羣衆灌輸鬥爭中的紀律性和計劃性，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

只有當牠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底代表時，只有當牠自己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時，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條件，便談不上什麼黨對於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真正領導。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在列寧關於我們的黨章第一條的著名公式裏就確定了，在列寧底這個公式裏，黨是看作爲各組織底總和，而黨員則爲黨組織中某一組織底組員。孟塞維克還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對這種公式，他們提出了一個自由報名入黨的『系統』，這種『系統』使每個『大學教授』和『中學生』，『同情者』，和『罷工者』，凡是多少幫助黨的，但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黨的任何組織的人，都可以取得黨員底『稱呼』。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新奇『系統』在我們黨內鞏固了，那末，結果一定會弄到黨裏充滿了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一定會把黨弄成了一個散漫的，無定形的，無組織的『結構』；使黨沉沒在『同情者』底大海中，抹煞黨與階級中間的界線，丟開黨關於把無組織羣衆提高到先進部隊底程度的責任，不用說，在這樣的機會主義的『系統』之下，我們的黨是不能夠在革命進

程中充當工人階級底組織核心的。

列寧說：

『如果站在馬爾託夫底觀點上，那末黨底界線還是完全不確定的，因為在他看來，「每一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是黨員」。試問這種散漫性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是「名稱」底廣闊的散佈。牠的害處就是灌入一種紊亂組織的觀念——把黨與階級混為一談的觀念。』（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一一頁）

但是黨並不僅是黨組織底總和。黨同時還是這些組織統一^的系統，是這些組織正式聯合起來的一個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為全體黨員所必須履行的切實的決議。沒有這些條件，黨就不能成為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不能對工人階級底鬥爭實行有組織的和有計劃的領導。

列寧說：

『從前，我們的黨並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不過是許多部分的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了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為有組織的黨，

這也就是權力底造成，思想底威信變成爲權力底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服從上級機關。」（請參看同上卷第二九一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的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不穩定份子底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末，黨，這個整體底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沒有可能。在組織問題上，列寧主義總是一貫地實行這種原則的。列寧把那些反對這種原則的鬥爭叫做只值得受人譏笑的和受人唾棄的『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

請看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那本書上關於這些不穩定的份子所說的話：

『俄國的虛無主義者特別具有這種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神奇古怪的「工廠」；部分服從全體和少數服從多數，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一聽見在中央機關領導之下分工，他們就可憐而又可笑地狂吠起來，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旋」……，一提起黨的組織章程，他們就做出看不起人的樣子和說出目中無

人的意見，說什麼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顯然的，這種關於所謂官僚主義的喊聲，不過是爲的要掩飾他們對於中央機關底人員的不滿意，不過是爲的要掩飾門面」。

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爲你是由代表大會不根據我的意見而是違反着我的意見委任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爲你依靠着代表大會底形式的決議，而不依靠我的同意；你作事極端機械，因爲你只依靠黨的代表大會底「機械的」大多數，而不顧及我想得到簡任位置的希望；你是專制魔王，因爲你不願意把權柄交給親熱的老夥伴們。」*（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〇頁和二八七頁）

（三）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可是，牠並不是工人階級底唯一的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別的許多組織，沒有這些組織，他就不能與資本制度作真正的鬥爭，這些組織就是職工會，合作社，工廠製造廠的組織，國會黨團，非黨的婦女聯合會，報館，文化的教育組織，青年聯合會，

*這裏所說的，是阿雪洛德，馬爾託夫，波特列索夫等人這些「夥伴」，這些人不願從第二次代表大會

底決議並且責備列寧爲「官僚主義者」。——斯大林註。

革命的戰鬥的組織（在公開的革命行動時期），代表蘇維埃——國家形式的組織（假如無產階級握得政權）等等。這些組織底絕大多數都是非黨的，只有一部份是直接接近於黨或是成爲黨底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之下，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要的。因爲沒有牠們，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種鬥爭範圍內的階級陣地，沒有牠們，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使命的力量。但是，組織既然這樣繁多，怎樣去實現統一的領導呢？有什麼把握可以保證在領導上不因組織太多而引起紛亂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幹各個特別範圍內的工作，因此牠們彼此不致互相妨害。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這就是這一切組織應該在一個方向上進行工作，因爲牠們都是爲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爲這一切組織進行工作時所應當依照的總路線，總方向呢？那裏有這樣一個中心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僅是因爲有必要的經驗而足以定出這條總路線，而且因爲牠有足夠的威信而可以激動這一切組織實行這條路線，以達到領導方面的統一，而免除間斷現象呢？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底黨。

黨有一切根據來做到這一點：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這些份子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的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常常領導牠們；第二，因為黨既然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所以牠就是一個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這些領袖，能夠領導本階級底一切形式的組織；第三，因為黨既然是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牠就是這樣一個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夠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底所有的和各種各樣的非黨組織都變成爲服務機關和聯繫帶，使黨與階級聯結起來。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當然這並不是說，非黨的組織，職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服從黨的領導。問題底本質不過是在於，加入這些組織的黨員們，當然是有威信的人，他們在這些組織裏應該採用一切說服的辦法，使得這些非黨的組織在工作當中與無產階級底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底政治領導。

就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黨是無產階級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這個最高形式底政治領導，應當普遍到無產階級底一切其他形式的組織方面去。」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五頁）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那種主張把非黨組織看作「獨立」組織和「中立」組織的機會主義理論——這種理論產生了一些不依賴於黨的議員以及離開黨的出版人，近視的工會官僚和小資產階級化的合作運動家——是和列寧主義底理論與實際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無產階級內部的和這個階級底各組織中的基本的領導核心。可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把黨看成爲自目的，看成爲自願自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底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而且同時牠是無產階級手裏的工具，當還沒有爭得專政的時候，便運用牠來爭得專政，而在已經爭得專政的時候，便運用牠來爭得專政，而在已經爭得專政的時候，便運用牠來鞏固和擴大專政。如果奪取政權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如果帝國主義底條件，戰爭底必然性，危機底

存在，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底一切力量集中到一個地點，把革命運動底一切線索集中到一個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麼，黨底意義就不能提到這樣高，黨底作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組織底一切別的形式。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首先就是因為黨是無產階級順利奪取政權時所必要的戰鬥參謀部。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集合於自己的週圍和在鬥爭進程中把整個運動底領導集中起來的黨，那麼，俄國無產階級是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的。

但是，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並不祇是爲的要爭得專政，而且更其是爲的要保持專政，鞏固專政和擴大專政，以謀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無論什麼人都看到了，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如鐵一般的紀律，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全體羣衆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就是說，如果不是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忠實的，不怕犧牲的，有威信的，能够領導或吸引其餘落後階

層的人們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那麼，布爾塞維克不僅不能把自己的政權維持到兩年半，而且不能維持到兩月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向千百萬的無產者羣衆灌輸紀律性和組織性；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造成骨幹和支柱以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底腐蝕影響，這就是說加強無產階級在從新教育和改造這些小資產階級方面的組織者的工作，這就是說幫助無產階級羣衆把他們自己訓練成爲這樣一種力量，以至於能夠消滅階級和準備條件去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然而要做到這一切，如果沒有一個因爲自己的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沒有一個鐵一般的和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如果

沒有一個爲本階級裏全體忠實份子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一個會注意羣衆情緒和會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麼，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一九一頁）

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爲的是要去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可是，既然這樣，那麼，一到階級消滅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衰亡的時候，黨也一定會跟着衰亡的。

（五）黨是意志底統一，不容有派別組織底存在。爭得和保持專政，要是沒有一個因爲有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沒有意志底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底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那麼，黨內的鐵的紀律是不可能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排斥黨內意見鬥爭底可能。正是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且容許批評和容許黨內意見的鬥爭。這更不是說，紀律應當是「盲目的」。正是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認爲要有自覺的和自願的服從，因爲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爲真正鐵的紀律。但是到了意見鬥爭已經完結，批評已經結

束，決議已經通過以後，全體黨員意志底統一和行動底統一，就是必要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則無論統一的黨，無論黨內鐵的紀律，都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在現在這個緊張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中間才能够完成自己的責任，就是，如果黨的組織是最集中化的，如果黨內統治着幾乎和軍事紀律一樣的鐵的紀律，如果黨的中央是具有廣泛的全權的，具有權力的威信機關，爲全體黨員所信任的機關。』（請參看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中，黨內紀律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在爭奪專政以後的黨內紀律也應當這樣說，而且更應當這樣說。

列寧說：

『誰只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政黨底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誰就是在事實上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可是，從這裏就可以看到，派別組織底存在，是與黨底統一及黨內鐵的紀律不

能相容的。顯然用不着證明，既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既有幾個中央，就是表示黨內沒有總的中央，就是等於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等於減弱和破壞紀律，減弱和破壞專政。當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和不願意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的第二國際的黨，是可以主張派別組織自由的這種自由主義的，因為牠們根本就不需要鐵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底黨，把自己的工作建築在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種任務基礎上的黨，是既不能容忍『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的。黨是意志底統一，牠不容許有任何派別組織底行動和黨內權力底分散。

因此，列寧會『根據黨底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底意志統一——無產階級專政成功底基本條件——這個觀點，解釋了派別組織底危險性』，我們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曾把這個解釋寫在關於黨底統一的這個特別決議案內。

因此，列寧會以『無條件地立刻開除黨籍』相威脅，來要求『完全消滅任何派別組織行動』和『立刻解散一切根據各種政綱形成起來的團體』（請參看關於黨底統一的決議案）。

(六) 黨是因為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機會主義的份子，就是派別組織行動底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閉關存在的階級。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許多農民，小資產階級份子，智識份子都不斷地無產階級化，流入無產階級隊伍中。同時無產階級底上層份子中發生腐化過程，這些份子主要地是由被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額外利潤所養的工會家和議員們。列寧說過：『這個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階層或「工人貴族」，就他們的生活方式，工資數量和他們整個的世界觀看來，都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他們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主要的社會的（不是軍事的）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辦，是資本家階級所僱用的工人傭僕，是改良主義和大國主義底真正執行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七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派別，這樣或那樣鑽入黨內，帶進動搖和機會主義底精神，腐化和猶疑底精神。他們主要地也就是派別組織行動和瓦解現象底來源，是使黨的組織渙散和使黨內發生爆裂的來源。如果在自己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

去與帝國主義者交戰，這就是陷於背腹受敵的地位。因此無情地同這般份子鬥爭，將他們趕出黨外，就是與帝國主義作有成效的鬥爭的先決條件。

主張以黨內思想鬥爭的方法來『征服』機會主義份子的這種理論以及主張在黨底範圍內來『消除』這些份子的這種理論，都是腐敗的和危險的理論，這種理論有使黨陷於痲痺和終身殘病的危險，有把黨交給機會主義者蠶食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失掉革命政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失去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內有了馬爾託夫與唐恩，波特列索夫與阿雪洛德這般人，牠就不能夠走上大道，不能夠取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夠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如果我們的黨已能創立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自己隊伍底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為牠能夠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能夠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塞維克。無產階級政黨的發展和鞏固底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大國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因為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

列寧說過：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孟塞維克，那末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爭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顯然是原則的問題。這已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明白證實了……。在俄國有過很多次數的困難情形，假使當時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一定就被推翻了……。在意大利，大家都認為快要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的決戰。在這樣的時機，不僅把那些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都拉底主義者驅逐出黨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能夠動搖或者正在動搖到去和改良主義者維持『統一』的出色共產黨員驅逐出去，撤消他們的一切負責職務，都可以成爲甚至於有益處的事情……。在革命前夜，和在爲革命勝利而作最慘酷的鬥爭的時候，黨內最小的動搖都可以斷送一切，可以破壞革命，可以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爲這政權還未穩固，因爲對於這政權的進逼還過分強大。如果動搖領袖在這個時候滾開去，這不是滅弱，而是又加強黨，又加強工人運動，又加強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到四六四頁）

九 工作體裁

這裏說的不是文學體裁。我所指的是工作體裁，是列寧主義底實際中的這樣一種特別的和特殊的東西，這種東西造成特別式樣的列寧主義者的工作者。列寧主義是一個理論的和實際的學校，這個學校造就着特別式樣的黨的和國家的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寧主義的工作體裁，這種體裁底特點在那裏呢？牠的特點是什麼呢？

這樣的特點有兩個：第一，就是俄國的革命規模；第二，就是美國的求實精神。列寧主義底體裁，就是黨的和國家的工作裏的這兩種特點底聯合。

俄國的革命規模是這樣一種消毒藥，這種消毒劑可以消除一切消極態度，守舊思想，保守主義，思想停滯和盲從祖先傳統態度。俄國的革命規模就是這樣一種活力，這種活力喚醒人的思想，推動前進，破壞舊物，開展前途。如果沒有牠，那麼任何前進運動都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不把牠與工作中的美國求實精神聯合起來，那末，牠就很有可能在實際中腐化爲一種空洞的『革命的』癡想主義。這種腐化的例子很多。誰不知道，在我們這裏，曾有過『革命的』杜撰主義和『革命的』設計主義底毛病，這種毛病底來源，就是以爲法令可以安置一切和改造一切。有一

位俄國作家愛倫堡曾在一個標題爲盡善盡美的共產主義人物的小說中，描寫一個患着這種毛病的『布爾塞維克』底風格，這個人立意擬好一個盡善盡美的人物底標準表格……而在這個『工作』裏『淹死了』。在這篇小說中，有些過於誇大的地方，可是，這篇小說很正確地抓住了這個毛病，這却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會像列寧那樣無情地和苛刻地嘲弄過犯着這種毛病的人。他痛斥了這種迷信杜撰主義和發號施令主義的毛病，說牠是『共產主義的誇大狂』。

列寧說：

『共產主義的誇大狂，這就是這樣的一種人，這種人加入了共產黨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在那裏設想，以爲他用共產黨的名義來發號施令，就可以解決他自己的一切任務。』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〇到五一頁）

列寧通常都是用平常的和日常的事務來對抗那種『革命的』空大砲，這樣也就是着重指明說，『革命的』杜撰主義是和真正的列寧主義底精神和字句都是相反的。

列寧說過：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平常的日常工作……。少發些政治的噪聲，多注意些極平常的，可是實際的……共產主義建設中的事實……。』（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四三和三五頁）

反之，美國的求實精神却是這樣一種消毒劑，這種消毒劑可以消除『革命的』癡想主義及幻想的杜撰主義。美國的求實精神是這樣一種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認什麼障礙，這種力量以自己的求實的堅忍精神去掃除所有的各種各樣的障礙，這種力量只要已經開始做某件事情，就一定要把牠做到底，那怕這件事情並不怎樣大；而沒有這種力量，嚴重的建設工作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不把美國的求實精神和俄國的革命規模結合起來，那末，牠就會很有可能腐化成爲狹隘的和無原則的實際主義。誰不知道這種狹隘的實踐主義和無原則的實際主義的毛病，往往使某些『布爾塞維克』蛻化和離開革命事業呢？這種特殊的毛病，在皮里略克所著的標題爲『荒涼滿目的年份』這篇小說中已經描寫過了，他在這篇小說裏描寫了某些俄國的『布爾塞維克』底風格，說他們充滿着意志和實際行動的堅決性，

『幹得』很『起勁』，可是沒有前途，不知道『究竟爲的什麼』；因此而迷失了革命工作底道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厲害地嘲笑過這種實際主義的毛病，他痛斥了這種『近視的實踐主義』底毛病，說牠是『無頭腦的實際主義』。牠通常都是用具體的革命事業和我們一切日常工作中的革命前途底必要性來對抗這種毛病，這樣就是着重指明說，無原則的實際主義，也同『革命的』杜撰主義一樣是與真正的列寧主義相反的。

俄國的革命規模與美國的求實精神底結合，這便是黨的和國家的工作中的列寧主義底實質。

只有這樣的結合，才能給我們以列寧主義者的工作者底完整的風格，列寧主義的工作體裁。

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在到十月革命的道路上這本書底序言——

一 十月革命底國內的和國外的環境

有三種國外的情况，曾使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比較容易地打破了帝國主義底鍊子，並這樣推翻了資產階級底政權。

第一種情况：十月革命開始於兩個基本的帝國主義集團——英法集團和德奧集團——作拚命鬥爭的時期，當時這兩個集團忙於彼此間的決死鬥爭，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力量來認真注意到與十月革命鬥爭。這種情况，對於十月革命會有極大的意義，因為牠使十月革命當時能夠利用帝國主義內部劇烈的衝突來鞏固和組織自己的力量。

第二種情況：十月革命開始於帝國主義戰爭底進程中，當時苦於戰爭並渴望和平的勞動羣衆，被客觀情勢引到無產階級革命，——擺脫戰爭的唯一出路。這種情況，對於十月革命會有最嚴重的意義，因為牠給了十月革命一個強有力的工具——和平，牠會使十月革命能夠更容易將蘇維埃革命與結束可恨戰爭的事業聯合起來，並因此給十月革命在西方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衆當中，造成了廣泛的同情。

第三種情況：當時在歐洲有強大的工人運動，在西方和東方有因爲長期的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革命危險日益成熟的事實。這種情況，對於俄國革命會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因為牠會保證俄國革命在其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在俄國境外獲得可靠的同盟者。

但是除了這些國外的情況以外，十月革命還有一些會使牠容易獲得勝利的國內的順利條件。

下述幾點，應認爲是這些條件中的幾個主要條件：

第一，十月革命當時會有俄國工人階級中絕大多數底最積極的擁護。

第二，牠當時會有正渴望和平與土地的貧農和大多數兵士底無疑的擁護，

第三，牠會有布爾塞維克黨這個有鍛鍊的政黨爲其首領，爲其領導力量，這個政黨之所以有力，不僅因爲牠有自己的經驗和多年鍛鍊成的紀律，而且還因爲牠與勞動羣衆有廣泛的聯繫。

第四，當時十月革命所遇着的，是些比較易於克服的敵人，如比較軟弱的俄國資產階級，已經被多次農民『騷亂』弄得氣勢完全頹喪的地主階級，以及已經在戰爭進程中完全遭受破產的妥協政黨（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

第五，十月革命會擁有新興國家底廣大疆域，在這個疆域內，牠能夠自由隨機應變，能夠在環境要求退守時退守，能夠暫時休息，能夠收集力量以圖再舉等等。

第六，國內具有充足的糧食的，燃料的及原料的富源，十月革命在反對反革命的鬥爭中，會能依靠着這一點。

這些內外情形底綜合，就造成了使十月革命比較容易獲得勝利的那種特殊的環境。

這自然不是說，十月革命，在國內的和國外的環境方面，沒有壞的條件。例如十月革命，曾處於相當孤立的地位，在牠旁邊和鄰近未曾有一個可做牠的依靠的蘇維埃國家，——這種壞條件底意義如何呢？將來的革命（例如德國革命）在這一點上，毫無疑義地會處於比較便利的地位，因為在牠鄰近存在有我們蘇聯這個實力強大的蘇維埃國家。至於十月革命底這樣一個壞條件，即無產階級在全國人口中不佔大多數的情形，那更不必說了。

但這些壞條件，祇是着重地指出，十月革命底上述國內的和國外的條件底特殊性有莫大的意義。

我們一分鐘都不能忘記這個特殊性。在分析一九二三年秋季德國事變時，尤應牢記着這個特殊性。託洛茨基同志應當首先就要記着這個特殊性，因為他攏統地拿十月革命與德國革命相比擬，並痛斥德國共產黨底真正的和虛構的錯誤。

列寧說：

「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具體的，歷史上非常特別的形勢之下，會容易開始進行社會主義

革命，但要將這個革命繼續進行並進行到底，俄國却比歐洲各國難些。還在一九一八年
初，我就已經指出這個情形，此後兩年來的經驗，已完全證明了這種論斷是正確的。這
些特殊的條件如下：一，有可能把進行蘇維埃革命與因為發生這個革命而使帝國主義戰爭
——已經使工農受苦不堪的帝國主義戰爭——歸於結束的事情，聯結起來；二，有可能在
相當時期內利用兩個稱雄於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強盜集團間的決死鬥爭（這些集團，當時不
能聯合起來反對蘇維埃這個敵人）；三，有可能支持比較長期的國內戰爭，這局部地是因
為國家疆域廣大和交通不便；四，在農民中當時有極其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
運動，致使無產階級底政黨，採取了農民政黨（社會革命黨，該黨大多數是極端仇視布爾
塞維主義的）底革命要求並因無產階級之奪得政權而一舉實現了這些革命要求；——這
些特殊的條件，現時在西歐是沒有的，而且重複這些條件或與此類似的條件，是不很容易
的。因此——除掉其他一些原因以外，——西歐比較我們難於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六至二〇七頁）

列寧底這段話是不可忘記的。

二 關於十月革命底兩個特點，或者是十月革命與託洛茨

基同志底不斷革命論

十月革命有兩個特點，這兩個特點之所以要加以說明，首先是爲的去了解這個革命底內部意思和歷史意義。

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是這樣的事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們國家裏降生時，是這樣的一個政權，這個政權，是在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在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勞動羣衆的情形之下）這種基礎上產生的。第二，是這樣的事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們國家內成立，是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底結果，這個國家，在資本主義關係上還不大發展，同時在資本主義更發展的別些國家內仍保存着資本主義。這自然不是說，十月革命再沒有其他的特點。可是現時對於我們重要的正是這兩個特點，這不僅是因爲牠們明顯表現出十月革命底實質，而且還因爲牠們極顯著地揭露『不斷革命論』底機會主義的本性。

現在簡單地來分析這兩個特點。

關於城市和鄉村小資產階級中的勞動羣衆的問題，關於將這些羣衆奪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中的極重要的問題。革命底命運和無產階級專政底鞏固程度，要取決於下述的情形：城市和農村中的勞動羣衆，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將擁護誰，是擁護資產階級還是擁護無產階級，他們將成爲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還是將成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法國革命之所以失敗，主要的因爲農民後備軍會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十月革命之所以勝利，是因爲十月革命會能從資產階級方面奪得資產階級底農民後備軍，十月革命會能將這些後備軍奪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無產階級，會在這個革命中成了城市和鄉村中千百萬勞動羣衆底唯一的領導力量。

誰沒有懂得這一點，誰就永遠不會懂得十月革命底性質，無產階級專政底本性和我們無產階級政權國內政策底特殊性。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簡單的政府的上層機關，並不是什麼由「有經驗的

戰略家』用顧慮周到的手腕來『精巧地』『挑選出來的』，並『精明地依靠着』人民中某些階層的這種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爲推翻資本，謀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而建立的階級聯盟，並以無產階級做這個聯盟中的領導力量爲條件。

這樣，這裏所講的，並不是關於『稍微』輕視或『稍微』誇大農民運動底革命可能性，——如『不斷革命』底某些要外交的擁護者現時所愛說的一樣。這裏所講的，是關於因十月革命底結果而產生的這個新的無產階級國家底本性。這裏所講的，是關於無產階級政權底性質，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底基礎。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底先鋒隊——與勞動羣衆中人數衆多的非無產階級的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智識界等等），或者說與大多數勞動羣衆之間所建立的階級聯盟底特別形式，這是反對資本的一個聯盟，這是爲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及資產階級底復辟企圖起見的聯盟，這是爲最終地創造和鞏固社會

主義起見的聯盟。」（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又說：

『無產階級專政，——如果將這個拉丁文的，科學的，歷史學和哲學的術語，翻譯成爲比較簡單的話，——這就是：在謀推翻資本束縛的鬥爭中，在這種推翻底進程中，在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的事業中，在謀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祇有一定的一個階級，即城市的以及一般的工廠的工業工人，能够領導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羣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六頁）

列寧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底特點之一，就是，這次革命是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底模範的實施。

有些同志，認爲這個理論，是純粹『俄國式的』理論，祇與俄國實際情形有關係的理論。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在說到那些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時，他所指的勞動羣衆，不僅是俄國的農民，而且還有蘇聯各邊

區（這些邊區不久以前還是俄國殖民地）中的勞動羣衆。列寧會堅決認爲：如不與異族中這些羣衆聯合起來，則俄國無產階級即不能獲得勝利。列寧在自己的關於民族問題的各篇論文中及在共產國際各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曾屢次講過：如沒有各先進國家中的無產階級與被奴役的各殖民地中的被壓迫民衆之間的革命的聯合，革命的聯盟，即世界革命決無勝利的可能。可是殖民地是什麼呢？不就是被壓迫的勞動羣衆嗎，不首先就是農民的勞動羣衆嗎？誰不知道？關於殖民地底解放問題，在實質上，就是關於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擺脫財政資本底扼制與剝削而獲得解放的問題？

可是由此可見：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並不是純粹「俄國的」理論，而是爲世界各國所必須採用的理論。布爾塞維主義，並不祇是俄國的現象。列寧說：『布爾塞維主義』是『世界各國所應該採用的策略模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六頁）

十月革命第一個特點底特徵就是這樣。

從十月革命這個特點上看來，託洛茨基同志底『不斷革命論』是怎樣的呢？

我們現在不來多講託洛茨基同志在一九〇五年所採取的立場，那時他『簡直』忘記了農民這個革命力量，他提出了『不要沙皇，就要工人政府』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主張不要農民參加的革命。甚至拉狄克同志——『不斷革命』底這個要外交的擁護者。——現在都不能不承認：在一九〇五年，『不斷革命』，是離開實際情形而『跳到空中』（該參看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真理報）。現在，大概是人都認為：不值得再和這種『跳到空中』的幻想來周旋了。

我們也不多講託洛茨基同志在戰爭時期中所採取的立場，例如一九一五年他在他的爲政權而鬥爭這篇論文中，根據下述的觀點，即『我們處於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不是使資產階級的民族與舊制度對立，而是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民族對立』，曾作出結論，說農民生底革命作用應當減少，說沒收土地的口號，已沒有從前那樣的意義（請參看一九〇五年第二八九頁至二九二頁）。大家知道：列寧當時分析託洛茨基同志這篇論文時，曾責備託洛茨基同志『否認』『農民生底作用』，

並說「託洛茨基在事實上幫助俄國自由派的工人政治家，這些政治家們之所謂「否認」農民底作用就是不願意發動農民去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八頁）

我們倒不如來分析託洛茨基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比較晚些的著作，來分析他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成立和他已能在事實上檢查自己的『不斷革命』論並改正自己錯誤的這個時期內所發表的著作。就拿託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二年給一九〇五年這本書所作的序言來說吧。請看託洛茨基同志在這篇序言中關於『不斷革命』所說的話：

「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號事變和十月罷工之間的時期內，本書作者便規定了自己對於俄國革命發展底性質的觀點，這些觀點得到了「不斷革命論」這個名稱。這個巧妙名稱底含義，就是說：俄國革命，雖然是直接要解決資產階級性的目的，可是並不能停止在這些目的上面。祇有在無產階級執掌政權後，革命才能解決自己最近的資產階級性的任務。而無產階級爭得政權後，又不能以革命中資產階級性的範圍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正是為保證自己的勝利起見，無產階級先鋒隊，在自己取得統治地位的最初時期內，就不僅

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主的所有權，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在這個情形下面，無產階級不僅要和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初期贊助了無產階級的一切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的衝突，而且要與會協助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的衝突。在農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底地位中的矛盾，祇有在國際範圍內，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底舞臺上，才能解決。」（請參看託洛茨基同志所著一九〇五年這本書底序言）

託洛茨基同志，就是這樣談論自己的「不斷革命」的。

祇要把這段話拿來與以上從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篇論文中所引過的話比較一下，就足以了解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論與託洛茨基同志底「不斷革命」論之間有何等深刻的區別。

列寧說，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階層間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而照託洛茨基講來，「無產階級先鋒隊」與「廣大農民羣衆」却有「敵對的衝突」。

* 各處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列寧說，無產階級領導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而照託洛茨基講來，則是『在農民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的工人政府底地位中的矛盾』。

照列寧的意見：革命首先從俄國本國工農當中，吸取自己的力量。而照託洛茨基講來，祇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底舞臺上』才能吸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世界革命竟來得遲緩，那麼怎樣辦呢？我們的革命，有沒有什麼光明的前途呢？託洛茨基同志認為絲毫沒有光明的前途，因為『……工人政府底地位中的矛盾，祇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底舞臺上，才能解決』。根據這個計劃，我們的革命祇有一個前途，就是在自己本身所有的各種矛盾中苟延殘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自行衰亡。

照列寧底意見，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依靠着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底聯盟，以便『完全推翻資本』，以便『最終建成和鞏固社會主義』的政權。

據託洛茨基講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與『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的衝突』並祇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底舞臺上』去找尋『矛盾』底解決的一種政權。

這種『不斷革命』與孟塞維主義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著名理論，有什麼差別呢？

在實質上是毫無差別的。

毫無疑義的，『不斷革命』，並不是對農民運動底革命可能性的一種平常的輕視。『不斷革命』乃是對農民運動的這樣一種輕視，這種輕視，結果就是否認列寧底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託洛茨基同志底『不斷革命論』，是孟塞維主義底一種。

十月革命第一個特點，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第二個特點底特徵，又是怎樣的呢？

列寧研究帝國主義——特別是在大戰時期內，發現了關於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和躍進式的規律。據這個規律底意思講來，各企業，各託

拉斯，各工業部門，各個別國家底發展是不平衡的，並不是按照已定的秩序，並不是一個託拉斯，一個工業部門或一個國家總是在前，而其他的託拉斯或國家則按次落伍，——而是躍進式的，在某些國家底發展中發生停頓，而在別些國家底發展中却發生向前的躍進。而且各落伍的國家，『完全合乎情理地』希圖保持舊的陣地，而各已躍進前去的國家，又同樣『合乎情理地』希圖奪取新的陣地，——結果，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軍事衝突，便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事實。例如德國過去的情形就是如此，在五十年以前，德國同英國法國比較，曾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日本同俄國比較起來也曾經是這樣。但是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紀初期，德國和日本，已向前躍進得很遠，德國已追過了法國並已開始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而日本則追過了俄國。大家知道，從這些矛盾裏，就發生了不久以前的帝國主義大戰。

這個規律底出發點如下：

一，『資本主義已經變成爲數極少的「先進」國對於地球上極大多數人民施行殖民政策的壓迫和財政資本的束縛的全世界系統。』（請參看列寧所著帝國主義法文版和德文版）

底序言，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十四頁）

二，『瓜分這種「勝利品」的，便是兩三個稱霸全球的，全身武裝的強盜（美、英、日），他們將全世界捲入他們自己的爲瓜分自己的勝利品而進行的戰爭。』（同上）

三，財政壓迫的世界系統內各種矛盾底增長以及戰爭衝突底必然發生，結果使帝國主義底世界戰綫，容易被革命所擊傷，而由個別國家來衝破這條戰綫，是大概一定的。

四，在帝國主義戰綫底鍊子較弱的那些環節上和國家中，就是說在帝國主義最軟弱而革命最易展開的地方，最有衝破這條戰綫的可能。

五，因此，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甚至這個國家在資本主義關係上比較不發展，而同時在其他的國家裏，甚至是在資本主義關係上比較發展的國家內，却仍舊保存着資本主義——是完全可能的和大概一定的。

簡括地講來，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底基礎，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底第二個特點是什麼呢？

十月革命底第二個特點，就在於這個革命是實際應用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

理論的榜樣。

誰沒有懂得十月革命底這個特點，誰就永遠不會懂得這個革命底國際性質，這個革命底偉大的國際勢力，這個革命底特別的對外政策。

列寧說：

『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因此，社會主義最初在不多的，甚至在一個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都是可能的。這個國家中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一經剝奪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就與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這樣就吸引別國被壓迫階級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暴動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反對剝削者階級和牠們的國家』。因為『不經過各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各落後國家作比較長期的和堅持的鬥爭，那末，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自由聯合，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各國機會主義者認定：無產階級革命，只能在工業發展的國家中開始發生，假如據他們的理論說來無產階級革命一般地應在什麼地方開始發生的話；他們認定：

這些國家在工業關係上愈是發展，則社會主義獲得勝利的機會愈多，並且照他們講來，在一個國家內，況且在資本主義關係上不大發展的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是絕對沒有的，是完全不近情理的。還在大戰時，列寧就已經根據帝國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拿自己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甚至這個國家在資本主義關係上是比較不發展的國家——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來與機會主義者對立。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完全證實了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正確的。

從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看來，託洛茨基同志底『不斷革命』是什麼一回事呢？

就拿託洛茨基同志所著的一本小冊子我們的革命（一九〇六年出版的）來講罷。

託洛茨基同志寫道：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的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權，不能把自己臨時的統治變為長期的社會主義的專政。這是不容片刻懷疑的。』（請看我們的革

（命第二七八頁）

這段話底意思是什麼呢？這段話底意思就是說：『沒有歐洲無產階級底直接的國家的援助』，就是說在歐洲無產階級沒有奪得政權以前，在一個國家內，這裏所說的就是指在俄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是不可能的。

這種『理論』與列寧關於『在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社會主義可以勝利的觀點，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呢？

顯然的，這裏是毫無相同的地方。

可是就假定說，託洛茨基同志底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〇六年出版的，當時還難於決定我們革命底性質，所以這本小冊子含有無意中的錯誤，並不完全符合託洛茨基同志在較晚時期內的觀點。我們就拿託洛茨基同志所著的別一本小冊子和平底綱領來講吧，這本小冊子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出版的，現在（一九二四年）已翻印在一九一七年一書中。託洛茨基同志在這本小冊子中批評列寧所主張的關於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並拿歐洲聯邦這個口號來與這

個理論對立。他認定：社會主義底勝利在一個國家內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底勝利，祇有成爲歐洲幾個聯合爲歐洲聯邦的主要國家（英、俄、德）內的勝利，才有可能，否則完全沒有可能。他爽直地說道：『如果德國不起革命，則俄國或英國勝利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反過來說也是一樣。』（請參看託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份，一九一七年，第八九頁）

託洛茨基同志說：

『拿來反對歐洲聯邦這個口號的唯一的，稍許具體的，歷史的理由，已由在瑞士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布爾塞維克黨當時的中央機關報——斯大林註），用下述的一句話說出了：「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社會民主黨人由此便作出了結論，說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底勝利是可能的，說因此無須以造成歐洲聯邦爲在個別國家內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平衡，——這是完全不容爭論的論據。但是這個不平衡性的本身，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奧、德、法各國底資本主義的水平不是一樣的。但是與非洲及亞洲比較起來，這一切國家，却是資本主義的「歐洲」，

這個「歐洲」已經成熟到足以實現社會革命。任何一個國家，在自己的鬥爭中，不應「等待」別國，——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重複提起這種道理，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以便使平行的國際行動思想，不致為等待主義的國際不動思想所代替。我們並不等待別國而在國內開始鬥爭並繼續鬥爭，同時我們完全相信：我們的倡導行動會推動別些國家內的鬥爭：而如果這一點竟不能實現，那末，以為革命的俄國——舉例來講——能抵擋保守的歐洲，或以為社會主義的德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能孤立支持下去，這就是絕無希望的想法，——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考慮，都證明這樣。」（請參看託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分，第八九至九〇頁）

可見，這裏仍是在歐洲各主要國家中社會主義同時勝利的理論，這種理論，照例是與列寧關於在一個國家中社會主義勝利的革命理論完全不相容的。

要社會主義完全勝利，要完全保證不致恢復舊制，就必須有幾個國家中的無產者們底共同努力，——這是不待說的。歐洲無產階級如不援助我們的革命，則俄國無產階級就不能擋住合力的進逼，同時，俄國革命如不援助西方革命運動，則這種

運動就不能以牠在俄國成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所具有的那種速度向前發展，——這是不待說的。我們需要援助，——這是不待說的。但什麼是西歐無產階級給予我們革命的援助呢？歐洲工人們同情於我們的革命，他們有破壞帝國主義者底武裝干涉計劃的決心——這一切是不是援助呢？是不是重大的援助呢？當然是的。如果沒有這種援助，如果沒有這種不僅歐洲工人，而且各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家都給我們們的幫助，則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處於極困難的地位。這種同情和這種幫助，又加上我們紅軍的實力和俄國工農拚命護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決心——所有這一切，至今是否足夠去擊退帝國主義者底進攻，並取得爲進行認真的建設工作所必須的一種環境呢？是的，是足夠的。這種同情現在是發展着，還是低落着呢？無條件地，牠是發展着。這樣，我們有沒有各種順利的條件來不但促進組織社會主義經濟的事業，並且還去援助西歐的工人和東方的被壓迫人民呢？是有的。俄國無產階級專政七年來的歷史明顯地說明這一點。能不能否認：我們這種的雄偉的勞動高潮已經開始了呢？是不能否認的。

既然這樣，那末，託洛茨基同志說革命的俄國不能抵擋保守的歐洲，——能有什麼意義呢？

這種說法，祇能有一個意義：第一，託洛茨基同志沒有感覺到我們革命底內部的勢力；第二，託洛茨基同志沒有了解西方工人和東方農民給予我們革命的這種精神上的援助有不可估量的意義；第三，託洛茨基同志沒有看到現時正侵蝕着帝國主義的那種內部的虛弱症。

託洛茨基同志，因醉心於批評列寧底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於是在自己的和平底綱領這本小冊子中（此小冊子在一九一七年出版，一九二四年再版），無意中打了自己的嘴巴。

但或許託洛茨基同志底這本小冊子也陳舊了，也許因為某種原因，此書已不再符合託洛茨基同志現時的觀點了？我們且拿託洛茨基同志最近的，當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在一個國家內，在俄國獲得勝利以後的著作來講吧。例如和平底綱領這本書底新版書後，是託洛茨基同志於一九二二年寫的。他在這篇書後中寫道：

『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國範圍內不能勝利地完成，——這種曾在和平底綱領一書中屢次重複過的斷語，在某些讀者看來，鬚髯已經爲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及五年來的經驗所推翻。可是這樣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工人國家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內，會抵擋住了全世界，這個事實，表明無產階級有莫大的實力，這個實力，在別些更先進，更文明的國家內，將能做出真正的奇事。但是，我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雖已維持住自己這一個國家底地位，我們却沒有着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並且甚至還沒有走近這種工作……。在其餘的歐洲國家內資產階級仍然握着政權時，我們在反對經濟上孤立地位的鬥爭中不能不與資本主義世界謀妥協；同時可以深信不疑地說：這些妥協至多祇能够幫助我們醫治某些經濟上的傷痕，求得某種進展，可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底真正高漲，却祇有在歐洲各最重要國家中無產階級獲得勝利後，才有可能。』（請參看託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分，第九一—至九三頁）*

託洛茨基同志就是這樣說的，這顯然是違反實際情形並拚命挽救『不斷革命』，

* 注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使之免於完全破產。

這樣講來，那末，原來是無論你怎樣辯白，可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不僅『沒有着手』，而且甚至『沒有走近』。這樣看來，那末，原來是有人曾希望『與資本主義的世界妥協』，可是這些妥協，原來也不會有絲毫效果，因為無論你怎樣辯白，可是在『歐洲各最重要國家內』無產階級尙未勝利以前，『社會主義經濟底真正高漲』總是辦不到的。

既然在西方還沒有勝利，那麼，俄國革命祇能『二者取一』：或者是幼年夭亡，或者是蜕化爲資產階級的國家。

無怪託洛茨基同志說吾黨『蜕化』，已經說了兩年了。

無怪託洛茨基同志，在去年，已經預言我們國家定會『覆滅』。

這個奇怪的『理論』，與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的理論，怎樣可以相容呢？

這個奇怪的『前途』，與列寧所說的前途：新經濟政策將使我們能夠『建成社

會主義經濟底基礎』，怎樣可以相容呢？

這個『不斷的』悲觀失望觀點，與列寧下述的言論——舉例來講——怎樣可以相容呢？

『社會主義現時已經不是遼遠將來的問題，或某種抽象幻景的問題，或某種偶像的問題。關於偶像這個東西，我們還是抱着舊的，很壞的意見。我們已經將社會主義應用到日常生活中，而在這裏我們就應當把事情弄清楚。這就是現時的任務，這就是現代任務。在結束演說時，我要表示這樣的信念，就是無論這個任務怎樣困難，無論這個任務和我們舊時的任務比較起來是如何新穎，無論這個任務會使我們受好多困難，——我們大家同心協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幾年以內，無論怎樣都一定會解決這個任務，這樣，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就會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六六頁）

這種『不斷的』喪失前途觀點，與列寧下述的言論——舉例來講——怎樣可以相容呢？

『實際上，一切大的生產資料歸國家管理，國家政權操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個無產階級與千百萬的小農及最小農聯盟，這個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一切必要的條件，來經過合作制，而且祇是經過合作制（我們從前曾鄙視合作制為營業性的東西，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制），難道這不是為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條件嗎？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但這却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條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這裏顯然沒有也不會有絲毫可以相容的東西。託洛茨基同志底不斷革命論就是否認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反之，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就是否認『不斷革命』論。

不信任我國革命底力量和能力，不信任俄國無產階級底力量和能力——『不斷革命』論底基礎就是這樣。

過去，通常只是指出了『不斷革命』論底一方面，——不相信農民運動底革命

可能性。現在，爲說得公道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應補上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就是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底力量和能力。

孟塞維主義底通常理論，說如果沒有在『西歐各主要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底預先勝利，那末，在一個國家內，尤其是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內，社會主義底勝利是不可能的，——託洛茨基同志底理論，與這種理論有什麼區別呢？

實質上是毫無區別的。

毫無疑義的，託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就是孟塞維主義底一種。

近來，在我們的出版物上，出現了一些腐敗的外交家，這些外交家極力偷運『不斷革命』論，說牠是一種與列寧主義可以相容的理論。他們說：自然，這個理論，在一九〇五年時曾是不適用的。可是託洛茨基同志底錯誤，在於他當時跑得太遠，企圖在一九〇五年的環境裏，應用當時還不能適用的理論。可是後來，——他們又說，——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當革命已經完全成熟時，託洛茨基同志底理論却很合乎實際了。這些外交家中最主要的一個，就是拉狄克同志，——這是不難

猜到的。請聽他的議論吧：

『戰爭在力謀奪取土地並渴望和平的農民與各小資產階級政黨之間，掘就了一條鴻溝；戰爭將農民推到了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布爾塞維克黨底領導之下。當時已有可能的，不是工農專政，而是倚靠着農民的工人階級底專政。盧森堡和託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反對列寧而提出的主張（就是說，『不斷革命』，——斯大林註），事實上却成了歷史發展底第二個階段。』（請參看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第四十二期的真理報）這裏每字每句，都是強詞奪理。

說在戰爭時『已有可能的，不是工農專政，而是倚靠着農民的工人階級底專政』，是不對的。實際上，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便是工農專政在與資產階級專政的特殊錯綜結合中的實現。

說拉狄克同志所不好意思提到的『不斷革命』論是一九〇五年時盧森堡和託洛茨基提出的，——這也是不對的。事實上，這個理論是巴烏斯和託洛茨基提出的。現在，經過了十個月以後，拉狄克同志認為應該糾正一下，於是就認為應該把巴烏

斯罵一頓，說他不應該提出『不斷革命』的理論（請參看真理報上拉狄克關於巴馬斯的論文）。可是拉狄克同志也應咒罵巴馬斯底同道人——託洛茨基同志，才算公道。

說已爲一九〇五年革命所拋棄的『不斷革命』，『在歷史發展底第二個階段上』，即是在十月革命時，竟成了正確的主張，——這也是不對的。十月革命底全部進程，十月革命底整個發展過程，表明了並證明了『不斷革命』論是毫無根據，表明了並證明了這個理論與列寧主義底基礎絕不相容。

甜蜜的言論和腐敗的外交手段，終不能掩蓋『不斷革命』論和列寧主義間的深刻的鴻溝。

三 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策略底幾個特點

要了解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底策略，至少要講明這個策略底幾個特別重要的特點。在許多論布爾塞維克策略的小冊子中，正常常忽略過這些特點，所

以尤其應該將牠們講明。

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個特點。聽了託洛茨基同志底言論後，就可以這樣設想，以爲在準備十月革命的歷史中，總共只有兩個時期：偵探時期和暴動時期，除此以外都是誤信邪說。一九一七年四月示威遊行是什麼呢？『四月示威遊行結果比當時所預料的來得「左些」，這次示威遊行，是一種偵探性質的發動，其目的就是檢驗羣衆們底情緒和檢驗羣衆們與蘇維埃內大多數人民間的相互關係』（請參看託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分，第二十七頁）。而一九一七年七月間的示威遊行又是什麼呢？據託洛茨基同志底意見，『在實質上說來，這一次示威遊行，也是在運動底較高的新階段上舉行的一種更大規模的新的偵探動作』（請參看同上第三十二頁）。一九一七年根據吾黨底要求而舉行的六月間的示威遊行，照託洛茨基同志底觀點講來，不用說，更應稱爲『偵探動作』。

這樣講來，就是說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時，布爾塞維克黨就已經有了現成的工農

政治軍隊，如果布爾塞維克無論在四月間，六月間和七月間都不會調動這支軍隊舉行暴動，而祇作了一些『偵探動作』，那末，這是因為，而且祇是因為『偵探得來的消息』當時不會報出順利的『情報』。

不用說，關於吾黨政治策略的這種簡單化的觀念，無非就是將通常的軍事策略與布爾塞維克黨底革命策略混為一談。

實際上，當時這一切示威遊行，首先就是羣衆自發反抗底結果，羣衆跑到街上去表示憤恨戰爭的情緒底結果。

實際上，那時黨底作用，就在於把羣衆底自發舉動組織起來，領導這種舉動，使其按照布爾塞維克底革命口號進行。

實際上，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時，布爾塞維克不曾擁有也不能擁有現成的政治軍隊。布爾塞維克，只是在由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之間的階級鬥爭和階級衝突底進程中才造成這種軍隊（而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時，終於造成了這種軍隊），布爾塞維克黨，當時也經過四月示威遊行，也經過六月和七月示威遊行，也經過區議會和市議

會底選舉運動，也經過反對郭尼洛夫暴動的鬥爭，也經過奪取蘇維埃的鬥爭，去造成這種軍隊。政治軍隊與軍事軍隊不同。如果軍事司令部在臨戰時，就已經擁有現成的軍隊；那末，政黨却要在鬥爭本身底進程中，在階級衝突底進程中，按照着羣衆本身根據親自的經驗來確信黨的口號是正確的，確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這種確信程度，去造成自己的軍隊。

當然的，每一次這樣的示威遊行，同時也相當地揭示了各種力量底不可一望而知的對比關係，也有相當的偵探作用，可是在此地，偵探作用，並不是舉行示威遊行的動機，而是牠的自然結果。

列寧在分析十月暴動前夜發生的事變並拿這些事變與四月到七月間的事變比較時，說道：

「這裏的情形，恰巧不是與四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前夜，六月九日前夜，七月三日前夜的情形一樣，因為在那個時候所發生的是自發的激動，我們這一個政黨，或是沒有抓住（如四月二十日）這種激動，或是將牠約束着而將牠形成爲和平的示威遊行（如六月九日

和七月三日)。因爲當時我們很知道：蘇維埃還不是我們的，農民所相信的還是李別爾唐恩·齊爾諾夫的道路，而不是布爾塞維克的道路（暴動），因此，當時還不能有大多數民衆跟從我們走的情形，因此，暴動底時機，還沒有到來。」（請參看列寧全集二十一卷，第三四五頁）

顯然的，專靠什麼『偵探』是沒有什麼多大希望的。

問題顯然不在於『偵探』，而在於：

一、在十月革命底整個準備時期內，黨在自己的鬥爭中，曾堅定地依靠着羣衆革命運動底自發高漲；

二、依靠着自發高漲時，黨曾保持着對於運動的獨佔的領導；

三、對於運動的這種領導作用，曾使黨易於組成羣衆的政治軍隊以舉行十月暴動；

四、這種政策曾不能不使得十月革命底全部準備工作，都在一個政黨——布爾塞維克黨——底領導下面進行；

十月革命
革命準備時期
布爾塞維克黨
基爾克策底
的才一了物
其就是爭取
共產黨在革命
中佔領中的
地位

五、十月革命底這種準備工作，又使得十月暴動以後，政權落到一個政黨——布爾塞維克黨——手上了。

總之，一個政黨，共產黨底獨佔領導，就成爲十月革命這種準備工作中的基本關鍵，——十月革命底特點就是這樣，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策略底第一個特點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布爾塞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在帝國主義環境中的勝利便不可能，——這是無須證明的。

十月革命與法國一八七一年革命不同，而且優勝於牠的地方，就是這一點，在法國一八七一年革命時，革命底領導是分掌在兩個政黨手裏，這兩個政黨當中任何一個政黨都不能稱爲共產黨。

第二個特點。這樣，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是在一個政黨——布爾塞維克黨——底領導之下進行的。可是黨怎樣實現了這個領導呢？這個領導是循着什麼路線實現的呢？當時這個領導是循着使各妥協黨——革命爆發時期內最危險的集團——

孤立的路線，循着使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孤立起來的路線而實現的。

列寧主義底基本的戰略規則是什麼呢？

這個規則，在於認定：

一、在日益迫近的革命爆發的時期內，妥協政黨是革命敵人底最險惡的社會支柱；

二、如不使這些政黨孤立，即不能推倒敵人（沙皇制度或資產階級）；

三、因此，革命底準備時期內，主要的鋒芒，應該用來使這些政黨孤立，使廣大勞動羣衆離開他們。

在反對沙皇制度的時期內，在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內（一九〇五至一九一六年），沙皇制度底最險惡的社會支柱，是自由派君主派的政黨，——立憲民主黨。爲什麼呢？因爲立憲民主黨是妥協黨，使沙皇制度與大多數民衆（即整個農民）妥協的政黨。當然的，黨在當時會將主要的打擊用去反對立憲民主黨，因爲：如果不使立憲民主黨陷於孤立，當時即不能指望農民與沙皇制度決裂，而沒有這種

決裂，當時就不能指望革命勝利。好多人當時不了解布爾塞維克戰略底這個特點，並責備布爾塞維克黨過於『仇視立憲民主黨』，說布爾塞維克反對立憲民主黨的鬥爭『蒙蔽着』布爾塞維克反對主要敵人——沙皇制度——的鬥爭。可是這些責備，是毫無根據的，祇是揭露這許多人簡直不了解布爾塞維克的戰略，這個戰略主張使妥協黨孤立，爲的是要便利於戰勝主要敵人，使這種勝利更其迫近。

如果沒有這樣的戰略，那末，無產階級就不能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爭得領導權，——這是無須證明的。

在十月革命底準備時期中，各個鬥爭力量底重心，已移到了新的位置上。當時沙皇已經被打倒了。立憲民主黨已由妥協的力量，變成了當權的力量，變成了帝國主義底統治的力量。這個時候的鬥爭，已經不是沙皇制度與民衆間的鬥爭而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鬥爭。在這個時期內，帝國主義底最險惡的社會支柱，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的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這些政黨是妥協黨，是主要勞動羣衆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政黨。當然的，布爾塞維克

黨底主要打擊，當時曾用來反對這些政黨，因為：如不使這些政黨孤立，當時即不能指望勞動羣衆與帝國主義決裂，而沒有這種決裂，當時就不能指望蘇維埃革命勝利。許多人當時不了解布爾塞維克黨策略中的這個特性，責備布爾塞維克黨『過於仇視』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責備布爾塞維克黨『忘記了』主要目標。可是十月革命底整個準備時期，顯然指明：祇有採用這種策略，布爾塞維克才能夠保證十月革命底勝利。

這個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勞動羣衆更加革命化，他們對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失望，他們脫離這些政黨，他們轉而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能引導國家達到和平的唯一澈底革命的力量，——底周圍。這個時期底歷史，就是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這方面與布爾塞維克那方面爲爭奪農民勞動羣衆而鬥爭底歷史。混合政府時期，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之力謀繼續戰爭，前線上的六月發動，兵士死刑律底規定，郭尼洛夫暴動——便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而且這些事變之決定這個命運，完全是證

實了布爾塞維克的戰略底正確。因為如果不使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孤立，當時就不能推翻帝國主義者底政府，而不推翻這個政府，當時就不能擺脫戰爭。使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孤立的政策，在當時，原來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總之，使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孤立，是領導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底基本路線，——這就是布爾塞維克策略底第二個特點。

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布爾塞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那末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底聯盟，是不會能夠實現的。

託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底教訓這本書裏面完全沒有講到，或差不多完全沒有講到布爾塞維克底這個特點，——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第三個特點。這樣，黨會是循着使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陷於孤立的路線，是循着使廣大工農羣衆脫離這些政黨的路線來領導了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的。但是黨怎樣具體實現了這種使這些政黨孤立的政策呢？採取了怎樣的形式呢？用了什麼口號呢？此種政策，是在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羣衆革命運動的形式中，在『全部

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實現的，其方法是力謀將蘇維埃由動員羣衆的機關變爲暴動機關，變爲政權機關，變爲新的無產階級國家組織底機關。

爲什麼布爾塞維克當時正要靠蘇維埃，認爲蘇維埃能夠促進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孤立底事業，能夠推進無產階級革命底事業，並負有引導成千百萬勞動羣衆達到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使命的一個基本的組織上的槓桿呢？

蘇維埃是什麼呢？

還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寧就已經說過：

「蘇維埃是新的國家機關，這個機關，第一，給我們以工農底武裝力量，而且這種力量，並不和民衆隔離，像舊時的常備軍那樣；而是和民衆有最密切聯繫；在軍事上講來，這個力量，比以前的軍隊要強大得不可比擬；在革命方面講來，牠是不能爲任何其他的東西所代替的；第二，這個機關，使我們與羣衆，與大多數民衆發生這樣密切的不可分離的，易於審查的和易於刷新的聯系，這種聯系在從前的國家機關內，簡直是夢想不到的；第三，這個機關底成份，爲民衆所選出，依民意而撤換，沒有官僚的形式主義，所以比以

前的機關要民主得多；第四，牠和形式極不一致的職業有堅固的聯系。因此牠可以不經過官僚制而使形式極不一致的極深刻的改良，易於實行；第五，牠給我們以先鋒隊底組織形式，就是說，被壓迫階級，工人與農民底最覺悟的，最努力的，最先進的部分底組織形式，這樣牠就是這樣一種機關，各被壓迫階級底先鋒隊可以利用這種機關來激動，教育，訓練和領導這些階級中的全體廣大羣衆，這些羣衆，從前都是完全處在政治生活及歷史以外的；第六，牠使我們可以兼收議會制和直接民主制底長處，就是說牠把立法的職能和法律底執行合併於選出的民衆代表身上。和資產階級的議會制比較起來，這是在民主制底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進展步驟……。如果各革命階級民衆創造力未曾創造蘇維埃，那麼，在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會是絕望的事情，因為毫無疑義的，無產階級不能利用舊的機關來維持政權，而新的機關又不能立刻造成。」（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五八至二五九頁）

所以布爾塞維克當時便靠着蘇維埃，認為蘇維埃是這樣一個基本的組織環節，這個環節能夠使十月革命底組織工作易於進行，能夠使建立無產階級國家底新的強

大機關的事業，易於進行。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從牠的內部發展上看來，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布爾塞維克黨遭受七月失敗以前，兩個政權並存局面的時期）和第二個階段（郭尼洛夫暴動失敗以後）。

在第一個階段上，這個口號是要使孟塞維克黨及社會革命黨底聯盟與立憲民主黨決裂，由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組成蘇維埃政府（因為蘇維埃當時是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底影響之下），使反對黨（即布爾塞維克黨）有權自由進行鼓動，各政黨在蘇維埃內自由進行鬥爭，布爾塞維克打算進行這種鬥爭，以便能夠經過革命底和平發展，去奪取蘇維埃並改變蘇維埃政府底成份。這個計劃，自然還不是表示無產階級專政。可是，這個計劃毫無疑義地是促進了為保證專政所必要的各種條件底造成，因為這個計劃，讓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執掌政權並強迫他們在事實上實施其反革命的政綱，就加速揭破了這些政黨底真正本質，就加速了使牠們孤立的過程，就加速了使牠們脫離羣衆的過程。但是布爾塞維克黨在七月間所遭受

的失敗，截斷了這個發展過程，因為這次失敗使軍閥的立憲民主黨的反革命獲得優勢，並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投入反革命底懷抱。這種情勢，曾使黨不能不暫時取消「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以便在革命新高漲的條件之下，再行提出這個口號。

郭尼洛夫暴動底失敗，展開了第二個階段。「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又重新提到日程上。可是，當時這個口號底意義，已經不和第一個階段上一樣。這個口號底內容已經根本改變了。當時這個口號就是表示與帝國主義完全決裂和政權轉到布爾塞維克手上，因為蘇維埃內大多數，當時已在布爾塞維克影響之下了。當時這個口號，便是革命經過暴動而直接進到無產階級專政。不但如此，當時這個口號還是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並給無產階級專政以國家的形式。

將蘇維埃變為國家政權機關這種策略底不可估量的意義，在於這個策略使廣大勞動羣衆擺脫了帝國主義，揭破了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是帝國主義底工具，並將這些羣衆一直引到了無產階級專政。

總之，將蘇維埃變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這種政策，是使各妥協黨陷於孤立和使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黨策略底第三個特點。

第四個特點。為要完全說明當時的情形，我們還得要研究以下的問題，就是：布爾塞維克怎樣能夠和為什麼能夠將自己黨的口號變成為廣大羣衆所接受並推動革命前進的口號，布爾塞維克怎樣能夠和為什麼能夠不僅使工人階級先鋒隊，不僅使工人階級大多數，而且使大多數民衆確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政策。

要知道，為要使革命勝利（如果這個革命是真正民衆的和包括着廣大羣衆的革命），——祇是黨底口號正確，還是不夠的。要革命勝利，還要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即是：要羣衆自己根據親自的經驗來確信這些口號是正確的。祇有在這個時候，黨底口號才能成爲羣衆本身的口號。祇有在這個時候，革命才能成爲真正民衆的革命。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策略底特點之一，就在於這個策略能夠正確地決定某些道路和轉折，這些道路和轉折自然把羣衆引向黨底口號，可以說引向

革命門口，這樣就使羣衆易於根據自己的經驗來捉摸，檢驗，認明這些口號底正確性。換句話說，布爾塞維克黨策略底特點之一，就在於這個策略，不會將對黨的領導與對羣衆的領導混爲一談，就在於牠明顯地看到了第一種領導和第二種領導之間的區別，這樣，就在於牠不僅是領導黨的科學，而且是領導廣大勞動羣衆的科學。

布爾塞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表現得彰明較著的實例，就是在立憲會議底召集和解散方面的經驗。

大家知道，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時，布爾塞維克就提出了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口號。大家知道，立憲會議是資產階級的國會，是與蘇維埃共和國底基礎根本矛盾的。怎樣能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就是布爾塞維克既然是向着蘇維埃共和國走，而同時却要求臨時政府立刻召集立憲會議呢？怎樣能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就是布爾塞維克不僅參加了立憲會議底選舉，而且還親自召集了立憲會議呢？怎樣能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就是布爾塞維克在舉行暴動一月以前，曾容許在由舊制度過渡到新制度這個過程中，可以有蘇維埃共和國和立憲會議底暫時配合呢？

這種事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

- 一、立憲會議這種主張，當時是在廣大民衆中最流行的主張之一；
 - 二、立即召集立憲會議這個口號，便利了揭露臨時政府底反革命本質；
 - 三、要在民衆眼前揭穿立憲會議這種主張，當時就要引導這些羣衆拿着他們關切土地，關於和平，關於蘇維埃政權的各種要求直接走到立憲會議底門口，這樣使牠們與實在的和具體的立憲會議相接觸；
 - 四、祇有這樣，當時才能使羣衆易於根據自己的經驗去確信立憲會議底反革命性及解散立憲會議之必要；
 - 五、既然有這一切情形，便自然可以容許蘇維埃共和國與立憲會議底暫時配合，作爲用來消滅立憲會議的方法之一；
 - 六、這種配合，如果是在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的條件之下實現的，牠就祇能表示立憲會議服從蘇維埃，立憲會議變爲蘇維埃底附屬品，立憲會議安然歸於衰亡。
- 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布爾塞維克黨底這個政策，則立憲會議底解散，就

不會如此順利，而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後來在『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這種口號之下的各種發動，就不會這樣大遭破產。

列寧說：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時，我們曾參加俄國資產階級國會底選舉，就是說立憲會議底選舉。我們的策略，是不是正確的呢？……我們俄國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的時候，豈不是比較西歐任何一國的共產黨人都有更多的權利來認為在俄國，議會主義在政治上已經失了作用嗎？自然，我們當時是有過這種權利，因為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國會存在得久不久，而在於廣大勞動羣衆準備（思想上，實際上）接受蘇維埃制度，準備解散（或說是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國會的程·度如何。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時，俄國城市中的工人階級，兵士和農民，因為一些特別的條件，已非常完善地準備去接受蘇維埃制度並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國會，——這是完全不容爭論和完全確定的歷史事實。然而布爾塞維克黨當時不會抵制立憲會議，而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和以後都曾參加了選舉。』（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二至二〇三頁）

究竟爲什麼布爾塞維克黨不會抵制立憲會議呢？列寧說，因爲：

「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獲得勝利的幾個星期以前，甚至在已得這種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國會，不懂不使革命的無產階級受害，倒使革命的無產階級易於向落後的羣衆證明爲什麼這種國會應被解散，使解散這種國會的事業易於成功，使「在政治上消滅」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這件事，易於達到。」（同上）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託洛茨基同志不了解布爾塞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唾棄立憲會議與蘇維埃配合底『理論』，說牠是希法亭主義。

他_不了解：在暴動這個口號之下和蘇維埃很有勝利希望的情形之下，容許這個配合而召集立憲會議，是唯一革命的策略，這個策略與將蘇維埃變成立憲會議底附屬物的希法亭主義的策略，毫無相同之處；他_不了解，某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並不能使他有根據去非難列寧和黨底完全正確的關於主張在相當條件之下成立『配合的國家政權』的立場。（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三八頁）

他_不了解：如果沒有布爾塞維克關於立憲會議的特殊政策，他們就不能將成千

百萬的民衆奪到自己方面來；而不奪得這些民衆，他們就不能將十月暴動變成深入的人民革命。

很有趣的，就是託洛茨基同志，甚至睡棄布爾塞維克在論文裏應用過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認爲應用這些字眼，即失去了馬克思主義者底體面。

託洛茨基同志大概忘記了：列寧這個毫無疑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間，即是在專政勝利前一月，還寫道：『全部政權必需立刻過渡到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民主派手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九八頁）

託洛茨基同志大概忘記了：列寧這個毫無疑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引證馬克思給顧格爾曼的一封著名的信（這封信寫於一八七二年四月），在這封信裏，馬克思說破毀軍閥官僚的國家機關，是歐洲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列寧在引證這封信時曾白紙黑字地寫了下面一段話：

「馬克思說，破壞軍閥官僚的國家機器，是『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這個非常深刻的指示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人民』革命這個概念，從馬克思嘴裏說出來，似乎有點奇怪，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派和孟塞維克們，司徒威底這些信徒們，這些想把自己當作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或者會把馬克思底這句話宣佈爲『失言』。他們用這樣簡陋的自由主義精神曲解了馬克思主義，以爲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對立以外，其他什麼都沒有，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對立的了解又是極端死板的……。在一八七一年，歐洲大陸上無論在那一國內，無產階級都沒有成爲人民底大多數。把真正大多數的人民捲入運動漩渦的『人民』革命，當時祇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包括在內，才能成爲這樣的革命。這兩個階級組成了當時的『人民』。這兩個階級因爲同受『官僚軍閥的國家機器』底壓迫、摧殘、剝削而聯合起來。搗毀這個機器，破壞這個機器，這便是『人民』，大多數人民，工人們和大多數農民底真正利益，便是貧農和無產階級自由聯盟底『先決條件』，而如果没有這個聯盟，則民主制是不穩固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至三九六頁）

列寧底這些話，是不可忘記的。

總之，善於用引導羣衆走上革命立場的方法，去使羣衆根據自己親身的經驗來確信黨的口號是正確的，這是把成千百萬勞動羣衆奪到黨方面來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策略底第四個特點。

我認爲以上的說話已經完全足以講明這個策略底各個特點。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

毫無疑義的，所謂革命在歐洲各主要國家內同時勝利的這個著名理論，所謂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不能勝利的這個理論，——原來是一個矯揉造作的，毫無生機的理論。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七年來的歷史，並不是證實這個理論，而是駁斥這個理論。這個理論不僅不能採納作爲世界革命發展底計劃，因爲牠與顯然的事實相矛盾。牠尤其是不能採納作爲一個口號，因爲牠不能展開而祇束縛那些因爲某種歷史條件而有單獨衝破資本戰線之可能的個別國家底倡導性；因爲牠不是推動個別國家去積極進攻資本，而祇是推動個別國家去消極等待『普遍爆發』底時機；因爲牠

不是在個別國家底無產者中間養成革命堅決性底精神，而祇養成哈姆列特底猶疑精神：『萬一別國不援助，那又怎麼樣呢？』列寧說得完全正確：無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乃是『普通的事情』，『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祇能是『少有的例外。』（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可是大家知道，列寧主義的革命論，並不祇限於此。

牠同時還是世界革命發展論*。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裏的勝利，並不是一個自顧自的任務。革命已獲勝利的這一個國家底革命，把自己不應看做自顧自的東西，而應看做用以加速全世界無產階級底勝利的助手，工具。因為在一個國家裏（在這裏就是指在俄國）革命底勝利，不僅是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和日益崩潰中的產物，牠同時還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

毫無疑義的，世界革命發展的道路，並不像革命沒有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前，在這種發達的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尚未出現以前，所能

* 請參看我著的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斯大林註。

感覺得的那樣簡單。因爲出現了這樣的新因素，如在發展的帝國主義底條件之下發生作用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定律；這個定律說明軍事衝突必然發生，說明資本之世界戰線一般地削弱和社會主義可以在個別國家內勝利。因爲出現了這樣的新因素，如在西方與東方之間，世界財政資本剝削中心與殖民地壓迫底舞台之間已經存在着一個偉大的蘇維埃國家；單是這個國家底存在，已足以使全世界革命化。

在研究世界革命底道路時，所有這些因素（比較次要的別些因素我還不講），是不能不估計到的。

從前，人們通常認爲，革命底發展道路，將是首先在那些比較發展的「先進的」國家中，社會主義底成份平衡地「成熟起來」。現在，這個觀念，須要有重大的改變。

列寧說：

國際關係底系統現在構成得這樣，就是歐洲有一個國家被各戰勝國所奴役——這就是

德國。再則，西方有些國家，而且是最老的國家，由於勝利而處於這樣的境遇，即牠們可以利用這種勝利來向本國被壓迫階級作一些不重要的讓步，——這種讓步雖然是不重要的，可是到底足以推延這些國家裏的革命運動，造成幾許類似『社會和平』的現象。

同時許多國家：東方各國，印度，中國等等，正因為最近這次帝國主義戰爭，完全走出了自己的常軌。牠們的發展最終地走上了普通歐洲式的資本主義的軌道。普通歐洲式的醞釀在牠們中間開始了。現在全世界都看得明白：這些國家已被牽入這樣的發展，這個發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因為這一點和因為與這一點有聯系，『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正在完成其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過程……不是和我們以前所預料的一樣。這些國家完成這種發展的步驟，並不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平衡的「成熟」，而是經過某些國家之被別些國家剝削，帝國主義戰爭時第一個戰敗國家之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之被剝削。另一方面，正因為這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東方各國最終地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地被牽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底總漩渦。』（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五至四一六頁）

如果除此以外還加上這樣的事實，就是：不僅是各戰敗國和殖民地被各戰勝

國所剝削，而且一部分戰勝國也被最強大的戰勝國（美國和英國）底財政資本所剝削；這一切國家之間的各種矛盾是使世界帝國主義解體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除了這些矛盾以外，這些國家中每一國內部還存在着和發展着各種極深刻的矛盾；這一切矛盾，因偉大的蘇維埃共和國與這些國家並存的事實而加深着和緊張着，——如果注意到所有這一切事實，則對於國際狀況底特殊情形，將得到比較完滿的概念。

最有可能實現的，世界革命底發展，將經過這樣的道路，就是許多新的國家，將以革命的方法脫離帝國主義國家底系統，而同時各帝國主義國家裏的無產階級却援助這些新的國家裏的無產者。我們知道，第一個已脫離這個系統的國家，第一個已獲勝利的國家，已經爲其他一切國家中工人羣衆和一般的勞動羣衆所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擁護，則這個國家就不能維持。毫無疑義的，這種擁護將會增強和發展。在第一個已獲勝利的國家內，社會主義之鞏固愈是澈底，這個國家之變爲世界革命繼續擴展底基礎，變爲使帝國主義繼續解體的槓桿，愈是迅速，則世界革命發展底本身，許多新國家由帝國主義系統中擺脫出來的過程底本身，也將愈迅速和愈澈

底，——這也是毫無疑義的。

如果說，沒有幾個國家內無產者底共同努力，則在第一個已得解放的國家內，社會主義不能取得最後勝利——如果這種議論是正確的，那末，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其餘一切國家中工人羣衆與勞動羣衆的幫助愈是切實，則世界革命底發展也將愈迅速和愈澈底，——這也是同樣正確的。

這種幫助底表現是什麼呢？

這種幫助底表現，第一，應該是：這個已獲勝利的國家「最高限度地施行在一個國家裏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世界各國的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這種幫助底表現，第二，應該是：一個國家中「已獲勝利的無產階級」，「一經剝奪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就與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這樣就吸引別國被壓迫階級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暴動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反對剝削者階級和牠們的國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

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已獲勝利的國家所給予的這種幫助底特點，不僅在於牠加速別些國家中無產者底勝利，而且還在於，牠既然使這種勝利易於達到，這樣就保證社會主義在第一個已獲勝利的國家內得到最後的勝利。

最有可能的實現，是在世界革命發展底進程中，會造成個別蘇維埃國家內的社會主義底發源地及這些發源地在全世界範圍內組成的系統，以與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帝國主義底發源地及這些國家在全世界範圍內組成的系統相並列，而且在這兩個系統間的鬥爭，將充滿世界革命擴展底歷史。

列寧說：

『因為，如果不經過各社會共和國與各落後國家作比較長期的堅持鬥爭，那末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自由聯合，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同卷同頁)

十月革命底世界意義，不僅在於牠是一個國家在衝破帝國主義系統的事業上的偉大創舉，不僅在於牠是帝國主義國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發源地，而且

還在於牠是世界革命底第一個階段和世界革命繼續發展底強大基礎。

因此，不僅這樣一種人是不對的，這種人忘記了十月革命底國際意義，而宣稱一個國家中革命底勝利是純粹民族的現象和祇是民族的現象。而且另外有一種人也是不對的，這種人雖記得十月革命底國際意義，但是企圖將這個革命看作一種被動的，祇是以接受外來援助爲使命的現象。實際上，不僅是十月革命需要其他國家裏的革命底援助，而且其他國家裏的革命也需要十月革命底援助，以便加速和促進那個推翻世界帝國主義的事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關於列寧主義底問題

我把這本書供獻給聯共（布）底列寧格拉組織。——斯大林

一 列寧主義底定義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裏，我給列寧主義作了一個著名的定義；這定義大概已經爲大家所公認了。這定義就是：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地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

這個定義是不是正確的呢？

我想，這個定義是正確的。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一是因為這個定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認爲牠是帝國主義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正好和有些批

評列寧的人所想的相反，這些人很錯誤地認為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後產生的。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二是因爲這個定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底國際性，正好和社會民主黨底說法相反，社會民主黨以爲列寧主義祇能適用於俄國的特殊環境中。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三是因爲這個定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與馬克思學說間的骨肉相連的關係，認爲牠是帝國主義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正好和有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底說法相反，這些人以爲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底繼續的發展，而僅是馬克思主義底恢復，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實際情形中的應用。

所有這些，顯然是不需要什麼特別評註的。

可是，在我們黨內，竟還有些同志認爲有給列寧主義做出另外一種定義的必要。例如，季諾維埃夫同志就以爲：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戰爭與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世界革命是在以農民佔大多數的國家裏直接開始的。』（請參看季諾維埃夫同志作的標題爲布爾塞維主義邊

* 注重點是季諾維埃夫同志自己加上的——斯大林註。

是託洛茨基主義的這篇論文，真理報第二百七十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號出版。

季諾維埃夫同志所特別着重指出的句子，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將俄國底落後性及農理性，放進列寧主義底定義以內，這究竟表示什麼呢？

這就是表示：將列寧主義從國際的無產階級的學說變為俄國特殊情況底產物。

這就是表示：落入鮑威爾和考茨基底圈套，鮑威爾和考茨基是否認列寧主義能在其他的資本主義更發展的國家內適用的。

不待說，農民問題對於俄國是有極大的意義，俄國是一個農民的國家。但是，這件事實對於列寧主義基礎底估計，有什麼意義呢？難道列寧主義僅僅是在俄國底基礎上專為俄國產生出來的，而不是在帝國主義底基礎上和為一般帝國主義國家產生出來的嗎？難道列寧底這樣的著作，如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派幼稚病等等，祇是對於俄國有意義，而不是對於一般帝國主義國家都有意義嗎？難道列寧主義不是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經驗底歸納嗎？難道列寧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不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政黨所可以採用和定要採用的

嗎？難道列寧說『布爾塞維主義是世界各國所應該採用的策略模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六頁），這不是說得很對嗎？難道列寧說『蘇維埃政權與布爾塞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有國際意義。*』（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一至一七二頁），這不是說得很對嗎？難道列寧底下面一段話不是說得很對嗎：

『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因為俄國很大的落後性與小資產階級性的緣故，所以和先進的國家比較起來，必然有一些兒特點。但是基本的力量——以及基本的社會經濟形式——在俄國與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都是一樣的。所以這些特點無論如何不能牽涉到最主要的事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五〇八頁）

可是，假如這些都是對的，那末豈不是應該說，季諾維埃夫同志所規定的列寧主義定義決不能算是正確的嗎？

給列寧主義規定這種民族狹隘的定義，這樣能與國際主義相容呢？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二 列寧主義底主要點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上曾說：

『有人以為，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和農民底作用及其比重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問題。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祇是附屬的問題。』

這個原理是不是正確的呢？

我認為這個原理是正確的。這個原理是完全從列寧主義定義中推論出來的。真正是，如果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又是無產階級專政，那末，很明顯的，列寧主義底主要點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是規定這個問題，並且使這個問題有理論根據和具體化。

可是，季諾維埃夫同志顯然還是不同意於這個原理的。他在自己的紀念列寧這

篇論文裏說道：

『我已經說過了，關於農民作用的問題，是布爾塞維主義，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

（請參看真理報第三十五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三號出版）。

季諾維埃夫同志底這個原理，顯然完全是從他給列寧主義做出的不正確的定義中推論出來的。因此，這個原理也和他的列寧主義定義一樣，是不正確的。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革命底根本內容』（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三—三七頁），這個提綱是不是正確呢？是絕對正確的。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與策略，這個提綱是不是正確呢？我想是正確的。但從這裏應當得到怎樣的結論呢？從這裏就應當得到這樣的結論：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牠的出發點，牠的基礎，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關於帝國主義的問題，關於帝國主義發展的躍進性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取得勝利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國家的問題，關於這個國家底蘇維埃形式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的問題，關於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正是列寧所規定的，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這些問題正是無產階級專政觀念底基礎，根基；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假如對於這些基本問題沒有規定，那就說不上從無產階級專政觀點上去規定農民問題，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

不待說，列寧是一個精通農民問題的人。不待說，農民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底同盟者的問題，對於無產階級是有極重要的意義，牠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底組成部分。但是，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未曾擺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那末，也就不會產生關於無產階級同盟者的這個附屬問題，即關於農民的問題，這點難道還不清楚嗎？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未曾擺着關於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這個實際問題，那末，也就不會發生關於與農民聯盟的問題。

假如列寧不是站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基礎上來規定了農民問題，而是離開這個基礎，站在這個基礎以外來規定了這個問題，那末，他就會不是一個偉大

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像他在實際上所的確是那樣的，而不過是一個平常的『農民哲學家』，像國外的著作界的庸人所常常描寫的那樣了。

在下面兩個定義裏，一定要選擇一個：

或者是，農民問題是列寧主義底主要點，那末，列寧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先進發展的國家，對於非農民的國家，是不適用的，是不必要的。

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主義底主要點，那末，列寧主義就是世界各國無產者們底國際學說，對於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資本主義先進發展的國家也在其內——都是適用的和必要的。

這裏應當選擇一個。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上，認為『不斷革命論』，是輕視農民底作用的『理論』。那裏說：

『列寧當時與「不斷」革命派鬥爭，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斷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就是站在不斷革命觀點上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即無產階級底這個極偉大的後備軍——底作用。』

這種對俄國的『不斷革命派』的定義，至今都是大家所公認的。可是，這種定義雖然一般地是正確的，但是還不能認為是十分圓滿的。一方面，一九二四年的辯論，另一方面，對於列寧著作的仔細的分析，已經指明了，俄國的『不斷革命派』底錯誤，不僅在於他們輕視了農民意作用，並且還在於他們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本領，在於他們不相信無產階級領導權這個問題。

因此，我在自己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本小冊子裏（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已經擴大了這個定義，並且用別的更完全的定義來代替了這個定義。在這個小冊子裏關於這點是這樣說的：

『過去，通常只是指出了「不斷革命」理論底一方面——不相信農民運動底革命可能性。現在，為說得公道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要補上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就是

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底力量和能力。』

這當然不是說，列寧主義曾經反對，或者現在反對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所提倡的那種沒有加括弧的不斷革命底思想。恰好相反。只有列寧這位馬克思主義者才正確地認識了和發展了不斷革命底思想。在這個問題上，列寧與『不斷革命派』之間的區別，就是：『不斷革命派』曲解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思想，將牠變成了無生氣的書本上的字眼。而列寧則採用了純潔的不斷革命思想，把牠變成了自己的革命理論底基礎之一。應該記得，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來的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這個思想，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理論底具體實現形式之一。請看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關於這點所說過的話吧：

『我們將立刻開始由民主革命過渡，而正是按着我們底力量，有覺悟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我們將立刻開始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止……』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說的話：

我們並不陷於冒險主義，並不違反自己的科學的良心，並不徵逐便宜的名譽，所以我們祇能說而且只是說：我們用全力來幫助全體農民去幹民主革命，以便使我們，無產階級底黨，比較容易些去盡量迅速地進到新的和更高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八六到一八七頁）

又請看列寧經過了十六年以後，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以後關於這個問題所

「考茨基，希法亭，馬爾託夫，齊爾諾夫，黑爾克維特，龍格，麥克唐納爾，都拉底，以及「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底其他的英雄好漢們，都不會了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相互關係。第一個革命轉變為第二個革命。第二個革命順便解決第一個革命底問題。第二個革命鞏固第一個革命底事業。鬥爭，祇有鬥爭，才能解決，究竟第二個革命能够如何趕到第一個革命前面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六頁）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我要讀者特別注意第一個引證，這引證是從列寧底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發表的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這篇論文中引來的。有些同志至今還認爲：列寧祇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大概一九一六年左右，才有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關於不斷革命的思想。我要這些同志特別注意這個引證。這個引證毫無疑義地證明，這些同志是深入迷途了。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顯著特點，在什麼地方呢？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革命間的區別，可以歸納成爲以下的五個基本要點：

第一，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底多少現成的形式已經存在的條件之下開始發生的，因爲這種形式在公開的革命開始以前，就已經在舊制度底胎胞中生長和成熟了；而社會主義革命却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底現成形式還沒有存在或者差不多還沒有存在的條件之下開始發生的。

第二，資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就是奪取政權和使這政權適合於現有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却是在奪取政權以後去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第三，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以奪取政權來完成的。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祇是革命底開始，同時政權則被利用來作為改造舊經濟，建設新經濟的槓杆。

第四，資產階級革命祇限於用這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別一個剝削者集團去掌握政權，所以牠不需要打破舊的國家機器；而無產階級革命却要取消所有的和各種的剝削者集團底政權，而使全體勞動的及被剝削的羣衆底領袖——無產階級——去掌握政權；所以牠一定打破舊的國家機器和用新的去代替這個舊的。

第五，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在多少長久時期內把成千百萬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團結在資產階級底周圍，這正是因為這些羣衆是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而無產階級革命，如果牠想要完成牠的基本任務——鞏固無產階級底政權，建設新的社

會主義的經濟，那末牠就能夠而且應該使這些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去同無產階級結成長期的聯盟，這正是因爲他們都是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

請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幾個基本原理吧：

『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區別之一，就是：對於由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還在舊制度的胎胞裏，新的經濟組織就已經逐漸形成，這些經濟組織就逐漸更改着封建社會底所有各方面。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祇有一個任務，這任務就是掃除，拋棄，破壞舊社會底一切束縛。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只要是完成了這個任務，牠就完成了牠所應當做的一切事情，因爲，牠加強着資本主義底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却處在完全別樣的情況中。因爲歷史底轉折步驟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是落後，那末，牠要由舊的資本主義的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關係，也就越是困難。這裏除了破壞的任務以外，更加上一種新的，空前困難的任務——即組織的任務。』（請參看列寧

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

列寧接着又說：

『如果俄國革命底那個經過了一九〇五年的偉大經驗的民衆創造力，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還沒有創立蘇維埃，那末，他們在十月間就決不能取得政權，因為勝利是要依靠那包括有千百萬羣衆的運動底那些現成的組織形式存在與否爲轉移。蘇維埃便是這種現成的形式，而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我們在政治方面就得到了那些爲我們後來所經過的美妙的成功和節節勝利的進展，因爲在當時，新的政治的形式已經預備好了，而我們祇要發下幾道命令來把蘇維埃政權從在革命最初幾月裏的胎兒狀態中變成爲法定的，在俄羅斯國家內奠定的形式——變成爲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

列寧說：

『還剩下了兩個極困難的任務，對於這些任何的解決，決不能像我們的革命在最初幾月裏所經過的那種節節勝利的進展那樣。』（請參看同卷第三一五頁）

『第一，這就是內部組織的任務，這就是擺在一切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正是在於：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有了資本主義關係底現成的形

式，而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的政權——則得不到這些現成的關係，如果不拿資本主義最發展的形式來講；而且就是這種最發展的形式在實際上也祇是包含工業底很小的上層部份；而在農業中却還完全很少涉及。組織統計工作；監督那些最大的企業，把整個國家的經濟的機械變成爲一個統一的的大機器，變成爲一個使千百萬人衆都按照一個計劃來做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當時放在我們肩膀上的那個巨大的組織任務。據現時的勞動條件看來，這個任務，決不能用高呼「萬歲」來解決，如我們以前解決了國內戰爭底任務那樣。」（請參看同卷第三一六頁）

「第二個莫大的困難……就是國際的問題。我們能够那樣容易地征服了克倫斯基底黨羽，那樣容易地創立了政權，那樣毫不費力地得到了關於土地社會化和關於工人監督生產的法令，——如果我們這樣容易地得到了這一些東西，那末這祇是因爲在當時所倣倖湊合成了的條件，曾暫時給我們擋開了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帝國主義具有自己的資本的莫大勢力，具有自己的高度組織的軍事技術，這軍事技術是國際資本底真實的力量，真實的要塞，這樣的國際帝國主義無論如何，無論在什麼條件之下，都是不能與蘇維埃共和國和平共居的，這也是由於牠自己的客觀地位，也是由於牠所代表的那個資本階級底經濟利益，

——這是因爲商業的聯繫，國際的財政的關係。在這裏，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裏就擺着俄國革命底極偉大的困難，牠的極偉大的歷史問題——必須解決國際的任務，必須引起世界的革命。』（請參看同卷第三二七頁）

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內部性質和基本意思。

如果沒有暴力的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那末是不是可以完成這種根本改造舊的資產階級制度的事業呢？

顯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以爲可以和平地，在適合於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底範圍中，完成這樣的革命，——那末，這或者就是神經錯亂和喪失人類的常態意識，或者是粗魯地和公開地離開無產階級革命。

我們應以很大的力量 and 很堅決的態度來着重指出這個原理，尤其是因爲無產階級革命，暫時還祇是在一個國家內得到了勝利，這個國家正被那些仇視牠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着，而且國際資本又不能不幫助這個國家裏的資產階級。

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

「被壓迫階級底解放，不僅是非有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七三頁）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在口頭上自稱為「社會主義者」，而實際上則是資產階級底奴僕——說：首先要使大多數的人民，在保存着私有財產制度的情形下面，就是在保存着資本底政權和資本底壓迫的情形下面去表示贊成無產階級底政黨，只有在那個時候，無產階級底政黨才能够和才應該拿取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七頁）

「我們却說：首先要使革命的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打倒資本底壓迫，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關，那時候，得到了勝利的無產階級便能很快地取得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們底同情與贊助，因為，牠能够用剝奪剝削者的方法來滿足他們的需要。」（請參看同卷同頁）

列寧繼續說道：

「無產階級爲了要取得大多數的民衆，第一，牠應該推翻資產階級和奪得國家政權；第二，牠應該粉碎舊的國家機關而施行蘇維埃政權，這樣牠就能够立刻破壞資產階級及小

資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中的統治、威信與影響；第三，牠應該用革命的手段，用剝奪剝削者的方法來實現那些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底經濟要求，以便澈底打破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中間的影響。」（請參看同卷第六四一頁）

無產階級革命底明顯的特徵就是這樣。

既是這樣，那末如果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則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特點又是怎樣呢？

請看列寧給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定義：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底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的形式裏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已經獲得了勝利的和已經取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這階級鬥爭是爲要反對那個已經失敗了的，可是還沒有消滅，還沒有絕跡，還沒有停止自己的反抗行動的資產階級，是爲要反對那個加緊了自己的反抗行動的資產階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列寧在反對把無產階級專政與「全民」政權，「普選」政權，與「非階級的」政權混爲一談的時候說道：

『把政治統治奪得在自己手裏的那個階級，在奪取這個政治統治權的時候，牠已覺悟到掌握政權的就是牠獨自一個階級。這一點是包含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以內的。祇有當一個階級知道，祇有牠獨自拿取政權，而不用「全民的，普選的，全民認爲神聖的」政權這些空話來自欺欺人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才有意思。』（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八六頁）

但是，這並不是說，一個階級底政權，無產階級底政權，這個不和別的階級瓜分政權而且也不能和別的階級瓜分政權的無產階級底政權，爲要實現自己的目的起見，並不需要什麼幫助，並不需要與其他階級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結成聯盟。恰恰相反。這個政權，一個階級底政權，祇有藉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尤其是與農民的勞動羣衆間的特殊形式的聯盟，才能建立和實行到底。

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究竟是什麼呢？牠的本質是什麼呢？一般說來，這種與別

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間的聯盟，是否與一個階級專政的思想相矛盾呢？

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就在於：這個聯盟底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就在於：國家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無產階級底黨，共產黨，這個黨並不與而且不能與別的政黨瓜分領導權。

由此可見，這裏的矛盾僅僅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底先鋒隊——與勞動羣衆中人數衆多的非無產階級的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智識界等等），或者說與大多數勞動羣衆之間所建立的階級聯盟底特別形式。*，這是反對資本的一個聯盟，這是爲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及資產階級底復辟企圖起見的聯盟，這是爲最終地創造和鞏固社會主義起見的聯盟。這是特別式樣的聯盟，這個聯盟是在特殊的環境中，即猛烈的國內戰爭的環境中形成的；這是社會主義底堅決的擁護者與社會主義底動搖的同盟者間的聯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盟，有時則是社會主義底堅決的擁護者與「中立派」間的聯盟（那時，聯盟就從關於鬥爭的協定變成關於中立的協定）。這是那些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思想上都各不相同的階級之間的聯盟。*（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加米業夫同志在他自己的某一個指導報告中，在反對這樣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說道：

「專政不是一個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見真理報第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我認爲，在這裏，加米業夫同志首先就是指我所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本小冊子裏的一個地方說的，這個地方底原文就是：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簡單的政府的上層機關，並不是什麼由「有經驗的戰略家」用顧慮周到的手腕來「精巧地」「挑選出來的」，並「精明地依靠着」人民中某些階層的這種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爲推翻資本，謀社會主義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底最後勝利而建立的階級聯盟，並以無產階級做這個聯盟中的領導力量為條件。」

我現在還是完全擁護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因為我認為，牠與列寧底那個剛才由我們引證過的定義是完全符合的。

我斷定說，加米業夫同志用這種肯定口氣所說的關於「專政不是一個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的話，是與列寧底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

我斷定說，祇有那些不懂得聯絡思想底意思，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思想底意思以及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權思想底意思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祇有不懂得列寧底以下這個提綱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這個提綱就是：

「當革命在其他各國還沒有到來的時候，祇有和農民妥協，才能够拯救俄國底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八頁）

祇有不懂得列寧底以下的原理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這個原理就是：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專政底最高原則 * 就是保存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〇頁）

列寧在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底重要的目的之一——即壓倒剝削者這個目的——的時候說道：

『專政底科學定義，就是不受任何東西所限制的，不受任何法律，絕對不受任何規則所拘束的，直接憑藉於暴力的政權』……『專政就是（請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永遠記着）不受限制的，憑藉於暴力而不是憑藉法律的政權。在國內戰爭時，一切已獲勝利的政權都祇能成爲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四一及四三六頁）

可是，固然專政是非有暴力不可的，然而，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只是包含有暴力。

列寧說：

『固然，專政是非有暴力不可的，但是，專政並不僅僅只是暴力；牠並且還是比以前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的勞動組織更高的勞動組織。」（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〇五頁）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是對剝削者施行的暴力，而且甚至於主要的並不在於施行暴力。這個革命暴力底經濟基礎，牠富有生機與獲得成功底保證，就在無產階級是代表和實現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組織。要點就在這裏。力量底來源和共產主義必然完全勝利底保證就在這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五到三三六頁）。

『牠的（就是說，專政底，——斯大林註）主要實質就在於勞動羣衆底先進部隊，勞動羣衆底先鋒隊，勞動羣衆底唯一領導者——無產階級底組織性與紀律性。無產階級底目的就是造成社會主義，消滅社會上的階級劃分，使社會上的全體人員都成爲勞動者，消滅任何由人剝削人的剝削制度底基礎。這個目的是不能立刻實現的；牠需要一個比較長期的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是因爲生產底改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是因爲社會生活一切部門底根本改變需要時間；這是因爲祇有在長期的堅忍的鬥爭中才能征服那種巨大的習慣勢力——拘守小資產階級性的和資產階級性的管理方式的習慣勢力。所以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專政底整個時期，是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請參看同卷

第三一四頁）

無產階級專政底顯著特點就是這樣。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有三個基本要點：

第一，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鎮壓剝削者，以便保衛國家，以便鞏固與其他各國無產階級間的聯繫，以便發展全世界各國底革命和使這些革命達到勝利。

第二，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使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以便鞏固無產階級與這些羣衆的聯盟，以便吸收這些羣衆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以便使無產階級對這些羣衆實行國家的領導。

第三，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組織社會主義，以便消滅階級，以便過渡到無階級的，無國家的社會中去。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三點底聯合。在三點裏面，無論那一點都不能算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唯一的特徵，反轉來說，在這三點裏面，只要是缺掉某一點，那末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無產階級專政便不成其爲專政了。因此，在這三點裏面，隨便去掉那一點，就一定會發生曲解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的危險。祇有把這三點合而

爲一，才能給我們一個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完全的和周到的概念。

無產階級專政是有自己的各個時代，自己的各種特殊形式，各種不同的工作方法的。在國內戰爭時代，最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暴力方面。但是從這裏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國內戰爭時代，並沒有任何的建設工作。如果沒有建設工作，那末就不能進行國內戰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情形却恰巧相反，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最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和平的，組織性的，文化的工作，革命的法律等等。但是，從這裏，同樣也是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建設時代，專政底暴力方面已經消失或者可以消失。在建設時期中，鎮壓底機關，軍隊及其他的組織，也和國內戰爭時代一樣，都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些機關，那末，專政底多少有保證的建設工作，是沒有可能的。不要忘記，革命暫時還祇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不要忘記，既然還有資本主義的包圍，那末也就會有干涉的危險以及由此危險而產生的各種結果。

五 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黨和工人階級

在上面，我已經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歷史必然性方面，牠的階級內容方面，牠的國家本質方面，最後是由牠的那些應當在整個歷史時期——所謂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去完成破壞的和建設的任務方面，講到了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我們應該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構造方面，從牠的『結構』方面，從牠的那些『聯繫帶』，『槓桿』以及那個『指導力量』底作用和意義——這些東西底總和便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列寧底話），而且無產階級專政底日常工作就是藉着這些東西來實現的——方面，來講到這個無產階級專政。

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這些『聯繫帶』或『槓桿』呢？什麼是這個『指導力量』呢？為什麼需要這些東西呢？

槓桿或聯繫帶就是無產階級底這樣的一些羣衆組織，如果不藉助於這些組織，就不能實現專政。

指導力量就是無產階級底先進部隊，就是牠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領導力量。

這種聯繫帶、槓桿與指導力量，是無產階級所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無產階級在牠爭奪勝利的鬥爭中，在有組織的和有武裝的資產階級面前，便會成爲沒有武裝的赤手空拳的軍隊。這些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組織，那末，無產階級在自己的爲推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在爲鞏固自己的政權的鬥爭中，在爲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便會遭受必不可免的失敗。這些組織底有系統的援助和先鋒隊底指導力量是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則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這些組織是什麼呢？

第一，這就是工人底職工會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支脈，即許多生產的，文化的，教育的及其他的組織。職工會聯合着所有一切職業底工人。這不是黨的組織。職工會可以說是包括我們這裏的統治階級——工人階級——底全體工人的組織。牠是共產主義底學校。牠把自己隊伍中的優秀份子提拔出來作所有一切管理部門裏的領導工作。牠把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份子與落後份子聯繫起來。牠把工人羣衆與工人

階級底先鋒隊聯結起來。

第二，這就是蘇維埃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無數支脈，即行政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及其他的國家的組織，更加上無數的自動的勞動羣衆團體，這些團體幫助着這些組織並使這些組織與人民連結起來。蘇維埃是城市中和鄉村中所有一切勞動者底羣衆組織。這不是黨的組織，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直接表現。所有一切關於鞏固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都是經過蘇維埃來實行的。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國家領導，是經過蘇維埃來實現的。蘇維埃把千百萬的勞動羣衆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連結起來。

第三，這就是所有各種的合作社及其所有一切的支脈。這是勞動者底羣衆組織，不是黨的組織。這種組織把他們聯合起來，最初是使他們以消費者資格聯合起來，然後就使他們以生產者資格聯合起來（農業合作社）。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廣闊建設底時期，這種組織便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牠便利無產階級先鋒隊與農民羣衆間的聯繫，並造成一種吸收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可能性。

第四，這就是共產青年團。這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不是黨的組織，但他是很接近於黨的。牠的任務就在幫助黨以社會主義的精神來教育青年。牠替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羣衆組織，造就一些供給所有一切管理部門工作的青年後備隊。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無產階級底廣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時期，青年團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最後，這就是無產階級底政黨，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牠的力量就在於牠把無產階級底所有一切羣衆組織中的所有一切無產階級優秀份子都收集在自己的隊伍裏面來。牠的任務就在統一無產階級底所有一切羣衆組織裏的工作，並指導牠們的行動，使其向着同一的目的走，向着解放無產階級的目的走。而聯合牠們和指導牠們向着同一的目的走，是絕對必要的，因爲，不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鬥爭底一致是不可能的，因爲，不做到這一點，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領導無產階級羣衆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政黨，才能統一和指導無產階級的羣衆組織裏的工作。祇有無產階級底政黨，祇有共

產主義者底黨，才能完成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領導者底這個作用。

爲什麼呢？

『第一，因爲黨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這些份子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的組織有直接的聯繫，而且常常領導牠們；第二，因爲黨既然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所以牠就是一個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這些領袖能够領導本階級底一切形式的組織；第三，因爲黨既然是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牠就是這樣一個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够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底所有的和各種各樣的非黨組織都變成服務機關和聯系帶，使黨與階級聯結起來。』（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領導力量。

『黨是無產階級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列寧底話）。

總之：職工會是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首先就是在生產方面，把黨與階級聯繫起來；蘇維埃是勞動羣衆底組織，這個組織首先就是在國家事業方面，把黨和這些勞動羣衆聯繫起來；合作社主要地是農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首先是在

經濟方面，在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把黨與農民羣衆聯繫起來；共產青年團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底使命就是幫助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去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青年和培養青年的後備幹部；最後，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的指導力量，牠的使命就是領導所有這些羣衆組織；——這就是專政「結構」底一般狀況，「無產階級專政系統」底一般狀況。

如果沒有黨，沒有這個基本的領導力量，那末，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這樣一來，如果用列寧底話來說，那末「一般和整個說來，結果就是一個在形式上非共產黨的，敏捷的，比較廣大的，很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機關，經過這個機關，黨與階級及羣衆密切聯繫起來；經過這個機關，在黨的領導之下，實現着階級底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三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能夠或者應該代替職工會，蘇維埃以及其他的羣衆組織。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黨並不是直接地來實現專政的，牠是藉助於職工會，經過

蘇維埃及其支脈來實現這個專政的。沒有這些「聯繫帶」，多少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如果沒有一些能够使先進階級底先鋒隊與這階級底羣衆們聯繫起來，使這階級和勞動羣衆們聯繫起來的「聯繫帶」那是不能實行專政的。」……「黨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而這個先鋒隊就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沒有職工會這樣的基礎，那是不能實現專政的，那是不能執行國家的職能的。爲要實現這些職能，就必須經過。許多也是新式樣的特別機關：就是經過。蘇維埃的機關。」（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十五頁和第六十四頁）

比方，在我們蘇聯這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應當把這樣一件事實看作黨領導作用底最高的表現，這事實就是我們的蘇維埃的或其他的羣衆組織，在解決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的時候，都要根據黨底指示。在這個意義上可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以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實質上，是牠的先鋒隊底『專政』，是牠的黨底『專政』，因為黨是無產階級底基本的領導力量。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田納爾說，他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但是他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完全和我們所了解的一樣。他認為，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底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而且真的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當工人階級是遭受着不斷的剝削而不能發展自己的人才的時候，工人政黨底最大的特點，正是在於這政黨只能包括本階級底少數。政黨祇能團結本階級底少數，正好像在無論那個資本主義社會裏，真正覺悟的工人，祇是佔全體工人底少數。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這個有覺悟的少數，才能够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而如果田納爾同志說他是政黨底仇敵，而同時又主張由工人階級中少數最有組織的和最革命的份子來給整個無產階級指示道路，那末，我就要說，在我們彼此中間，實際上是沒有什麼意見分歧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七頁）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可是這是不是說，可以在無產階級底專政和黨底領導作用（黨底『專政』）之間放一個等號呢？可以將前者與後者看作一個東西呢？可以將後者代替前者呢？當然不是這樣說。當然是不可以的。例如蘇林同志就說過『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請參看列寧關於黨的學說第九十五頁）。這個說法顯然是把『黨底專政』和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一個東西。從列寧主義底立場上看來，可不可以認為這種把兩個東西看作一個東西的事情是正確的呢？是不可以的。這是因為：

第一，在我們剛才從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的講演中引來的一段話裏面，列寧絕對沒有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他祇是說，『祇有覺悟的少數（就是說政黨，——斯大林註），才能夠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底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說『在實質上就是』，這還不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是說『完全就是』。我們常常說：民族問題，在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而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還不是說，農民問題可以包括民族問題，農民問題範圍就等於民族問題底範圍，農民問題和民族問題就是一個東西。顯然用不着證明，民族問題底範圍是比農民問題廣泛些和豐富些。關於黨底領導作用和關於無產階級底專政，也應當和關於這個例子所說的一樣說。如果黨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底『專政』，那末，這不是說，『黨底專政』（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彼此一樣的東西，前者底範圍就等於後者底範圍。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專政底範圍是比黨底領導作用底範圍廣泛些和豐富些。黨實現無產階級底專政，但牠所實現的正是無產階級底專政，而不是什麼別的專政。誰將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底『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底專政。

第二，無產階級羣衆組織底無論那一個重要決議，都一定要根據黨的領導的指示。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這是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僅僅就是黨的領導的指

示呢？這是不是說，因此就可以把黨的領導的指示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呢？當然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領導的指示再加上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對於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行，再加上民衆對於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施。這裏顯然是有許多過渡和中間階段，這些過渡和中間階段是無產階級專政底重要原素。因此，在黨底領導的指示與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施之間，還存在着許多東西，這就是：被領導者底意志和行動，階級底意志和行動，牠是否有決心去擁護這些指示，牠是否有本事去執行這種指示，牠是否有本事去依照環境底需要而實行這些指示。顯然用不着證明：負有領導責任的黨是不能不顧到被領導者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是不能不注意到本階級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的指示來代替階級底意志和行動。

第三，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已經獲得勝利的和已經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這個階級鬥爭可以

表現在什麼地方呢？他可以表現在無產階級爲反對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底襲擊或反對外國資產階級底干涉起見而進行的許多武裝鬥爭中。在無產階級政權沒有鞏固的時候，這種階級鬥爭可以表現在國內戰爭中。在政權鞏固以後，牠的表現，就是無產階級進行廣大的組織的和建設的工作，並吸收廣大的羣衆來進行這種工作。在所有這些情形之下，行動者都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黨，僅僅一個黨，單是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藉階級底援助來進行所有這些鬥爭的。黨照例祇是領導這些鬥爭，而牠所以能夠領導這些鬥爭，祇是因爲牠有階級底援助。因爲，黨不能包括階級，不能代替階級。因爲，無論黨底領導作用怎樣重要，黨始終祇是階級底一部份。因此，誰將黨底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便是用黨來代替階級。

第四，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黨就是無產階級底直接當權的先鋒隊，就是領導者』（列寧）。在這個意義上，黨掌握政權，黨管理國家。但是，這還不是說：黨可以超過國家政權，不要國家政權而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黨可以越過蘇維埃，

不經過蘇維埃而來統治國家。這還不是說：可以把黨和蘇維埃，和國家政權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黨是政權底中堅。但是，牠並不是國家政權，並且不能把牠和國家政權看作同樣的東西。列寧說：『我們底黨是一個當權的黨，所以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的「上層」與黨的「上層」混合起來，在我們這裏，他們現在是混合的，而且將來還會是混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〇八頁）。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列寧這段話底意思絕對不是說：我們的那些整個的蘇維埃機關，如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運輸機關，我們的經濟機關等等，都是我們黨底機關，黨能夠代替蘇維埃及其支脈，可以把黨和蘇維埃看作同樣的東西。列寧屢次說：『蘇維埃底系統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四與第十五頁）。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過，黨就是國家政權，黨與蘇維埃是一個東西。有幾十萬黨員的黨，領導着那些包括有幾百萬人——黨員及非黨員——的蘇維埃及其在中央的和在各地方的支脈，但是黨不能夠而且不應該用自已來代替他們。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專政是由那個組織在蘇維埃裏

的和受布爾塞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所實行的」；『黨底一切工作都是經過*

蘇維埃——蘇維埃把屬於所有一切職業的勞動羣衆都聯合起來——進行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三到一九四頁）。專政『需要經過*蘇維埃的機關而實現』（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十四頁）。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來代替蘇維埃，來代替國家政權。

第五，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是一個國家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政一定包含着暴力的概念。如果確切地了解專政這個名詞底意義，那末，沒有暴力，便不會有專政。照列寧所下的定義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直接依靠着暴力的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一五頁）。所以，如果說黨底專政對於無產階級的關係，同時又把這個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那末這就是說：黨不僅應當是本階級底指導者，領袖與教師，而且應當是一種對本階級實行暴力的國家政權。因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此，誰將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是暗中以為可以把黨底威信建築在暴力上面，而這種想法是荒謬絕倫的，是完全與列寧主義不能相容的。黨底威信是由工人階級底信任來維持的。工人階級底信任不是用暴力可以取得的，暴力祇能消滅工人階級底信任；而要黨有正確的理論，黨有正確的政策，黨對工人階級的忠實心，黨與工人階級羣衆的聯繫，要黨有決心，有才幹去說服羣衆來相信黨的口號是正確的口號，——只有這樣，黨才能取得工人階級底信任。

從所有這些話裏面，我們可以得到些什麼樣的結論呢？

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一，列寧用黨底專政這兩個字時，他並不是指專政這兩個字底原來意思（依靠着暴力的政權），而是假借這兩個字底意思，就是說指領導底意思。

二，誰把黨底領導及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曲解列寧底意思，很錯誤地以對整個工人階級施行暴力的職能，歸之於黨。

三，誰把那些實際上為黨所沒有的，以暴力對付工人階級的職能歸之於黨，誰

就違背了先鋒隊和階級間的，黨和無產階級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底基本要求。

這樣一來，我們就直接碰到了關於黨和階級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關於工人階級裏的黨員和非黨員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了。

照列寧所下的定義來說，這種相互關係就是「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的相互信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黨應該仔細聽羣衆底意見；牠應該極力注意羣衆底革命本能，牠應該研究羣衆鬥爭底實際；根據這種實際來檢查自己政策底正確性。因此，黨不僅應該教育羣衆，而且應該從羣衆那裏學習。

第二，這就是說：黨應該一天一天地取得無產階級羣衆對牠的信仰，黨應該以自己的政策和工作，來造成羣衆對牠的擁護，黨不應該命令羣衆，而首先就要說服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羣衆，幫助他們在自己的經驗上認識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政策；因此，黨應該是本階級底領導者，領袖與教師。

違背這些條件就是違背先鋒隊與階級間的正確的相互關係，就是破壞他們的『相互信任』，就使得無論是階級底紀律，無論是黨底紀律，都受到破壞。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無論什麼人都看到了，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如鐵一般的紀律，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全體羣衆那樣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就是說，如果不是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忠實的，不怕犧牲的，有信心的，能够領導或吸引落後階層的人們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那末，布爾塞維克不但不能把自己的政權維持到兩年半，而且不能維持到兩月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列寧往後又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沒有一個鐵一般的，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如果沒有一個爲本階級裏全體忠實份子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一個會注意羣衆情緒和會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但是，黨是怎麼取得階級底這些信任和擁護的呢？爲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鐵的紀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牠是在什麼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呢？

請看列寧關於這點所說的話吧：

『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審查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他們對革命的忠實心，堅毅性，犧牲精神，英勇精神。第二，是由於他們能與極廣大的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階級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聯繫，接近，而且在某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種程度上，可以說與他們融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性，政治的戰略與策略底正確性，而且還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使極廣大的羣衆們都根據親自的經驗來相信這個正確性。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在革命的政黨內，就是說在擔任有推倒資產階級和改造全社會的使命的先進階級底政黨內，便不會有紀律了。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一切要建立紀律的企圖，都一定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笑話。而從另一方面說來，這些條件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夠產生的。只有長久的的工作，困苦的經驗，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理論，才能使這些條件易於造成，而這個理論本身，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與真正羣衆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發生密切聯繫時才能形成起來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四頁）

列寧繼續說道：

『爲要戰勝資本主義，那末，在領導黨（共產黨），革命階級（無產階級）——與羣衆（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總和）中間，就要有正確的相互關係。只有共產黨，如果牠真是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革命階級底先鋒隊，如果牠是包含革命階級底一切優秀的代表，如果牠是由完全覺悟的忠實的，受堅持的革命鬥爭底經驗所教育過和鍛鍊過的共產主義者所組成的，如果這個黨能將自己和本階級底全部生活密切聯繫起來，並且經過這個階級去與全體被剝削的羣衆聯繫起來和得到這個階級和這些羣衆底完全的信任。*——只有這樣的黨才能够領導無產階級去作極無情的，堅決的，最後的鬥爭，以反對資本主義底一切勢力。從另一方面說，只有在這樣的黨底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够展開自己的革命進攻底全部勢力，完全打消那爲數很少的被資本主義所腐化的工人貴族，舊有的工聯主義者以及合作運動領袖等等底不可免的反感和反抗；——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够展開自己的全部力量，而牠的這種力量，因爲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底原故，是比牠在人民總量中所佔的份量大得不可計量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一五頁）

從這段引證裏，應該得出以下的結論：

（一）黨底權威和工人階級中間爲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鐵的紀律，不是靠威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嚇或黨底『無限』權力建立起來的，而是靠工人階級對於黨的信仰，靠工人階級對於黨的擁護建立起來的；

(二) 工人階級對於黨的信仰，並不是一下子就造成的，並不是藉着對工人階級施行的暴力壓迫手段造成的，而是全靠黨在羣衆中的長期工作，黨底正確的政策，全靠黨善於根據羣衆自身底經驗說服他們，使之相信黨的政策之正確，全靠黨善於保證自己得到工人階級底擁護，善於引導工人階級底羣衆；

(三) 沒有黨底那種爲羣衆底鬥爭經驗所證實了的正確的政策，沒有工人階級底信仰，就沒有，而且不能有黨底真正領導；

(四) 如果黨得到階級底信仰，如果黨的領導是真正的領導，就不能把黨和黨的領導拿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因爲要是沒有一個得到工人階級底信仰的黨底領導（黨底『專政』），就不能有多少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要是沒有這些條件，那黨底權威和鐵的紀律，或者就是一句空話，或者就是誇張和冒險。

不可以把無產階級專政拿來同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其所以不可以的，是因為黨底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主要東西，如果是講到多少鞏固的與完全的專政，而不是過去那樣，例如巴黎公社那樣的不完全的和不鞏固的專政。其所以不可以的，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領導，是處在工作底一條線上的，是在一個方向內行動的。

列寧說：

『只要提出問題來發問「黨底專政還是階級底專政？領袖底專政（領袖底黨）還是羣衆底專政（羣衆底黨）？」就可以證明這個提問題的人底思想是糊塗到了驚人的和沒有止境的地步……。大家都知道，羣衆分成爲階級……，通常，或在大多數情形中，至少是在現代文明國內，階級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底管理人，照例都是多少比較穩固的一批有威信的，有影響的，有經驗的，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的職務的所謂領袖們……。把問題弄到一般地將羣衆專政與領袖專政對立，這就是荒謬和愚蠢到可笑的地步。』（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八和一九九頁）

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這種正確的原理，是從這樣的前提出發的，就是：先要在先鋒隊與工人羣衆之間，黨與階級之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牠是從這樣的假設出發的，就是：先鋒隊與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還是所謂常態的，還是在「相互信任」底範圍以內。

可是，如果先鋒隊與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如果黨與階級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都被違背了，那時又將怎樣呢？如果黨自己開始這樣或那樣使自己與階級對立，違背自己與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的基礎，違背「相互信任」底基礎，那時又將怎樣呢？這樣情形一般地是不是可能的呢？是的，是可能的。這樣的情形是可能的：

(一) 如果黨開始不靠自己的工作與羣衆底信任，而靠自己的「無限」權力來在羣衆中建立自己的威信；

(二) 如果黨底政策顯然不對，而牠却不願重新審查和糾正自己的錯誤；

(三) 如果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的，可是羣衆還沒有達到領會這個政策的程

度，而黨却不願或者不會等待，不讓羣衆得到機會去根據自己的經驗來信服黨底政策是正確的。

在我們黨底歷史上，有過好些次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各種集團和派別組織之所以沒落和消散了，都是因為牠們違背了這三個條件之一，而有時連三個都一起違背了。

可是，從這裏可以知道，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領導）對立起來的觀點，只有在以下的情況中間，才不能認爲是正確的，就是：

（一）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不是了解爲原來意思上的專政（『依賴暴力的政權』），而是了解爲黨底領導，這個領導絕不使用暴力去對付整個階級，去對付牠的大多數；而列寧就正是這樣了解的；

（二）如果黨有根據做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即是，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政策適合階級底利益；

（三）如果階級，如果階級底大多數都了解這個政策，接受這個政策，由於黨

底工作而信服這個政策之正確，信任黨和擁護黨。

違背這些條件，就一定會引起黨與階級間的衝突，引起牠們彼此的分裂，引起牠們彼此的對立。

不可以用強迫力量來強迫階級接受黨的領導呢？不，是不可以的。無論如何，這樣的領導不能是多麼長久的。如果黨想依舊是無產階級底黨，牠就應當知道，牠首先和主要地是工人階級底領導者，領袖，教師。我們不能忘記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本小冊子裏面關於這點所說的話：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這先鋒隊能够奪取政權和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和組織新制度，在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社會生活這件事務上做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教師，領導人，領袖。*』（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八六頁）

如果黨底政策不正確，如果牠的政策與階級底利益相衝突，是不是可以認為牠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是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依舊做領導者，牠就應當修改自己的政策，應當糾正自己的政策，應當承認自己的錯誤和糾正這個錯誤。爲證實這個原理起見，至少可以從我們黨底歷史中引證這樣的事實，如取消糧食徵收制時期，這時工農羣衆顯然表示了不滿意我們的政策，這時黨就實行，公開地和誠實地實行修改這個政策。請看列寧當時在聯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取消糧食徵收制及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問題所說的話：

「我們不應當設法隱瞞什麼，而應當公開說，農民是不滿意我們與他們彼此間相互關係底現有形式的，他是不願意要這種形式的，並且再不會這樣生存下去的。這是無容爭辯的。他們的這種意志表現得很肯定。這是絕大部份勞動民衆底意志。我們應當顧計到這一點，而且我們是這樣清醒的政治家，以至於能夠公開說：讓我們來把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修改一下罷。」（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如果黨底政策雖然在大體上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政策，由於（比方說）階級底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政治落後，而還沒有得到階級底信仰與擁護，如果黨由於（比方說）事變還沒有成熟，而還沒有能夠說服階級使之相信黨底策略是正確的；既然是這樣，那末是不是可以說，黨只要根據自己的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的這一點，就應當自己担任提倡責任和領導責任，去組織羣衆底決定勝負的發動呢？不，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做真正的領導者，牠就應當善於等待，應當說服羣衆使之相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應當幫助羣衆去根據自己的經驗信服這種政策是正確的。

列寧說：

『如果革命政黨在各革命階級底先進隊伍內以及全國內沒有爭得大多數，那就說不上什麼暴動。』（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二頁）

『沒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底見解上的轉變，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是由於羣衆底政治經驗造成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三頁）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經爭得了。這是主要的。沒有這一點，連走到勝利的第一步都不能作。可是這與勝利相隔還很遠，單靠一支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

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抱定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至少是抱定對先鋒隊採取好意的中立態度的立場和完全不能援助牠的敵人的立場的時候，却叫一個先鋒隊去作決定勝負的戰鬥，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勞動的和被資本壓迫的羣衆都走上這樣的立場，光是宣傳，光是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底親自的政治經驗。」（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一九頁）

大家知道，我們的黨，在一九一七年由列寧底四月提綱到十月暴動這時期內，正是這樣行動的。也正因爲牠依照列寧底這些指示行動了，所以牠就爭得了暴動底勝利。

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的相互關係底條件，大體上就是這樣。

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而先鋒隊與階級間的正確關係又不受到破壞，那末什麼叫做領導呢？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領導就是等於說服羣衆，使其相信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提出和實行這樣一種口號，這種口號可以把羣衆引上黨底立場，使他們易於根據自己

的經驗來看清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把羣衆提高到黨底覺悟程度並這樣來保證得到羣衆底援助，使羣衆有進行堅決鬥爭的決心。

因此說服方法是黨領導階級的基本方法。

列寧說：

「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在兩年半以來，空前地戰勝了俄國及協約國底資產階級以後，提出「承認專政」作為加入職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在羣衆裏的影響，幫助孟塞維克。因為共產黨員底全部任務，就是要會說服落後份子，會在他們裏面做工作，而不要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來與他們隔離。」（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九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應當說服一切工人，到最後一個人爲止，不是說，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着手行動，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開始行動。絕不是的。這只是說，黨在進行決定勝負的政治行動以前，應當進行長久的革命工作以保證自己得到大多數工人羣衆底擁護，至少是得到工人階級大多數底好意中立。不然，則列寧所說的

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到黨方面來乃是勝利革命底必要條件的這個原理，就絲毫沒有意思了。

可是，如果少數人不願意，如果他們不同意自願服從大多數人底意志，那末對他們應怎樣呢？黨既然得到了大多數人底信任，牠是不是可以強迫，是不是應當強迫少數人服從多數人底意志呢？是的，可以的，而且應當的。領導是由說服羣衆的方法，由黨用以影響羣衆的這個基本方法來保證的。可是這並不是不容許強迫手段，而是容許強迫手段，如果這種強迫手段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對黨的信任和擁護做基礎，如果牠是在說服了大多數人以後對少數人使用的。應當記起我們黨內在工會問題的爭論時期關於這一點所有過的爭論。當時反對派底錯誤，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底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在於反對派當時認為可以採取強迫手段呢？不是的，並不是在這裏。當時，反對派底錯誤是在於，牠不能說服大多數人使他們相信牠自己的立場底正確，並沒有大多數底信仰，而還是要去採用強迫手段，堅決主張『再三檢查』那些負有大多數人底信仰的人。

請看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職工會的演說內是怎樣說的：

『爲要建立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的相互關係，相互信任，那末，如果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犯了錯誤……就應當糾正這個錯誤。可是當人們開始來擁護這個錯誤時，這就會成爲政治危險底來源。如果我們沒有根據枯士梭夫在這裏所表示的那些情緒來採取盡量可能的民主辦法，那我們就會走到了政治的破產。我們首先應當說服，然後才強迫。我們無論如何應當說服，然後才強迫。我們沒有能夠說服廣大羣衆，於是就破壞了先鋒隊與羣衆間的正確相互關係。』（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列寧在他的關於職工會這本小冊子內也說了同樣的話：

『只有當我們已經能夠給強迫手段建築起說服手段底基礎的時候，我們才算正確地和有成效地使用了強迫手段。』（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七十四頁）

而且這是完全對的。因爲沒有這些條件則任何領導都是不可能的。因爲，如果拿黨來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黨內行動底一致；如果拿階級來說，只有這樣才能保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證階級行動底一致。沒有這一點，就會使工人階級隊伍分裂、渙散和解體。

黨底正確領導底基礎，大體上就是這樣。

凡是拿別的態度來看待領導，那就是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官僚主義，隨便什麼都可以，——只不是布爾塞維主義，只不是列寧主義。

如果在黨與工人階級之間，先鋒隊與工人階級之間，已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那末就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可是從這裏應該得出結論，就是尤其是不能把黨與工人階級，把黨底領導（『專政』）與工人階級底專政當作一個東西。蘇林同志，根據關於不能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這一點，便作出了一個不正確的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可是列寧不但說到這樣的對立是不容許的。他同時還說到把『羣衆底專政與領袖底專政』對立起來也是不容許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而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底專政當做一個東西呢？如果我們走上這一條路，我們就應當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的領袖底專政』。而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的

這種政策，實際上正是弄到這樣的愚蠢的議論……。

季諾維埃夫同志關於這一點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季諾維埃夫同志，實質上也與蘇林同志底觀點一樣。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不過有這樣的分別，就是蘇林同志說得更直截、更明顯，而季諾維埃夫同志却在那裏說含糊話。只要拿季諾維埃夫底列寧主義這本書裏的下面一段話來看，就可以相信這一點：

季諾維埃夫說：

『蘇聯現存的制度，從牠的階級內容看來，是什麼呢？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蘇聯政權底直接彈簧機是怎樣的呢？是誰實現工人階級底政權呢？是共產黨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蘇聯政權底法律上的形式是怎樣的呢？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新式國家制度是怎樣的呢？這就是蘇維埃制度。二者是絲毫不相矛盾的。』（請參看列寧主義第七〇至第三七一頁）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說二者不相矛盾，這當然是對的，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整個工人階級的關係了解爲黨底領導的話。可是怎能根據這一點就在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蘇維埃制度與黨底『專政』之間劃一個等號呢？列寧曾把蘇維埃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而他是對的，因爲蘇維埃，我們的蘇維埃，是勞動羣衆在黨底領導之下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組織。可是列寧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在什麼著作內，曾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把黨底『專政』與蘇維埃制度看作相等的東西，如現在季諾維埃夫同志所幹的一樣呢？不僅只是黨底領導（『專政』），而且就是領袖底領導（『專政』）也與無產階級的專政不相矛盾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就宣佈說，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就是說，黨專政底國家，就是說，領袖專政底國家呢？季諾維埃夫同志所偷着和胆小地實行的『原則』——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恰巧就要得出這個荒謬的結論。

據我所找到的在列寧底無數著作中，只有五個地方，他曾經順便提到黨底專政。

第一個地方，就是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維克的爭論，那裏他說：

『當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是一黨專政，而提議——這點你們已經聽到——建立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時，我們說：「是的，一黨專政！我們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而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礎，因為這是這樣一個黨，這個黨在幾十年中爭得了全體工廠製造廠的和工業的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地位。」（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二三頁）

第二個地方，就是在為戰勝高爾察克告工農書中，那裏他說：

『有人（特別是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甚至於他們的「左派」）以所謂「一黨專政」，布爾塞維克共產黨人底專政這些恐嚇字眼來恐嚇農民。在高爾察克底實例中，農民已經學會不怕什麼恐嚇字眼了。或者是地主和資本家底專政（就是鐵的政權），或者是工人階級底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三六頁）

第三個地方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在與田納爾的爭辯中。在上面，我已經引了這段演說辭。

第四個地方是在幼稚病裏面有幾行。在上面，我已經把這段話引用過了。

第五個地方是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大綱草稿中，有一個小題目叫做「黨專政」，這個草稿曾在列寧文集第三卷裏發表（請參看列寧文集第三卷第四九七頁）。應得指出，在這五個地方中，有兩個地方（第二個地方與第五個地方）的「黨專政」這幾個字，列寧是用在括弧以內的，這顯然就是指明這個公式底不確切的，是借用的意思。

同樣應該指出，在所有這五個地方，關於「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列寧並不是看作照字面本意來講的專政（「倚靠着暴力的政權」），而是看作黨的領導。

值得注意的，就是列寧在他的任何一種主要的或次要的著作中，在解釋或提起無產階級專政及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都連暗示也沒有暗示過，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恰巧相反，這些著作底每一頁和每一行都是顯然反對這個公式的（請參看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傾幼稚病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關於黨底作用的提綱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字（真正是找不到一個字）是說到黨底專政的。而這個提綱却是在列寧直接指導之下規定的，並且列寧會屢次引用過牠，認為是關於黨底任務和作用的正確說法底模範。

所有這些都是說明什麼呢？

都是說明：

（一）列寧未曾認為『黨底專政』這個措辭是無容責備的，精確的措辭，因此這個措辭在列寧底著作中用得非常之少，並且有時還加上括弧；

（二）有少數地方，列寧與敵手辯駁時會不得已而講到黨底專政，他在那裏通常講的是『一黨底專政』，即是說我們黨獨掌政權，不與別黨分享政權，而且他總是解釋道，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應當了解為黨底領導，黨底領導作用；

（三）凡是在列寧認為須要以科學精神規定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他完全只是講到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樣的情形有幾千次）；

(四) 正因此列寧『連沒有想到』把『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寫在關於黨底作用的基本決議案內——我所說的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案；

(五) 有些同志把黨底『專政』，因而也是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或者企圖看作同樣的東西，從列寧主義上看來，他們是不對的，他們在政治上是近視的，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是違背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的條件。

我還不去說，『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如果沒有上述的附帶語，可以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造成許多危險和政治缺點。使用這個沒有附帶語的措辭，那就等於：

(一) 暗中告訴非黨的羣衆說：不要胆敢反對，不要胆敢議論，因為黨無所不能，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

(二) 暗中告訴黨的幹部說：行動要勇敢些，氣勢要強硬些，也可以不聽從非黨羣衆底意見，——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

(三) 暗中告訴黨底上層說：可以任意自滿，或許還可以稍許矜誇，因為在我

們這裏是黨底專政，『因而』也是領袖底專政。

正是在現在這時候，指出這些危險是很適宜的，因為現在是羣衆底政治積極性高漲底時期，這時候黨有決心仔細諦聽羣衆底意見，這對於我們有特別的價值；這時候，黨很細心地看待羣衆底要求，這是我們黨底基本訓條，這時候，黨應當在政策方面有特別的審慎性和特別的靈活性，這時候矜誇的危險是黨底正確領導羣衆這事情上所遇到的最嚴重的危險之一。

不能不記起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過的極寶貴的話。

『在民衆中，我們（共產黨人，——斯大林註）到底還只是滄海一粟，只有我們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只有那時候我們才能管理國家。沒有這一點，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羣衆，整架機器就要倒塌。』（請參看列寧

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五六頁）

『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這也就是那保證黨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中取得基本領導力量這個光榮作用的必要條件。

六 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內（一九二四年四月出版），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有兩種措辭。第一個措辭是：

『以前認為，在一個國家內，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的，或至少是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共同發動。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根據這種勝利是可能的這點來出發，因為帝國主義環境內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發展上的不平衡的和躍進的性質，帝國主義內部那種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這個原理是完全正確的，而且不需要什麼評註。牠的目標是在反對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社會民主黨人認為，當其他各國不同時發生勝利的革命而無產階級在一

國內取得政權，那就是空想。

可是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內還有第二個措辭。這個措辭是*：

『可是在一國以內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權，這還不就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社會主義底主要任務——組織社會主義生產——還擺在前面。沒有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能不能解決這個任務，不能在一國內達到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呢？不，是不可能的。爲要推翻資產階級，只要一國底努力就够了，——這一點，有俄國革命底歷史可以證明。爲要取得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爲要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一國底努力，特別是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底努力，却就不够了，——爲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有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第一版）

這第二個措辭底目標，是反對那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們底論調的，是反對託洛茨基派的，託洛茨基派說過，一國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別國還沒有獲得勝利時，決不能『擋住守舊的歐洲』。

*這裏所講的是該書第一版。

因爲：——但只是因爲，——這個措辭在當時（一九二四年四月）是足夠的，牠無疑義地是給了相當的益處。

可是後來，當列寧主義在這方面所受的批評在黨內已被克服了的時候，當在眼前發生了新的問題，發生了關於有可能不用外來幫助而只用我們本國底力量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問題的時候，——第二個措辭已經顯然不夠了，於是也就不對了。

這個措辭底缺點在什麼地方呢？

牠底缺點在於，牠把兩個不同的問題聯結成爲一個問題；這兩個不同的問題就是：一個是關於有可能用一國底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對這個問題應當給以肯定的回答，而另一個則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是不是可以認爲，在其他好些國家沒有勝利的革命時，牠完全可保障自己不受外國干涉，於是也就不致發生舊制度底復辟，——對這個問題應當給以否定的回答。我還不去說，這個措辭可以使使人這樣設想，就是以爲用一國底力量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想法當

然是不對的。

根據這一點，我在我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小冊子內（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改變了，修正了這個措辭，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關於完全保障不發生資產階級制度底復辟，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有可能在一國以內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點是用以下兩個方法達到的，第一，把『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解成爲『完全保障不致恢復舊制度』，這只有經過『幾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第二，是根據列寧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宣佈一個無可辯駁的真理，就是我們有一切必要的條件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請參看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

這種新措辭也就成了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底任務這個著名決議案底基礎，這決議案，因爲估計到資本主義底穩定（一九二五年四

* 這種新措辭，後來已經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底以後各版內代替了舊的措辭。

月)而討論到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並認爲用我們一國底力量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這種新措辭也成了我的關於聯共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工作總結這本小冊子底基礎，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在聯共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閉會後出版的。

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這問題底提法，在這本小冊子內說：

『我們的國家有兩批矛盾。一批是國內的，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矛盾（這裏所講的是關於一國內面社會主義底建成，——斯大林註）。另一批是國外的，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其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這裏所講的是關於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斯大林註）……』『第一批矛盾是完全可用一國底努力克服的，第二批矛盾則需有幾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才能解決，誰要是把這兩批矛盾混淆起來，他就犯着最粗鄙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他就或者是糊塗蟲，或者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請參看關於聯共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工作總結）

關於我們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在這小冊子上說：

『我們能够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與農民一塊，在工人階級底領導之下來建設牠』
『……因爲『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我們有……一切必要的條件來克服國內的一切困難以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爲我們能够而且應當用自己的力量來克服這些困難。』（請參看同書）

關於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問題，那裏說：

『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就是完全保障不致受到外國干涉的企圖，於是也就是不致發生復辟的企圖，因爲多少重大的復辟企圖，只有在外來的認真幫助之下，只有在國際資本底幫助之下，才可以發生。因此各國工人所給我們革命的幫助，尤其是這些工人即使在幾國以內的勝利，就是完全保障第一個勝利國不致受着外國干涉和復辟企圖的必要條件，就是社會主義最後勝利底必要條件。』（請參看同書）

問題大概已經明白了吧。

大家知道，在我的問題與回答這本小冊子（一九二五年六月）內和聯共第十四

次代表大會上的中央政治報告中（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是以同樣的精神解釋這個問題。

事實就是這樣的。

我想，這些事實是大家和每個人所知道的，季諾維埃夫同志也是知道的。

現在，在黨內發生思想鬥爭以後和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一九二五年四月）以後，差不多已有兩年了，如果季諾維埃夫同志現在還認為可以在他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做的結論中把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所著的小冊子內陳舊的，完全不充分的措辭拉出來，來解決這個已經解決了的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的問題，——那末季諾維埃夫同志底這個特殊的風格，只是證明他在這個問題上完全弄糊塗了。在黨已經前進了以後把牠拉轉去，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已由中央全會批准了以後去迴避這個決議案，——這就是絕無希望地陷入了矛盾，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離開列寧底道路，自己承認自己的失敗。

什麼是在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呢？

這就是說，有可能用我們一國底力量來解決工農間的矛盾，這就是說有這樣的可能：由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在其他各國無產者們底同情與幫助之下，但是並沒有其他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預先勝利，而就利用這個政權來在我們國家內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沒有這樣的可能性，社會主義底建設就是沒有前途的建設，就是不相信可以建成而建設社會主義。誰如果不相信社會主義可以建成，誰如果不相信我國底技術落後並不是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阻礙，那末，他就不能進行社會主義底建設。否認這個可能性，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就是離開列寧主義。

所謂沒有其他各國底革命勝利，社會主義在一國以內的完全的最後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沒有至少幾國革命底勝利，要完全保障不致受到外國的干涉，因而

也不致發生資產階級制度底復辟，是不可能的。否認這一個無可辯駁的原理，就是離開國際主義，離開列寧主義。

列寧說：

「我們不僅生存在一國以內，而且是生存在世界各國底系統以內，蘇維埃共和國與各帝國主義國家在長時間內的並排存在，是不可能的。歸根到底或者是這個勝利，或者是那個勝利。而在這個結局還沒有到來的時候，蘇維埃共和國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間必然發生一些極可怕的衝突。這就是說，無產階級這個統治階級，只要牠願意統治和將要統治，牠就還應當用自己的軍事上的組織來證明這一點。」（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二頁）

列寧在另一個地方說：

「我們面前有一個極不穩固的，可是到底是無疑的，不可否認的，相當的平衡。這是否長久——我不知道，而且我想，這是不可以知道的。因此在我們這方面須要極其謹慎。我們的政策第一個訓練，由我們的政府在一年以來的工作中所得出來的第一個教訓，一切

工農所應當領會的教訓，這就是要小心提防，要記着，我們是處在那些公開表示非常仇恨我們的人們，階級和政府底包圍之中。須要記着，我們隨時都可以受到侵襲的危險。」（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一七頁）

大概是明白了吧。

季諾維埃夫同志對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的觀點，是怎樣呢？

請聽呵：

『對於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了解，至少應當是：（一）消滅階級，於是也就是（二）取消一個階級底專政，在這裏所說的就是取消無產階級底專政』……季諾維埃夫同志往下又說道：『爲要更確切地認識一九二五年在我們蘇聯國內問題是怎樣的，就要分清兩件事：（一）社會主義建設底有保證的可能性——這樣的社會主義建設底可能性，當然是在一國範圍內也完全可以設想到的，（二）社會主義底最後建成和鞏固，就是說，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社會底實現。』（請參看季諾維埃夫同志底列寧主義，二九一和二九三頁）

所有這一些說法能夠表明什麼呢？

這就是表明季諾維埃夫同志對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不是了解爲免除外國干涉和免除復辟底保障，而是了解爲社會主義社會建成底可能。季諾維埃夫同志所了解的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是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的建設，這種建設不能夠而且不應該達到社會主義底建成。季諾維埃夫同志底立場是這樣的：得過且過的，沒有前途的建設，明知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却來建設社會主義。

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明知不能建設成功而去建設，——你們看季諾維埃夫同志是荒謬到了什麼地步。

可是要知道這是戲弄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在季諾維埃夫同志在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做的結論中，還有這樣一段話：

「你們看一看，例如雅可福烈夫同志在最近這次庫爾斯克省黨代表會議上講出了什麼話。他問道：「我們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在四面都受資本主義敵人所包圍的條件下面，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據以上所說的話，我們是有理由來說，我們不僅建設着社會主義，而且我們雖然暫時還是孤獨的，暫時還是世界上唯一的

蘇維埃國度，唯一的蘇維埃國家，——我們將建成這個社會主義」（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庫爾斯克真理報第二七九期）。這難道是列寧主義的問題提法嗎？難道這不是民族狹隘主義精神底表現嗎？」*

這樣一來，依季諾維埃夫說起來：承認在一國內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就是站在民族狹隘主義底觀點上，而否認這種可能，就是站在國際主義底觀點上。

可是如果這是對的，——那末一般地說來，是不是值得進行鬥爭以謀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呢？既是這樣，那豈不是應當說這樣的勝利是沒有可能的嗎？

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這就是季諾維埃夫同志論據底內部邏輯所必然引起的結果。

而這種毫無列寧主義氣味的荒謬議論，季諾維埃夫同志却拿來贈給我們，說這是『國際主義』，是『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我敢斷定說，季諾維埃夫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是離開列寧主義而滾到孟塞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上去了。

讓我們來看列寧底言論罷。列寧還在十月革命以前，一九一五年八月，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就說了以下的話：

『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因此，社會主義最初在不多的，甚至在一個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都是可能的。這個國家中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一經剝奪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就與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這樣就吸引別國被壓迫階級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暴動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反對剝削者階級和牠們的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三三三至一三三三頁）

列寧底這句由我加上着重點的話：『一經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已勝利了的國家底無產階級，在爭得了政權以後，能夠而且應當在自己本國裏面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而『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又是什麼

意思呢？這就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用不着證明，列寧底這個明顯的和確定的原理是無須再加評註的。不然，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號召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就會是不可了解的事情了。

從這裏就可以看到，列寧底這個明顯的原理是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底以下的糊塗的，反列寧主義的『原理』——我們可以在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的條件下面來『在一國範圍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有天壤之別的。

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在無產階級未奪取政權以前寫的。可是，也許在一九一七年以後，經過奪取政權經驗以後，他的觀點有改變吧？現在來看列寧在一九二三年寫的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列寧說：

『實際上，一切大的生產資料歸國家管理，國家政權操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個無產階級與千百萬的小農及最小農聯盟，這個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還不是一切必要的條件，來經過合作制，而且只是經過合作制（我們從前曾鄙視合作制為營業性的東西，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

合作制)，——難道這不是爲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條件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但這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够的一切條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換句話說：我們能夠而且應該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爲我們管轄着爲這種建成所必需的而且是足夠的一切條件。

要比這些話說得更清楚些，大概是很困難的罷。

請你們把列寧底這個模範原理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反對雅可福烈夫同志的論調比較一下，你們就會懂得，雅可福烈夫不過是重複了列寧關於一國裏面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的話，而季諾維埃夫既然起來反對這個原理，斥責雅可福烈夫同志，那末，他就是離開了列寧底觀點，而是走上了孟塞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孟塞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就是以爲：在我們的國家裏，因技術落後，所以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

所不知道的只是，要是我們沒有指望把社會主義建設成功，那我們何必要在一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九一七年十月間取得政權呢？

本來是不應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取得政權的，——這就是季諾維埃夫同志論據底內部邏輯所必然得出來的結論。

其次，我現在要肯定說，在關於社會主義勝利的這個最重要問題上，季諾維埃夫同志是反對了我們黨底明確的決定，這些決定會規定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因召集共產國際擴大會議而應負的任務這個著名的決議案裏。

我們來看這個決議案吧。在這個決議案裏，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裏面獲得勝利的問題，曾有以下決定：

『兩個直接相反的社會制度之存在，引起資本主義封鎖，其他的經濟壓迫形式，武裝干涉，復辟底經常威脅。因此保證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即擔保不致復辟*的唯一保障，就是某些國家裏面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主義教訓道，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即是說完全保證資本主義關係不致復辟，這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從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這一點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如果得不到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那些國家底「國家的幫助」（託洛茨基底話），就不能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請參看決議案）

你們可以看到，決議案把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解釋為保證不致發生武裝干涉和不致發生復辟，——這是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在其列寧主義一書中的解釋完全相反的。

你們可以看到，決議案認為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即使得不到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那些國家底「國家的幫助」，也能夠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是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在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在結論中反駁雅可福烈夫同志時的那種斷言完全相反的。

這不是季諾維埃夫同志反對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鬥爭是什麼呢？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當然，黨的決議案有時也不是沒有過錯的。有時黨的決議案也包含着錯誤。一般說來，可以作這樣的假定，就是說假定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也含有一些錯誤。也許季諾維埃夫同志認為該決議案是錯誤的。如果這樣，那末他就應當像布爾塞維克那樣明白地和公開地指出這一點。但不知爲什麼原故，季諾維埃夫同志却沒有這樣做。他寧願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即從後方來攻擊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同時却連一個字也不提起這個決議案，對決議案不作任何公開的批評。季諾維埃夫同志大概以爲這條道路最容易達到目標，而他底目標只有一個，即「改善」決議案和「稍微」修改一下列寧底觀點。用不着證明，季諾維埃夫同志是打算錯了。

季諾維埃夫同志底錯誤從什麼地方來的，這個錯誤底根源在什麼地方呢？

在我看來，這個錯誤底根源，就在於季諾維埃夫同志深信，我們國家底技術上的落後對於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是一種不可克服的障礙；他深信，由於我們國家底技術上的落後，無產階級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埃夫同志和加米業夫

同志有一個時候曾企圖在我們黨底四月代表會議以前的一次中央會議上發表這個論據。可是他們却受到回擊，而不得不退守，表面上服從了與他們相反的觀點，即中央大多數底觀點，可是，雖然季諾維埃夫同志在表面上服從了中央大多數底觀點，然而他始終還是與這個觀點繼續作了鬥爭（請參看季諾維埃夫同志底列寧主義一書和他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結論）。我們黨底莫斯科委員會在其給列寧格拉省黨代表會議的覆信中，關於聯共中央內部這次「事件」，曾說了以下的話。

「不久以前，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兩同志曾在政治局擁護了一個觀點，就是以為要是國際革命不起來拯救我們，我們由於技術上及經濟上的落後，就不能克服內部的困難。我們和中央大多數却共同認為，雖然我們在技術上落後，而且違反着這種技術上的落後，我們還是能够建設社會主義，而且正在建設着並一定會建成這個社會主義。我們認為，這個建設底進行自然要比已在全世界獲得勝利底條件下面緩慢得多，可是我們終究是前進着，而且將來還會繼續前進。我們同樣也以為，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兩同志底觀點，是表示不信任我們工人階級和跟着工人階級走的農民羣衆底內部力量。我們以為，這個觀點

是離開了列寧主義的立場。」（請參看覆信）

這個文件是在我們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開頭幾次會議的時候在刊物上發表的。季諾維埃夫同志自然會經有可能就在代表大會上起來反對這個文件。很可注意的一回事，就是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兩同志竟找不到證據來駁斥我們黨底莫斯科委員會所提出來反對他們的那個嚴重責備。這是不是偶然的呢？我以為不是偶然的。這顯然是因為這個責備正是名符其實，季諾維埃夫同志和加米業夫同志之所以用沉默態度來『回答了』這個責備，這正是因為無法『推辭』牠。

新反對派因人們責備季諾維埃夫同志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底勝利事業而生氣起來。可是，既然關於一國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已經討論整年，既然季諾維埃夫同志底觀點已被中央政治局所駁倒（一九二五年四月），既然我們黨關於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一定的主張，並把這種主張規定在我們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著名決議案上（一九二五年四月），——既然這樣，而季諾維埃夫同志却還是敢於在其列寧主義一書上（一九二五年九月）發表意見來反對我們黨底觀點，以後還在我們黨底第十

四次代表大會上重複這種意見，——那末，季諾維埃夫同志這樣頑強固執堅持自己的錯誤，不是因為季諾維埃夫同志不相信，極端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是因為什麼呢？

季諾維埃夫同志想把自己這種不信任態度解釋爲國際主義。但試問從什麼時候起，在我們這裏竟把那種在列寧主義根本問題上離開列寧主義的行爲解釋爲國際主義呢？

在這裏犯了反對國際主義的和反對國際革命的過錯的，不是我們黨，而是季諾維埃夫同志，這樣說不是正確些麼？因為試問我們的『建設着的社會主義』底國家不是世界革命底根據地是什麼呢？但要是這個國家沒有能力來建成社會主義，那末牠能夠不能夠做世界革命底真正的根據地呢？要是這個國家沒有能力在自己國內達到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達到獲得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那末牠能夠不能夠依舊是對於全世界工人們的一種莫大的中心吸引力，像牠現在實在是這樣的心吸引力這樣呢？我以爲是不能夠的。但從這裏是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不相信社

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鼓吹這種不相信的態度，結果會使我們的國家喪失世界革命根據地底資格，而喪失這種資格，就會削弱世界革命運動呢？社會民主黨人先生們會用什麼東西來恐嚇工人，以便使他們離開我們呢？他們所用的，就是關於『俄國人是幹不出什麼事情來的』這種宣傳。我們現在是用什麼東西來打擊着社會民主黨人，並吸引一批一批工人代表團到蘇聯來參觀，鞏固共產主義在全世界上的陣勢呢？我們所用的，就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功。既然如此，那末誰宣傳不相信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功，誰就是間接幫助社會民主黨人，誰就是削弱國際革命運動底勢力，誰就必然離開國際主義……這難道還不明白麼？

你們可以看到，季諾維埃夫同志底『國際主義』，並不比他在關於一國裏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的那種『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稍為好些。

因此，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把新反對派底觀點估計爲『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曲解列寧主義』，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這種估計，是完全正確的。

七 爲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鬥爭

我以爲，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這乃是新反對派底基本錯誤。我之所以把這個錯誤看作他們的基本錯誤，是因為新反對派底其餘的錯誤都是從這個錯誤當中產生出來的。新反對派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底性質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合作制底作用問題，關於與富農的鬥爭方法問題，關於中農底作用與比重問題都犯了錯誤，這一切錯誤都是從反對派底一個基本錯誤中產生出來的，這個基本錯誤就是：他們不相信有可能用我們本國底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什麼叫做不相信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呢？

這首先就是不相信農民底基本羣衆由於我國發展底某些條件而能夠被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這第二就是不相信我們國家裏的無產階級，既管轄着國民經濟底命脈，就有能

力把基本農民羣衆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

反對派關於我們的發展道路問題的議論，暗中就是以上面這兩個原理作出發點的，——反對派是自覺地還是不自覺地這樣做的，那都是一樣。

可以不可以把蘇聯農民底基本羣衆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呢？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裏，對於這個問題有兩個基本原理：

第一，『決定不可以把蘇聯的農民和西方各國的農民混爲一談。蘇聯的農民是不能不與西方各國的農民不同的，因爲蘇聯的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底教訓，與無產階級一塊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得到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而西方的農民，却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作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得到了土地，並因此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的農民，慣於看重自己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底意義，而且因爲有了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才得到了自由，——這一點不能不是他們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作底非常順利的條件』。

第二，『決不可以把俄國的農業和西方各國的農業混爲一談。西方的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牠所處的環境是農民中發生深刻的分化，這時候，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各國，分裂和解體完全是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俄國，單是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重要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都收歸國有這兩個原因，農業底發展就不會走這條道路。在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別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那種由國家以優待的借款來維持的廣大的合作制底道路。列寧在他的關於合作制的論文中，很正確地指出，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新的道路，就是說，經過合作社來吸引大多數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底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開始在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在農產品生產方面』。『……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對多數的農民將願意走上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棄那條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制底道路，拋棄那條貧困和破產的道路』。

這兩個原理是不是正確呢？

我覺得這兩個原理，對於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我們的整個建設時期是正確的而

且是無可置辯的。

這兩個原理祇是列寧幾個著名提綱底表現，這些提綱就是關於：無產階級與農民實行聯絡，把農民經濟歸併到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底系統以內，無產階級應當與基本農民羣衆一同進展到社會主義去，千百萬農民羣衆底合作化是農村裏面社會主義建設底康莊大道，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發展底條件之下，『在我們看來，單是合作制底發展已經就等於社會主義底發展。』（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事實上，在我們國家裏，農民經濟能夠循着而且應該循着那條道路去發展呢？

農民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農民經濟，如果拿絕大多數的農戶來說，是一種小商品性的經濟。但什麼叫做小商品性的農民經濟呢？這就是一種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個十字路口的經濟。牠可以發展到資本主義方面去，也可以發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牠正在向資本主義方面發展，而在我們這裏，在我們的國家裏，在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下，牠就應該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

爲什麼農民經濟這樣不穩固，這樣不獨立呢？原因在什麼地方呢？

原因就在於農民經濟散漫，無組織，牠們依賴着城市，依賴着工業，依賴着信貸制度，依賴着國內政權底性質，最後，其原因還由於這樣一個大家所知道的原理，即無論在物質方面或文化方面，農村是跟着城市走，而且應當跟着城市走。

農民經濟底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就是經過農民生底最深刻的分化，在一個極端上是巨大的大地產，而在另一極端上則是廣泛的貧困化。這樣的發展道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必不可免的，因為那裏的農村，農民經濟，是依賴着城市，依賴着工業，依賴着城市裏面集中的信貸，依賴着政權底性質的，而在城市居統治地位的則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工業，資本主義的信貸制度，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

在我們的國家裏，城市底面目是完全不同的，工業是由無產階級管轄着，運輸業，信貸制度，國家政權等等都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裏，土地國有化是全國通行的法律，——在這樣一個國家裏，農民經濟是不是一定要走這條發展道路呢？當然是不一定要走的。正是相反。正是因為城市是農民生底領導者，而在我們國家裏統治城市的是把國民經濟底一切命脈都管轄在自己手裏的無產階級，正是因為這樣，農民經

濟在自己的發展中就應該走另外一條道路，走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這條道路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這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農戶在各種合作方面廣泛地合作化起來，把渙散的農戶團結在社會主義工業週圍，在農民當中推行集體制度，起初是在農產品底銷售方面和農民所需要的城市製造品底供給方面，以後就在農業底生產方面。

而且愈是下去，則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環境之下，這條道路愈是成爲必不可免的道路，因爲，銷售事業底合作化，供給事業底合作化，最後，信貸及生產事業底合作化（農業協作社），是提高農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使廣大農民羣衆擺脫貧窮破產的唯一方法。

有人說，在我們這裏，農民就其地位說來並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因此他們沒有能力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說農民就其經濟狀況說來並不是社會主義性的，這當然是對的。可是，並不能根據這一點來否認農民經濟能夠按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去發展，因爲既然已經證明了，農村是隨着城市走的，而統治城市的則是社會主義的工

業。在十月革命的時候，農民就其地位說來也不是社會主義性的，他們當時並不想在國內建立社會主義。他們當時所努力要求的，主要地是消滅地主政權和停止戰爭，奠定和平。然而他們當時還是隨從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推翻資產階級和由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擺脫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道路，是奠定和平的唯一道路，因爲在當時沒有別的道路，而且不能有別的道路，因爲在當時我們的黨得以摸到，得以找到這樣一個標準，在這個標準以內，可以使農民底特別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與國家底一般利益（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並使前者服從後者，這種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的和有利的。因此，農民雖然有其非社會主義性，當時還是隨從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關於吸收農民走上社會主義建設軌道的問題，也應該這樣說。農民就其狀況說來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可是他們應該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發展底道路，因爲除了與無產階級聯絡以外，除了與社會主義的工業聯絡以外，除了使農民經濟經過農民廣泛的合作化而走社會主義發展總軌道以

外，就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其他的道路足以使農民擺脫貧窮破產的境地了。

爲什麼一定是經過農民底廣泛的合作化呢？

因爲廣泛的合作化就是「我們所找到的這樣一個標準，在這個標準以內，可以使私人的利益，私人商業的利益，和由國家對這種利益的審察及監督聯合起來，可以使這種利益受一般利益底支配」（列寧）。這個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和有利的，這個標準可以保證無產階級有可能來把基本農民羣衆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去。正因爲對於農民，經過合作社來銷售自己的商品和經過合作社來爲自己的經濟領導機器，是有利的事情，正因爲這樣，所以農民應當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廣泛的合作化底道路。

而在社會主義工業佔統治地位的條件之下，農民們底廣泛的合作化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小商品性的農民經濟離開舊的，使農民大批破產的資本主義道路，而過渡到新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建設底道路。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爲農民經濟新的發展道路而鬥爭，爲吸收農民基本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鬥爭，是我們黨底當前任務。

因此，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是正確的，決議上說道：

『農村裏面社會主義建設底基本道路就在於：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國家的信貸機關以及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其他經濟命脈底經濟領導日益發展的條件之下，把基本農民羣衆吸收進合作社組織裏去，並保證這種組織循着社會主義的道路而發展，其方法就是利用，克服並排擠牠的資本主義成份。』（請參看大會根據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而通過的決議案）

新反對派底最嚴重的錯誤，就在於牠不相信農民底這條新的發展道路，看不見或者不懂得在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之下，這條道路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牠之所以不懂得這一點，是因為牠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能在我國獲得勝利，不相信我國無產階級有能力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

因爲這個原故，牠就不懂得新經濟政策底兩重性，就誇大新經濟政策底短處，就把新經濟政策解釋成多半是退守的政策。

因爲這個原故，牠就誇大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底作用，而輕視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的各種槓桿底作用（社會主義工業，信貸制度，合作制，無產階級政權等等）。

因爲這個原故，牠就不懂得我們的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性質，就懷疑列寧的合作制計劃底正確性。

因爲這個原故，牠就誇大農村底階級分化現象，在富農面前表示張惶失措，輕視中農底作用，企圖破壞黨底保證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而且一般地在黨底農村政策問題上動搖不定。

因爲這個原故，牠就不懂得黨所進行的偉大工作：吸收千百萬工農羣衆來參加工業與農業底建設，來整頓合作社和蘇維埃，來管理國家，來與官僚主義鬥爭，來爲改善和改造我們的國家機關而鬥爭，——黨底這種工作是表明發展底新階段，如果沒有這種工作，則任何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不可能的。

因爲這個原故，牠就在我們建設底困難面前表示悲觀失望和驚惶失措，懷疑我

們的國家能夠工業化，悲觀地空談什麼黨底蛻化等等。

在他們那裏，在資產者們那裏，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好的：在我們這裏，在無產者們這裏，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壞的；要是西歐的革命不能趕快跑來救急，——我們的事情就要倒台了，——新反對派底一般論調就是這樣，這種論調，在我看來是取消主義的論調，但不知爲着什麼（大概爲着令人發笑）反對派竟把牠冒充爲「國際主義」。

反對派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季諾維埃夫同志說，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這一切說法當然都是不對的。事實上，新經濟政策是黨底這樣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容許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並計算到社會主義成份能夠戰勝資本主義成份。事實上，新經濟政策只在開始時是退守的，但是牠計算到在退守過程中重新擺布力量而舉行進攻。事實上，我們實行進攻已有幾年了，而且進攻得有成效，因爲我們發展着我們的工業，發展着蘇維埃的商業，排擠着私人資本。

但是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這種提綱

底意思是怎樣的呢？這種提綱是以什麼爲出發點的呢？

牠的出發點就是一種不正確的設想，以爲在我們這裏現時所發生的，單是資本主義底恢復，單是資本主義底『復元』。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懷疑我們的工業底社會主義的性質。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在富農面前表示驚惶失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這樣急忙地把那些關於農民分化的不正確的數字拿來作根據。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特別忘掉了一點，就是在我們這裏，中農是農業裏面的中心人物。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輕視中農底比重和懷疑列甯底合作制計劃。只有用這種設想才可『說明』，爲什麼新反對派不相信農村底新的發展道路，即吸收農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事實上，在我們這裏現時所發生的並不是單方面的，資本主義恢復的過程，而是雙方面的，資本主義底發展和社會主義底發展同時進行的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底矛盾的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克服資本主義成份的過程。

這一點，無論對於城市或對於農村都是一樣不容否認的，在城市裏，社會主義底基礎是國家工業；在農村裏，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關鍵是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絡着的廣泛的合作社系統。

單是資本主義底恢復，是沒有可能的，這至少是因爲，在我們這裏，政權是無產階級的，大工業都是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運輸業和信貸業都是由無產階級的國家管轄着。

階級分化不能有過去那樣的範圍，中農仍是農民底基本羣衆，而富農不能再有從前那樣的力量，這至少是因爲，在我們這裏，土地已經國有化，土地已經成爲不可買賣的東西，而我們的商業的，信貸的，賦稅的以及合作事業的政策，目的是在限制富農底剝削傾向，增高最廣大的農民羣衆底幸福和剷除農村中向兩個極端分化的情形。我還不去說，在我們這裏，與富農的鬥爭，現在不僅採用了舊的方法，即組織貧農來反對富農，而且還採用了新的方法，即鞏固無產階級及貧農與中農羣衆的聯盟來反對富農，反對派不懂得採取這第二個方法來與富農鬥爭底意思和意義，

這一件事實就是再次證明反對派是滾到了農村發展底舊時的道路，滾到了農村發展底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富農和貧農是農村中的基本力量，而中農則『被沖散』。

反對派說合作制是國家資本主義底一種，在說這種話的時候，他們引用列寧著的糧食稅這篇文章，因為他們這樣說，所以他們就不相信能夠利用合作制作為農村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關鍵。在這裏，反對派也犯了最嚴重的錯誤。這樣來解釋合作制，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在列寧著作糧食稅這篇文章的時候，是足夠的和可以滿意的，當時我們還沒有已經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當時列寧把國家資本主義設想為我們經濟中可能的基本形式，而把合作制看作與國家資本主義相聯結着的東西。但是這樣的解釋到現在已經是不夠了，已經成為歷史上的舊話了，因為從那個時候起，情形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已經發展起來，國家資本主義並沒有生活到我們當時所希望的那種程度，而現在包括千萬以上會員的合作社系統，却已經開始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絡起來。

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可以解釋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列寧在寫了糧食稅這篇文章以後兩年，在一九二三年，就用另外一種觀點來觀察合作制，認為『在我們的條件之下，合作制往往是與社會主義完全相符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對於這一點的解釋就是：在這兩年之內，社會主義工業已經長大起來，而國家資本主義則沒有發展到應有的程度，因此列寧就不把合作制看作與國家資本主義相聯結的東西，而把牠看作與社會主義工業相聯結的東西了。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可以解釋這件事實呢？

合作制底發展條件已經改變了。對於合作制問題的態度，當時也應當變更。

在列寧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上，有絕妙的一段話說明這問題，這段話就是：

『在國家資本主義下面，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合作企業，第一是私人的企業，第二是集體的企業。在我們現存的制度下面，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合作企業是集體的企業，但是牠們與社會主義企業却沒

有區別*，要是牠們是建立在國家所有的，即工人階級所有的土地上，是依靠於國家所有的，即工人階級所有的生產資料上的話。」（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在這段小小的引證中，解決了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存的制度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第二個問題就是，與『我們的制度』相聯結着的合作企業，是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的』。

我想很難比這些話還說得更清楚了。

請看列寧這本小冊子中的另一段話吧！

『在我們看來，單是合作制度發展已經就等於（只有上面所指出的那些「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底發展，而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都有根本的變更。』（請參看同卷同頁）

很明顯的，我們在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上看到對於合作制的新的估計，而這種新的估計是新反對派所不願承認的，新反對派違背事實，違背淺顯的道理，違背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列寧主義而竭力隱瞞這種新的估計。

與國家資本主義聯結着的合作制，是一回事，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結着的合作制，是另外一回事。

但從這一點上並不能做出一個結論，說在糧食稅這篇文章與關於合作社這本小冊子中間，橫着什麼鴻溝。這種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譬如只要引證糧食稅這篇文章裏的下面這段話，就馬上可以懂得糧食稅這篇文章與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在合作制估計問題上，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繫。請看這一段的話吧：

「從租讓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大生產底一種形式過渡到大生產另底一種形式。從小經濟主底合作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就是說，這樣一種過渡，這種過渡比較複雜，但是牠如果成功，就能包刮更廣大的民衆，就能拔出舊有的與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甚至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底更深遠的和更有生機的根蒂，而後面這種關係，在反抗一切「維新」的意思上講來，是最頑強不屈的。」（請參看列寧

* 注重點我是加的，——斯大林註。

（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三七頁）

從這段引證中可以看出，列寧還在作糧食稅這篇文章的時候，就是說在我們還沒有已經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的時候，就已認為合作制如有成效，就可以把牠變成反對「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亦即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關係的那種強有力的鬥爭工具。我覺得正是這一個思想，後來成了他的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底出發點。

但是從這一切話當中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一切話當中，應當得出的結論就是：新反對派對合作制問題的觀點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形而上學的。新反對派不把合作制看作與其他現象聯結着的，譬如如與國家資本主義聯結着（一九二一年）或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結着的（一九二三年）歷史現象，而把牠看作一種永久的和一成不變的東西，看作「自在的物」。於是反對派關於合作制問題就犯了錯誤，由此反對派就不相信農村可以經過合作制而發展到社會主義去，於是反對派就滾到舊時的道路，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新反對派對於社會主義建設底各個實際問題的立場，大體上就是這樣。

結論只有一個：反對派底路線（要是牠有路線的話），反對派底猶豫和動搖，反對派底不信任和在困難面前的驚惶失措，——結果是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因為，如果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如果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性質引起懷疑，如果富農差不多有無上威權，對合作制很少希望，中農底作用日益降落，農村新的發展道路很成問題，黨差不多是蛻化着，而西歐的革命還沒有這樣逼近，——既然這樣，那末在反對派底軍械局裏究竟還剩下什麼呢？在反對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成份的鬥爭中，他們指望於什麼呢？須知只靠一種「時代哲學」是決不能跑去作戰的。

顯然的，新反對派底軍械局，要是一般地可以稱之為軍械局的話，是不值得羨慕的。這個軍械局不是爲着進行鬥爭。尤其不是爲着勝利。

顯然的，如果黨靠着這樣的軍械局而去挺身作戰，那黨「一下子」就會斷送自己的生命，——那時牠就簡直只好向我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

因此，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是完全正確的，決議上說道：『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鬥爭，是黨底當前任務』，解決這個任務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與不相信我們國家裏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觀點以及與想把『徹底社會主義式的』（列寧底語）企業——我們的企業——看作『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這種企圖作鬥爭；這樣的思潮即使羣衆不能自覺地對待一般的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不能自覺地對待社會主義工業，牠們就只能妨礙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底增長並使私人資本易於去與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作鬥爭；』代表大會因此認爲必需進行廣泛的教育工作來克服這些對列寧主義的曲解。』（請參看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根據聯共中央委員會底工作報告而通過的決議）

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歷史意義，就在於這次大會能夠根本揭露了新反對派底錯誤，排斥了牠那種不相信和叫苦的觀點，明確規定了往前爭取社會主義的道路，給黨指出了勝利的前途，這樣就用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勝利這種不可打破的信仰心來武裝了無產階級。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關於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給楊·斯基同志的回信——

楊·斯基同志！

你的信，我當然已經按時收到了。回信寫遲了一點，請你原諒。

(一) 列寧說，『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四二頁)。政權集中在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手上；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被推翻，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取得政權，——這就是『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的問題』。

黨在革命底某個階段整個時期內都發生效力的基本戰略口號，如果不是完全地和整個地依據列寧底這個基本提綱，就不能稱爲基本口號。基本口號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之下才能算正確的，如果牠們是建立在對階級力量作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個

基礎上，如果牠們規定出階級鬥爭戰線上革命力量佈置底正確計劃，如果牠們便利於引導羣衆走上爭取革命勝利底鬥爭戰線，走上由新階級奪取政權底鬥爭戰線，如果牠們使黨易於從廣大民衆中來組成爲完成這種任務所必需的廣大的和強大的政治軍隊。

在革命底某個階段當中，有發生失敗和退却，失利和個別策略錯誤的可能，可是這却不是表示，基本的戰略口號是不對的。例如，俄國革命第一個階段上的基本口號是『與全體農民一塊，反對沙皇和地主，中立資產階級，爲達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勝利而鬥爭』——這個口號，是完全正確的，雖然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了。

可見，決不可以把黨底基本口號問題拿來與革命在其發展底某個階段上遭受失敗或失利的問題混淆起來。

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黨底基本口號在革命過程中已經達到推翻某些舊階級或某個舊階級底政權，可是從這個口號中產生出來的一些重要的革命要求却沒有實

現，或者牠們的實現延長到整個時期，或者需要一次新的革命來實現牠們，可是這也不是表示，基本口號是不正確的。例如，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地主，可是沒有達到實行沒收地主的土地等等，然而這却不是表示，我們在革命第一個階段上的基本口號是不正確的。或者再舉一個例子：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使政權過渡到了無產階級手上，可是並沒有一下子就達到：第一，一般地，將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第二，特別是使鄉村中的富農孤立，而却把這件事情延長到相當的時期，可是這也不是表示，我們在革命第二個階段上的基本口號——「與貧農一塊，反對城市裏的和鄉村裏的資本主義，中立中農，爲無產階級底政權而鬥爭」——是不正確的。

可見，決不可以把黨底基本口號問題拿來與關於實現從這個口號中所產生出來的那些要求的期限和形式問題，混淆起來。

因此，決不可以根據某個時期內革命運動底個別的成功或失敗來估計我們黨底戰略口號，更不可以根據實現某些由這種口號中產生出來的要求的期限或形式來估

計我們黨底戰略口號。只有根據以下的觀點，才可以估計黨底戰略口號，就是要看這些戰略口號，是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分析階級的力量，是不是在爲着革命勝利，爲着使政權集中在新階級手下底鬥爭戰線上，正確地佈置革命底力量。

楊·斯基同志，你的錯誤就在於，你避開了這個最重要的方法學上的問題或沒有懂得這個問題。

(二) 你在自己的信內寫道：

「有人斷定說，我們只是在十月革命前與全體農民聯盟，這個斷定是不是對的呢？是不對的。『與全體農民聯盟』這個口號，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第一時期都有效力，因爲全體農民當時都樂意於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

這樣一來，從你的這段話裏面，就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在革命底第一個階段內（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即是在推翻沙皇地主政權和建立工農專政的時候，與在革命底第二個階段內（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一九一七年十月），即是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在這兩個階段內，黨底戰略口

號是沒有分別的。可見，你就是否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基本區別。而你犯這個錯誤，顯然地是因為你不願意瞭解這樣的簡單事情，即戰略口號底基本問題就是關於革命某個階段上底政權問題，就是關於那個階級應被推翻和政權應過渡到那個階級手上的問題。顯然用不着證明，你對這個問題的立場是根本不對的。

你說，在十月革命時候和十月革命以後的第一時期，我們都實行了『與全體農民聯盟』這個口號，因為全體農民當時都樂意於澈底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可是誰告訴過你，說十月政變和十月革命只限於澈底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或者把澈底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作為自己的基本任務呢？你這個觀點是從那裏找到的呢？難道可以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安排在資產階級革命底範圍以內嗎？難道取得無產階級專政還沒有超出資產階級革命底範圍以外嗎？怎麼可以斷定說，富農（須知這也是農民）能夠贊助推翻資產階級和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裏呢？怎麼可以否認：關於土地國有，廢除土地私有權，禁止土地買賣等等的法令，雖然牠不能算是

社會主義的法令，可是我們是在與富農的鬥爭中而不是在與富農的聯盟中才能實行的呢？怎麼可以斷定說，富農（也是農民）能夠贊助蘇維埃政權關於剝奪工廠，鐵路，銀行等等的法令或無產階級關於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呢？怎麼可以斷定說，十月革命裏的基本內容不是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事實，不是推翻資產階級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呢？

當然的，十月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如果沒有十月革命，那末，資產階級革命當時就不能進行到底；同樣的，如果十月革命沒有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那末，十月革命本身，當時也就不能鞏固起來，而既然十月革命曾經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牠就曾經應當得到全體農民意底同情。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難道可以根據這點就斷定說，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件事，不是十月革命過程中的附帶現象，而是牠的本質和牠的基本目的嗎？十月革命底主要目的是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剝奪資本家等等，你把這個主要目的拋棄到什麼地方去了呢？要是戰略口號

底主要題目是任何革命底基本問題，即是政權由一個階級手內過渡到另一個階級手
上的問題，那末由此難道還不可以明白看到：決不可以把資產階級革命由無產階級
政權進行到底的問題，拿來與關於推翻資產階級和取得這個無產階級政權的問題混
淆起來，即是說拿來與那成爲革命第二階段中的戰略口號底主要題目底問題混淆起
來。

無產階級專政底最大的成績之一，就在於牠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牠把中
世紀制度底污垢完全肅清了。這對於鄉村會有最重要的並且真正是決斷的意義。沒
有這一點，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兩者的匯合，當時就不能實現，關於這一點，
馬克思還在十九世紀下半年就已經說過了。沒有這一點，無產階級革命本身當時就
不能鞏固。並且這裏須要注意下面這個重要情況。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件
事，並不是一次的動作。實際上，牠延長成了整個時期，不僅包括一九一八年的一
段時間，如你在你的信內所斷定的那樣，而且還包括一九一九年的一段時間（窩瓦
河流域和烏拉爾）和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的一段時間（烏克蘭）。我所指的是

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底進攻，這時在整個農民面前都擺着地主政權復辟底危險，這時農民，正是整個地，不得不團結在蘇維埃政權底周圍，以便來保證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和替自己保全這個革命底果實。這種實際生活過程底複雜性和多樣性，專政底這種直接社會主義任務與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之「奇巧的」錯綜結合，時刻都應當注意到，以便正確地認識你從列寧著作中所引來的這幾段話以及黨實行自己的口號底訣竅。是不是可以說，這種錯綜結合證明革命底第二個階段上黨底口號是不正確的，即是說這個口號是與革命底第一個階段上的口號沒有分別呢？不可以這樣說的。正是相反，這種錯綜結合只是證實革命底第二個階段上黨底口號——與貧農一塊，反對城市裏的和鄉村裏的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底政權而鬥爭等等——，是正確的口號。為什麼呢？因為，為要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就須要首先在十月革命中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並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權，因為只有這樣的政權才能夠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而要在十月革命中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權，就須要在十月革命以前準備和組織一種能夠推翻資產階級，能夠建立無產

階級政權的相當的政治軍隊，並且無需證明，這樣的政治軍隊，我們當時只有在以下的這個口號之下才能夠準備和組織起來，這口號就是：無產階級與貧農聯盟，反對資產階級，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顯然的，沒有從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間所實行的這樣的戰略口號，我們就不會有這樣的政治軍隊，於是也就不會在十月革命中取得勝利，不會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於是也就不會有可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決不可以把將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這件事情拿來與革命底第二階段上以保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爲任務的戰略口號對立。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避免這一切『矛盾』——承認革命底第一階段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略口號與革命底第二階段上（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口號間的基本區別，承認在革命第一階段時期，我們是與全體農民共同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鬥爭；而在革命第二階段時期，我們是與貧農共同去反對資本家底政權，爲無產階級革命而鬥爭。而這一點是必須要承認的，因爲對革命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上的階級

力量的分析，使我們一定要承認這一點。不然便不能解釋這樣的一件事實，就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我們曾是在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底口號之下進行工作，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已經把這個口號改換為無產階級和貧農底社會主義專政口號。楊·斯基同志，你同意吧，就是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間將一個口號改換為另一個口號的這種更改，如果採用你的措辭，是不能解釋的。

列寧在他的兩個策略這本小冊子裏面，早已指出了黨底兩個戰略口號間的這個基本區別。他把黨在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的口號規定如下：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爲要做到這點，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和癱瘓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十六頁）

換一句話說，就是與全體農民一塊，反對專制制度，中立資產階級，實行民主革命。

至於黨在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時的口號，那末他是這樣規定的：

『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爲要做到這點，就要把人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和癡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同上)

換一句話說，就是與貧農以及人民中一般的半無產者階層一塊反對資產階級，中立城市中及鄉村中的小資產階級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這是在一九〇五年寫的。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把當時的政治情況估計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與資產階級的實在政權錯綜結合的局面，他說：

『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由革命底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底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因爲無產階級沒有充分的覺悟性和組織性而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第二階段應當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貧農。』(請參看列寧底四月提綱，——即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十八頁)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底，當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正以全力進行時，列寧在工人與

農民這篇專門的論文內寫道：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能够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當時的（指一九〇五年。——斯大林註）基本規定。而這種規定是對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已經再一次地證明了這一點。祇有領導貧農（我們的黨綱上所謂半無產者）的無產階級能够用民主和平來結束戰爭，治好戰爭所造成的創傷，開始實行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些步驟已成爲絕對必要的和刻不容緩的了——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時的規定。』（請參看

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二二頁）

不應這樣去瞭解這一點，就是以爲我們這裏現在好像是無產階級和貧農底專政。這當然是不對的。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底口號下面走到十月革命的，並且在十月革命的時候，已經在形式上實現過這個口號，其具體表現就是我們會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有過聯盟並與他們分享過領導，雖然在事實上，我們在那時候就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因爲我們布爾塞維克在當時就已經佔大多數。然而，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盲動』以後，在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聯盟破裂以後，無產階級和

貧農專政連在形式上也不存在了，因為這時候領導已完全轉到了一個政黨手上，轉到了我們黨的手上，我們的黨不與而且也不能與其他的政黨分掌國家底領導。這在我們這裏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

最後，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寧回顧革命所經過了的道路的時候，曾寫道：

『是的，當我們還與整個農民一塊的時候，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這一點我們會最明顯不過地認識到，從一九〇五年起，我們已說過幾百次和幾千次了，我們從來沒有打算去跳過歷史過程底這個必然要經過的階段，也沒有打算用法令去把牠取消……。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從四月起，在十月革命以前好久，在我們奪取政權以前好久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公開說過了並向民衆解釋了：現在，革命決不能停止在這個地方，因為國家已前進了，資本主義已前進了，破產現象已達到了空前的範圍，這種破產現象要求（無論誰願意不願意這一點），要求社會主義去的前進步驟。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挽救被戰爭所摧殘了的國家，就不能減輕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痛苦。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底進程證明了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與「全體」農民一塊來反對君主

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然後與貧農一塊，與半無產階級一塊，與一切被剝削者一塊來反對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鄉村富人，富農，投機商人，所以革命就變成爲社會主義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〇至三九一頁）

由此可見，列寧曾經屢次着重指出第一個戰略口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時期內的戰略口號與第二個戰略口號——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的戰略口號之間是有極端深刻的區別。在那裏的口號：與全體農民一塊來反對專制制度，在這裏的口號：與貧農一塊來反對資產階級。

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在十月革命以後延長到很久時期，而既然我們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就使得「全體」農民當時不能不同情於我們，——這個事實，如我在上面說過的，却絲毫都不能搖動這樣一個基本原理：我們是與貧農一塊走到十月革命和與他一塊在十月革命中取得了勝利，我們與貧農一塊兒，在富農（也是農民）底反抗和中農底動搖之下，共同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了無產階

級專政（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會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之一）。

大概明白了吧。

（三）你在信內往下又寫道：

『有人說，「我們是用與貧農聯盟和使中農中立的口號而走到十月革命的」，這個說法是不是正確的呢？是不正確的。依上面所說過的理由及從列寧底著作中摘引過的幾段話看來，就可以明白，這個口號只有在「農民內部的階級分化已經成熟了」（列寧）的時候才能够發生，即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够發生。』

照這段話看來，黨走上使中農中立的道路不是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也不是在十月革命時候，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貧農委員會成立以後。楊·斯基同志，這是完全不對的。正是相反，使中農中立的政策，不是在貧農委員會成立以後，一九一八年以後開始的，而恰是在那時候完結的。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使中農中立的政策，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上被取消了（而不是被施行了）。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八次代表大

會上致開幕辭時說過：

『舊時的社會主義底優秀代表，——當他們還相信革命和在理論上及思想上替革命出力的時候，——曾說過使農民中立，就是說，使中農雖不能變成積極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社會階層，那麼，至少也使他變成不妨礙革命，取中立態度，不站在我們的敵人方面的一個社會階層。這個抽象的，理論上的對任務的提法，對於我們是完全明白的。可是這種提法是不够的。我們已走進了社會主義建設底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須要具體地，詳細地規定出一種爲鄉村工作經驗所考驗過了的基本規則和指示，我們應當遵照着這些規則和指示來對中農採取堅固聯盟底立場。』（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一四頁）

由此可見，你在你的信內所說的話與列寧上面所講的話恰恰相反，而且你這裏把我們黨的真正的實際顛倒過來，把中立中農底開始與牠的終結混淆起來。

當還在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時候，當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的時候，中農還灰心呻吟着，還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動搖着，因此也就不得不使他中立。當中農已開始相信資產階級是『真的』被推翻了，相信蘇維埃政權是在鞏固起來，正在戰勝富

農，紅軍開始在內戰的戰線上取得勝利的時候，他便開始轉到了我們這方面來。正是在這樣的轉變之後，黨的第三個戰略口號才有可能提出來，這口號就是列寧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依靠貧農並與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向前去實行社會主義建設。

你爲什麼忘記了這件事實呢？

其次，根據你的信說來，在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時和在這個革命勝利後的最初時期裏使中農中立的政策，是不正確的，不適用的，因而是不能採納的。楊·斯基同志，這是完全不對的。實際情形恰好相反，正是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底時候和在無產階級政權未鞏固以前，中農最是表示動搖和反抗的。正是在這個時期，必須與貧農聯盟和使中農中立。

你爲要堅持自己的錯誤，所以斷定說，農民問題，不僅對於我們的國家，而且對於其他『與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底經濟有多少相像的』國家，都有大的意義。這後一點當然是對的。可是，請看列寧在他提交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關於土

地問題的提綱內，怎樣說到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期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對待中農的政策。列寧會把貧農，或更確切些說，把「農村中的勞動的及被剝削的羣衆」規定爲一個單獨的集團，——由農村工人，半無產者和極小農和小農組成的一個集團，然後就講到中農問題，把中農看作農村中的特別集團，他說：

『從經濟意義上說來，所謂「中農」就是這樣的一些小農人，這些農人根據所有權或租佃權而佔有的，也是一塊兒面積不大的土地，可是，這塊土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照例還是不僅使他可以勉強維持家庭和產業，而且有可能得到一些兒剩餘，這些剩餘至少在很好的年頭中能够變爲資本，這些農人很時常地僱用別人的勞動力……。革命的無產階級不能爲自己提出這樣一個任務，——至少不能爲最近的將來和爲無產階級專政開始時期提出這樣一個任務，——就是說，把這個階級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牠只應當爲自己提出使這一個階級中立底任務，就是說要迫使牠不積極幫助資產階級去與無產階級作鬥爭。』（請參看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底速記錄，第六一〇至六一一頁）

看了這段話以後，怎麼還可以說，使中農中立的政策，在我們這裏「只是」

『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發生』，即是『只是在鞏固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的政權在實際上得到了決斷的成效以後才能『發生』呢？

可見，關於各無產階級政黨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時候的戰略口號問題，也像使中農中立的問題一樣，都不像你想像的那樣簡單。

（四）由上述一切看來，可見你從列寧底著作內所引的幾段話，絲毫不能拿來與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基本口號對立，因為這幾段話：第一，不是論到黨在十月革命以前的基本口號，而是論到十月革命以後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第二，牠們並不駁倒而是證實這個口號底正確性。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但現在不能再重複說一遍的，就是不能把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所實行的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拿來與黨在革命底第二階段上，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的戰略口號——這個戰略口號底主要題目就是政權問題——對立起來。

（五）你講到莫洛託夫同志底那篇登載在真理報上的著名論文——論我們國內的資產階級革命（請參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的真理報），並且說，原來恰是這

篇論文『推動了』你來向我要求解釋。楊·斯基同志，我不知道你是怎樣讀人家底文章的。我也讀過莫洛託夫同志底文章，而且我認爲這篇論文與我們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關於黨對待農民的口號問題所說的話，絲毫不相矛盾。莫洛託夫同志在他的論文內，並不是論到黨在十月革命時期的基本口號，而是論到，然既黨在十月革命以後曾經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因而牠就會經得到一切農民底同情。可是，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把這一個事實指出來，這並不是否認，而恰是證明這樣一個基本原理底正確性，這個原理就是，我們是與貧農一塊，使中農中立，反對城市裏與鄉村裏的資產階級，達到了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沒有這一點，我們當時就不能夠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布爾塞維克第七八兩期合刊。

關於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

底口號

——給S.波克洛夫斯基同志的回信——

波克洛夫斯基同志！

我以為，你在今年五月二號寫給我的信，使我沒有緣由，也沒有根據來作詳細的回答，來作逐條的回答。其實，你的這封信和楊·斯基同志底信比較起來，並沒有絲毫特別新的東西。要是我現在還是來回答你的這封信，那是因為這封信包含有一些直接恢復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的加米業夫思想的成份。只是爲要揭破這些恢復加米業夫思想的成份起見，我認爲須要簡單回答你的信。

(一) 你在你的信裏面說道：『在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時期內，我們實際上有過與全體農民聯盟的口號』，『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時期內，黨堅持了和擁護了自己對農民的舊口號——與整個的全體農民聯盟。』

第一，這就是說，布爾塞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四月到十月內）是沒有努力於把貧農與豐裕農分開，而是把農民看作了整個的東西。

第二，這就是說，在準備十月革命時期內，布爾塞維克是沒有把『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新口號拿來代替『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這個舊口號，而是停留在舊的立場上，就是說，停留在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寫的兩個策略這本小冊子裏所規定的立場上。

第三，這就是說，布爾塞維克在準備十月革命時期（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十月內），與蘇維埃底動搖態度及妥協行為作鬥爭的政策，與中農在蘇維埃內及在前線上的動搖態度作鬥爭，與那些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動搖態度作鬥爭，與那些在七月事變時帶有特別激烈性質的動搖態度和妥協行為作鬥爭的政策（在七月事變時，在社會革命黨人的及孟塞維克的妥協派領導之下的蘇維埃，協同反革命的將軍們來從事於孤立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與某些農民階層底這種動搖態度和妥協行為的鬥爭，原來是無的放矢的和絕對不需要的。

末了，這就是說，加米業夫在一九一七年四五五月間堅持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舊口號，是對的；而列寧當時認爲這個口號已經陳舊並宣佈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新口號，却是不對的。

只要把這些問題一提出來，就可以明瞭，你的信是從頭到尾都自相矛盾的。

可是，你既然是一個很愛從列寧著作裏摘引個別引證的人，那末，就讓我們來摘引列寧底話罷。

不必花費多大的工夫就可以證明一點，就是列寧會認爲，從革命向前發展的觀點上看來，在二月革命以後俄國土地關係上的新現象，並不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農民之間有了共同利益，而是貧農與豐裕農之間發生了分裂，當時貧農傾向於無產階級，而豐裕農則跟隨着臨時政府走。

請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與加米業夫及加米業夫派爭論時，關於這一點是怎樣說的：

「現在來靠望與農民有共同利益，這對於無產階級的黨是不可容許的。」（請參看列

「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二四五頁）又說：

「我們在現時就已經在一些農民代表大會底決議上看見一種要等到召集立憲會議的時候才來解決土地問題的思想，——這是傾向於立憲民主黨的豐裕農 * 底勝利。」（請參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七六頁）又說：

「也許農民會拿取一切土地和全部政權。我不但不忘記這個可能性，不把自己的眼界只限於今天一天，而且，我在直接了當地規定土地綱領時，還估計到這樣的新現象，就是：僱農及貧農與農民業主間的更深的分裂 *。」（請參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寫的論文——關於策略的信，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三頁）

在列寧看來，這就是二月革命以後在鄉村裏的新環境中所發生的新的重要現象。

這就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的時期內規定黨底政策時的出發點。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拉全市代表會議上，就是根據這個原理出發來說話的，他說：

「只是在這裏，在當地我們才知道，工兵代表蘇維埃已把政權交給臨時政府。工兵代表蘇維埃是無產階級與兵士專政底實現；而在兵士中間，大多數都是農民。這也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底專政。可是這個「專政」已與資產階級妥協了。在這裏就正是須要重新審查「舊的」布爾塞維主義。」*（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七六頁）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寫以下一段話的時候，也是根據這個原理出發的。這一段話就是：

「誰要是在現在還只說「無產階級與農民底革命民主專政」，那末他就是落在實際生活之後，因此他在實際上就是跑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他就應當被送到「布爾塞維克的」，革命以前的古董陳列所（可以叫做「老布爾塞維克」陳列所）裏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一頁）

在這個基礎上也就產生了無產階級和貧農底專政這個口號以代替舊口號——無

產階級和農民底專政。

你也許會說（你在你的信內正是這樣說），這是託洛茨基所主張的，跳過還沒有完成的農民革命的政策，可是這種話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正像加米業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反駁列寧時所說的話一樣。當時列寧完全料到會有這樣反駁，所以他說道：

「託洛茨基主義——「不要沙皇，就要工人政府」。這是不對的。小資產階級是存在着，不能把牠拋出去。可是牠有兩部分。牠的貧苦的，一部分是與工人階級一塊兒走的。」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八二頁）

加米業夫同志底錯誤，而現在也是你波克洛夫斯基同志底錯誤，就在於不會指明，不會着重指出小資產階級底兩部分間的區別，在這裏就是指農民底兩部分間的區別；就在於不會從整個全體農民羣衆中分出那部分貧農，並根據這一點來規定黨在一九一七年由革命底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的環境內的政策；就在於不會由這一點推論出一個新的口號，黨底第二個戰略口號——關於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口號。

現在來在列寧底著作裏來循序考察『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從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間的實際歷史。

一九一七年四月：

『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由革命底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底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因為無產階級沒有充分的覺悟性和組織性而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第二階段應當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貧農。』*（請參看列寧底四月提綱，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十八頁）

一九一七年七月：

『只有革命的工人，如果有貧農*去幫助他們的話，只有他們才能够打破資本家底反抗，引導人民去無償地奪取土地，去得到完全的自由，去消除飢荒，去打倒戰爭，去達到正義的和鞏固的和平。』（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七十七頁）

一九一七年八月：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只有領導貧農*（我們的黨綱上所謂半無產者）的無產階級能够用民主和平來結束戰爭，治好戰爭所造成的創傷，開始實行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些步驟已成爲絕對必要和刻不容緩的了，——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時的規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一頁）

一九一七年九月：

『只有無產者和貧農*底專政，能够打破資本家底反抗，表現出政權底真正偉大的勇氣和決心，保證自己在軍隊裏和農民裏都能得到羣衆們底喜躍的，奮勇的，真正英勇的贊助。』（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四七頁）

一九一七年九月到十月，列寧在布爾塞維克能否保持國家政權這本小冊子內與新生活報爭論的時候寫道：

『或者是*全部政權歸資產階級——你們早已不擁護這個主張，而且連資產階級自己也提都不敢提到這一點了，因爲牠知道，在四月二十號到二十一號，人民只把肩膊一聳就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拋開了這樣的政權，而現在呢，將更堅決幾倍地和更殘酷幾倍地拋開這樣的政權。或者是政權歸小資產階級，就是說歸這個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聯合（聯盟，協定），因為小資產階級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夠單獨地和獨立地來奪取政權，這是一切革命底經驗所證明了的，是經濟科學所證明的，這科學說明，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或者是站在資本方面，或者是站在勞動方面，可是站在中間是站不住的。這種聯合在俄國半年以來已經嘗試了數十種方法而終歸失敗了。末了，或者是，全部政權歸無產者和貧農，來反對資產階級，以便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這是還沒有嘗試過的，而且是你們，新生活報方面的先生們，勸人民不要。去幹的，你們用自己在資產階級面前的恐嚇心理去恐嚇人民。第四種情況是連空想也空想不出來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七五頁）事實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準備史中所有這一切事實和事變，你都『平安地』迴避過去了，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與蘇維埃內的『農民業主』底動搖態度和妥協行為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所作的鬥爭，你都從布爾塞維主義歷史上『平安地』一筆勾消了，你把列寧底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平安地』葬送了，而你同時却又以為這還不是霸權曲解歷史，霸權曲解列寧主義。

波克洛夫斯基同志，從這幾段話裏——列寧底這類話還可以多摘引出來——你應當看到，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並沒有拿整個農民做出發點，而只是拿農民裏的貧苦部份做出發點，他們並不是在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這個舊口號之下，而是在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新口號之下，走向十月革命的。

由此可見，布爾塞維克實行這口號時，是經過了與蘇維埃底動搖態度及妥協行為的鬥爭，與坐在蘇維埃裏的那部份農民底動搖態度及妥協行為的鬥爭，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政黨底動搖態度及妥協行為的鬥爭，這些政黨底名稱就是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

由此可見，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新口號，我們當時就不會收集充分強大的政治軍隊，這支軍隊能夠克服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底妥協主義，能夠使

某一部分農民底動搖中立起來，能夠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並這樣來使資產階級底革命可以進行到底。

由此可見，『我們是和貧農一塊，在富農（也是農民）底反抗和中農底動搖之下走到了十月革命，並且在十月革命中取得了勝利。』（請參看我給楊·斯基同志的回信）

這樣一來，那末就應當說，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以及十月革命底整個準備時期內，對的原來是列寧，而不是加米業夫。而你，波克洛夫斯基同志，現在却來恢復加米業夫思想，那未免是落到不大好的伙伴裏去了罷。

（二）你引證列寧底關於一九一七年十月我們是在整個農民贊助之下取得了政權這句話，來與上面所講過的一切話對立。說我們在整個農民底相當贊助之下取得了政權，這是完全對的。可是你忘記了補充一件『小事情』：就是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整個農民只是在我們曾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這個限度以內，才贊助了我們。這是很重要的『小事情』，牠在這裏決定問題。波克洛夫斯基同

志，『忘記』這樣重要的『小事情』和這樣來抹煞極重要的問題，這對於布爾塞維克是不可容許的。

從你的信內可以看出，你是把列寧底關於整個農民意贊助的話，拿來與黨底『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對立，而這個口號也是由列寧所規定出來的。可是要想拿列寧底這句話來與以上從列寧底著作中所引出來的幾段話對立，要想有根據用你所引的列寧關於整個農民的話來駁倒以上所引的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的口號的幾段話，——要想這樣，就至少要證明兩件事情。

第一，就是證明：把資產階級的革命進行到底是十月革命裏的主要點。列寧認爲，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是十月革命底『副』產物，十月革命『順便』解決了這個任務。就要首先駁倒列寧底這個原理，並證明十月革命裏的主要點不是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不是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裏，而是把資產階級的革命進行到底。波克洛夫斯基同志，請你試一試來證明這一點罷，你如果能夠證明這一點，那末我就決意承認，在一九一七年由四月到十月期間我們黨底口號不是無產階級和貧

農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從你的信內可以看出，你認爲自己不可以擔任這個過於冒險的任務，可是你却企圖『順便』證明，在十月革命底最重要問題之一上面，在和平問題上面，全體農民整個都贊助了我們。這當然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波克洛夫斯基同志，在和平問題上，你落到庸人的觀點上去了。實際上，關於和平的問題當時在我們這裏就是關於政權的問題，因爲在當時，只有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裏，才可以指望擺脫帝國主義戰爭。你大概忘記了列甯底以下的話，就是『只有使政權過渡到別一個階級手裏，才可以結束戰爭』，就是『打倒戰爭——這並不是拋棄槍枝，而是使政權過渡到別一個階級手裏。』（請參看一九一七年四月列甯在彼得格拉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甯全集第二十卷，第一八一和一一七八頁）

總之，兩者必取其一：或者你應當證明，十月革命裏的主要點是使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或者你不能證明這一點，——那時自然要發生這樣的結論，就是在十月革命裏，整個農民只是在我們會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這個限度內，才贊助

了我們。

第二，你應當證明，布爾塞維克不必要在十月革命底整個準備時期裏有系統地實行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不必要根據這個口號來與小資產階級政黨底妥協行為作有系統的鬥爭，不必要同樣根據這個口號來有系統地揭露某些農民階層及其在蘇維埃裏的代表底動搖態度，而就能夠在十月革命時及十月革命以後在他們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限度內得到整個農民底贊助。波克洛夫斯基同志，請你試一試來證明這一點罷。實際上，為什麼我們能夠保證自己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得到整個農民底贊助呢？因為是我們有了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可能性。為什麼我們有了這種可能性呢？因為我們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權和用無產階級的政權代替了牠，只有無產階級政權才能夠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為什麼我們能夠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呢？因為我們在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下面進行了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因為我們根據這個口號來與小資產階級政黨底妥協行為作了有系統的鬥爭，因為根據這個口號來與蘇維埃裏面的中農底動

搖態度作了有系統的鬥爭，因為我們當時只有在這樣的口號之下才能克服中農底動搖態度，打破小資產階級政黨底妥協行為和集合一支能夠爲着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裏而鬥爭的政治軍隊。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些決定了十月革命底命運的先決條件，那末我們無論在十月革命以後，都是不能得到整個農民底贊助的。

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這兩個東西底匯合問題是應該這樣來了解的，波克洛夫斯基同志。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把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整個農民底贊助拿來與在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下面準備了十月革命的事實對立——這就是絲毫·不·懂·得·列·甯·主·義·。

你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你沒有懂得十月革命過程中社會主義的任務與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互相錯綜結合的事實，也沒有懂得實現十月革命底這樣一些個別要求的訣竅，這些要求是從黨底關於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第二個戰略口號裏

得出來的。

讀你的這封信的時候，可以發生這樣的感想，就是說，原來不是我們曾經把農民拿來替無產階級革命效勞，却反而是『整個農民』，富農也包括在內，曾經把布爾塞維克們拿去替自己效勞。如果布爾塞維克們曾經這樣容易地替非無產階級效過勞，那末他們的事業就會很壞了。

波克洛夫斯基同志，一九一七年四月間的加米業夫思想，這就是使你腳跟動搖的東西。

(三)你斷定說，斯大林看不見一九〇五年的環境與臨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時的環境中間的差別。這種斷言，當然是不嚴重的。我沒有這樣說，而且不能夠這樣說。我在我的信內只是說到，黨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來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口號，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已得到了證實。這當然是對的。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列甯在農民和工人這篇論文內就正是這樣描寫情況的：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纔能够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當時的

(指一九〇五年——斯大林註)基本的規定。而這種規定是對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已經再一次地證明了這一點*。(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一一頁)

太過於『講辯證法的』同志呵，你不過是想來吹毛求疵罷了！

(四)其次，你又企圖揭破斯大林，說他有自相矛盾的說話，把他在列寧主義底問題這本小冊子裏所說的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有與中農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的這段話，拿去和他關於在十月革命以前中農底妥協行爲的這個提綱對立。不必花費多大的工夫就可以證明，這樣把兩個不同的現象當作一個東西，是絕對不合科學的。在十月革命以前的，當資產階級專政時的中農，與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經鞏固以後的，當資產階級已被剝奪，合作制已經發展，基本的生產資料已經集中在無產階級手上的時候的中農，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把兩種中農當作一個東西，將他們混爲一談——這就是在觀察現象時，把現象看作是與歷史環境沒有聯繫的東西，並且是喪失一切前途。這與季諾維埃夫用混淆年月時期的方法來引證別人的言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論相同。如果這就叫做『革命的辯證法』，那末應當承認，在玩弄『辯證法的』魔術這方面，波克洛夫斯基同志真是天下無雙的能手了。

(五)其餘的問題，我不談及，因為我認爲，在我與楊·斯基同志的通信內，已經把這些問題說得透澈無遺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一 代表團底問題與斯大林同志底回答

第一個問題：列甯和共產黨在實際上給馬克思主義補充了那一些新原則呢？說列甯會相信『創造性的革命』，而馬克思却比較喜歡等待經濟力量底登峯造極的發展，這種說法是不是正確的呢？

回答：我以爲，列甯並沒有給馬克思主義補充任何『新的原則』，同樣，他也沒有取消馬克思主義底『舊』原則裏的任何一個原則。列甯曾經是，而且始終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最忠實的和最一貫到底的學生，他是完完全全依靠着馬克思主義底原則的。可是，列甯並不僅僅只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底執行者，他並且也是馬克

恩格斯學說底繼續者。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他根據着發展底新條件，根據資本主義新階段底條件，根據着帝國主義底條件而向前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底學說。這就是說，列寧既然是在階級鬥爭底新條件下面繼續發展了馬克思底學說，這樣他就在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內放進了一些爲馬克思恩格斯所沒有給出來的新東西，放進了一些在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時期內所不能給出來的新東西，同時，由列寧所放進馬克思主義底寶庫內去的這些新東西，完完全全是以馬克思恩格斯所規定的原則做基礎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在向前發展馬克思底學說的時候，曾在幾個問題方面給了一些新東西，請看這是那幾個問題罷：

第一，就是關於壟斷資本主義問題，關於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底新階段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資本論裏面，已經分析了資本主義底基礎。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在壟斷資本以前的資本主義統治時代，生在資本主義平穩進化和『和平』推廣於全地球的時代。這個舊階段到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已經終結，這時馬克

恩和恩格斯已經去世了。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會只能猜想資本主義發展底這樣一些新的條件，這些新的條件是因為資本主義底新階段代替了舊階段而發生的，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的，壟斷的階段而發生的。在這時候，資本主義底平穩的進化已被資本主義底躍進式的，必然引起災難恐慌的發展所代替了，在這時候，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和矛盾已表現得特別厲害，因為在這時候，在這種極不平衡的發展底條件下面，為爭取銷售商品的市場和輸出資本的市場的鬥爭，已經使這種為着定期重新分割世界及勢力範圍的定期帝國主義戰爭，成為必不可避免的了。列甯底功勞，也就是說，列甯底新東西，就在於他依靠着資本論底基本原理，對於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作了一個有根基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揭露了牠的爛瘡和那些使牠必定滅亡的條件。在這個分析底基礎上，就產生列甯底一個著名的原理，這個原理就是：在帝國主義底條件下面，社會主義有在個別的，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面取得勝利的可能。

第二，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給出了無產階級專政

底基本思想，認為這種專政是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是用暴力推翻資本政權的方法。列寧在這方面所給新東西就在於：（一）他發明了蘇維埃政權，認為這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爲着這個發明，他利用了巴黎公社底和俄國革命底經驗；（二）他根據關於無產階級底聯盟者問題來解釋了無產階級專政底公式，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導者的無產階級與被領導的非無產階級的（農民及其他等等）被剝削羣衆間的階級聯盟底特殊形式；（三）他特別着重指出了一件事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社會內最高式樣的民主制，是代表多數人（被剝削者）底利益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底形式，——與代表少數人（剝削者）底利益的資本主義民主制相反。

第三，就是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被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着的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建設底形式和方法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看作是多少長久的，充滿着革命戰鬥和國內戰爭的時期，在這時期內，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採取經濟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

的和組織上的那些必要辦法，以便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無階級的社會，無國家的社會，以便代替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列寧是完全全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這些基本原理基礎上的。列寧在這方面所給的新東西就在於：（一）他在理論上證明了：被各帝國主義國家所包圍着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如果牠不會被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底武裝干涉所撲滅，那末在這個國家內就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二）他規定了經濟政策底具體道路（『新經濟政策』），藉着這些具體道路，握有經濟命脈（工業，土地，運輸業，銀行等等）的無產階級就可以把社會化了的工業與農村經濟聯絡起來（『工業與農民經濟底聯絡』），這樣來引導整個國民經濟走到社會主義；（三）他規定了那種經過合作制來漸漸把農民基本羣衆引導到和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軌道上去的具體道路，合作制是由無產階級專政拿來改造小農經濟和以社會主義精神來教化農民基本羣衆的最偉大的工具。

第四，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所有一切人民革命中，在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給出了

無產階級領導權觀念底基本大綱。列甯在這裏所給的新東西就在於，他向前發展了這些大綱，並且把這些大綱擴張成爲無產階級領導權底嚴密系統了，擴張成爲無產階級不僅在推翻沙皇制度及推翻資本主義的事業上，而且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裏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都對城市的和鄉村的勞動羣衆施行領導底嚴密系統了。大家知道，無產階級領導權底觀念，因爲有列甯和列甯黨的緣故，在俄國得到了巧妙的應用。俄國革命，結果弄到了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權，局部地也是因爲這個原故。從前的情形，照例總是這樣，就是在革命底時候，工人在街壘上作了鬥爭，流了血，推翻了舊制度，可是政權却落到了資產階級手裏，而資產階級後來又壓迫和剝削工人。英國和法國底情形曾經是這樣。德國底情形曾經是這樣。我們俄國底情形，就不是這樣了。在我們俄國，工人會不僅是革命底突擊力量。俄國無產階級既然是革命底突擊力量，同時又曾力謀成爲領導者，成爲城市和鄉村的一切被剝削羣衆底政治領導者，把這些羣衆團結在牠自己的周圍，使這些羣衆脫離資產階級，使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孤立起來。俄國無產階級既然是被剝削羣衆底領導者，牠時刻都作了鬥

爭，以便奪取政權和利用這政權來擁護自己的利益以反對資產階級，以反對資本主義。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俄國革命底每一個强有力的發動，無論是在一九〇五年十月也好，無論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也好，都把工人代表蘇維埃提到了舞台上，把這個擔任着鎮壓資產階級的使命的新政權機關底萌芽，提出來對抗資產階級的國會——擔任着鎮壓無產階級的使命的舊政權機關。我們俄國的資產階級曾兩次企圖恢復資產階級的國會和消滅蘇維埃：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在『預備國會』時期，就是說在布爾塞維克奪取政權以前，以及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在『立憲會議』時期，就是說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而每次都遭了失敗。爲什麼呢？因爲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孤立了，千百萬勞動羣衆已認定無產階級是革命底唯一領袖，而蘇維埃已受了羣衆底審查和試驗而被他們看作自己的工人政權，如果把這個政權拿去換成資產階級的國會，這對於無產階級便是一個自殺政策。因此，難怪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在我們俄國並沒有發育過。所以革命在俄國就弄到了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這就是實行列甯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裏的領導權的觀點系統的結果。

第五，就是民族殖民地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分析愛爾蘭，印度，中國，中歐各國，波蘭，匈牙利，這些國家裏面的事變的時候，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定出了基本的，出發點的思想。列甯底著作是以這些思想為基礎的。列甯在這方面的新供獻就在於：（一）他把這些思想集成為關於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的觀點底整個系統；（二）把民族殖民地問題與推翻帝國主義的問題聯繫起來；（三）把民族殖民地問題宣佈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底一個組成部分。

末了，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底政黨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定出了關於政黨的基本大綱，認為無產階級底政黨是無產階級底先進黨隊，沒有牠（沒有政黨）無產階級就不能得到解放，就是說也不能奪取政權，也不能改造資本主義社會。列甯在這方面的新供獻就在於，他繼續向前發展了這些大綱，使其適用於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鬥爭底新條件，因為他指明了，（一）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牠比無產階級組織底其他各種形式（職工會，合作社，國家組織）都要高些，牠的使命就是要歸納和指揮其他這些組織底工作；（二）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經過黨才能實

現，因為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指導力量；（三）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由一個政黨，由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是不與而且也不應與其他的政黨瓜分領導權的，——纔能夠成爲完滿的專政；（四）如果在這個政黨裏沒有鐵的紀律，那末就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底那些關於鎮壓剝削者的和把階級社會改造爲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

列甯在自己的著作裏，具體化了馬克思的學說和向前發展了這個學說而使其適用於帝國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鬥爭底新條件，列甯在這裏所給的新東西，大體上就是這樣。

因此我們就說，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底馬克思主義。

由此可見，既不能把列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分開，更不能把牠與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

在代表團的問題中往下又說：『說列甯會相信「創造性的革命」，而馬克思却比較喜歡等待經濟力量底登峯造極的發展，這種說法，是不是正確的呢？』我認爲，這種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我想，無論那個人民革命，如果牠是真正的人民革

命，都是創造性的革命，因為牠打破舊制度和創造、建立新制度。當然，例如在阿爾巴尼亞有時發生這些部落反對別些部落的『暴動』，在這樣的所謂『革命』裏是不能有絲毫創造性的。可是這樣的兒戲的『暴動』從來沒有被馬克思主義者認作革命。這裏所說的，顯然不是關於這樣的暴動，而是關於發動着被壓迫階級去反對壓迫階級的那種羣衆的人民革命。而這樣的革命却不能不是創造性的。馬克思和列寧所主張的正是這樣的革命，——而且僅只是這樣的革命。而且，很明顯的，這樣的革命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面都能發生的，牠只是在一定的順利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下面才能發生的。

第二個問題：是不是可以說共產黨監督着政府？

回答：這全靠對於監督兩字的瞭解如何而決定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對於監督的瞭解，是有些特別的。我知道，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內，雖然是有着『民主的』國會，而資本主義的政府，都是受最大的銀行所監督的。國會總是叫人相信，說正是他們監督着政府。而實際上，政府閣員底成份都是由最大的銀行團所預先決

定的，政府底行動是由這些銀行團所監督的。誰不知道，無論在那一個資本主義「強國」裏都不能違反最大的財政大王底意志而組織內閣，只要財政大王一實行財政逼迫，內閣總長們就要馬上辭職逃走，這就是銀行對政府的真正的監督，而違反着國會底那種有名無實的監督。如果，你們所問的是關於這樣的監督，那末我們就應當聲明，金錢大王監督政府的事情，在我們這裏是行不通的，而且是絕對沒有可能的。這至少是因爲，在我們這裏銀行早已收歸國有，而金錢大王却早已被趕出蘇聯境外了。

也許代表團所問的，不是關於黨對於政府的監督，而是黨對於政府的領導吧？如果代表團想問到這一點上，那末我就回答道：是的，我們這裏是黨領導政府。而這種領導之所以能夠做到，是因爲我們的黨得到工人和一般勞動者大多數底信任，所以牠就有權柄代表這個大多數來領導政府機關。

蘇聯底工人政黨——共產黨，對於政府的領導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首先就是表現在，共產黨總是努力經過蘇維埃和蘇維埃代表大會而把自己的候

選人，自己的優秀工作人員，就是說忠實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和願意誠心誠意爲無產階級出力的人提出去擔任我國國家工作底基本職務。這一點，黨在極大多數的情況中都能做到，因爲工人和農民都是信任我們的黨的。我們這裏政權機關底領導人是共產黨員，他們——這些領導人——在國內享有莫大的威信，這都不是偶然的。

第二是表現在，黨審查着管理機關底工作，政權機關底工作，同時糾正那些不可避免之錯誤和缺點，幫助牠們去實行政府底決議，努力保證牠們得到羣衆底擁護，而且牠們通過任何一個重要決議，都得到黨底相當的指示。

第三是表現在，當各個政權機關規定自己的工作計劃的時候，無論這個工作是工業和農業方面的也好，是商業和文化建設方面的也好，黨都給以一般的領導的指示，以決定這些機關在計劃有效期內工作底性質和方向。

資產階級底報紙，對於我們的黨這樣『干涉』國事，通常都是表示『驚奇』。可是這種『驚奇』完全是假裝的。大家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產階級的政黨也是一樣『干涉』國事和領導政府的，而且那裏的領導是集中在極少數人底手內，

這些人是與大銀行有各種各樣的聯繫的，因此他們總是拚命在人民面前隱瞞自己的作用。誰不知道：在英國或別的資本主義國家裏，每個資產階級的政黨都有一個由包攬領導權的極少數人組成的秘密內閣呢？你們只要回想起路易喬治關於自由黨底「陰暗」內閣的著名演說就夠了。在這方面，蘇維埃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分別就在於：（一）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產階級的政黨是爲着擁護資產階級底利益和反對無產階級而領導國家的，可是，在蘇聯，共產黨却是爲着擁護無產階級底利益和反對資產階級而領導國家的；（二）資產階級的政黨在人民面前隱瞞自己的領導作用，爲着這個目的，便組織自己的形跡可疑的秘密內閣，而在蘇聯，共產黨却不需要任何的秘密內閣，牠斥責秘密內閣底政策和行爲，並公開向全國聲明，說牠自己擔負着領導國家的責任。

有一位代表問道：黨是根據同樣的理由來領導職工會的吗？

斯大林回答道：在基本上是這樣的。在外表上，黨是不能給職工會以任何訓令的。可是，黨可以給在工會內作工的共產黨員以訓令。大家知道，在職工會內也同

在蘇維埃內，合作社等等內面一樣，是有共產黨黨團的。這些共產黨黨團底責任就在於，要在職工會，蘇維埃，合作社和別的機關內用說服的方法去做到通過與黨底訓令相符合的決議。這一點，牠們在極大多數的情形裏都能夠實現，因為黨在羣衆裏的影響極大，黨在羣衆裏得到很大的信任。無產階級各種各樣組織彼此行動底一致，就是這樣達到的。如果沒有這種情形，那末，在工人階級這些組織底工作中，就會發生各行其是的現象。

第三個問題：既然俄國只有一個政黨是合法的，那末你從那裏知道羣衆是同情共產黨主義呢？

回答：對的，在蘇聯是沒有合法的資產階級政黨的；在蘇聯，只有一個黨，工人黨，共產黨，才是合法存在的。然而，我們有沒有方法和手段來使自己確定相信，大多數工人，大多數勞動羣衆都是同情共產黨員的呢？這裏所講的當然是指工農羣衆，而不是指新資產階級，不是指那些已被無產階級打破的舊的剝削階級底殘餘。是有的，我們是有可能，我們是有方法和手段來知道工農羣衆是否同情共產黨。

員的。就拿我國生活上最重要的事情來說，看看有沒有根據來斷定說，羣衆真正是同情共產黨員的。

首先就拿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期這樣重要的關頭來說，這時共產黨正是以黨底資格，公開號召了工農去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這時牠這個黨是得到了工農兵絕大多數底擁護。那時環境是怎樣的呢？那時與資產階級聯合了的社會革命黨人及社會民主黨人（孟塞維克）掌握着政權。中央及各地方的政權機關，以及一千二百萬軍隊底指揮機關，都操在這些政黨手裏，操在政府手裏。共產黨那時處在半公開的情況中。各國資產階級都預料布爾塞維克黨是一定會失敗的。協約國在當時是完完全全擁護克倫斯基底政府的。可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黨，並沒有中止號召無產階級去推翻這個政府，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結果怎樣呢？絕大多數的勞動羣衆，在後方和前線上都最堅決地擁護了布爾塞維克黨，——而克倫斯基政府就被推翻了，無產階級底政權就建立起來了。雖然那時全世界資產階級都以敵視態度預言布爾塞維克一定會滅亡，可是布爾塞維克終究成了勝利者，試問怎麼能有這樣的事情呢？

這種情形不是證明廣大勞動羣衆同情布爾塞維克黨嗎？我想是的。這就是共產黨在廣大民衆中間的威信和影響所受的第一次審查。

拿往下一個時期，武裝干涉時期，國內戰爭時期來講罷，在這個時期，英國資本家佔領了俄國北部，亞爾漢格爾和謨爾曼區，這時美英日法各國資本家抬出了高爾察克，佔領了西伯利亞，這時法國的和英國的資本家曾設法佔領『南俄』，援助鄧尼金和佛蘭格爾。這是協約國和俄國反革命將軍們所進行的戰爭，爲的是要反對莫斯科的共產黨政府，反對我們十月革命底勝利品。這是共產黨在廣大工農羣衆裏的力量和穩固性受最大的審查的時期。結果怎麼樣呢？誰不知道，國內戰爭結果，是外國侵略軍被趕出俄國境外，而反革命的將軍們被紅軍打得落花流水呢？原來戰爭底命運，歸根到底並不是取決於技術（蘇聯底敵人曾把很多的技術供給了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而是取決於正確的政策，取決於千百萬民衆底同情和擁護。布爾塞維克黨那時竟成了戰勝者，這是不是偶然的事情呢？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這種情形不是證明共產黨在我們這裏是享有廣大勞動羣衆底同情嗎？我想是證明這點

的。這就是蘇聯共產黨底力量和穩固性所受的第二次的審查。

現在來講現今時期，來講戰後時期，這時候，和平建設問題已成爲當前的問題，這時候，經濟破壞階段已爲工業恢復階段所代替了，末了，已爲在新的技術基礎上改造我國全部國民經濟的階段所代替了。我們現在有沒有方法和手段來審查共產黨底力量和穩固性，來決定廣大勞動羣衆對共產黨同情到什麼程度？我想是有的。

首先就拿那大約包含有一千萬無產者的職工會來講，看看我們的職工會領導機關底成份。共產黨員領導着這些機關，這是不是偶然的事情呢？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情。如果以爲蘇聯工人對職工會領導機關底成份漠不關心，那就是愚蠢的想法了。蘇聯工人是在三次革命底浪潮中長大起來和教育出來的。這種工人比任何人都更學會了怎樣去審查自己的領導者，要是這些領導者不能滿足無產階級底利益，那末，工人們便要把他們趕走了。曾經有一個時候，我們黨內最有名望的人就是普列漢諾夫。然而工人已經相信普列漢諾夫是離開了無產階級路線的時候，他們就不惜來斷

然使他孤立。而如果這樣的工人表示信任共產黨員，推舉他們去擔任職工會內重要職務，那末這個事實，就是直接指明，共產黨在蘇聯工人中間的力量和穩固性是極端偉大的。這就是廣大工人羣衆絕對同情共產黨員這件事實底審查。

拿最近的蘇維埃選舉來講罷。在我們蘇聯，除掉那些剝削別人勞動的和被剝奪了選舉權的資產階級份子以外，凡屬成年人，從十八歲起，不分性別和民族，都享有蘇維埃選舉權。這大約有六千萬的選舉人。其中絕大多數當然是農民。這六千萬選舉人中間，大約有百分之五十一，即是三千多萬人，是實行了自己的選舉權。現在請看看我們在中央的和在各地方的蘇維埃領導機關底成份。被選出的領導份子，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這難道可以說是偶然的事情嗎？當然是不可以的。這件事實不是證明共產黨是得到千百萬農民羣衆底信任嗎？我想是的。這就是共產黨力量底穩固性底又一個審查。

拿那個大約包含有兩百萬青年工農的青年團（共產主義青年團）來講吧。青年團內選舉出來的領導份子，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這件事實可以說是偶然的事情

嗎？我想是不可以的。這就是共產黨底力量和威信底又一個審查。

末了，拿我們的那些包含着蘇聯境內所有一切民族的，成千百萬的勞動男女，男工和女工，農夫和農婦的代表會議，會議，代表會等等來講罷。西歐人有時譏笑我們這些會議和代表會議，說俄國人總是喜歡多說話。可是這些會議和代表會議對於我們是有莫大意義的，因為這些會議和代表會議既可以調查羣衆底心理，又可以發露我們的錯誤和定出消滅這些錯誤的方法，因為我們的錯誤並不少，而且我們並不隱瞞自己的錯誤，認為發露錯誤和誠懇改正錯誤，乃是改善國家領導的最好的方法。你們只要看看這些代表會議和會議上的發言者底言論，看看這些由工農出身的這些『平常人物』底切實的和誠實的意見，看看他們的決議，——你們就可以看出，共產黨底影響和威信是偉大到什麼程度，你們就可以看出，世界上無論那一個政黨都會羨慕這種影響和這種威信的。這就是共產黨底穩固性底又一個審查。

這就是我們可以審查共產黨在民衆裏的力量和影響的方法和手段。

我就是從這裏來知道蘇聯的廣大工農羣衆是同情於共產黨的。

第四個問題：如果有一批非黨的人組織了自己的派別組織，在選舉時提出了自己的那些站在擁護蘇維埃政府的立場上的候選人，可是同時又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他們能不能有自己的經費和進行積極的政治運動呢？

回答：我認爲這個問題本身就包含有不可調和的矛盾。決不能有這麼一批人，這批人一方面主張擁護蘇維埃政府，而另一方面又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爲什麼呢？因爲對外貿易壟斷制，是蘇維埃政府『立場』底堅固基礎之一。因爲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一批人決不會主張擁護蘇維埃政府。因爲這樣的一批人只能是深深地仇視整個蘇維埃制度的一批人。

在蘇聯當然是有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份子。這就是耐潑曼，富農，已被打碎的剝削者階級底殘餘等等。可是，這些份子佔人民底極少數的。我想，代表團在發問題時所講的，不是這種份子。如果代表團所講的，是工人和農民中的勞動羣衆，那末，我就應當說，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這種要求只能引起他們的哈哈大笑和敵視態度。

老實說，由工人們看來，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這是什麼一回事呢？由工人們看來，就是放棄國家工業化，放棄新工廠和新製造廠底建造，放棄舊工廠和舊製造廠底擴充。由工人們看來，這就是讓資本主義國家運來的商品充溢蘇聯市場，使我們自己的比較軟弱的工業縮小，使失業人數增加，使工人階級底物質生活變壞，使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削弱。歸根到底，這就是使耐潑曼和一般新資產階級底勢力加強。蘇聯無產階級能不能去實行這種自殺政策呢？當然是不能的。

而由勞動農民羣衆看來，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又是什麼一回事呢？這就是把我們的國家由獨立的國家變爲半殖民地的國家和使農民羣衆貧窮化。這就是恢復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時代所風行一時的『自由貿易』制度，當時，反革命的將軍和『協約軍』底聯合勢力，自由地搶劫和剝削了千百萬農民羣衆。歸根到底，這就是使富農和鄉村裏其他的剝削份子底勢力加強。農民在烏克蘭，在北高加索，在窩瓦區，在西伯利亞，已經嘗夠了這種制度底滋味。有什麼根據可以預定說，農民忽然又想跳進這個圈套呢？農民勞動羣衆是不能主張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這難道還

不明顯嗎？

有一個代表起來說道：代表團提出了關於對外貿易壟斷制問題，關於取消這個壟斷制問題，代表團提出這個問題來，是認爲，如果在蘇聯沒有一個政黨底壟斷制，沒有合法權壟斷制，那末，就會有整批人根據着這一點而組織起來了。

斯大林回答道：這樣，代表團又回頭說到共產黨——在蘇聯唯一合法的政黨——壟斷制問題了。當我講到有什麼方法和手段來審查千百萬工農羣衆對共產黨的同情時，我已簡單回答了這個問題。至於其他的人民階層，富農，耐潑曼，已被打破的舊時剝削階級底殘餘，那末，他們在我們蘇聯，已被剝奪了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的權利以及選舉的權利。無產階級不僅從資產階級方面奪取了工廠，製造廠，銀行，鐵路，土地和礦山。牠還奪去了資產階級具有自己的政治組織的權利，因爲牠是不願意恢復資產階級底政權的。蘇聯無產階級已從資產階級和地主方面奪去了工廠，製造廠，土地和鐵路，銀行和礦山，代表團對於這一點大概是沒有什麼反對意見的（笑聲）。可是我覺得，代表團對於下面一點却有點懷疑，就是：爲什麼無產

階級並沒有限於這一點，却進一步地奪去了資產階級底政治權利。我以為這是不完全合乎邏輯的，或者更正確點說，這是完全不合乎邏輯的。根據什麼理由來要求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取寬宏態度呢？難道西方資產階級在自己掌握政權的時候，對工人階級採取絲毫寬宏態度嗎？難道牠不是把工人階級底真正革命的政黨逼到秘密狀態中去嗎？根據什麼理由來要求蘇聯底無產階級對自己的階級敵人採取寬宏態度呢？我認爲，邏輯是一定要人推論到底的。誰要是認爲可以把政治權利歸還資產階級，他就應當——如果他想合乎邏輯——更進一步地主張把工廠，製造廠，鐵路和銀行也交還資產階級。

有一個代表起來說道：代表團底任務是要弄清楚，工人階級和農民內面與共產黨意見不同的意見是怎樣可以得到合法的表現。如果以爲代表團是注意關於把政治權利交給資產階級的問題，注意關於資產階級底意見怎樣可以得到合法的表現的問題，那就不對了。問題正是關於工人階級和農民內面與共產黨意見不同的意見怎樣可以得到合法的表現。

另外一個代表起來說道：這些不同的意見是不是可以在工人階級底羣衆組織內，在職工會及其他等等內面得到表現。

斯大林回答道：很好。那末，問題不是關於恢復資產階級底政治權利，而是關於在工人階級和農民內面的意見上的鬥爭。現時工人和農民羣衆內面有沒有意見上的鬥爭呢？當然是有的。要想千百萬工人和農民都是一樣的想法，那是不會有的事情。這樣的事情，是實際生活裏所沒有的。第一，工人和農民，無論就他們的經濟地位來講，無論就他們對某些問題的觀點來講，在他們彼此中間，都是有很大的區別的。第二，在工人階級本身內，也有一些觀點上的不同，教育不同，年齡不同，性格不同，基本工人和從鄉下來的工人間的不同等等。所有這些都要引起工人和農民勞動羣衆內面的意見上的鬥爭，這種鬥爭，在會議上，在工會內，在合作社內，在蘇維埃選舉的時候等等都得到合法的表現。

可是，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面的意見上的鬥爭，與以前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意見上的鬥爭，有根本的區別。在以前的時候，工人和勞動農民內面的意見上的

鬥爭，主要地是集中在關於推翻地主，推翻沙皇制度，推翻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制度的問題上。而在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面，意見上的鬥爭却不是關於推翻蘇維埃政權，不是關於打破蘇維埃制度的問題，而是關於改善蘇維埃政權底機關，關於改善這些機關底工作的問題。這裏是有根本的區別。在以前，關於用革命手段打破現存制度的問題而發生的意見上的鬥爭，曾使得在工人階級和農民勞動羣衆裏面可以發生幾個互相競爭的政黨，這是毫不足怪的。這些政黨就是：布爾塞維克黨，孟塞維克黨，社會革命黨。另一方面，在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意見上的鬥爭底目的，並不在於打破現存的蘇維埃制度，而在於改善和鞏固這個制度，所以這種鬥爭決不能成爲使工人和鄉村勞動羣衆裏面有幾個政黨存在底根源，……這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因此，只有一個政黨——共產黨——底合法存在，這個政黨底壟斷，不僅不會引起工人們和勞動農民們底反對，反而被他們看作是一種必需的和恰意的事情。

我們黨是國內唯一合法的政黨（共產黨底壟斷），我們黨底這種地位，並不是

什麼人工造成的，不是故意想出來的。這樣的地位是不能用人工造成的，不能用行政手腕等等造成的。我們黨底壟斷，是從實際生活中生長出來的，是在歷史上形成起來的，是由於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在我們的實際環境裏完全破產和滾下舞台的結果。在以前，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是什麼東西呢？是在無產階級裏面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人。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這些政黨底生存是由什麼東西培養着和維持着的呢？是由於當時有資產階級底存在，末了，是由於有資產階級政權底存在。資產階級一被推翻，這些政黨存在底基礎也就不跟着消滅了，這難道還不明顯嗎？而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後，這些政黨又變成了什麼東西呢？牠們變成了以恢復資本主義和推翻無產階級政權爲目的的政黨。這些政黨曾經不得不失去他們在工人和農民底勞動階層裏的任何基礎和任何影響，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共產黨與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黨爲着影響工人階級而彼此進行的鬥爭，並不是從昨天才開始的。還在一九〇五年以前，當俄國的羣衆的革命運動還只最初表現出來的時候，這種鬥爭就已經開始了。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時期，是

在我們俄國工人階級內面發生劇烈的意見上的鬥爭的時期，是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彼此爲爭奪工人階級內面的影響而進行鬥爭的時期。我們蘇聯的工人階級，在這個時期裏經過了三次革命。工人階級在這幾次革命底火燄裏試驗了和審查了這些政黨，看他們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否中用，牠們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如何。臨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時候，當歷史把過去的整個革命鬥爭做了總結的時候，當歷史在自己的天秤上衡量了工人階級內面互相鬥爭的各政黨底比重的時候，——在這個時候，蘇聯底工人階級，到底作了最後的選擇，選上了共產黨，認爲牠是唯一的無產階級政黨。工人階級選上了共產黨，這件事實怎樣來解釋呢？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例如在列甯格拉蘇維埃內，布爾塞維克還祇佔極少數，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那時在各蘇維埃內還佔絕大多數，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臨到十月革命的時候，整個政權機關和一切壓迫工具都操在那些與資產階級聯合着的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手內，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這是因爲，那時候共產黨主張消滅戰爭，主張立刻實行民主和平，而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

却主張『把戰爭進行到勝利的結局』，主張繼續進行帝國主義的戰爭。這是因為，那時候共產黨主張推倒克倫斯基底政府，主張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主張把工廠和製造廠，銀行和鐵路收歸國有，而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却為擁護克倫斯基底政府而鬥爭和擁護資產階級佔有工廠和製造廠，銀行和鐵路的權利。這是因為，那時候共產黨主張立刻把地主土地沒收來交給農民，而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却總是把這個問題推延到那個被推延到遙遙無期的立憲會議。結果，工人和貧農到底選了共產黨，這究竟有什麼奇怪呢？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很快就墮落到底了，這究竟有什麼奇怪呢？共產黨就是因為這個緣故而爭得了政權的。

往下一個時期，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後的時期，國內戰爭時期，就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完全滅亡的時期，就是布爾塞維克黨完全勝利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自己就便利了共產黨底勝利。孟塞維克底及社會革命黨底那些已被打破的和在十月革命時已經墮落到底的殘餘，已經與富農的反革命暴動聯絡起來，與高爾察克的隊伍及鄧尼金的隊伍聯合起來，已跑去替協約國出力效

勞，這樣就在工農羣衆面前完全把自己揭破了。結果造成了這樣的景象，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維克已由資產階級的革命家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家，幫助了協約國來撲滅新的蘇維埃的俄羅斯，而布爾塞維克黨却把所有的生動的和革命的力量統一到自己的週圍，發動了一批一批新的工農隊伍去作擁護社會主義祖國的鬥爭，去作反對協約國的鬥爭。共產黨人在這個時期內的勝利，應當使，並且實在已經使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維克受到完全的失敗，這完全是自然的事情。既是這樣，那末共產黨成了工人階級底和貧農底唯一政黨，這究竟有什麼奇怪呢？

在我們這裏，共產黨，這個在國內唯一合法的政黨底壟斷制就是這樣形成的。

你們所說的，是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面的工農中間的意見上的鬥爭。我已經說過，意見上的鬥爭是有的而且將來也是有的，不是這樣，就不能前進。可是，在現今的條件下面，工人裏面的意見上的鬥爭並不是關於推翻蘇維埃制度的這個原則問題，而是關於改善蘇維埃，關於糾正蘇維埃機關底錯誤，於是也就是關於

鞏固蘇維埃政權的這些實際問題。這樣的意見上的鬥爭，當然只能鞏固和改善共產黨。這樣的意見上的鬥爭，當然只能鞏固共產黨底壟斷制。這樣的意見上的鬥爭，當然不能成爲使在工人階級及勞動農民內部成立別的政黨的一種滋養料。

第五個問題：你能不能把你和託洛茨基間的基本的意見分歧簡單告訴我們？

回答：我首先就應當說，與託洛茨基的意見分歧並不是個人的意見分歧。如果意見分歧是帶着個人的性質，黨就會連一點鐘的工夫也不花費在這件事情上面了，因爲黨是不愛什麼個別人物來出風頭的。問題大概是關於黨內的意見分歧。我是這樣瞭解這個問題的。是的，這種意見分歧在黨內是存在的。關於這些意見分歧底性質，不久以前李可夫同志在莫斯科做報告的時候和布哈林同志在列甯格拉做報告的時候都已經說得很詳細。這些報告已經公佈出來了。我對於這些報告裏的關於意見分歧問題所說過的話，並沒有什麼要補充的東西。要是你們沒有這些文件，我可以給你們找到這些文件（代表團告訴說，他們有這些文件）。

有一個代表起來說道：在我們回國後，人家會來向我們問到這些意見分歧，可

是我們並不是所有的文件都有。例如，我們並沒有「八十三人」底政綱。

斯大林說道：我並沒有在這個政綱上簽名。我沒有權柄來支配別人的文件。

（代表們笑起來）。

第六個問題：在資本主義各國生產發展底基本推動力，是根據於榨取利潤的希望而來的。這種推動力在蘇聯當然是相對缺乏的。代替牠的是什麼東西，而且這種代替，依你的意見，有多少效果？牠能不能是經常的？

回答：資本主義經濟底基本推動力就是榨取利潤，這是對的。說榨取利潤不是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目的，也不是牠的推動力，這也是對的。既是這樣，那末，我們工業底推動力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首先就是這樣的情況，就是在我們這裏，工廠和製造廠是屬於全體人民，而不是屬於資本家的，管理工廠和製造廠的不是資本家代理人而是工人階級代表。覺悟到工人不是爲着資本家工作而是爲着自己的國家工作，爲着自己本階級工作，——這種覺悟心就是我國工業發展和改善底極偉大的推動力。應當指出，在我們這

裏工廠和製造廠底經理，絕大多數都是由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在商得職工會底同意以後，指派的工人擔任的，並且沒有一個經理能夠違反工人們或相當工會底意志而保留自己的職位。其次應當指出，就是在每個工廠或製造廠內都有自己的工廠委員會，這委員會是由工人選舉的，是監督本工廠管理處底工作的。最後，應當指出，在每個企業內都舉行生產會議，本企業裏的全體工人都參加這種會議，工人在這種會議上審查工廠經理底全部工作，討論工廠管理處底工作計劃，指出錯誤和缺點，並有可能經過職工會，經過黨，經過蘇維埃政權機關去糾正這些缺點。不難明白的，所有這些情形是根本改變了工人底地位以及企業裏的規則。要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面，工人把工廠看作牢獄，那末在蘇維埃制度下面，工人却已經不把工廠看作牢獄，而把他看作自己的親近的和切身的事業了，對於這種事業底發展和改善，他是非常願意的。顯然用不着證明，工人對企業的這種新的態度，工人底這種親近企業的感覺，就是我們的全部工業底最大的推動力。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由工人出身的生產技術發明家和工業組織者底人數，就一天一天增長着。

第二就是這樣的情況，就是我們這裏的工業收入不是用去使個人發財致富，而是去繼續擴大工業，改良工人階級底物質的和文化的狀況，用去減低工農所都需要的工業品底價格，即是說又是用去改善勞動羣衆底物質的狀況。資本家不會把自己的收入用去提高工人階級底幸福。他是爲利潤而生活的。不然他就不是資本家了。他榨取利潤，爲的是要積成剩餘資本而輸出於比較不發達的，缺少資本的國家，以便榨取新的更大的利潤。資本就是這樣從美國流到中國，流到南洋羣島，流到南美洲，流到歐洲，從法國流到法屬殖民地，從英國流到英屬殖民地的。我們這裏的情形就不同了，因爲我們不進行並且不承認殖民政策。我們這裏的工業收入是留在國內，用去繼續擴張工業，用去改善工人底狀況，用去減低工業商品價格來提高國內市場底銷售能力——農民市場底銷售能力也在內。在我們這裏，百分之十的工業利潤是用去改善工人階級底生活的。在我們這裏，由國家開支的工人階級保險費等於工人所領的貨幣工資底百分之十三（每年八萬萬多盧布）。有一部份的收入（我現在不能確定說有多少）是用去供給文化上的需要，工廠藝徒學校及工人休假日的。

很大部份的收入（我現在也是不能確定說有多少）是用去每年增高工人底貨幣工資的。其餘部分的工業收入是用去繼續擴張工業，用去修理舊工廠，用去建立新工廠，末了，用去減低工業商品價格的。這些情形對於我們的全部工業的偉大意義就在於：（一）這些情形使農業易於和工業接近，使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形勢易於消滅；（二）這些情形促進國內市場，城市與鄉村的市場銷售能力底增長，這樣就替工業底繼續擴展造成不斷增長的基礎。

末了，就是這樣的情況，就是工業國有化的事實，使整個工業經濟底有計劃的經營易於進行。

我們工業底這些刺激和推動力會不會是經常的因素呢？牠們能不能成爲經常有效的因素呢？是的，牠們一定會是經常有效的刺激和推動力。我們的工業將來越是發展，這些因素底力量和意義便會越增加增長。

第七個問題：在那種程度裏，蘇聯可以和別國底資本主義工業合作？對於這種合作是否有一定的界限，或者這只是一種嘗試，以便弄清楚那一種合作在那一部份

裏是可能的，在那一部分裏是不可能的。

回答：這裏所講的，大概是關於與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方面，商業方面，也許還在外交方面的暫時的協定，我認爲，兩個彼此對立的制度——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底存在，並不使這種協定絕對沒有可能。我認爲，這樣的協定在和平發展底環境內是可能的和適當的。輸出和輸入就是這種協定底最適當的基礎。我們需要機器設備品，原料（例如棉花），半製品（金屬的以及其他的），而資本家却需要銷售這些貨物。這就是協定底基礎。資本家需要石油，木材，糧食，而我們却需要銷售這些貨物。這就是協定底又一個基礎。我們需要信貸借款，資本家需要在這種借款上得到好利息。這就是協定底又一個基礎，而且這是信貸方面的協定底基礎；同時，大家知道，蘇維埃的機關是最守信用的付債人。

關於外交方面也可以這樣說。我們進行着主張和平的政策並決意與各資產階級國家簽訂互不侵犯的公約。我們進行着主張和平的政策並決意簽訂關於裁軍，一直到關於完全取消常備軍的協定，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在熱奴亞會議上就已經向全世界

界宣言了。這就是外交方面協定底基礎。

這些協定底界限呢？界限是由那彼此競賽着的與鬥爭着的兩個制度間的對立形勢所決定的。在這兩個制度所容許的範圍內，但只是在這種範圍內，協定才是完全可能的。與德國，與意大利，與日本及其他等國協定底經驗，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這些協定是否只是一種試驗，還是牠們能具有多少長久的性質呢？這不僅是取決於我們，這還要取決於我們的對方。這是取決於一般環境的。戰爭能夠把所有的和各種的協定推翻。末了，這是取決於協約底條件的。帶束縛性的條件我們是不能接受的。我們與加里曼簽訂了關於讓他開採格魯西亞錳礦的協定。協定期限是二十年。可見期限是不很短促的。我們還與連拿·哥爾德菲爾特公司簽訂了關於讓他開採西伯利亞金礦的協定。協定期限是三十年，——期限更長。末了，還與日本簽訂關於開採庫頁島底石油及煤礦的協定。

我們希望這些協定帶有多少穩固的性質。可是，這當然不僅取決於我們，而且還取決於我們的對方。

第八個問題：俄國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與資本主義國家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有什麼基本分別？

回答：你們所說的，大概是關於蘇聯境內那些從前被沙皇制度及俄國剝削階級所壓迫的和從前沒有自己的國家組織的民族。基本的分別就在於，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存在着民族壓迫和民族束縛，而在我們這裏，在蘇聯，這兩種東西，都根本消滅了。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除了第一等民族，特權民族，『有國家的』民族以外，同時還存在着第二等民族，『無國家的』民族，權利不全的民族，被剝奪了這種或那種權利的，首先是被剝奪了國家權利的民族。在我們蘇聯却相反，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壓迫底這一切原素，都被消滅了。我們這裏一切民族都是平權的和有主權的，因為在從前佔統治地位的大俄羅斯民族底民族特權和國家特權已被消滅了。這裏所講的，當然不是關於民族平等的宣言。關於民族平等的宣言，無論那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和社會民主黨都發出不少。要是宣言不見於實行，那宣言有什麼價值呢？這裏所講的是消滅那些做民族壓迫底代表，創造者及實行者的階級。在以前的俄國，地

主和資本家就是這樣的階級，我們推倒了這些階級，因而也就消滅了民族壓迫底可能性。正因為我們推倒了這些階級，我們這裏才有了真正民族平等的可能。在我們這裏，這就叫做主張民族自決直到分立為止的思想底實現。正因為我們實現了民族自決，所以我們才得以消除了蘇聯境內各民族勞動羣衆間彼此互不相信的心理，並把各民族根據自願性的原則合併爲一個聯盟的國家。現時存在着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就是我們的民族政策底結果和蘇聯各民族自願聯合爲一個聯盟國家的表現。顯然用不着證明的，就是這樣的民族政策，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不可能的，因爲那裏還是由資本家們當政，而資本家就是民族壓迫政策底創造人和實行者。不能不指出這樣一件事實做例子，就是在蘇聯底最高機關內，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裏做主腦的，不一定是由俄國人充當的主席，而是六個主席，這是按照加入蘇聯的六個聯邦共和國分配的，在這六個人中間，一個是俄羅斯人（加里寧），另一個是烏克蘭人（彼特羅夫斯基），第三個是白俄羅斯人（齊爾越可夫），第四個是阿塞爾拜疆人（莫薩別可夫），第五個是土耳其門人（愛達可夫），第六個是烏茲別

克人（何扎也夫）。這一個事實就是我們的民族政策底明顯表現之一。不消說，無論那一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無論牠是怎樣最民主的，都是不會去作這樣的步驟的。可是，由我們看來，這一個步驟却是由我們整個民族平等政策裏產生出來的一件當然的事實。

第九個問題：美國工人首領用以下的兩個理由來辯護他們自己與共產黨人間的鬥爭：第一個理由就是說，共產黨人在工會內進行着派別組織的鬥爭和攻擊着工會裏的那些不急進的服務人員，這樣，共產黨人就破壞工人運動。第二個理由就是說：美國共產黨人遵照着由莫斯科發出的命令做事情，所以他們不能是優秀的工會工作者，因為他們對國外組織的忠順態度超過對自己的工會的忠順態度。怎樣來消除這種困難，以便使美國共產黨人可以與美國工人運動底其他組織進行共同的工作呢？

回答：我以爲，美國工人領袖們企圖這樣來辯護自己反對共產黨人的鬥爭，這種企圖是經不住任何的批評的。誰都還沒有證明，而且也不能證明，說共產黨是

破壞工人運動的。可是有一點却應當認爲是完全證明了的，這就是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美國也在內，都是工人運動底最忠實和最勇敢的戰士。在工人罷工和遊行示威時，共產黨人站在工人階級底前列，首先當受資本家底打擊，而改良派的工人領袖們在這時候却躲在資本家底後院子裏，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共產黨員怎麼能夠不批評改良派工人領袖們底這種畏怯性和反動性呢？這種批評只能加強和鞏固工人運動，這難道不明顯嗎？固然，這樣的批評是要破壞反動的工人領袖們底威信的。可是，這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呢？反動的工人領袖們儘可以提出反駁的批評來，但不應把共產黨人趕出於工會以外。我以爲，美國工人運動，如果牠想活着並向前發展，牠就不能不經過工會以內的意見上的與派別間的鬥爭。我以爲，工會以內的意見上的與派別間的鬥爭，對反動首領們的批評等等，將會日益發展起來，不管改良派工人領袖們是怎樣反抗這一點。而美國工人階級却絕對需要這樣的意見上的鬥爭和這樣的批評，以便使牠能夠在各種不同的派別裏選擇一個，和終於把自己變成美國社會裏的有獨立的和有組織的力量。美國改良派首領們埋怨共產黨人，這只是證

明，他們不相信自己有理，不相信自己的地位底穩固。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們害怕批評如同害怕瘟疫一樣。美國工人首領們比美國很多資產者都更是堅決反對初步的民主制，這到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

說美國共產黨人『遵照着由莫斯科發出來的命令』做事情，這是完全不對的。你們在世界上一定找不到這樣的共產黨人，這種共產黨人會同意遵照外來的『命令』做事情，而違反自己的信念，違反自己的意志，不顧環境底指示。如果在什麼地方有這樣的共產黨人，那末他們是一錢不值的。共產黨人，是最勇敢的和最奮不顧身的人，他們向強有力的敵人進行鬥爭。共產黨人底價值，局部地也就在於他們善於堅持自己的信念，因此，說美國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信念而只會遵照外來的『命令』做事情，這真是很奇怪的說法。工人首領們底話內只有一點是對的，這就是，美國共產黨人是加入共產黨人底國際組織和時常與這個組織底中心機關商量各種問題。可是這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呢？難道美國工人首領們反對組織工人的國際中心機關嗎？固然，他們是沒有加入阿姆斯特丹國際。可是他們之所以不加入到那裏去，

不是因為他們反對工人的國際中心機關，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阿姆斯特丹國際是太左的組織（代表們笑起來）。爲什麼資本家可以在國際範圍內組織起來，而工人階級或工人階級底一部分，却不應當有自己的國際組織呢？格林和他的美國勞動同盟會裏的朋友們，謾罵着美國共產黨人，卑鄙下賤地重複着資本家關於所謂『由莫斯科發出來的命令』的奇談，這難道不明顯嗎？有些人以爲，共產國際底委員們在莫斯科專門坐着寫命令來送給世界各國。而既然加入共產國際的，共有六十多國的共產黨，那末，共產國際底委員們原來是這樣的一些人，這些人既不睡覺，也不吃飯，而只是專門坐在那裏不分日夜地起草命令以供給這六十多個國家（代表們笑起來）。美國工人首領們公然企圖用這種可笑的奇談來掩飾自己的害怕共產黨人的心理，來抹煞共產黨人是美國工人階級底勇敢的和最忠實的工作人員的這件事實！

代表團問到擺脫這種狀況的出路。我想，出路只有一條：這就是容許美國工會以內的意見上的與派別間的鬥爭，拋棄把共產黨人逐出工會以外的反動政策，以便使美國工人階級有在這些派別中間自由選擇一派的可能，因爲在美國還沒有發生過

自己的十月革命，美國的工人還沒有在工會裏的各種不同的派別中間最後選擇一派的可能。

第十個問題：現在是不是從這裏匯錢到美國去援助美國共產黨或共產黨報紙工人日報呢？如果不是，那末美國共產黨人向共產國際繳納多少金錢來作為每年的黨費呢？

回答：如果這裏所講的是關於美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間的相互關係，那末，我就應當說，美國共產黨既是共產國際底一部分，那末當然是向共產國際繳納黨費的，同樣，共產國際既然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底中心，那末在必要時，當然又給美國共產黨以可能的協助的。我以為，這裏並沒有絲毫奇怪的和例外的事情。如果這裏所講的是關於美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間的相互關係，那麼，我就應當聲明，我一次也沒有看見美國共產黨底代表來向蘇聯共產黨請求援助的事情。你們也許認為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可是這却是事實，這件事實證明美國共產黨人是太清高了。可是，如果美國共產黨來向蘇聯共產黨要求幫助，那又會怎樣呢？我以為，蘇聯共產

黨一定會給美國共產黨以可能的幫助。實在是，如果共產黨，而且是掌握着政權的共產黨，竟拒絕給別國的處在資本主義鐵蹄下的共產黨以可能的幫助，那麼牠還值得什麼呢？我敢說，這樣的共產黨是一錢不值的。假如說，美國工人階級推翻了本國的資產階級，爭得了政權；又假如說，別一國的工人階級跑來向在反資本主義的偉大門爭中取得了勝利的美國工人階級要求可能的物質上的幫助，——那時候，美國工人階級能不能拒絕這種幫助呢？我以為，如果牠不馬上斷然給以幫助，牠就會完全使自己丟臉了。

第十一個問題：我們知道，有些好的共產黨員並不同意共產黨底這樣一個要求，就是要所有的新加入的共產黨員都做無神論者，因為在現時，反動的僧侶們已被壓倒了。如果將來宗教是擁護整個科學而不對抗共產主義，那末共產黨將來能不能對宗教採取中立態度呢？如果宗教的信仰並不與對黨的忠順態度相抵觸，那末，你將來能不能允許共產黨員抱着宗教的信仰呢？

回答：在這個問題上有幾點不適當的地方。第一，像代表團在這裏所說的這樣

的『好的共產黨員』，我是不知道的。恐怕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共產黨員罷。第二，我應當聲明，在形式上講來，在我們這裏徵收黨員入黨的條件裏，是沒有要求候補黨員一定要做無神論者這種條件的。我們的徵收黨員的條件就是，承認黨綱和黨章，絕對服從黨底和黨機關底決議，繳納黨費，加入黨底某一個組織。

有一個代表起來說道：我常常讀到這樣的消息，就是有些黨員因爲信仰上帝而被開除黨籍。

斯大林說道：我只能重複上面所講的關於徵收黨員入黨的條件，別的條件在我們這裏是沒有的。

這是不是說，黨對於宗教取中立態度呢？決不是的。我們進行着反對宗教成見的宣傳，而且將來也要進行這種宣傳。國家立法規定，每個公民都有權信奉任何宗教。這乃是各人底信仰事情。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已經實行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可是，我們雖是實行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宣佈了信教自由，可是，我們却規定

每個公民都有權柄用說服方法，用宣傳和鼓動方法去反對各種宗教，反對任何宗教。黨對於宗教不能取中立態度，牠進行反宗教的宣傳以反對一切和任何宗教的成見，因為牠擁護科學，而宗教成見是反對科學的，因為無論那一種宗教都是與科學相反的。不久以前在美國懲辦了達爾文主義者，這種事情在我們這裏是不能有的，因為黨實行盡力擁護科學的政策。黨對宗教成見不能取中立態度，牠將進行宣傳以反對這些成見，因為這種宣傳是這樣一種可靠的手段，牠可以打破反動的僧侶界底影響，而反動的僧侶界是贊助剝削階級和勸誘人們去服從這些階級的。黨對宗教成見底代表，對於那毒害勞動羣衆底意識的反動僧侶界是不能取中立態度的。我們不是已經壓倒了反動的僧侶界呢？是已經壓倒了。只是可惜牠還沒有完全被消滅。反宗教的宣傳就是把反動僧侶界徹底消滅的手段。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在黨員中間，有人有時候妨礙儘量擴展反宗教的宣傳。如果把這樣的黨員開除，這是很好的，因為在我們黨內，不能容留這樣的『共產黨員』。

第十二個問題：你能不能給我們簡單說明共產主義所企圖創造的那個將來的社

會底情形呢？

回答：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一般的說明，在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底著作內已經有過。要是對於共產主義社會作簡單的解剖，那末這將是這樣的社會：（一）那裏不會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而只會有一切所有權，集體所有權；（二）那裏不會有階級和國家政權，而只會有一切工業的和農業的勞動者，這些勞動者共同聯合成爲勞動者自由聯合會，共同管理經濟；（三）那裏按計劃組織起來的國民經濟，無論在工業方面或農業方面將都是以高度技術爲基礎的；（四）那裏不會有城市與鄉村間，工業與農業間的對立形勢；（五）那裏生產品底分配將按照舊時的法國共產主義者底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六）那裏科學與藝術將得到充分順利的條件，以至於可以達到全盛的繁榮；（七）那裏每個人因爲不必去爲餬口而操心，不必去奉承『世界上的強者』，所以就會成爲真正自由的人。以及其他等等。顯然的，我們離這樣的社會還遠哩。

至於爲共產主義社會底完全勝利所必要的國際條件，那麼牠們是會隨着各資本

主義國家裏的革命危機及工人階級革命爆發底增長而形成和增長起來。決不能這樣的設想，以爲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底工人階級將進到社會主義，尤其是進到共產主義，而別些國家底資本家却冷淡地看待這一點，袖手旁觀。更不能這樣設想，以爲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階級會同意只做一個旁觀者來旁觀着這一個或那一個國家裏的社會主義勝利的發展。實際上，資本家們將採取一切爲他們所能做到的辦法來撲滅這樣的國家。實際上，在這個或那個國家裏，每一個走向社會主義，尤其是走向共產主義的嚴重步驟，都必然會使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階級不可阻遏地發動起來，以便在這些國家裏爭取專政和社會主義。這樣一來，在國際革命向前發展底過程中將形成兩個世界中心：一個是社會主義的中心，吸引那些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國家，一個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吸引那些傾向於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兩個中心爲佔有世界經濟的鬥爭，將在全世界上解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命運。因爲世界資本主義最後的失敗，就是社會主義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勝利。

一 斯大林同志底問題和代表們底回答

斯大林說道：如果代表們還不很疲倦，就請允許我也來問你們幾個問題。（代表團表示同意）

第一個問題：在美國工人中間，組織在職工會裏的工人底百分數，是很小的，這是因為什麼緣故呢？在美國，大概約有一千七百萬工業工人。（代表們起來說道：在美國有一千八百萬到一千九百萬工業工人。）有組織的工人大概約有三百萬。（代表們起來說道：在美國勞動同盟會內大約有三百萬有組織的工人，此外，其他的職工會內有五十萬有組織的工人，這樣，總共便有三百五十萬有組織的工人。）我個人認為，這個組織在職工會內的工人百分數，是很小的。在我們蘇聯這裏，全體無產者底百分之九十都組織在職工會內。我想問問你們代表團，你們代表團是不是認為，在美國組織在工會裏的工人數目比較少，這是一件好事實呢？你們代表團是不是認為，這個事實是證明美國無產階級底軟弱，證明牠在經濟方面與資

本·家·作·鬥·爭·的·鬥·爭·武·器·底·軟·弱·？

布·洛·菲·回·答·道·：職工會底會員人數少，這並不是因為職工組織內存在着不妥當的策略，而是因為國內一般的經濟條件，這些條件不激起全體工人羣衆去加入組織，並且由於這些經濟條件底順利，甚至於還縮小工人階級反資本家鬥爭底必要。這些條件當然會要改變，這些條件一改變，工會就會發展起來，而整個職工運動就會走上另一條道路。

都·格·拉·思·回·答·道·：我同意上一個發言人底解釋。我還要補充說幾點，第一，須要注意一點，就是在美國的工資近來由資本家自己提得很高。這種增高工資的現象，在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和以後都有過。如果把現時的實際工資同一九一九年的工資比較，那就可以知道，現時的實際工資是高得多了。職工運動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起初和現在都是按照行會原則，按照職業性質組織的，而且職工會主要地都是爲着熟練工人而成立起來的。站在這些工會底領導地位的，都是那些一定的首領，他們代表着閉塞的團體，只替自己的會員謀得良好的條件。他們從來沒有過

要擴張職工會範圍和把不熟練工人組織在職工會裏面來的動機。此外，美國職工運動須要顧到那個組織得很好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掌握有一切用以阻礙全體工人組織在職工會內的資料。比如說，托拉斯化了的生產部門，如果在自己的某一個企業內遇着職工會底太厲害的反抗，牠就甚至於採用這樣的辦法：關閉這個企業和把工作移到自己的另一個企業裏去。這樣一來，職工會底反抗力量就分散起來。美國資本主義自動增高工人底工資，可是並不給工人以任何的經濟權力，不給以可能去為改善自己的經濟生活而鬥爭。在美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資本家在各種民族底工人中間散佈民族仇視的思想。在大多數情況下，不熟練工人都是過去從歐洲來的工人，或者在最近以來，就是黑種工人。資本家極力離間各種民族底工人。這種按民族性的劃分，也按着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底標準來劃分。資本家們有系統地在各種民族底工人中間散佈彼此對敵的思想，而不管他們的勞動底熟練程度怎樣。最近十年來，美國資本主義進行着比較開明的政策，就是說牠建立了自己的職工會，即所謂公司協會。牠吸收工人們來參加牠自己的企業底工作，使工人們

希望該企業得到利潤等等。美國資本主義現在企圖用縱線的劃分制去代替橫線的劃分制，即是企圖引誘工人階級和使工人階級希望資本主義獲得利益，這樣來分裂工人階級。

郭意爾說道：我不是從理論上而是從實際上來觀察這個問題。固然，在順利的時候是最容易組織工人的，可是問題底本質是在於，美國勞動同盟會底會員增減底統計指明，美國勞動同盟會是漸漸失去不熟練的工人而增加熟練的工人的會員。這樣一來，美國勞動同盟會是願意變成並且正在漸漸變成以熟練工人為主要成份的組織。美國的職工運動差不多沒有包括不熟練的工人。大工業部門底工人並沒有職工會。美國的職工運動差不多沒有包括不熟練的工人。大工業部門底工人稍許有一些組織，可是在煤礦工業裏也還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工人是沒有組織的工人。像鍊鋼工業，橡皮工業，汽車工業這些部門底工人，差不多完全沒有職工會的組織。可以說，職工會是沒有包括着不熟練的工人的。許多站在美國勞動同盟會以外的職工會組織，是極力想組織不熟練的工人和少熟練的工人的。至於說到美國勞動同盟會首領們底態

度，那末，比方，有一個這樣的首領——五金工會底主席，就曾經完全公開地聲明說，他是不願意吸收不熟練的工人加入自己的工會的。工會領袖底地位是這樣，就是：幾十個領取很大的薪資的人，每年領得一萬元或一萬多元美金的人，組合成為一個特殊的領袖的等級，要想鑽進這個特殊等級裏面去，那是非常困難的。

杜·恩·說·道·：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問題是提得不公道的，因為，要是在他的國家內有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組織在職工會內，那末這是因為這裏的政權是握在工人階級手裏的，可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都是被壓迫的階級，而且資產階級採用一切辦法來使工人沒有組織工會的可能。此外，那裏還有反動的職工會，由反動的領袖所領導的職工會。在美國那樣的情況內，是很難使職工會底觀念深入到工人底意識裏去的。在美國，職工會不大發展底原因，也就在這裏。

斯·大·林·問·道·：最後這位說話的人，是不是同意那位在他以前說話的人底意見呢？那位在他以前說話的人是認為：美國工人運動底有些領袖們，自己就是極力謀縮小職工運動底規模。

杜恩說道：我同意。

斯大林說道：我沒有想得罪什麼人，我不過是想知道美國情形和蘇聯情形之間的差別。如果我得罪了什麼人，使他覺得難過，那就請他原諒。（各代表們都笑起來。）

杜恩說道：我一點也不覺得難過。

斯大林問道：在美國，有沒有國家替工人保險的制度？

有一位代表回答道：在美國，是沒有國家替工人保險的制度的。

郭意爾回答道：在大多數省份內，在工人生產裏受傷殘廢時，可以領取補償金，可是，補償的份額，至多也不過等於勞動能力損失底百分之三十。這是在大多數省份裏通行的制度。照法律規定，工人在某個企業內損失了勞動能力，他就應當向該企業所有人的私家商號領取補償金。

斯大林問道：在美國，有沒有由國家擔任的失業保險呢？

有一位代表回答道：是沒有的。現在籌集着的失業保險基金，把全國各州總共

起來計算，也只能夠維持八萬到十萬失業工人。

郭·意·爾·回·答·道：對工業裏的受傷殘廢的保險（不是國家的保險），即是對生產裏的受傷殘廢的保險是有的。可是因疾病或年老而弄成殘廢的，却絲毫也得不到保險。保險基金是由工人納費籌集的。實際的情形是這樣：就是全部基金都是由工人自己付出的，因為如果工人不籌集這筆基金，他們就可以領取比較多的工資，而既然這筆基金是由工人和企業主協商籌集的，所以工人就領取較少的工資。差不多所有的基金都是由工人們這樣納費籌集起來的。企業主事實上只出這些基金底很小一部份，大約是百分之十。

斯·大·林·說·道：我想，要是我告訴大家，說我們蘇聯每年由國家拿出八萬萬多盧布來做工人保險費，你們是會高興聽的。還不妨告訴大家，我們這裏所有各工業部門裏的工人，除了通常的貨幣工資以外，還可以享受保險，生活上的改善，文化上的供給等等，工人在這方面所領得的補充工資，大約等於貨幣工資底百分之三十。

第二個問題：爲什麼在美國沒有特別的羣衆的工人的政黨？美國的資產階級有

兩個黨——共和黨和民主黨，而美國的工人却沒有自己的羣衆的政黨。同志們不是認爲，沒有自己的羣衆的工人政黨，——那怕就是像英國那樣的工人政黨（工黨），這可以減弱工人階級在與資本家作政治鬥爭中的力量？其次，爲什麼美國工人運動底領袖們，格林及其他等人，堅決表示反對在美國成立工人政黨呢？

布洛菲回答道：是的，首領們會有這樣的決定，認爲沒有組織這種政黨的必要。然而有少數人，認爲組織這種政黨是必要的。現時在美國的客觀條件是這樣的，就是像上面所已經說過的，美國職工運動是很薄弱的，而職工運動底薄弱又是因爲工人階級暫時還沒有組織起來的需要，還沒有與資本家進行鬥爭的需要，因爲資本家自己提高工人底工資和保證他們有滿意的物質生活。

斯大林說道：可是，在生活上是有保證的工人，主要的都是些熟練的工人。這裏有一個矛盾。一方面，說是沒有組織的必要，因爲工人的生活是有保證的；另一方面，却又說組織在職工會內的，正是那些在生活上最有保證的，即是熟練的工人；而在第三方面，那些沒有組織在職工會內的，恰好又是在生活上最少有保證

的，即是不熟練的，是最需要組織的那些工人。關於這一點，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懂得。

布·洛·菲·說·道：是的，這裏是有矛盾的，可是，美國底政治方面的和經濟方面的實際情形也是有矛盾的。

布·列·普·尼·爾·說·道：雖然不熟練的工人沒有組織在職工會以內，可是他們却有政治發言權。所以，不熟練的工人如果有不滿意的意見，他們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發言權來表明這些意見。另一方面，加入了職工會的工人，如果遇到什麼特別困難的事情，那末，他們並不是利用職工會，而是利用政治發言權。所以，沒有職工會組織的情形，是由政治發言權來補償的。

伊·紫·賴·爾·思·說·道：基本的困難之一就是制度本身，就是美國選舉制度本身。那裏在選舉總統時，當選的不是獲得全國底大多數選票，或甚至某一個階級底大多數選票的人。那裏每州都有選舉幹事會，每州都有一定的參加總統選舉的選舉票數。要當選為總統，一定要有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數。如果有三四個政黨，那就會弄成這

樣的情形，就是誰也不會當選，而選舉就應當移到國會內去。這就是用以反對成立第三個政黨的理由。反對成立第三個政黨的人提出這樣的理由：不要提出第三個候選人，因為如果你們提出第三個候選人，那你們就會分散自由黨的票數，使自由黨底候選人不能當選。

斯·大·林·說·道·：可是，上議院議員拉佛列特曾經組織過資產階級的第三個政黨。這樣看來，那末事情原來是這樣：就是如果第三個政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牠就不會分散選舉票，而如果牠是工人的政黨，牠就會分散選舉票了。

戴·維·思·說·道·：我並不認爲上一個發言的人所指出的事實是基本的因素。照我的意見，以下的情形才是基本的因素。我舉出我所居住的那個城市做例子。在進行選舉運動時，就有某個政黨底代表出來活動，給職工會底首領一個什麼重要職位，因爲選舉運動而轉交工會首領以相當的款子，由他拿去使用，後來，他因爲擔任重要職務，便得到相當的榮譽。結果弄成這樣的情形，就是職工運動底首領自己就是某個資產階級政黨方面的人。因此，自然的，當有人倡議成立第三個政黨，即成立工

入政黨的時候，職工會底這些首領是絲毫也不願意設法組織這樣的政黨的。而且他們還藉口說，如果成立第三個政黨，就會引起職工會內的分裂。

都格拉思說道：組織在職工會內的只是熟練的工人，這主要地是因為，要想加入職工會，須要有相當的基金和相當的保證，因為會費很大，不熟練的工人是繳不起這樣高的入會費的。此外，不熟練的工人經常受着這樣的恐嚇，就是如果他們企圖組織起來，企業主就要開除他們的工作。不熟練的工人只有在得到熟練的工人底積極援助時才能夠組織起來。而這種援助，他們在大多數情形下都是得不到的。這種情況，就是使不熟練的工人不能加入職工會的基本阻礙之一。工人羣衆保護本身權利的基本方法，就是在政治上來保護這些權利。我認爲不熟練的工人之所以沒有組織，其主要原因也就在這裏。我認爲經濟基礎就是使不熟練的工人在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都沒有組織起來的基本要點。我應當指出美國選舉制度底一個特點，這就是直接選舉制：在那裏，無論什麼人都可以跑到選舉會議上去宣佈自己是民主派或共和派和投票選舉。我確信，如果龔伯思沒有這個關於主張直接投票的論據，他就

不能把工人束縛在非政治的綱領上。他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向工人們說，如果工人們想去作政治活動，那末他們就可以加入現存的兩個政黨，在這裏奪取職位，在這裏取得威信。龔伯思總是利用這個口實來束縛工人，使工人們想不到組織工人階級和成立工人政黨。

第三個問題：爲什麼在承認蘇聯的問題上，美國勞動同盟會底首領比許多資產者還更反動些呢？爲什麼像波拉先生以及其他這樣的資產者，都主張承認蘇聯，而美國工人運動底首領，從龔伯思起到格林止，却進行了而且還在繼續進行最反動的宣傳，反對承認第一個工人共和國，反對承認蘇聯呢？爲什麼連以前的美國大總統威爾遜這樣的反動人物，都認爲可以『祝賀』蘇俄，而格林和美國勞動同盟會底其他的首領却想比資本家還更反動些？請看威爾遜底『祝辭』原文，這是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當德皇軍隊進攻蘇維埃的列寧格拉的時候，致給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的：

『我想趁着蘇維埃代表大會舉行的機會，來代表美國人民向俄國人民表示誠懇的同

清，特別是在目前這個時候，目前，德國軍隊深入俄國境內，其目的是在於妨害爭取自由鬥爭，消滅這鬥爭底一切勝利品，實現德國底陰謀和束縛俄國人民。雖然美國政府現時可惜不能給俄國以牠自己所願意給的那種直接的援助，可是，我還是想經過現在這次代表大會來使俄國人民相信：美國政府是利用着一切可能來保證俄國重新得到內政上的完全自主和完全獨立，來保證俄國完全恢復牠在歐洲底和現代人類底生活中的偉大作用。美國人民極熱烈地同情於俄國人民底那種想永遠解脫專制制度而謀得獨立自由的志願。」（請參看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號的真理報第五十期）

美國勞動同盟會底首領們想做比反動的威爾遜更反動些的人，這是不是常態的現象呢？

布洛菲回答說：我不能確切說明這個問題，可是我認為，美國勞動同盟會底首領們主張不承認蘇俄的原因也與美國勞動同盟會不加入阿姆斯特丹國際的原因一樣。不同處就在於美國工人有特別的哲學，就在在於美國工人與歐洲工人之間存在有經濟上的差別。

斯大林說道：『可是據我所知道的，美國勞動同盟會底首領們並不反對承認法西斯蒂統治着的意大利或波蘭。』

布洛菲說道：『你指出法西斯蒂政府的波蘭和意大利來做例子，這樣你就說明了美國不承認蘇聯的原因。這種對蘇聯的惡感就是因為美國工人運動底首領們和美國共產黨人有很不好的關係。』

杜恩說道：『上一個發言人所引過的原因，——說既然他們與本國共產黨人感情不好，他們怎麼能夠承認蘇聯，——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為他們還在美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就已宣傳不承認蘇聯了。基本的原因是在於，美國勞動同盟會底首領們反對任何類似社會主義的東西。而資本家又在這方面慫恿他們，這些資本家有一個組織，叫做『全國公民協會』，這個協會拚命慫恿整個美國的社會來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這個組織曾經反對愛維里底立場，因為愛維里曾經主張發展美國和蘇聯間的商業關係。這個組織底首領們曾經說過：『既然自由派都開始發出這樣的論調，我們還怎麼能夠維持我們工人階級裏面的秩序呢？』『全國公民協會』是這樣一些資本

家庭組織，這些資本家曾把大批款子投在這個組織裏並且領導着這個組織。須要指出的，就是美國勞動同盟會底副主席奧爾在這個反動的協會內担任副主席底職務。

布·洛·菲·說·道·：與工會首領底反動性有關係的那些原因，還不是基本的原因；對於這個問題須要更深一層來觀察。美國代表團來到蘇聯，這就是很好的回答，很足以表明美國一部分工人對蘇聯的同情態度。我認爲，美國勞動同盟會底領袖們對於蘇聯的意見，與美國工人階級大多數底意見是沒有分別的。工人階級大多數對蘇聯的這種態度，是由於蘇聯與美國相隔太遠。美國工人階級對於無論什麼國際事情都是不肯注意的，而在對於蘇聯的態度問題上，又受了資產階級底很厲害的影響。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爲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而作——
真理報第225期，1927，11，6—7。

十月革命並不是單單『一國範圍內的』革命。牠首先是帶着國際性質的，帶着世界性質的革命，因爲這個革命是全世界人類歷史中由舊的資本主義世界進到新的社會主義世界的一個根本的轉變。

過去的革命，其結果通常是由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來掌理國政。剝削者更換了，而剝削制則依然存在。在奴隸解放運動時，有過這樣的情形。在農奴暴動時，有過這樣的情形。在英，法，德各國著名的『大』革命時期，也有過這樣的情形。我現在不說巴黎公社，因爲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初次的光榮的英勇的企圖，企圖迴轉歷史來反對資本主義，但是這種企圖還是沒有成功。

十月革命在原則上與這些革命不同。牠所抱定的目的，並不是用一種剝削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不是由一個剝削者集團來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而是消滅任何一種人剝削人的現象，消滅所有一切剝削者集團，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那迄今所有一切被壓迫階級中最革命的階級底政權，組織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正因為這樣，十月革命底勝利，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根本的轉變，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命運上的一個根本的轉變，是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一個根本的轉變，是全世界被剝削羣衆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上的一個根本的轉變，是他們風俗，傳統，文化和思想上的一個根本的轉變。

十月革命是帶着國際性質的，帶着世界性質的革命，——這一點底基礎就在這裏。

世界各國底被壓迫階級對於十月革命表示深刻的同情，認為十月革命是使他們獲得解放的保證，——這一點底根源也是在這裏。

我們可以指出這樣幾個基本問題，在這幾個問題上，十月革命是影響着全世界革命運動底發展。

第一，關於十月革命，首先應當指出的，就是牠打斷了世界帝國主義底戰線，在各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個國家裏，推翻了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並使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掌握着政權。

被僱傭的，被驅策的，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階級，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地昇到了統治階級底地位，用自己的實例來感化着世界各國底無產階級。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展開了一個新時代，在各帝國主義國家裏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十月革命奪取了地主和資本家底生產工具和資料，並把這些工具和資料變成了公共的財產，這樣便把社會主義的所有權同資本主義的所有權對立起來。這樣，牠便揭破了資本家們底妄談，資本家們妄談說資產階級的所有權是不可侵犯的，神聖的，永遠不朽的。

十月革命奪取了資產階級底政權，剝奪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權利，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並把政權交給了蘇維埃，這樣便把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的民主制）來同資產階級的代議制度（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對立起來了。拉法格還在一八八七年就說過：在革命以後第一天，『所有從前的資本家都被褫奪選舉權』，他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這樣，十月革命便揭破了社會民主黨人底妄談，社會民主黨人妄說現在有經過資產階級的代議制度而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

但是十月革命不會停留而且也不會能夠停留在這一點上。十月革命破壞了舊有的，資產階級的制度以後，就已經着手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制度。十月革命底十年，就是黨，職工會，蘇維埃，合作社，文化組織，運輸業，工業和紅軍底建設事業的十年。蘇聯社會主義在建設戰線上的無疑義的成績，已經顯然地表明了：無產階級能夠不要資產階級和反對着資產階級，來很有成效地管理國家；能夠不要資產階級和反對着資產階級，來很有成效地建設工業；能夠不要資產階級和反對着資產階級，來很有成效地領導全部的國民經濟，能夠不顧資本主義的包圍，而很有成

效地建設社會主義。有一種舊的『理論』，說被壓迫者非有剝削者不行，如同腦袋和身體上的其他部份非有胃部不行一樣，這種『理論』不僅是古代史上有名的羅馬元老梅業尼·阿格里波底心得。現在這種『理論』，一般地是社會民主黨政治『哲學』底基礎，尤其是社會民主黨聯合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這種政策底基礎。這種已帶有成見性質的『理論』，現在是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無產階級走上革命化這條道路上的最厲害的障礙之一。十月革命給了這種虛妄的『理論』以致命的打擊，這件事實，就是十月革命底極重要的結果之一。

十月革命這些結果和與此類似的結果，曾經不得不而且現在還不能不大大影響到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階級底革命運動，這一點還要證明嗎？

資本主義各國裏的共產主義日益發展着，全世界各國無產者對蘇聯工人階級的同情日益增長，工人代表團成羣結隊地來參觀蘇維埃國家，——這些人人皆知的事實，無疑義地證明十月革命所散播的種子，已經在開始出產果實了。

第二，十月革命不僅在帝國主義底統治中心，不僅在『宗主國』裏動搖了帝國

主義。十月革命還打擊了帝國主義底後方，帝國主義底周圍地帶，因為牠掘動了帝國主義在各殖民地和附屬國中的統治。

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這樣就打破了民族壓迫和殖民地壓迫的鍊子，使一個龐大國家中各被壓迫民族一概擺脫了這種壓迫。無產階級如果不解放被壓迫民族，便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在蘇聯實行了民族的殖民地革命，不是在民族仇視和國際衝突底旗幟下實行的，而是在蘇聯各民族中工農互相信任和友誼聯合底旗幟下實行的，不是爲着民族主義的名義實行的，而是爲着國際主義的名義實行的，——這件事實，就是十月革命底一個特點。

正因爲民族的和殖民地的革命在我們這裏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和在國際主義底旗幟下進行的，所以被賤視的民族，被看作奴隸的民族第一遭地在人類歷史上昇到了真正自由的和真正平等的民族底地位，這樣，牠們就用自己的實例來感化了全世界底被壓迫民族。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展開了一個新時代，殖民地革命底時代，而這種殖民地革

命，在世界各被壓迫國家裏，是在與無產階級聯盟中，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的。

從前「照例總是」認為：自古以來，世界就分成了下等的和高等的種族，分成了黑色人種和白色人種，這兩種人種中，第一種人種是沒有達到文明的能力，而祇有淪為剝削對象的命運，而第二種人種却是文明的唯一代表人物，負有剝削第一種人種的使命。現在可以說這種奇談已被打碎，已被拋開了。十月革命給了這種奇談以致命的打擊，因為牠在實際上證明了已被解放的，已被吸引到蘇維埃發展軌上來，而非歐洲的民族，是能夠推進真正先進的文化和真正先進的文明，絲毫不比歐洲民族壞些，——這件事實是十月革命底極重要的結果之一。

從前「照例總是」認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底方法，民族彼此脫離底方法，民族分開底方法，加強各民族勞動羣衆間民族仇視底方法，是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唯一方法。現在應該認為這種奇談已被推翻了。十月革命給了這種奇談以致命的打擊，因為牠在實際上表明了無產階級的和國際主義的解放被壓迫民族的方法，是唯一正

確的方法；實際證明了這個方法是可能的而且適當的；因為牠在實際上表明了，在自願性和國際主義基礎上，各個極不相同的民族的工農們建立親睦的聯盟，是可能的而且適當的，——這種事實，是十月革命底極重要的結果之一。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世界各國勞動者將來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聯底實際榜樣，這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底存在，不能不成爲上述這一點直接證明。

十月革命底這些結果和與此類似的結果，曾經不得而且現在還不能不大大影響殖民地和附屬國裏的革命運動，這是不待說的。在中國，南洋羣島，印度等等國家裏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底發展，這些民族對蘇聯的同情日益增長，——這些事實無疑義地證明上述這一點。

平安無事地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及附屬國底紀元，已經過去了。

殖民地和附屬國裏的解放革命底紀元，這些國家裏的無產階級覺醒底紀元，無產階級領導革命底紀元，已經到來了。

第三，十月革命既然把革命底種子散播到了帝國主義底中心和後方，既然減弱了帝國主義在『宗主國』的力量並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統治，這樣，牠便使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存在本身成了問題。

如果在帝國主義底條件下，因資本主義底不平衡性，因相互衝突和武裝接觸底不可避免，最後因空前的帝國主義的屠殺，致使資本主義自發的發展，已過度成熟而進到了資本主義『腐化』和『死亡』底過程，那末，十月革命和一個極大的國家因十月革命而脫離了資本主義底世界系統，便不能不加速這種過程，而一步一步地破壞世界帝國主義底基礎本身。

而且，十月革命不僅是動搖了帝國主義，牠同時還建立了世界革命運動底強大的和公開的基礎，——這就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世界革命運動從前不曾有這個基礎，現在牠却可依靠着這個基礎。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革命運動底這樣一個強大的和公開的中心，世界革命運動從前不曾有這種中心，而現在牠却可以在這個中心周圍團結起來，組織全世界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人民底統一革命戰線去反對帝國主

義。

這首先就是說，十月革命使世界資本主義受了一個致命傷，這是世界資本主義永遠不能再治好的致命傷。正因為這樣，所以資本主義永遠不能恢復十月革命以前牠所具有的那種『平衡』和『穩固』了。資本主義可以局部地穩定，牠可以使自己的生產合理化，牠可以把國家管理事業交給法西斯主義去辦，可以暫時壓制工人階級，但是牠永遠也不能恢復牠從前曾引為自豪的那種『安靜』，那種『確信』，那種『平衡』和那種『穩固』了，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這時候，革命底火燄時而在帝國主義底中心，時而在帝國主義底周圍地帶，必然地要爆發起來，使資本主義的彌補方法，一概無效，使資本主義底死期日益迫近。有名的寓言說得好：『抽出了尾巴，又掛上鼻子，抽出了鼻子，又掛上尾巴』，現今資本主義的情形，剛好就是這個樣子。

其次，這就是說，十月革命把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底力量和比重，勇氣和戰鬥決心提高到了相當的高度，逼得統治階級不能不顧到被壓迫階級——這個新的重要

因素。現在已經不能把世界勞動羣衆看作徘徊於黑暗鄉和沒有前途的「盲目人衆」了，因為十月革命爲他們建立了燈塔，爲他們照出道路和給他們指出前途。如果從前沒有全世界公開發的集議場可以表示和定明被壓迫階級底希望和希圖，那末，現在却已經有這種集議場了，——這就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如果這個集議場一消滅，則急遽的黑暗的反動勢力，就要長期地籠罩着「先進各國」底社會的和政治的生活，——這差不多是不能懷疑的。甚至單是「布爾塞維克國家」存在的這一件事實，就足以阻礙反動的黑暗勢力，使被壓迫階級謀自己的解放鬥爭易於進行，這是不能否認的。全世界各國底剝削者所以這樣獸行般地怨恨布爾塞維克，其實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歷史正在重複着，不過是在新的基礎上重複着罷了。從前在封建制度衰落時期，「雅可賓黨人」這幾個字，曾引起全世界各國貴族們底驚恐和憎惡，現今在資本主義衰落時期，「布爾塞維克」這幾個字，正同樣地引起資產階級國家底驚恐和憎惡。反過來說，從前巴黎曾是蒸蒸日上資產階級底革命的代表們底避難所和學校，現在莫斯科是蒸蒸日上無產階級底革命代表們底避難所和學

校。怨恨雅可賓黨人，這不會挽救封建制度滅亡。怨恨布爾塞維克，這也不能挽救資本主義底粉碎，這還能夠懷疑嗎？

資本主義「穩固」底紀元，已隨身帶着那種說什麼資產階級制度牢不可破的奇談而一去不返了。

資本主義覆亡底紀元，已經到來了。

第四，十月革命不僅是經濟關係和社會政治關係上的革命。十月革命同時又是智慧中的革命，是工人思想中的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下，在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底旗幟下，在列寧主義——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下誕生和強健起來的。因此十月革命表明馬克思主義戰勝改良主義，表明列寧主義戰勝社會民主主義，表明第三國際戰勝第二國際。

十月革命，在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在列寧主義政策與社會民主主義政策之間，掘下了一個不可越過的鴻溝。從前，在無產階級專政未獲得勝利以前，社會民主黨還不公開地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思想，可是，絲毫沒有設法，絕

對沒有設法去促進這種思想底實現，社會民主黨當時還能這樣拿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來裝飾門面，因為社會民主黨底這種行爲，並沒有爲資本主義造成任何的危險。當時，在那個時期，社會民主黨在形式上還與馬克思主義匯成一氣或者差不多匯成一氣。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獲得勝利以後，大家都已顯然地看見：馬克思主義所引導的方向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勝利能表明什麼，在這個時候，社會民主黨已經不能拿馬克思底旗幟來裝飾門面了，已經不能向無產階級專政思想表示媚態了，因爲這會給資本主義造成相當的危險。社會民主黨早已和馬克思主義底精神決裂，結果竟不能不與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也實行決裂，而公開和決然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底產兒，反對十月革命，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現在社會民主黨不能不和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而且實實在在地和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了，因爲在現時的條件之下，不去公開地和忠誠地擁護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不進行革命鬥爭反對本國資產階級，不去造成本國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的條件，即不能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社會民主黨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已經擺着一條鴻溝。從那時起，列寧主

義，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底唯一的代表和擁護者。

但是事情並不限於這一點。十月革命使社會民主黨與馬克思主義分開以後，還更往前進了，就是說還把社會民主黨拋到那些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直接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們底營壘中去了。當阿德列爾，鮑威爾，威爾斯，列維，龍格，布留姆這些先生們辱罵『蘇維埃制度』，誇獎議會的『民主制』時，他們這樣就是要表示：他們現在是進行着鬥爭，而且將來還要進行鬥爭，爲着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制度，爲着要在『文明』國家保存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現在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底思想上的支柱。列寧曾經說得萬分正確，他說現在的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家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資本家階級底工人傭僕』，『在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裏』，他們必然要跑到『凡爾賽派方面去反對巴黎公社社員』。不消滅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便沒有可能來消滅資本主義。因此資本主義死亡底紀元，同時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中死亡底紀元。十月革命底偉大意義，局部地也就在於，十月革命表明列寧主義必然戰勝世界

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

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裏統治底紀元，已經完結了。
列寧主義和第三國際統治底紀元，已經到來了。

糧食戰線上的問題

——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與紅色教授學校，共產主義學院以及斯維德洛夫夫大學

學生們談話底一部份——

問題：那一點要算是我們糧食事業困難中的基本困難呢？逃出這些困難的出路在什麼地方呢？既然有這些困難，那末，對於我們一般工業發展底速度方面，特別是從輕工業與重工業間的對比關係上看來，應當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

回答：初看起來，也許覺得我們的糧食困難是偶然的現象，只是因為計劃工作底不好，只是因為經濟計算工作有了許多錯誤。可是，只是初看起來才可以覺得是這樣。實際上，困難底原因在這裏是更深刻得多的。至於計劃工作底不好和經濟計算底錯誤在這裏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關於這一點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可是拿不好的計劃工作與偶然的錯誤來解釋一切困難，——就是陷於極端嚴重的錯誤。過

於看小計劃工作底作用與意義，那是錯誤的。可是過於誇大計劃原則底作用，以爲我們已達到了這樣的發展程度以至於可以計劃與調節任何的和所有的東西，那就是更大的錯誤了。不要忘記，在我們的國民經濟底成份內，除了服從於我們的計劃影響的那些成份之外，還有其他的暫時不服從於計劃工作的成份，最後，還有些敵視我們的階級，要克服這些階級，單是用國家計劃局的計劃工作手續，那是做不到的。就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我以爲，不能把一切都歸結爲簡單的偶然現象，歸結爲計劃工作底錯誤等等。

那末，我們在糧食戰線上的困難底基礎在那裏呢？

我們的糧食困難底基礎就在於，在我們這裏，商品糧食生產量底增長是比糧食需要量底增長慢些。工業是在增長着。工人數量是在增長着。城市是在增長着。末了，工藝原料（棉，麻，糖蘿蔔等等）生產區域，——需要商品糧食的區域，是在增長着。所有這些情形，就使糧食底需求，商品糧食底需求迅速增長起來。而商品糧食生產底增長却慢得要命。不能說，我們國家在今年採辦得來的糧食比去年或前

年少些。反之，我們國家今年所採辦得來的糧食比過去幾年多得多。可是現在我們還是遇到糧食的困難。請看幾個數字。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年度，我們到四月一號止已採辦了四萬三千四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萬二千三百萬普特，所以，採辦到的糧食在國內剩下三萬一千一百萬普特。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度，我們到四月一號止採辦了五萬九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萬五千三百萬普特。在國內還剩下四萬四千三百萬普特。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年度，我們到四月一號止採辦了五萬七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二千七百萬普特。在國內還剩下五萬四千九百萬普特。換一句話說，我們今年到四月一號止，已經採辦來供國內需要的，是比去年多一萬萬普特，比前年多二萬三千萬普特。可是，我們今年在糧食戰線上，還是有困難。

我在自己的有一個報告裏面已經說過，這些困難會被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首先是會被富農利用來破壞蘇維埃的經濟政策。你們知道，蘇維埃政權採取了好些辦法來消滅富農底反蘇維埃的發動。因此關於這點我在這裏不來多講；這裏我所注

重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商品糧食生產之所以增長得緩慢的原因問題，就是關於，雖然我們的耕種面積和糧食總出產量已經達到了戰前的程度，而我們這裏的商品糧食底生產量還是比糧食底需要量增長得慢些的問題。

真的是，我們的耕種面積已經達到了戰前的程度，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是的，是事實。糧食出產總量在去年就已經等於戰前的生產標準，就是說，達到了五十萬萬普特糧食，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是的，是事實。既然如此，那末爲什麼雖有這些情況而我們所生產的商品糧食却比在戰前的時候少一倍，而輸出國外的糧食却差不多比在戰前的時候少十九倍呢？這裏首先的和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十月革命底結果，我們的農業底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就是因爲我們的農業已由那些出產商品糧食極多的，大規模地主經濟和大規模富農經濟，過渡到了我們現在這些出產商品糧食極少的，小農的和中農的經濟。在大戰以前，我們曾有一千五百萬到一千六百萬個農戶，而現在我們却有二千四百萬到二千五百萬個農戶，單單是這一點已經證明，我們的農業底主要基礎，就是出產最小限量商品糧食的小農莊。農業上大規模

的農莊，無論牠是地主的，富農的，或者是集體的，牠的强有力的地方就在於，牠有可能來使用機器，利用科學底成績，施用肥料，提高勞動生產率，並因此而產出最多數量的商品糧食。反過來，小規模的農莊底軟弱的地方就在於，牠沒有，或者差不多沒有這些可能性，因此牠也就是半消費的經濟，少帶商品性的農業。比方，拿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來講。牠們出產的商品糧食，等於自己的總生產量底百分之四七點二。換一句話說，就是牠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比在戰前時候的地主經濟所出產的還多些。而小農的和中農的經濟呢？牠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却只等於自己的總生產量底百分之十一點二。可見，這裏的差別是很大的。

請看幾個數目字，這些數目字可以說明過去的大戰以前的與現在的十月革命以後的糧食生產底結構情形。這些數目字，是中央統計局幹事會的幹事員聶蒙啓諾夫同志製定的。這些數目字，好像聶蒙啓諾夫同志在自己的說明書裏所附帶聲明的那樣，並不能說是完全精確的，——牠們只是使人有可能來作大約的核算。可是這些數目字完全足以使人明白，從一般的糧食生產底結構上看來，特別是商品糧食生產

底結構上看來，在大戰以前與十月革命以後，是有多大的差別。

大戰以前：

糧食總生產量	商品糧食(運出鄉村以外的)		
	以百萬普特為單位	百分數	商品類底百分數
(1)地主	六〇〇	二一·〇	四七
(2)富農	一、九〇〇	六五·〇	三四
(3)中農和貧農	二、五〇〇	三六九·〇	一四·七
總計	五、〇〇〇	一〇〇	二六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

糧食總生產量	商品糧食(運出鄉村以外的)		
	以百萬普特為單位	百分數	商品類底百分數

總計	(1) 蘇維埃農莊 和集體農莊	(2) 富農	(3) 中農和貧農
四、七四九、〇	八〇、〇	六一七、〇	四、〇五二、〇
一〇〇〇	一·七	一三·〇	八五·三
六三〇、〇	三七、八	一二六、〇	四六六、二
一〇〇〇	六·〇	二〇·〇	七四·〇
一三三·三	四七·二	二〇·〇	一一·二

這個統計表是證明什麼呢？

第一，牠是說明，絕大部分糧食品底生產，是從地主和富農方面過渡到了小農和中農方面。這就是說，小農和中農，因完全解脫了地主的壓迫和在基本上削弱了富農底勢力，於是就得到了最切實地改善自己的物質狀況的可能。這是十月革命底結果。基本農民羣衆從十月革命那裏所取得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品，首先就表現在這裏。

第二，牠是說明，在我們這裏，商品糧食底基本所有人，就是小農，首先就是中農。這就是說，不僅從糧食總生產量看來，而且從商品糧食底生產上看來，蘇聯

由於十月革命底結果，已變成了小農經濟底國家，而中農則變成農業底『中心人物』了。

第三，牠是說明，地主的（大規模的）農業已經消滅，富農的（大規模的）農業縮減了三倍多，由大規模的農業過渡到那只出產百分之十一的商品額的小農民的農業，同時在糧食生產方面又還沒有多少發達的大規模的公共的農業（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這些情形本來應當弄到，而且真的已經弄到了商品糧食底生產比大戰以前的時候有劇烈的減少。雖然我們現在的糧食總出產量是與大戰以前的標準一樣，而我們現在所有的商品糧食，却比大戰以前少一倍，這是事實。

我們在糧食戰線上的困難底基礎就在這裏。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不能認為我們食糧採辦事業上的困難是簡單的偶然現象。

無疑義的，下面這一個情形，在這裏也是起了相當的壞作用，這個情形就是：我們的商業機關，曾經擔任了一個為牠們所不必擔任的，給許多小城市和中等城市

供給糧食的義務，這在相當程度上曾經不能不減少國家底糧食儲存。可是，不容有絲毫懷疑的，就是我們糧食戰線上的困難底基礎，並不是這種情形，而是下面這一個事實，就是我們的農業底商品額增長得很遲慢，而同時商品糧食底需要却增長得很迅速。

出路在那裏呢？

有人認為，出路就在於恢復富農的農業，在於發展和擴展富農的農業。這些人不敢說要回復到地主的農業，因為大概他們知道，在現在這個時候來談論這樣的事情，是很危險的。可是，他們却更高興說什麼有必要來盡力發展富農的農業以謀……蘇維埃政權底利益。這些人認為，蘇維埃政權可以同時倚靠着兩個相反的階級，——倚靠以剝削工人階級為經濟原則的富農階級，同時又倚靠以消滅任何剝削為經濟原則的工人階級。這真是只有反動派才表演得出來的把戲。值不得證明，這些反動的『計劃』，是與工人階級底利益，與馬克思主義底原則，與列甯主義底任務，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的。有人說，富農並不『劣於』城市資本家，富農底危險絕不

比城市耐潑曼底危險還大些，因此我們現在用不着『害怕』富農，——這種說法完全是自由派的廢話，是用催眠工人階級及基本農民羣衆底警惕性的。不要忘記，在工業方面，我們可以拿出產全部工業商品底十分之九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來對抗城市小資本家，可是在農村生產方面，我們可以拿來與農村裏的大規模的富農生產對抗的，不過是那些還沒有強固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這些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所生產的糧食要比全體富農農莊所生產的糧食少七倍。不懂得大規模的富農農莊在農村中的意義，不懂得富農在農村中的比重是比資本家在城市工業中的比重要高百倍，——這就是神經錯亂，與列寧主義斷絕關係，跑到工人階級底敵人方面去。

那末，出路到底在那裏呢？

首先，出路就在於，由小規模的，落後的和散漫的農民的農莊過渡到聯合的，大規模的，公共的農莊，用機器來供給的，用科學成績武裝起來的，能夠生產最多的商品糧食的公共的農莊。出路就在於，在農業方面，由個人農的民的農業過渡到

集體的公共的農業。

列甯還在十月革命底頭幾天裏就已經號召我們的黨去組織集體農莊。從那個時候起，在我們黨內，集體農莊思想的宣傳，總是沒有停止過。然而，組織集體農莊的號召只是近來才得到大規模的響應。這種影響首先是因爲，農村中合作運動底廣闊發展，在農民心理上已準備好了一個轉變趨向於集體農莊的，而現有的許多集體農莊，現在就已經得到每俄畝出產一百五十到兩百普特的收成，並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商品額，這種情形又很厲害地吸引着貧農和下層中農去組織集體農莊。還有一個情形在這裏也有不小的意義，這就是我們的國家只是在最近以來才得到了大大資助集體農莊運動的可能。大家知道，今年國家已支出去幫助集體農莊的款子比去年多一倍（在六千萬盧布以上）。黨底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曾經認爲大規模的集體農莊運動所需要的條件已經成熟，加強集體農莊運動是提高國內糧食生產底商品額的最重大的方法之一，——這是完全正確的。

根據中央統計局底統計材料，集體農莊在一九二七年的糧食總出產量不下五千

五百萬普特，一般的平均商品額是百分之三十。在今年初期發生的成立新集體農莊和擴大舊集體農莊的廣闊的浪潮，應當使集體農莊底糧食生產量到年底的時候有很大的增加。任務就在於，保持集體農莊運動發展的現時的速度，擴大集體農莊底範圍，取消有名無實的集體農莊，用真正的集體農莊來代替牠們，並規定這樣的規則，就是要集體農莊把自己的全部商品糧食都交給國家和合作社機關，不然就得不到國家的津貼和債款。我想，只要是遵守這些條件，那我們就能夠做到這一步，就是：經過三四年後，我們就能夠從集體農莊方面得到四五千萬普特的商品糧食。

人們有時候把集體農莊運動與合作社運動對立起來，這些人大概是認為，集體農莊是一個東西，而合作社却是另一個東西。這當然是不對的。有些人甚至還把集體農莊與列寧底合作制計劃對立起來。不消說，這樣的對立是絲毫不符實情的。實際上，集體農莊是合作社底一種，是生產合作社底最明顯的一種。有銷售合作社，有供給合作社，也有生產合作社。集體農莊一般地是合作社運動底分不開的一部分，局部地是列寧的合作制計劃底分不開的一部分。實行列寧的合作制計劃——這

就是把農民從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集體農莊的合作社。局部地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才有下面這樣的事實，就是在我們這裏，集體農莊只是由於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發展和加強的結果才開始產生和發展起來。

第二，出路就在於，擴大和鞏固舊的蘇維埃農莊，組織和發展新的大規模的蘇維埃農莊。根據中央統計局底統計，現有蘇維埃農莊底糧食總出產量，在一九二七年不下四千五百萬普特，商品額佔百分之六十五。無疑義的，如果蘇維埃農莊得到國家方面的相當的贊助，牠們就可以大大地提高糧食生產。可是任務不只是限於這一點。蘇維埃政權已經通過一個決議，規定在那些沒有農民份地的區域內組織新的大規模的蘇維埃農莊（每個農莊有一萬到三萬俄畝），這些農莊，經過五六年後，應當出產大約一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組織這些蘇維埃農莊的工作，已在着手進行。任務就在於，無論如何要實現蘇維埃政權底這個決議。我想，只要執行這些任務，我們就能夠做到這一步，就是：經過三四年後，我們就能夠從新的和舊的蘇維埃農莊方面得到八千萬至一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

第三，最後，出路就在於，有系統地提高小的和中等個人農民經濟底收成額。我們不可以而且不應當贊助大的個人富農經濟。可是我們可以而且應當贊助小的和中等的個人農民經濟提高牠的收成，把牠引上合作組織底軌道。這個任務是舊的，還在一九二一年用糧食稅代替糧食徵收制的時候就已把牠提倡得特別厲害。這個任務，由我們的黨在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所批准了。現在因為在糧食戰線上發生困難，這個任務底重要性便更加明顯了。因此，應當堅決執行這個任務，正好像堅決地執行頭兩個任務——關於集體農莊的任務和關於蘇維埃農莊的任務——一樣。

所有的材料都是證明，農民經濟底收成額，可以在幾年以內增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現時在我們這裏使用着的木犁，不下五百萬。只要一用鐵犁去代替這些木犁，就可以使我國的糧食生產有極巨大的增長。更不必說用某種最少限量的肥料，乾淨的種子，小號的機器等等去供給農民經濟。訂立定貨合同的方法，與整批農村和村落訂立條約，規定供給牠們以種子及其他等等，同時一定要從牠們方面得到相

當數量的糧食品，——這個方法是提高農民經濟收成額和吸收農民加入合作制的最好的方法。我想，只要是在這方面認真進行工作，那末，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就可以從小的和中等的個人農民經濟方面得到不下於一萬萬普特的新的商品糧食。

這樣一來，只要是執行這一切任務，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的國家就可以得到二萬萬到二萬五千萬普特的新的商品糧食，這就多少足以使我們在國內和國外都能夠實行應有的調節辦法。

爲逃出糧食戰線上的困難所必要的辦法，大體上就是這樣。

除這些基本辦法以外，還採用一些臨時辦法以改善在把商品供給農村這方面的計劃工作，並且叫我們的商業機關不要再擔任許多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底糧食供給義務，——這就是現時的任務。

除了這些辦法以外，是不是還要採取許多別的办法，譬如說，既然工業增長使得對於糧食的需要，迅速增長着，使得牠暫時還超過商品糧食生產增長底速度，那末，在這裏是不是還要採用弄慢工業發展速度的辦法呢？是不要的。無論如何都不

要！弄慢工業發展底速度，這是削弱工人階級底勢力，因為工業發展上的每個前進步驟，每個新的輕工廠和重工廠，依列甯底說法，都是工人階級底『新要塞』，足以加強牠在與小資產階級底自發勢力的鬥爭中，與我國經濟內的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中的障地。恰巧相反，我們應當保持工業發展底現時的速度，我們應當儘可能地更加發展這個速度，以便把大批商品輸到農村，而從那裏多多收取糧食，以便把機器供給農業，首先是供給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以便使農業工業化並提高農業生產底商品額。

也許，爲着多多『慎重』起見而應當阻撓重工業底發展，以便把那個主要的是爲農民市場而生產的輕工業變成我們的工業底基礎吧？無論如何也是不應當的！這是自殺政策，這是要破壞我們的全部工業，輕工業也在其內。這就是離開我國工業化底口號，把我國變爲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底附屬品。我們在這裏所依據的出發點就是列甯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所發表的著名的領導的原理，這些原理是我們全黨所絕對應該遵守的。請看列甯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上關於這一

點所說的話罷：

『爲要挽救俄國，就不僅是需要農民經濟底好收成，——這還不夠，——也不僅是需要那替農民供給消費品的輕工業底好情況，——這也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重工業。』

或者還請看這樣的話：

『我們節省一切用費，連小學校底費用也節省。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爲我們知道，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會根本喪失自己這個獨立國家底地位。』（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九頁）

列寧底這些指示是不可忘記的。

既然採用上面所指出的那些辦法，那末工農聯盟又將怎麼樣呢？我想，這些辦法只能使鞏固工農聯盟的事業易於進行。的確是，如果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將以加快的速度發展起來；如果由於直接幫助小農和中農的結果，他們的農莊底收成額將提高起來，而合作社將包括日益廣大的農民羣衆，如果國家又得到幾萬萬萬普特新

有的商品糧食，以供給調節辦法底需要；如果由於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辦法底結果，富農將受到抑制而漸漸被征服，——那末在工農聯盟以內的工農間的矛盾將因此而日益消滅下去，糧食採辦方面的非常手段，將沒有採用的必要，廣大的農民羣衆將日益轉向集體形式的農莊，而爲征服農村裏的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將日益帶有羣衆的和有組織的性質，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工農聯盟底事業從這種辦法裏只能得到好處，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只是要注意一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之下的工農聯盟並不是什麼平常的聯盟。這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底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聯盟，這種聯盟底目的就是：（一）加強工人階級底陣地，（二）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以內的領導作用，（三）消滅階級與消滅階級社會。凡對於工農聯盟作另外的瞭解，那就是機會主義，孟塞維主義，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做什麼都可以，不過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過不是列寧主義。

怎樣可以使工農聯盟底思想與列寧關於農民是『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這個著

名原理彼此相容呢？這裏沒有矛盾嗎？這裏的矛盾，不過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實際上，在這裏並沒有絲毫矛盾。列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裏曾經把農民說成爲「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同是在這個報告裏，他又再三說明工農聯盟底必要，他說，「專政底最高原則——這就是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以便使無產階級能夠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顯然的，無論如何，列甯不認爲這裏有絲毫矛盾。

列甯說：農民是「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對於這個原理，應當怎樣來解釋呢？這不是說農民是由資本家組成的嗎？不，不是的，這是說，第一，農民是一個特別的階級，牠把自己的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權基礎上，因此，牠與無產階級不同，因爲無產階級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權基礎上的。這是說，第二，農民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從自己隊伍中分化出，產生着和培養着資本家，富農以及一般的各種各樣的剝削者。

這種情形不是擺在工農聯盟組織事業面前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嗎？不，不

是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之下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並不是與全體農民的聯盟。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就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的聯盟。不與農民資本主義份子作鬥爭，不與富農作鬥爭，這樣的聯盟是不能實現的。不組織貧農——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這樣的聯盟是不能鞏固的。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現有的條件之下的工農聯盟，只有在列寧底下面的一個著名的口號之下方能實現，這個口號就是：去倚靠貧農，去與中農成立堅固的聯盟，一分鐘也不要停止與富農的鬥爭。因為只有實行這個口號，才能把農民基本羣衆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底軌道上來。

這樣一來，你們就可以看到，列寧底兩個公式間的矛盾，不過是意想中的，似是而非的矛盾。實際上，在牠們中間，是沒有絲毫矛盾的。

列寧和關於與中農聯盟問題

——給S同志的回信——

S同志！

把列寧在他的那篇關於蘇洛卿的著名論文裏所提出的一個口號——『善於達到與中農的協定，同時連一分鐘也不放棄與富農的鬥爭和只是堅固地倚靠着貧農』，看作是『貧農委員會時期』底口號，看作是『所謂中立中農時期末尾』底口號，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貧農委員會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成立的。到一九一八年十月末，我們在鄉村中的勢力已超過富農，中農已經轉向蘇維埃政府方面。在這個轉向底基礎上也就產生了中央委員會底決議，決定取消蘇維埃與貧農委員會這兩個政權並存制，決定改選鎮蘇維埃和村蘇維埃，決定把貧農委員會溶化在新選出的

本文內容，略有刪減。——斯大林註。

蘇維埃內，因而就是決定取消貧農委員會。大家知道，這個決議在蘇維埃方面的規定，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號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我這裏所說的就是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號所通過的那個關於改選鎮蘇維埃和村蘇維埃以及把貧農委員會溶化在蘇維埃內的決議案。而列寧在自己的那篇標題爲蘇洛腳底寶貴的自供的論文裏，宣佈了與中農協定的口號以代替中立中農的口號，這篇論文是在什麼時候發表的呢？牠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號發表的，就是說，差不多是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這個決議案以後兩星期的時候才發表的。列寧在這篇論文內簡直說道：我們之所以採取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因爲中農已轉向到我們這方面來了。請看列寧底話：

「在鄉村裏，我們的任務，就是消滅地主，打破剝削者和富農投機家底反抗；爲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只能堅固地倚靠半無產者，倚靠「貧農」。可是中農不是我們的敵人。他過去動搖過，現在動搖着，將來還會動搖；影響動搖者的任務與推倒剝削者及戰勝積極敵人的任務並不是一樣的。善於達到與中農的協定——同時連一分鐘也不放棄與富農的鬥爭

和只是堅固地倚靠着貧農——這是現時的任務，因為正是現在，由於上述的那些原因，中農轉向到我們這方面來乃是必不可免的事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九四頁）

從這裏就要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裏得出的結論就是，列寧底口號不是關係於舊時期，不是關係於設立貧農委員會和中立中農時期，而是關係於新時期，與中農協定的時期。這樣一來，他所反映的就不是舊時期底末尾，而是新時期底初頭。

可是，你關於列寧口號的那種斷言，不僅是在形式上不對，不僅是在年月方面不對，而且在實質上也不對。大家知道，列寧底這個與中農協定的口號，這個新口號，在我們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三月）已成爲全黨宣佈的口號。大家知道，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就是這樣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給我們與中農作堅固聯盟的政策奠定了基礎。大家知道，我們的黨綱，蘇聯共產黨底黨綱，

* 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也是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的。大家知道，這個黨綱內，有幾項是專門關於黨對鄉村裏各個集團的態度：對貧農，對中農，對富農的態度的。在聯共黨綱底這幾項內，關於鄉村中的各個社會集團，關於黨對他們的態度，說了一些什麼話呢？請聽罷：

「俄國共產黨，在自己的整個農村工作裏，照舊還是倚靠着農村裏的無產階級的和半無產階級的力量，首先就要把他們組織為獨立的力量，在農村裏成立黨的支部，成立貧農組織，成立農村無產者與半無產者底特別式樣的職工會等等，竭力使他們與城市無產階級接近，竭力使他們擺脫農村資產階級和小私有財產利益底影響。

俄國共產黨對富農階級，對農村資產階級的政策就是堅決反對他們的剝削者的企圖，鎮壓他們對於蘇維埃政策的反抗。

俄國共產黨對中農的政策就是漸漸地和有計劃地吸收他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工作。黨底任務就是使中農離開富農，仔細關心他的需要，這樣來把他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在思想上影響的辦法，而絕對不是用鎮壓的辦法來與他的落後思想鬥爭，在一切與他的切

身利益有關係的地方，都要努力與他作切實的協定，在決定關於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的時候，向他讓步。*』（請參看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五一頁）

請你試一試，來在黨綱底這幾項條文與列寧底口號之間找出即使是最小的，即使是字句上的分別罷！你是找不出這樣的分別的，因為根本就沒有這種分別。而且，絲毫不可懷疑的，就是列寧底口號不僅與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不相矛盾，而且反而是這些決議底最精確的和最妥當的措辭。須知事實是這樣，就是聯共黨綱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在我們黨底專門討論了中農問題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而列寧底那篇反對蘇洛卿的論文，那篇宣佈了與中農協定的口號的論文，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報章上發表的，是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前四個月發表的。

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完全肯定了列寧在他那篇爲反對蘇洛卿而作的論文內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所宣佈了的口號，認為這是黨在整個現今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內，在自己的農村工作裏所應該拿來當作指南的一個口號，這難道不是很明顯的事嗎？

列寧這個口號底要在什麼地方呢？

列寧這個口號底要旨就是，他極其正確地抓到了黨的農村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這個任務表現在下面這樣的一個個簡短的公式裏：（一）去倚靠貧農，（二）去與中農成立協定，（三）一分鐘也不要停止與富農的鬥爭。請試一試，從這個公式內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來作現今農村工作底基礎，而忘記牠的其餘的部分——那時候你就一定要弄到走途無路的地步。在現今的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底條件下面，不倚靠貧農和不與富農進行鬥爭，是不是可以和中農建立真正的和堅固的協定呢？是不可能的。在現今發展底條件下面，不倚靠貧農和不與中農成立協定，是不是可以與富農作有成效的鬥爭呢？是不可能的。怎樣去最中肯地把黨的農村工作底這個三位一體的任務在一個概括的口號裏表現出來呢？我想，列寧底口號是這個任務底最中肯的表現。應當承認，誰也不能比列寧說得更中肯些……。

爲什麼正是在現在，正是在農村工作底現今條件下面必須着重指出列寧這個口號底妥當性呢？

因爲，正是在現在，可以看見個別同志有這樣的傾向：就是想把黨的農村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撕成幾部分和把這些部分弄得彼此脫離。這一種情形已由今年一二月間我們的糧食採辦運動底實際工作所完全證實了。應當與中農成立協定——這是在所有的布爾塞維克都知道的。可是要怎樣成立這個協定呢——這就不是每個人都懂得的了。有些人想用拒絕與富農的鬥爭或是減弱這種鬥爭的辦法來成立與中農的協定：據他們說，與富農的鬥爭可以嚇去一部分中農，即那部分豐裕的中農。另外有些人想用拒絕組織貧農的工作或者減弱這種工作的辦法來成立與中農的協定：據他們說：組織貧農的工作弄得使貧農獨豎一幟，這樣，就可以把中農從我們這裏離開。這樣離開正確路線的結果，就弄得忘記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就是忘記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級，忘記只有與富農作堅決的鬥爭和加強在貧農裏的工作，才能使與中農協定堅固起來，忘記沒有這些條件中農就可以認爲富農是強者而動搖到

富農方面去。請記起列寧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

『必須決定對那個沒有一定不移的堅固立場的階級的關係。無產階級大多數都贊成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大多數都反對社會主義，決定這兩個階級間的關係是容易的。可是當我們講到中農這樣的階層時，那就知道，這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局部地是私有主，局部地是勞動者。他不剝削別的勞動者。他在數十年內費了極大的力量來維持自己的地位，他親自受了地主和資本家底剝削，他忍受了一切痛苦；而同時他又是私有主。因此我們對待這個動搖的階級的關係是有莫大的困難的。』（請參看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〇〇頁）

可是也有另外的離開正確路線的傾向，這些傾向底危險性並不比上述的傾向少些。有這樣的現象，就是有人進行着反富農的鬥爭，可是進行得這樣拙劣，這樣粗率，以致打擊到貧農和中農頭上來了。結果富農還是沒有受損傷，而與中農聯盟的事業却發生了裂痕，而一部分貧農竟暫時落在進行着反蘇維埃政策的鬥爭的富農爪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牙裏了。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有人企圖把反富農的鬥爭變爲剝奪富農，而把糧食採辦工作變爲糧食徵收，他們忘記了，在我們這樣的條件下面剝奪富農乃是一件蠢事，而糧食徵收並不是與中農聯盟，而是與中農鬥爭。

這些離開黨底路線的傾向是由於什麼東西產生出來的呢？

是由於不懂得，黨的農村工作底三方面的任務是一個單一的和分不開的任務。是由於不懂得，決不可以把與富農鬥爭的任務和與中農協定的任務分開，決不可以把這兩個任務和將貧農變爲黨在農村中的支柱的任務分開*。

*從這裏就得出結論說，離開正確路線的傾向，給工農聯盟事業造成兩種危險：一方面的危險就是由於有些人想把（舉例說）糧食採辦方面的臨時非常辦法變爲黨的經常或長久的方針；另一方面的危險就是由於有些人想利用取消非常辦法這件事情來放縱富農，來宣佈貿易底完全自由，使貿易不受國家機關底調節。因此，爲要保證正確的路線，就必須要有兩條戰線上的鬥爭。

我還要順便指出，就是我們的出版物並不時常都遵守這個規則，而有時却表現出一些片面態度。例如，有這樣的情形：人們揭露了這樣一種人，這種人想把糧食採辦方面的臨時非常辦法變爲我們的政策

做些什麼呢？

爲要使這些任務在我們的日常的農村工作過程中不致彼此互相脫離，那就須要爲要達到這點，至少須要發出這樣一個領導的口號，這個口號要能夠把這一切

底經常方針，因而使聯絡發生危險。這種揭露是很好的。可是不好的和不對的就是他們同時却不充分注意到和不好好揭露那些從另一邊威脅聯絡的人，不揭露這一種人，這種人受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影響，要求減弱與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和規定貿易完全自由，使其不受國家所調節，因而從另一端來破壞聯絡。這就不好了。這是片面態度。

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人們揭露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否認（舉例說）振興個體的小農的和中農的農莊（在現今階段上是農業底基礎）底可能性和安當性。這種揭露是很好的。可是，不好的和不對的，就是他同時却不揭露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忽視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意義而不懂得，在現時，振興個體的小農的和中農的農莊的任務，應當在實際上拿振興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建設的任務來作補充。這就是片面態度了。

爲要保證正確的路線，須要進行兩條路線上的鬥爭和拋棄任何的片面態度。

任務合併爲一個總的公式，因而不致使這些任務彼此互相脫離。

在我們黨的軍械局內是不是有這樣的公式，這樣的口號呢？

是有的。這樣的公式就是列寧底口號：『善於達到與中農的協定，而同時連一分鐘也不放棄與富農的鬥爭和只是堅固地倚靠着貧農。』

因此我認爲，這個口號是最妥當的和包羅一切的口號，認爲正是在現在，正是在農村工作底現今條件下面，須要把牠提到第一位。

你認爲列寧底口號是『反對派的』口號而在你的信內發問道：『這一個反對派的口號，公然在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一號的時候，在真理報上登載出來了，這樣的事情怎麼會發生的呢？爲什麼這個口號在聯共中央委員會底機關報真理報上出現了，這是否只是技術上的疏忽，或者是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的妥協呢？』不消說，話到是說得氣勢凶凶的！S同志，可是，總還是請你在『轉彎地方』慎重一點罷，免得你在氣頭上得出結論說要禁止刊印我們的黨綱，而這個黨綱是完全證實了列寧底口號（是事實呵！）的，基本上是由列寧（絕對不是反對派！）起草的和由我們

黨的（也不是反對派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請多尊重我們的黨綱上面關於農村裏各個社會集團的那些著名的條款吧！請多尊重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吧！……至於你說『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妥協』，那末，我以為這句話簡直不值一駁，這句話大概是你冒火說出來的。

使你難過的，大概是這樣的情形，就是在列寧底口號以及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聯共黨綱上面說的是與中農協定，而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底開幕辭內講的却是與中農的堅固聯盟。你大概認為在這裏有什麼矛盾。也許你甚至還想作這樣的設想，以為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一種什麼離開與中農聯盟的政策的东西。這是不對的，S同志。這是一個大的迷誤。只有那些會讀口號底字面而不會考究口號底意思的人，纔能這樣想。只有那些不知道關於與中農聯盟，關於與中農協定這個口號底歷史的人，纔能這樣想。能這樣想的只有這樣一種人，這種人以為：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辭內說與中農『鞏固聯盟』的政策，而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的另一篇演說內以及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內却又說我們現在需要與中農『協定』

的政策，這就表示列寧在這裏是自相矛盾的。

事情底本質，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事情底本質是在於，列寧和代表全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並不認爲在『協定』與『聯盟』這兩個概念中間有絲毫分別。事情底本質是在於，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一切演說內，到處都把『聯盟』和『協定』這兩個概念當作相等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對中農的態度』的決議案也是一樣，那裏把『協定』和『聯盟』這兩個概念當作是相等的。因爲列寧和黨認爲與中農協定的政策，並不是一個偶然的和很快就成過去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政策，他們曾經有，而且現在還有完全的理由來把與中農協定的政策稱爲與他堅固聯盟的政策，反轉來說，他們曾經有理由，而且現在還完全有理由來與把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稱爲與中農協定的政策。只要讀一讀我們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底速記錄及這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案，就可以深信這一點。

請看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辭裏的一段話。

「因爲蘇維埃工作人員沒有經驗，因爲問題困難，用來對付富農的打擊往往落到了中

農身上。我們在這裏犯了非常大的過錯。在這方面集合起來的經驗，將幫助我們來採取一切辦法以便在今後避免這樣的情形。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你們很是知道：這個任務是困難的。我們這裏沒有什麼幸福可以給與中農，而中農却是物質主義者，實際主義者，他要求具體的物質幸福，這種幸福是我們現在所拿不出來的，而國家也許還要在沒有這些幸福的情況下面，來渡過那個在現在已表明有完全勝利希望的艱難鬥爭底月份。但是，我們在我們的行政的實際工作裏，可以做出很多的事情：改善我們的機關，改正許多濫用職權現象。我們可以而且應當糾正和改正我們黨的路線——沒有充分注意到與中農聯盟，與中農協定*的路線。」（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二〇頁）

可見，列寧並沒有認為「協定」與「聯盟」之間有絲毫分別。

請看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對中農的態度」的決議案內的一段話：

「把中農和富農混淆起來，把反對富農的辦法在這種或那種程度上推行到中農身上，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這就不僅是最粗魯地違背蘇維埃政權底一切法令和牠的全部政策，而且是最粗魯地違背共產主義底一切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指出，無產階級在爲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決鬥時與中農的協定，是平安過渡到消滅任何剝削的條件之一。

因爲農業技術比較工業落後的緣故——莫說在俄國，就是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也是這樣，——中農是具有比較堅固的經濟根蒂的，所以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始以後，中農還會支持到很久的時間。因此，蘇維埃工作人員和黨的工作人員在農村裏的策略，應該是在長時期裏與中農實行合作……。

……這樣，蘇維埃政權在農村裏的完全正確的政策，便保證勝利的無產階級與中農的聯盟和協定……

……工農政府及共產黨底政策，以後也是應當本着這種由無產階級及貧農去與中農協定的精神進行的。』（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七〇頁到三七二頁）
可見，議決案也沒有認爲在『協定』與『聯盟』之間有絲毫分別。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不妨還指出一點，就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底這個決議案內，沒有一個字講到與中農的『堅固聯盟』。可是，這是不是說，決議案因此就離開了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呢？不，不是的。這只是說，決議案認為『協定』『合作』的概念與『堅固聯盟』的概念是相等的。這是顯而易見的：沒有與中農的『協定』，就不能有與中農的『聯盟』，而要是沒有與中農的『長期的』協定和合作，那末，與中農的聯盟就不能是『堅固的』了。

事實就是這樣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列寧和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違背了列寧關於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意見，或者是須要拋棄這種不認真的推測，而來承認，列寧和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並沒有認為『協定』與『堅固聯盟』這兩個概念之間有絲毫分別。

總之，誰要是想做專門咬文嚼字主義底犧牲品，誰要是想考究列寧關於倚靠貧農，關於與中農協定和關於與富農鬥爭這個口號底意義，他就不會不懂得，與中農協定的政策就是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

你的錯誤就在於，你沒有懂得反對派底拐騙的圈套，聽信了他們的謠言，落到敵人替你掘好了的陷阱。反對派的騙子們在那裏大喊大叫，要別人相信，說他們是贊成列寧關於與中農協定的口號的，同時他們故意作出造謠生事的暗示，說與中農的『協定』是一回事，而與中農的『堅固聯盟』却是另一回事。他們想這樣來一舉兩得：第一，隱瞞自己關於中農問題的真正立場，這種立場底內容就是不與中農協定，而是『與中農分裂』（請參看反對派斯米爾諾夫底著名的演說，這篇演說詞我在莫斯科省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上已引證過了）；第二，利用『協定』與『聯盟』間的虛構的分別來擒拿布爾塞維克裏的那些頭腦簡單的人，完全迷住他們，推着他們離開列寧。

而我們的有些同志是怎樣應付這一點的呢？他們並不去撕破反對派騙徒們底假面具，並不去揭破他們對黨隱瞞自己的真正立場的欺騙行為，——却反而去上圈套，滾進陷阱，讓別人推着他自己離開列寧。反對派大呼大擂，高聲談論列寧底口號，反對派份子把自己裝成擁護列寧口號的人，——因此我應當避開這個口號，以

便使別人不致把我混在反對派一塊，不然人家就可以說我和『反對派妥協』，——這些同志底想法就是這樣的！

而且這還不是反對派拐騙手段底唯一的例子。例如，拿自我批評的口號來講。在爾塞維克不能不知道，自我批評的口號是我們黨的行動底基礎，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是布爾塞維克培養幹部的方法底精華，反對派高聲叫喊，要別人相信，說自我批評的口號是他們（反對派）想出來的，說黨是從他們那裏襲取了這個口號，而這樣一來，黨就向反對派投降了。反對派這樣幹法，至少是想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想瞞着工人階級，使工人階級不能知道，在以破壞黨性爲目的的反對派的自我批評和以鞏固黨性爲目的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中間，是隔着一條鴻溝；第二，——使某些頭腦簡單的人走上圈套并逼迫他們避開黨的自我批評的口號。

而我們的某些同志是怎樣應付這一點呢？他們並不去撕破反對派騙子底假面具和堅持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口號，——却反而落入陷阱，離開自我批評的口號而聽受反對派底支配，……向牠投降而同時却錯誤地設想，以爲他們是避開反對派

了。

這樣的例子本來可以引出一大堆。

可是，我們在自己的工作中是不能聽受任何人底支配的。我們尤其不能在自己的工作中以反對派對於我們的批評爲指南。我們應當走自己的道路，既申斥反對派底撈騙行爲，也申斥我們的個別的上了反對派挑撥圈套的布爾塞維克底錯誤。請記起馬克思底話：『一心按照着你自己的道路走，讓人們隨便怎樣去說吧！』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真理報第一五二期。

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全體聯席會議上的演說辭——

同志們，我以為，首先就要撇開小事情，撇開個人問題等等，以便解決那個引起我們注意的右傾問題。在我們黨內是不是有右傾的，機會主義的危險；是不是存在着有利於這種危險的客觀條件；怎樣和這個危險鬥爭——這就是現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可是，如果我們不除淨那一切蒙蔽了這個問題的和妨礙着我們來瞭解問題實質的小事情和次要成份，那末，我們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查波爾斯基同志以為右傾問題是一個偶然問題，這是不對的。他斷定說，這裏的事情，並不在於什麼右傾，而完全是在於意氣鬥爭，在於個人野心等等。就暫時假定，說這裏也同在任何鬥爭裏一樣，意氣鬥爭和個人野心是有幾許作用。可是拿意氣鬥爭來解釋一切，只看見意氣鬥爭，而不看見問題底本質，這就是離開正確的，

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決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就是像莫斯科組織這樣一個毫無疑義地是巨大的，年老的，團結一致的組織，會因為幾個意氣鬥爭者或野心家底努力而整個組織都被驚動了，都被推動了。不，同志們，天下是不會有這樣的怪事的。更不必說，對於莫斯科組織底力量和能力，是不可以這樣輕視的。在這裏發生了作用的，顯然是一些更深刻的原因，這些原因無論與意氣鬥爭，無論與個人野心，都是沒有關係的。

福翁托夫同志雖然是承認有右傾危險存在，可是他並不認為這個危險會值得由認真的正經人去認真研究，他這種態度也是不對的。照他這樣說來，右傾問題，原來是空喊家研究底對象，而不是正經人研究底對象。我完全懂得福翁托夫同志底意思，他是這樣忙於日常的實際工作，以至沒有工夫來想到我們的發展前途。可是這還不是說，我們應當把某幾個黨務工作人員底狹隘的和求實的實踐主義變為我們的建設工作底教條。健全的實際主義本來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如果牠在工作中間失掉前途和不使自己的工作服從黨的基本路線，——那末，牠就會變為壞事情了。可是

不難明白，右傾問題就是我們黨底基本路線問題，就是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所規定的發展前途，究竟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呢。

有些同志在討論關於右傾的問題的時候，把問題完全着重在代表右傾的個人身上，這些同志也是不對的。他們說，請指出右傾份子或調和份子來，請說出他們的姓名來，以便使我們可以來對付他們。這樣提出問題，是不正確的。個人當然是有相當的作用。可是，這裏的事情並不在於個人，而是在於產生黨內右傾危險的那些條件和那種環境。可以把個人排除，但是這還不是說，我們這樣就算掘毀了黨內右傾危險底根源。所以關於個人的問題雖然也確實有意思，可是他並不能解決事體。

說到這裏，使我不能不憶起奧德沙地方的一件故事，這是一九一九年末和一九二〇年初的事情，那時我們的軍隊將鄧尼金底軍隊逐出了烏克蘭，完全打敗了奧德沙區內鄧尼金軍隊底最後殘部。那時有一部份紅軍兵士在奧德沙忿然搜尋了協約國，因為他們相信，如果他們拿獲了協約國，戰爭就會終結了（全場發笑）。就假定說紅軍兵士，當時是在奧德沙拿獲了協約國底某個代表。可是，關於協約國的問題

當時是不會因此而解決的，因為雖然那時奧德沙是鄧尼金隊伍底最後一塊地盤，可是，協約國底根源並不在於奧德沙，而是在於世界資本主義。關於我們的某些同志也可以這樣說，這些同志在關於右傾的問題上把事體着重在代表右傾的個人上，同時却忘記了產生這種右傾的條件。

所以，在這裏，我們首先應當說明的，就是關於離開列寧路線的右傾和「左」傾（託洛茨基主義的傾向）產生底條件問題。

在資本主義底條件下面，共產主義裏的右傾，就是一部份共產黨人底一種傾向，偏向，固然是沒有正式形成的，也許是還沒有覺悟到的，可是畢竟是一種偏向——離開馬克思主義底革命路線而走向社會民主黨方面去的偏向。既然有些共產黨員認為選舉鬥爭中的「階級反對階級」的口號是不妥當的（法國）；或者起來反對共產黨提出自己的單獨的候選名單（英國），或者不願着重提出與「左派」社會民主黨作鬥爭的問題（德國）以及諸如此類等等，——那末，這就是說，在共產黨以內，是有人正在極力想使共產主義去遷就社會民主主義。如果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

內的右傾得到勝利，那麼，這就會使共產黨在思想上被人粉碎，使社會民主主義大大加強。而社會民主主義底大大加強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資本主義底加強和鞏固，因為社會民主黨是資本主義在工人階級裏的主要支柱。所以，如果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得到勝利，那末，這就會使那些爲保存資本主義所必需的條件日益增長起來。

在蘇聯發展底條件下面，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已經被推翻，可是資本主義底根蒂還沒有被拔除的地方，共產主義裏的右傾，就是一部份共產黨人底傾向，偏向，固然是沒有正式形成的，也許是還沒有覺悟到的，可是畢竟是一種偏向——離開我們黨底總路線而走向資產階級思想方面去的偏向。既然在我們這裏，有些共產黨員企圖拉着我們黨離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底決議而往後退，否認有向農村資本主義成份進攻的必要，或者是要求縮小我們的工業，認爲現時的工業發展速度，是足以使國家滅亡的，或者是認爲撥款發展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是不妥當的，是在費金錢，或者是認爲在自我批評底基礎上與官僚主義鬥爭是不妥當的，認爲自我批評

可以掘動我們的機關底根基，或者是要求減弱對外貿易底壟斷以及諸如此類等等，——那末，這就是說，在我們黨內，是有人在企圖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去遷就（也許自己不覺得）『蘇維埃的』資產階級底胃口和需要。如果我們黨內的右傾得到勝利，那末，這就會使我們國內的資本主義成份大大加強。而我們國內資本主義成份底加強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減弱和資本主義恢復機會底加強。所以，如果我們黨內的右傾得到勝利，這就會使那些爲恢復我們國內的資本主義所必要的條件增長起來。

在我們蘇聯國家內，是不是存在着使資本主義底恢復（復辟）成爲可能的事情的條件呢？是存在着的。同志們，這也許好像是很奇怪的，可是這却是事實。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並加以加强的速度發展着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同時將農民經濟與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工業聯絡起來。可是我們還沒有拔出資本主義底根蒂。這些根蒂到底是深藏在什麼地方呢？牠們是深藏在商品生產裏，深藏在城市的和特別是在農村的小生產裏。資本主義底力量，如列寧所說的，是在於

『小生產底勢力，因為，可惜得很，小生產在世界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則經常地，每日每時，自發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顯然的，既然我們這裏的小生產是具有大批的甚至於是優越的性質，既然牠經常地和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面，——那末，我們這裏就有使資本主義底恢復成爲可能的事情的條件。

在我們這裏，在我們的蘇維埃的國家內，是不是存在着爲消滅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性所必要的工具和力量呢？是存在着的。列寧關於在蘇聯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的提綱，其所以是正確的，正因為牠是以這一點爲基礎的。爲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需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工農聯盟，根據國家工業化底觀點來發展我們的經濟命脈，用很快的速度來發展工業，使國家電氣化，將整個國民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使農民大批合作化和提高農民經濟底收成額，漸漸使個人的農民農莊聯合成爲公共的農莊，發展蘇維埃農莊，限制和克服城市和鄉村裏的資本主

義成份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請看列寧關於這一點所說的話：

『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民的國家裏的時候，在俄國，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基礎是比共產主義所有的更加堅固的。這是必需記着的。凡是細心考察過農村生活和將牠與城市生活作過比較的人，都知道，我們還沒有拔出資本主義底根蒂，我們還沒有掘動國內敵人的基礎。國內敵人支持在小經濟上面，爲要掘動牠底基礎，就只有一個方法——這就是把全國底經濟——農業也在內，都轉移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移到現代大生產底技術基礎上。只有電氣，才是這樣的技術基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不然，國家就仍舊還是小農民的國家，我們須要明白覺悟到這一點。不僅在世界範圍內，而且在國內，我們都比資本主義軟弱些。這是大家所知道的。我們已經覺悟到這一點，而且一定會做到這一步，就是使經濟基礎從小農民的過渡爲大工業的。只有當國家已經電氣化的時候，當工業，農業及運輸業都有現代的大工業底技術基礎的時候，——只有在這時候，我們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到第四七頁）

由此可見，第一，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民的國家裏的時候，當我們還沒有拔出資本主義底根蒂的時候，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基礎是比共產主義所有的更加堅固的。可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把樹砍倒了，而樹根子却還沒有拔出，因為力量不夠的原故。由此也就產生出在我們國家內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性。

由此可見，第二，除了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性以外，在我們這裏還有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性，因為我們能夠消滅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性，能夠拔出資本主義底根蒂和達到澈底戰勝資本主義，如果我們努力進行使國家電氣化的工作，如果我們給工業，農業，運輸業建立起現代大工業底技術基礎的話。由此也就產生出在我們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性。

最後，由此可見，不可以只是在一個工業裏面建設社會主義，而同時却使農業服從自發的發展，以為農村『自己會跟着』城市走。城市裏社會主義底工業存在，就是農村裏社會主義改造底基本因素。可是，這還不是說，這個因素是完全足夠的。要使社會主義的城市能夠引導農民的農村到底，要做到這一步，就須要如列寧

所說的，『將國家底經濟，農業也在內，轉移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移到現代大工業底技術基礎上。』

列寧底上面這段話，不是與他所說的『新經濟政策完全保證我們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性』這段話相矛盾嗎？是不相矛盾的。恰巧相反，他們彼此是完全相符合的。列寧並不是說，新經濟政策給我們現成的社會主義。列寧只是說，新經濟政策保證我們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性，在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與社會主義底實在的建成之間，是有很大的差別的。不能把可能性與實在性混爲一談。正是爲要把這個可能性變爲實在性，正爲着這一點，列寧在上面那一大段話裏面，才主張國家電氣化，主張給工業，農業及運輸業建立起現代大工業底技術基礎，以作爲社會主義澈底勝利的條件。

可是要在一兩年內就要實現這個建成社會主義的條件是沒有可能的。不能在一兩年內就將國家工業化，建成強大的工業，使千百萬農民羣衆合作化，給農業建立起新的技術基礎，將個人的農民的農莊合併爲大的集體農莊，發展蘇維埃農莊，限

制和克服城市裏和鄉村裏的資本主義成份。要做到這一步，就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底多年的加緊努力的建設工作。當這一點還沒有做到的時候，——而這一點並不是一下子就做得到的，——我們便仍舊還是一個小農民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裏小生產經常地和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在這個國家裏資本主義恢復底危險還是存在的。而既然無產階級並不是生活在沒有人烟的孤島裏，而是生活在帶有各種複雜情形的最實在的和最實際的生活裏，所以在小生產基礎上生長着的資產階級的成份，是『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來從各方面包圍無產階級，用這種自發勢力來浸染無產階級，來腐化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內部經常重複發生小資產階級的無氣節性，渙散性，個人主義，由醉心轉為灰心的心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三六頁），並這樣把相當的猶豫，相當的動搖，帶進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裏面去。

我們黨內各種動搖和各種離開列寧路線的傾向，其根源和基礎就在這裏。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關於我們黨內的右傾或『左』傾問題，不能認為是微

小的問題。

我們黨內的右的，公開的機會主義的傾向底危險，是在於什麼地方呢？是在於這個傾向不充份估計我們敵人底力量，資本主義底力量，看不見資本主義恢復底危險，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面的階級鬥爭底關鍵，因而就這樣輕易去向資本主義讓步，要求降低我們工業發展底速度，要求緩和對待農村裏和城市裏的資本主義份子，要求把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的問題推到後面去，要求減弱對外貿易壟斷制以及諸如此類等等。毫無疑義的，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得到勝利，那末，這就會放縱資本主義底勢力，就會破壞無產階級底革命立場，就會提高資本主義在我們國家裏恢復起來的機會。

我們黨內「左」傾（託洛茨基主義派的傾向）底危險是在於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於牠過份估計我們敵人底力量，資本主義底力量，只看見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而看不見有用我們國家底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陷於絕望地步而不得不拿這樣的空談——說我們黨正在特米多爾化——來安慰自己。列寧說「當我們還生活在小

農民的國家裏的時候，在俄國，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基礎是比共產主義所有的更加堅固的』，——從列寧底這句話當中，『左的』傾向就作出那種不正確的結論，說在蘇聯根本就不可以建成社會主義，說對農民是一點沒有辦法的，說工農聯盟底思想是已經失去時效的思想，說要是沒有西歐已經勝利的革命趕快來幫忙，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就必會倒台或是蛻化，說如果不採納超工業化底幻想計劃——那怕就是用與農民分裂的代價來實行的計劃，——那末，社會主義底事業便應當認為是已經滅亡的了。因此就有『左』傾政策中的冒險主義。因此就有政策中的『超人類的』躍進。毫無疑義的，如果『左』傾在我們黨內得到勝利，那末就會使工人階級脫離自己的農民基礎，使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脫離其餘的工人羣衆，——因而使無產階級遭受失敗，使恢復資本主義的條件易於形成。

可見這兩個危險，無論是『左的』或是右的危險，這兩個離開列寧路線的傾向，無論是右傾，或者是『左』傾，雖然各從不同的兩端出發，而牠們兩者所引起的結果，却總是一樣的。

在這兩個危險中間，那一個壞些呢？我以為兩個都是很壞的。站在與牠們作順利的鬥爭底觀點來說，這兩個傾向中間的差別就在於，在我們底黨看來，『左』傾現時是比右傾明顯些。我們與『左』傾已經作了幾年的加緊努力的鬥爭，——這種情形，當然不能不給我們黨許多益處。顯然的，在與『左的』託洛茨基主義傾向作鬥爭的幾年中，我們的黨已學會了許多東西；用『左的』辭句來欺騙我們的黨，已經不是容易的事情了，至於說到右傾危險——這個危險，從前也是存在過，現在由於因去年糧食採辦危機而使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加強的原故，所以更加公開暴露出來，——那末我認為右傾危險，對於我們黨內某些黨員還不是很明顯的。因此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一分鐘也不減弱與『左的』，託洛茨基主義的危險作鬥爭，同時却着重與右傾作鬥爭，並盡力設法做到這一步，就是務必使這個傾向底危險，由我們的黨看起來，是與託洛茨基主義的危險一樣明顯。

右傾問題，如果牠不是與我們發展中的困難問題有聯繫，也許不會像現在這樣緊張。可是事情底本質也就在於，右傾底存在，加深我們的發展過程中的困難，阻

難着我們去克服這些困難。正因為右傾危險是阻難着我們克服困難的鬥爭，正因為這樣，所以在我們看來，關於克服右傾危險的問題是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現在要關於我們的困難底性質問題說幾句話，應當注意，我們的困難不是停頓過程中的或衰落過程中的困難。有經濟衰落過程中或經濟停頓過程中的困難，而在發生這種困難的時候，人們總是努力把經濟停頓現象弄得比較不這樣沉重，或使經濟衰落狀況比較不這樣深刻。我們的困難，是絲毫不像這樣的困難的。我們的困難底特點就是在於，牠們是高漲過程中的困難，發展過程中的困難。當我們這裏講到困難的時候，我們通常所講的，都是關於要把工業提高百分之幾，要把耕種面積增加百分之幾，要把收成率增加多少普特以及諸如此類等等。正因為我們的困難是高漲過程中的困難，而不是衰落過程中或停頓過程中的困難，正因為這樣，所以這種困難對於黨是不會有什麼特別危險的。可是困難到底還是困難。正因為要克服困難就需要緊張一切力量，需要有堅固性和穩定性，而堅固性和穩定性並不是每個人都夠有的，這也許因為有人覺得疲倦和疲勞了，或者因為有人寧願安靜些過活，不願

有鬥爭和噪鬧，——正因為是這個原故，於是就發生猶疑和動搖，向着抵抗力最小的方面走，說要減低工業發展底速度，說要寬待資本主義份子，否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并根本否認一切超出日常工作尋常環境和安靜環境的東西。可是我們如果不克服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便不能向前進展。而為要克服困難，首先就必須打倒右傾危險，首先就必須克服右傾。因為右傾阻礙與困難鬥爭的事業並企圖搖動我們黨的那種為要克服困難而鬥爭的意志。這裏所講的，當然是與右傾作真正的鬥爭，而不是口頭上的，紙上的鬥爭。我們黨內有些人，因為怕良心上過不去，所以也不拒絕宣佈與右傾危險作鬥爭，好像傳教師有時唱唸『上帝至善，上帝至善』一樣，可是並不採取任何實際辦法來把與右傾的鬥爭放在應有的基礎上和在事實上克服這個右傾。這樣的派別，在我們這裏就做對公開機會主義的右傾採取調和態度的調和派。不難明白，與這種調和態度鬥爭，是與右傾，與右傾危險的總鬥爭底組成部份。因為不與庇護機會主義者的調和態度作有系統的鬥爭，便不能克服右的，機會主義的傾向。

關於右傾底代表人物的問題，固然並不能解決事情，但確實是有意義的。我們有過這樣的情形，就是在去年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發生危機的時候，我們在黨的下層組織裏會碰到右傾危險底代表人物，當時，在村鎮裏有好些共產黨員起來反對黨底政策，實行與富農份子聯絡起來。你們知道，這種份子在今年春季已被我們清出我們的黨以外，這一點，在今年二月間，已經在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底一個著名的文件裏特別提到了。可是如果說我們黨內再沒有剩下這種份子，那就不對了。如果往上面去看看黨的縣組織和黨的省組織，仔細考察蘇維埃機關和合作社機關，那末，你用不着花費什麼工夫就可以在這裏找到右傾危險底代表人物以及對這個危險取調和態度的調和派底代表人物。大家知道有我們黨的機關和蘇維埃機關好些工作人員底『信』，『申明書』及其他的文件，在這些東西裏面，右的傾向，表現得十分鮮明。你們知道，在中央委員會七月全會底速記錄上曾提到了這些信和文件。如果再往上去看看並提出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問題，那麼就須要承認，在中央委員會底委員裏面，也有一些對右傾危險取調和態度的份子，固然，這些份子是極少的。中央委

員會七月全會底速記錄就是這一點底直接證明。在中央政治局內又是怎樣的呢？在中央政治局內有沒有什麼傾向呢？在我們中央政治局內，也沒有右派，也沒有左派，也沒有對他們取調和態度的調和派。這是應當在這裏十分肯定地說明的。黨內不良份子及各種反對派散佈謠言，說我們中央政治局內有右傾或對右傾的調和態度；這種謠言是應當拋棄的。

在莫斯科的黨組織裏或牠的上層機關莫斯科委員會內，是不是有過動搖和猶疑呢？是有過的。要是現在斷定說那裏未曾有過猶疑和動搖，那就愚蠢極了。彭可夫同志底誠懇的演說辭，就可以直接證明這一點。彭可夫同志并不是莫斯科組織和莫斯科委員會裏的最後的一個人。你們聽見了，他直接地和公開地承認了他在我們黨的政策底許多極重要問題上面所犯的錯誤。當然，這並不是說，莫斯科委員會整個都發生過動搖。不，不是的。像今年十月莫斯科委員會告莫斯科組織底全體黨員書這樣的文件，無疑義地是證明，莫斯科委員會已克服了自己的某些委員底動搖。我不懷疑，莫斯科委員會底引導核心是會能夠澈底糾正現狀的。

各區的組織曾經干涉了這件事情，曾提出了要剷除莫斯科組織裏某些領導人底錯誤和動搖的問題，而有些同志對於這一點便表示不滿意。我不知道，這裏的不滿意可以拿什麼來做理由。莫斯科組織裏的各區的積極份子們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要求剷除錯誤和動搖，這有什麼壞處呢？難道我們的工作不是在自下的自我批評情況中進行的嗎？自我批評可以提高黨的和一般的無產階級的下層份子底積極性，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要是各區積極份子曾經能盡自己的責任，這又有什麼壞的或危險的東西呢。

中央委員會干涉了這回事情，這是不是做得對呢？我以為中央委員會是做得對的。伯爾津同志認為，中央提出關於撤換一個曾被區組織所反對的區的領導人問題，這是做得太激烈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可向伯爾津同志提起關於一九一九或一九二〇年的幾件小事，那時有幾個中央委員在黨的路綫方面犯了幾個錯誤，我想是不很嚴重的錯誤，而依列寧底提議就受了處罰以警告大家，其中一個人被派往土耳其斯坦，而另一個人幾乎是被取消了中央委員底資格。列寧當時是不是做得對

呢？我以為他是做得完全對的。那時中央委員會裏面的情況不像現在這樣。當時有一半中央委員是跟着託洛茨基跑的，而中央委員會本身裏面的情況是不穩固的。現今中央委員會底做法已經是柔和得多了。爲什麼呢？也許我們想比列寧慈善些吧？不，事情底本質不在這裏。事情底本質是在於，現今中央委員會底情況比當時穩固些，所以中央現在有比較柔和些去做的可能。沙哈洛夫同志說中央委員會干涉得太遲了，他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他之所以說得不對，是因爲他大概不知道，中央委員會底干涉，事實上是從本年二月起就開始了。沙哈洛夫同志可以信服這一點，如果他願意的話。固然，中央委員會底干涉沒有立刻就收到良好的結果。可是如果拿這一點去責備中央，那就奇怪了。

結論：（1）右傾底危險是我們黨內嚴重的危險，因爲牠的根源在於我們國家底社會經濟環境中；（2）右傾底危險，因有各種困難而加深，而不克服右傾及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便不能克服這些困難；（3）在莫斯科組織裏有過動搖與猶疑現象，有過不穩固的成份；（4）莫斯科委員會底核心，藉着中央委員會及各區積極

份子底幫助，已經採取了一切辦法去剷除動搖現象；（5）莫斯科委員會一定能夠克服以前所暴露了的錯誤，這是不能懷疑的；（6）任務就在於剷除內部的鬥爭，使莫斯科的組織團結一致，在擴展的自我批評基礎上順利地進行各支部底改選。

（大鼓掌）

關於共產黨(布)黨內的右傾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共產黨(布)中央全體會議上的演說辭底一部分——

一 階級的變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我們的意見分歧是在什麼地方，這些意見分歧是與什麼有聯繫呢？

我們的意見分歧首先是與我們國內及資本主義各國最近所發生的階級變動底問題有聯繫。有些同志認為，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是有偶然的性質。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們黨內之所以發生了意見分歧，是由於最近所發生的那些階級變動，那種階級鬥爭尖銳化，這種變動，這種尖銳化造成着發展過程中的轉變。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的主要錯誤，就在於這派人看不見這些變動和這個轉變，看不見而且不願看這些變動和這個轉變。本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新反對派就

不瞭解黨底和共產國際底新任務，而這種不瞭解就是新反對派特質。

新反對派底領導人，在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聯席會議上說話的時候，完全避開了關於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問題，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關於階級鬥爭底尖銳化，絲毫也沒有暗示說到我們的意見分歧正是與這種階級鬥爭底尖銳化有聯繫的，——同志們，你們是不是感覺到了這一點呢？他們講到了所有的事情，也講了哲學，也講了理論，但是，却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那些在現時決定着我們黨底方針和實際工作的階級變動。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怪事情呢？也許是因爲他們有健忘病罷。當然不是的！政治家是不會忘記主要的東西的。這是因爲，他們看不見和不瞭解現在我們國內以及資本主義各國所發生的新的革命過程。這是因爲，他們忽略過去了主要的東西，忽略過去了政治家所不應忽略過去的階級變動。本來就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新反對派一遇到我們黨底新任務就表示張惶失措和空拳無力的樣子。

試回想我們黨內最近發生的那些事變。試回想我們的黨最近因在我們國內發生新的階級變動而提出了的那些口號。我說的是這樣的口號，如自我批評，加緊與官

僚·主·義·鬥·爭·及·清·洗·蘇·維·埃·機·關·，·組·織·新·的·經·濟·幹·部·人·材·及·紅·色·專·門·家·，·加·緊·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運·動·，·進·攻·富·農·，·減·低·成·本·費·及·根·本·改·善·職·工·會·底·實·際·工·作·，·實·行·清·黨·等·等·。·有·些·同·志·覺·得·這·些·口·號·是·令·人·胆·戰·心·驚·和·令·人·頭·昏·眼·花·的·。·然·而·這·些·口·號·顯·然·是·現·時·黨·底·最·必·要·的·和·最·迫·切·的·口·號·。

最初，我們因沙哈廷案件發生而重新提出了關於新的經濟幹部人材問題，由工人內面造就紅色專門家來代替舊的專門家的問題。因沙哈廷案件發生而暴露出來的事情是什麼呢？暴露出來了的事情，就是資產階級還遠沒有被徹底擊破，牠在我們經濟建設上組織而且將來還會組織暗害工作，就是我們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局部地是黨的組織，把我們的階級敵人底暗中破壞工作忽略過去了，就是，因此需要盡力設法鞏固和改善我們的組織，發展和鞏固這些組織底階級的警惕性。

於是，就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問題。爲什麼呢？因爲如果不盡量發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把我們的各個組織底工作放在羣衆監督下面，那就不能改善我們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及黨的組織，就不能推進社會主義底建設和征服資產階級的

暗害行爲。而暗害行爲，不僅在煤礦區域內，而且在冶金工業方面，而且在軍事工業方面，而且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內，在黃金及白金工業以及其他等方面，都發生過並且還在繼續發生，——這是事實。於是就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

其次，因爲有糧食採辦方面的困難，因爲富農進行反對蘇維埃的價格政策的發動，我們就着重提出了關於盡量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問題，關於進攻富農的問題，關於用壓榨富農豐裕份子的方法來組織糧食採辦的問題。糧食採辦方面的困難暴露了什麼事情呢？這些困難所暴露了的，就是富農並不是在那裏睡覺，富農是正在發展着，他們是組織着暗害工作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底政策，而我們的黨的機關，蘇維埃機關和合作社機關，至少是一部份這樣的機關，或者看不見敵人，或者去遷就敵人，而不去與敵人鬥爭。

於是，就更加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審查和改善我們的黨的機關，合作社機關及一般的糧食採辦機關的口號。

其次，因爲有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工業和農業的新任務，就產生了關於有系

統的減低成本費的口號，關於鞏固勞動紀律的口號，關於擴展社會主義競賽的口號等等。這些任務會需要改造職工會和蘇維埃機關底全部實際工作，根本振興這些組織，把這些組織裏的官僚主義的份子清洗出去。

於是，就着重提出了關於與職工會及蘇維埃機關裏的官僚主義作鬥爭的口號。

最後，關於清黨口號問題。如果認為不把黨本身磨得銳利，而就可以鞏固我們的蘇維埃的和經濟的組織，職工會的和合作社的組織，可以把這些組織裏的官僚主義底骯髒東西清洗出去，那就是笑話了。官僚主義份子，不僅在經濟的和合作社的組織裏，不僅在職工會的和蘇維埃的組織裏生活着，而且還在黨本身底組織裏生活着，這是無可懷疑的。如果黨是所有這一切組織底領導力量，那末，清黨就顯然是這樣一個必要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就決不能澈底振興和改善工人階級底其他的一切組織。於是就提出了關於清黨的口號。

這些口號是不是偶然的呢？不，不是偶然的。你們自己看到牠們不是偶然的。這些口號是一條分不開的鍊子上的幾個必要的環節，這條鍊子就是叫做社會主義向

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

這些口號首先是與我們的工業和農業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改造時期有聯繫的。而國民經濟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改造又是什麼呢？牠就是社會主義在整個戰線上向國民經濟底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這是我國工人階級向着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一個最重大的進展。可是要實行這個改造，首先就必須改善和鞏固社會主義建設底幹部人材，——經濟的，蘇維埃的和職工會的幹部人材以及黨的，合作社的幹部人材，必須磨礪我們的一切組織，把這些組織裏的骯髒東西清洗出去，必須提高千百萬工人羣衆底積極性。

其次，這些口號是與國民經濟裏面的資本主義份子對進攻着的社會主義實行反抗的這件事實有聯繫的。決不可以把所謂沙哈廷案件看作偶然的事情，「沙哈廷派」現時正盤踞在我們的一切工業部門裏。其中有許多已被拿獲，可是還遠沒有盡被拿獲。資產階級智識界底暗害行爲，是對於發展着的社會主義的最危險的反抗之一種。況且暗害行爲是與國際資本有聯繫的，因此牠更是危險。資產階級的暗害行

爲，無疑義地指明，資本主義的份子遠遠沒有放下武器，他們正在積蓄力量來作反蘇維埃政權的新發動。至於說到農村裏的資本主義份子，那麼富農反對蘇維埃底價格政策的發動已經繼續到兩年了，這更其不可以看作是偶然的事情。很多人至今還不能解釋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富農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是按照自流手續給出糧食，而在一九二七年以後却已經停止按照自流手續給出糧食了。可是這個事實却絲毫沒有什麼奇怪。在從前，富農還比較軟弱，還沒有可能去認真佈置自己的經濟，還沒有足夠的資本來鞏固自己的經濟，因此牠曾經不得不把自己糧食出產底全部剩餘或者差不多全部剩餘都拿到市場上去，可是在現在，在經過了好幾個豐年以後，他已經把自己的經濟佈置周到了，他已經積蓄了必要的資本，——於是，他就有了在市場上投機的可能，就有了把糧食——這個金幣底金幣——藏起來的可能，作爲自己的後備資本，而寧肯把肉類，燕麥，大麥及其他次要農產物運到市場上去。現在如果希望富農會自願讓我們從他那裏取得糧食，那就可笑了。富農現在對於蘇維埃政府政策的反抗，其根源就在這裏。

可是城市和鄉村資本主義份子對社會主義進攻的反抗是表示什麼呢？這就是表示無產階級底階級敵人勢力底重新配合，這種重新配合底目的，就是要維持舊關係而反對新關係。不難懂得，這些情形不能不引起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可是爲要打退階級敵人底反抗和替社會主義底前進肅清道路，就除掉所有其他的事情以外，還需要磨礪我們的一切組織，把這些組織裏面的官僚主義清洗出去，改善他們的幹部人材和動員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及農村勞動羣衆去反對城市和農村裏的資本主義份子。

我們黨底現時的那些口號，就是在這些階級變動底基礎上產生出來的。

關於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階級變動也應當這樣說。如果認爲資本主義底穩定依然沒有改變，那就是可笑了。如果斷定說這個穩定日益鞏固着，日益成爲堅固的，那就更是可笑了。實際上，資本主義底穩定是一月比一月，一天比一天削弱起來和動搖起來。爭取市場和爭取原料的鬥爭底尖銳化，武裝底增長，英美對抗底增長，蘇聯社會主義底發展，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底左化，歐洲各國罷工和階級搏

鬥時期底已經到來，各殖民地——印度在內——革命運動底發展，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國底發展——所有這一切事實都是無疑義地證明，在資本主義各國裏，新的革命高漲底成份是正在增長着。

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加緊鬥爭來反對社會民主黨，首先就是反對該黨底「左」翼，因為牠是資本主義底社會支柱。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就是加緊反對共產黨內的右傾份子，因為他們是社會民主黨影響底代辦。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就是加緊反對與右傾調和的調和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底避難所。於是就提出了關於肅清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傳統的口號。於是就規定了共產主義在職工會內的所謂新策略。有些同志不懂得這些口號底意思和意義。可是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懂得，不實行這些口號就決不能準備無產階級羣衆去作新的階級戰鬥，決不能戰勝社會民主黨，決不能實行挑選共產主義運動底真正領袖——能引導工人階級去爲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的領袖。

同志們，這就是在我國以及在資本主義各國裏所發生的這樣一些階級的變動，

在這些變動底基礎上便產生了我們黨在內部政策方面以及在共產國際方面的那些現時的口號。

我們黨是看見這些階級變動。牠懂得新任務底意義並動員力量去解決這些任務。所以，牠總是帶着全副武裝去應付事變。所以牠並不怕擺在牠面前的困難，因為牠總是準備着克服困難的。

新反對派底倒霉處，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底倒霉處，就在於牠看不見這些階級變動和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正因為牠不懂得這些新任務，所以牠就抱着完全張惶失措的心理，總是準備着逃避困難，遇見困難而退却，放棄陣地。

你們看見過在大河裏面，比方葉尼塞河這樣的大河裏面遇見大風浪時的漁夫嗎？我看見過不止一次了。有這樣一種漁夫，這種漁夫遇見已經到來的大風浪的時候便動員自己的全部力量，鼓勵自己的人文心，勇敢地朝着風浪划船：『弟兄們，不要軟勁，努力抓着舵，破浪前進罷，我們是一定要勝利的！』可是也有另一種漁夫，他們一聞見大風浪，就灰心喪氣，開始叫苦而使自己的人們萎靡不振：『真

倒霉呀，大風浪來了，兄弟們，請在船板上臥下，閉着眼睛，也許會可以馬馬虎虎挨到岸邊罷。」（全場大笑）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底方針和行爲，是與那第二批漁夫，遇困難而驚惶退却的漁夫完全不同，這難道還需要證明嗎？

我們說，在歐洲，新的革命高漲底條件正在成熟着，這種情況給我們提出一些新的任務：加強與各國共產黨內的右傾的鬥爭，將右傾份子從黨內趕出去，加強與掩護右傾的調和派的鬥爭，加強與各國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鬥爭以及其他等等。而布哈林同志却回答我們說，這都是空話，說我們這裏絲毫沒有這樣的新任務，說實際上問題底本質就是在於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就是說把布哈林同志『當衆批評一頓』。

我們說，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給我們提出新的任務，這些任務要求有系統地減低成本費和鞏固企業裏的勞動紀律；而爲要執行這些任務，便非有根本改變職工會內的全部實際工作不可。而湯姆斯基同志却回答我們說，這都是空話，說我們這裏絲毫沒有這樣的新任務，說實際上問題底本質就是在於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想

把他——就是說湯姆斯基同志『當衆批評一頓』。

我們說，國民經濟底改造給我們提出新的任務：加強與蘇維埃經濟機關底官僚主義作鬥爭，清除這種機關裏的腐敗的和異己的份子，暗害份子以及其他等等。而李可夫同志却回答我們說，這都是空話，說我們這裏絲毫沒有這樣的新任務，說實際上問題底本質就是在於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就是說把李可夫同志『當衆批評一頓』。

同志們，這難道不是可笑嗎？布哈林，李可夫和湯姆斯基三同志，除了自己的肚臍之外，便看不見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這難道不明顯嗎？

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底不幸，就是他們看不見新的階級變動和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正因為牠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所以他們就不得不做事變底尾巴，遇到困難就束手無策。

我們的意見分歧底根源就在這裏。

一 關於共產國際方面的意見分歧

我已經說過，布哈林同志看不見和不懂得共產國際底因新革命高漲日益增長的條件而引起的那些新任務，這些任務就是：從共產黨內趕出右派，征服調和派和肅清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這個情形，已完全為我們在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所證實了。

在這方面的意見分歧是從什麼開始的呢？

是從布哈林同志提交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的關於國際狀況的提綱開始的。從前，這樣的提綱，照例都是預先在聯共代表團內審查的。可是這一次却沒有遵守這個條件。結果弄得這樣，就是由布哈林同志署名的提綱一面送往聯共代表團，同時就分給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底各外國代表團。可是，在這個提綱上曾有許多地方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聯共代表團會不得不在提綱中加上大約二十個修正。

這種情形就使布哈林同志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可是這是誰的過錯呢？試問

布哈林同志爲什麼要在還沒有交給聯共代表團審查以前就把提綱送給各外國代表團呢？既然提綱是不能令人滿意，那末聯共代表團當時是不是可以不加修訂呢？結果就弄出這樣的情形，就是從聯共代表團內實際上作出了關於國際狀況的新提綱，而各外國代表團就拿這個提綱來與布哈林同志署名的舊提綱對立。顯然的，如果布哈林同志沒有這樣急忙地把自己的提綱分送給外國代表團，就不會有這種不好意思的情形。

我現在要指出聯共代表團所加到布哈林同志底提綱上的四個基本的修正。我想指出這些基本的修正，爲的是要更明顯地表示關於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底性質。

第一個問題——這就是關於資本主義穩定底性質的問題。照布哈林同志底提綱看起來，在現今的時候，並沒有發生着任何一個動搖資本主義穩定的新現象，而且相反，資本主義是正在改造着和在基本上多少穩固地支持着。顯然的，對於所謂第三時期，即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作這樣的估計，聯共代表團當時是不能同意的。

牠當時不能同意這一點，因為保存這樣的對於第三時期的估計，就會使那些批評我們的人們有材料來說我們是抱着所謂資本主義『恢復健康』的觀點，即抱着希法亭底觀點，抱着我們共產黨人所不能抱的觀點。因此聯共代表團便作一個修正，從這個修正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穩定是不穩固的，而且不能是穩固的，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底尖銳化，這個穩定，現在正被和將來還會被事變過程所搖動。同志們，這個問題是對於共產國際各支部有決定的意義的。資本主義的穩定是動搖着還是鞏固着，——共產黨日常政治工作底整個方針都要由這一點來決定的。我們現在是處在革命運動底低落時期，處在單單是收集力量的時期，或者是處在新革命高漲底條件日益增長的時期，處在使工人階級準備去作當前的階級戰鬥的時期，——共產黨底策略方針就是由這一點來決定的。聯共代表團底這個修正案，——這個修正案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所通過了——底好處正是在於，牠所規定的方針，是以這第二個前途做根據的方針，是以新革命高漲底條件日益增長的這個前途做根據的方針。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與社會民主黨作鬥爭的問題。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內說

到了，與社會民主黨作鬥爭是共產國際各支部底基本任務之一。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這還不夠。要使與社會民主黨的鬥爭進行得有成效，就必須要把問題着重在與社會民主黨底所謂『左』翼作鬥爭的上面，這個『左』翼玩弄『左』的辭句而這樣來巧妙地欺騙工人，阻礙工人脫離社會民主黨。顯然的，不粉碎『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就不能戰勝一般的社會民主黨。可是，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內，關於『左』派社會民主黨的問題却完全沒有談到。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因此聯共代表團曾不得不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上作了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共產國際各支部內的調和態度的問題。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內說到了有與右傾鬥爭底必要，可是却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到要與那個對右傾調和的調和態度作鬥爭。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問題在於，向右傾宣戰的時候，右傾份子就通常裝扮為調和份子而使黨陷於困難地位。為預防右傾份子底這個手腕起見，就必須提出與調和態度作堅決鬥爭的問題。因此聯共代表團曾認為必須在布哈

林同志底提綱上作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四個問題，就是關於紀律問題。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內沒有提到各共產黨內有保持鐵的紀律之必要。這也不是一個不大重要的缺點。因為什麼呢？因為在加強與右傾的鬥爭的時期，在實行清除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份子的口號的時期，右傾份子通常總是組織成爲派別的組織，造成自己的派別組織的紀律，而打破和破壞黨的紀律。爲要使黨不致受到右傾份子底派別組織的襲擊，就必須要提出關於黨內鐵的紀律的問題和關於黨員應該絕對服從這個紀律的問題。不是這樣，便根本莫要想去與右傾作認真的鬥爭。因此聯共代表團就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上作了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我們當時是不是可以不把這些修正加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上去呢？顯然是不可以的。在古代的時候，人們關於哲學家柏拉圖說過：我們尊重柏拉圖，但是我們更尊重真理。關於布哈林同志也可以這樣說：我們尊重布哈林，可是我們更尊重真理，更尊重黨，更尊重共產國際。因此，聯共代表團會不得不把這些修正加到布哈

林同志底提綱上去。

這可以說是我們關於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底第一階段。

我們的意見分歧底第二階段是與所謂維托爾夫及特爾曼的事件有聯繫的。維托爾夫是漢堡黨組織底以前的書記，被控告為濫用黨的經費的。他曾因此被開除黨籍。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裏的調和派，會利用維托爾夫是與特爾曼同志有接近的關係（雖然特爾曼同志是與維托爾夫底犯罪行為絲毫沒有關係的），就把維托爾夫底案件變成了特爾曼底案件而開始來推翻德國共產黨底領導。你們大概已經從報紙底消息中知道，調和份子愛維爾特和黑爾赫特當時竟能暫時拉攏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來反對特爾曼同志。怎麼樣呢？他們把特爾曼從領導機關中撤銷了，開始控告他為舞弊營私，並且事先沒有通知共產國際執委，也沒有得共產國際執委底批准，就公佈了『相當的』決議案。這樣一來，他們不是執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關於與調和派作鬥爭的指示，不是與右傾及調和派作鬥爭，而是最無理地違背這個指示，與德國共產黨底革命領導作鬥爭，與特爾曼同志作鬥爭，這種鬥

目的就是要在德國共產黨員隊伍裏面掩護右傾和批准調和態度。

而布哈林同志並不去拉轉船舵，糾正現狀，不去恢復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那個已被違背的指示底權力，不去制止調和派底胡行，却反而在自己的一封著名的信內提議批准調和派底這次政變，將德國共產黨交給調和派，而對於特爾曼同志，却又在報紙上加以誹謗，再次申明他犯了過錯。而且這還叫做是共產國際底「領導者」！難道世界上有這樣的「領導者」嗎？

中央委員會討論了布哈林同志底提議並且否決了這個提議。這當然是布哈林同志所不高興的。可是這裏是誰底過錯呢？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並不是爲着要我們去違背這個決議，而是爲着要由我們去執行這個決議。如果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會決定向右傾及調和態度宣佈鬥爭，把德國共產黨底領導工作保留給特爾曼同志所領導的基本幹部，而調和派愛維爾特及黑爾哈特却忽然想來推翻這個決議，那末布哈林底責任就是要制止調和派底越軌行動，而不是讓他們把持德國共產黨內的領導。錯在布哈林同志，因爲他把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忘記」了。

我們的意見分歧底第三階段，是與德國共產黨內右派鬥爭的問題有聯繫的，與粉碎布蘭德列爾及達里格麥爾底派別組織以及將該派別組織底首領從德國共產黨裏開除出去的問題有聯繫的。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們在這個根本的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就在於他們總是迴避參加這個問題底解決。實質上，當時所解決的問題，是德國共產黨底生命問題。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們是知道這一點的，可是，他們却還是有系統地迴避參加相當機關底會議，這樣來阻礙這件事情底進行。爲的什麼呢？大概是爲的要在共產國際面前與德國共產黨內右派面前都不失爲『潔白君子』。爲的是要在後來可以說，『將布蘭德列爾和達里格麥爾開除於共產黨外的，並不是我們布哈林派，而是他們，而是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而且這還叫做與右傾危險的鬥爭哩！

末了，我們意見分歧底第四階段。這是與布哈林同志向中央十一月全會提出的要求有聯繫的。他當時要求從德國召回聶依曼同志，要求制止特爾曼同志底所謂越軌行動，說特爾曼同志在自己的一個演說辭內批評了布哈林同志在第六次世界代表

大會上的報告。我們當然不能夠同意布哈林同志底主張，因為手內沒有任何文件可以證實布哈林同志底要求。布哈林同志答應了找出文件來證實聶依曼及特爾曼底錯誤。然而，任何文件他都沒有找出來。他並沒有找出文件來，而只是把恩伯德洛同志在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內的著名演說辭分發給聯共代表團底同志，而這個演說辭後來被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評判為機會主義的演說辭。布哈林同志把恩伯德洛底演說辭分發給聯共代表團底同志，並把他介紹為控告特爾曼同志的材料，想這樣來證明他關於召回聶依曼同志及所謂制止特爾曼同志底越軌行動的這個要求是正當的。而實際上呢，他這樣證明了，他是與恩伯德洛同志同情的，而恩伯德洛底立場，由共產國際執委看來，却是機會主義的立場。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關於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底要點。

布哈林同志認為，我們既然是進行鬥爭反對共產國際各支部裏的右傾及對右傾的調和態度，既然是清除德國共產黨裏和捷克斯拉夫共產黨裏的社會民主黨份子和傳統，從共產黨內開除布蘭德列爾和達里格麥爾這般人，這樣我們就是使共產國際

「解體」，使共產國際「滅亡」。反之，我們却認爲，我們實行這樣的政策，把問題着重在與右傾及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鬥爭上，這就是鞏固共產國際，清除共產國際裏面的機會主義者，使共產國際各支部布爾塞維克化，幫助各共產黨去準備工人階級進行臨到的革命搏戰。

可見得，這並不簡簡單單是聯共中央委員會裏面有什麼不同的色彩，而是關於共產國際政策底根本問題有很嚴重的意見分歧。

三 關於國內政策方面的意見分歧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和階級鬥爭。我已說過，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沾染了瞎眼病而看不見這些變動，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我已說過，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新反對派便抱着張惶失措心理，害怕困難和決心在困難面前束手投降。不能說，新反對派底這些錯誤是從天上落下來。恰恰相反，牠們是與已經過去的那個發展時期有聯繫的，那個時期是叫做國民經濟底恢復時期，那時的建設是依和

平的道路進行的，所謂依自流的辦法進行的，那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階級變動，那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可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却是新的發展時期，與舊時期，就是說與恢復時期不同的時期。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是新的建設時期，整個國民經濟在社會主義底基礎上改造的時期。這個新的時期引起新的階級變動，引起鬥爭底尖銳化。牠需要有新的鬥爭方法，需要重新分配我們的力量，需要改善和鞏固我們的一切組織。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底倒霉處也就是在於，他們現在還過着舊生活，牠看不見這個新時期底特點，不懂得新的鬥爭方法底必要。因此，他們就患着瞎眼病，抱張惶失措心理，害怕困難。

一 關於階級鬥爭問題

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底這種瞎眼病，這種張惶失措心理，其理論基礎，是在什麼地方呢？

我以爲，這種瞎眼病和張惶失措心理底理論基礎，就是布哈林同志對於我們國

內的階級鬥爭問題所採取的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我所指的布哈林同志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及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環境裏階級鬥爭關鍵底不瞭解。

在這裏，已經有人幾次從布哈林同志底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本小冊子裏摘引了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一段著名議論。可是這裏所摘引過的都有一些遺漏。請讓我吧這段議論完全摘引出來。同志們，這是必要的，只有這樣，才可以看出布哈林同志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是到了何等深刻的程度。聽吧：

『我們的農民的合作社組織底基本網子，將不是由富農式的，而是由「勞動」式的合作社細胞所組成，這些細胞會生入我們的一般國家的機關底系統內，這樣就會成爲社會主義經濟這條鏈子裏的單個環節。另一方面，富農的合作社的巢窩，也將同樣經過銀行等等而生入這個系統內；可是牠們在某種程度內是異類物體，如同租佃企業一樣。』

有些同志從布哈林同志底小冊子裏摘引這一段議論的時候，却不知爲什麼把最

* 布哈林，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工農聯盟，第四九頁。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後一句關於租佃企業家的話遺落了。羅季特同志大概是想替布哈林同志幫忙，所以利用了這一點而從座位上叫喊，說人家曲解布哈林底意思。可是這全段引證底要點正在於最後一句關於租佃企業家的話。因為如果把租佃企業家與富農看作同等的東西，而富農又生入社會主義，那末從這裏會得出什麼結論呢？結論只有一個，就是說租佃企業家也生入社會主義，就是說，不僅富農，而且租佃企業家也生入社會主義（全場大笑）。

羅季特同志啊，這就是從這句話裏得出來的結論。

羅季特：布哈林同志所說的是「異類物體」。

斯大林：羅季特同志呵，布哈林所說的，並不是什麼「異類物體」，而是「在某種程度內是異類物體」。所以，富農和租佃企業家，「在某種程度內」是社會主義系統內的異類物體。可是布哈林同志底錯誤也正是在於，富農和租佃企業家，雖然「在某種程度內」是異類物體，可是，總還是生入社會主義。你們看，布哈林同志底理論竟弄到何等荒謬的地步。城市和鄉村的資本家，富農和租佃企業家，都會

生入社會主義，——你們看，布哈林同志是說出何等荒謬的話來了。同志們，我們不需要這樣的『社會主義』。讓布哈林同志把牠拿給自己去用吧。

直到現今，我們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都是認為，城市及鄉村中的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之間，是有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正是建築在這一點上面的。而現在，照布哈林底關於資本家和平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說來，所有這些原理，都要推翻，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階級利益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正在消滅，剝削者正在生入社會主義。

羅季特：這是不對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需要的。

斯大林：可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階級鬥爭底最尖銳的形式。

羅季特：問題底本質裏正是在這裏。

斯大林：而照布哈林說來，資本家是生入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羅季特同志，你怎麼不懂得這一點？如果城市和鄉村中的資本家是生入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內，那末，到底是爲反對誰而須要進行鬥爭，爲反對誰而需要進行最尖銳的階級鬥爭

呢？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需要是爲着要與資本主義份子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爲着要鎮壓資產階級和根本剷除資本主義。可是如果城市與鄉村的資本家，如果富農及租佃企業家是生入社會主義，那末是否一般地還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呢？如果需要，那末是爲鎮壓什麼階級呢？

羅季特：問題底本質正是在於，照布哈林說來，所謂生入是要有階級鬥爭的。

斯大林：我覺得，羅季特同志已經立誓要替布哈林同志效勞。可是他的效勞正好像是狗熊效勞一樣，因爲，羅季特同志本來是想去挽救布哈林的，而事實上却完全把他沉到水底下去了。難怪俗話說，「喜歡效勞的狗熊比敵人還危險些」。(全場呵呵大笑)

兩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資本家階級與爭得了政權及建立了專政的人工階級之間有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或者是沒有這種利益矛盾，那末就只有一個辦法——宣佈階級利益底協和。

或者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或者是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或者是

階級利益底不可調和的矛盾，或者是階級利益協和的理論。

兩者必居其一。

像布連唐諾或維伯這類的『社會主義者』宣傳社會主義生入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生入社會主義的主張，這還可解，因為這些『社會主義者』實際上就是反社會主義者，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可是，一個人既然想做馬克思主義者而同時又宣傳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這就不可解了。

布哈林同志曾在他的演說內企圖引列寧底一段著名的話來證實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同時，他斷定說，列寧所說的也同布哈林說的一樣。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粗魯地和不可容許地誣蔑列寧。請看列寧這一段話底原文：

『當然，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內，社會制度是建立在兩個階級——工人和農民——底合作上面的，現在，在某種條件之下，也容許了『耐潑曼』，就是說資產階級，來參加這個合作。』*

* 列寧，我們要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〇五頁。

你們看，這裏沒有一個字是講到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這裏只說到，我們『在某種條件之下』，也『容許了』耐潑曼，就是說資產階級，參加工農底合作。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不是說，我們這樣就是認為有耐潑曼生入社會主義的可能呢？當然不是的。只有不怕羞恥的人才會這樣來解釋列寧底這一段話。這只是說，我們現在不消滅資產階級，我們現在不沒收牠的財產，而在相當條件之下還容許牠存在，所謂某種條件就是，要他們絕對服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法律，就是為要從國民經濟生活中逐漸排除資本家起見而日益加緊限制他們。不作極劇烈的階級鬥爭，而可以實行排除資本家和消滅資本主義底根源嗎？是不可以的。既然有主張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際，那還可以消滅階級嗎？是不可以的。這樣的理論和實際，只能培植和永遠保全階級，因為牠，這個理論，是與階級鬥爭底理論相矛盾的。而列寧底這段話却完全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環境內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上面的。在布哈林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列寧關於專政是極尖銳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之間，會有什麼相同的地方？顯然的，這裏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相同的地

方。布哈林同志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時候，階級鬥爭就應當熄滅和取消，以便達到階級底消滅。反之，列寧却認為，只有用經過堅持的階級鬥爭，階級才可以被消滅，這種鬥爭，在無產階級專政時候比無產階級專政以前還更劇烈些。列寧說：

「消滅階級是長久的，困難的，堅持的階級鬥爭底事情，這種鬥爭，在推翻了資本政權以後，在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以後，在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後，並不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及舊社會民主黨底卑鄙人物所設想的那樣），而只是變更自己的形式，而在許多方面還成爲更殘酷些。*」

這就是列寧關於消滅階級的話。

經過無產階級底極劇烈的階級鬥爭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列寧底公式。

經過階級鬥爭底熄滅和資本家底生入社會主義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布哈林同志底公式。

這兩個公式之間能有什麼相同的地方？顯然的，牠們之間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

* 列寧，給匈牙利工人致敬禮，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五頁。

相同的地方。

如此，布哈林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就是離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他的理論就是接近於學院派社會主義底理論。

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們所犯的一切錯誤底基礎，就在這裏。

有人會說，關於布哈林底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值不得多講，因為這個理論本身就說道——不僅說道，而且喊道——布哈林同志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不對的！當這個理論還藏在櫃子內的時候，還可以不去注意牠：在個別同志們底著作裏面有些愚蠢話，這有什麼奇怪呢？直到最近以前我們都是這樣對待的。可是在最近的時候，環境已經有了一些改變。在最近幾年來囂張起來了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已經在鼓勵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使牠帶着迫切的性質。現在已不能說牠是藏在櫃子裏面了。現在，牠，布哈林同志底這個奇怪理論，有野心要成爲我們黨內右傾底旗幟，機會主義底旗幟。因此我們已不能把這種理論忽略過去，因此我們一定要打碎這種理論，打碎這個不正確的和有害的理論，以便利我們的黨員同志

們去與右傾作鬥爭。

二 關於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問題

布哈林同志底第二個錯誤，是從他的第一個錯誤中產生出來的，這第二個錯誤是在於對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問題，對資本主義份子加強反抗蘇維埃政權底社會主義政策這個問題有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這裏所說的是關於什麼事情呢？是不是說，資本主義的成份比我們經濟底社會主義部份增長得快些，因此牠們加強自己的反抗，損害社會主義的建設呢？不，不是關於這一點。況且說資本主義成份比社會主義部份增長得快些，這是不對的，如果這是對的，那末社會主義建設就會已經快到滅亡的地步了。這裏所說的，是社會主義有成功地進攻着資本主義成份，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成份增長得快些，資本主義成份比重因此降落下去，正因為資本主義成份比重降落下去，他們就感覺得有死亡的危險和加緊着自己的反抗。而他們暫時還有加強反抗底可能，這不僅因為世界資本主義給他們以幫助，而且因

爲他們的比重雖然是降落了，他們的相對增長與社會主義底增長比較起來雖然是減低了，可是，他們的絕對的增長，還是有的，這也就給他們相當的可能來積累力量，以便反抗社會主義底增長。而在現今發展的階段上，在現今的力量對比條件之下，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和城市及鄉村資本主義成份反抗底加強，正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們底錯誤，就在於他們不懂得這種簡單的和顯明的真理。他們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不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而以庸人的態度去觀察問題，企圖用各種偶然的原因來解釋階級鬥爭底尖銳化，例如說是因爲蘇維埃機關底「不中用」，因爲地方的同志們底政策「不謹慎」，因爲「缺乏」圓滑性，因爲有『過火行動』以及其他等等。

例如，在布哈林同志底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本小冊子內有一段話，就表示他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觀察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問題。請看這一段話罷：

『鄉村中的階級鬥爭，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在以前的那種形式中爆發出來，而且這種尖銳化通常都是由富農份子所引起的。例如，富農們，或者是那些剝削別人而發

財的，鑽進了蘇維埃機關內的人們開始槍殺農村通訊員，——這就是階級鬥爭表現底最尖銳的形式（這是不對的，因為最尖銳的鬥爭形式是暴動。——斯大林註）。然而這樣的情形通常都是在這樣的地方發生的：在這些地方，地方的蘇維埃機關還是軟弱的。隨着這種機關底改善，隨着蘇維埃政權一切下層機關底鞏固，隨着地方的農村的黨的和團的組織底改善和加強，這種現象將——這是完全顯然的——日益稀少，歸根到底將完全消失。* * *

這樣說起來，那末階級鬥爭底尖銳化是由於機關方面底原因，由於我們下層機關中用或不中用，軟弱或強固。這樣說起來，那末，比方沙哈廷區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暗害行為，這種資產階級份子對蘇維埃政權的反抗底形式和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底形式，並不是因為階級力量底對比，不是因為社會主義底發展，而是因為我們的機關不中用。這樣說起來，那末在沙哈廷區內的大規模暗害行為未出現以前，我們的機關是好的，而後來，在大規模的暗害行為出現的時候，機關却不知怎樣成了毫不中用的東西了。這樣說起來，那末，在去年以前，當糧食採辦還是自流式的進行和

* 布哈林，到社會主義去的道路和工農聯盟，由第五三到五四頁，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階級鬥爭還沒有特別尖銳化的時候，我們的地方的機關是好的，或甚至是盡善盡美的，而從去年起，當富農底反抗已採取特別尖銳的形式的時候，我們的機關便忽然變壞了和不中用了。這不是解釋，而是拿解釋來開玩笑。這不是科學，而是妖術。

這種階級鬥爭底尖銳化應當拿什麼原因來解釋呢？

應當用以下兩個原因來解釋：

第一，因為我們的前進，因為我們的進攻，因為工業和農業裏社會主義形式的經濟底發展，這種發展同時使得城市和鄉村中相當的資本家隊伍受着相當的排擠。現在情形是這樣，就是我們是依照列寧底這樣一個公式過生活的，這個公式就是『誰勝誰敗』：或者是我們把他們——資本家——完全打倒，給他們一個——如列寧所說過的——最後的決定勝利的鬥爭，或者是他們把我們完全打倒。

第二，是因為資本主義份子不願自動下台：他們反抗着而且將來也還會反抗社會主義，因為他們看見他們生存底末日快要到了。而他們暫時還能夠反抗，因為他們的比重雖然降落了，但是在絕對關係上，他們還是增長着：城市和鄉村的小資

產階級，如列寧所說過的，每日每時從自己的隊伍中提拔出資本家和小資本家，他們，這些資本主義份子，採取一切辦法來保持自己的生存。

在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階級自動下台的事情。在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資產階級不用盡一切氣力來保持自己的生存的事情。無論我們的下層蘇維埃機關將來是好還是壞，而我們的前進，我們的進攻，將要縮減資本主義的份子和排擠他們，而他們，垂死的階級，將要不顧一切而進行反抗。

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社會基礎就在這裏。

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底錯誤就在於，他們把資本家反抗底增長與他們的比重底增長看作是同等的東西。可是這種同等看法是沒有絲毫根據的。沒有根據，因為要是他們，資本家進行反抗，那末這並不是說，他們已比我們強些。實際上恰恰相反。垂死的階級起來反抗，並不是因為他們已比我們強些，而是因為社會主義增長得比他們快些，因此，他們日益比我們弱些。正因為他們日益變弱些，所以他們感覺得自己的末日要到了，而不得不盡力設法反抗。

現今歷史時期內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和資本家反抗底加強，其關鍵就在這裏。

實際情況既是這樣，黨底政策應當是怎樣的呢？

牠應當是要喚醒工人階級和鄉村中被剝削羣衆，提高他們的戰鬥力，發展他們的動員的決心，來和城市和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鬥爭，來和正在反抗中的階級敵人鬥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之所以是好的理論，局部地也就是因為牠便利着動員工人階級去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底敵人。

布哈林的關於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布哈林的關於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的見解，其害處是在什麼地方呢？

害處就在於，牠催眠工人階級，搖動我們國內革命力量底動員決心，解散工人階級底隊伍，便利資本主義份子進攻蘇維埃政權。

三 關於農民問題

布哈林同志底第二個錯誤是與農民問題有關係的。大家知道，關於農民的問

題，是我們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我們的條件下面，農民是由各種社會集團組成的，即是由貧農，中農及富農組成的。顯然的，我們對這些集團的態度是不能同樣的。貧農是工人階級底支柱，中農是同盟者，而富農是階級敵人，——這就是我們對這些社會集團的態度。這都是很明顯的和大家所知道的。然而，布哈林同志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却有些不同。在他估計農民的時候，分化底事實是失落了，各個社會集團存在底事實，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而只剩下一個叫做什麼農村的灰色斑點。在他看來，富農不是富農，中農不是中農，而是什麼農村中的一片貧窮現象。他在這裏演說也就是這樣說：難道我們的富農可以叫做富農嗎？他說：須知這是窮人。他說：我們的中農難道像個中農嗎？須知道這是餓肚子的窮人。顯然的，這樣一種對農民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與列寧主義不能相容的觀點。

列寧說過，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個原理對不對呢？是絕對對的。爲什麼把農民看作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呢？因爲農民在構成我們的社會的兩個基本階級中間是這樣一個階級，牠的經濟是建立在私有財產和小商品生產上面

的。因為，農民，當他們還是經營着小商品生產的農民的時候，經常地和不斷地從自己的隊伍中產生出而且不能不產生出資本家。這種情況，在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對工農聯盟問題的態度問題上，對於我們有決定一切的意義。這就是說，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與農民的無論那個聯盟，而只是這樣一個聯盟，這個聯盟應當以與農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作鬥爭為基礎。可見列寧關於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的提綱，不但不與工農聯盟的主張相矛盾，而且相反，是給這種聯盟以根據，使牠成為以反對我們的經濟裏的資本主義成份為目標的工農聯盟。列寧提出了這個提綱，為的是要指明，工農聯盟，只有在牠是以反對那些由農民本身所分泌出來的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做基礎的時候，才能是堅固的聯盟。

布哈林同志底錯誤就在於，他不懂得和不領會這個簡單的東西，他忘記在鄉村裏有幾個社會集團，在他的眼光內沒有富農，沒有貧農，而只剩得一片盡是中農羣衆。這是布哈林同志底毫無疑義的右傾，與託洛茨基主義的『左』傾相反，『左』傾在鄉村中只看見有貧農和富農而看不見有其他的社會集團，看不見有中農。

在與農民聯盟的問題上，託洛茨基主義和布哈林同志這一派間的分別是在什麼地方呢？分別就在於：託洛茨基主義反對與中農羣衆成立堅固聯盟的政策，而布哈林派則主張與農民作無論那個聯盟。用不着證明，這兩個立場都是不正確的，好像半斤和八兩一樣。

列寧主義絕對主張與農民底基本羣衆作堅固的聯盟，主張與中農聯盟，可是他並不主張無論那個聯盟，而是主張與中農作這樣的聯盟，這個聯盟可以保證工人階級底領導作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便利着消滅階級。

列寧說：

「關於工人階級與農民的協定，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法。從工人階級底觀點上看來，只有當這個協定是維持工人階級專政和成爲消滅階級的辦法之一的時候，這個協定才是可容許的，正確的和原則上可能的；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工人階級與農民協定底公式，當然還是爲蘇維埃政權底一切敵人，無產階級專政底一切敵人所主張的公式。」*

* 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三八七頁。

往下又說：

「現在，無產階級掌握着政權並領導着這個政權。他領導着農民。領導着農民，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第一，以消滅階級為路線，而不是以適應小生產者為路線。如果我們離開這個根本的和基本的路線，那我們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者而陷入這樣一些小資產者底營壘，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底營壘，這些小資產者，這些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現在就是無產階級最凶惡的敵人。」*

這就是列寧底關於與農民基本羣衆聯盟，與中農聯盟問題的觀點。

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關於中農問題的錯誤，就在於他們看不見中農底兩面性質，介於工人階級與資本家中間的兩面地位。列寧會說：「中農是動搖的階級」。爲什麼呢？因爲中農一方面是勞動者，這是他與工人階級接近，而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財產者，這使他與富農接近。因此就有中農底動搖。這不僅在理論上是對的。這種動搖，在實際上也每日每時都表現出來。列寧說：

* 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九九至四〇〇頁。

「農民既然是勞動者，他就傾向於社會主義，寧願工人專政而不願資產階級專政。農民既然是糧食出賣者，他就傾向於資產階級，傾向於自由貿易，就是說，後退到「慣常的」陳舊的「歷來的」資本主義。」*

因此，與中農的聯盟，只有當牠是以反對資本主義份子爲目標，反對一般資本主義，只有當牠是保證着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裏的領導作用，只有當牠是便利着消滅階級的時候，牠才可以是堅固的。

奇怪得很，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公然把這些簡單而明瞭的東西都忘記了。

四 關於新經濟政策和市場關係問題

布哈林同志底第四個錯誤，是與新經濟政策問題有關係的。布哈林同志在這裏的錯誤就在於，他看不見新經濟政策底兩面性，他只看見新經濟政策底一方面。當我們在一九二一年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我們會把這政策底鋒芒用去反對軍事共

* 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四頁。

產主義，反對那些排除任何貿易自由的統制和秩序。我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新經濟政策是表示相當的貿易自由。布哈林同志是記住了這一方面的事情。這也是很好的。可是布哈林同志認為新經濟政策只有這一方面，這就錯了。布哈林同志忘記新經濟政策還有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的事情就是在於，新經濟政策並不是表示完全的貿易自由，在市場上玩弄價格的自由。新經濟政策，就是在保證國家底調節作用和他在市場上起作用的情形之下的，在相當界限內的，在相當範圍內的貿易自由。新經濟政策底第二方面就正是在這裏。而且，新經濟政策底這第二方面，如果不是比第一方面重要些，那至少也不比第一方面次要些。在我們這裏，沒有像資本主義各國所通常都有的那種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的現象。糧食價格在基本上由我們規定。工業品底價格由我們規定。我們努力實行減低成本費和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同時極力保持農產品底穩定價格。市場上這樣的特殊辦法，是資本主義各國所根本沒有的，這難道不明白嗎？

由此可見，在有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應當保存牠的兩方面：一方面就是反對

軍事共產主義底統制及以保證相當的貿易自由，另一方面，就是反對完全的貿易自由及以保證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如果取消這兩方面底某一方面，那就不會有新經濟政策了。

布哈林同志認為，新經濟政策只能『從左邊』受到危險，從那些想消滅任何的貿易自由的人們方面受到危險。這是不對的，這是最嚴重的錯誤。況且，現在這樣的危險是最不實在的，因為我們的地方的及中央的組織內現在沒有或者差不多沒有那個人不懂得，保持相當的貿易自由是完全必要的完全妥當的。現在比較更實在得多的，是從右邊來的危險，是從那些想消滅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想『解放』市場而這樣來開關完全的貿易自由底紀元的人們方面的危險。這種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危險現在比較實在得多，這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不要忘記，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正在這方面進行工作，——從右邊來進行破壞新經濟政策。也要記着，富農和豐裕份子底呼號，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底呼號（我們有許多同志往往受着這些呼號底影響），正是從這方面來衝擊新經濟政策。布哈林同志看不見這種破

壞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危險，這個的確實存在的危險，這件事實就無疑地證明他是受了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影響。

布哈林同志提議使市場『常態化』和按區來『運用』糧食採辦價格，即是增高糧食價格。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他不滿意蘇維埃的市場條件，他想漸漸降低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並提議向那從右邊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讓步。

暫時假定我們是聽從了布哈林同志底話。由此會得出什麼結果呢？比如說，在秋季，在糧食採辦時期底初頭，我們提高糧食價格。可是因為市場上時常總有人，有各種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能多出兩倍價錢來收買糧食；又因為我們不能同投機商人去搶生意，因為他們總共收買什麼一千萬普特，而我們却需要收買幾萬萬普特，於是糧食所有者反正還是會把糧食拿着不賣，等候繼續漲價。於是到春季的時候，當國家正開始最需要大批糧食的時候，我們又要增加糧食價格。可是在春季來抬高糧食價格，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害死貧苦的農民和力量單薄的農民，這些

農民在春季不得不買進糧食，部份地作為種子，部份地以供食用。而這些糧食就是他們在去年秋季以賤價賣出去而現在又以高價買回來的。花費了這些手續以後，我們是不是能夠得到什麼重大的結果，就是說得到足夠數量的糧食呢？一定是不能夠得到的，因為總是有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他們能夠又用比我們多一兩倍的價錢來收買這些糧食。於是，我們又要去應付糧食價格底提高，白費氣力來與投機商人及屯賣商人競爭。

而既然是這樣，那末我們既然走上了提高糧食價格的道路，我們就應該越往下滾去，還是沒有担保可以得到足夠數量的糧食。

可是事情還不止於此。第一，我們既然提高糧食採辦價格，以後也就應該提高原料價格，以便維持各種農產品價格底相當比例。第二，我們既然提高糧食採辦價格，也就不能在城市裏維持糧食底低廉價格，——於是我們也就應該提高糧食底賣價。可是因為我們不能而且不應得罪工人，——我們就應當以加快的速度來提高工資。可是這就不能不使得工業品底價格也提高起來，因為，如果不是這樣辦，那末

就會使財源違反着工業化底利益而從城市裏流入鄉村。結果我們就會要不是根據低的價格或至少穩定的價格來調勻工業品與農產品底價格，而是根據糧食和工業品一同提高的價格來調勻這些價格。換一句話說，我們就會要採取使工業品和農產品漲價的方針。不難明白的，這樣『運用』價格，不能不弄到完全取消蘇維埃的價格政策，弄到取消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弄到完全放縱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這將對於誰有利益呢？這就是對於城市和鄉村中的豐裕階層有利益，因為高價的工業品和農產品，不能不成爲工人階級和貧農以及能力單薄的農民所買不起的東西。佔便宜的是富農，豐裕份子，耐潑曼及其他的富足階級。

這也是聯絡，可是却是特殊的聯絡——是與鄉村及城市裏的富足階層的聯絡。工人和經濟力量單薄的農民將有全權來質問我們：我們究竟是誰的政權，是農民的政權呢，還是富農及耐潑曼的政權呢？

與工人階級及與鄉村裏經濟能力單薄的階層破裂，與鄉村及城市裏的豐裕階層聯盟——這就是布哈林底所謂市場『常態化』及按區『運用』糧食價格所要弄出的

結果。

顯然的，黨是不能走上這條滅亡的道路的。

布哈林同志關於新經濟政策的一切觀念是混亂到什麼地步，他受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束縛是厲害到何等程度，這局部地在下面這件事實裏也可以看得出來，就是，他對於城市與鄉村間的，國家與農民間的商品週轉底新形式問題，是抱着極端反對的態度。他氣憤起來和叫喊起來反對這樣的事實，就是國家已變成了用商品來供給農民的供給人，而農民正變成拿糧食來供給國家的供給人。他認為這是違背新經濟政策底一切規矩，幾乎是破壞新經濟政策。試問，爲什麼呢，有什麼根據呢？要是國家，國家工業變成替農民供給商品的人，而農民變成替工業，替國家供給糧食的人，這會有什麼壞處呢？要是農民變成了替國家工業供給棉花和糖蘿蔔以及大麻的供給人，而國家工業變成了替農業底這些部門供給城市商品，種子和生產工具的供給人，那麼這從馬克思主義，從馬克思主義的新經濟政策底觀點上看來會有什麼壞處呢？訂立定貨合同的方法，在這裏是建立城市與鄉村間商品週轉底這些新形

式底基本方法。可是訂立定貨合同的方法難道與新經濟政策底要求相矛盾嗎？如果因為有這種訂立合同的方法，農民不僅在棉花，糖蘿蔔和大麻方面，並且在糧食方面也變成爲國家底供給人，這會有什麼壞處呢？爲什麼小批生意，零星生意可以叫做商品週轉，而按照關於價格及商品質量的預定條約（訂立定貨合同）來進行的大批生意就不能叫做商品週轉呢？這種荒唐話從那裏來的呢？城市與鄉村間按照訂立定貨合同的方法來實行商品週轉的這些新的普遍形式，正是在新經濟政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牠們是我們的組織在加強對國民經濟實行計劃的和社會主義的領導方面的一個最大的進步，這難道不容易明白嗎？

布哈林同志已經不會了解這些簡單明瞭的東西，這不是奇怪嗎？

五 關於工業發展速度和新式聯絡問題

最後就是關於工業發展速度和關於城市與鄉村間的新式聯絡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的意見分歧裏的最重要問題之一。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爲，我們的一

切關於黨底經濟政策問題的實際方面的意見分歧底線索，都是集中在這個問題內面的。

什麼是新式聯絡，從我們的經濟政策底觀點上看來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除掉城市與鄉村聯絡底舊形式以外，我們現在還需要這個聯絡底新形式；在舊形式下面，工業在主要方面是滿足了農民底個人需要（花布，靴鞋一般的布疋等等），而在新形底下面，工業將滿足農民農莊底生產需要（農用機器，拖拉機，改良的種子，肥料等等）。要是我們以前在主要方面是滿足農民底個人需要，而少牽涉到農民農莊底生產需要，那麼現在，我們除繼續滿足農民底個人需要以外，同時還需要盡力供給農用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這些東西都是與農業生產有新技術基礎上的改造有直接關係的。過去，當任務還是在於恢復農業及由農民好好經營過去地主的和富農的土地的時候，我們還能夠以舊式聯絡為滿足。可是現在，當任務已經是在於改造農業的時候，這已經是不夠了。現在須要更加前進，須要幫助農民在新技術及集體勞動底基礎上改造農業生產。

第二，這就是說，除了改造我們的工業以外，同時我們還應當開始來認真改造農業。我們正在改造而且局部地已經改造了我們的工業，給我們的工業建立新的技術基礎，供給牠以新的優良的機器，新的優良的幹部。我們建造着新的工廠和製造廠，改造和擴大改善舊的工廠，我們發展着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因為這個原故，城市就發展起來，新的工業地點就增多起來，舊的工業地點就擴大起來。因為這個原故，對糧食品，對工業原料的需求就增長起來。而農業依舊還是使用舊的工具，使用舊的，祖先遺傳下來的耕種方法，使用舊的，原始的，現在已不用或者差不多已不中用的技術，使用舊的，小農的個人的經營方式和勞動方式。比方，革命以前我們約有一千六百萬農戶，而現在至少有二千五百萬農戶，這個事實不是有很大的意義嗎？這一切不是證明農村經濟日益帶有渙散零碎的性質是什麼？而渙散的小農戶經濟底特點，就在於牠們不能在應有的限度內利用技術，機器，拖拉機，農業科學成績，就在於牠們是少帶商品性的農業。因此，農產品內的商品出產量就感覺不夠。因此，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之間就有發生破裂的危

險。因此，就必需催促農業底發展，使牠趕上工業發展底速度。所以，爲要不致有發生這種破裂的危險起見，須開始在新技术底基礎上來認真地改造農業。而爲着改造農業起見，就須要把分散的農戶漸漸聯合爲大規模的農莊，集體農莊，須要把農業建立在集體勞動底基礎上，須要擴大集體農莊，須要發展舊的和新的蘇維埃農莊，須要把大批訂立定貨合同的形式有系統地運用於農業底一切基本部門，須要廣設農業機器站，以幫助農民來學會使用新技术和把勞動集體化，——總而言之，須要把小農戶漸漸轉到大的集體生產底基礎上，因爲只有公共的大生產才能夠盡量利用科學成績與新技术成績，大大推進我國農業底發展。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應當忽視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不，不是的，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在給工業供給糧食及原料這件事情上，現在是有而且在最近將來也還會主要的作。正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必須幫助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可是這就是說，單只是個體的農民經濟已經不夠了。我們的糧食採辦方面的困難，正是證明這一點。因此除發展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以外，同時還須要盡力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

埃農莊。因此須要以普遍訂立定貨合同，以成立農業機器站，以盡量發展合作制運動，作為個體的貧農中農農莊和集體的公共農莊之間的橋樑，以便使農民將自己小的個體農莊轉到集體勞動底軌道上。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真正發展農業。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解決五穀問題。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使經濟力量單薄的農民階層解脫窮苦，解脫貧困。

最後，這就是說，必須努力發展我們的工業，因為我們的工業，是農業生產改造事業底基本供給來源，必須發展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必須建設拖拉機工廠，農業機器工廠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經過廣泛的訂立定貨合同制來督促基本的農民羣衆進到集體形式的經營，如果不用很多的拖拉機，農業機器等等來供給農業，就沒有可能來發展集體農莊，就沒有可能來發展農業機器站。但是，如果不加緊速度發展工業，就沒有可能來用機器和拖拉機去供給農業。因此，用加快速度來發展我們的工業便是在集體制度基礎上進行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新式聯絡底意思和意義，就是這樣。

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不得不在口頭上承認新式聯絡底必要。可是，這不過是口頭上的承認，其目的是要用在口頭上承認新式聯絡這一點做掩護，以便暗中偷運一種簡直相反的東西。實際上，布哈林同志是反對聯絡底新形式的。布哈林同志底出發點並不是加快速度發展工業，——農業生產改造事業底槓杆，而是發展個人的農民的農業。在布哈林同志看來，最主要的就是使市場『常態化』，以及容許農產品市場上的自由玩弄價格，實質上就是容許完全的自由貿易。因為是這樣，所以他就對集體農莊採取不信任的態度，這種不信任的態度，當他在中央七月全會上演說時以及當他在中央七月全會以前起草提綱時，他就已經表現出來。因為這樣，所以他就對於在採辦糧食時為反對富農而採取的所有一切的和各種各樣的非常辦法都抱着否定的態度。大家都知道：布哈林同志躲避非常辦法，正好像邪鬼躲避正神一樣。大家都知道，布哈林同志一直到現在還不能了解，在目前的條件之下，富農不會自願地，按照自流手續來繳納充分數量的糧食。這一點現在已經由我們糧食採辦工作底兩年來的經驗所證實了。

如果商品糧食始終還是不夠，那又怎樣辦呢？布哈林同志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要用非常方法來驚動富農；從外國輸入糧食吧。不久以前，他還提議從外國輸入五千萬普特糧食，就是說，輸入價值一萬萬金盧布的糧食。如果金盧布需要用來輸入工業裝置品，那又怎樣辦呢？布哈林同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必須寧願從外國輸入糧食，這顯然是要把輸入工業裝置品的事情放在末尾的地位。

這樣就是說，爲要解決五穀問題和改造農業起見所需要的基礎，並不是加快速度發展工業，而是以自由市場及在自由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這一點做基礎來發展個人的農民的農業，富農的農業也在內。

這樣看來，這裏是有兩個不同的經濟政策計劃：

黨底計劃：

- 一、我們要改造工業；
- 二、我們要開始認真改造農業；
- 三、爲要做到這一步，就要擴展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底建設，廣泛地採用訂

立定貨合同制和設立農業機器站，以作爲建立工業與農業間的生產聯絡的手段。

四、至於說到現時糧食採辦方面的困難，那就必須承認，在這裏採取一種得着中農貧農羣衆底公共贊助的臨時的非常辦法，是可以的，這是打破富農底反抗和盡量取得他的剩餘糧食的手段之一，而爲要免得從外國輸入糧食和保存金幣來發展工業，就必須取得這些剩餘糧食。

五、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在給國家供給糧食和原料這件事情方面，現時有而且將來還會有主要的作用，可是單靠牠已經不夠了，——因此除發展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以外，同時還要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廣泛地採用訂立定貨合同制，加緊發展農業機器站，爲的是要易於把資本主義份子排擠於農業以外，易於把個體農莊漸漸移到大規模的集體農莊底軌道上去，移到集體勞動底軌道上去。

可是爲要達到這一切，就必須首先努力發展工業，五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拖拉機工廠，農業機器工廠等等。而如果没有這個條件，就不能解決五穀問題和改造農業。

結論就是：加快速度來發展工業，便是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布哈林同志底計劃：

一、使市場『常態化』，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和提高糧食價格，那怕這一點會弄到工業品，原料和糧食都昂貴起來。

二、盡力發展個體的農民的農業，而同時相當地降低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底發展速度（布哈林同志在七月間提出的提綱，布哈林在七月全會上的演說）。

三、用自流辦法採辦糧食；根據這種採辦法，那末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面都不容許採用——那怕就是局部地採用——非常辦法去對付富農，即使這些辦法得到中農貧農羣衆底贊助，都是不可以採用的。

四、如果採辦的糧食不夠，便拿出一萬萬盧布去從外國輸入糧食。

五、要是金幣不夠來同時開支糧食底輸入和工業裝置品底輸入，那就應該減少裝置品底輸入，也就是說降低我們工業發展底速度，——不然我們的農業就會『踏步原地』，也許還會『簡直下降』。*

結論就是：發展個體農民經濟，便是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事情底真相，就是這樣的，同志們！

布哈林同志底計劃，就是降低工業發展底速度和破壞新式聯絡的一個計劃。

我們的意見分歧，就是這樣。

我們對於發展新式聯絡：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等等這件事情，是不是做遲了呢？

有人斷定說，黨對於這件事情，至少遲做了兩年。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只有不懂得蘇聯經濟的『左的』空談家才能這樣說，所謂在這件事情上做遲了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事情是在於預先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必要，那末我們還在十月革命時就開始了這件事情。而關於黨還在十月革命時期就已預先看到了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這一點，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末了，還可以拿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三月）所通過的黨綱來看。集體農莊和蘇維

* 布哈林：經濟學家底意見。

埃農莊底必要，在那裏已經十分明顯地顧及到了。可是要實行和組織擁護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羣衆運動，單只靠我們黨底上層領導份子預先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還是不夠的。所以，問題不在於預先看到，而在於實現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建設底計劃。可是爲要實現這樣的計劃，就需要有好些條件，而這些條件，是我們以前所沒有的，這些條件只是在最近才表現出來。事情就在這裏，同志們。

爲要實行這個擁護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羣衆運動底計劃，爲要做到這一步，首先就需要使黨底上層機關在這方面首先得到黨員羣衆底贊助。而我們的黨是入數達百萬的黨，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因此，當時需要說服廣大的黨員羣衆，使他們相信上層領導機關底政策是正確的。這是第一。

其次，爲要做到這一步，就需要在農民羣衆裏造成擁護集體農莊的羣衆運動，要農民不害怕集體農莊，而根據經驗相信集體農莊是比個體農莊好些，並自動地跑進集體農莊去。而這一點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是需要花費相當時間的事情。這是

第二。

其次，爲要做到這一步，就需要國家有一批爲資助這個運動，爲資助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所必需的經費。而爲要資助這件事情，是需要許多萬萬款子的，親愛的同志們。這是第三。

末了，爲要做到這一步，就必需要使工業多少充分地發達，以使用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來供給農業。這是第四。

是不是可以斷定說，在兩三年以前我們已有了這一切條件呢？不，不能這樣說。

不可忘記，我們是執政黨，而不是反對黨。反對黨可以發出口號——我講的是運動底根本實際口號，——而打算在自己已取得政權以後去實現。誰也不能說，反對黨不立刻實現自己的基本口號是牠的過錯，因爲大家都懂得，當權的不是牠這個反對黨，而是別的黨。而我們布爾塞維克黨是執政黨，所以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種政黨底口號不是簡單的（鼓動的）口號，而是一種更大得多的東西，因爲這些口號

有實際解決底效力，有法律底效力，是應當即刻就實行的。我們的黨決不能提出實際的口號而然後把牠延擱不執行，如果這樣，那就是欺騙羣衆。要發出口號，特別是將千百萬農民羣衆轉移到集體制度底軌道上去這樣重大的口號，須要有可以使牠們直接實現的條件，末了，須要創造和組織這些條件。因此，單只是黨底上層機關預先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這對於我們還是不夠的。正是因爲這些緣故，所以我們需要有一些爲實現和切實執行我們的口號所必需的條件。

我們黨底黨員羣衆，比如說，在兩三年以前是不是已經有決心去盡量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呢？不，他們當時還沒有決心去做這件事情。黨員羣衆向着新式聯絡方面的重大轉變，只是從糧食採辦方面的第一批嚴重困難發生時才開始的。只是因爲發生了這些困難，黨員羣衆才覺得十分需要加速建立新式聯絡，首先就是加緊建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並堅決贊助自己的中央委員會來進行這件事情。這就是我們從前沒有而且現在却有一個條件。

兩三年以前，我們這裏是不是有過千百萬農民羣衆贊成集體農莊或蘇維埃農莊

的重大運動呢？是沒有的。人人都知道，兩三年以前農民是敵視蘇維埃農莊的，至於集體農莊，却被他們譏笑爲毫不中用的『共產社』。而現在呢？現在就不同了。現在我們這裏已有整批農民階層把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看作是使農民經濟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幫助的來源：種子，優良的牲畜，機器和拖拉機。現在，只要有機器和拖拉機，集體農莊底事業就會以加快的速度前進。

在某一些，很廣大的農民階層裏的這種轉變是從那裏來的呢？牠是由什麼促進了的呢？首先是由於合作制和合作運動底發展。無可懷疑的，如果沒有合作制，尤其是如果沒有農業合作制——這種合作制已在農民中間造成贊助集體農莊的心理基礎——底強大的發展，我們這裏就不會有像現在整批農民階層所表現的這種趨向於集體農莊的熱心。現有的組織得優良的集體農莊在這裏也起了大的作用，因爲牠們給了農民好的榜樣，表明將小農的農莊合併爲大規模的農莊，合併爲集體農莊，是可以怎樣改良農業。這裏發生了相當作用的，還有現成的設備得優良的蘇維埃農莊，因爲牠們幫助了農民改良他們的農業。我還不說到大家所熟悉的其他的事實。

這就是我們從前所沒有過的而現在却有了的又一個條件。

其次，可不可以斷定說，兩三年以前我們曾有可能去認真地資助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發出數萬萬盧布來資助這件事情呢？不，不能這樣斷定說。你們明白知道，我們在當時連用去發展最低限度的工業（沒有這樣最低限度的工業便根本不能有任何的工業化）的經費都不夠，更不用說去改造農業了。當時我們不是可以從那成爲國家工業化底基礎的工業方面取出這些經費，而把牠們轉給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顯然是不可以的。可是現在呢？現在我們已有經費來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了。

末了，可不可以斷定說，兩三年以前我們已在工業方面有了充分的基礎來加緊着拿機器和拖拉機去供給農業等等呢？是不能這樣斷定說的，那時的任務，在於創造最低限度的工業基礎，以便將來用機器和拖拉機來供給農業。當時我們的區區的款項也就用去創造這種基礎。可是現在呢？現在我們已有這種工業基礎以供給農業底需要。無論如何，這種基礎，在我們這裏，正在以加快的速度創造起來。

可見，爲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底大批發展所必需的條件，只是在最近時候才造成的。

同志們，事情底真相就是這樣的。

正是因爲這些緣故，所以不能說我們把發展新式聯絡這件事做得太遲。

六 布哈林同志是怎樣的理論家

右傾反對派底理論家——布哈林同志——在我們的政策底這些基本問題上的主要錯誤，大體就是這樣。

有人說，布哈林同志是我們黨底理論家。他當然是一個理論家，而且是不小的理論家。可是問題底實質就在於，他的理論並不完全是高明的。這只要看他在黨的政策底問題上所作出的那一大堆錯誤，——關於這些錯誤，我在上面已經講過——就可以知道。這些錯誤，關於共產國際問題上的錯誤，關於階級鬥爭問題，關於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關於農民問題，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關於聯絲底新形式

問題所犯過的這些錯誤，決不能是偶然出現了的。不，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牠們，布哈林同志底這些錯誤，是從他的不正確的立場，從他的理論缺點中產生出來的。是的，布哈林同志是個理論家，可是他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他這個理論家還得要補習一下以後，才可以成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

有些人總是藉口說列寧那封給了理論家布哈林以估計的著名的信。現在來談一談這封信吧。列寧說：

『從年青的中央委員中間，我想關於布哈林和皮達可夫說幾句話。我以爲這是最出色的人材（就最年輕的人材來說），關於他們須要注意以下一點：布哈林不但是黨內極寶貴的和極巨大的理論家，他還理應被看作是全黨所喜愛的人，可是要把他的理論觀點算作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是很可懷疑的，因爲在他的思想裏有些學究氣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並且我想，他從來也沒有完全懂得辯證法）。』*

總之，不懂辯證法的理論家。學究式的理論家。要把他的『理論觀點算作是完

* 一九二六年七月全會底記錄，第四卷第六六頁。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是很可疑的』的理論家。列寧對於布哈林同志底理論面目的估計，就是這樣。

同志們，你們自己都懂得，這樣的理論家還得要補習一下。如果布哈林同志懂得：他還不是一個完全成熟的理論家，他還需要補習，他是一個還沒有完全領會辯證法的理論家，而辯證法却是馬克思主義底精髓，——如果他懂得這一點，他就會謙遜一些，而這樣一來，對於黨只會有好處。但是倒靈處就在於布哈林並不過於謙遜。倒靈處就在於他不僅不過於謙遜，而且關於好些問題，首先是關於國家問題，他還想去教訓我們的教師列寧。同志們，倒靈處就在這裏。

在這裏，我要引證一九一六年列寧與布哈林關於國家問題所發生的著名的理論上的爭辯。這一點對於我們很重要，以便揭露布哈林同志底太不量力的野心，想去教訓列寧的這種野心，同時也可以揭露他在這樣的重要問題上，如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階級鬥爭問題等等上的理論弱點底根源。大家知道，一九一六年在少年國際雜誌上登出布哈林同志底一篇文章，署名爲 *Nota Bene*，這篇文章在事實上是用來

反對列寧的。布哈林同志在這篇論文內寫道：

『……要是認為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間的區別，在於前者贊成國家而後者反對國家，那就完全錯了。實際上區別就在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想要組織新的社會生產，作為集中的，即是技術上最進步的生產，而不集中的無政府主義的生產，却只是退步到舊的技術，舊式企業……。』

『……社會民主黨是，或者至少應當是羣衆底教育者，對於這個黨，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必須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則上敵視國家的態度……。現在的戰爭已經指明國家觀念底根蒂是何等深入到工人底心靈內去了。』

列寧批評布哈林同志底這些觀點。於一九一六年發表了一篇專門論文回答：

『這是不對的。作者提出的問題是，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上有什麼區別，而所回答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另一個問題——他們對將來社會底經濟基礎的態度上有什麼區別。這當然是很重要和必要的問題。可是並不因此而就可以把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上的主要區別忘記。社會主義者主張在謀工人階級底解放的鬥』

爭中利用現代的國家及其各機關，同樣也主張必須利用國家作爲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者的特殊的過渡形式。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的過渡形式，牠也是一種國家。無政府主義者想「取消」國家，想「炸毀」(Sprengen)牠，如 *Nota Bene* 同志在一個地方就這樣說而把這種觀點誤推在社會主義者頭上。社會主義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關於這問題所說的話引得太不完全了，——認爲，在資產階級被剝奪以後，國家就要衰亡，「漸漸」「死去」……。

「……要想「着重指出」對於國家的「原則上敵視態度」，就要真正「明白」懂得這態度，而作者恰恰就沒有明白性。」「國家觀念底根蒂」這種話，是完全糊塗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是社會主義的。並不是「國家觀念」碰着了國家觀念否定，而是機會主義的政策（這種政策就是以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態度去對待國家）碰着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政策（這種政策，就是以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態度去對待資產階級的國家和以這樣的態度去利用國家來反對資產階級，以便推翻這階級）這是完完全全不相同的東西。」*

* 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九六頁，少年國際。

這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布哈林同志是滾入了何等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泥潭，這大概是明白了吧！

斯騰說道：那時列寧還沒有盡量規定『炸毀』國家底必要。而布哈林雖然是犯了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却已着手去規定這個問題。

斯大林繼續說道：斯騰同志，不是的，現在講的不是關於這一點，現在講的是對於國家的一般態度，是關於這一點，就是依布哈林底意見，工人階級應當在原則上仇視任何國家，工人階級底國家也在其內。

斯騰說道：那時列寧只講到關於利用國家的問題，而關於『炸毀』問題，他在批評布哈林同志時，却絲毫也沒有講到。

斯大林繼續說道：斯騰同志，你弄錯了。我敢給你担保，這裏講的是關於，依布哈林（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底意見，工人階級應當着重指明自己對於任何國家，因而也是對於過渡時期的國家，對於工人階級底國家的原則上的仇視態度。你試去向我們的工人解釋，說工人階級應當極力在原則上仇視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

級專政也是國家。布哈林在少年國際雜誌上的論文中所發揮的主張，就是否認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國家的主張。布哈林同志在這裏忽略過了一件『小事』，就是他忽略過了一個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工人階級如果的確想鎮壓資產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便不能不要有自己的本身所有的國家。這是第一。第二，說列寧同志在自己的批評中沒有講到關於『炸毀』、『取消』一般國家的理論，這是不對的。列寧不僅講到了這種理論，這從我們所引過的那段話內可以看出來，而且他還會批評牠，說牠是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並提出關於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創造新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理論來與牠對立。末了，不要把無政府主義的關於『炸毀』國家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打破』、『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理論混爲一談。同志們中間有人喜歡把這兩個不同的觀念混爲一談，認爲牠們都是同一個思想底表現。可是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在批評無政府主義的關於『炸毀』和『取消』一般國家的理論的時候，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理論爲出發點的。

要是我爲着更明白起見，把列寧關於國家問題的手稿之一——這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末或一九一七年初（二月革命以前）寫的——引出來，或許不是沒有益處的。從這篇手稿中可以容易看到：（一）列寧批評布哈林同志底無政府主義的關於國家問題的錯誤的時候，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理論爲出發點；（二）雖然布哈林，依列寧底說法，『比考茨基較近真理』，可是他還是『並沒有揭破考茨基派，反而用自己的錯誤去幫助他們』。請看這篇手稿底原文：

在關於國家問題方面有非常重要意義的，是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六號至二十八號，恩格

斯寫給伯爾的一封信。

請看這封信底整段最重要的地方：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照這幾個字底文法意思講來，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自己的公民的國家，卽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所有這一套關於國家的廢話了，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在原來意思上的國家了。無政府主

義者利用「人民國家」這字眼來攻擊我們已太够了，雖然馬克思底那些用以駁斥普魯東的著作和以後的共產黨宣言，都已經簡直說過：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施行時，國家就要自行解散（*sich auflöst*）和自行消滅。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時，在革命時不得不利用來以暴力來鎮壓自己的敵人的一種臨時機關，那麼關於自由的人民國家的說話就是純粹的無謂之談：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時，他不是為自由起見而需要牠，而是為鎮壓自己的敵人起見而需要牠。而到了有可能來談到自由時，國家就不成其為國家了。因此，我們要提議到處用「公社」（*Gemeinwesen*）這個字眼來代替國家這個字眼，公社這個字眼是一個很好的德國古字，與法文的「康姆納」相當。」（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

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裏大概是最顯著的和最激烈的『反對國家』的議論了。

(一)『應當拋棄所有這一套關於國家的廢話。』

(二)『公社已經不是在原來意思上的國家了。』

(到底是什麼呢？顯然是由國家到無國家的過渡形式！)

(三)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這字眼來『攻擊』(原文 in die Zähne gewor-

ten——打嘴巴)我們已經够了(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他們的德國朋友犯了這個顯

然的錯誤而覺得不好意思；然而他們認為，依當時的情況當然是正確地認為，這個錯誤比無政府主義者底錯誤是比較不重要得多。這要 (N.B. II)。

(四)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施行時』，國家便會『自行解體和自己消滅』……『自行解散』 (Nota Bene) (請與以後的『衰亡』字眼對照看)……

(五) 國家是『在鬥爭時，在革命時』所需要的『臨時機關』……(當然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

(六) 國家之需要，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壓倒 (Niederhaltung)——這個字並不是壓倒這個字底本來意思，而是制止復辟，鎮服) 無產階級底敵人。

(七) 有自由的時候就不會有國家。

(八) 『我們(即是恩格斯和馬克思)要提議『到處』(在綱領上)不講『國家』而講『公社』 (Gemeinwesen)，『康姆納』！

由此可見，不只是機會主義者，而且是考茨基，也是如何俗化了和污辱了馬克思與恩格斯。

這八項最豐富的思想，機會主義者一項也沒有懂得！

他們只採取了現有東西底實際需要：利用政治鬥爭，利用現代國家來訓練和教育無產階級，來『奪得讓步』。這是對的（反對無政府主義者），但這還只是百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如果可以這樣用算術名詞來表示的話。

考茨基在他的宣傳作品和一般的時評著作上，完全抹煞了（或者是忘記了？或者沒有懂得？）馬克思底一、二、五、六、七、八等項和“Zerbrechen”這個字。（考茨基在一九一二或一九一三年與潘業枯克辯論時（看下面四十五頁至四十七頁），關於這個問題已完全滾落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

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主張現在利用國家和（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候也利用國家（『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目前對於實際工作最重要的幾項。（布哈林正是把這幾項忘記了！）

使我們與機會主義者不同的，就是以下的幾點更深刻，『更恒久的』真理，就是：

（一）國家是有『暫時』性的；（二）現在關於國家的『廢話』是有毒的；（三）無產階級專政不完全帶有國家底性質；（四）國家與自由是相矛盾的；（五）應當用『公社』這個字眼代替國家這個字眼，『公社』這個字眼是比較更正確的觀念（概念，綱領名辭）；

(六)應『打破』(Zerbrechen)軍閥官僚的機器。還有一點不可忘記，就是德國公開的機會主義者(伯恩斯坦，科里布等)直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而正式綱領和考茨基便間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因為他在日常鼓動中不談到牠，並容忍科里布等人底叛徒行爲。

一九一六年八月，已經向布哈林寫過：『請你護自己的關於國家的思想完全成熟罷』。可是，他並沒有護自己的這種思想完全成熟，而就在刊物上發表了，署名爲『Nota Bene』，而且他所發表的意見並沒有揭破考茨基派，反而是用自己的錯誤去幫助了他們！可是實際上布哈林是比較考茨基近於真理的(列寧)。

關於國家問題的理論爭辯底簡略歷史就是這樣。

問題本來似乎是很明顯的：布哈林犯了半無政府主義的錯誤，——早已應當改正這些錯誤，而跟着列寧底脚步前進。可是只有列寧主義者才能這樣想。布哈林却不同意這一點。他反而斷定說，不是他錯了，而是列寧錯了，不是他跟隨了或者應當跟着列寧底脚步走，而是相反，原來列寧不得不跟隨布哈林底脚步走。同志們，你們不相信嗎？如果不相信，請再聽下去吧。自從一九一六年發生這些爭論以

後，已經九年了，在這九年之內布哈林同志沒有做聲，在列寧死後過了一年，就是在一九二五年，布哈林同志把他的關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理論這篇論文登在法權底革命彙刊上，而這篇論文就是以前社會民主黨人彙刊編輯部（即列寧）所沒有接受來發表的，他在這篇論文底附註上面簡直說，在這次爭論中，對的並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同志們，這看起來是很奇怪的，然而這却是事實。

請聽聽這個附註底本文：

「依里奇（即列寧）曾經發表一篇評論來反對少年國際雜誌上的一篇論文。讀者容易看到，人家曾經說我有錯誤，可是我本來沒有錯誤，因為我明白看見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另一方面，從依里奇底評論中可以看出，他那時對於炸毀國家（當然是資產階級國家）的這種原理有了不正確的態度，他把這個問題和無產階級專政底衰亡問題混淆了。也許我那時應當多多發揮專政的問題。但是我以這樣來替自己辯白，就是那時候社會民主黨人曾經這樣風行一時地讚美資產階級的國家，以至於在這種情形下面，自然要把全部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注意力集中在關於炸毀這架機器的問題上。

當我由美國回到俄國而碰見了克魯普斯加姬同志的時候（這是在我們的秘密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這時依里奇已躲藏起來），她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說：「依里奇叫我向你轉達，說關於國家問題，他現在與你並沒有什麼意見分歧」。 依里奇研究問題時，也得出了關於「炸毀」的同樣結論，可是他是這樣發揮了這個題目以及關於專政的學說，以致於在這方面的理論思想發展中開闢了一個新紀元。」**

布哈林同志在列寧死後經過一年的時候，就是這樣議論列寧的。

這就是沒有學習成就的理論家過分妄自尊大底標本。也許克魯普斯加姬同志真是對布哈林同志說過他在這裏所寫的話，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從這裏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只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列寧曾經有了一些根據來意料布哈

* 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 法權底革命第一冊，一九二五年共產主義學院出版，第五頁。

林同志已經放棄了或者已決意放棄自己的錯誤。不過是這樣罷了。可是布哈林同志却有了另外的打算。他斷定了，從今以後應該算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底創造者或至少是發啓人的，並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同志。

我們向來都認爲，並且現在還照舊認爲我們自己都是列寧主義者。可是現在才知道：列寧和他的學生——我們，原來都是布哈林主義者。同志們，這是有點兒好笑。可是布哈林同志既然要這樣過分妄自尊大，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也許可以設想，布哈林同志在上述這篇論文底附註上不過是偶然失言，說了一句蠢話，後來已經把他忘記了。可是這原來是不對的。布哈林同志底話，原來是完全認真說出來的。這一點可以從這樣一件事實中間看得出來，就是布哈林同志在這個附註中所說的關於列寧底錯誤和布哈林底有理這種話，在不久以前，就是說在一九二七年，就是說在布哈林同志第一次襲擊列寧以後已經過兩年的時候，又在馬列茨基同志所作的布哈林同志底傳略裏發表出來了（請參看蘇維埃百科全書），並且布哈林同志連想都沒有想到要去抗議馬列茨基同志底這種……大膽行爲。顯然的，

布哈林同志底反對列寧的言論，決不可以認爲是偶然的。

這樣說起來，那末對的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寧，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底發啓人不是列寧，而是布哈林。

同志們，布哈林同志底理論上的錯誤和理論上的妄自尊大，就是這樣的。

雖然是這樣，這個人却還是有勇氣來在這裏，在自己的演說裏，說在我們黨底理論立場上『有些腐朽東西』，說在我們黨底理論立場上有趨於託洛茨基主義的傾向，而說這樣語的，就正是這個布哈林同志，這個布哈林同志現在正犯着（而且過去已經犯過）好些最粗鄙的理論錯誤和實際錯誤，不久以前還作過託洛茨基底門生，昨天還找過託洛茨基派做同盟者來反對列寧主義者，還與他們暗中私通過！同志們，這難道不是好笑嗎？

七 是五年計劃呢，還是兩年計劃呢

現在來講李可夫同志底演說。要是布哈林同志企圖給右傾思想以理論的基礎，

那末，李可夫同志就極力想在自己的演說中替這件事情立定實際提議的基礎，拿我們農業方面的困難底『可怕情形』來恐嚇我們。這並不是說，李可夫同志沒有提到理論問題。不，他提到了這些問題。可是他提到這些問題的時候，至少是犯了兩個嚴重錯誤。

李可夫同志所提出的關於五年計劃的決議草案，被中央政治局專門委員會否決了，那草案上說，『五年計劃底中心思想就在於國民勞動生產率底增長』。雖然中央政治局專門委員會把這種完全不正確的立場否決了，可是李可夫同志竟在這次演說中擁護了這種立場。說在蘇維埃國家內五年計劃底中心思想就在於勞動生產率底增長，這話對不對呢？不，不對的。並不是國民勞動生產率底任何的增長，都是我們需要的。我們所需要的是國民勞動生產率底一定的增長，就是——需要足以保證國民經濟底社會主義部門有系統地超過資本主義部門的這種增長。同志們，問題底實質就在這裏。五年計劃如果忘掉這個中心思想，那末牠就不是五年計劃，而是五年廢話。勞動生產率底一般的增長，是任何一個社會所願意的，無論資本主義社會

也好，無論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也好，都是願意有的。蘇維埃社會與其他任何社會不同的地方也正在於，牠所願意有的，並不是勞動生產率底任何的增長，而只是這種一種增長，這種增長要能夠保證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超過其他各種經濟形式，首先是超過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如此而保證征服和排擠出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而李可夫同志却把蘇維埃社會發展五年計劃底這種真正中心思想忘記了。這裏就是他的第一個理論錯誤。

他的第二個錯誤就在於，從商品週轉底觀點上看來，他不懂得（比如說）集體農莊和任何個人農莊，——就中也包括資本主義的個人農莊——中間的分別，或不願意明瞭牠們中間的分別。李可夫同志斷定說，從糧食市場上商品週轉底觀點上看來，從取得糧食的觀點上看來，他看不見集體農莊與糧食私有主間的分別，所以，在他看來，我們是從集體農莊方面，從私有主方面，還是從某個阿根廷的糧食商販方面去買糧食，橫直都是一樣。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這是重複伏龍金同志底著名言論，伏龍金同志有一個時候曾經對人說，在他看來，在何處以

及向何人，向私有主還是向集體農莊去買糧食，橫直都是一樣的。這就是給糧食市場上的富農詭計作暗藏式的擁護，辯護與辯白。雖然這種擁護是從商品週轉底觀念上進行的，可是這個事實並不改變事情底實質，就是這種擁護畢竟還是替糧食市場上的富農詭計辯白。如果從商品週轉底觀點上看來，集體形式的經濟與非集體形式的經濟之間沒有分別，那麼，是不是值得去發展集體農莊，是不是值得給牠們以優待條件，是不是值得去實現那征服農業上的資本主義成份的困難任務呢？李可夫同志顯然是採取了不正確的方針。這裏就是他的第二個理論錯誤。

而且這還不過是順便說的話。現在來講李可夫同志底演說中所提出了的實際問題。

李可夫同志在這裏斷定說，除了五年計劃之外，還需要有另外的平行的計劃，就是發展農業底兩年計劃。他引用農業上的困難作為提議平行的兩年計劃的根據。他說過：五年計劃是好事情，他也是贊成的，可是如果我們同時還擬定農業底兩年計劃，那就更好，——要不然，農業事情就會停頓。表面上看來，這個提議似乎一

點也不壞。可是如果切實去考察一下，就可看出，他之所以想出農業底兩年計劃，原來是爲的要着重指出五年計劃是不切實的，是紙上的，而兩年計劃是切實的，可行的。我們能夠同意這一點嗎？顯然是不能夠的。我們會向李可夫同志說過：如果你不滿意農業方面的五年計劃，如果你認爲五年計劃上所規定的用去發展農業的款子不夠，就請公開說出你的補充提議，說出你的補充投資數目來，——我們同意把農業上的這些補充投資加在五年計劃上。結果是怎麼樣呢？原來李可夫同志並沒有什麼關於農業上的補充投資的補充提議。試問，那麼農業底平行的兩年計劃要着幹什麼呢？我們往後又向他說過：除了五年計劃之外，還有每年計劃，這是五年計劃底一部份，——請把你關於振興農業方面的補充的具體提議加進頭兩年的每年計劃上面去，如果李可夫同志一般地是有這些提議的話。結果怎麼樣呢？原來李可夫同志並沒有提出這樣的關於補充撥款的具體計劃。那時我們就明白了李可夫同志關於兩年計劃的提議，並不是要去振興農業，而是想來着重指出五年計劃是不切實的紙上計劃，而是想來破壞五年計劃。爲着安慰「心靈」，爲掩飾門面，就需要五年計

劃，爲着進行事情，爲進行實際工作，就需要兩年計劃，——李可夫同志底戰略，原來就是這樣。李可夫同志提出兩年計劃來，是爲着在以後，在五年計劃底具體實行過程中，好拿兩年計劃來對抗五年計劃，好來改造五年計劃，使五年計劃遷就兩年計劃，這樣來縮小和刪削那些用來發展工業的經費。

我們之所以否決了李可夫同志底關於平行的兩年計劃，就是因爲有了這些理由。

八 關於耕種面積問題

李可夫同志在這裏恐嚇我們黨，說蘇聯底耕種面積有經常不斷的縮小下去的趨勢。同時他暗指着黨，暗示說，耕種面積底縮小應歸咎於黨底政策。他沒有公開說出，我們的事情正趨向於退化。可是從他的演說中可得出這樣的印象，就是說我們這裏是有類似退化的現象。說耕種面積有經常不斷的縮小下去的趨勢，這種話對不對呢？是不對的。李可夫同志在這裏所採用了的，是關於全國耕種面積的平均計

算。可是平均計算的方法，不用各區的統計材料來參照，就不是科學的方法。也許李可夫同志曾經讀過列寧著的資本主義底發展這本書。如果他讀過，他定當記得，列寧怎樣在那裏罵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因為他們關於耕種面積底發展是採用平均計算法，而忽視各區的統計材料。奇怪的是李可夫同志現在重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庭錯誤。所以，要是按區考察耕種面積底變動，即是說要是依科學方法來考察問題，那末，得出的結論就是：在有的區域裏，耕種面積是有經常不斷的增加，在有的區域裏，耕種面積，主要地是隨着氣候條件爲轉移而有時減少，並且沒有這樣的材料可以證明，我們在什麼地方，那怕就是在某一個重大的糧食區域內，是有耕種面積經常不斷的縮小下去的情形。

實際上，在有幾個受了大冰凍或旱災的地方，例如烏克蘭有幾個區域，耕種面積近來有了縮小。

座位上有人說道：並不是整個烏克蘭。

施里赫特說道：在烏克蘭，耕種面積已增加了百分之二點七。

斯大林繼續說道：我說的是烏克蘭底荒地帶。可是在其他各區，例如在西伯利亞，在窩瓦河一帶，在哥薩克斯坦，在巴什基里亞，沒有被不良的氣候條件所牽累的地方，耕種面積是有系統地增加着。爲什麼在有些區域裏耕種面積有系統地增加，而在別個區域裏却有時減少呢？其實不能說，黨底政策在烏克蘭是一樣，而在蘇聯底東部或中部又是另一樣。同志們，這是講不通的。顯然的，氣候條件在這裏有不小的意義。

對的，富農不管氣候條件如何而縮小着耕種面積。這裏也許可以「歸咎」於黨底政策，因爲黨底政策是要幫助貧農中農羣衆反對富農。可是由此得出什麼結論呢？難道我們曾在什麼時候答應過要進行一種能使鄉村中一切社會集團都能滿意——連富農也能滿意——的政策嗎？而且一般地說來，如果我們一般地想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政策，那末難道我們可以實行一種能夠使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都能滿意的政策嗎？如果由於我們實行了這種以限制和克服鄉村資本主義成份爲目標的列寧主義的政策的結果，富農便開始局部地縮小了自己的耕種，那末這有什麼特別呢？難道

可以不這樣嗎？也許這個政策是不對的吧，——那末就請向我們公開這樣說。稱自己爲馬克思主義的人們，看見富農局部地縮小耕種，就大驚小怪地說是一般耕種面積縮小而忘記，除了富農之外還有貧農和中農，他們的耕種正在推廣，還有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牠們的耕種正在以加快的速度增長着，這不是很奇怪嗎？

末了，在李可夫同志底演說辭內，關於耕種面積問題還有一個不正確的說法。

李可夫同志在這裏訴苦，說有的地方，就是在集體農莊最發達的地方，貧農中農的個人耕種面積開始在縮小。這是對的。可是這有什麼壞處？不這樣又能怎樣呢？如果貧農中農開始拋棄個人的耕地而加入集體農莊，那末集體農莊底推廣和增多就應當同時引起貧農中農個人耕地相當的縮小，這難道不明白嗎？你想要怎麼呢？現在集體農莊方面有兩百多萬公畝的土地。到五年計劃之末集體農莊將有二千五百萬公畝以上。集體農莊耕地是用什麼人底土地來擴展的呢？是用貧農中農的個人的耕地。而你們想要怎麼樣呢，親愛的同志們？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來使貧農中農的個人農業轉移到集體農業底軌道上去呢？集體農莊的耕地將在許多區域內靠着合

併個人農莊的耕地而發展，這難道還不明白嗎？人們不願意了解這種簡單的事情，真是奇怪。

九 關於糧食採辦問題

關於我們的糧食困難，人們在這裏說了一大堆荒唐話。可是把我們的糧食的行情的困難方面的要點却忽略過去了。首先就是忘記了，我們今年所收穫了的黑麥和小麥，——我說的是收穫總量，——比去年少了五六萬萬普特。這能夠不影響到我們的糧食採辦事業嗎？當然是不能夠不影響到。也許這應歸咎於中央委員會底政策吧？不，這是與中央底政策無關的。這種現象是由於烏克蘭底荒原地帶有了嚴重的歉收（大霜凍，旱災），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區以及西北區有局部的歉收。主要地也就是因為這一點，所以去年我們在烏克蘭到四月一號時已採辦了二萬萬普特糧食（黑麥和小麥），而今年却總共只採辦了二千六百萬到二千七百萬普特。小麥與黑麥底採辦在中央黑土區差不多降低了七倍，在北高加索差不多降低了三倍，也就

是因爲這一點。今年在東方糧食採辦，有幾區內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是這當然不能補償，而且也沒有補償我們在烏克蘭，在北高加索和中央黑土區所有過的糧食採辦不足的情形。不要忘記，在常態的收成之下，在烏克蘭與北高加索所採辦的糧食，等於蘇聯所採辦的全部糧食底一半以上，而有時還甚至於三分之一。李可夫同志把這種情況忽略過去了，真是奇怪。

最後，還有第二個情況，這種情況是我們的糧食採辦的行情性的困難方面的主要關鍵。我所指的是鄉村中富農和豐裕份子反抗蘇維埃政府底糧食採辦政策。李可夫同志避開了這種情況。可是避開這一點，就是避開糧食採辦事情上的主要關鍵。最近兩年來的糧食採辦方面的經驗證明什麼呢？牠證明，鄉村中的殷實階層，手內握有大部份剩餘糧食，並在糧食市場上起指揮作用，他們不願意把我們所需要的糧食，依蘇維埃政權所規定的價格自願地賣給我們。我們每年大約需要五萬萬普特的糧食來供給城市和工業地點，供給紅軍和工藝原料作物區域。依自流底辦法我們大約能採辦到三萬萬到三萬五千萬普特。其餘一萬五千萬普特，不得不用對富農及鄉

村殷實階層施行強迫辦法來取得。最近兩年來糧食採辦的經驗所證明給我們看的，就是這樣。

最近這兩年以來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的變遷是從那裏來的，爲什麼自流辦法在從前有濟於事，而現在却已經不夠了呢？所發生了的事情就是：富農和殷實份子在這幾年內已長大起來了，幾次豐年對於他們不是白白地過去了的，他們在經濟上強固了，積累了一些兒資本，現在他們能在市場上投機，把自己的剩餘糧食屯積起來，以等待高價，而拿別的農作物來週轉週轉。糧食不是平常的商品。糧食不比棉花，棉花不能吃，不是見人就能賣出的。在我們現今這種條件之下，糧食與棉花不同，牠是這樣一種商品，這種商品是大家都要的，沒有牠就不能生存。富農注意到這一點，因此他把糧食屯積起來，使一般的糧食所有人都沾染這種風氣。富農知道，糧食是金幣中的金幣。富農知道剩餘糧食不僅是使自己發財的手段，而且是用以束縛貧農的手段。富農手上的剩餘糧食，在現今的條件之下是加強富農份子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的手段，因此，我們從富農方面取得這些剩餘糧食，這不僅便利着

城市和紅軍底糧食供給，而且根本破壞着那個使富農底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加強的手段。

要得到這些剩餘糧食，需要怎樣辦呢？首先需要消滅自流主義底心理，因為這種心理是有害的和危險的東西。需要組織糧食採辦。需要動員貧農中農羣衆來反對富農，並組織他們來共同擁護蘇維埃政權底那些加強糧食採辦工作的辦法。烏拉爾和西伯利亞依自動規定徵收額的原則所實行的糧食採辦方法底意義，正是在於，牠使得有可能來動員鄉村中勞動階層去反對富農以加緊糧食採辦的工作。經驗指明了，這個方法使我們得到良好的結果。經驗指明了，這些良好結果我們是在下面這兩方面得到的：第一，我們徵取鄉村富裕階層底剩餘糧食，這樣來便利國家底供給事業；第二，我們在這事情上動員貧農中農羣衆反對富農。在政治上教育他們，將他們組織爲我們在鄉村中的強有力的，成千百萬人的政治軍隊。有些同志沒有注意到這第二種情形。然而，這種情形，正就是烏拉爾西伯利亞的糧食採辦方法底重要結果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結果的話。固然，有時候，除這個方法以外，還同時

採用非常辦法來對付富農，這就引起布哈林及李可夫兩同志底可笑的叫喊。可是這有什麼壞處呢？爲什麼不能在有些時候，在相當的條件之下，採用非常辦法來對付我們的階級敵人，來對付富農呢？爲什麼在城市內可以成百地逮捕投機商人，將他們逐到土魯汗去，而對於那些企圖扼住蘇維埃政權底咽喉和束縛貧農的富農們，就不能用社會制裁的辦法，按貧農中農賣糧食給我們採辦機關的價格去取得他的剩餘糧食？這是從那裏得出來的結論呢？難道我們的黨曾經說過他在原則上反對採用非常辦法去對付富農嗎？李可夫和布哈林兩同志，顯然是在原則上反對採取任何一種非常辦法對付富農的。可是親愛的同志們，須知這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策。你們不能不知道，列寧在施行新經濟政策以後，甚至主張——當然是在相當的條件下面——恢復貧農委員會底政策。可是什麼是局部地用非常辦法來對付富農呢？這與貧農委員會底政策比較，甚至於還算不得滄海一粟。

他們，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希望說服階級敵人，使他自願放棄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剩餘糧食自願賣給我們。他們希望，富農——已經長大了的，並有可能拿

別的農作物來實行週轉的，隱藏着自己的剩餘糧食的富農，——會依照我們的糧食採辦價格而自願把自己的剩餘糧食賣給我們。他們不是發了昏嗎？他們豈不是顯然不懂得階級鬥爭底關鍵，顯然不知道什麼是階級嗎？他們是不是知道在我們爲着加強糧食採辦工作而召集的鄉村會議上面，富農怎樣譏笑我們的工作人員和蘇維埃政權。他們是不是知道這樣的事實，就是例如在哥薩克斯坦，我們的鼓動員費了兩點鐘工夫去勸說糧食所有人把糧食交出來供給國家的時候，有一個富農口裏啣着烟斗出來講話，向着這位鼓動員回答：『喂，小孩子請你在我面前跳一跳舞，我就給你兩個普特糧食。』

座位上有人喊道：真是混賬忘八蛋！

斯大林繼續說道：請你們試試說服這樣的人吧。同志們，階級到底還是階級啊。誰也跳不出這個真理。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方法底好處，本來也就在於，牠使得更有可能來推動貧農中農階層去反對富農，使得更有可能來打破富農底反抗和強迫他們把剩餘糧食交給蘇維埃政權機關。

現在新反對派中間，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中間，最時髦的字眼就是糧食採辦上的「過火」這兩個字。這兩個字在他們那裏是最通行的貨物，因為牠幫助他們掩飾自己的路線。當他們想掩飾自己的路線時，他們通常是這樣說：我們當然不反對壓榨富農，可是我們反對在這方面所犯的和觸犯中農的那些過火行動。然後就來描寫這些過火行動底可怕情形，宣讀「農民」底信，宣讀如馬爾科夫同志這類同志們底大驚小怪的信件，然後做出結論：須要取消壓榨富農的政策。因為實行正確的政策時有了過火行動，所以就·需要·取消·這個·正·確·的·政策，這豈不很好嗎？機會主義者底慣技就是這樣：藉口說在實行正確路線時有過火行動而要求取消這個路線，用機會主義的路線來代替這個路線。同時布哈林同志這派裏面的人，小心地瞞着這樣的事實，就是還有另一種過火行動，更危險和更有害的過火行動，——這種過火行動，就是走向與富農結合，走向遷就鄉村裏富裕階層，走向用右傾份子底機會主義政策去代替黨底革命政策。

當然，我們大家都是反對這些過火行動。我們大家都是反對把用去對付富農的

打擊拿來觸動中農。這是顯然的，這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可是如果用布哈林同志這派人所努力使用的關於過火行動的那一套廢話來破壞我們黨的革命政策和用布哈林同志這派人底機會主義政策來暗中代替牠，那我們是堅決反對的。同志們，不行的，『你們的這套把戲是要不通的』。

請你們說一說，在黨底政治辦法裏，究竟有那一個政治辦法在實行的時候，沒有附帶發生某些過火行動。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要與過火行動作鬥爭。可是難道可以根據這一點就責罵路綫底本身，唯一正確的路綫底本身嗎？就拿實行七小時工作日這樣的辦法來講吧。這個辦法是我們的黨最近所實行的最革命的辦法之一，這是不容有絲毫懷疑的。誰不知道，這個在實質上很是革命的辦法，在我們這裏實行的時候就附帶發生過好些過火的行動，有時還是極可惡的過火行動。這是不是說，我們應當取消實行七小時工作日的政策呢？新反對派方面的同志們是不是懂得，他們動不動就拿糧食採辦工作上過火行動拿來做藉口，這是滾到何等污濁的泥坑裏去了。

四 關於與右傾鬥爭問題

這樣，我們已經再三分析了我們的意見分歧底一切主要問題。無論是在理論方面，無論是在我們黨底共產國際政策及內部政策方面，都講過了。由以上所述，就可以看出，李可夫同志關於在我們這裏有一致的路線的意見，是不符實情的。由以上所述，就可以看出，我們這裏實際上有兩條路線。一條是黨底總路線，是我們黨底革命的列寧的路線。另一條路線就是布哈林同志這一派底路線。這第二條路線還沒有完全形成，這局部地是因爲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裏面觀點非常糊塗不清，局部地是因爲這第二條路線由於自己在黨內比重上的軟弱，所以總想這樣或那樣戴着假面具。可是牠，這條路線，到底還是存在着（這是你們所看到的），而且是一條與黨底路線不同的路線，是一條差不多在黨政策底一切問題上與黨底總路線對立的路線。這第二條路線在基本上是右傾底路線。

布哈林同志在這裏說，中央政治局三個委員受着『精神上的死刑』，他說，

這三個委員被我們各個組織「當衆批評着」。他說，黨已經使政治局底這三個委員——布哈林，李可夫和湯姆斯基——受着「精神上的死刑」，在刊物上和會議上批評他們的錯誤，可是他們——政治局底這三個委員——却「不得不」閉口不言。同志們，這是廢話。這是自由主義化的共產黨員底妄言，這種共產黨員企圖削弱黨底反右傾的鬥爭。

照布哈林說來，要是他和他的朋友們犯了右傾的錯誤，那末黨是沒有權利來揭破這些錯誤的，黨應當停止與右傾的鬥爭，等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們自願放棄自己的錯誤。布哈林同志所要求於我們的不是太多了嗎？他不是不是以為，黨是爲着他而存在，而不是他爲着黨而存在呢？當全黨動員起來反對右傾，進行決戰去征服困難的時候，誰強迫他閉口不言，靜靜地坐着呢？布哈林同志和他的知己朋友們，爲什麼現在不發言，不進行堅決的鬥爭去反對右傾及調和派呢？如果布哈林同志和他的知己朋友們決意走上這一個並不是怎樣困難的步驟，那末黨一定會歡迎他們——對於這一點，難道有誰可以懷疑嗎？爲什麼他們不決意走上這一個歸根到底他們還

是一定要走的步驟呢？是不是因為他們把自己派別底利益看着比黨底和黨的總路綫底利益更高呢？在反右傾的鬥爭中，布哈林，李可夫和湯姆斯基這幾位同志完全沒有參加，這到底是誰的過錯呢？所謂政治局底三個委員受『精神上的死刑』，這一套話，就是政治局底三個委員底一個掩飾得不很巧妙的企圖——想強迫着我們黨閉口不言和停止反右傾的鬥爭——這還不很顯然嗎？

與右傾鬥爭，並不是我們黨底次要任務。與右傾鬥爭是我們黨底有決定意義的任務之一。如果我們在自己本身的隊伍內，在自己本身的黨內，在領導運動及引導無產階級前進的無產階級政治司令部內，——如果我們在這一個司令部內，容許右傾份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動，這些份子企圖拆散黨底隊伍，企圖腐化工人階級，企圖使我們的政策適合『蘇維埃的』資產階級底胃口並這樣來在我們建設底困難面前表示投降，——如果我們容許這一切，那末這將是什麼意思呢？這難道不就是說我們想漸漸降低革命，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逃避困難，把陣地讓給資本主義份子嗎？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是不是懂得，拒絕與右傾作鬥爭這就是出賣工人階級，

出賣革命呢？布哈林同志這一派是不是懂得，不征服右傾和調和派，就不能征服我們面前的困難，而不征服這些困難，就不能達到社會主義建設底決定的勝利？既然這樣，那末關於所謂政治局底三個委員受『精神上的死刑』的廢話，還有什麼價值？

同志們，不行的，用所謂『精神上的死刑』這類自由派的廢話，是嚇不倒黨的。黨要求你們來和全體中央委員站在一個行列內去與右傾及調和派作堅決的鬥爭。黨要求你們這樣，爲的是要易於動員工人階級，組織社會主義在整個戰綫上的進攻，打破階級敵入底反抗並保證克服我們的建設方面的困難。或者你們執行黨底這個要求，那時黨就會歡迎你們。或者你們不做到這一點，——那時你們就只好埋怨自己。

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號在共產國際執委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講演——

同志們！我認爲舍米契同志並沒有完全認清了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立場，布爾塞維克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後都從來沒有把民族問題與一般的革命問題分開過。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態度就是：布爾塞維克歷來都把民族問題當作與革命前途密切聯繫着的一個問題。

舍米契同志引證了列甯的話，說列甯曾經主張把民族問題歸入憲法中去解決。舍米契同志的這種說法，意思就是想說列甯曾認爲民族問題是憲法問題，也就是說，不是革命的問題，而是改良的問題。這完全是不對的。列甯從來沒有作過（而且也決不會作）這種憲法的幻夢。只要把他的著作看一下就可以相信這點。即使列甯曾經說過憲法，但是也並不是說主張用憲法的手段來解決民族問題，他所主張的

是用革命的手段來解決民族問題，就是說，他把憲法只是看作革命勝利的一種結果。我們蘇聯也有憲法，而且這個憲法確實也反映到民族問題的解決。可是，這個憲法並不是與資產階級妥協的結果，而完全是革命勝利的結果。

此外，舍米契同志又引證我在一九二二年所著的論民族問題的那本書，極力想在那裏找出間接的論據以證明他自己的正確。但這種引證却絲毫沒有得到一點結果。因為他不僅沒有找到，而且也不能找到一個引證或半點含糊的理論來證明他對民族問題的那種『憲法主張』。爲了證實我這一句話起見，我可以從那本書上引一段話給舍米契同志看，在那一段話中我把奧大利式的解決民族問題方法（憲法的手段）完全與俄國馬克斯主義者的解決方法（革命的手段）對立起來的。

那本書上是這樣說的。

『奧大利人想用小的改革的方法和緩慢的步驟來實現「民族自由」。把民族的自治當作了實際的辦法，他們并不打算起根本的變動，也并不想作民權的解放運動，這種運動在他們的前途上是沒有的。但是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是把「民族自由」的問題與根本的變

動，與民主解放運動相聯繫着的，并不打算實行改良的方法。這也就根本的改變了俄國民族底命運。」

我想。這裏說得已經很明白了。

這并不是斯大林個人的觀點，而是俄國馬克斯主義者的共同的觀點，他們過去和現在觀察民族問題完全是與一般的革命問題密切地聯繫着的。

我可以毫不困難地說：在俄國馬克斯主義的歷史中民族問題的提法曾經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十月革命前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十月革命的時期。在第一個階段中，民族問題完全當作了整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問題底一部分，也就是說，把它當作了整個的工農革命專政問題底一部分。及至第二個階段，民族問題已擴大起來，而變成了殖民地問題，民族問題已經由國家內部的問題變成了世界的問題——這時候我們就已把民族問題看作了整個的無產階級革命問題底一部分，即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底一部分。但無論在這兩個階段的任何一個階段上，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都是絕對地革命的。

我想，舍米契同志對於這一切還是沒有完全明了的。因此他企圖把民族問題降低到憲法的立場上，就是說，把民族問題當作了改良問題。

從這個錯誤中也就產生出了他的另一個錯誤：他不願意把民族問題在實質上看作農民問題。這並不是土地問題，而是農民問題，因為這兩樣東西是不同的。至於說民族問題不能與農民問題混為一談，因為除了農民問題之外，民族問題還包括民族文化，民族國家等等問題，這是正確的。不過民族問題的基礎，它的內部的實際是農民問題，這也是毫無疑義的。因為農民是民族運動的基本軍隊，沒有農民的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強大的民族運動。所謂民族問題實際上就是農民問題，正是指這點而說的。我覺得舍米契同志之所以不願意接受這個公式，也就是因為他沒有估計到民族運動內部的力量，而且也沒有了解民族運動之深刻的民衆革命性。他沒有了解到這一點，而且也沒有估計到這一點，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在實際上就是沒有估計到運動（例如霍爾瓦特的民族解放運動）內部的潛力，這對於整個南斯拉夫的共產黨是一種非常嚴重的複雜問題。

這就是舍米契同志的第二個錯誤。

舍米契同志企圖把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與國際的環境，與歐洲的整個前途分裂開來，毫無疑義地也是錯誤的。舍米契同志根據現時在霍爾瓦特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中沒有什麼重大的民衆運動，因此便說，民族自立權的問題，是學院式的問題，至少也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這種說法，當然是不對的。即使這個問題在現時并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但如果戰爭一開始，或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如果歐洲革命一爆發，或者在爆發的時候，這個問題就馬上成了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但戰爭是必然要爆發的，他們必然是要打起來的，如果我們把帝國主義的本質和發展觀察一下，對於這一點是勿容懷疑的。

在一九一二年，當我們——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民族綱領的第一個草案的時候，在俄羅斯帝國的無論那一個地方都還沒有什麼大的民族獨立運動。可是，那時我們就已認為必須把民族自決權（每個民族的自立權和國家的獨立權）這一項包含到我們的綱領中去。爲什麼呢？因爲我們不僅只根據了當時現有的事實，而且

也根據了國際關係整個系統中所發展着的趨勢，也就是說，我們那時不僅只顧到現在，同時也顧及將來。而且我們知道，如果那一個民族要求自立，那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就要努力的爲使每個民族都能獲得這種自立權而奮鬥。舍米契同志在他的演講中歷次引證斯大林論民族問題的那本書。現在且看一看斯大林在這本書中關於民族自決和獨立的問題是怎樣說的：

『歐洲帝國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偶然的。資本在歐洲已經感覺到太狹隘了，因此他要向外發展，尋找新的市場，賤價的勞動，新的投資場所。但這必然要引起外部的糾紛和戰爭。在這一種內外局勢的匯合之下，俄羅斯的某一個民族必然會起來提出和解決他們的民族獨立問題，這是非常可能的。阻制這種運動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事情。』

這還是在一九一二年寫的，你們知道，這幾句話到後來，在戰爭時和戰後，尤其在俄國無產階級的專政勝利之後，就已完全證實了。

我們更有理由的可以說，在歐洲各地，尤其是在南斯拉夫，特別是在現時，在被壓迫國家的民族革命運動業已深入，俄國革命也業已取得勝利之後，這種可能性

是很大的。同樣也必須注意到這一點，就是：南斯拉夫並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他是與某種帝國主義的集團聯繫着的，因此他就決不能逃出南斯拉夫之外所作的那一場惡戰。如果，你要替南斯拉夫共產黨規劃一個民族的綱領——現在所說的正是這一點——那末，就必需要牢記着，這種綱領不僅要根據現時所有的事實，同時也一定要根據由於國際關係而發生的并且必然要發生的那種現象。因此，我認爲民族自決權問題必須把他當作一個非常切於實際的迫切的問題。

現在再來講民族綱領吧。南斯拉夫必須起蘇維埃革命，不推翻資產階級，不獲得革命勝利，民族問題就不能有完滿的解決——這一種主張應成爲民族綱領的出發點。當然，也有例外。例如在戰前挪威威脫離瑞典而獨立就是一個例外，關於這點列寧也曾經做過一篇文章很詳細的講到過。但這件事是在戰前，在各種特別順利的環境的湊合之下發生的。在戰後，尤其是在俄國蘇維埃革命的勝利之後，這種機遇就很難得了。至少，這種機會的可能性已經少到幾等於零了。但如果這樣，那麼，我們當然就不能在這種『幾等於零』的立場上來建築綱領。因此，我們必須把革命的

主張作爲民族綱領的出發點。

此外，也必須把民族自決直至國家自立的這一項放到民族綱領中去。何以在現時內部的和國際的形勢之下非加上這一項不可的理由，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最後，還有關於不需要脫離南斯拉夫的那些民族之疆土的自主這一項也必須特別列入民族綱領中。凡是認爲這一項可以不需要的人，也是不對的。這完全是錯誤的。在某種條件之下，南斯拉夫的蘇維埃革命勝利之後，有些民族不願脫離南斯拉夫，這是很可能的事，例如在俄國就是如此。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就必須把自主問題放到民族綱領中去，這意思就是說，將南斯拉夫改造成爲建築在蘇維埃制度之基礎上的民族自主國的聯邦。

因此，對於那些願意脫離南斯拉夫的民族，必須予以自立權，對於那些不願脫離南斯拉夫的民族，就必須予以自主權。

爲了免除誤會起見，我必須說明這點，就是切不可把自主權解作爲義務或責任。各民族可以享受這一種自立權，但如果他不願意的時候，亦可不享受這種權利。

——享受與否完全是他自己的自由，這一點是必須認清的。有些同志把自立權變做了一種應盡的義務，他們要求霍爾瓦特民族無論如何地要實行自立。這種主張是不正確的，我們必須放棄這種主張才對。我們決不可將權利與義務混爲一談。

再論民族問題

——關於舍米契的文章——

舍米契同志現在，在南斯拉夫委員會的討論之後，已完全同意共產國際中俄國共產黨代表的主張，這是很欣喜的事。但如果只根據這一點，便以為俄國共產黨的代表與舍米契同志之間，在討論前或討論時並沒有過爭論，這也是不對的。舍米契同志對於民族問題的爭論，似乎正是這樣想法的，他極力想把這種爭論歸咎於誤解。但可惜他完全錯了。他在他的文章中肯定地說，我們之間的爭論，完全是出於『誤會』，完全是由於他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一篇演講『沒有翻譯完全』而引起。換一句話說，就是，他把一切爭論完全歸咎於翻譯者，說他爲什麼而沒有把他的話完全翻譯出來。爲了主張真理起見，我不得不申明，舍米契同志的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合事實的。如果舍米契同志能夠把他在委員會上所講的話（現在保存在共產

國際的文庫中）引證一段出來證明他的這個申明，當然比較是要好些。但是不知道什麼緣故他沒有這樣做。因此，我不得不再和舍米契同志作一次辯白，這種辯白雖然不很使人舒服，但是完全是必要的。

甚至在現在，當他已完全同意俄國共產黨代表的意見時，在他的主張中也依舊還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因此，這一種辯白就更爲必要了。

我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講演中（闊布爾塞維克第七期）已經說過，我們爭論的問題有三個：（一）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法問題；（二）在現時歷史階段中之民族運動的內部的社會本質問題；（三）民族問題中之國際作用問題。

在第一個問題中，我已經說過，舍米契同志並沒有完全明白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主張。他把民族問題完全和一般的革命問題分裂開來，他把民族問題完全歸結於憲法問題。

這種主張究竟對不對的呢？

請你們把舍米契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號）所說的下

面一段話拜讀一下後，自己去判斷罷。他說：

『可否把民族問題歸到憲法問題中去呢？首先，我們有一個理論上的假設。假定，在 X 國家中共有 A，B，C 三個民族。這三個民族，都申明他們願意共同的相處在一個國家裏。在這種情形之下，問題是在於什麼呢？當然，就在於調節這個國家的內部關係。就是說，完全是一種憲法問題。在這個理論上的假設中，民族問題是歸納在憲法問題中的……』

……如果我們在這種理論上的假設中把民族問題歸入憲法問題中，那時候我們就必須說——我一向是這樣主張的——，民族自決，直至民族自立，都是解決憲法問題的條件。我只是在這一種立場上提出我的憲法問題。』

我想，舍米契同志的這一段話用不到再做一番註解了。很明顯的，凡是把民族問題看作整個無產階級革命問題之一部分的人，就不會將民族問題歸到憲法問題中去。反轉來說，只有把民族問題同整個的無產階級革命問題完全分開來看的人，才會將民族問題歸到憲法問題中去。

舍米契同志的演說中曾經說，不作革命的鬥爭，就決不能獲得民族自決權。

舍米契同志說：『當然，祇有作革命的鬥爭纔能獲得這種權利。這種權利決不是用議會的方法可以獲得的，祇有羣衆的革命的行動才能獲得。』但所謂『革命的鬥爭』和『革命的行動』究竟是什麼呢？可不可以將『革命的鬥爭』以及『革命的行動』與推翻統治階級，與奪取政權，與革命的勝利——解決民族問題的條件——混爲一談呢？當然是不可以的。把革命的勝利當作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條件，這是一回事，但如果把『革命的行動』『革命的鬥爭』當作解決民族問題的條件，那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必須指出，在憲法的改良的道路上并不是完全丟開『革命的鬥爭』和『革命的行動的。』在決定某個政黨是改良的政黨抑是革命的政黨時，主要的標準不是他的『革命行動』的本身，而是它的革命行動的政治目標和政治任務。俄國的孟塞維克在一九〇六年，第一次國會解散之後，不僅主張組織『總同盟罷工』，而且甚至於主張『武裝暴動』。但他們終究還是孟塞維克。因爲要知道，他們那時候主張這樣幹究竟是爲什麼呢？當然并不是爲了破壞沙皇制度，也不是爲了造成革命的完全勝利，而只是爲了『打動』沙皇政府以獲得相當改良，擴大憲法，及召集

『完善』之國會而已。爲了在舊的統治階級政權的保存之下改良舊制度而作『革命的行動』，這是一回事，這是一種憲法的道路。爲了破壞舊制度，爲了推翻統治階級而作『革命的行動』這又是另一回事，這是一種革命的道路，獲取革命之完全勝利的道路。這其間是有根本的區別的。

所以我認爲，舍米契同志在主張將民族問題歸入憲法問題中的時候，雖也主張作『革命的鬥爭』，但不僅沒有推翻，反而更證實了我下面的這一句話：『舍米契同志並沒有完全了解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主張』，因爲他不明白，民族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與革命勝利問題有密切聯系的，整個革命問題的一部分。

但我也并不想說，我關於舍米契同志在這一個問題中的錯誤所發表的意見是什麼的。關於舍米契同志的錯誤，曼奴依爾斯基同志在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上就已說過，曼奴依爾斯基同志說：

『舍米契同志在他所著的馬克思主義中之民族問題一書上以及他在南斯拉夫共產黨機

聞報上所發表的許多文章中，把修改憲法的口號當作了共產黨的實際口號，這就是他實際上把民族自決問題全部歸到憲法的範圍中去說了。」（參看第五次大會記錄五九六頁）

季諾維夫同志在南斯拉夫的委員會上也說到了這個錯誤，他說：

『在舍米契同志的遠景中所缺少的只是革命這件東西，要知道，民族問題是革命的問題，而不是憲法的問題。』（參看真理報第八三期）

俄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中的這些代表們關於舍米契同志的錯誤所講的話，當然決不會是偶然的，毫無根據的，無風是不會起浪的。

舍米契同志的第一個錯誤就是這麼一回事。

他的其餘錯誤直接是從這個基本的錯誤中產生出來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在我的講演中（參看布爾塞維克雜誌第七期）已經說過，舍米契同志『不願意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是農民問題』。

這對不對呢？

請你們把舍米契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所說的下面一段話讀一下，而且請你

自己去判斷罷。

舍米契同志問道：『南斯拉夫的民族運動之社會意義是什麼呢？』他自己回答道：『這個社會的實質就在於塞爾維亞的資本與克羅阿脫及斯拉夫的資本之間的競爭。』（參看舍米契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演說）

當然，斯拉夫族和克羅阿脫族的資產階級與塞爾維亞資產階級間的競爭在這種民族運動中也能起相當的作用——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把各個民族的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看作民族運動之社會實質的這樣人，就不會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是農民問題——這也是一樣的毫無疑義的。現在，民族問題已從地方的國家內部的問題變成了世界的問題，變成了殖民地與附屬國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問題，這時候民族問題的實質是什麼呢？現在民族問題的實質就在於殖民地與附屬國反抗統治民族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對於他們的財政剝削，政治壓迫，以及文化掠奪的鬥爭。在這種民族問題的提法之下，各種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相互間競爭，能有何種意義呢？這種意義，當然不是最主要的，有的時候甚至是無關緊要的。很明顯的。這裏主要

的並不是在於這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能在競爭中把另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打倒的問題，這裏的問題是在於佔統治地位的帝國主義者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的基本羣衆（首先是農民羣衆），而這種剝削和壓迫，同時又引起了這些羣衆與帝國主義鬥爭，使他們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者。如果民族運動的社會實質是在於各種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間的競爭，那末也就不能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是農民問題，反過來說，如果你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是農民問題，那麼，你就不能把各種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間底競爭當作民族運動的社會實質。要在這兩個公式之間劃一個等號，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

舍米契同志也引證了斯大林在一九二二年底所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那本書中的一句話。那句話是這樣說的：『民族的鬥爭就是資產階級相互間的鬥爭。』他之所以引證這句話，就是想藉此來證明，他對於現時民族運動之社會實質所下的定義之正確。但這本書是在大戰前著的，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那時候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來的民族自決的基本要求，還

沒有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完全的把它們當成了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一部分。如果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國際的形勢已起了根本的變動，歐戰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一部分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那就未免太可笑了。一九一六年十月，列甯在他自己著的民族自決問題討論之總結一書中就已說過：民族問題的基本點——民族自決問題，現在已不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已變成整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列甯以及俄國共產主義的其他的代表關於民主問題還發表了許多深遠的著作，我在這裏也不多講了。現在，當我們已由新的歷史環境而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時候，舍米契同志却偏來引證斯達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著的那本書中的一句話，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這意義就僅僅是這樣：舍米契同志的引證是完全離開了空間與時間，離開了活的歷史環境，破壞了辯證法的基本要求，不顧到在某一個歷史環境中正確的話，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中是可以變成不正確的。我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講演中已經說過，俄國布爾塞維克的民族問題底提法有兩個階段，第一個是十

月革命前的階段，這時候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民族問題還是當作整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第二個是十月革命的階段，這時候已經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民族問題也已變成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這個區別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是不到再加以證明的。我恐怕舍米契同志還沒有明白這兩個階段間的這種區別之意義！

因此我認爲舍米契同志不願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是農民問題，而要把它看作是各種不同民族資產階級間之競爭的問題，是由於「忽視民族運動底力量和了解民族運動之深刻的，革命的性質」所致。

舍米契同志的第二個錯誤就是這麼一回事。

季諾維夫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也同樣的說到了舍米契同志的這個錯誤，這是很可注意的，季諾維夫說道：

『舍米契同志說南斯拉夫的農民運動是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因此不是革命的運動，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這種異口同聲的說法，是不是偶然的呢？當然不是的。
又是無風不會起浪的。

最後，關於第三個問題，我也已經說過，舍米契同志企圖「離開國際環境和歐洲的前途來觀察民族問題」。

這種說法對不對呢？

是的，這是對的。因為舍米契同志在他的說話中絲毫沒有講到國際環境在現時的情形之下，尤其是對於南斯拉夫，是解決民族問題事業上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南斯拉夫國家本身是帝國主義兩大集團間衝突的產物，南斯拉夫決不能逃出它周圍的帝國主義國家現時所要發生的那一場惡戰。這一切事實都是在舍米契同志的視線之外的。舍米契同志說他完全承認在國際環境相當的變動之後，民族自決問題能成爲迫切的實際問題，但這種說法，在現時的國際環境之下，已經是不充分的了。現在的問題並不是在於承認在遙遠的將來國際環境能起相當變動，而使民族自決問題成爲迫切的實際問題，——這一點，在現在，就是那些資產階級的民主黨人，在

必要的時候，也會承認的。現在的問題并不在於此，而是在於：不要使戰爭和暴力所造成於南斯拉夫現有的疆界變成解決民族問題的出發點和立法根據。兩者之間必取其一：民族自決問題，及根本改變南斯拉夫疆界的問題，或者是描寫遙遠的未來的那種民族綱領的招牌，或者是民族綱領的基礎。一般看來，是很明顯的，民族自決這一條如果只是民族綱領的招牌，當然就決不能同時又說它是南斯拉夫共產黨民族綱領的基礎。我恐怕舍米契同志還照舊地把民族自決問題看作民族綱領的一種未來的招牌。

所以，我認爲舍米契同志完全把民族問題與整個的國際環境問題分裂了開來，因此他把民族自決問題，即根本改變南斯拉夫疆界的問題，當作了一個學院式的不切實際的問題。

舍米契同志的第三個錯誤就是這麼一回事。

曼奴依爾斯基同志在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上的報告中，也同樣的講到了舍米契同志的這個錯誤：

『舍米契同志對民族問題的整個主張之基礎前提就是下面的這一個思想：無產階級應在許多戰爭和努力所造成的那種疆域中去奪取資產階級的國家。』

這一種異口同聲的說法難道是偶然的麼？當然，不是的。

再說一遍：無風是不會起浪的。

（此文登於布爾塞維克雜誌第一一、一二號，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號。法重點是我加的——斯達林註。）

與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號——

法國，德國，奧國，捷克斯拉夫，南美洲，中國，比國，芬蘭，丹麥及愛斯多尼亞各國派來的代表共八十人。談話繼續了六小時之久。

斯達林：同志們，昨天接到一張無名的德文的條子，中間寫着許多問題問我。今天早上我又接兩張發問題的條子，一張是法國代表寫的，一張是丹麥代表寫的。現在我首先來答復第一個條子上的問題，雖然我還不知道這些問題究竟是誰發的。答復了這些問題之後，然後再來答復後兩個條子上的問題。如果你們不反對，我就來開始答復（代表們表示同意）。

第一個問題：爲什麼蘇聯不參加國際聯盟？

回答：關於蘇聯不參加國際聯盟的原因，在我們的報章上已講過多次。我現在

可以把其中幾個主要的原因說一說。

蘇聯不加入國際聯盟，不參加國際聯盟會議的原因，第一就是因為蘇聯不願意替國際聯盟的帝國主義政策負責，替國際聯盟所發給的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國家的「委任狀」負責。蘇聯之所以不加入國際聯盟，就因為他極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壓迫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政策。

蘇聯不加入國際聯盟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他不願意替國際聯盟所進行的軍事準備，增加武裝，組織新的軍事聯盟等等勾當負責，因為這種勾當必然要引起新的帝國主義的戰爭。蘇聯之所以不參加國際聯盟，就是因為他極端地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

蘇聯不加入國際聯盟的第三個原因，就是因為他不願意成為國際聯盟這一種帝國主義強盜窟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國際聯盟却以其會員的假話遮掩這種事實）。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後台老板的「幽會所」，用以掩閉他們的勾當。國際聯盟官冕堂皇地所講的那些話，都是用來欺騙工人的空話。帝國主義後台老板們在暗中偷偷地

幹的那些勾當，纔是帝國主義的正經事業，這種勾當都是由國際聯盟的演說家們用巧妙的漂亮的言辭掩飾着的。這樣，蘇聯不願參加這反對民衆的趣劇，又有什麼奇怪呢？

第二個問題：爲什麼蘇聯不能容納社會民主黨？

回答：蘇聯之所以不能容納社會民主黨（即孟塞維克），就是因爲在蘇聯內不能容納反革命的人。這也許會使他們覺得奇怪，但實際上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我們國家發展的條件，和發展的歷史是這樣的：社會民主黨在沙皇時代是一個比較革命的政黨，沙皇政府推翻之後，克倫斯基政府的時代，他就成了一個資產階級的在朝黨，一個主張帝國主義戰爭的政黨，及至十月革命之後，他就完全變成了一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革命的政黨。你們要知道，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在國內戰爭的時候完全是站在高察克和但尼金方面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現在這個政黨完全是一個企圖恢復資本主義，撲滅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我認爲社會民主黨的這一種蛻變不僅是俄國所特有底現象，而且也是各國所共有的現象。在沙皇時代，俄國社會民主黨

總還算是一個比較革命的政黨。因此，我們布爾塞維克那時候還同孟塞維克（即社會民主黨人）共處在一個政黨裏面。當所謂民主的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的時候，社會民主黨就成了資產階級的在朝黨。一到革命的無產階級握取了政權時候，社會民主黨就變成了公開的反革命的政黨。

有一個代表問：社會民主黨是不是只有在蘇聯是一種反革命的力量，在其他的國家他是否也是一種反革命的力量呢？

斯達林：我已經說過，這裏有一點區別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社會民主黨是企圖以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名義恢復資本主義和消滅無產階級專政。底一種反革命的力量。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無產階級還沒有取得政權，社會民主黨有的是一種反對資本家政權底在野黨，有的是一種與自由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向極端反動的資本主義的力量和革命的工人運動雙方進攻的政黨，有的是自始至終公開擁護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底一種政黨。社會民主黨只有在無產階級真正得到政權之後，才完完全全成爲反革命的政黨，那時

候他必然要用他一切反革命的手段來反對無產階級的政權。

第三個問題：爲何在蘇聯沒有出版自由？

回答：你們所說的究竟是那一種出版自由呢？是那一個階級的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呢，還是無產階級的出版自由呢？如果說的是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那在我們蘇聯，在無產階級的專政之下，是沒有的，而且將來也不會有。如果說的是無產階級的出版自由，那我就告訴你們：你們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裏決找不到像我們蘇聯那樣普遍的廣大的無產階級底出版自由。無產階級出版自由并不是一句空話，沒有好的印刷所，好的報館，沒有各種大大小小的包含着數百萬工人羣衆底公開的組織，沒有普遍的集會自由——也是不會有什麼出版自由的。你們看一看蘇聯的生活條件，考察一下工人區域，你們就可知道，最好的印刷所，報館，一切造紙工廠和印刷所必需的顏料工廠，莊嚴的宏大的會場——工人階級的出版自由所必需的這一切東西，都完完全全地操在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底掌握中。這就是我們蘇聯工人階級的出版自由。我們這裏沒有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我

們不代表被推翻了了的資產階級利益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出版自由，但這有什麼奇怪呢？我們絕對沒有必要給各階級以出版自由，使各階級都得到幸福的這一種義務。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的時候，就公開說過：這個政權是一個階級底政權，無產階級底政權，他將爲着蘇聯大多數人民——城市與鄉村的勞動羣衆——底利益去鎮壓資產階級。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可以向無產階級的專政要求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呢？

第四個問題：爲什麼不把監禁着的孟塞維克釋放出來？

回答：你們所說的大概是那些積極的孟塞維克。是的，那些積極的孟塞維克在監禁期限未滿之前是不釋放出來的。但這又有什麼奇怪呢？例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的時候，當少數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掌握政權的時候，爲什麼不記布爾塞維克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呢？爲什麼列寧在七月至十月——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握政的時候，不得不秘密地隱避起來呢？爲什麼全世界無產階級心目中的偉大的旗幟——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月間不得死亡命於芬蘭，遠避克倫斯基

和采萊推里，切爾諾夫和唐的『民主共和國』呢？爲什麼列寧的機關報——真理報，在第二國際著名的健將們底統治之下，還會被資產階級的軍官所毀壞呢？這就是因爲在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與革命的無產階級間的鬥爭中不得不採取一種壓制手段。我已經說過，在我們蘇聯，社會民主黨已完全是一個反革命的政黨。因此革命的無產階級也不得不拘捕這個反革命政黨的活動分子。

但這樣說來還不充分。從上面的話中我們還得出這樣的推論：我們拘捕孟塞維克就是十月革命政策底繼續。但十月革命究竟是什麼呢？十月革命，第一就是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現在各國比較覺悟的工人已都承認，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是對的。我們相信你們的意見一定也是這樣。但現在有一個問題：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中究竟推翻了什麼人？歷史告訴我們，事實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時候所推翻的正就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因爲那時候完全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切爾諾夫，哥刺，里伯爾，唐，采萊推里，阿勃浪麻維契，阿烏克仙契甫等人——撐握着政權。

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是什麼政黨呢？他們是第二國際的政黨。

因此，蘇聯無產階級的推翻了第二國際的政黨，才完成了十月革命。也許，這對於有些社會民主黨人，是很不樂意的，但是，同志們，這是毫無疑義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的。

由此可見，在無產階級的革命中，無產階級可以而且必須推翻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政權，只有這個才能使政權落到自己的手中。既然可以推翻他們，那麼，當他們已公開跑到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營壘中去的時候，為什麼就不能拘捕他們呢？你們不是以為推翻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手段比拘捕還要輕一些呢？如果不承認十月革命的政策所必然產生出來的結果是正確的，那麼也就不能承認十月革命的政策是正確的。兩者之中必取其一：或是承認十月革命是錯誤的——那麼拘捕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當然是錯誤的；或者承認十月革命是正確的，——那麼拘捕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也是不能認為錯誤的。這是邏輯上的法則。

第五個問題：為什麼不允許社會民主黨報紙辦公處的新聞記者到蘇聯來？

回答：因為外國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尤其是前進報（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黨報——譯者）比許多資產階級的報紙還更起勁地侮蔑蘇聯和蘇聯的代表。因為許多資產階級的報紙——例如『*Aossische Zeitung*』攻擊蘇聯的時候，還要比前進報（*Zorwarts*）『客觀一點』，『有禮貌一點』。這看來也許是『很奇怪的』，但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如果前進報的行為不比有些資產階級的報紙壞，那他的代表也就可以像其他資產階級報紙的代表那樣有資格到蘇聯來。最近前進報曾經向蘇聯駐柏林的一個外交代表提出條件，請求准許前進報的訪員到蘇聯來。我們的外交代表就回答他道：『如果前進報，在實際上證明是對蘇聯和蘇聯代表的態度不再比「有禮貌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報紙——如像 *Vosische zeitung* 這一類報紙——還更壞，那蘇聯政府也就決不反對前進報的訪員到蘇聯來。』

我想，這個答覆已經很明白了。

第六個問題：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有否合併底可能呢？

回答：我想是不可能的。因為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主張和立場完全是不同

的。

第三國際的主張是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第二國際的主張恰巧相反，他主張保持資本主義及破壞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須的一切東西。這兩個國際之間的鬥爭是資本主義擁護者和社會主義擁護者鬥爭的思想上的反映。在這個鬥爭中，不是第二國際戰勝第三國際，便是第三國際戰勝第二國際，他們兩者不是勢不兩立的。當然，我們毫無疑義地可以斷定工人運動中的勝利必定是歸於第三國際的。我認爲他們底合併是不可能的。

第七個問題：怎樣估計西歐的情形？在最近的將來是否會發生革命的事變。

回答：我認爲歐洲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危機底成分已在增長而且將來還是要增長的。資本主義可以局部地穩定，可以使生產合理化，可以暫時加緊壓迫工人階級——這一切勾當資本主義現在還都可以做，但是他已經不能恢復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前的那一種『穩定』『平衡』狀態了。這一種『穩定』和『平衡』他已再也不能恢復了。現在西歐各國以及歐洲資本主義活命的東西——殖民地，已都紛紛地爆

發了革命底火燄，就以這一點而論就可知道資本主義的穩定和平衡已再沒有恢復的希望了。今天奧國爆發了革命的火燄，明天英國爆發了革命火燄，後天法國或德國又爆發了革命火燄，後來，中國，馬來羣島，和印度等也就都爆發革命起來了。歐洲和殖民地是什麼東西呢？這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和四週。歐洲資本主義中心已經『不安靜』起來。在他的四週還更其『不安靜』。新的革命事變底條件已經成熟起來。我認爲日益發展着的資本主義危機之最明顯的表誌，工人階級的不滿和憤激的情緒日益緊張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薩柯和樊齊蒂（Sacco and Vanzetti）的事。殺死兩個工人在資產階級的屠夫們看來算什麼一回事呢？難道他們不是每天每星期都要屠殺許許多多工人麼？可是屠殺薩柯和樊齊蒂這兩個工人，却引起了全世界工人階級這樣巨大的風波。這證明什麼呢？這就是證明資本主義腳底下的地基已經一天比一天不穩固了。這就是證明，新的革命事變的條件已經成熟起來了。資本家也許還可以把第一個革命底浪潮趕回海岸去，但這件事情決不能安慰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底革命不是一個總的浪潮可以成功的。他是從時起時伏不平衡的浪潮

中發展起來的。俄國曾經是這樣。歐洲也必將是這樣。我們現在正站在新的革命事變之前。

第八個問題：反對派在俄國黨內的勢力強不強？他們所依靠的是何種階層？

回答：我認爲，反對派的勢力是很薄弱的。它在我們黨內的力量是非常之小的。我拿在手上的就是今天的報紙。在這份報上把幾天以來的討論作了一個總結。

數目字告訴我們，舉手贊成中央和中央提綱的黨員有十三萬五千人，而贊成反對派的黨員却只有一千二百人，還不到百分之一。我想，在以後的表決中反對派所得到的票數定還要少。我們的討論要繼續到代表大會開幕爲止。我們在這一個時期內要儘可能地徵求我們全體黨員的意見。我不知道在你們社會民主黨裏是怎樣進行討論的。我不知道你們社會民主黨中有沒有這種討論。我們對於討論是看得很嚴重的。我們要徵求全黨的意見，結果你們一定可以看到，反對派的比重將比上述的數目還要小得多。也許在我們黨的十五次大會上反對派的代表一個也沒有都說不定。我們且拿列寧格勒的 Putilov 和 Trengolnik 這兩個大企業來看，Trengolnik 共有

一萬五千工人。其中有一千一百二十二個黨員。舉手贊成反對派的只有三十九人。
『Putilov』約有一萬一千工人。其中有一千七百十八個黨員。舉手贊成反對派的只有二十九人。

反對派所依靠的是那種社會階層呢？我認爲反對派所依靠的主要的是非無產階級底階層。如果問一問那些不滿意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非無產階級的人民；他們同情那一方面？那他們就一定毫不猶疑的回答你說，他們是同情反對派的。爲什麼呢？因爲反對派的鬥爭實際上就是反黨的反無產階級專政——他們不能不使一部分非無產階級的階層不滿意——的鬥爭。反對派就是非無產階級的階層不滿意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底一種反映。

第九個問題：魯脫費舍爾（Rut Fisher）和馬斯洛夫在德國宣傳說：現在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的領導要將工人出賣給反革命，這種說法是不是對的呢？

回答：我想大概是對的罷！共產國際和聯共現在正在準備把蘇聯工人階級全部出賣給全世界的反革命。除此之外，我還可以告訴你們，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

已決定在這幾天內迎請一切驅逐出國的地主和資本家回蘇聯來，把工廠土地歸還他們。這還不夠。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更決定，布爾塞維克此後要改用肉肉充當糧食。最後我們已經通過一個決議，決定把一切女人都充公，要實行姦淫自己的親姐妹（全場哄笑）。（有一個人問：誰會發出這樣的問題？）你們也都笑起來了。也許在你們中間有人會以為我答覆問題太不正經。但是，同志們，這樣的問題不能正正經經地回答他的。我認為對於這問題只能以一笑答之。（大鼓掌）

第十個問題：你對於反對派及德國魯脫費舍爾和馬斯洛夫的態度如何？

回答：我對於反對派及其德國的黨徒底態度同法國著名的小說家陀台對於達拉斯康的達爾達林一樣的（此時代表中現出一種恰愉精神）。你們大概都讀過陀台創作的一部著名的小說，書名叫作達拉斯康的達爾達林。這部小說的主人翁達爾達林，是一個平常的『仁慈的』小有產者。可是他有非常發達的幻想和說謊的天才。他向人家吹牛，說他曾經在阿脫拉斯山殺死過不計其數的獅子和老虎。容易上當的朋友們便頌揚他是世界第一的獵人。可是陀台和達爾達林都知道達爾達林從沒有見

過什麼獅子和老虎。達爾達林又向人家吹牛，說他曾經登過蒙勃蘭（Monblan）高山。他的容易上當的朋友們於是便稱他是世界第一的爬山家。可是陀台明知道達爾達林從來沒有看到過蒙勃蘭山，因為他僅僅只到過蒙勃蘭山的山脚。達爾達林又告訴人家說他曾經在離法國很遠的一個地方建下了一個偉大的殖民地，他的朋友們於是又稱他為世界第一的殖民家。可是陀台明知道——達爾達林自己也承認——在這幻想中除了狼狽之外是再也得不到什麼旁的東西的。

你們知道，達爾達林這種吹牛的行爲必然會使自己陷入怎樣狼狽的情形中。

我想，反對派的首領們在莫斯科和柏林所吹的牛皮也必然會使反對派陷入這種狼狽的糟糕的局勢中（全場哄笑）。第一張條子上所發的問題已經答覆完了。現在來答覆法國代表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蘇聯政府想用什麼方法與外國的煤油公司鬥爭？

回答：我覺得這個問題根本問得不對。在這一種問題之下，就似乎蘇聯煤油工

業已準備向外國的煤油公司進攻，企圖把它們消滅。事實上是不是這樣的呢？不，決不是這樣的。實際上，情形是這樣的，有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煤油公司努力的想消滅我們蘇聯的煤油工業，而我們蘇聯的煤油工業爲維持自己的生存與繼續發展起見，就不得不採取防禦的手段。蘇聯的煤油工業，無論在生產額方面（我們出產的煤油比資本主義國家要少些），或在市場的聯繫方面（他們與世界市場的聯繫比我們密切得多）。都比資本主義國家的煤油工業要薄弱得多。蘇聯的煤油工業用什麼方法來防禦呢？他的防禦的方法，第一就是改善煤油的質量，第二降低煤油的價格，使我們的煤油出賣到市場上去的時候，比資本主義國家的煤油還要便宜些，有人一定要問：難道蘇維埃國家竟這樣富裕，能比最富強的資本主義企業還更能便宜些把煤油出賣到市場上去麼？當然，蘇聯的工業不比資本主義企業富強。而且資本主義的企業還多富強於蘇聯的工業，但這原因並不是在於富強。這原因是由於蘇聯的煤油工業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工業，所以他不需要猛烈地榨取額外利潤；可是資本主義的煤油企業都是非榨取大量的額外利潤不可的。正因為蘇聯的煤油工業不需

要外額利潤，所以他可以把他的貨物比資本主義的企業的貨物更賤價地出賣到市場上去。蘇聯的糧食，蘇聯的木材等等也都是這樣，一般的說來，蘇聯的貨物，特別是煤油，在世界市場上是減低價格減輕購買人之經濟情形底原動力。這就是蘇聯的煤油業防禦資本主義國家煤油企業進攻底方法與力量。世界各國的煤油大王，特別是台脫亭狂暴地反對蘇聯和蘇聯的煤油工業，用反對『共產主義宣傳』的時髦話掩飾其煤油的高價政策及其對消費羣衆的劫掠，這其中的一切巧妙就在於此。

第二個問題：怎樣實現農民問題中之集體制度？

回答：我們認爲，農民問題中的集體制度是逐漸地，用經濟的，財政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方面來實現的。我以爲最有興趣的問題，要算經濟方面的問題。在這個領域內，我們底辦法是從三方面進行的：一，組織個別的農戶於合作社中；二，組織農戶（主要的是貧農）於生產協作社中；三，經過國家的計劃機關和調節機關在銷售農產品以及供給農民以工業必需品方面來包羅農村經濟。

幾年以前，在農業與工業之間，有許多的中間人——以城市製造品供給農民，

以農業品供給工人的那些私有企業家——阻隔着。當然，這些中間人決不肯『白出力』的，他們從農民身上以及城市居民身上抽括去的利潤不止數千百萬。這是城市與鄉村間的聯系，社會主義工業與單獨的農民經濟間底聯系還沒有建立好的時期。那時候合作和國家分配機關底作用還比較小。但這個時期以後，情形就大變了，現在在城市與鄉村間，工業與農業間底商品流通中，合作社和國家商業機關作用已不僅可以算爲主要的作用，而且也可以算爲統治的作用了（雖然我們還不能說他是壟斷的作用）。農民所購買的輕工業品，由合作社和國家機關經手的佔百分之七十以上。農業機器差不多百分之百都是國家供給的。農民所出賣的糧食。由合作社和國家機關經手的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工業原料，如棉花，甘蔗等等物品的交易，差不多百分之百都是由合作社和國家機關經手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證明，資本家已漸漸從商品流通範圍中排擠出去，工業已漸漸與農村經濟直接聯系起來，投機商人的利潤已保留在工業與農業中，農民已經可以比

較賤價地購買城市的商品，同時工人也可以比較賤價地購買農業品。

第二，這就是證明，工業已把資本家從商品流通範圍中趕出去，因此，他也就得到了領導農村經濟影響農村，提高其文化程度，使其有合理化與工業化底可能。

第三，這就是證明，國家把工業與農業直接聯系起來之後，也就得到了有計劃地發展農村經濟的可能，他可以把最好的種子和肥料供給農村經濟，可以決定他的生產額，以價格政策去影響他等等。

最後，這就是證明，鄉村已漸漸造成了一種很好的條件，使我們可以順利地消滅資本主義成分，節制和克服富農，組織勞動的農民經濟於生產協作社中，盡可能地用國家的經費幫助這些生產協作社。

例如，就拿製糖工業所必需的蘿蔔和紡織工業所必需的棉花來講罷。這種原料的出產額，及其價格和質量，都不是由無組織的市場情況來決定的，也不是由投機事業家以及交易所這類資本主義的機關來決定的，而是糖業和紡織業新迪加與代表成千成萬農戶的棉花合作社和蘿蔔合作社預定了條約有計劃來決定的。這裏已沒有

交易所這類組織，也沒有買空賣空的這一類投機事業。這一切資本主義經濟的工具，在我們這一個領域內已不存在。我們在一個領域內只有兩方單獨的直接交易，沒有什麼交易所，沒有什麼中間人——一方面是國家的新迪加，另一方面是合作化的農民。國家新迪加與合作機關預先訂好合同，規定合作社必須出產多少蘿蔔和棉花，而新迪加則必供給多少優良的種子和借款給農民。經濟年度告終的時候，一切出產品都歸新迪加所支配，而農民也就可以按照預定的條件從新迪加方面得到一筆款子。這種制度，我們叫做合同制度。這個制度的優點就是他能使雙方都得到利益，而且能使工業與農業直接聯系起來不要經過中間人。這種制度是農村經濟集體化的最正確的道路。

我們現在還不能說農村經濟的其他部門已經發達到這個程度。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農村經濟的一切部門，麥子的生產也包括在內，將都漸漸的過渡到這一條發展的道路。這一條道路就是直接走到農村經濟集體化的一個入門徑。

完全的集體化，只有到農村經濟已在新的技術基礎上改造過，已經實現了機器

化和電氣化，大多數勞動農民已加入合作社，大多數鄉村已都有農村經濟協作社組織的時候，才能實現。我們現在正在向這個目的進行，但這個目的還沒有達到也不能很快地達到。爲什麼呢？因爲要達到這個目的，還必須一大筆經費，但國家現在還沒有這樣一筆大經費，當然，這筆經費經過相當時間，一定地可以積聚起來的。馬克思曾經說過，無論那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沒有大量的數千百萬的財政上的消費，是不能在歷史上鞏固起來的。我認爲我們已進入了農村經濟發展底新階段，國家現在已開始能夠加緊地在財政上資助新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的工業已經在國民經濟中獲得了領導作用，已經能夠領導農村經濟——這件事實就是農村經濟要走向集體化的最可靠的保證。

第三個問題：在軍事共產主義時代，當時企圖消滅貨幣，有些什麼主要的困難？

回答：無論在內部的發展上，以及對外的關係上，都曾經遇到了很多困難。如果單就內部的經濟方面而論，那我們可以指出三個主要的困難。

第一個困難就是：我們的工業當時完全處在破產和停頓的狀態中（只有軍事工業在外國武裝干涉的時候供給我們內戰的軍需品是例外）。三分之二的工廠都關門起來，交通也完全停頓起來，商品差不多完全沒有。

第二個困難就是：農村經濟也完全處在停頓的狀態中，農民都被招募到戰線上去，缺乏原料，城市居民（首先是工人）的糧食也非常缺乏。我們那時候每每只發半磅麵包給工人，有時甚至只發五十格蘭姆。

第三，那時候差不多還完全沒有組織為城市與鄉村間的蘇維埃商業的傳遞機關以便將城市製造品供給鄉村并將農村生產品供給城市。那時合作社和國家商業機關還在萌芽的狀態。

但在國內戰爭告終，實施新經濟政策之後，我們國內的經濟情形就根本改變了。

工業已發展而加強起來，在全部國民經濟中佔了領導地位。我們在最近兩年來，不靠外債，不靠國外任何的幫助，純粹用我們自己的積累，投到我們工業中去

的經費已達二十萬萬餘盧布，這是證明我們工業發展的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我們現在已經不能說對於農民沒有商品。

農村經濟的生產額已提高到戰前的水平線。現在我們已經不能說工人沒有麵包和其他的農產品了。

合作社和國家商業機關也已大大的發達起來，他們在商品流通中已佔領導地位。現在我們已經不能說，在我們城市與鄉村間工業與農業間沒有商業的傳遞機關和分配機關了。

所有這些已經獲得的成績，現在當然還不能夠把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完成。但是一切成績已足使我們可以順利的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前進了。

我們現在必須改造我們的工業，及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建築新的工廠。我們必須提高農村經濟的文化，盡可能的製造農業機器供給農民使用，使大多數的勞動農民都吸收入合作社中，把個別的農民經濟改造成為大規模的農業協作社。我們必須城市與鄉村間建立這樣的一種傳遞分配機關，使它真正能夠像每一個人估計他自己

的預算和收支那樣地來估計和滿足全國城市與鄉村底需要。當我們達到這一切的時候，我們纔可以完全不需貨幣。但現在離這個時候還很遠呢！

第四個問題：『剪刀』問題現在究竟如何？

回答：如果這裏所說的『剪刀』是指農產品與工業品（指成本費）間價格的差異而言，那麼，『剪刀』形勢就像下面所說的那樣：

毫無疑義的，現在我們工業品的價格比在其他條件下要貴些。其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工業還很幼稚，我們還必須防禦外來的競爭，造成加速工業發展條件，而工業的迅速發展對於城市和鄉村同樣都是必要的。因為工業如果不加速發展，我們就沒有充份的製造品與農業機器可以按時的供給農村經濟。這一種情形就造成了工業品與農產品的價格底差異，這種差異對於農村經濟是有一點損失的。

爲了消除農村經濟的這一種損失起見，政府和黨採取了逐漸的不斷的降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這個政策是否能稱爲實際的呢？我認爲這個政策絕對是實際的。大家知道，在最近一年來工業品的零售價格已降低了百分之八十。同時，我們的工業

組織已經有系統的減低工業品的成本費與批發價格。我們毫無疑義地可以堅信這個政策將來還是要繼續採取的。此外，我還要告訴你們，不斷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是我們整個經濟政策的樞紐，沒有這個政策，就根本談不到我們工業的改善，合理化，同時也根本莫想鞏固工農的聯合。

資產階級的國家在這方面所採取的政策就完全不同。在那些國家中，資本家往往把企業組織在託拉斯和新迪加內，以便提高國內工業品的價格，使這種價格變為壟斷的價格，用這種手段多榨取一點利潤，造成商品輸出於國外的基礎，這些資本家在國外以賤價出賣自己的商品，以便拿得新的市場。我們俄羅斯，在資產階級統治時代，也採取了這種政策，例如，白糖，在我們國內的價格要三倍，而出賣到外國去的時候，都非常便宜，例如，英國甚至用白糖喂豬。蘇維埃政府所採取的政策與這完全相反的。蘇維埃政府認為工業應為人民而服務，而不是相反。它認為不斷的減低工業品的價格就是發展工業的主要方法。不用說，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同樣也足能提高人民的需要，擴大國內市場的容量，及造成發展工業所必須不斷增長

的源泉。

第五個問題：蘇維埃政府對於法國小債主有什麼意見？如何可以使法國的閒逸階級與他們相識？

回答：我們對於戰前債務的意見，已在拉哥夫斯基（Rakovsky）同志的談話中發表出來了。我想，這些意見，你們大概都已經看過。我們對於戰前的債務償還與否，是要看法國是否肯借債給蘇聯而決定的，我們所堅持的原則就是：你如果給我，我也就給你。你們如果肯借債給我們，我們也就把戰前的債款還你們一點，不借給我們，我們就一點不還給你們。這是不是說，我們在原則上已承認了戰前的債務了呢？不，決不是這樣，這只是說，我們一方面保持我們取消沙皇債務的法令，同時在實際的妥協的條件之下，如果肯借債給我們（這種債款不僅為我們所必需，同時也有利於法國工業的）那我們也同意把戰前的債款還一點，這一筆付還戰前債款的錢，我們祇當作發展我們工業所必需的債款底一種附加利息。

談到沙皇俄國的軍事債款。說到由於十月革命的結果對蘇聯的各種要求。但是

大家都忘記了，我們的革命是原則上否認帝國主義戰爭及與此種戰爭相關連的沙皇政府底債款的。大家都忘記了蘇聯是不能償還而且將來也不償還這些軍事債款的。除此之外，大家都忘記了蘇聯是不能不計算外國向蘇聯進兵時期（蘇聯的反攻是與這種進兵有連帶關係的）所遭受的劫掠與損失及由此而生的蘇聯的相反的要求。試問向這些劫掠與損失應當由誰負責呢？誰應當賠償這些劫掠與損失呢？帝國主義的強盜很希望人家忘記他們這些野心的事。但是他們應當知道，這種事情無論如何是不能忘記的。

第六個問題：怎樣把燒酒的壟斷和與酒辦做鬥爭聯系起來：

回答：我認爲，這兩件事是難以聯系起來的。這裏毫無疑義的有一個矛盾。明明知道這個矛盾，而且有意地的這樣做，黨知道，在現在這個時候，這種矛盾的存在，是沒有什麼要緊的。當我們施行燒酒壟斷的時候，在我們面前擺着兩件出路：或是向資本家妥協，把許多重要的工廠都租讓給他們，從他們方面取得我們所必需的經費以便從事工作；或是施行燒酒的壟斷，以取得我們所必需的流通經費，用我

們自己的力量來發展我們的工業。中央委員（我也在內）當時曾和列寧商量這件事，列寧認為在得不到外債的時候，就祇好公開的直接的實施酒的壟斷，作為一種臨時辦法，這就是我們實施燒酒壟斷的時候所發生的問題。

一般的說來，完全廢止燒酒當然要好一些，因為燒酒是一種壞東西，但如果廢止了燒酒我們就只好去受資本家的奴役，這就更壞了。因此，我們寧願少得些壞處。現在我們每年從燒酒得到的收入共計五萬萬盧布以上。放棄燒酒事業，就是放棄這項收入，而且酒癖的現象也必定不會減少。因為國家如果不製造酒，農民自己就要去製造酒，成天的醉迷於燒酒罈中。農村文化的不發達在這種地方當然也有相當的作用，不用說，如果我們立刻放棄了燒酒的壟斷，我們的工業就喪失了五萬萬以上的盧布。這一筆經費是無從填補的。

但這是不是說燒酒的壟斷在將來也應當一直保留下去呢？不，決不是的。我們實施燒酒壟斷，祇是一種臨時辦法。因此，只要在我們的國民經濟中找到一個新的收入底來源，使我們可以藉此去發展我們工業的時候，我們就馬上要取消這一種辦

法。這種新的收入的來源，毫無疑義地是可以找得到的。

我們把燒酒事業交給國家經營，這種辦法究竟對不對的呢？我認爲是對的。如果我們把燒酒事業交給私人去經營，那就要引起下列的結果，第一，必然會加強私有資本；第二，政府就不能調節燒酒的生產與消費；第三，政府就不能在最近的將來取消酒的生產與消費，現在我們的政策就是逐漸的縮小燒酒的生產。我想，我們在最近的將來，一定可以完全取消燒酒的壟斷，把酒的生產縮小到純粹爲技術上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然後就完全禁止酒的賣買。

我想，如果西歐的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并給我們以必要的幫助，那我們也就用不到去經營燒酒事業以及其他那些不好的事業了，可是有什麼辦法呢？現在我們西歐的兄弟們還不願意奪取政權，我們只好靠我們自己的經費。但這並不是我們的過失。這是命運如此。所以我們西歐的兄弟們對於燒酒壟斷也應該負相當的責任哩（笑聲，鼓掌）。

第七個問題：國家政治保衛局（G. P. U.）的法權，審案不用證明人和辯護

人，秘密逮捕。因為這些辦法頗難以爲法國的社會輿論所贊同，所以最好把它們的根據講一下。你們是否想變更或廢止這些辦法？

回答：國家政治保衛局或是非常委員會都是蘇維埃政權底懲罰機關。這個機關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社會治安委員會很有點相像。它所懲辦的犯人多半是奸細，陰謀者，恐怖主義者，強盜，投機商人，及製造偽幣的人。它與軍事政治法庭相類似，專門用來保護革命的利益，抵防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及其奸細的陰謀的。

這個機關是在十月革命後一天，當我們發現了許多陰謀的，恐怖的，奸細的（他們的經費是由俄國和外國的資本家接濟的）組織的時候，才組織起來的。在許多反蘇維埃政權的恐怖舉動之後，在烏里咨基同志（列寧格勒革命委員會委員，被社會革命黨所謀害）被殺，伏羅達爾斯夫（列寧格勒革命委員會委員，也被社會革命黨人所暗殺）被殺，列寧被刺（他曾被社會革命黨人所傷）之後，這個機關就更發展而鞏固起來。我們大家都應當承認，國家政治保衛局那時候確實非常敏銳的給了革命的敵人以銳利的打擊。而且他的一種能力現在也完全保留着。國家政治保衛

局給資產階級的催命符，是革命的警衛兵，是無產階級的寶劍。

因此，各國資產階級對於國家政治保衛局一個個都切齒痛恨，是毫不奇怪的。沒有什麼故事，他們不牽涉到國家政治保衛局，沒有什麼侮蔑，他們不散佈到這個機關。這證明什麼呢？這就是證明國家政治保衛局是很正確地在保護革命的利益。那般可咀咒的革命的仇敵謾罵國家政治保衛局，却巧證明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行動是正確的。

工人對於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態度就不是這樣的，你們且跑到各個工人區域去問一問工人們對於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意見。那你們就可以知道工人們都是很尊敬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深深地感覺到這是忠實的革命的保護人。

我明白資產階級對於國家政治保衛局底仇恨和不信任。我明白各國資產階級的旅行家，到蘇聯來遊歷的第一件心事就是探問國家政治保衛局還存在與否，及是否已到了取消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時候。這一切都是很明白的，毫不奇怪的。但我不明白有些工人代表，跑到蘇聯來開口就驚惶地問：國家政治保衛局是否懲辦了很多反

革命家？以後是否還要懲辦那些反無產階級政權的恐怖主義者和陰謀者？現在是否到了取消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時候？有些工人從什麼地方生出這樣關心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的心思呢！這怎麼解釋呢？它的根據在什麼地方呢？

勸我們的手段盡量的和軟，勸我們取消國家政治保衛局……但是我們取消了國家政治保衛局之後是否可以擔保各國資本家就從此不再組織和接濟陰謀者，恐怖者以及殺人放火等的反革命的團體了呢？在絲毫不能擔保革命的敵人能解除武裝的時候，就來解除革命的武裝——難道這不是蠢到極點的勾當麼？難道這不是反對工人階級的一種犯罪行為麼？不，同志們，我們決不願意再重複巴黎公社的錯誤。巴黎公社對付凡爾賽敵人的手段太和軟了，當時馬克思責備他們是很有道理的。他們這種和軟的手段，結果當棋耶標進入巴黎的時候，就明白地斷送了成千成萬工人的性命。同志們不是以為俄國的資本家和地主沒有像法國凡爾賽人那樣殘忍和兇暴呢？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記得他們（俄國的地主和資本家）與英法日美的聯軍勾結起來佔據西伯利亞，烏克蘭和北高加索的時候，是怎樣殘暴地屠殺工人的。

我並不是說，因國家內部的情形而使我們不得不設立革命的懲罰機關。就我們內部的情形而論，革命的大局早已鞏固穩定，沒有國家政治保衛局也已是過得去了。但問題就在於我們內部的敵人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東西。他們與各國的資本家有千條萬緒的聯系，各國資本家正在竭盡全力用盡各種方法幫助他們。我們是被資本主義的世界所包圍着的國家。我們革命內部的敵人是全世界資本家的奸細。資本主義的國家是我們革命的內部敵人之後方的根據地。我們與內部的敵人鬥爭，也就是與全世界反革命分子鬥爭。現在請你們評判一下，在這種條件之下是否可以不要國家政治保衛局這種懲罰機關呢？

不，同志們，我們不願再重複巴黎公社的錯誤。我們的革命需要國家政治保衛局，國家政治保衛局還應當保留着威嚇無產階級的敵人（大鼓掌）。

有一個代表說：斯大林同志，我代表在座的代表們向你深深的表示感謝，感謝你明白的解釋，使我們透澈的明白了國外對蘇聯所散佈的那些謠言。請你不要懷疑，我們回到本國去之後必能把蘇聯的真情實理告訴工人們。

斯大林：同志們，這是不值得感謝的。我回答你的問題是我應盡的責任，我們蘇聯的工作人員，認為應當向我們本階級的兄弟們盡量地解釋他們所願得到回答的一切疑問。我們的國家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嬰兒。我們國家負責人員向世界無產階級的代表解釋疑問只是他們應盡的責任（鼓掌）。

關於工農政府問題

——答特密得利夫同志的信——

特密得利夫同志！

本年一月十四日，你在布爾塞維克雜誌上所發表關於工農政府問題的信，轉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叫我答覆，我因黨務纏身，以致延擱，尙請原諒。

一，我們不應該同有些同志一樣的提出問題說：『工農政府是一個實際的，或是一個宣傳的口號』。我們絕對像這樣的說：我們在事實上雖則沒有工農政府，但我們又不妨說工農政府是一個宣傳的口號。像這樣的發問，不啻說我們的黨可提出內虛外實的口號，此種口號，不切合於事實，在黨的本身，亦不相信，但把他提出來作為欺瞞民衆的工具的。此種行動只有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能夠做，因言行不一致，欺瞞民衆，是這些日趨死亡的政黨之主要的工

具。但我們的黨不論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決不許有這樣的發問，因他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是列寧主義的黨，是向前進步的黨，他的力量是在言行的一致，他不肯欺瞞民衆，他對民衆只講真實的話，他不以挑撥的手段來決定政策，他是根據階級力量的分析來決定的。我們應該這樣的發問：或者，我們沒有工農的政府——那末，工農政府的口號必須將他拋棄，因為他是不需要的不真實的口號；或者，我們在事實上確有工農政府，而此種政府的存在，是與階級的力量相符合的，——那末，工農政府的口號是正確的革命的口號，非此即彼，願特密得利夫同志擇之。

二，你稱工農政府的口號是：『斯大林同志的公式』這是完全不對的。實際上這個口號，或者如你所願說的這個公式，乃是列寧的口號，並不是什麼別的人的。我只是在問題與答覆一書上重新提出而已。請看一看列寧全集的第一五卷第一二、一四、一六、三八、五二、七九、三四八頁；第一六卷第二八、二九、三一五頁，第一八卷第一部第九六頁，那裏列寧稱蘇維埃政權爲「工農政府」；請看一看第一五卷第二二八、三三二、三四〇、三四一、三四五頁，第一六卷第九五、一六四、

三〇一、三〇三、三〇七、三七八、三七九頁、第一七卷第五六、一〇五、三二〇、三四〇、四〇三、四一九、四二〇頁；第一八卷第一部第九四、一一一、二二三頁，那裏，列寧稱蘇維埃政權爲：『工農政權』。你們看了這些引據以及列寧所有的他種論著，你們就會了解工農政府的口號或『公式』是列寧的口號或『公式』，並不是什麼別的人的。

三，你的根本錯誤：在你（一）把我們政府與我們國家的兩個問題混淆起來；（二）把我們的國家與政府的階級性與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的問題混淆起來。

我們的國家，絕對不能與我們的政府混淆，同時也不能使之相等。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組織，取國家政權的形式，以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消滅階級等等爲目的的。我們的政府，是此種國家組織的上層機關，是他的上級領導機關。政府或許犯了錯誤，一時使階級的專政發生破壞的危險，但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不正確的錯誤的原則，不能做過渡時代國家組織的原則。他僅是說，上級指導不好，上級指導的政策，政府的政策，是不合於無產階級

的專政的，此種政策，應該使之與無產階級專政的要求相符合。國家與政府，如根據他的階級改變性來講，是一種同樣性質的組織，但政府自有他的範圍，他不能包括國家的一切。他們在機體上是相互聯系的，相互依助的，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把他們混爲一談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不能把國家與政府這兩個問題混淆起來，同樣，不能把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上級領導機關混淆起來。

把我們的國家和我們政府的階級性，和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混淆起來，更是不可允許的。我們國家與政府的階級性，本身是很明顯的——他們的階級性，就是無產階級的。我們國家政府的目的，也是很明顯的——他們的目的在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消滅階級等等。一切都很明顯了。然而究竟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的嚮向何在？就是要採用怎樣的路線與方法，藉此，可以在我們農業的國家內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無產階級的國家，爲的是要鎮壓剝削者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消滅階級等等。我們的政府，除上述一切以外，須指出一些

途徑與方法，我們要在無產階級佔少數農民佔絕對多數的國家內實現上述任務是不能。這些途徑與方法是什麼，他們的趨向何在呢？他們主要的趨向是使工人與農民基本羣衆的聯合保存和鞏固起來，使得執政的無產階級在這個聯合中的領導權能保存和鞏固起來。除此種聯合外，那末，我們的政府就毫無力量，我們也沒有可能實現剛才我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種種任務。這是無須證明了。此種聯合，究能存在得好久；蘇維埃政府鞏固此種聯合的政策究能繼續到什麼時候？這是很明顯的，他在階級與政府存在的時期內，還是要繼續的，因為政府是階級社會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這是我們要注意到：甲，工農聯合，不是爲保存農民這一個階級，是要改造他們，使之走向恰恰適合於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方向；乙，蘇維埃政府鞏固此種聯合政策，不在鞏固階級，而在消滅階級，而在加緊消滅階級的速度。因此列寧說得很對，他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是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合，使無產階級能夠擔任領導的作用與國家的政權。』（第一八卷上冊第三三一頁）。不用證明的，惟有列寧這種主張，而非其他主張，才是蘇維埃政府日常政策的指導路

線，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在日下發展的階段中，實際上就是維持和鞏固這種工人和農民基本羣衆聯合的政策。在這種意義上——祇有在這種意義上，并非在他階級性的意義上……蘇維埃政府才是工農政府。不承認這一點，就是脫離列寧主義，否認無產階級與農民勞苦羣衆聯合的真諦。不承認這一點，就不啻說聯合是一種陰謀，而不是真正的革命行動，我們施行新經濟政策，爲的是『煽動』，而不是與農民羣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不承認這一點，就不啻說，我們的革命不能滿足農民基本羣衆的根本利益，就不啻說他們的利益，是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有不可調和的衝突，我們不能而且不應當與農民基本羣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列寧合作社的計劃是靠不住的，孟塞維克及其同調者是正確的……。只要把這些問題提出來，便會馬上明瞭用『煽動』的眼光去觀察工農聯合問題的陳腐與無謂，所以我在問題與答覆一書上說工農政府的口號，並不是『挑撥』和『煽動』的手段，而是絕對真確的革命口號。

簡單說：一個問題是講到國家與政府的社會性，這個就決定我們革命發展的根本目的；另外一個問題是說政府的日常政策，關於這個政策的途徑與方法，是實現

上述目的的必須條件。這兩個問題，無條件的是互相聯系的。這不是說，他們是可以等量齊觀，混爲一團。

你可以看見，國家與政府的階級性的問題決不能與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混淆起來。這裏有一個矛盾存在，根據政府的階級性，他是無產階級的政府，它怎樣能稱爲工農政府呢？但是這裏的矛盾只是推測想像的。老實說有幾個神經過敏的同志在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兩個公式中，也想找出這樣矛盾，因爲第一個公式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階級的政權』（第十六卷，第二八二頁），但第二個方式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勞苦羣衆先鋒隊——無產階級無量數非無產階級勞苦羣衆（小資產階級，小私有者，農民，智識份子等等）之階級聯合的特殊形式』（第六卷，第二四一頁）。在這兩個公式中有沒有矛盾呢？當然是沒有的。在與農民基本羣衆發生階級聯合間，有的時候，怎樣能達到一階級的政權（無產階級）呢？就在執政的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先鋒隊）在這個聯合中實現其領導作用。在與農民基本羣衆聯合，以國家的形式去領導農民，藉以來實現無產階級的一階級政權。這就是兩個公式的

基本意思。那裏還有矛盾存在呢？但是無產階級對於農民基本羣衆的國家領導，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譬如在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革命的時候，我們獲得了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專政，但我們在那個時候，有沒有存在過這樣的國家領導？是沒有過這樣的領導。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國家領導，乃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領導。所謂無產階級的國家領導，就是：（甲）資產階級已被推翻；（乙）無產階級已握得政權；（丙）無產階級不與其他階級分掌政權；（丁）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基本羣衆，建設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革命與工農專政之下的領導，即是說：（甲）資本主義還是根本存在；（乙）革命的德謨克拉西的資產階級當權（在政權的成分中，此種資產階級佔重要地位）；（丙）德謨克拉西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分掌政權；（丁）無產階級將農民從資產階級政黨的影響下解放出來，并在政治思想方面領導他們作推翻資本主義爭鬥的準備。你可以看見，這裏的差別，是一種根本的差別哩。

對於工農政府問題，也是同樣的說法。我們政府的本性是無產階級的，以及由

此而產生的社會主義的任務，並沒有妨礙我們的政府，恰恰相反，它們祇推動，而且必須推動他，使它實行保障和鞏固工農聯合的政策，以爲我們農民國家內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階級任務的重要工具，因此我們，稱此種政府爲工農政府，這裏有什麼矛盾呢？列寧實行工農政府的口號，并稱我們的政府爲工農政府這是很好的，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呢？

一般的講來：『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我們國家內，藉他的幫助實現一階級的政權，即無產階級的政權，是一種異常複雜的制度。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喜歡這樣的複雜情況，不合他們的口味。我知道，在他們中間。有很多同志抱着『少費力主義』願意在簡而又易的制度下過生活。有什麼辦法呢；第一，列寧主義，須應用真正的列寧主義（絕不能簡單庸俗化）；第二，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最簡單的最容易的『理論』，不一定是最正確的理論。

四，你在來書中，噓聲嘆氣的說：『一般同志對此問題所犯的罪過。是在他們或者僅是簡單的談到國家或者僅是簡單的談到政府。因此，他們不能給一個最後的

回答，同時他們完全忽視了這兩個觀念的關係」。我承認，在我們做指導工作的同志中間確有此種『罪過』存在，如果我們注意到有些不很努力的『讀者』當他們讀列寧文集時，不願意好好的研究，而反要求人家替他們將每字每句都澈底的分析一下。這有什麼辦法呢，第一我們做指導工作的同志，異常忙碌，鎮天爲日常工作所糾纏，不能把列寧主義逐點加以解釋；第二，總要留點工作給『讀者』，因爲他們終久必須由隨便翻閱列寧全集，而走向刻苦的研究。應該說的，就是如果『讀者』對於列寧主義不肯下刻苦研究的工夫，那『讀者』的怨嘆，（像你的一樣），和『誤會』時常會發生的。

拿個比方來說，拿我們國家這個問題來說。這是很明顯的，我們的國家，不論根據他的階級性或政綱，或根本任務，或行動，或事業，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國家。自然，在國家機關裏有些『官僚主義的流弊』。列寧的定義：『工人國家是抽象的，在事實上，我們所有的工人國家，第一個特點，在牠是一個工人佔少數農民佔絕大多數國家，次則工人國家尙帶有官僚主義的流弊。』

(第十八卷上冊第三三頁)懷疑有此的，只有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和一些反對派的分子。列寧屢次說明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即是一階級(無產階級)的專政。這些已經很久以前爲人所共知的了。但是還有不少列寧主義底『讀者』，仍然冒充列寧的話，謂列寧曾經稱過我們的國家爲『工農』國家，其實，這裏並不難知道列寧在那時所說的並不是我們國家階級性的定義，更沒有否認我們國家的無產階級性，他只說無產階級性的蘇維埃國家必須實行無產階級與農民基本羣衆的聯合，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又必須向鞏固此種聯合的方向進行。試看一看列寧全集十五卷——五五頁；第十七卷——二六，五四，四二〇頁；第十八卷第一編——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三八〇頁。在這些著作中，以及在幾種其他著作中，列寧稱我們的國家爲『工農』國家。可是在這些地方列寧始終不是說到我們國家的階級性，列寧只給了鞏固工農聯合的政策一個定義，這個政策，是在農民國家條件之下的我們國家的無產階級性及社會主義的任務中所產生出來的。在這種有條件狹隘的意義上，只在這種意義上，才能講到列寧在上述的著作

中關於「工農」國家。至於我國的階級性，我已在上面說過了，列寧曾給我們一個真確無比的說法，這種說法，絕不能加以任何的曲解：我們的國家是工人的國家在農民佔大多數的國家內并帶有官僚主義流弊的。我以爲這是已經很明顯的了。但是無論如何，還有些「讀者」善於「誦讀」文句，而不求了解，已讀過的東西還在繼續悲嘆着，埋怨列寧，關於我們國家性質的問題把他們弄糊塗了。而列寧的「信徒」不願「解釋」這種「混糊的地方」，特密得利夫同志，這不是很可笑的一回事嗎？……

你問：免除「誤會」的出路在那裏？據我的意見，只有一條出路：不要片斷的去研究列寧主義把他看得太容易，而要切實的深思與嚴重的去研究它。除此以外再沒有旁的出路。

第一個五年計劃總結

——斯達林同志在聯共黨中央執監聯席會議上的演說——

一 五年計劃的國際重要性

同志們！當我們公佈五年計劃的時候，很少有人認識五年計劃偉大的國際重要性。恰恰相反，許多人以為五年計劃是蘇聯的私事，這事體固然是重要的而且嚴重的，但他不過是蘇聯自己國內的私事。

但是歷史顯示了五年計劃的國際意義是不可測量的。歷史已經表現了五年計劃並不是蘇聯的私事，而是整個國際無產階級的事體。

遠在五年計劃出現以前，那時我們剛剛完成了反抗干涉主義者的戰爭而進行經濟的建設，在那時列寧便已說過：我們的經濟建設，具有深刻的國際重要性，蘇維

埃政權於經濟建設中所採取的每一個前進步驟，都引起了資本主義國家內各階層的強烈的回聲，把人類分成兩個營壘：一個是擁護無產階級革命的，另一個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

列寧說：

『現在我們影響世界革命，主要是用我們的經濟政策。每個人都望着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內的全體勞動者，沒有例外，也沒有誇大。這種事現在已經實現了。在這一方面，這種鬥爭已經具有世界範圍。假使在這一工作中我們能獲得勝利，那麼，我們最終一定能在全世界範圍上得到勝利。因此經濟建設問題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在一條戰線上，我們要緩緩的，逐漸的爭取勝利——這是不能很快地做到的——只能切實地向前和向上推進。』（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俄文第三版，四百十頁）

列寧說這些話的時候正是我們正在結束反對干涉主義者的戰爭，由武裝鬥爭轉到經濟戰綫上的鬥爭反對資本主義，轉到經濟建設時期。

從那時起經過了許多年，在這個時期內，每季，每年，蘇維埃政府在經濟建設

領域內所採取的每個步驟，都顯明地證明了列寧所說的這些話是正確的。

但是最顯然地證實列寧的這些說法的正確性，要算是建設的五年計劃——這計劃的來源，他的發展和他的實現。事實上，好像我們在我們國家進行經濟建設所採取的步驟中，沒有一個如五年計劃的問題及其發展與實現一樣，引起了歐美亞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各階層中這樣的回響。

其初，資產階級及其報紙，對五年計劃加以嘲笑。他們暗指我們的五年計劃爲「妄想」，「惡夢」，「烏托邦」。

後來事情很明白了，五年計劃的實施，產生了具體的結果，他們這些人便發出警報，說五年計劃威脅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生存，說五年計劃的實現會要使歐洲市場上的貨物充斥起來，傾銷增加，失業擴大。再過了多日，反對蘇聯政府的這種陰謀詐術，並沒有發生所期望的結果，於是各公司商店各報館各公團派遣了各種代表到蘇聯去考查，以使用自己的眼睛觀察那裏的實況。在這裏，我不是說工人代表團。一直從五年計劃的最初的開始，工人代表團就表現他們對於這一計劃開始的

熱情，預祝蘇聯完全成功，並且表示完全擁護蘇聯的工人階級。

從此以後，在所謂輿論中，在資產階級各種報紙上，各種公園內，起了一個分裂。有的人說：五年計劃完全失敗了，布爾塞維克快要坍台；另一方面，又有人發出相反的論調，說布爾塞維克雖然是一羣壞蛋，但是他們的五年計劃似乎成功了，並且很顯然的，布爾塞維克要達到他們的目的。

在這裏我引用代表各種見解的資產階級的報紙所表示的意見，這或許對於我們不無補益罷。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末，紐約時報說：

「一個五年工業計劃，絲毫不顧到比例性，而想如莫斯科時時自豪的所謂「不惜任何代價」達到目的。這個計劃實際上不是一個計劃，而是一個冒險以圖德性的賭博。」

因此，你們可以知道，五年計劃不是一個計劃，而是一場賭博！

英國資產階級報紙每日電訊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說：

「作為計劃經濟的一種實際嘗試，這個計劃是十分顯然的失敗了。」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說：

『自然，集體化運動是一個悲慘的失敗。使俄國瀕於兇荒。』

一九三二年夏季波蘭的資產階級報紙波蘭公報說：

『目前的勢形似乎表顯了蘇維埃政府，因實行農村集體化的政策，已經把他自己驅逐到「此路不通」的絕境。』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英國資產階級報紙金融時報說：

『因為實行他們的政策的結果，斯達林和他的黨遇到了五年計劃制度的破產，五年計劃所想達到的目的成了幻想。』

意大利的政治報說：

『說一個有一萬萬六千萬人民的國家四年的工作毫無成績，說布爾塞維克統治所代表的這樣一個大的政權在四年中經濟上和政治上超人的努力毫無成績，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不過那裏仍然有一個災難。這是一個對任何人都是很明顯的事實。朋友和敵人，布爾塞維克和反對布爾塞維克的人，左翼和右翼的反對派等都認識這一事實。』

美國資產階級雜誌現代歷史一九三二年十月號說：

『我們只要檢閱目前俄國的現狀，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所宣佈的統計目的方面，特別是在一些根本的社會原則方面，五年計劃是失敗了。』

這些著者的意見，毫無批評的價值。我認爲沒有批評的價值，因爲這些『頑固者』屬於中世紀時代的化石類，不管我們如何執行我們的五年計劃，他們仍然是要重述他們的意見。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從資產階級營壘內發出的另一報紙的意見。

在這兒，法國最著名的資產階級報紙時報在一九三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說：

『在第一回中，蘇聯已經得了勝利。蘇聯正在進行工業化，沒有外國資本的幫助。』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時報又說：

『共產主義以極大的步伐完成改造工作，而資本主義制度只能緩緩的進步。……在法國，土地劃分爲無數歸個人所有，因此農業不能機械化。蘇維埃因實行農業工業化，已經解決了這一問題。在與我們競爭中，布爾塞維克已經勝利了。』

英國資產階級報紙圓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十九期上說：

『在五年計劃下所獲得的發展是很驚人的。卡可夫和斯達林的曳引機廠，莫斯科的拉摩汽車廠，下諾弗哥羅的福特車廠，第聶伯洛水電廠，西伯利亞麥尼托哥兒斯克與古勒次克的大鋼廠，烏拉爾機器廠化學廠網（烏拉兒將成爲俄國的魯耳）——這些和全國其他的工業成績，證明了俄國的工業雖有種種缺點和困難，無論在健康上，在體積上和在力量上都是在繼續生長，已經替未來的發展建立了基礎。從俄國的觀點上特別重要的是俄國已經大大地加強了他的戰鬥力。』

英國資產階級報紙金融新聞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說：

『關於機器建設的進步是沒有人可以懷疑的。報紙上，講壇上大吹大擂的宣傳這種進步也不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必須記着……自然俄國生產機器和工具，不過這些機器和工具是最簡單的種類……』

『真的，在絕對數字中，機器和工具的輸入是在實際的增加，但是輸入機器和國內自製機器的比例是切實的減少……』

『俄國今日在生產他的五金業與電氣業工業所需要的一切機械。他已經建立了他自己的汽車工業，建設了工具製造的工業，從小的簡單的器械到複雜的機器。而且在農業機械方面，蘇聯可以脫離外國輸入品而獨立。』

『他們也不認爲一些基本工業（如鐵煤）生產量的遲緩其嚴重的程度足以妨害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有一件事是確實的：現在正在建設中的大工廠足以保證重工業出產量大大的增加。』

奧國的資產階級報紙『Neuen Ineie press』在一九三二年正月廿七日說：

『我們可以咀罵布爾塞維主義，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布爾塞維主義。五年計劃是一個新的巨像，我們必須注意到這點，特別是在經濟方面估量到這點。』

英國資本家加維（他是聯合屬國銀行的行長）在一九三二年十月說：

『我要聲明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也不是一個布爾塞維克。我確實是一個資本家，一個個人主義者。俄國正在向前猛進，然而我們國內許多工廠停了業，三百萬的人在拼命的找工作。人們對於五年計劃加以嘲笑并且預言五年計劃要失敗。但是你們可以相信在五年計劃條件之下，所做的工作多於所計劃的。在我所參觀的一切工業城市中，新的區域正

在產生，這些新區域的建築是根據一定計劃，有很寬的街道，有樹木，有廣場，有最近代式的房屋，有學校，醫院，工人俱樂部，有照料工人兒童的托兒所和幼稚園。不要輕視俄國的計劃，不要妄想蘇維埃政府會失敗。……現在的俄國是一個有靈魂，有一個理想的國家。俄國是一個驚人活躍的國家。我相信俄國的志願是正確的。不過最重要的事是俄國全體青年和工人有一種為今日資本主義國家不幸缺乏的東西，這東西就是希望。」

『美國資產階級的雜誌《國家》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說：

『五年計劃的四年已經真正地見到了特別的發展。俄國正在用戰時的強度來建設一個新生命的物體的社會的模型。這個國家的面孔已經改變到令人不認識。莫斯科有成百的街道與廣場，在莫斯科的郊外有新的外市，新的建築，一羣新工廠。其他比較不重要的城市也是如此。從大草原中，從荒涼曠野中，從沙漠中已經出現了新的城市，不僅是幾個城市，在過去四年中至少有五十個這樣的城市，每個城市有五萬到二十五萬人民，每一個城市是建築在某一種企業的附近，開發某種天然的富源。成百數的電力站，還有一些大的發電廠如第聶泊洛等正在實現列寧的公式：電氣加蘇維埃等於社會主義。』

『蘇聯現在努力大規模的製造俄國以前從未生產過的物品——曳引機，複合機，高度

鋼軌，人造橡皮，高力地什爾摩托，五萬基羅瓦特渦輪，電話交換器，電力採礦機，飛機，汽車，貨車，腳踏車，電力銲接機，及其他數百種新機器……。

『俄國開採鋁，鎂，碘，磷灰石，木炭，及許多寶貴礦產，這是第一次。』

『現在蘇維埃農村的標誌不是一個富麗的教堂的圓頂，而是穀物起重機和穀物保藏棧。集體農場的人正在建築養豬所，倉庫，房屋。電氣正在侵入愚蒙的鄉村，無線電及報紙已經征服了這種鄉村。工人們正在學習操縱世界上最近代的機器，農民的兒童們製造和使用比在美國看見的更大的複雜的農業機械。』

『俄國已經變成了機器熱了。俄國正在很快地由木的時代轉變到鋼，鐵，三合土與摩托的時代。』

英國左派改良主義的前進報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說：

『沒有一個人會看不見正在進行的偉大建築工作。』

新工廠，新影院，新學校，新餐館，新俱樂部，整幢新的大共同住宅，每一個地方都有新的建築物，許多已經完成了，其他的則才建立起骨架。

『我們很難使英國的讀者認識在俄國已經做了的工作和現在正在進行的工作。』

『一定要親眼看過才會相信。我們在戰時的努力同俄國已經完成的工作相比真是渺小不足道。美國人承認就是在西方最忙的日子也不能有像俄國現在正在進行的狂熱建築工作。』

『在兩年後在俄國我們就看見了這許多變遷，因此我們簡直不能料想到再過十年後俄國將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我勸你們忘記那些英國報紙所說的詭譎驚人的故事，英國的報紙關於俄國的事情總是頑固地，囂然地，可鄙地造謠。我勸你們忘記那些一知半解的學院知識階級所傳播的半真理和誤解，這些智識階級從他們的上等的中等階級的眼鏡中去看俄國，他們很瞧不起俄國，其實他一點兒也不了解俄國現時正在進行着的事。……』

『俄國正在依着根本正確健全的路線建設一個新社會。爲了要進行這一工作，俄國正在冒許多危險，正在以世界上未見過的力量來熱烈的工作，他犯了錯誤，并且用辛辛來補救這些錯誤，他必須克服極大的困難，這種困難是與企圖在一個廣大，未開化，脫離世界而孤立的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不能分開的。在兩年後我參觀俄國所得的印象是：俄國正在堅實的進步，計劃，創造，建設，向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挑戰。』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資產階級營壘中的紛爭與分裂。有的大吹大擂說五年計劃失敗了，蘇聯要死亡；但是另外有些人顯然贊成和蘇聯維持商務合作，很明顯的，他們打算可以從五年計劃的成功中取得若干利益的緣故。

特別的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階級對於蘇聯五年計劃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的關係。這裏只引述每年來到蘇聯的許多工人代表團中的一個宣言，比如比利時工人代表團。這個宣言，可以代表每個工人代表團，不管他是英國的，或法國的，或美國的，或德國的，或來自其他國家的。這個宣言說：

「我們十分高興在我們旅行中看見了偉大的建設工作。在莫斯科，馬喀越府喀，戈羅府喀，哈爾可夫，列寧格勒，我們能證明他們用什麼熱忱在那兒工作。一切機器，都是最新式的模型。工廠中到處清潔可愛。空氣光線，都很充分。我們親見蘇聯工人受了怎樣的醫藥。工人住處，建築在工廠的附近。學校與托兒所，都設立於工人區域。對於照料小孩們予以極大的注意。我們見到舊式與新式工廠的不同。舊式與新式住房的差別。我們所見到的，很明白地表示工人羣衆是以絕大的能力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來建設新的社會。我們在

蘇聯看見了偉大的文化進步，而在其餘的一切國家，一切都在沒落的狀態中，失業瘋狂般地增加着。但是我們也看見了蘇聯勞苦羣衆在路途上所遭遇的巨大困難。我們更了解他們指出其勝利時的那種洋洋得意的神情。我們深信他們正在克服一切障礙。』

這就是五年計劃的國際重要性。兩三年內所做出來的建設工作，使五年計劃產生了初步的成功，把全世界分成兩個營壘：一方面站立着不斷地咀咒我們的人，另一方面站立着見我們五年計劃勝利而恐慌的人。此外還有存在於全世界的我們自己的營壘，正在繼續增加他的力量，——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階級的營壘，這一工人階級對於蘇聯無產階級的成功是歡欣鼓舞的，並且是準備擁護他的，這使全世界的資產階級見了害怕。

這是什麼意義？

這就是說：五年計劃勝利與成績的國際重要性是沒有疑慮的。這就是說：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孕育着無產階級革命。正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孕育着無產階級革命，所以資產階級要從五年計劃的『所謂』失敗找得新的論據，來反對革命。同時，無產

階級在另一面正在從五年計劃的成功，找得新的論據來擁護革命反對整個世界的資產階級。

五年計劃的成功，動員一切國家內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來反對資本主義。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無疑地，五年計劃的國際革命意義，是確實不可測量的。所以我們對於五年計劃，對與其實質與基本任務，必須予以極大的注意。我們必須很仔細地分析五年計劃的結果，分析執行和實現五年計劃的結果。

一 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與其實現方法

現在我們來提出五年計劃的實質這個問題。五年計劃是什麼呢？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什麼呢？

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在於使我們的國家，從落後的有時是中世紀的技術，走向新式現代技術的道路。

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在於把蘇聯從一個農業國家，從一個脆弱的倚賴資本主

義國家的國家，變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而不依賴世界資本主義。

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在於把蘇聯變成一個工業國家，完全驅逐資本主義的原料，擴大經濟的社會主義形式的陣綫，建立廢除蘇聯內各階級的經濟基礎，建立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

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在於我們國內建立一種工業，能夠於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不僅改造整個工業而予以新的設備，並且改造交通與農業。

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在於把小規模的散漫的農業。轉到大規模的集體的經濟，這樣便可於農村中樹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使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為不可能。

最後，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在於國內創立絕對必須的技術上的與經濟的種種前提，來增加保衛國家的防禦能力到極大的限度，務必擔保外來的武裝干涉，外來的軍事進攻的任何企圖，都受堅決的擊退。

這個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取決於什麼呢？五年計劃後面的問題是什麼呢？

這是由於必須消滅蘇聯在技術上與經濟上的落後，這一落後注定了蘇聯的無意義的存在。這是由於必須在國內創立種種先決條件，使蘇聯在技術上與經濟上不僅能夠趕上而且及時超過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我以為蘇維埃政權不能長期維持自己於落後工業的基礎上，只有最新的大工業，祇有不僅不落後而且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的那種大工業，才能成為蘇維埃政權的穩固基礎。

我以為蘇維埃政權不能長期站立於兩個矛盾的基礎上，一個是摧毀資本主義原始的社會主義式的大工業，另一個是產生資本主義原素的個人的小農經濟。

我以為從小農經濟決不能建立大生產的基礎，小農莊如果不聯合成為大的集體農莊，那末，蘇聯資本主義恢復的危險，是成為一切可能危險中最實際的危險。

列寧說過：

『革命的結果，俄國在幾個月內在政治制度上趕上了最先進的國家。但是這是不夠的。戰爭是堅決不容情的，他無情地提出了兩個辦法：或是在經濟上趕上最先進的國家并

且超過他們，或是滅亡；或者是猛力上前，或者是滅亡。這是歷史所提出的問題。」

列寧說過：「祇要我們生存在小農國家，則在俄國便存在着於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堅實的經濟基礎。……只有全國電氣化了，只有工業農業交通獲得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了，那時我們才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

列寧說的這些話，成爲黨的基本見解，來制定五年計劃與決定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

但是我們不能亂七八糟地來執行這個偉大的計劃。爲要實行這個計劃，我們必須首先找出這個計劃中主要的一環，只有找到和抓住這主要的一環，我們才能推進這個計劃中其他的許多環。

五年計劃中的主要環是什麼呢？

五年計劃的主要環。是重工業，以建設機器爲中心。因爲只有重工業才能改造工業的全部，交通與農業，使他們都能夠自立。因此恢復重工業是執行五年計劃的基礎。

在這方面，我們也有列寧的指示。列寧說：

「能够救俄國的不單是農民田莊的豐收。那是不够的。也不單是輕工業的好狀況，把消費者的商品供給農民。那是不够的。我們也需要重工業。不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不能建設任何種的工業。沒有重工業，我們將要滅亡而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重工業需要政府的津貼補助。假使我們不能找到政府津貼，我們不能稱爲一個文明的國家，更談不上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俄文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三四九頁）

但是重工業的改造與發展，尤其是在我們落後的不富足的國家內，成爲一個很困難的工作，因爲大家都知道，重工業需要鉅大的財政資金與最低限度的有經驗的技術人員的存在，沒有這個，重工業是簡直不可能的。黨知道這點麼？考慮到這點麼？是的，黨知道這點。他不但知道這點，而且大聲疾呼地喊出來了。黨知道英德美的重工業是如何建立的。黨知道這些國家內重工業的建立，是得到大借款的幫助，或由於劫掠別的國家，或同時採用這兩種方法。黨知道我國不能採用這些方

法。那末它打算依靠什麼呢。他依靠我們自己國內的力量。他記者：我們握住蘇維埃政權，又以土地，工業，交通，銀行，貿易的國有爲後援，能夠執行嚴格的節儉政策，以便籌集改造與發展重工業所必須的資金。黨曾經十分公開地說過：這一工作需要重大的犧牲，假使我們達到我們的目的，黨打算依賴國內的力量來進行這工作，不需要奴隸我們的信用借款與外債。

在這一點上，列寧說：

「我們必須努力建設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內要保持工人對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的信任。以極大的節儉剷除他們的社會關係中的每一個奢侈的痕跡。」

「我們要使我們的國家機關變爲極端的節省，我們要肅清帝俄時代官僚資本家機關所遺留的每一個奢侈的痕跡。」

「這不會變成一個農民狹窄心理的王國嗎？」

「否，假使我們能保持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在政府的管理中採取極大的節省政策，那麼我們一定能使每一點儲蓄——不管是如何的小——都用來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

業，發展電氣化，水電，完成窩爾加阿弗斯特羅依等等。

『我們的希望就是在這兒。只有那時我們才能「換馬」，以一個破碎農民國家內所需要的貧困的經濟馬來換無產階級所尋求的馬——大機器工業，電氣化等等的馬。』（列寧

全集二十七卷，第四一七頁）

從一匹貧窮的馬換為一匹大機器工業馬，這就是黨在進行五年計劃中所追求，所努力的目的。

實行極端的節儉制度，籌集必須要的款項來進行我國工業化，這是恢復重工業與完成五年計劃所必須走的道路。

這是大膽的工作麼？困苦的道路麼？但是我們的黨是稱為列寧主義的黨，因為他沒有害怕困難的權利。黨是十分相信五年計劃的可能性，十分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所以他覺得在四年內可以完成五年計劃這個困難工作。確切點說，假如我們加上『特別季』，便是四年零三個月完成的。

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的有名的口號。

結果是怎樣呢？事實證明了黨是正確的。事實證明了假若沒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假若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黨是不能夠得這個我們可以自豪而無愧的勝利。

三 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結果

現在我們講到實現五年計劃的問題。

在工業範圍內，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結果是什麼呢？我們在這個領域內得到了勝利麼？得到了。我們不僅得到了勝利，而且超過了我們自己所希望的，甚至超過了最熱心的黨員所希望的。現在就是我們的敵人也不能否認。至於我們的朋友更不用說了。

從前沒有鐵和鋼工業作爲我們國家工業化的基礎。現在有了。

從前沒有電話機工業。現在有了。

從前沒有汽車工業。現在有了。從前沒有機器工業，現在有了。

從前沒有健全化學工業，現在有了。

從前沒有生產現代農業機械的真正重要工業，現在有了。

從前沒有航空工業，現在有了。

從前關於電力的生產，我們占末了的一位，現在却進到第一等位置中的一個了。

從前關於油與煤的生產，我們占末了一位，現在進到第一等位置中的一個了。

從前祇有一個煤鐵根據地，即烏克蘭，我們尙不能完全利用他。現在擴大了這個基礎。並且在東方建立了一新的煤鐵基礎，算是我們國家足以自豪的。

從前只是我國的北方有幾個紡織業的中心，現在却建立了兩個新的中心，一個在中央亞細亞，另一個在東西伯利亞。

我國不僅創立了這些鉅大的新的工業部門，而且發展他們到這樣的程度，和這樣的大範圍，簡直令歐洲的工業相形見绌。

這一切的結果，使工業中的資本主義原素永遠被剷除而不能復活，使社會主義工業成爲蘇聯工業的唯一形式。

這一切把我們的國家從一個農業國家變成一個工業國家，因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比重，從一九二八年五年計劃開始時的百分之四十八，增加到一九三二年五年計劃終了時的百分之七十。

這一切使我們在五年計劃的第四年能夠完成五年工業生產的全部的百分之九三·七。工業生產比戰前增加三倍以上，比一九二八年增加兩倍以上。關於重工業的生產量的計劃，我們完成了五年計劃百分之一〇八。是的，五年計劃的整個計劃，還有百分之六沒有完成。這是由於鄰國拒絕和我們簽定不侵犯條約，並且遠東的糾紛日趨嚴重，我們不得不把某幾種企業儘可能地迅速地改造現代的防禦武器，來增厚我們的防禦力。

因情勢的需要，使我們不得不作某種準備，使有些工廠停止製造生產品，經歷四個月的時光，因此影響了一九三二年五年計劃的總生產的完成。這一改變的結果，完全補足了國防能力上的缺憾。但對於完成五年計劃的生產計劃，確有一個不良的影響。假如不是有了這一意外的情況，我們不但完成了計劃上的數字而且超過

了他。

最後，這一切把蘇聯從一個虛弱的，毫無防禦力的國家改變為一個防禦力強大的國家，一個準備應付任何事變的國家，一個在外來攻擊時能大量生產一切近代防禦武器供給他自己的軍隊的國家。

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結果，大概如此。

你們自己判斷一下：資產階級報紙說五年計劃在工業領域內『失敗』了，到底有什麼價值呢？資本主義各國，現在是怎樣呢？他們關於工業生產的發展，目前感受極銳利的危機。在這方面，有大家知道的官場統計：

在一九三二年的末了，蘇聯的工業生產，是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三三四，在同一時期，美國的工業生產降到戰前水準百分之八四，英國降到百分之七十五；德國降到百分之六二。一九三二年末，蘇聯的工業生產增加到一九二八年水準百分之二一九，美國的降到百分之五六，英國的降到百分之八〇，德國的降到百分之五五，波蘭的降到百分之五四。

這些數字，不過指明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業，在和蘇維埃制度的比賽中，經不起試金石의 試驗：蘇維埃制度下的工業，享有優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優點。他們向我們說：這一切都是很好的，許多新工廠已經建立了，工業化的基礎也建立了，不過放棄工業化的政策，放棄擴大生產手段的生產的政策，或至少延緩這個工作到較後的階段，以便生產更多的棉布，鞋子，衣服及其他日常需要的用品，那便更好了。但是我們必須知道，並且顧慮到這一展緩工業化的政策會得到什麼結果呢？不錯的，我們可以拿建立重工業所耗費的十五萬萬盧布的半數，來買進生棉，生皮，橡皮等。自然可以生產更多的棉布，鞋子，布疋。但是我們不能有電耕機與汽車工業，也不能有穩固的鋼鐵工業，沒有五金來生產機器。資本主義世界都有現代的技術的武裝，而我們是無異乎被敵人解除武裝。我們不能拿電耕機與農業器來供給農業。因此我們沒有糧食。我們更不能戰勝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原素。或許也大增加了恢復資本主義的機會。或許也不能有一切現代的防禦武器，沒有這個，國家的獨立是不能的；沒有這個，我國便變成了國外的敵人的戰爭活動的目的物。那

時我國的地位，或許和中國差不多，自己既沒有重工業，也沒有軍事工業，只好任人宰割罷了。總括一句：在那樣的場合中，我們會要受武裝干涉，決不會有什麼不侵犯條約，只有戰爭，非常殘酷的戰爭，而且是不平等的血戰，因為我們沒有武裝，而敵人則有一切現代的進攻的武裝。

事情就是這樣，同志們！顯然地，一個自尊的國家，一個自尊的黨，不能採取這種自殺的觀點，黨正因為拒絕了這種反革命的態度，才能在工業的領域內，獲得完成五年計劃中的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在實現五年計劃中，在組織工業建設領域內的勝利中，黨以最高的速度執行發展工業的政策，黨推動了全國，使他向前猛進。

黨執行提高速度的政策，是不是正確的行動呢？毫無疑義地是正確的。

對於一個落後幾百年的國家，對於因為落後就有滅亡的危險的國家，當然不能不加以刺激。只有用這個方法，才能使這個國家於現代技術的基礎上，迅速地改造自己，最後走向發展的大道。

再者。我們不知道帝國主義者在那一天來進攻蘇聯，來阻撓我們的建設工作。

他們認為適當的時候就來進攻，并且同時利用我們的技術上的與經濟上的弱點，這是毫無疑義的。所以黨只得推動國人，以免虛耗時間，他必須從早利用『喘息』的時間，來建立蘇聯工業化的基礎，這基礎成爲蘇聯權力的根據。黨沒有等待與敷衍的可能。他必須提高速度到最大的限度。

最後，黨必須在最短時期內補救國防方面的弱點。目前的形勢，資本主義國家軍備的發展，縮減軍備的失敗，國際資產階級對於蘇聯的仇視，這一切逼迫我們的黨不得不努力加強國防力，這是國家獨立的基礎。

黨曾經有不有真實的可能來實現最大的速度呢？他確有真實的可能。它有了這樣的可能，不僅僅因爲黨及時喚醒全國向前邁進着，尤其是因爲黨能依靠大規模的新建設，在舊有的或刷新了的工場與工廠上，這些工廠已經由工人，工程師與專家弄得很純熟了，因此可以使實現發展的最大的速度是可能的。

那就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即新建設有迅速的進步，擴張建設的猛烈，建設熱情，新建設的突擊隊與大大增加速度的基礎。

是不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執行同樣增加速度的政策呢？否。

第一，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功的結果，我們已經在實質上完成了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建立工業，交通和農業的現代技術的基礎，在這些條件下，還需要去刺激和加速全國嗎？很明白的，現在沒有這種需要。第二，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功的結果，我們已經提高國防能力到必須的程度。最後，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功的結果，我們已經建立好幾百個新式大工廠，並且以現代複雜的技術來裝置它們。

這個意思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工業生產中，舊有的工廠，即被我們把技術弄純熟了的舊有工廠，不再起領導作用，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一樣。起領導作用的，將是新設的工廠，它的技術還沒有由我們弄得純熟，但是必須要弄純熟。不過把新企業及新技術弄得純熟，比較利用舊有的或刷新了的工廠是困難些。它需要較多的時間，來提高工人，工程師，技術人員的熟練，養成新習慣，使他們能夠完全使用新技術。這不是很明顯嗎？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下，就令我們想進行高速度發展，也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起始的一二三年。

因此，我以為第二個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工業生產增加的速度，將要小一點。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工業生產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二二。但是我以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工業生產，將是每年增加百分之三一——一四。這種增加率，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做不到的。現在，他們連百分之五的增加都辦不到了。他們究竟是資本主義國家。具有蘇維埃經濟制度的蘇聯是不同的，在我們的經濟制度下，我們能夠并且應該每年實現百分之三一——一四的增加，這是最低的限度。

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創造了對新建設的熱情，得到了很大的勝利。這是很好的。到現在，這便不夠了。我們現在必須補充這一工作，必須熱烈地來熟練新的企業與現代技術，來提高勞動的生產力，來大大地減少成本。這是現在一件主要的事情。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夠在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半對於建設與工業生產的發展得到新的猛烈的發展。

最後，稍為說一說速度與生產每年增加的百分數。生產增加百分率是怎樣的意見呢？每百分增加的背景是什麼呢？我們舉出經濟恢復時期的一九二五年。那時生

產每年的增加是百分之六六。工業的總生產是七七〇〇百萬盧布。百分之六六的增加，在那時代表三〇〇〇百多萬（絕對數字）。因此那時的每百分增加等於四三百萬盧布。再來舉出一九二八年。這年的增加是百分之二六，即約略等於一九二五年百分增加的三分之一。那時工業的總出產是一五、五〇〇百萬盧布。那年的總增加是三二八〇百萬（絕對數字）。這樣，那時的每百分增加，代表一二〇百萬盧布，即約略等於一九二五年所增加的百分之六六的三倍。最後，一九三一年，生產增加百分之二二，即等於一九二五年所增加的三分之一；而工業的總生產，等於三〇、三〇〇百萬盧布。增加的總和，等於五六〇〇百萬。那末每百分增加，等於二五〇萬盧布。即等於一九二五年增加百分之六六的六倍，等於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六的二倍。

這一切是什麼意思呢？他的意思是：在考查生產發展的速度時，不應該只限於考查發展的百分數。必須知道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內容，增加的總數是若干。比如一九三三年只增加百分之一六，即是一九二五年所增加百分數的四分之一。但是這年

增加的實數，決不會小四倍。就絕對數字講，一九二五年生產的增加，等於三〇〇〇百萬強，每百分之一的增加，等於四三百萬。一九三三年根據百分之一六的速度生產增加，不會少於五〇〇〇百萬，即等於一九二五年的兩倍。每百分之一的增加，至少代表三二〇至三四〇百萬盧布，即等於一九二五年每增加百分之一的七倍。這些是工業領域內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結果。

四 四年完成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的結果

農業領域內的五年計劃，便是集體化的五年計劃。什麼是黨執行集體化的基礎呢？黨認為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要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除工業化以外，應該把小的個別農莊，轉變為集體化了的大農莊。更以電耕機與現代農業機器來裝置他，使成為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唯一穩固基礎。黨認為沒有集體化，便不能領導我們國家到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大道，便不能把成百萬的勞動農民從貧困與愚昧中解放出來。列寧說：『小農莊沒有法子免除窮困。』

列甯說過：『假如我們依舊維持小農莊——甚至於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我們同樣將受不可避免的破產的威脅。』

他又說：『祇有藉助於集體合作的工作，我們才能從這個帝國主義大戰替我們造成的死巷中走出來。』

『我們必需轉到共同耕種大的模範農場，沒有這個，我們不能逃出滅亡，不能逃出目前俄國所遭遇的絕境。』

根據上面的基礎，列甯得到下面的基本結論：

『只有在實際事實中證明給農民看社會的，集體的，合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的優點，只有以合作的與勞動組合的農場去幫助農民，祇有這樣，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才能真正地證明給農民看工人階級是對的，才能真正堅決地和有力地奪取數百萬農民羣衆。』（列寧全集二十四卷五七九——五八〇頁）

黨於執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於執行農業五年計劃的綱領，是從列甯的這些話出發的。在這方面，五年計劃的任務，在於連合散漫的小農莊，這小農莊沒有利用

電耕機與現代農業機器的可能。應該把他轉變成為集體化了的大農莊，用一切現代工具來裝置他，把他轉變成為高度發展的農業。國家模範農莊，蘇維埃農莊，應該成立於自由的土地上。

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的任務，在於把蘇聯從一個落後的小農國家變成一個以集體勞動為基礎的國家，生產最大數量的市場商品。

在農業方面，黨在執行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中得到了什麼成績呢？他完成了綱領麼？或者他受了失敗呢？黨在三年內組織了二〇〇、〇〇〇以上的集體農莊，五〇〇〇蘇維埃農莊，主要用來生產五穀與家養牲畜，同時在四年內增加了耕地二百萬公畝。

現在集體農場包括租地百分之六以上，包含全體農場百分之七十以上，超過五年計劃三倍。

在個別農莊支配的時期，僅能獲得五〇〇——六〇〇百萬蒲特的『商場五穀』，現在每年可以獲得一二〇〇——一四〇〇百萬蒲特五穀，這要算是黨的成績。

富農階級被打碎了，不過還沒有完全消滅，勞動農民，已經從富農的剝削下解放出來了；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即集體農莊。這是黨的成績。

蘇聯已經從小農經濟的國家變成世界上最大農業的國家，這也是黨的成績。

你們想想：從這一切看來，資產階級報紙說集體化失敗了，說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失敗了，他們這些話到底有多少價值。

正在經過最銳利的農業危機的資本主義國家內，農業的現狀是怎樣呢？讓我們看看一般知道的官報罷！

生產五穀最重要的國家，減少了耕地百分之八——一〇。美國棉地減少了百分之一五，捷克與德國的乾地，減少了百分之二二——三〇，立陶宛與萊多維亞的蘇地減少了百分之二五——三〇。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統計，美國農產品的總生產量一九二九年值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一九三二年則降為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即是說

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同一時期五穀總產量的價值由一、二八八、〇〇〇、〇〇元降到三九一、〇〇〇、〇〇〇元，即是減少百分之六十八強。關於棉花，則從一、三八九、〇〇〇、〇〇〇元降到三九七、〇〇〇、〇〇〇元，即是減少百分之七十強。

這些事實，不是證明了蘇維埃制度的農業超過資本主義農業的種種優點麼？不是證明了集體農莊比個別農莊與資本主義農莊是較好的農業形式麼？有人說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不能完全生產有利的報酬，反而消費了大量的金錢，經營這種企業是不合理的，頂好是將他解散，祇留下生產有利的報酬的。只有不懂國民經濟的問題和經濟問題的人，才會說這些話。

幾年以前過半數的紡織廠是不能生利的。一部分同志要求要這些廠停辦。假使我們當時採納了他們的意見，結果將變成怎樣呢？我們對於國家，對於工人階級犯了極大的罪過。因為我們一定會破壞了正在生長中的工業。

在那時我們怎樣辦呢？我們等了一年多一直到整個的紡織業都能生利。

現在高爾基地方的汽車廠也還不能生利，難道我們關閉這個工廠嗎？我們也要關閉現時尚不能生利的鋼鐵業嗎？同志們，我們不應當關閉他嗎？

假使我們從這樣一種觀點來看生利性，那麼，我們只能努力發展能生最高利息的少數工業如糖果，麵粉，香水，襪，玩具等等。自然我并不反對發展這些工業。恰恰相反，這些工業也必須發展，因為他們也是人們所需要的。但是第一，沒有機器和燃料，我們不能發展這些工業，然而要有重工業才能生產機器和燃料。第二，我們不能以這些工業作為工業化的基礎。主要點就在這兒，同志們。

有利與否，是不能從小店主的觀點與一時的觀點來加以觀察的。有利與否，必須從一般的國民經濟觀點，從多年平均的觀點，來加以觀察的。只有這樣的觀點，才真是列寧主義的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觀點是必須的，不僅關於工業尤其關於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都應該是這樣的。這裏，請想一想。三年內我們建立了二〇〇、〇〇〇集體農莊與五、〇〇〇蘇維埃農莊。即是說我們完全建立了新的偉大企業，他對於農業猶如工廠對於工業是同樣的重要。請舉出一個國家來，不說於三年

內建立二〇五、〇〇〇新的偉大企業。只說建立二五、〇〇〇這樣的企業。你們不能舉出這種國家來的。世界上沒有這種國家。

然而我們在農業中創立了二〇五、〇〇〇新企業。雖然世界上有人要求這些企業立刻生利，否則立刻必須加以毀滅和解散。

這不是很明顯地嗎？黑羅斯提拉特的桂冠不能讓這些莫明其妙的人安眠？我說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不生利。並不是說他通統不生利。不是這一回事。大家知道有若干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是很生利的。我們有幾千的集體農莊，有幾千的蘇維埃農場，已經很能生利了。我們的黨與蘇維埃政權對於這些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都可引以自豪的。自然這種農莊，並不是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是相同的。他們當中有些是很舊的。有些却是很新的。有些還不成爲財政上有定形的經濟組織。他們在組織上的發展經過和一九二〇——二一年我們工廠所經過的同樣時期。他們的大多數，還不能夠生利，但是經過兩三年以後，他們就會和一九二一年後的工廠一樣地生利。這是沒有疑義的。因爲他們不全體生利就拒絕幫助，這是反工人階級與農

民的最大罪惡。只有人民的敵人，反革命派，才說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是沒有用的東西。

黨於執行農業五年計劃，提高了集體化的速度。這是對的麼？黨無疑義地是正確的。在這裏，還免不了各種情感的暴露。黨於消滅富農階級，和肅清富農的巢穴，自不能半途而廢。黨利用電耕機與農業機器，更利用土地佔有制的不存在，自然可以實行農業的集體化。在這方面，黨的成功是最大的，因為超過五年計劃集體化的三倍了。

這個意思是不是說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內還要執行集體化的加速度的政策呢？不是的。因為已經完成把蘇聯最重要的區域都集體化了。在這領域內，我們超過了以前的預期。我們已經使農民的大多數覺悟到只有集體農莊才是最可接受的經濟形式。同志們！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集體農莊的問題，已經不是「是不是」的問題。這問題已經確實解決了。集體農莊，已經加強了。到舊式個別農莊的道路，已經是封閉了。現在的任務，在於從組織上加強集體農莊，肅清陰謀破壞份子，提

拔真正好的有經驗的布爾塞維克幹部到集體農莊，把集體農莊變成真正布爾塞維克農莊。現在這是主要的事情。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到四年完成的問題就是如此。

五 在改善工人農民的物質狀況方面，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結果

我已經說過工業和農業中的成績，說過蘇聯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這些成績對我們改善工人農民的物質狀況有什麼結果呢？

從根本改善勞力與勞心的勞動者的物質地位看來，我們在工業農業領域內成功的最重要的結果，在什麼地方呢？第一，在撲滅了工人中的失業與愚昧；第二，吸引了差不多一切的貧農建立集體農莊，破壞了把農民分為富農與貧農的基礎，因此消滅了農村中的窮困和貧苦。

這是資產階級國家夢想不到的偉大成績，不論他是如何的『民主』。我們蘇聯工人，早已忘記失業了。三年以前，我們有一百五十萬的失業工人，但是到現在，

已經有兩年沒有失業工人了。現時工人才能忘記失業與失業痛苦。看看資本主義國家，失業的痛苦是怎樣的！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失業的工人，總有三四千萬。他們現在是怎樣一種人呢？一般人稱他們爲『注定遭劫的人』。他們天天找工做，準備在任何條件下接受工作，但是終久找不着，因爲他們是『多餘的』。同時大量的商品與產物，是被資本家與大地主的驕子的浪費。失業工人得不到食物，因爲他們不能付錢；得不到住處，因爲他們不能付房租。他們是怎樣生活？他們靠些富人們桌上可憐的救濟金爲生，他們只是吃着人們拋棄了的腐爛食物。他們住在大城市的貧民窟，很多是住在城外用樹皮箱板蓋成的破房裏。不僅如此，失業的結果，不僅只有失業者受痛苦。在業工人也受痛苦，因爲大批失業的關係，生產中創出了一種不穩定狀態，不知道明天是怎樣的。今天固然還沒有失業，究竟到了明天，是不是會得到被開除呢？

四年完成五年計劃最重要的結果中的一個，是於蘇聯內消滅了失業，使工人們不感覺到失業的恐怖。

對農民也是一樣的。他們忘記了貧農與富農的分別。他們忘記了每年有幾百萬的農民破產爲乞丐的痛苦。忘記了農村貧民被富農剝削的痛苦。三四年以前，農民的戶口中差不多有百分之三〇是貧農。他們的總數在一千萬以上。在十月革命以前，貧農占戶口百分之六〇。他們過着飢餓的生活，經常地被富農奴役着，在從前還被富農與大地主奴役着。不久以前，有一百五十萬乃至兩百萬貧農，每年到南方，北高加索與烏克蘭替富農工作，從前替富農與大地主工作。他們當中更有一大部分來到工場的大門前，增加失業工人數量。不只貧農是這樣可憐。一半中農也受同樣的痛苦。農民已經忘記這一切了。

五年計劃給予了貧農與中農的下層一些什麼呢？他消滅了富農階級，這樣便把貧農與一大半中農從富農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他吸引他們到集體農莊中來。替他們建立了一個穩固的基礎。他這樣使農民不至再分爲剝削的富農與被剝削的貧農了。他提高貧農與中農的下層到生活有保障的地位，因此毀滅了農民貧窮化與破產化的行程。在我們這裏，每年再沒有幾百萬的農民，拋棄他們的農莊，跑到很遠的地方

來謀生活。如果要找集體農莊上的農民，到外邊工作，必須首先簽定和集體農莊結成的合同，擔保免費乘車。在我們這裏，再沒有幾十萬幾百萬農民破了產，擁護到工廠的大門邊。今日的農民已經確立了他的根基，成爲集體農莊上的一個成員，握有電耕機，農業機器，種子，準備金等。

改進工農物質的景况的結果，第一個五年計劃表現了：（一）大工業中工人與僱員的加多，比一九二八年加一倍，超過五年計劃百分之五七；（二）國民收入的加多，即是一九三二年工農收入加多，等於四五、一〇〇百萬盧布，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八五；（三）大工業中工人與僱員每年平均的工錢，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六七，超過五年計劃百分之一八；（四）社會保險基金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二九二（一九二八年是一〇五〇百萬，一九三二年是四一二〇百萬），比五年計劃的原定額加多百分之一二；（五）公共食堂包含最重要的工業部門中的工人的百分之七〇，超過了五年計劃的六倍。

不錯的，我們還沒有辦到完全滿足工農的要求，這恐怕是最近一兩年內辦不到

的。但是我們做到了工農的物質景况年年有改進。只有蘇維埃政權的死敵，才懷疑這點。資產階級報紙的代表，包含他派駐莫斯科的一部分的通訊員，或許也是懷疑的。這些人了解蘇聯的經濟與勞動羣衆的景况，正如亞比敘利亞王了解高等數學。

資本主義國家內工農的地位現在是怎樣呢？

這兒我們有正式的數目字。

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失業人數已經駭人地大大增加了。在美國，根據官報，製造工業中的工人數目由八百五十萬（一九二八年）減少到五百五十萬（一九三二年）。但是據美國總工會的統計一九三二年末美國失業者總數達到一千一百萬。

在英國，根據官方的統計，失業人數從一百廿九萬（一九二八年）增加到二百八十萬（一九三二年）。

在德國，官場的總計說失業人數從一百三十七萬六千人（一九二八年）增加到五百五十萬人（一九三二年）。

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可以看到同樣的情形。不過我們要記着官方的統計總是

減少失業數目字。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失業人數大概是在三千五百萬到四千萬之間。

同時有計劃地減少工人的工資。在美國平均每月工資與一九二八年相比減少百分之三十五。在英國同時期減少百分之十五，德國減少到百分之五十。根據美國總工會的推算，在一九三〇——三一年，因減少工資，美國工人損失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在英德兩國內工人的保險基金已經大大減少了。在英美完全沒有或近乎完全沒有任何形式的失業保險，因此無家可歸的工人和飄泊者的數目有極大的增加。特別是在美國。

資本主義國家內農民羣衆的地位并不比工人好。農業危機正在根本動搖農村，把千百萬的受難農民驅逐在農村中飄流。

關於改善蘇聯勞動者物質狀況方面，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結果就是如此。

六 在城市與鄉村間商品交換方面，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結果

工業農業生產的鉅大增加，工農業積餘產品的增加，工農需要的增加，這一切恢復了并且擴大了鄉村與城市間的商品交換。

城市與農村間生產上的合作，是合作的主要形式。不過光是生產上的合作是不夠的。必須用交換上的合作來補充，才能使城市與鄉村間的聯繫有永久性，不破碎。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發展蘇維埃貿易。這是不正確的，假使說只能用一種方法——如經過合作社——來發展蘇維埃貿易。為發展蘇維埃貿易，我們必須採取各種道路，如合作社，國營貿易機關，集體農場貿易等。

有些同志以為發展蘇維埃貿易，尤其是發展集體農場貿易，會要恢復到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階級。這個意見是絕對錯誤的。

什麼是蘇維埃貿易？蘇維埃貿易，是沒有大小資本家與投機者的貿易。他是經濟史上從沒有見過的貿易的特種形式，只有在我們蘇維埃發展的特種條件底下才能由我們布爾塞維克創辦出來。

在蘇維埃貿易（包括集體農場貿易）與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貿易間有一個基

本的不同。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階段，我們允許資本主義的恢復，我們允許私人貿易，我們允許私人商業家，資本家與投機者的活動。在那時我們有相當的自由貿易，只受政府法令的限制。在那個時候，私人資本的活動在國家的貿易上佔一個很大的地位。在那時我們沒有發展的工業，沒有集體農場，國家農場。現在我們有了，這些發展的工業，集體農場，國家農場在一定計劃的基礎上進行着，供給政府大量的農產品與城市製造品。

現在我們有相似的形勢嗎？自然沒有。

第一，蘇維埃貿易絕不與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貿易相同，雖然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貿易是受政府的限制。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貿易允許資本主義的恢復，允許私人資本在商品交換中的活動，但是蘇維埃貿易則拒絕了這兩種可能。

第二，在我們的背後，有了充分發展了的國家工業與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的整個網，以大量的工業農業出品供給國家，來發展蘇維埃貿易。新經濟政策的第一階段，不是這種情形，也不能是這種情形。

第三，最後，我們把一切私商人與私中間人都從貿易中驅逐出了。

這自然不會排斥依照商品流通中隔世遺傳律出現的新的私商人與投機家，這些人得了好機會經營集體農場貿易。但是我們有一個武器來抵制這些不好的現象，那個武器便是禁止投機與懲罰投機的蘇維埃法律，你們自然知道這種法律并不溫和，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條件下沒有，也不能有這種法律。

有了這些條件，還有人說我們會恢復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貿易，這完全是了解我們的蘇維埃經濟。

有人說現今我們的革命法律與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革命法律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現時我們的革命法律是恢復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革命法律。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革命法律主要是反對戰時共產主義所採的過激手段，反對『非法』的沒收和勒索，在蘇維埃法律嚴重監視之下，保障私人所有主與資本家的財產安全。

現時我們的革命法律則完全不同。現在的革命法律主要是用來對付損害公共財

產的竊賊，怠工者、惡棍及強盜。現時革命法律主要的任務只是在保護公共財產。

因此用蘇維埃政府法律所給我們的一切武器和方法來保護公共財產，這是黨的主要任務之一。

有人說，沒有健全的金融制度，沒有穩固的金融，是不能發展貿易的，甚至蘇維埃貿易也是不能的。又說，尤其是我們蘇維埃的金融制度與金融，據他們說是沒有價值的。必須首先加以改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者這樣對我們說。以我看來，這些經濟學者關於政治經濟的知識，恐怕不會超過英國大僧正關於反宗教宣傳的知識。怎麼能說我們蘇維埃金融沒有價值呢？我們用這種金融建設了馬格立多斯、提羅易，第立拍羅斯提羅易，庫斯勒慈斯提羅易，斯達林與哈科夫電耕機廠，莫斯科與高爾基汽車廠，幾十萬集體農莊，幾千蘇維埃農莊，這不是事實嗎？這些資本主義專家覺得這些東西是用乾草或乾土做的，而不是用有價值的材料做的嗎？假如我們考慮到有組織的市場，不說及無組織的市場，前者在我們商品的流通上有決定的意義，後者僅有次要性，那末，什麼是蘇維埃金融的基礎呢？自然不是存金。蘇

維埃金融的穩定性，主要地是由巨量商品做保證，這商品握在國家的手中，以一定的價格轉運市場。這種擔保品只存在於蘇聯，不是比存金還好些麼？那一個經濟學家能夠否認這點？五年計劃的結果，蘇維埃貿易領域內得到了什麼成績呢？執行五年計劃的結果，我們：

一，輕工業的生產量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八七；

二，增加了合作社的與國家的零售貿易百分之一七五（和一九二八年比較），這貿易在一九三二年的總額是三九·六百萬盧布；

三，和一九二九年來比較，增加了國家的與合作社的貿易額，一共增加了一五八、〇〇〇個鋪店；

四，集體農場貿易繼續增加，個別的國家和合作社機關購買農產品的數量也繼續增加。

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流通，表示了完全不同的象徵。在那裏，危機使貿易蕭條，使貿易機關大批地關門，使中小商人貧窮化，使貿易中的商品發生擁擠，使工

人羣衆的購買力繼續減低。這就是四年完成五年計劃在商品流通發展方面的成績。

七 四年完成五年計劃在反對敵人階級殘餘鬥爭中的成功

執行關於工業農業貿易的五年計劃的結果，我們在一切國民經濟領域內，加強了社會主義的原則，把資本主義原素都趕出去了。

結果是：把垂死階級的最後殘餘、從他們最後的巢穴裏趕出去了。這就是指的工業家及其走狗，商人及其助手，以前的貴族，僧侶，富農，富農分子，以前的白軍軍官，警士，憲兵，各種狹義愛國主義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以及其他反蘇維埃份子。這些『得意時代已經過去的人』被趕出去了，散佈於蘇聯全境，混進了我們的企業中，工廠中，行政機關中，貿易機關中，建築企業中，交通機關中以及我們的合作農莊與蘇維埃農莊中。他們藏匿在這些地方，冒充工農，他們當中也有些混入共產黨內來了。

他們爲什麼這樣做呢？他們混進這些組織中來，自然帶有痛恨蘇維埃政權的感

情，自然非常痛恨新經濟與新文化的形式。不過這些紳士們，再沒有能力向蘇維埃作公開的進攻。他們與他們的階級，曾經做過這樣的進攻，但是被擊退了。他們現在所能做的，祇是挑撥離間和危害工人，集體農民，蘇維埃政府與共產黨。他們總是在暗中盡力活動。他們焚毀倉庫，損壞機關，組織怠工，破壞集體農場，與國家農場。他們當中有些大學教授甚至用牛瘟或惡性癩來毒殺集體農場與國家農場的牲畜。但是他們主要的活動是組織羣衆偷取和強劫盜用政府財產，合作社的財產與集體農場的財產。

在工廠內，鐵路上，貿易機關內，集體農莊企業內，他們實行搶劫盜竊，這是他們的主要活動方式。他們的階級本能告訴他們：蘇維埃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化了的財產，如果要動搖蘇維埃政權，必須這個基礎破壞。

他們於組織搶劫與盜竊，利用了集體農民即昨日的個別農民的私有財產的習慣與殘餘。馬克思主義者要知道個人的覺悟，落在現今物質景况發展的後面。集體農民現在不是個別的農民，而是集體者。但是他們的氣性仍然是舊的私有財產氣性。

從前剝削階級的殘餘分子，利用集體農民的私有財產的舊觀念，來組織搶劫與盜竊，以反對公共財產，以破壞蘇維埃制度的基礎即公共財產。

有許多同志認為這些現象不很重要。不了解這些分子的偷竊與強劫的意義。認為這些事實沒有什麼特別意義。這些同志是大錯了。我們的制度的基礎是公共財產，正如私有財產是資本主義的基礎一樣。在鞏固資本主義社會的行程中，宣佈了私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們現在也要宣佈社會化了的財產一樣地神聖不可侵犯，以便在生產與貿易的一切領域內來鞏固我們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對於搶劫與盜竊社會化了的財產的寬容是無異允許破壞蘇維埃制度，這制度基於社會化了的財產。因為這種原因，所以不久以前，蘇維埃政府頒佈保護社會化財產的法律。

這個法律是我們革命法典的基礎。嚴格的實施這個法律是每個共產主義者，每個工人與每個集體農民的第一責任。

因此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是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以便消滅垂死的資產階級的最後殘餘，以便消滅他們的掠奪行爲。有些同志把消滅階級的理論，把建立無階

級的社會與國家逐漸消滅的理論，解釋爲可以允許怠惰與調和，解釋爲可以是認停止階級鬥爭與削弱國家權力的反革命理論。自不待說，這些人和我們的黨沒有相同的地方。階級的消滅，不是由於階級鬥爭的停止而來的。相反的，只有加強階級鬥爭，才能消滅階級。國家的逐漸沒落，不是由於國家權力的削弱而來的，而是國家權力提高到最大限度的結果，要這樣提高，才能完全掃滅垂死的資產階級的殘餘，才能組織有效的防禦，來反抗資本主義的環境，這環境還沒消滅，短時期內也不會消滅。

五年計劃的結果，已經把敵對階級的最後殘餘，從生產中趕出去了。富農已經被打倒了，並且準備了最後消滅他。但是這還是不夠的。我們現在的任務，在於把從前統治階級剩下來的那些份子，從我們的一切機關中趕出去，使他完全不能作惡。

不錯的，從前剝削階級的這些殘餘份子，自然不能以破壞，搶劫，盜竊來根本改變蘇聯的現狀。他們恐怕是太弱了一點，不能夠有效地抵制蘇維埃的手段。不過

我們要留心，蘇維埃的壯大，會要加強垂死的資產階級的最後殘餘的反抗。正因為他們的垂死的末日快要到來，所以不惜使用種種武器來對付我們。他們不惜以種種罪名加於蘇維埃來挑動落後份子來反對我們。在這個基礎上，從前被打倒了的反革命的政黨，如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以及資產階級國粹派，都能夠復活而且恢復他們的活動，就是反革命派的反對派的殘餘，從托洛斯基派到右派，也能夠復活。那自然沒有甚麼可怕的地方，不過我們如果要極快地消滅這些份子，而且不想受重大的犧牲，也必定要考慮到一切。

所以，革命的機警，是目前布爾塞維克特別需要的性質。

根據前四年的結果與成績，就斷定蘇聯內部的一切都是順利的，這當然是錯誤的。我們的工作中，有了不少的錯誤與缺憾。可惜我現在不能說明這些錯誤與缺憾，因為我的報告短了一點，不允許我這樣做。但是這也不是主要的一點。主要點是：雖然有了無人否認的錯誤與缺憾，我們仍然得到了很大的勝利，引起了全世界工人的熱情，我們所得的勝利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要性。

使我們於種種困難中能夠得到這個歷史勝利的主要力量是什麼呢？最主要的是廣大工人與集體化農民的活動，自動犧牲，熱情與積極，他們和我們的工程師與工藝專家，在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隊運動中，發展了偉大的能力與熱情。自不待說，沒有這個原素，我們不但不會達到目的，恐怕很難前進一步。

第二，便是黨與蘇維埃政府領導的堅決，他們號召羣衆前進，並且克服了在途中途所遇着的一切困難。

最後，便是蘇維埃經濟制度特有的價值與優點，這制度的本身包含着偉大的能力來克服所遇着的一切困難。

這是蘇聯在偉大的鬥爭中得到歷史勝利的三個最重要的原素。

總的結論是：

一、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結果，駁倒了資產階級與社會民主黨政客的说法，說五年計劃是一個幻想，一個不可實現的迷夢。事實上，五年計劃已經完成了。

二、五年計劃的結果，掃滅了資產階級的舊的武斷宣傳，說工人階級只能破

壞，不能建設。五年計劃的結果，表示工人階級不僅能夠破壞舊的，而且能夠建設新的。

三、五年計劃的結果，粉碎了社會民主黨所說的單獨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五年計劃的結果，表示可以單獨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因為在蘇聯已經有了這樣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

四、五年計劃的結果，否認了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說的只有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最好的制度，而一切其餘的經濟制度都不能受經濟發展的困難所提出的試驗的說法。五年計劃的結果，表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破產了，他已經是過時了，他必須讓位於較高形式的制度，即社會主義蘇維埃制度，只有這個制度才不怕恐慌，才能克服資本主義所不能解決的困難。

五、最後，五年計劃的結果，表示共產黨只要完全知道所走的方向與不怕困難，那末，共產黨是無敵的。

（鼓掌如雷，歷時很久。出席的人全場起立向斯達林同志致敬）（完）

農業區黨的工作的任務

——一九三三年正月十一日斯達林同志在聯共中央執監聯席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

我相信發言的同志們已經很正確的摘要敘述了在農業區域中黨的工作情形，黨的工作中的缺點與成績，特別是缺點。不過我以為他們還沒有說及關於農業區域中黨的工作的缺點的最重要點。同時這一方面，對於我們有極大的興趣。因此請你們允許我提出我對於農業區域中黨工作缺點的意見，以布爾塞維克特有的完全坦白性，來說我們的意見。

一九三二年我們在農業區域工作的主要缺點是什麼呢？主要的缺點是一九三二年我們在收集穀物的工作所遭遇的困難比一九三一年所遇的困難更大。

我們不能說這種現象，是由於穀物的收成不好，因為今年的收成并不比去年更

壞，而是比去年好。沒有人能否認一九三二年市場五穀的收成比一九三一年更大，在一九三一年蘇聯境內五個重要地方的旱災大大的減少了國家的穀物平衡。自然在一九三二年因古班，德力克及一些烏克蘭區域氣候不良，使我們的穀物收成中受了相當的損失。但是這些損失還不到一九三一年因旱災而受損失的一半。因此在一九三二年在農村中的穀物比一九三一年多。雖然是如此，一九三二年穀物收集的工作所遇的困難比一九三一年所遇的困難更大。

這是什麼理由呢？我們工作缺點的來源是什麼呢？如何解釋這個變態呢？主要的解釋是因為我們實際工作的同志與在農業區的工人不能了解在農村中因實行穀物集體農場貿易而產生的新形勢。正是因為他們不能顧慮到這種新形勢，所以他們不能根據新形勢而來適應新的狀態，沒有五穀集體農場貿易，穀物沒有兩種價格（政府規定的價格與市場價格）那麼農村中的狀況是不會改變的。因為宣佈穀物集體農場貿易，農村中的狀況一定有一個澈底的改變，因為宣佈穀物集體農場貿易，就是說法律上承認穀物市場價格，這種市場價格是比政府所規定的價格高。在這兒我們

無須指出這種情形將使農民們畏縮不肯把穀物儘量地供給政府，農民們對於這事的見解是這樣：『現在宣佈了穀物集體農場貿易，法律上承認了市場價格。同量的穀物我可以在市場上獲得比較把穀物交給政府所得的價格更大。因此，假使我不是愚蠢。我必須保留穀物，少交一點給政府，多留一點給集體農場貿易，因此同量的穀物，我可以賣更多的錢。』農民們的這種見解，自然是很簡單，很合理的。問題在於許多農業區內工作人不了解這種最簡單明瞭的事體。爲要不妨害政府的任務，共產黨員在新的條件之上，早就應該在一九三二年七月收穫開始的時候，用一切力量增加與促進穀物收集工作。

環境所需要的就是在此。但是他們實際上怎樣做了呢？他們不去促進穀物收集，反而去建設各種基金，因此使穀物交付者在盡他們對政府責任中收藏更多的穀物。因爲沒有了解這些新的環境，他們不認識農民們不肯交出穀物會妨害穀物收集，他們反而恐怕農民不會把穀物收藏起來，以後送到市場上去，實行集體農場貿易，或者農民們甚至於把他們所有的穀物完全交到倉庫。換言之，在農村中的共產

主義者，至少他們的大多數是如此，他們僅僅了解集體農場貿易的正面，但是他們誤解了並且不完全了解集體農場貿易的反面。他們不了解，假使不在開始收穫的時候用一切力量來促進穀物收集運動，那麼集體農場貿易的反面能給政府以極大的損害。犯這種錯誤的人不僅是集體農場上的工作人員。蘇維埃農場的經理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這些經理們非法的把應當交付給政府的穀物收藏起來，經過其他的路線，把這些穀物用較高的價格出賣。

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在關於發展集體農場貿易的決議中曾經考慮到因實行集體農場貿易而產生出新的環境嗎？是的，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曾經考慮到這些新的狀況。在這個決議案中曾經直接了當的提出，只有在穀物收集計劃完全實現後，只有在穀種收集後才能實施穀物集體農場貿易。這個決議案很明白的說，只有在穀物收集與穀種收集完成後（大概一九三三年正月十五日），只有在完成這些條件後，才能開始穀物集體農場貿易。

在這個決議案中，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執行委員會似乎對農業區中的工作人員說：

「不要因為顧慮各種基金和資本而分散你們的注意力，不要忽視主要的任務，在收穫開始的時候，就進行穀物收集運動，用力推進這種運動，因為第一個指示是完成穀物收集計劃，第二個指示是收集基金與穀種，只有實行這兩個條件後，你們才能開始和發展你們的穀物集體農場貿易。」

中央政治局與人民委員會的錯誤是在他們沒有儘力指出問題的這一方面，沒有大聲疾呼地警告農區的工作人員注意集體農場貿易所含有的危險。但是他們曾經警告注意這些危險，而且是很明白的警告，這是沒有疑義的。我們必須承認中央委員會人民委員會有點過分估量在實際工作中的工作人員和一些區域的工作人員的列寧主義者的頑強性和先見之明。

或是我們不當實行集體農場貿易？或者這是一個錯誤，特別是因為集體農場貿易不僅有正面而且有反面。否，這不是一個錯誤。沒有一個革命計劃能保證不會有反的方面，假使這個革命計劃不能正確的執行。這種說法在穀物集體農場貿易中也是對的。對於鄉村與城市，對於工人階級與農民，集體農場貿易是必要的而且有利

益的。正因為是它是有利益，所以我們必須採用。

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是根據什麼理想來決定實行穀物集體農場貿易呢？最重要的是擴張城市與鄉村間物品流通的基礎，改良以農產品供給工人，以城市製造品供給農民。毫無疑義的，為要達到這個目的，政府與合作社的貿易是不夠的。必須用新的辦法來補充這些物品流通機關，這個新辦法就是集體農場貿易。我們用集體農場貿易來補充他們。其次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執行委員會想以集體農場貿易的幫助，補助集體農場上的農民的收入，加強他們的經濟狀況。最後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執行委員會以為實行集體農場貿易可以推進農民在集體農場上的工作，在播種方面與收穫方面。一切由集體農場農民生活中所得的事實完全證實了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的這些意見。加強了鞏固集體農場的過程，消滅了農民退出集體農場的現象，更多的個別農民加入集體農場，使集體農場的會員在接受新會員時加以仔細的選擇。這一切和其他相似的事件毫無疑義地證明了集體農場貿易不僅沒有削弱集體農場的地位，反而加強了和鞏固了集體農場的地位。因此我們在農業區工作的缺點

不能歸咎於集體農場貿易。這些缺點是由於沒有正確地執行指示，我們的工作人員不能估計到新的環境，我們的隊伍不能適應因實行集體農場貿易而產生的新環境。

第二個原因是在實際工作中的同志們——不僅是這些同志們——不了解由於鞏固集體農場在我們產穀物區域中的統治地位；我們在農村中工作條件的改變。我們大家都很高興集體農場貿易形式變成了我們穀物地方中的統治形式。然而有些人還不了解：這種新的環境，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我們在農業發展方面的留意和責任。許多人以為只要我們在這個或那個地方完成集體化的百分之七十或八十，那麼一切必須的事都做了，我們可以讓這事體自己去發展。他們以為集體化單獨進行這一工作，單獨可以促進農業。但是同志們，這是一個很深刻的錯誤。事實上，集體形式變為主要的經濟形式，不僅不減少反而增加了我們在農業方面的留意，不僅不減少反而增加了共產主義者在促進農業中的領導作用。

讓事情聽其自然的發展，這種見解在現在比以前更有害於農業之發展，這種辦法現在可以摧毀整個的工作。只要個別農民在農村中佔優勢，那麼黨能把他的干涉

發展農業的行動限制於個別的救濟行動，用勸告或防止的辦法。在那個時候，個人農民必須自己照料他的農場，因為他不能把他自己所有的農場的責任推到別人的身上去，除開他自己以外，他不能依靠任何人。在那個時候，個人農民不得不自己去注意播種，收割及農業一般的過程，假使他自己不願意餓飯，受飢荒。

在改變為集體農場後，這種狀況完全變更了。集體農場不是一個個人農民農場。現在集體農場的農民說：「集體農場是我的，同時也不是我的。他是我的，同時也是張三，李四，以及其他集體農場會員的。集體農場是公共財產。」

現在的集體農民就是以前的個人農民。現在的集體農民可以躲避責任，可以依賴集體農場之其他會員，因為他知道集體農場絕不會使他餓飯的。因此現在的集體農民不如以前的個人農民那樣地留心，因為現在是由全集體農場的農民來負擔一切事務和責任。

從這樣還發生什麼呢？

結果是進行集體農場的主要責任由個人農民轉到集體農場的管理部，轉到集體

農場的指導部。現在農民不是要求他們自己來處理集體農場的事務，建立合理的管理部，而是要求集體農場的經理來處理集體農場的事務與管理一切。更正確一點說，集體農場的責任，不是由他們自己而是由集體農場的經理來負擔。

這是什麼意義呢？

這就是說黨在農業發展的過程中，再不能只限於個別的干涉行爲，現在黨必須把集體農場的領導權拿到自己的手中，負擔起集體農民工作的責任，幫助集體農民在科學的與技術的基礎上，發展他們的農場。

但是問題不僅如此而已。集體農場是一個大事業。沒有計劃是不能進行大事業的。只有在有計劃經營的基礎上才能進行這個包括成百成千農場的大農業事業。沒有這個，集體農場是一定要失敗的。

在這兒發現了集體農場制度的另一條件，這個條件與管理個別農民農場的條件完全不同。

我們能把這個大事業的管理聽其自然嗎？讓他自動地變化嗎？

很顯然的我們不能這樣做。爲要經營這樣的大事業，我們必須供給集體農場以一定限度的有基本教育的人，這些人耍能執行這個事業的計劃，以有組織的方法來管理這個事業。這是很明顯的，假使在發展集體農場運動中沒有政府的有計劃的干涉和幫助，那麼，經營這種事業是不可能的。

隨着這點發生了什麼呢？

集體農場制度并不會減少，恰反而增加了黨與政府對於發展農業的留意和責任，假使黨要想指導集體農場運動，那麼黨必須注意到集體農場生活與集體農場管理等等。黨不僅不應當減少，而應當增加黨與集體農場的聯繫，黨應當知道在集體農場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這樣才能及時幫助集體農場，保護集體農場不受壓迫的危害。

我們實際中所看見的是怎樣呢？

我們看見許多區域與地方組織完全不知道集體農場的生活與要求。許多人坐在自己的公事房裏，用他們的筆很自滿地塗鴉而不注意到集體農場的發展，在個別的

情形中，因為脫離了集體農場，有些省黨部的委員們所得關於他們省內集體農場的消息，不是從該省內的各地方黨部而是從莫斯科的中央。同志們，這種現象是很令人痛心的，但是這是一種事實。由個人農場轉到集體農場應當幫助鞏固共產黨在農村中的領導。然而實際上在有些地方共產黨員躺在桂冠上安眠，以集體化高大的百分的數字自豪，而讓事情自然的發展。

有計劃的管理集體農場的問題應當是促進鞏固共產黨在集體農場上的領導。但是實際上有些地方共產黨員放棄了他們的責任，讓舊日的白軍軍官，及工農的敵人在集體農場上實行大破壞工作。

我們在農業區工作的缺點，第二個原因大概是如此。

我們在農業區工作的缺點，第三個原因是許多我們的同志過份估量集體農場，以集體農場為一種新經濟形式，把集體農場變成了一種神像。他們以為只要集體農場存在成爲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那末正確地管理集體農場，正確地計劃集體農場制度，以及轉變集體農場為模範的社會主義農場等等事都可迎刃而解。他們不了解

在組織構造上集體農場仍然是很微弱，需要黨極大的幫助，要黨供給有經驗的布爾塞維克幹部與日常的集體農場經理。

不僅如此，這并不是最重要的。主要的缺點是許多同志在農業新組織形式方面過分估量了集體農場的力量與可能。這些同志不知道雖然集體農場代表一種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但是集體農場本身還不能避免各種危險，還不能免除各種反動份子侵入集體農場的領導機關，現在還沒有保證在某種條件之下集體農場不致被反對蘇維埃的份子利用作他們的私圖。集體農場是經濟組織的社會主義形式，恰如蘇維埃是政治組織的社會主義形式。集體農場與蘇維埃是我們革命的最大的成績。是工人階級最大的成績。但是集體農場與蘇維埃祇不過建立了組織的形式，是的，是社會主義的，然而他們不過僅是組織形式而已。一切要看用什麼去充實這個形式的內容。

我們知道在有些地方工農代表的蘇維埃在某一時期曾經擁護過反革命反對革命。如一九一七年七月在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派領導下的蘇維埃贊助反革命反對革命。一九一八年末德國的工人兵士會議在社會民主黨領導之下，幫助反革命反對革

命。因此這不僅是蘇維埃組織形式的問題，雖然這種形式的本身是最大的革命成績。最主要的是蘇維埃工作的實際內容，和性質，到底實際上是誰領導蘇維埃——革命黨人嗎？抑或是反革命黨人？因為這種理由所以反革命派並不時時公開反對蘇維埃，例如在克倫斯特暴動時，俄國反革命首領米爾糾可夫宣言他贊成蘇維埃，不過這種蘇維埃是不允許共產黨參加的。俄國反革命首領米爾糾可夫的口號就是「建立沒有共產黨參加的蘇維埃」。反動派很知道這不是蘇維埃本身的問題，問題是在誰領導蘇維埃。

集體農場問題也是如此。在真正的革命者，布爾塞維克，共產主義者領導之下，集體農場是組織農業的社會主義形式，能在經濟建設中產生出驚人的奇跡。但是假使集體農場在社會革命派，孟塞維克，白軍軍官，及以前但尼金，哥爾恰克等擁護者操縱之下，那麼集體農場在某一時期的不過是一切反動交易的托辭而已。

這兒我們要牢記住集體農場這種組織形式現在沒有不僅能避免反蘇維埃份子的侵入，而且有時反而會被反革命派利用。在以農民各人經營自己的農場：他們是分

散的，彼此隔離的，因此反蘇維埃份子在農民中的反革命活動不能有很多的成績。在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後，這種狀況完全不同了。集體農場就是農民現成的羣衆組織形式。因此，反蘇維埃份子侵入集體農場和他們的反蘇維埃活動能有更大的成績。

我們必須認識反蘇維埃份子已經看到了這一點。這是人所共知的，例如北高加索的一部分反動派努力建立集體農場性的組織來掩蓋他們的非法組織。

這也是人們知道的，一些還沒有被人揭破和撲滅的反蘇維埃份子，他們自願的加入集體農場，甚至至於頌揚集體農場，企圖在集體農場內建立他們反動工作的巢穴。同樣，一部分反蘇維埃份子現在宣言贊成集體農場，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在集體農場中，不能有共產黨員。「建立不要共產黨員參加的集體農場」，這就是現在在反蘇維埃份子中所傳播的口號。因此，這不單是集體農場本身是社會主義組織的形式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這個形式內容。即是到底是誰在領導與管理集體農場。

站在列寧主義的觀點，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在組織形式方面：是武器，并且僅是武器。在某種條件之下，這種武器可以被用來反對革命。我們可以用這種武

器來對付反動派。這種武器可以供工人階級與農民使用。在某種條件之下，這種武器也可供工人階級與農民的敵人使用。這一切完全要看誰掌握着這種武器去反對誰。

受他們的階級本性的指導，這些工人與農民的敵人現在開始了解這一點。不幸得很，我們許多共產黨員還不了解這一點。正因為有些共產黨員不了解這種簡單的事體，所以一些掩飾很好的反蘇維埃份子中管理一些集體農場組織怠工破壞行動。

我們在農區工作缺點的第四個原因是：許多同志不能在實際中把鬥爭的戰線用來反對富農，同志們不了解近來階級敵人的面孔已經改變了，不了解階級敵人在農區中的策略也改變了，因此同志們不知道改變我們的策略以求獲得勝利。敵人了解這種已經改變了的形勢，他認識了新制度在農村中的力量和威權，因此他改變他自己，改變他的策略，從公開反對蘇維埃農場改變為暗中的破壞活動。但是我們沒有了解這點，我們還沒有認識這種新的形勢，仍然是繼續如以前一樣去找敵人，結果在以前的地方找不到敵人。我們繼續採用簡單反對富農的策略，這種策略很久就不適用了。

我們在集體農場外去找敵人，以為敵人一定是有兇惡的面孔，大的牙齒，粗大的頸，手中拿着來福槍。我們根據標語上面的人去找富農。然而在表面上，這些富農很久就絕跡了。現在農村中的富農，富農走狗，反蘇維埃份子等等大部份是『冷靜』，『可愛』，甚至『神聖的』人。要找這些人，我們不必離開集體農場。他們就是在集體農場上，當倉庫管理員，經理，記帳，書記等。他們絕不說『打倒集體農場』。他是『贊成』集體農場的。但是他們在集體農場上進行怠工和破壞工作，這種損害是集體農場的農民無論如何不能恢復的。他們絕不說『打倒繳納穀物』，他們是『贊成』繳納穀物的。他們只是實行欺騙，要求集體農莊籌集三倍於實際需要的金錢來養牲畜，要求集體農場建立三倍於必需的保險金，要求集體農場給每一個工人六至十磅穀物為公共飯食等等，這當然是很容易了解的，要花這樣多錢的『基金』公共食用，集體農場的經濟力當然是受危害人，繳納穀物一無所存。

要看破這樣好巧的敵人，不受他們的欺騙，我們必須充滿革命的機警，我們必須能揭破敵人的假面具，在集體農場會員的面前，暴露敵人反革命的眞面目。在

農業區的許多共產黨員具有這種能力嗎？有時共產黨員不揭破這樣的階級敵人，反而受敵人的欺騙，跟在敵人後面走。

許多同志不認識帶上新的面具的階級敵人，不能揭破敵人的欺騙詐術，這些同志自己安慰自己以為再沒有富農了，在執行消滅富農階級政策的結果已經撲滅了農業區中的反蘇維埃份子，因此我們可以允許『中立』集體農場的存在，這種中立集體農場既不是布爾塞維克，也不反對蘇維埃，他們自己必定自動地轉走蘇維埃政權這方面來。

但是，同志們！這是一個大的錯誤。固然富農是被打敗了，但我們還沒有能使富農不能再作惡。假使我們共產主義者遲疑不決，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希望富農自然的發展能放棄不作惡，那麼我們更不能很速的完全擊敗富農。這兒沒有『中立』的集體農場的存在，也不能存在。『中立』的集體農場是瞎人們的夢想。目前在蘇維埃農村中正進行着猛烈的階級鬥爭，這兒沒有『中立』集體農場存在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面，這集體農場或者是布爾塞維克的集體農場，或者是反蘇維埃的集體

農場，假使我們不能領導這一種或其他種的農場，這就是說這些農場是被反蘇維埃的份子領導，這點是毫不容人懷疑的。

末了，我們農業區工作缺點的另一原因，是在輕視了共產主義者在建立集體農場中與穀物收集中的作用和責任。共產黨員一說到穀物收集的困難時，總是把這種責任推到農民的身上，以爲一切都是農民的過失。這是十分錯誤的，並且是絕對不公道的。農民與這種事體沒有關係。至於責任與過失問題，這種責任完全是在共產黨員的身上，一切都是我們共產黨員的過失。

在世界上，無論在現在與過去都沒有像蘇維埃政權這樣有威權的政權。沒有像共產黨這樣有權力的強大的黨。

沒有人擾亂我們，也沒有人能擾亂我們根據集體農場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的需要進行集體農場工作。假使我們不時勝利地依據列寧主義的需要進行集體農場工作，假使我們甚至犯了一些嚴重不可原諒的錯誤（例如在穀物收集工作中），那麼這完全是我們自己來負責的。

沒有認識穀物集體農場貿易反的方面，並且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這些都是我們要負責的。許多黨部脫離了集體農場，睡在桂冠上做夢，聽事情自然發展，這些都是我們的過失。許多同志過分估量了集體農場是羣衆組織的形式，他們不了解問題不是在形式的本身而是在我們能抓住集體農場的領導，把一切反蘇維埃份子從集體農場的領導機關中驅逐出去，這種事實是我們要負責的。他們不認識新的形勢，不明白階級敵人的新策略，這些階級敵人現在在暗中活動，這也是我們要負責的。

這兒發生了一個問題：在這兒農民怎麼辦呢？我知道許多集體農場現在在發展能很迅速地盡他們對政府的義務，在經濟上一天比一天強大。在另一方面，我知道有些農場雖然他們的收成與上述的農場一樣而且有同樣的客觀條件，但是這些農場正在沒落與崩潰。原因在什麼地方呢？原因是第一種農場是在真正共產黨員領導之下，第二種集體農場則爲懦夫們所領導。雖然他們袋裏有黨證，他們終究是懦夫。

目前的問題是：農民與這事有什麼關係呢？這是由於輕視了共產黨員的作用和責任，因此本應當找農業區工作缺點的原因，而我們沒有去找，因此不能克服這些

缺點。

穀物收集困難的原因并不是在農民中去找，而是應當在我們自己隊伍中來找。因為現在是我們掌握政權，我們有政府的一切手段可以聽我們指揮利用。領導集體農場是我們的任務，我們必須擔負農業區工作的完全責任。

這些就是我們在農業區段作缺點的原因。

或者有人以為我所講的未免令人悲觀喪氣，對於我們農業區整個工作是不過含有一些缺點而已。自然，這不是真的。實際上，除開這些錯誤外，我們在農村工作中得了許多嚴重的，極重要的成績。在我演講開始的時候我就說過我的任務不在指出這些成績，而是指出缺點。

我們能克服這些缺點嗎？是的，這是沒有疑問的。我們在最近的將來克服這些缺點嗎？這是無疑問的。

我相信機器站，曳引機站，及蘇維埃農場上的政治部是幫助我們在最短時期內克服這些缺點的最重要的手段。（大大的鼓掌歷時很久）

應當使集體農民變成小康者

——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場突擊隊員大會上的演說——

集體農民同志們！我本來不想在你們的大會說話。我不想說話，因為發言的人們已經把一切的說完了，而且說得很好，很扼要。我還有發言的必要嗎？不過你們既然堅決要求，而且權力是在你們的手中（鼓掌很久），我不得不服從。讓我在一些特殊問題上發表一點意見。

一 集體農場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我要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集體農民所採取的道路是否是正確的道路，集體農場的道路是否是正確的？

這并不是一個無聊的問題。你們是集體農場突擊隊員，自然你們不懷疑集體農

場是正確的道路。因此你們會認為這個問題是多餘的。不過在全體農民中還有一些農民，他們的思想不與你們一樣。在農民中，甚至在集體農民中，還有許多人懷疑集體農場路線的正確性。這當然是不足奇怪的。因為人們在舊式的方式中生活了很久的年代，走老的道路，在富農、地主、高利貸者與投機者的面前屈服。自然我們不能說農民贊成舊式的資本主義道路。不過舊道路是一條已經走慣的道路，而且還沒有人證明出一個新的更好的生活方法。這種情形特別是如此：因為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人們還是依着舊的方式生活着。現在布爾塞維克像暴風暴雨一樣，忽然衝破這個舊的停滯的生活，高呼現在要捨棄舊的道路，實行一個新的生活，一個集體農場的生活。現在要開始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人們不同的生活，是新的集體生活。但這是一種什麼新的生活呢？誰能答覆？這種生活不比舊生活更壞嗎？無論如何，這是一條新道路，一條不平常的道路，一條沒有人走過，沒有人探險過的道路。繼續走舊道路不較好嗎？再等一等看才去走集體農場的道路不更好嗎？冒險碰運靠得住嗎？

目前就有一部份勞苦農民受這些懷疑迷困。

我們應當消釋這些疑惑嗎？我們應當把這些疑惑拿來公開的研究，看看這些疑惑有多少價值？自然我們應當這樣做。

因此，上面所提出的問題，不能認為是一個無聊的問題。

讓我們看一看集體農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確。

有些同志相信：過渡到新的道路，集體農場的道路，是在三年以前開始的。這種說法，只有一部份是真實的。自然廣泛的組織集體農場是三年以前開始的。你們是知道的，過渡時間是摧毀富農，造成千百萬小農中農贊成集體農場的運動。這完全是真實的。不過要進行大規模的過渡到集體農場，必須要有某些先決條件。沒有這些先決條件，羣衆集體農場運動一般的說來是萬難想像到的。首先要有一個蘇維埃政府，這個政府已經幫助而且還繼續幫助農民走上集體農場的道路；第二，要驅逐地主與資本家，沒收他們的工廠和土地，把這些工廠和土地宣佈爲人民的財產；第三，要壓制富農，剝奪他們的機器和曳引機；第四，要宣佈只有團結在集體農場

中的貧農與中農可以用機器和曳引機。末後，要實行國家工業化，建立一個新的曳引機製造工業，建新工廠，製造農業機器，供給集體農民大批的曳引機和機器。沒有這些先決條件，我們不能想到在三年以前開始大規模的過渡到集體農場的道路。

因此，要走上集體農場的道路，首先必須完成十月革命，推翻資本家與地主，沒收他們的工廠和土地，建立新的工業。

過渡到新的集體化的道路，是從十月革命時開始的。不過在三年前，這種運動以新的力量向前進，因為只有在那時十月革命的經濟影響才完全發揮，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能順利的推進國家的工業化。

在世界史上，已經看過了許多次的革命。這些革命與十月革命不同之點在於：這些革命完全是一方面的革命，用另外一種剝削形式，來代替原來的對勞動者的剝削形式，但是剝削的本身繼續存在。某一階級剝削者和壓迫者被另外一階級剝削者和壓迫者代替了，但是剝削者和壓迫者仍然存在。十月革命的目標是毀滅一切剝削，剷除一切剝削者和壓迫者。

奴隸革命廢除了奴隸所有者，消滅了奴隸制度作為對勞動者的一種剝削方式。然而封建制度和封建制度對勞動者的剝削代替了奴隸制度。用另外一羣剝削者代替原來的一羣剝削者。在奴隸制度下，『法律』允許奴隸主人殺死他們的奴隸。在農民主制度下『法律』『僅僅』允許地主出賣他們的農奴。農奴革命打倒了地主，廢除了農場剝削制度，但是他却產生了資本家和地主，產生了資本家和地主對勞動者的剝削形式。一種剝削者代替了另外一種剝削者。在農場制度下，『法律』允許地主出賣他們的農場。在資本主義下，『法律』『僅僅』允許勞動者注定要受失業和窮困的痛苦，餓死。

祇有我們的蘇維埃革命，只有我們的十月革命提出不以剝削者代替剝削者，不以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而是來消滅一切剝削，剷除一切剝削者，一切擁有財富的人，壓迫者，不管他們是新的或是舊的。（鼓掌很久）

這就是為什麼十月革命是領導農民走上集體農場道路的一個先決條件，一個必須的先決條件。

農民擁護十月革命是正當的行動嗎？是的。他們這種行動是正當的。他們的行動很正當，因為十月革命幫助他們從地主、資本家、高利貸者、富農、商人、投機者的壓迫中解放出來。

不過這僅僅是這問題的一方面。驅逐壓迫者，驅逐地主與資本家，鎮壓富農與投機者，這都是很好的。然而這是不夠的，要完全脫離舊的道路，僅僅摧毀剝削者是不夠的。要實行這種工作，也必須建立一個新的生命，建立一種生命使勞苦的農民能有機會改良他們的物質和文化地位，每天每年向前邁進。爲要實行這種工作，必須在鄉村中建立一種新的制度，集體農場制度。這是這個問題的第二方面。

舊制度與新的集體農場制度有什麼不同呢？

在舊制度之下，農民單獨的工作，用舊方法舊工具工作，他們爲地主，資本家，富農，和投機者而工作，他們工作反而越壞了，而使別人發財。在新的集體農場制度下，農民在集體農場上共同工作，用新的設備，曳引機，農業機器等。他們爲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集體農場而工作，沒有富農和投機者，他們工作爲要每天增進

他們的物質和文化地位。在舊制度下，有一個幫助有錢人壓迫勞苦農民的資產階級政府。在新的集體農場制度下，工農政府幫助工人和農民反對有錢的人。舊制度走向資本主義而新制度走向社會主義。

在你們面前擺着兩條路：資本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是前進到社會主義；一條是後退到資本主義。

有人相信可以找出其他的第三條道路。有些動搖的同志不能完全相信集體農場道路的正確性，而急想找出某種未知的第三條路。他們希望我們能回到舊的道路，回到個人農業，但是不要有資本家和地主，他們希望我們能『僅僅』允許富農和其他一些小資本家是我們經濟制度的一個合法部分。但是在實際生活中，這不是第三條路，而是到資本主義的第二條路。回到個人農場與恢復富農是什麼意義呢？就是說恢復富農剝削制度，恢復富農對農民的剝削：把政權送給富農。我們能恢復富農，同時維持蘇維埃政府嗎？否，我們不能。恢復富農建立富農政府，取消蘇維埃政府，這就是說，將走到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政府，必然要走到恢復地主與資本家、

恢復資本主義。所說的第三條路實際上是回到資本主義的第二條路。問一問農民，他們是否願意恢復富農剝削制度，回到資本主義，取消蘇維埃政府，恢復地主資本家的政府。試問一問任何農民，你就可以曉得那一條道路是大多數勞苦農民所認為唯一正確的道路。

因此這兒有兩條道路：或者是向前，向上走到新的集體農場制度；或者是向後，向下走到舊的富農資本主義制度。除此以外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勞苦農民很正確的捨棄資本主義道路，採取發展集體農村的道路。

有人說集體農村的道路是正確的道路，但是這條路是很艱難的。這種說法只有一部份的真理。自然我們要遇到困難。生命中的好事不會容易到來。但是主要的困難已經被我們克服了，存在你們前面的困難值不得嚴重的說明。無論如何，假使與十年或十五年以前工人們所受的困難相比較，那麼，集體農場同志們，你們現時的困難不過是兒戲而已。你們的發言人已經在這兒稱讚列寧格拉、莫斯科、卡哥夫與頓巴斯的工人。他們說工人們有了很大的成績，而你們集體農民的成績很少。在

我們看起來你們發言人所說的說話有一種同志的羨慕的意義。他們似乎特別注重：『假使我們集體農場農民們能有列寧格勒、莫斯科、卡哥夫與頓巴時工人相似的成績，那真是多麼好呀！』這是很好的。不過你們知道列寧格勒與莫斯科的工人爲了這些成績付了多少代價？爲了要完成這些成績他們經過了什麼艱難困苦？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九一八年工人生活的一些事實。那時工人們幾個星期看不見一塊麵包，更談不上肉類和其他生活品。那時能每天發給列寧格勒與莫斯科工人八分之一磅的黑麵包一半是混和油糕，已經算是好的日子了。而這種情況繼續不只是一個月或半年，而是經過了整整的兩年。但是工人們忍受着而不喪氣，因爲他們知道好日子一定會來的，他們將獲得決定的勝利。現在你們可以看到工人們是沒有錯的。試把你們的困難和痛苦與工人所受的痛苦和艱難相比，你們就可以知道你們的困難是不值得嚴重的說及。

要領導集體農場前進，要發展集體農業他應當所發展的，有什麼東西是必須的呢？

第一，集體農場應當有永久的耕地。你們有了嗎？是的。你們有了，你們知道所有最好的土地都已經交給集體農場并且永久分給集體農場。因此集體農場可以由地耕種和改良土地，無須乎顧慮到這塊土地會落到別人的手中去。

第二，集體農民必須要能用曳引機和機器。你們有了嗎？是的，你們有了。你們都知道我們的曳引機廠與農業機器工廠主要的是爲集體農場工作，以一切近代的設備供給集體農場。

末後，政府必須以人力財力完全幫助集體農民，不能允許敵對階級的子孫搗亂集體農場。你們有這樣的一個政府嗎？是的，你們有。這個政府叫工農蘇維埃政府。你們能指出另外一個國家，他的政府不是幫助資本家、地主、富農、有錢人而是幫助勞苦的農民嗎？在世界上現在沒有也不曾有這樣的另一個國家。只有在這蘇維埃國家內，政府是幫助工人、集體農民，幫助城市和鄉村的勞動者，反對一切剝削者與富有者。（鼓掌很久）

因此，你們已經具備了一切對於發展集體農場，從舊的壓迫解放出來所必需的

東西。

對於你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你們誠實地工作，根據你們的工作分配你們的集體農場的進款。你們保護集體農場的財產，保護曳引機與機器，注意照料你們的馬，盡你們對於工農政府的責任，鞏固集體農場，驅逐一切鑽進集體農場的富農和他們的走狗。

我想你們一定會同意我的意見：克服這些困難，即是誠實的工作和保護集體農場的財產，這并不是難事。特別是因為現在你們不是為富人和剝削者而工作，而是為你們自己的集體農場而工作。

你們可以看得出，集體農場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是勞苦農民唯一正確的道路。

二 我們的當前任務是使一切集體農民成爲小康者

第二個問題是：在新的道路上，在我們的集體農場的道路上我們得了什麼成

績？我們希望在今後兩三年間做到什麼成績？

社會主義是一件好的東西。一個快活的社會主義生活，固然是一件很好的事。

不過這一切都是將來的事。現在主要的問題不是我們將來會獲得什麼。主要的問題是現在我們已經獲得了什麼。農民已經走上了集體農場的道路，這是很好的。在跟着集體農場道路向前邁進，我們得了一些什麼具體的成績呢？

我們已經完成了這樣：我們幫助了千百萬的貧農加入集體農場；因為參加集體農場，使用更好的土地和生產工具，千百萬的貧農已經提高到中農的水平線；在過去挨餓的千百萬貧農現在得了安全保障；我們消滅了把農民劃分為貧農與富農的區別，剷除了富農，幫助貧農在集體農場中成為他們自己勞動的主人，使他們變為中農。

在四年以前，在未發展集體農場以前的情況是怎樣呢？富農發了財，并且一天比一天向前增高。貧農失敗而窮困化，變成富農的奴隸。中農拼命想趕上富農，但是他們常常失敗，跌到貧農隊伍中，使富農喜氣洋洋。因此我們不難猜想到只有富

農和一些小康者在這種競爭中佔了勝利。在鄉村中每一百家中我們可以找到四五家富農，八或十家小康農民，四十五到五十家中農，三十五家貧農。因此在這些農家中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五是窮困，不得不要受富農奴隸制度的壓迫。我不想說及中農中較微弱的部份，他們佔中農半數以上，他們的地位與貧農相差很微，他們直接依靠富農。

由於發展集體農場，我們取消了混亂和不公道，剷除了富農奴隸制度，吸收了整個貧農羣衆參加集體農場，給了他們安全保障，提高他們到中農的水平線，有權使用集體農場的士地，享受集體農場的優待權，有權使用曳引機和農業機器。

這是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說因爲有了集體農場，我們已經把不少於二千萬的農民從窮困，滅亡，富農奴隸剝削中拯救出來，使他們變成生活有保障的人。

同志們，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這一成績是世界上沒有聽見過的，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曾經獲得這種成績。

在這兒就是集體農場建設與農民採取集體農場道路的具體成績。

但是這僅僅是我們的第一步，我們在集體農場建設的道路上第一個成績。

假使以為我們應當停留在第一步，停留在這個第一次的成績，那就錯誤了。

否，同志們，我們不能因獲得了這第一步的成績而就停留不向前進。爲要更向前邁進，鞏固集體農場，我們必須再進一步，我們必須取得另外一個成績。這第二步是什麼呢？第二步是提高集體農民（以前的貧農和以前的中農）到更高的地位。必須要使所有的集體農民成爲小康。是的，小康，同志們。（鼓掌很久）

因爲有了集體農場我們已經把貧農提高到中農的水平線。這是很好的。但是這是不夠的。現在我們必須要再向前一步，幫助所有的集體農民（以前的貧農和以前的中農）升高到小康的地位。我們是能完成這種工作的，我們要不顧一切來完成這種工作。（鼓掌很久）我們有一切的东西來達到我們的目的。現在我們還不能很好使用機器與曳引機，耕種田地也不令人滿意。我們現在只要改良使用機器和曳引機，改良耕種土地，就可以增加我們的生產兩三倍。這樣就足以使所有的集體農民成爲集體農田的小康勞動者。

在過去小康者的地位是怎樣呢？爲要成爲一個小康的農民，必須虐待鄰人，剝削鄰人，對於他們買賤賣貴，雇用農場勞動者，很利害的剝削這些勞動者，蓄存一些資本，在能立足後就爬到富農的地位。因此在個人農場時代小康的農民在貧農和中農中引起了懷疑和仇恨。現在已經改變了。現在的情形本身完全不同。要成爲一個小康的集體農民，并不需要虐待和剝削鄰人。同時現在也不容易剝削他人，因爲現在沒有土地和私有財產，沒有佃農，現在機器與曳引機歸國家所有，現在在集體農場中有錢的人不算時髦了。過去曾經有過這種時髦，不過現在已經永遠過時了。集體農民要成爲小康的農民，祇要在農場上誠實的工作，適當地使用曳引機、機器和牲畜，好好的耕種土地，小心地照料集體農場的財產。

有時候有人說：假使我們有了社會主義，爲什麼還要勞動呢？過去我們勞動，現在我們勞動，這不是要停止勞動的時候嗎？同志們，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這是無賴遊民的哲學而不是誠實勞動者的哲學。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勞動。恰恰相反，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勞動上面的。社會主義與勞動是不分離的。我們的偉大導師列寧

說過：『不做工的人不能有東西吃。』這是什麼意義呢，列寧的話目的是反對什麼人呢？他反對剝削，反對那些自己不勞動，而靠他人勞動以致富的人們。還反對其他什麼人呢？反對那些自己流浪不做事而靠他人生活的人們。社會主義所要求的不是遊惰度日，而是要求一切的人民應當誠實的勞動，不是爲他人，爲有錢的人和剝削者而勞動，而是爲自己爲社會勞動。假使我們能誠實的勞動，爲我們自己爲我們的集體農場而勞動，那麼我們在兩三年之內就能把所有的集體農民（以前的貧農與以前的中農）提高到小康者的地位，提高到一種享有豐富的生產品過一個十分文化生活的人們的地位。

這就是我們當前的任務。我們能完成這種任務，而且要不顧一切來完成這種任務。（鼓掌很久）

三 特別批評

現在讓我說幾句批評的話。

首先是關於在農村中我們的黨員。在你們中有黨員，不過有很多是非黨員。大會中非黨員多於黨員，這是很好的，因為我們正是要把非黨員吸收參加我們的工作。有些共產黨員用布爾塞維克的态度去對付非黨員的集體農民。不過有些誇耀自己的黨員資格，脫離了非黨員。這是很壞而有害的。布爾塞維克和共產黨的力量在於他們能知道如何團結千百萬的非黨員活動份子在黨的周圍。我們布爾塞維克假使不知道如何去爭取千百萬非黨員的工農對黨的信仰心，那麼我們不能獲得我們已經得了的勝利。這需要什麼呢？這需要黨員不應當脫離非黨員，黨員不應當把自己關在小房內，不應當誇耀自己的黨員資格，而應當傾聽非黨員的意見，這樣不僅可以教育非黨員，而且可以從非黨員學得教訓。

我們不應當忘記黨員不是從天空上掉下來的。我們要記住所有的黨員以前自己也曾經是個非黨員。今天是非黨員，明天也許就會加入黨。這有什麼值得誇耀呢？在我們老布爾塞維克中，有很多在黨內做了廿或卅年的工作。然而我們自己也會曾經是非黨員。假使二三十年以前，那時黨員看不起我們。不讓我們入黨，對於我們會

發生什麼呢？或者我們會與黨疏遠一些年頭。不過我們老布爾塞維克到底是有相當勢力的。（鼓掌很久）

因此有時看不起非黨員的黨員，青年的黨員，應當記住這一切，要記住：布爾塞維克之所以被人愛，不是由於盛氣凌人，而是由於謙遜。

現在說幾句關於集體農婦的話。同志們，集體農場中的婦女問題是一個大問題。我們知道你們有許多人輕視婦女，嘲笑他們。不過，同志們，這是一個錯誤，一個嚴重的錯誤。這不僅因為婦女佔人口中的一半。而主要的是集體農場運動已經提拔了一些特殊的能幹的婦女到領導的地位。你們考察這個大會的成份，你們就可知道婦女有了很大的進步。在集體農場中婦女是一個偉人的力量。看輕這種力量是一個罪過。我們的義務是推進在集體農場中的婦女，讓這種力量發揮。

確實的，在最近的過去，蘇維埃政府對於集體農婦在乳牛問題上有一些小的誤會。不過現在乳牛問題已經解決了，這些誤會也消除了。（鼓掌很久）我們進展很快，大多數的集體農民每一家人有一條乳牛。再過一二年，你們不能找出一個自己

沒有乳牛的集體農民。我們布爾塞維克正在努力設法使每一個集體農民有一條牛。

（鼓掌很久）

婦女自己應當記住集體農場對於婦女的力量和意義，要記住：只有在集體農場中婦女才有機會與男子平等。沒有集體農場，就是不平等；有集體農場，就有平等的權利。讓婦女同志牢記住這句話，保護集體農場如像她們的眼睛瞳子一樣。（鼓掌很久）

幾句關於集體農場中共產主義青年男子的話。同志們，青年是我們的將來，我們的希望。他們要代替我們老年人的地位。他們應當舉着我們的旗幟走到最後的勝利。農民中多數的老年人多半被舊的重累，舊生活的習慣和回憶所壓倒。自然他們不能與黨和蘇維埃政府整齊步伐。至於青年們就不同了。他們沒有舊的重累的壓迫，很容易接受列寧的遺訓。正是因為他們容易接受列寧的教訓，所以我們要他們負責，把那些落後的和動搖的人向前推動。對的，青年沒有足夠的智識，但是智識是可以求得的。今天沒有，明天就會有了。因此問題就是研究列寧主義。青年共產

黨員同志，研究布爾塞維克主義，你們就能推動那些動搖份子跟你們一齊向前進。少空談，多工作，你們的主義一定能勝利的。

再說一說個人農民。關於他們我們在這裏說得很少。這不是說他們已經不存在了。否，不是的。現在還有個人農民，而且我們不能不管他們，因為他們是我們將來的集體農民。我知道有一部分個人農民已經完全受傷，害了很深的投機病。或者就因為這種原因我們的集體農民不願意讓個人農民加入集體農場，有時甚至於完全不要他們加入。這自然是正確的，不能有異議。不過還有較大部分的個人農民，他們還沒有害了很深的投機病，他們用自己誠實的勞力以謀生，這種個人農民或者不反對參加集體農場。不過一方面他自己對於集體農場道路的正确性還有動搖，另一方面由目前集體農民對於個人農民的惡感，因此妨礙了他們加入集體農場。

自然我們要了解集體農民，考察他們的觀點。在這些年頭中，他們受了個人農民許多的傷害和嘲笑。不過在這兒傷害與嘲笑不是很重要的。一個領袖假使不能忘却傷害，而把個人的事情看得比集體農場的利益更高，這個領袖是不足道的。假使

你要成爲一個領袖，你應當知道如何忘記個人農民對你的傷害。兩年以前，我收到伏爾加河一個農民寡婦的一封信，在這封信內，她怒訴他們不要她加入集體農場，要我幫助她。我詢問集體農場，他們答覆說她曾經侮辱一個集體農場會議，所以他們不能允許她參加集體農場。困難在什麼地方呢？在一個農民會議上，集體農民邀請個人農民加入集體農場，這個寡婦在答覆邀請的時候，提起他的裙子的邊緣說：『這兒，加入你們的集體農場！』（大笑）無疑地，她的行動不當并且侮辱了大會。但是在一年後，他真心悔過承認自己的錯誤，你們還能拒絕他加入集體農場嗎？我想你們不能。因此我把我的意見寫信告訴這個集體農場。他們允許了她加入集體農場。結果怎樣呢？現在她在那兒工作不僅不落後，而且是在前線的隊伍中。

（鼓掌很久）

這是一個給你們的例子，說明真正的領袖必須要知道如何忘記侮辱，假使我們事業的利益需要的時候。

這種情形也適用於一般的個人農民，我不反對有區別的讓他們加入。我是反對

無區別的拒絕一切個人農民。這不是我們布爾塞維克的政策。集體農民不應當忘記在不久以前他們自己也是個人農民。

末了，我要簡單的說到柏忍齊克集體農民的那封信。這封信已經發表了，或者你們已經讀過了。這封信是很好的。這封信表現了我們的集體農民中有一些有經驗的有根底的集體農場組織者和煽動者，他們是我們國家的光榮。不過在這封信中有一點是錯了，而且這一點是我們不能同意的。這一點就是柏忍齊克的同志們以為他們在集體農場的勞動是微小，甚至於無意義，以為演說的勞動是偉大，是創造。我們能同意這點嗎？否，同志們：我們完全不能同意這種見解。或者，他們犯這種錯誤是由於謙遜。然而這錯誤終究是一個錯誤。把領袖們看作歷史的唯一創造者，而看不起工人和農民，這種時代是已經過去了。決定民衆和國家的命運的人不僅是領袖，而且主要的是千百萬勞苦羣衆。

工人和農民，不自吹自擂，建設工廠與作坊，礦業與鐵道，集體農場與國家農場，創造生活中一切好的東西，供給全世界的衣食，這些才是新生命的真正英雄與

創造者。很顯然的，柏忍齊克同志們忘記了這一點。過於看高自己的力量，誇大自己的功績，這是不好的；但是輕視自己的力量，不認識自己微小的努力是決定歷史命運的真正偉大的和創造的努力，這是更壞的。

我希望柏忍齊克的同志們能同意我對於他們這封信的小小的糾正。

同志們，我們就在這兒結束了吧。

（鼓掌很久，變為熱烈大喝采。全體起立向斯達林致敬。高聲歡呼，斯達林同志萬歲！領導的集體農民

萬歲！我們的領袖斯達林同志萬歲！）

斯大林與霍瓦爾德底談話

(霍瓦爾德是美國斯克里浦斯·霍瓦爾德報業聯合會主席)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霍瓦爾德：日本最近所發生的事變，你以為對於遠東情況將要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斯大林：現在還難說，關於這個問題材料太少，情形不十分清楚。

霍瓦爾德：倘若日本決意真要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那蘇聯將採取怎樣的態度呢？

斯大林：倘若日本決意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侵犯牠底獨立，那我們就要幫助蒙古人民共和國。關於這點，李特維諾夫的代理人斯托莫尼科夫不久以前已向駐莫斯科日領事聲明過了，並曾指出，自一九二一年以來，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友

誼關係，毫無改變。我們一九二一年曾經幫助過蒙古人民共和國，現在我們要給以同樣的幫助。

霍瓦爾德：這樣說來，日本侵佔庫倫的企圖，是否會引起蘇聯採取正面的行動呢？

斯大林：是的，會引起的。

霍瓦爾德：近幾天來，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邊疆一帶，日人是否有某些使蘇聯可以認為係侵犯的行動呢？

斯大林：日人似乎於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邊境繼續集中軍隊，可是，暫時還沒有看出有何種引起邊境衝突的新企圖。

霍瓦爾德：蘇聯顧慮德國同波蘭有反蘇聯的侵略計劃，並顧慮他們正在準備實行軍事合作來促進這一計劃底實現。但同時，波蘭則聲明他不願把自己的國境讓給任何外國軍隊作為反對第三國家戰事行動的根據地。蘇聯以為德國方面的進攻到底是有怎樣的呢？德國軍隊從那些陣地出發，向什麼方向行動呢？

斯大林：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國家當着牠要同其他國家戰爭的時候，即令不是同鄰國作戰，牠也要着手找尋可以達到牠所要進攻的國家邊境的疆域。而侵略國通常總是找到這種疆域的。牠或者武力侵佔這些疆域，如一九一四年德國進侵比利時以襲擊法國一樣；牠或者採取「假道」的辦法。如一九一八年德國企圖經過拉特維亞進攻列寧格拉時一樣；我不知道那些疆域最能適合於德國的目的，但是我想，願意給德國假道的人們是可以找到的。

霍瓦爾德：全世界都在談論戰爭問題，倘若戰爭真正不可避免的話，那末，斯大林先生，據你的意見，戰爭什麼時候爆發呢？

斯大林：這是不能預先說定的。戰爭可以突然發生。現時戰爭是不正式宣佈的，簡直開始就是了。但在另一方面，我認爲愛好和平的人們底陣地是在鞏固着。他們可以公開的活動，他們依靠於社會輿論的威力，他們掌握有像國際聯盟一類的機關。這也正是愛好和平的人們底優點。他們的力量，是在於他們依靠人民羣衆的意志，以進行其反戰爭的活動。世界上沒有那一國人民願意戰爭的。至於敵視和平

的人們，他們就不能不秘密的活動，這也正是他們的弱點。但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們可以決意從事戰爭，冒險以作最後之掙扎。

蘇法互協公約已由法國衆議院批准，這是愛好和平的人們事業上之一個新勝利。而這一公約對於敵視和平的人們則成爲相當的障礙。

霍瓦爾德：戰爭倘然發生，那末，牠會在世界上那個地方先爆發呢？戰爭的烏烟瘴氣，在何處最爲瀰漫呢？在東方抑在西方呢？

斯大林：我以爲有兩個戰爭危險策源地。第一個策源地在遠東，在日本一帶。我是根據日本軍閥屢次聲言威脅其他國家而這樣說的。第二個策源地在德國。很難說那一個策源地威脅最大，可是兩個都存在着，都動作着。同這兩個基本的戰爭危險策源地比較起來，意阿戰爭，不過是枝節事件。現時表現得最積極的是遠東的危險策源地。但這個危險中心，有可能移到歐洲方面。不久以前，希特勒與法報記者的談話也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在這次談話中，希特勒企圖講些似乎愛好和平的東西，可是在他「愛好和平」的言論當中滲雜着這樣許多威脅法國和蘇聯的話，結

果所謂『愛好和平』一點也沒有了。你看，就是當着希特勒想談和平，他也離不開威脅，這就是徵兆。

霍瓦爾德：據你的意見，目前戰爭危險底主要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斯大林：是資本主義。

霍瓦爾德：究竟是資本主義的那些現象呢？

斯大林：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掠奪現象。你可記得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怎樣發生的。牠是由於要重新瓜分世界而發生的。現在又是這個花樣。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認為他們在上次重分勢力範圍、領土、原料地、市場等等方面，是受了委曲的；他們爲着自己利益想在重分一下。資本主義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就成了一種承認戰爭爲解決國際矛盾合法方法的制度。即令不是法律上承認的話，實質上是這樣的。

霍瓦爾德：你是否認爲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也可以有根據來顧慮蘇聯，恐怕蘇聯決以武力強迫其他民族去接受蘇聯的政治理論呢？

斯大林：像這一類的顧慮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倘若你以為蘇聯的人要用自己的力量甚至用武力去改變周圍國家的面貌，那你就大錯了。蘇聯的人當然願意周圍國家的面貌改變，但這是週圍國家自己的事情。倘若周圍國家自己真正堅如磐石，那我就不知道這些國家怎麼會覺得蘇聯人民底思想是危險的東西。

霍瓦爾德：你這種聲明是否就是說，蘇聯在某種限度內，已經放棄了牠進行世界革命的計劃與圖謀呢？

斯大林：我們向來沒有過這一類的計劃與圖謀。

霍瓦爾德：斯大林先生，我似乎覺得，世界上久已存在着另外一種的印象。

斯大林：這是出於誤會。

霍瓦爾德：悲劇的誤會嗎？

斯大林：不，喜劇的，或者可以說悲喜交集的誤會。不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革命在其他國家也要產生，但是只有當着這些國家的革命者，覺得可能或者須要的時候，革命方能產生。如果以為革命可以輸出的話——這就是胡說。每一

個國家倘若願意革命，他們就用自己的力量進行自己的革命，倘若不願意，也就不會有革命。例如我們國家願意進行革命，於是就進行了革命，現時我們在創造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但硬說我們要在其他國家進行革命，要干預牠們內部生活，那就是無中生有，就是撰造我們向來所沒有宣傳過的主張。

霍瓦爾德：在蘇聯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時，羅斯福總統與李特維諾夫先生，關於宣傳問題，曾經交換過同樣的公文，在李特維諾夫先生致羅斯福總統的信中的第四條內，曾載明蘇聯政府負有以下的義務：『不允許在自己領土內組織或存在對整個美國或其一部份的領土或領地，志在推翻或準備推翻，或以武力改變政治社會制度之任何團體與組織，同時，在自己的領土內，要採取制止方法，以反對這類組織或團體及其代表或負責人員之活動』，我請你，斯大林先生，解釋一下，倘若履行這條義務與蘇聯願望不合，或不在蘇聯權力以內，則李特維諾夫先生何以在這信上簽名呢？

斯大林：履行你所引證的這條義務，是我們權力以內的事，我們履行了這條義務

務，而且以後還是要履行，依照我們的憲法，政治僑民在蘇聯有居留權，我們給他們以逋逃的權利，正如美國給予政治僑民以逋逃的權利一樣，很明顯的，李特維諾夫在該信上簽名，是以信中所載之該項義務係雙方都須履行爲出發的。你，霍瓦爾德先生，現在美國有受美國公民物質上的幫助，爲資本主義利益進行反蘇聯宣傳的白黨僑民，他們有時且成爲恐怖團體，這是否與羅斯福——李特維諾夫的協定相抵觸呢？顯然的，這些僑民正是享受了在美國也有着逋逃權。至於我們方面，我們向來沒有容忍在自己領土內，有任何暗殺份子的存在，不管他的罪惡行爲是反對什麼人。逋逃權的解說，在美國大概要比在我們國內更爲廣泛。好吧，我們也並沒有苛求於人。或許你不同意我，以爲我們對於這些居留我們領土內的政治僑民表示同情。但是，難道沒有美國公民同情宣傳擁護資本主義，反對蘇聯的白黨政治僑民嗎？那末，這裏的問題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問題就在於不應當幫助他們，不應當在經濟上幫助他們的活動，問題就在於兩國當局人員不應干預別國的內部生活。我們的當局人員忠實的履行了這個義務。這些當局人員中，如有違犯義務者，請告訴給

我們。

倘若要奢求從美國逐出所有白黨僑民，那就要侵犯在美國和蘇聯都宣佈了的通逃權了。這裏應當承認，在雙方提要求時是有一定的合理界限的。李特維諾夫在其致羅斯福總統的信上簽字，並不是以私人資格，而是以國家代表的資格出面的。羅斯福總統的簽字，同樣也是如此。他們二人的協定，是兩個國家的協定。無論蘇聯代表李特維諾夫或美國代表羅斯福總統，當在這個協定上簽字時，他們都是代表本國的行爲，這兩個國家不應而且不會去干預對方的內政。這個協定並不能抵觸兩國所宣佈的通逃權。應在這個範圍內解說羅斯福——李特維諾夫的協定，兩個國家代表的協定。

霍瓦爾德：但是，美國代表白勞德和達爾希豈不是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七次共產國際大會上號召武力推翻美國政府嗎？

斯大林：我承認，我不記得白勞德和達爾希二同志的發言，甚至不記得他們說的什麼。這類的話，也許他們說過。但是，美國共產黨並不是蘇聯的人創立的，牠

是美國人創立的。他在美國合法存在，他在選舉時有自己的候選人，以至有總統候選人。假如白勞德和達爾希兩同志在莫斯科只演講過一次，那末，他們在本國，在美國，這類的講演已作過千百次，而且大概講得更激烈些，便知美國共產黨可以自由宣傳他們的思想的。認為美國共產黨的活動，應由蘇聯政府負責，那是完全不正確的。

霍瓦爾德：是的，但此地所談的問題是美國共產黨在蘇聯境內活動是違犯了羅斯福——李特維諾夫的協定第四條。

斯大林：共產黨的活動是怎樣的，牠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共產黨的活動通常就在於組織工人，組織羣衆會議，示威罷工等等。很明顯的，美國共產黨要在蘇聯境內進行這一切事情是不可能的。在我們蘇聯是沒有美國工人的。

霍瓦爾德：我是否可以把你的聲明，了解爲我們相互的義務，是可以找到一種使我們兩國間良好關係保障與持久的解釋呢？

斯大林：是的，絕對可以的。

霍瓦爾德：你大概承認，共產主義社會在蘇聯還沒有建立起來。建立起來的，是國家社會主義。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以及德國的國社黨，都說他們也獲得類似這樣的成績。限制個人自由，以及使人民忍受其他種種貧困，以利於國家，這是否是所有上述這些國家底共同特點呢？

斯大林：『國家社會主義』這一個名稱是不確當的。許多人對於這個名詞的瞭解，乃是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財富的一部分，有時是很大的一部分，轉入國家之手或受其監督，同時，工廠及土地方面的私有權，大多留存在私人手裏。許多人是這樣來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有時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一名詞掩飾之下，爲了準備戰爭或進行戰爭起見，把一部分私人企業收爲國家辦理。我們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無論如何，都不能稱爲『國家社會主義』。我們蘇聯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因爲工廠，土地，銀行，交通業方面的私有制，都被取消，而代之以社會公有制。我們所創立起來的社會組織，可稱爲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組織，這種組織，雖然還沒有完全建成，可是基本上的確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這個社會

底基礎就是社會所有制：國家的即全體人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和集體農莊的所有制。無論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也好，無論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也好，與蘇聯的這一種社會絲毫沒有相同之處。首先是因為工廠，土地，銀行，交通業等等方面的私有制，在上述兩個國家裏都絲毫沒有觸動，所以德國及意大利的資本主義依然完全存在。是的，你說得對，我們還沒有建成共產主義的社會。建成這種社會並不是容易的事情。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區別，你大概是知道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還有某些所有上的不平等。可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已經沒有失業現象，已經沒有剝削，已經沒有民族壓迫。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人人有勞動之義務，雖然勞動的報酬還不是依照各取所需的原則，而是以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為標準。因此，還存在着工資、而且工資是不平等的，有差別的。只有將來建立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人們勞動由社會方面所得的報酬，不是以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為標準，而是以各取所需為原則，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才可說我們建成了共產主義社會。

你說，爲了建成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起見，我們犧牲過個人的自由，忍受過貧困。你的問題裏面含着一種用意，以爲社會主義社會否認個人的自由。這是不正確的。當然，要創造任何一個新東西，就必須自己經濟一些，積蓄資財，暫時節省自己的消費，向別人借貸。如果你要建造一棟新房屋，你就要積蓄金錢，暫時節省消費，否則，房屋也許建築不起來。說到建設人類的整個新社會，那就更須如此了。我們會不得不暫時節省某些消費，積蓄相當的資財，努力從事。我們過去正是這樣辦的，所以我們建成了社會主義的社會。

可是我們建成這一種社會，並不是爲要束縛個人自由，而是使每個人真正感覺到他是自由的。我們之所以建成這種社會，爲的是真正的個人自由，不是括弧裏的自由。失業的人，饑寒交迫，找不到工做，我很難設想他們有什麼『個人的自由』。只有在剝削被取消了的地方，在沒有人壓迫人的地方，在沒有失業與貧窮的地方，在人們並不擔憂明天會失掉工作、住宅、飯碗的地方，才能夠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這種社會裏，才可以有真正的，不是紙上的個人自由。

霍瓦爾德：你是否認爲美國的德謨克拉西與蘇維埃的制度，可以並存發展的
呢？

斯大林：美國的德謨克拉西與蘇維埃的制度，可以和平並存，互相競賽。然而
這一個不能發展而成爲另一個。蘇維埃制度不能轉變爲美國的德謨克拉西，反之亦
然。如果我們彼此不吹毛求疵，我們可以和平並存。

霍瓦爾德：蘇聯正在起草新憲法，該憲法中，要規定新的選舉制度。既然將來
在選舉中仍舊同以前一樣，只有一個政黨活動，那麼，這種新制度能夠改變蘇聯的
情形到什麼程度呢？

斯大林：大概在今年年底，我們要通過我們的新憲法。制憲委員會正在進行工
作並且應當很快完成此項工作。我們已經宣佈過，依照新憲法，我們將實行普遍
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的選舉。將來在選舉中只有一個政黨活動，這件事
情，使你感覺不安。你沒有看見，在這些條件之下，會有怎樣的選舉鬥爭。很明顯
的，將來在選舉中提出候選名單的，不僅是共產黨，而且是各種非黨的社會團體。

這種團體我們有好幾百。我們沒有彼此對立的政黨，猶之乎我們沒有彼此對立的資本家階級與被資本家所剝削的工人階級。我們的社會，完全由城市與農村的自由的勞動者——工人、農民、智識份子所組成。這些階層中之每一階層能夠有其特殊的利益，此種利益，經過現存的很多的社會團體而表現出來。可是既然沒有階級，既然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既然社會主義社會的各階層之間只是存在着某些非基本上的差別，那就不會有形成敵對政黨之發育滋長的基地。沒有幾個階級的地方，就不會有幾個政黨，因為政黨是階級的一部分。

在民族『社會主義』之下，也只存在着一個政黨。然而這種法西斯的一黨制度是行不通的。原因就在於德國依然存在着資本主義，依然有階級，有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總是要爆發出來的，其中代表敵對階級的政黨的鬥爭也是要爆發出來的，比如西班牙就是如此。意大利也只有一个法西斯黨，然而也因為上述原因，在意大利也行不通。

爲什麼我們的選舉是普選呢？因爲全體公民，除少數被法庭剝奪選舉權的人以

外，均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爲什麼我們的選舉是平等的呢？因爲財產上的差別（還有部分的差別），種族與民族之不同，都不會使選民得到任何特權或者使他們受到損失。婦女也與男子平等，享受同樣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我們的選舉將是真正平等的。

爲什麼不記名呢？因爲我們要給蘇維埃公民以完全自由來選出他們所要選的人，選出他們所信任足以保證他們利益的人。

爲什麼是直接的呢？因爲在當地直接選舉一切代表機關，直至最高機關，這是我們偉大國家的勞動者利益底最好保證。

你認爲不會有選舉鬥爭。可是選舉鬥爭一定會有的，而且我認爲一定會有很熱烈的選舉鬥爭。我們有不少機關，工作做得不好。有時某個地方政權機關，不知道如何去滿足城市與農村中勞動者各方面的與日具增的各種要求。你有沒有建立好的學校呢？你有沒有改善了住宅的條件呢？你是一個官僚嗎？你有沒有幫助我們，使得我們的勞動率效力更大，使得我們的生活更加文明一些呢？這將是一種標準，千

萬選民得用這種標準去測量候選人，從候選名單中取消其不適當的候選人，提出最優秀的人來充當候選人。是的，選舉鬥爭將是熱烈的，牠將在許多極嚴重的問題周圍，——主要的是在實際的，對於人民有第一等意義的問題周圍發生。我們新的選舉制度，使一切機關與團體的工作緊張起來，逼迫着他們來改善自己的工作。蘇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與不記名的選舉制度，將成爲人民手中的鞭子，用去鞭策工作不好的政權機關。據我的意見，我們的新的蘇維埃憲法，將是世界上所有的憲法中最民主的憲法。

在蘇聯第八次全國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上關於蘇

聯憲法草案的報告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當斯大林同志走上講台時，全會場長即熱烈鼓掌歡迎。全場起立，到處高呼：「斯大林同志萬歲！」斯大林同志萬歲！偉大的斯大林萬歲！偉大的天才斯大林同志萬歲！維瓦特！紅色戰線！斯大林同志永遠光榮！」

一 憲法委員會的組織及其任務

同志們！

大家知道，提出憲法草案到本次大會來討論的憲法委員會，是根據蘇聯第七次蘇維埃大會的特別的決議所組織的。這一決議，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六號通過的。

其原文如下：

一、對於蘇聯憲法要按照以下的方向來加以修改：

甲、使選舉制更加民主化，用平等的選舉來代替不完全平等的選舉，用直接的選

舉來代替多級的選舉，用不記名的選舉來代替記名的選舉；

乙、更確定憲法底社會經濟基礎，使憲法適合於蘇聯現時階級力量底互相關係

（新的社會主義工業已經建立起來了，富農階級已經被粉碎了，集體農莊制度已經勝利了，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已經奠定為蘇維埃社會底基礎等等）。

二、向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建議選出憲法委員會根據第一項所指出的原則來擬定修正的憲法條文，然後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去批准。

三、蘇聯蘇維埃政權機關底下屆選舉，根據新的選舉制來進行。

這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六號的事。在通過這一決議案後的第二天，即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七號，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就召集了第一次全體會議，並為執行蘇聯第七次蘇維埃大會決議起見，組織了憲法委員會，共二十一個委員。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

第一次全體會議委託憲法委員會起草修改蘇聯憲法的草案。

這就是憲法委員會應當進行工作的正式根據和蘇聯最高機關的指令。

因此，憲法委員會就應當估計從一九二四年到現在蘇聯生活中在社會主義方面的一切進展來修改一九二四年通過的現行憲法。

二 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六年時期蘇聯生活中的改變

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六年的時期，在蘇聯生活中究竟有些什麼改變，而憲法委員會必須在自己的憲法草案上反映的呢？

這些改變的實質何在呢？

在一九二四年，我們的情形怎樣？

當時是新經濟政策第一個時期；當時蘇維埃政權，在儘量發展社會主義的條件之下，會容許資本主義有些許的活躍；當時牠計算到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經濟系統競賽的過程中來組織社會主義系統對於資本主義的優勝。當時的任務就是要

在這一競賽過程中鞏固社會主義的陣地，達到消滅資本主義的成份，完成社會主義系統的勝利，使其成爲國民經濟底基本系統。

當時我們的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情形，是很不好看的。固然，牠當時已在慢慢恢復起來，但是，牠的生產量還遠沒有達到戰前的水平。牠當時所依據的是舊的、落後的和薄弱的技術。當然，牠當時是在社會主義方面發展了的。當時，我們工業的社會主義部分底比重，大約佔百分之八十，而資本主義部分，畢竟還有不少於百分之二十的工業。

當時我們農業的情形，就更難看了。固然，地主階級是已經消滅了，但是，農業資產階級，富農階級，還有不小的力量。當時我們的整個農業，好像是專靠中世紀落後技術來經營經濟的小的個體農民所形成的茫無邊際的海洋。而我們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好像是這一海洋中的一些島嶼，老實說，他們在我們國民經濟中，當時還沒有多少重大的意義。當時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還很薄弱，而富農則還有力量。當時我們還不說消滅富農，而只說限制富農。

關於我國商品流通的情形，也可以說是一樣的。在商品流通方面，當時社會主義部份差不多僅佔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會更多些；而其餘的部份都是被商人、投機者及其他私人所佔據了。

這就是一九二四年時我們經濟的情形。

現在，一九三六年，我們的情形怎樣呢？

如果那時是處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時期，新經濟政策的開始，是資本主義有些許活躍的時期，那麼，現在則是處在新經濟政策的最後一個時期，新經濟政策的完結，是資本主義在一切國民經濟部門中完全被消滅的時期。

首先就從我們的工業來看罷。我們的工業在這一個時期已經發展成爲巨大的力量。牠現在已經不能說牠是薄弱和技術方面設備不好了。相反的，牠現在是依據於新的、富足的現代的技術和特別發展的重工業，尤其是更發展的機器製造業。而且最主要的是資本主義已經從我們工業範圍中完全驅逐出去了，而社會主義的生產形式，現在在我們工業部門中是獨佔統治的系統。我們現時的社會主義工業從牠的生

產品數量看來，已超過戰前七倍以上，這不能看作是一件小事。

在農業方面，現在已經不是僅有落後技術和富農有勢力的小農個體經濟的海洋，而是有世界上最大的、機械化的、用新的技術武裝起來的生產，就是包括一切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系統。大家知道，在農業中，富農已經被消滅了；而憑藉中世紀落後技術的小農個體經濟，僅佔很小的地位，牠在農業中所佔有的耕地面積，至多不僅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不能不指出這樣的事實，就是集體農莊現在已握有三十一萬六千架拖拉機，共五百七十萬馬力，而與蘇維埃農莊一共計算起來，就有四十萬架拖拉機，共七百五十八萬馬力。

至於講到我國的商品流通，那麼，在這一方面，商人與投機者已被完全驅逐出去了。全部商品流通，現在完全握在國家、合作社與集體農莊的手中。新的蘇維埃商業，沒有投機者的商業，沒有資本家的商業，已經產生和發展了。

這樣看來，現在社會主義系統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達到完全勝利，已經是事實了。

這說明甚麼呢？

這就是說，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剷除了和消滅了，而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已經奠定為我們蘇維埃社會不可動搖的基礎了（長時的鼓掌）。

在蘇聯國民經濟方面這一切改變的結果，現在我們就有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即沒有危機和失業現象，沒有貧困和破產並給全體公民都有一切可能達到優裕文化生活的經濟。

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六年我們經濟方面所發生的改變，基本上就是如此。

既然蘇聯經濟方面有了這些改變，於是我們社會底階級結構亦隨之起了改變。

大家知道，由於國內戰爭勝利的結果，地主階級就已經完全被消滅了。至於其他剝削階級，則也與地主階級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在工業部門中，已沒有資本家階級了。在農業部門中，已沒有富農階級了。在商品流通中，已沒有商人和投機者了。這樣，一切剝削階級都被消滅了。

剩下的，有工人階級。

剩下的，有農民階級。

剩下的，有智識份子。

但是，如果以為在這時期中，這些社會集團，沒有任何改變，比方說，如果以為他們還是與資本主義時期一樣，那就是錯誤的想法。

例如，就拿蘇聯工人階級來說吧。人們往往照舊叫他做無產階級。但是，什麼是無產階級呢。無產階級是在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屬於資本家的經濟系統之下被剝奪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而被資本家階級剝削的階級。無產階級就是被資本家剝削的階級。而在我們國家中，大家知道，資本家階級已經被消滅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已經從資本家手中奪來轉交給國家，而這個國家的領導力量便是工人階級。因此，已經沒有剝削工人階級的資本階級了。因此，我們的工人階級，不僅沒有被剝奪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相反的，他與全體人民一起掌握着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既然他掌握着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而資本家階級又已消滅，就絕對沒有任何剝削工人階級的可能了。在這樣情形之下，還能把我們的工人階級叫做無產階級麼？

很明顯的，這是不能的。馬克思說：『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必須粉碎資本家階級，從資本家手中奪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並消滅產生無產階級的生產條件。』能不能說蘇聯工人階級已經實現了解放自己的這些條件呢？完全可以，而且應當這樣說。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蘇聯無產階級變成了完全新的階級，變成了消滅了資本主義經濟系統，保證了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並使蘇維埃社會走向共產主義去的蘇聯的工人階級。

由此可見，蘇聯的工人階級，乃是完全新的擺脫了剝削的工人階級，這樣的工人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所沒有過的。

再說到農民的問題。照通常的概念說，農民是這樣一種小生產者階級，這些小生產者，好像一盤散沙，散佈在全國的地面上，各自在自己的小的經濟上，用落後的技術耕種土地，這些小生產者，就是私有制度的奴隸，就是被地主、富農、商人、投機者、高利貸者等等所任意剝削的。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如就他的基本羣衆說，就正是這樣的階級。能不能說我國現時的農民——蘇維埃的農民羣衆與這樣的

農民相像呢？不能，不能這樣說。這樣的農民，在我國已經沒有了。我們蘇維埃的農民，是完全新的農民。我國已經沒有剝削農民的地主和富農與商人和高利貸者了。因此，我們的農民，是擺脫了剝削的農民。而且我們蘇維埃農民的最大多數，是集體農莊的農民，即是他們自己的工作 and 財產，不依靠個體勞動和落後技術，而是依靠集體勞動和現代技術。最後，我們農民的經濟基礎，不是私有制，而是在集體勞動基礎上生長起來的集體所有制。

由此可見，蘇維埃農民，這完全是新的農民，這樣的農民，是人類歷史上所沒有過的。

最後，講到智識份子的問題，講到工程師和技術工作人員、文化工作人員和一般的職員等的問題。在這一時期中，我國的智識份子同樣有了大的改變。這已經不是那舊的落後的智識份子，這些舊的智識份子，企圖把自己看作超階級的，而實際上他們大多數是替地主和資本家效勞的。我們蘇維埃的智識份子，這是完全新的智識份子，與工人階級和農民骨肉相聯的智識份子。第一，智識份子的成份改變了。

在我們蘇維埃的智識份子中，由貴族和資產階級出身的，佔很少的成份。蘇維埃智識份子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從工人階級、農民和其他勞動階層出身的。最後，智識份子活動的性質也改變了。以前他們是必須替富人階級效勞，因為除此以外，他們便沒有別的出路。現在他們替人民服務，因為剝削階級已經不存在了。正因為這樣，他們現在是蘇維埃社會中享有平等權利的一員，在蘇維埃社會中，他們與工人和農民攜手並進，建設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由此可見，這完全是新的勞動的智識份子，這樣的智識份子，在地球上任何國家內都找不到的。

在這一時期中，蘇維埃社會階級結構方面的改變，就是如此。

這些改變，說明什麼？

第一，說明在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以及這兩個階級與智識份子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中，而舊的階級的特性，也正在消滅中。這就是說，這些社會集團之間的距離，正在一天一天的縮短。

第二，說明這些社會集團之間的經濟上的矛盾，正在降弱，正在消失。

最後，說明這些社會集團之間的政治上的矛盾，也同樣正在降弱，正在消失。

蘇聯階級結構方面改變的情形就是這樣。

關於蘇聯社會生活改變的情形，如果不把另一方面的改變補充說幾句，那就是不完全的。我所指的就是蘇聯各民族間相互關係的方面。大家知道，蘇聯境內約有六十個民族、民族集團和小民族。蘇維埃國家是多民族的國家。因此，顯然的，關於蘇聯各民族人民相互關係的問題，對於我們不能不有第一等的意義。

大家知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在一九二二年蘇聯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大會上成立的。牠是根據各民族人民平等與自願的原則組成的。一九二四年所通過的現行憲法，是蘇聯第一個憲法。在那個時候，各民族人民之間的關係還沒有應有的和諧，對於大俄羅斯民族不信任的殘餘還沒有消滅，各民族的離心力還起着作用。當時需要在這些條件之下，在經濟政治和軍事的互助基礎上來調整各民族人民底兄弟的合作，把他們聯合為一個多民族的聯盟國家。當時蘇維埃政權不能不看到在

這一事業上的困難。牠有了在資產階級國家中建立多民族國家失敗的教訓。牠有了舊奧匈帝國失敗的經驗。然而牠還是進行創立多民族的國家——因為牠知道，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產生的多民族的國家，是可以戰勝一切困難的。

從那時到現在，已經有十四年了。這樣一個時期，已足夠來檢閱已有的經驗。經驗怎樣呢？這一時期，毫無疑問的指出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建立多民族國家的經驗是完全成功了。這就是列甯民族政策毫無疑義的勝利了。（長時鼓掌）

怎樣解釋這一勝利呢？

因為沒有了剝削階級，而剝削階級是民族衝突的組織者；因為沒有剝削，而剝削是培植民族相互猜忌和挑撥民族惡感的；因為有了工人階級的政權，而工人階級是反對一切奴役的，是忠誠奉行國際主義思想的；因為真正實現了在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上各族人民相互的幫助；最後，因為發揚了蘇聯各族人民民族文化，形式為民族的面內容為社會主義的文化——因為所有這些和類似這些的因素，就使得蘇聯各族人民的面貌根本改變了，在他們之間，消失了互相猜忌的感覺，發展了互助

友善的感覺，這樣，就培植了在統一的聯合國家系統中各民族的真正兄弟的合作。

結果，我們現在就有完全創造成功的、克服了一切困難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的鞏固性，可以使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發生羨慕。（熱烈的鼓掌）

在蘇聯這一時期中民族相互關係方面所發生的改變，就是如此。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六年的時期中，在蘇聯經濟和社會政治生活方面的改變底總結，就是如此。

三 憲法草案的基本特點

在新的憲法草案上，怎樣反映了蘇聯生活方面的這些改變呢？

換一句話說，提到這次大會上來討論的憲法草案的基本特點是什麼呢？

憲法委員會曾受委託修改一九二四年的憲法條文。憲法委員會工作的結果，就有了憲法的新條文，蘇聯新憲法的草案。憲法委員會起草新憲法草案時的出發點，

是認爲憲法不應當與綱領混淆的。這就是說，在綱領與憲法之間有實質的差別。綱領是要說還沒有東西，是要說應當在將來達到和爭取的東西；相反的，憲法應當說已有的東西，說現在已經真正達到和爭取到了的東西。綱領主要是指將來，憲法是指明現在。

舉兩個例子來說明一下。

我們蘇維埃社會已達到了的就是牠已在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創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即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又稱爲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者初級階段。這就是說，我們在基本上已經實現了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長時的鼓掌）。共產主義這一階段的基本原則，就是人所共知的一句名言「各盡所能，按勞取酬」。我們的憲法，應不應當反映這一事實，即已經獲得了社會主義的事實呢？我們的憲法，應不應當以這些獲得的事實做基礎呢？無條件的是應當的。因爲社會主義在蘇聯是已經達到了的和獲得了的。

可是，雖然蘇維埃社會是以達到在將來實現共產主義最高階段爲目的，然而，

牠現在還沒有實現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主要原則的共產主義最高階段。我們的憲法，能不能以現在還沒有的、還應當爭取的共產主義最高階段做基礎呢？不能夠的，因為共產主義最高階段是在蘇聯還沒有實現的，還是要在將來應當實現的。如果不願意把憲法變成宣揚將來勝利品的綱領和宣言的話，那就不能把共產主義最高階段來做憲法基礎的。

這就是在現在歷史時期的我們憲法的範圍。

這樣，新憲法草案就是表現已經走過的道路底總結，已經達到的勝利底總結。因此，牠是記載和用立法的方法鞏固事實上已經達到的和獲得的東西。（熱烈的鼓掌）

這就是蘇聯新憲法草案的第一個特點。

再者，資產階級國家的憲法，通常都是從資本主義制度牢不可破的信念出發。這些憲法構成的主要基礎，就是資本主義的原則，資本主義主要的基石：對於土地、森林、工廠、作坊及其他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人對人的剝削和

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存在；社會裏兩個極端的對立，在一個極端上是生活毫無保障的大多數勞動羣衆，而在另一極端上則是生活有保障的肆意揮霍的少數不勞而獲的人以及其他等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就是依據於這些和諸如此類的資本主義的基石。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反映這些東西，把牠們用立法的方法鞏固起來。蘇聯新憲法草案與資本主義國家憲法不同的，就是蘇聯新憲法草案從在蘇聯消滅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事實出發，從社會主義制度勝利的事實出發。蘇聯新憲法草案構成的主要基礎，就是社會主義的原則，社會主義的主要基石，已經獲得了的和已經實行了的：對於土地、森林、工廠、作坊及其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剝削和剝削階級底消滅；大多數人貧困和少數人揮霍的現象底消滅；失業現象底消滅；勞動是每個有工作能力的公民底義務和光榮的職責，就是不『勞動者不得食』。勞動的權利，即每個公民獲得工作保障的權利；休息的權利；享受教育的權利以及其他等等。新憲法草案是依據於這些和類似這些的社會主義基石。牠反映這些東西，並把牠們用立法的方法鞏固起來。

這就是蘇聯新憲法草案的第二個特點。

再者，資產階級的憲法，雖不明說，實際上是從下面這些前提出發：就是社會是由階級對立，由擁有財產的階級和毫無財產的階級的對立所組成，無論那一政黨執政，對於社會實行國家領導（專政），應當屬於資產階級，憲法之所以需要，是爲了鞏固便利於有產階級的社會秩序。

蘇聯新憲法草案與資產階級憲法的區別，就是蘇聯新憲法草案是從下面這些前提出發的：即社會上已經沒有階級對立，社會是由互相友善的兩階級，工人和農民組成，掌握政權的，正是這些勞動階級，對於社會實行國家領導（專政），屬於工人階級，即社會先進階級，憲法之所以需要，就是爲了鞏固便利於勞動羣衆的社會秩序。

這就是新憲法草案的第三個特點。

再者，資產階級憲法雖不明說，實際上是從下面這一前提出發的：就是各民族與各種族之間是不能平等的；有享有完全權利的民族，也有無完全權利的民族；除

此以外，還存在着第二種的民族或種族，譬如殖民地，他們所有的權利比之無完全權利的民族還少些。這就是說，所有這些憲法的基礎，是民族主義的，即是佔統治地位的民族底憲法。

蘇聯新憲法草案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的區別，就是蘇聯新憲法草案是富有國際主義精神的憲法。牠的出發點，就是認為一切民族及一切種族完全平等。牠的出發點就是認為各民族的和種族的膚色和語言，文化程度和國家發展程度的差別，也和某些其他的區別一樣，不能成爲辯護民族不平等的根據。牠的出發點，就是認為一切民族和種族，不管他們過去和現在的狀況，不管他們強或弱，都應當在一切經濟的、社會的、國家的、社會文化生活的範圍內，享有同等的權利。

這就是新憲法草案的第四個特點。

新憲法草案的第五個特點：就是牠的一貫的，徹底的民主主義。從民主主義觀點看來，資產階級憲法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直接否認公民的平等權利和民主自由，或者實際把這些權利與自由變爲烏有。另一類是樂意接受甚至標榜民主主義的

原則，但是却加上一些條件與限制，使得民主權利與自由根本殘缺不全。他們說，一切公民都有平等選舉權，但是，馬上加上一些居住年限，教育程度，甚至財產標準等的限制。他們說，一切公民有平等權利，可是馬上附加說，女子或一部份女子是除外的。還有其他等等。

蘇聯新憲法草案的特點，就在於牠把諸如此類的條件和限制拋棄了。對於蘇聯新憲法草案，無所謂積極的，或消極的公民；對於蘇聯新憲法草案，一切公民都是積極的。牠不承認在男與女，久居與暫居，有財產與沒有財產，受過教育與未受過教育等之間有權利上的差別。對於蘇聯新憲法草案，一切公民都有平等的權利。決定每個公民在社會上的地位的，不是財產狀況，不是民族出身，不是性別，不是工作地位，而是各人的能力和各人的勞動。

最後，新憲法草案還有一個特點。資產階級的憲法通常僅限於規定公民形式上的權利，而不注意實行這些權利的條件，這些權利實現的可能的條件，這些權利實現的物質條件。說公民平等，可是忘記如果資本家與地主在社會上掌有財富和政治

勢力，而工人與農民被剝奪了財富和政治權利，如果資本家和地主是剝削者，而工人和農民是被剝削者，那麼，僱主與工人之間，地主與農民之間，是不能有真正平等的。或者再說言論、集會、出版自由，可是忘記了如果工人階級沒有可能支配適當的會場、好的印刷廠、充份的紙張等，那麼，這些權利，對於工人階級，就變成了空話。

新憲法草案的特點，就在於不僅規定了公民的形式上的權利，而且把重心放在保障這些權利，放在實現這些權利的物質條件的問題上。牠不是簡單的宣佈公民的平等權利，而是用立法的方法鞏固已把剝削制度消滅了的事實、一切公民已擺脫一切剝削的事實來保障公民權利的平等。牠不是簡單宣佈勞動權，而且用立法的方法鞏固在蘇維埃社會沒有危機的事實、消滅失業現象的事實，來保證勞動權。牠不是簡單的宣佈民主自由，而且用立法的方法保證牠，用一定的物質條件保證牠。因此，很明顯的，新憲法草案的民主主義，不是『通常的』、『公認的』⁽⁴⁾、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

蘇聯新憲法草案的基本特點就是這樣。

這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六年時期，蘇聯經濟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改變與進步在新憲法草案上的反映。

四 資產階級對於憲法草案的批評

要對於資產階級對憲法草案的批評說幾句話。

外國資產階級報章雜誌對於憲法草案的態度如何，這個問題，無疑義地是有相當興趣的。外國報章雜誌既然反映資產階級國家人民各種階層底輿論，所以我們對於這些報章雜誌所鼓吹的反對憲法草案的批評不能置之不理。

外國報章雜誌對於憲法草案的第一種反響，就是故意抱緘默態度，故意不提及我們的憲法草案。我此地所指的，就是最反動的、法西斯的報章雜誌。這一種批評家，認為最好是對於憲法草案採取緘默態度，就是裝聾作啞，好像不會有過憲法草案，而且在宇宙間根本上就沒有這種憲法草案一樣。也許有人說，緘默並不是批

評。然而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把緘默方法，當作一種特別的藐視辦法，這也是一種批評方式，固然，這種方式是愚蠢的，是可笑的，可是終究是一種批評方式。（全場大笑，鼓掌）。然而他們的緘默方法，並沒有效果。他們歸根到底不得不打開葫蘆，並通告世界，——雖然這對於他們是很痛心的——說蘇聯憲法草案終究存在，不僅存在，而且對於人心開始發生有害的影響。自然他們不這樣做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世界上總還有輿論，有讀者，有活的人，這些人要知道事實底真相，要使這些人長久受騙，這是沒有任何可能的。依靠欺騙是不會長久的……。

第二種批評家，承認憲法草案在宇宙間確實存在，然而他們認為憲法草案並不是大不了的可注意的文件，因為牠事實上不是憲法草案，而是一紙空文，而是用來耍手腕和欺騙人的一種空洞的允諾。同時他們還補充說，而且蘇聯也不能擬出更好的憲法，因為蘇聯本身就不是一個國家，牠至多也不過是一個地理概念（全場大笑），既然蘇聯不是一個國家，那末，蘇聯的憲法，也不會是真正的憲法。這種批評家底標本式的代表，就是——雖然這是很奇怪的——德國的官場雜誌德意志外交

政治通信。該雜誌簡直說，蘇聯憲法草案乃是空洞的允諾，乃是欺騙，乃是『普鐵木金的屯田村』。牠毫不猶豫地宣稱，說蘇聯不是一個國家，說蘇聯『不過是一個確定的地理概念』（全場大笑），因此蘇聯憲法不能認爲是真正的憲法。

我們對於這一種所謂批評家能夠說什麼話呢？

偉大的俄國著作家石德林，在自己的一篇傳奇小說中曾描寫一個眼界狹小、生性魯鈍，但是極端自信和暴躁的、愚而好自用的官僚。這個官僚在他所『管轄的』區域內，殺了成千成萬的居民，燒燬了幾十座城市，而建立了『秩序與治安』以後，眺望四周，忽在天際雲邊看見了美國，這個國家，自然是不十分知道的，而在那裏却有什麼誘惑人心的自由，在那裏却用別種方法來統治國家。這個官僚一看見了美國，就氣忿忿地說道：這是什麼國家，他是從那裏來的，牠有什麼理由存在着？（全場大笑，鼓掌）。當然，牠是在數世紀前偶然被人發現的，可是難道不能把牠重新封閉起來，使牠完全無聲無臭嗎？（全場大笑）這個官僚說了這一番話之後，就下了一個批示：『要把美國重新封閉起來！』（全場大笑）

我覺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信雜誌裏的先生們，與石德林小說中的官僚是一而二的人物。（全場大笑，大鼓掌表示贊同）。蘇聯早已成爲這些先生們的眼中釘。蘇聯如燈塔一樣，屹立了一十九年，牠用解放的精神薰染全世界底工人階級，牠使工人階級底仇人瘋狂發怒。牠，這個蘇聯，不僅存在而已，而且日益發育，不僅發育而已，而且日益繁榮，不僅繁榮而已，而且編製新憲法草案，這個草案引起被壓迫階級的興奮和新希望。（大鼓掌）。這樣一來，德國官場雜誌中的先生們怎麼會不生氣呢？他們氣忿忿地說道，這是什麼國家，牠有什麼理由存在着（全場大笑）。如果牠於一九一七年十月發現了，那末，爲什麼不能把牠重新封閉起來，使牠完全無聲無臭呢？他們說了這一番話以後，就決議：要把蘇聯重新封閉起來，並大聲宣佈說，蘇聯這個國家是不存在的，說蘇聯不過是一個地理概念！（全場大笑）

石德林小說中的官僚，雖然十分愚鈍，寫了那重新封閉美國的批示，但同時他還懂得一些實際情形，他馬上就自言自語說道：「然而這也許不能由我作主的罷」。（笑聲爆發，掌聲雷動）。我不知道德國官場雜誌裏的先生們，是否有充分

的智力，猜想到這一點，就是他們在紙上當然能夠「封閉」這一個或那一個國家，然而如果認真講起來。那末，「這並不是他們所能作主的。」……（笑聲爆發，掌聲雷動）

至於說蘇聯憲法，好像是一種空洞的允諾，好像是「普鐵木金的屯田村」等等，那末，我就要引證幾個確定不移無待證明的事實。

在一九一七年，蘇聯底人民推翻了資產階級並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是事實，而不是允諾。

其次，蘇維埃政權消滅了地主階級並把從前屬於地主、官產和教堂的一萬萬五千萬俄畝以上的土地轉交與農民，而且這還沒有把那些從前就在農民手中的土地計算在內。這是事實，而不是允諾。

其次，蘇維埃政權剝奪了資本家階級，沒收他們的銀行，工廠，鐵路以及其他的生产工具和生產資料，把這些東西宣佈為社會主義的財產並委任工人階級最優秀的人物來領導這些企業。這是事實，而不是允諾。（長時期的鼓掌）

其次，蘇維埃政權，在新的、社會主義的原則上，在新的技術基礎上，組織了工業和農業，這樣牠就達到了下列的成績：現在蘇聯農業底出產比戰前多一倍半，工業底出產比戰前多七倍，而國民收入比戰前增加了四倍。凡此種種都是事實，而不是允諾。（長時間的鼓掌）

其次：蘇維埃政權消滅了失業，實行了勞動權利，休養權利，教育權利，保證了工農智識份子以良好的物質上和文化上的條件，保證了普遍的、平等的、不記名的選舉法見諸實行。凡此種種都是事實，而不是允諾。（長時間的鼓掌）

末了，蘇聯製定了新憲法草案，這個草案並不是允諾，而是把這些衆所共知的事實加以登記和用立法的方法鞏固起來，而是把已經達到的和已經獲得的勝利品加以登記和用立法的方法鞏固起來。

這樣以來，試問德國官場雜誌裏的先生們之所以發出『普鐵木金屯田村』的空論，如果其目的不是在於他們要對人民隱瞞關於蘇聯的真相，使人民誤解，欺騙人民，那麼，其目的又在什麼地方呢。

事實就是如此。俗語說得好，事實是最爽直無欺的東西。德國官場雜誌裏的先
生們也許會說，如果這些都是事實，那就更糟了。（全場大笑）。可是，那時我們
就可以用一句俄國的名言來回答他們：『法律不是爲着傻子寫的。』（全場歡笑，
長時間的鼓掌）

第三種批評家願意承認憲法草案是有相當價值的，他們認爲這個草案是一種好
現象，然而他們却很懷疑草案中有些條文是否能夠見諸實行，因爲他們確信這些條
文根本上是不能實行的，所以這些條文要成爲紙上空文。這些批評家——如果說得
客氣一點的話——是懷疑論者。他們，這些懷疑論者，在各國都有。

老實說，我們遇到他們並不是第一次。當一九一七年布爾塞維克奪得政權的時
候，懷疑論者說：布爾塞維克倒並不是壞人，然而掌握政權的事情，他們却辦不
通，他們一定要失敗的。可是，在事實上，失敗了的，並不是布爾塞維克，而是懷
疑論者。

在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的時期，這種懷疑論者說：蘇維埃政權，當然是不

壞的東西，然而鄧尼金協同高爾察克又加上外國人，大概要戰勝這個政權。可是，在事實上，懷疑論者在這一點上也失算了。

當蘇維埃政權公佈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懷疑論者又起來說：五年計劃，當然是好事情，可是牠未見得能夠實現的，應當認為五年計劃的事情，布爾塞維克大概辦不成功的。可是事實證明懷疑論者又倒霉，五年計劃四年就完成了。

關於新憲法草案以及懷疑論者方面對於該草案的批評，我們也應當說同樣的話。草案一公佈，這種批評家又重新起來說話，表示他們的憂慮，對於憲法中有些條文是否能夠實現，表示懷疑。毫無疑義的，這懷疑論者，在這個問題上，現在也要像過去屢次失敗的情形一樣，而一定會失敗的。

第四種批評家，攻擊新憲法草案，認為這個草案，就是『向右轉』，就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取消布爾塞維克統制』。他們用各種不同的腔調說，『布爾塞維克已經向右轉，這是事實』。在這一點上特別努力的，就是有些波蘭報紙以及一部分美國報紙。

關於這些所謂批評家，可以說些什麼話呢？

如果他們把工人階級專政基礎擴大以及使專政變為更靈活的、因此也就是加強由國家領導社會的制度，解釋成爲不是加強工人階級專政，而是削弱這種專政，甚至放棄這種專政，那末，就讓我們來問一問：這些先生們究竟是否知道什麼是工人階級專政呢？

我們用立法的方法來鞏固社會主義的勝利，以立法的方法來鞏固工業化、集體化和民主化的勝利，如果他們把這些事情叫做『向右轉』，那末就要來問一問：這些先生們究竟是否知道左與右的分別？（全場大笑，大鼓掌）

無疑義的，這些先生們在自己對於憲法草案的批評中完全鬧糊塗了，他們既是鬧糊塗了，所以把左右都弄錯了。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記起戈果爾所做的小說死靈魂上面的一個貴族家裏的『使女』片拉格姪。戈果爾描寫這個『使女』有一次對齊切科夫的馬車夫謝里芳指示道路，然而她鬧糊塗了，不會分別道路的左右，因此她陷於踟躇不安的地位。

應當承認，波蘭報紙中的批評家雖然十分自重，然而與死靈魂小說中貴族家庭的「便女」片拉格姬底瞭解程度，相去不遠。（鼓掌）。你們記得，馬車夫謝里芳認為必須對於片拉格姬弄不清左右而加以譴責，於是對她說：「哎呀，你這個賤丫頭……不知道那邊是右，那邊是左」。我以為也應當譴責這些不幸的批評家，對他們說：喂，你們這班可憐的批評家……簡直不知道那邊是右，那邊是左。（長時間的鼓掌）

末了，還有一種批評家。如果上一種批評家責備憲法草案放棄工人階級專政，那末，這一種批評家，恰恰相反，責備憲法草案，說牠絲毫沒有改變蘇聯現狀，說沒有放棄工人專政，沒有容許各種政黨自由並保存蘇聯共產黨目前的領導地位依然有效。同時這一種批評家認為蘇聯沒有各種政黨自由，乃是破壞民主主義基礎的標誌。

我應當承認，新憲法草案真正保留工人階級專政底制度依然有效，同樣也保全蘇聯共產黨目前的領導地位而毫無變更。（大鼓掌）如果可敬的批評家認為這是憲

法草案的缺點，那末，只能對這一點表示惋惜。可是我們，布爾塞維克，却認爲這是憲法草案的優點。（大鼓掌）

關於各種政黨底自由，那末，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却抱着有些不同的觀點。黨是階級底一部分，是階級的先鋒部隊。幾個政黨，也就是各種政黨底自由，只能存在於下述一種社會之中，就是在那裏有彼此對抗的階級，而這些階級的利益是互相敵對並彼此不能調和的，在那裏，比方說，有資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農民，有富農和貧農等等。然而在蘇聯，資本家、地主、富農等等這一類的階級，已經沒有了。在蘇聯只有兩個階級，即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的利益，不僅不彼此敵對，而是恰恰相反，是互相融洽的。因此，在蘇聯並沒有幾個政黨存在的基礎，也就是說，並沒有這些政黨自由的基礎。在蘇聯只有一個政黨——共產黨底基礎。在蘇聯只有一個政黨——即勇敢和澈底保護工農利益的共產黨才能存在。牠對於這兩個階級底利益保護得並不壞，這一點是未必可以發生絲毫疑慮的。（大鼓掌）

人們講到民主。可是什麼是民主呢？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有彼此對抗的階級，那

裏的民主，歸根到底，乃是對於有勢力的人的民主，乃是對於有財產的少數人的民主。在蘇聯的民主，恰恰相反，乃是對於勞動者的民主，亦即對於一切人民的民主。由此可見破壞民主主義基礎的，並不是蘇聯底新憲法，乃是資產階級的憲法。因此我認爲蘇聯憲法乃是世界上唯一澈底民主的憲法。

資產階級對蘇聯新憲法的批評情形，就是如此。

五 對於憲法草案的修正和補充

現在說到在全民討論憲法草案時，許多公民對於憲法草案所提出的修正和補充。

大家都知道，在全民討論憲法草案中，曾提出很多修正和補充。所有這些提案，在蘇聯的報紙上都已公佈過了。因爲這些修正，內容既很複雜，而價值也很不一致，所以，據我的意見，是可以分爲三類的。

第一類修正底特點，就在於這些修正所說的並不是關於憲法上的問題，而是關

於將來的立法機關日常工作上的問題。有些是關於保險方面的個別問題，有些是關於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某些問題，有些是關於工業建設方面的某些問題，有些是關於財政事宜方面的問題，——這就是這類修正所提到的問題。顯然，這些提案人，沒有把憲法問題和日常工作問題之間的區別弄清楚。正因為這個原故，他們的企圖要在憲法內，盡量參進一些法律，簡直要把憲法變成一部法律大全。可是憲法並不是一部法律大全。憲法乃是根本法，而且僅祇根本法。有了憲法，並不是說不需要將來的立法機關底日常工作，而是必然需要的。憲法是給與這種機關將來立法工作以法律上的基礎。所以，這樣的修正和補充，既與憲法沒有直接關係，因此，據我的意見，就應該交到我國將來的立法機關去。

第二類的修正和補充，則企圖在憲法內，加進一些歷史備考的成分，或加進一些關於蘇維埃政權現時還沒有得到，而將來必須達到的勝利品之宣言式的成份。這些提案人主張在憲法內指出黨、工人階級及一切勞動羣衆多年以來在爲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中，克服了那些困難，要在憲法內說明蘇維埃運動的最終目的，即建成完

全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就是這類修正用各種說法所重複提到的問題。我想，這一類修正和補充，既與憲法沒有直接關係，也是不應當採納的。憲法是那些已經得到和已有保障的勝利品之事實的記載，和用立法的方法鞏固起來，如果我們不願意改變憲法這一基本性質，我們就不應當在憲法內，填寫一些關於以往歷史的記載，或者關於蘇聯勞動羣衆將來勝利品的宣言。對於這類的事情，我們有另外的方法和另外的文件。

最後，第三類的修正和補充，則是與憲法草案有直接關係的。

這類修正，大部分都是含着字句修改的性質。因此這類修正，可以交到本屆大會審編委員會，我想，大會一定會成立這樣一個委員會，並委托牠來把新憲法草案全文，給以最後的審編。

至於第三類修正的其他一部分，則有更多的實質上的意義，我想，關於這些修正，在這裏必須說幾句話。

(一)首先是關於憲法草案第一條的修正。這裏總共有四個修正。第一個修

正是主張用『勞動者國家』字樣來代替『工農國家』的字樣。另一個修正是主張把『工農國家』的字樣改爲『工農及勞動知識份子國家』。第三個修正是主張用『蘇聯境內一切種族和民族的國家』字樣來代替『工農國家』的字樣。第四個修正是主張用『集體莊員』或者『社會主義農業勞動者』字樣來代替『農民』字樣。

——是否應當採納這些修正呢？我以爲是不應當的。

憲法草案第一條所講的是什麼呢？第一條所講的是關於蘇聯社會底階級成份。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否能夠在憲法內不說到關於我國社會底階級成份問題呢？當然是不能夠的。大家都知道，蘇聯底社會是由兩個階級，由工人和農民組成的。憲法草案第一條所說的正是這一點。所以，憲法草案第一條是正確的反映着我國社會底階級成份。有人可以問：那末勞動知識份子呢？要知道，知識份子從來不是，而且也不會是一個階級，——他們曾是，而且現在還是一種社會階層，他們由社會裏各階級出身的份子組成的。在舊的時代，智識份子多半都是由貴族和資產階級出身，一部份由農民出身，至於由工人出身的，那更是極少極少了。而在我們蘇

維埃的時代，智識份子，主要都是工農出身。但不管他們出身如何，不管他們性質如何，他們畢竟是一種社會階層，而不是一個階級。

這種情形不會減少勞動智識份子的權利嗎？一點也不會！憲法草案第一條所說的，並不是關於蘇聯社會各社會階層底權利問題，而是關於這一社會底階級成份問題。關於蘇聯社會各階層底權利問題，勞動智識份子底權利也在內，主要是在憲法草案第十章第十一章內規定的。從這兩章內可以明白看出，工人，農民及勞動智識份子，在我們國內一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活方面，都是完全平權的。因此，所謂勞動智識份子的權利會被減少の問題，是根本談不到的。

同樣，關於蘇聯各種族和各民族的問題，也是如此。在憲法草案第二章內，已經指出蘇聯是各平等民族之自由的聯盟。憲法草案第一條所說的是蘇聯底階級成份，而不是民族成份，既然如此，那末在這一條裏，是否需要重複說明這一點呢？顯然是不需要的。關於蘇聯各民族和各種族底權利問題，則在憲法草案第一，第十，第十一各章內，都講到了。從這幾章內可以明白看出，蘇聯各民族和各種族，

在國內所有一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活方面，都享有同樣的權利。因此，所謂民族的權利會被減少の問題，也是根本談不到的。

同樣，要以『集體莊員』字樣，或以『社會主義農業勞動者』字樣來代替『農民』字樣，也是不正確的。第一，在農民中，除集體莊員外，還有一百多萬非集體莊員的農戶。對於他們怎樣辦呢？提出這種修正的人，是不是想要把這一部份農民除開不算呢？如果這樣想，那就未免太不合理了。第二，雖然大多數農民都從事於集體農業，但是，這還不是說他們已經不是農民了，他們已經不復有自己個人的經濟，自己個人的家業等等了。第三，如果照提案人底意思推論的話，那就必須以『社會主義工業勞動者』字樣來代替『工人』字樣了。但是，不知道提案人爲什麼並沒有這樣提議。末了，難道在我們國家裏，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已經消失了嗎？如果這些階級還沒有消失，那是否值得把工農底固有名詞，從字典中一筆勾銷呢？該修正底提議人所指的，顯然不是現在，而是將來的社會，而是將來已經沒有階級，工人和農民都已變成統一的共產主義社會裏的勞動份子的時期。所以，他們顯

然是往前跑得太遠了。但是，在製定憲法時，應當以現在，以那些已有的事實爲出發點，而不應當以將來的前途作出發點。憲法是不可以，而且不應當向前跑的。

(二) 其次就是對於憲法草案第十七條的修正。這一修正主張根本取消憲法草案第十七條，該條內容是說各盟員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蘇聯之權。我認爲這個修正是不正確的，因此大會是不應當採納的。蘇聯是各平等盟員共和國底自願的聯盟。如果把憲法內關於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一條取消，那就等於破壞這聯盟底自願的性質。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做呢？我認爲不可以，而且不應當這樣做。有人說，在蘇聯沒有一個共和國願意退出蘇聯，因此，第十七條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說在我們蘇聯並沒有一個共和國願意退出蘇聯，這當然是對的；但是絕對不能從此就得出結論，說我們不應該在憲法上，明文規定盟員共和國有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同樣在蘇聯也並沒有那個盟員共和國願意壓迫另一個盟員共和國的事。但絕對不能從此就得出結論，說應當把蘇聯憲法裏關於盟員共和國有平等權利一條取消。

(三) 再則，有人提議在憲法草案第二章內，另外加上一條，說自治的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在其經濟和文化發展到相當水平時，得改組爲盟員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能否採納這一提議呢？我認爲是不應該採納的。這一提議，不僅牠的內容方面是錯誤的，而且牠所持的理由也是錯誤的。把自治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是不能以該共和國底經濟和文化發展程度做理由的：同樣，把某個共和國留在自治共和國之列，也是不能以該共和國底經濟和文化落後做理由。如果以此做理由，那就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列寧主義的態度。例如韃靼共和國，仍爲自治共和國，而卡查赫共和國，却要改爲盟員共和國，但這還不是說，從文化經濟發展的觀點上看來，卡查赫共和國高於韃靼共和國。實際情形則恰恰相反。同樣，例如，關於窩瓦河流域的日耳曼人自治共和國和基爾吉茲盟員共和國，也可以這樣講，就文化經濟關係說來，前者高於後者，可是前者則仍爲自治共和國。

究竟要根據那一些標誌，才能把自治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呢？

這種標誌有三。

第一，就是一定要這個共和國是邊疆的，並非四週皆爲蘇聯領土所包圍的共和

國。爲什麼？因爲既然盟員國有自由退出蘇聯之權利，那麼這一個要改爲盟員共和國的共和國，就必須要有可能在邏輯上和實際上提出退出蘇聯的問題。而提出這樣的問題，却只有那與某一外國相毗連的共和國，也就是說，並非四週皆爲蘇聯領土所包圍的共和國，才有可能。自然，在我們蘇聯，並沒有那一共和國會在實際上提出退出蘇聯的問題。但是，既然盟員共和國有退出蘇聯的權利，那麼，就必須使這種權利不致變成空洞的和無意義的紙上空文。例如，就拿巴什基爾共和國或韃靼共和國來說罷。假定這兩個自治共和國已改爲盟員共和國。那麼，試問他們能夠在邏輯上，在實際上提出退出蘇聯的問題嗎？是不能夠的。爲什麼？因爲他們四週都被蘇聯各共和國和自治省所包圍，因此，實際上，他們就是要退出蘇聯，也是無處可退的。（全場大笑，鼓掌）因此，要把這些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那是不正確的。

第二，就是一定要這一民族，在用牠的名稱命名的蘇維埃共和國裏的人口內，佔着集居的大多數。例如拿克里姆自治共和國來說罷。牠雖然是一個邊疆的共和

國，但是克里姆的鞑靼人，在該自治共和國內並不佔大多數，相反的，——他們只佔少數。因此，要把克里姆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也是不正確的，不合邏輯的。

第三，就是一定要這個共和國按人口數量說來，不是一個太小的共和國，比方說吧，牠的人口至少不應在百萬以下，而是在百萬以上。爲什麼？因爲，如果以爲一個人口很少和軍隊不多的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能夠維持其獨立國家的地位，那就想錯了。帝國主義的強盜，會把這個共和國生吞活剝，這難道還能有什麼懷疑的嗎？

我想，如果沒有具備上述三種客觀的標誌，在現在的歷史時期中，提出將這個或那個自治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的問題，是不正確的。

（四）再其次，有人提議，把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及二十九等條內關於各盟員共和國屬下各省和各邊區之行政區域劃分的詳細記載一概刪去。我想，這種提議同樣是不能採納的。在我們蘇聯，有些人非常樂意和孜孜不倦地隨便變更各省各邊區的界線，以致在工作中造成一種混亂

而無把握的心理。憲法草案正是給這種人以限制。而這非常之好，因為在這個問題上，以及在許多其他問題上，我們都要有富有把握的自信的空氣，都要有穩定而明確的精神。

(五)第五個修正，是與第三十三條有關的。這個修正，認定建立兩院制是不適當的，並提議取消民族蘇維埃。我認爲這種修正也是不正確的。如果蘇聯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那麼，一院制是會優於兩院制的。可是蘇聯，並不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大家都知道，蘇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我們有一個最高機關，不分民族而代表蘇聯一切勞動羣衆共同的利益。這是聯盟蘇維埃。但是蘇聯各民族，除共同的利益以外，還有與其民族特點有關係的單獨的特殊利益。可不可以忽視這些特殊的利益呢？是不可以的。是否需要一個特別的最高機關，來恰恰反映這種特殊的利益呢？毫無條件是需要的。沒有這樣的機關，便無法管理像蘇聯這樣多民族的國家，這是毫無疑義的。這樣的機關，就是第二院，就是蘇聯民族蘇維埃。

人們往往藉口說歐美各國國會制度的歷史，藉口說那些國家兩院制僅只表露了

許多缺點，第二院照例都是變爲反動的中心，變爲阻礙運動前進的障礙。所有這一切都是對的。但是這些現象之所以發生，是因爲在這些國家裏，兩院之間是不平等的。大家都知道，第二院比第一院常有較大的權利，而且，第二院的議員照例都不是用民主手續所選出，而往往是由上面任意指派的。無疑的，如果兩院之間，實行平權，第二院也如同第一院一樣，依民主手續而產生，那就不會有這樣的缺點了。

(六)其次有人給憲法草案提出補充，認爲應規定兩院代表有同樣的名額。我想，這個提議是可以採納的。據我看來，這個提議有明顯的政治上的優點，因爲更加重着表示兩院的平等。

(七)再其次，有人給憲法草案提出補充，說民族蘇維埃代表的選舉，也應當如同聯盟蘇維埃一樣，採用直接選舉的辦法。我想，這個提議也是可以採納的。不錯，在選舉時，這會發生一些技術上的困難。但是，這個提議，定能給予很大的政治的利益，因爲，牠一定會提高民族蘇維埃底威信。

(八)又其次，是對於第四十條的補充。這個補充，提議賦予最高蘇維埃主席

團以頒佈臨時法律之權。我認爲這個補充，是不正確的，大會是不應當採納的。不是由一個機關，而是由許多機關實行立法的情形，我們應當剷除了。這種情形是與法律固定性的原則相抵觸的。而且正是現時我們比任何時候都需要法律的固定性。蘇聯的立法權，只應當由一個機關，即最高蘇維埃行使之。

（九）再其次，則是對於憲法草案第四十八條的補充。根據這一補充，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之主席，不是由蘇聯最高蘇維埃選出，而由全國人民選出。我認爲這一補充是不正確的，因爲牠與我們憲法底精神不相符合。照我們憲法制度，在蘇聯不應有由全民選舉的，與最高蘇維埃並列，並能與最高蘇維埃對立的個人總統。蘇聯的總統是集體的——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連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主席也在內，這一主席團，並不由全民選出，而由最高蘇維埃選出，並應向最高蘇維埃報告工作和對牠負責。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最高機關這樣的結構，是最民主的，是能夠保障國家不致發生不幸的偶然事件的。

（十）再其次，是對於同一條，即第四十八條的修正。這一修正的內容如下：

將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副主席增至十一人，以便每一盟員共和國各有副主席一人。我想這個修正，是可以採納的，因為，這可以改善我們的事業，而且只會鞏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威信。

（十一）再其次，是對於第七十七條的修正。這一修正，要求組織新的蘇聯人民委員會——國防工業人民委員會。我認爲這一修正，同樣應該採納的（鼓掌），因爲分出我們的國防工業，並建立相當的人民委員會的組織底時機是已經成熟了。我覺得，這對於我們的國防事業只有好處。

（十二）再其次，是關於憲法草案第一百二十四條的修正。這一修正，要求修改該項憲法條文，規定禁止宗教儀式的舉行。我想，這種修正是應當拒絕的，因爲牠不符合我們憲法底精神。

（十三）最後，還有一個修正。這個提案，具有相當重要性。這就是關於憲法草案第一百三十五條的修正。該提案主張剝奪傳教師，過去的白黨份子，以及所有一切過時的人和不參加有益於社會的勞動的人底選舉權，或無論如何，對於這種人

的選舉權，都應加以限制，只能給予他們以選舉權，而無被選舉權。我認爲這種修正，同樣是應當拒絕的。蘇維埃政權以前之剝奪不勞動的人和剝削份子的選舉權，並不是永遠不變的，而是臨時的，在一定時期以內的。曾有過一個時候，這些份子進行了反對人民的公開戰爭，反抗了蘇維埃的法律。蘇維埃政權爲回答他們這種反抗行動起見，才頒佈了關於剝奪他們的選舉權的蘇維埃法律。自那時起到現在，已經過不少的時間了。在這一時期中，我們已經把剝削階級消滅了，而蘇維埃政權，已變成不可戰勝的力量。難道還沒有到審改這種法律的時候嗎？我認爲是已經到了。有人說，這個有危險，這會使敵視蘇維埃政權的份子，某些過去的白黨份子，富農，神父等等，鑽進國家最高機關來。但是，這裏究竟有什麼可怕呢？你怕狼嗎，那你就不要到樹林裏去。（全場歡動，熱烈鼓掌）。第一，並不是所有過去的富農，白黨或神父，都敵視蘇維埃政權的。第二，如果，卽令在某些地方，民衆竟選上了敵視蘇維埃政權的份子，那這就是說，我們的宣傳工作，做得太壞了，我們的丟臉是完全應該的，而倘若我們的宣傳工作，真正是以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去進

行，那麼，民衆是不會容許這些敵視蘇維埃政權的份子，混進自己的最高機關的。這就是說，應當工作，而不應當叫苦（熱烈鼓掌）；應當工作，而不應當等待以行政上的命令方式，把一切都準備妥當。列寧還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就已說過，在不遠的將來，蘇維埃政權就會認為實行沒有任何限制的普選權，是有益處的。請你們注意：沒有任何限制這幾個字。當他說這話的時候，外國的武裝干涉還未被消滅，而我們的工業和農業還處在極壞的狀態哩。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十七年了。同志們，難道還沒有到實行列寧這種指示的時候嗎？我認為是到了。

下面就是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在其著作——蘇俄共產黨綱草案中所說的話。請讓我讀一下：

「爲避免由一時的歷史上的需要，得出不正確的普遍的結論起見，蘇俄共產黨，應向勞動羣衆解釋，一部份公民之被剝奪選舉權，在蘇聯絕對不像在大多數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內所有的現象一樣，在那些國家內，把某一部份公民，宣佈爲終身被褫奪公民權的人，而在蘇維埃國家內，剝奪選舉權的辦法，只是涉及剝削者，只是涉及那些不顧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之基本法律，而進行頑強的反抗，以謀維持自己的剝削者地位，維持資本主義關係的份子。因此，一方面，在蘇維埃共和國內，因社會主義之日趨鞏固，以及因那些在客觀上有可能維持其剝削者地位，或維持資本主義關係的份子，日益減少的緣故，被剝奪選舉權者之百分數，亦自然日見減少。現時在俄國，這種百分數，恐怕不會多於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在另一方面，在最不遠的將來，因外國武裝干涉之停止，以及剝奪剝削者的事業之完成，在某種條件之下，是可以造成這樣一種局面，那時無產階級國家的政權，將取另外一種鎮壓剝削者反抗行動的方法，而實行沒有任何限制的普選權。」（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九十四頁，一九三五年黨出版社出版）

我以為問題是很清楚了。

關於對蘇聯憲法草案的修正和補充，情形就是如此。

六 蘇聯新憲法的意義

按照繼續幾及五月之久的全民討論之結果，可以推想到這個憲法草案，是會被

本屆大會贊同的。（熱烈鼓掌，歡呼，全場起立）

再經過幾天，蘇聯就有根據廣泛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原則所製定的新的社會主義的憲法了。

這將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文件。他以簡單明瞭的語氣，幾乎是以記錄的體裁，來說明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事實；來說明蘇聯勞動羣衆已擺脫資本主義奴役制度的事實；來說明蘇聯廣泛的、最澈底的民主制勝利的事實。

這一個文件，證明資本主義國家裏千百萬高尚的人們所曾經幻想的以及繼續在幻想的理想，已在蘇聯實現了。（熱烈鼓掌）

這一個文件，證明凡在蘇聯所已實現的，在其他國家裏，也是完全能夠實現的。（熱烈鼓掌）

由此可見，蘇聯新憲法的國際意義，是無限偉大的。

現在，正當法西斯主義的濁流想污辱工人階級之社會主義的運動，污辱文明世界最優秀人士之民主主義的趨向的時候，蘇聯的新憲法，就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公

訴書，牠說明社會主義與民主制度是不可戰勝的。（鼓掌）蘇聯新憲法對於所有那些現在進行反法西斯野蠻暴行的鬥爭的人們，就是一種精神上的鼓舞，一種實際上的幫助。（熱烈鼓掌）

對於蘇聯各族人民，蘇聯新憲法則具有更其偉大的意義。如果蘇聯新憲法，對於資本主義各國人民將是行動的綱領，那末，對於蘇聯各族人民就是他們奮鬥的總結，他們在爲人類解放而奮鬥的戰線上勝利的總結。由於已經走過的鬥爭道路和忍受艱辛的結果，現在得到這一個說明自己勝利果實的憲法，是如何覺得爽快而快樂呵。由此知道我們的人究竟爲着什麼而作了堅忍的奮鬥，以及他們怎樣獲得了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是如何爽快而快樂呵。由此知道我們的人所流的許多血，原來並沒有白流，而是給了應有的結果，是如何爽快而快樂呵（長時間的鼓掌）。這就在精神上，鼓舞着我們的工人階級，我們的農民，我們的勞動智識份子。這就推動他們向前邁進，並提高其合理的自豪精神。這就鞏固他們對自己力量的信心，並動員他們去進行新的鬥爭來奪取共產主義的新的勝利。

（熱烈歡呼，全場起立，「嗚拉」之聲如雷，一致高呼「斯大林同志萬歲」！全體代表起立唱「國際歌」。國際歌唱後，重行歡呼，高喊「烏拉」！「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同志萬歲」！）

幹部決定一切

同志們！我們最近在建設與領導方面，都獲得了偉大的成就，這是不能否認的。因此我們當中，就有人常常談着，我們管理者與領導者之如何優越，幾乎一切的成就，都得歸功與他們，這當然是不正確的，這不僅是領導方面的單獨問題，但我們今天還不必討論這個，我們願意說一些幹部的話，是關於一般的幹部，特別是紅軍的幹部。

你們都知道，我們從過去祇承受到一個技術落後和貧困的國家，一個經過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和三年的國內戰爭的國家，一個半識字低度技術，在小農經營的世界裏祇有零碎的小工業的國家。

我們偉大的任務，就是要從中世紀與愚蠢的途徑，奔向現代工業與機械化農業途徑，你們已經看到這是一種嚴重而困難的任務，我們在最短期間要能解決這一任

務，并鞏固我們國內的社會主義：如果不解決他，那我們這技術薄弱與文化落後的國家，就要失去牠的獨立而成爲帝國主義強國手中之一種玩物了。

我們國家在這時會經過一個可怕的技術缺乏的時期。我們沒有工業機器，我們沒有農業機器，我們沒有運輸機器，甚至沒有初步的技術基礎，要沒有這一基礎，我們國家的工業改造，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一點建設這一基礎之前提條件。

第一等的工業，要建設起來。這一工業應走之方向，應該是不但使工業本身有技術的改造，並且使我們的農業與輸運也要這樣改造，這使我們的各種重要經濟方面，皆要受到犧牲，我們要在食品，學校，製造等各方面，盡力節省費用，以累積創立工業基礎之必需條件。

我們沒有其他方法來消滅我們技術方面之貧困，這是列寧告訴我們的，我們必須依照他的步驟。

這樣一種偉大而艱苦的任務，其不能迅速而完備地成功，也是很顯然的，這些工作之成績，只有經過幾年之後，才看得到。我們自己一定要用強烈的熱血布爾什

維克的堅定性与頑強性，才能克服這一類的缺陷，並堅決前進以達到我們偉大的目的，所以我們當中，就不能容許動搖或不堅定的傾向。

我們知道我們正是用這種方法發動了我們的鬥爭。

但並不是每個同志都有充分的熱血，堅忍與毅力的。我們同志當中，也有人在第一次困難時，就要求退却的。俗話說：掉頭看的人，就該碰着石頭，這自然是對的。可是人們是有記憶的，在考查我們工作成績的時候，人們就會自動的想起過去的，有些同志被我們面前的困難嚇倒了，便要求黨向後倒退，他們說：『工業化集體化、機器、電耕機、聯合機、汽車，我們要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呢？最好給我們一些紡織物，最好多買一些生產的原料，一般的消費品，並給我們民衆以更多的這一些使民衆生活，舒適的小事物，在我們這樣落後的情況中，建立第一等工業，是一種危險的空夢。』

自然我們能用三百萬盧布來做國外貿易，輸入原料，並增加生產大衆的消費品，這也是一種計劃。但在這種計劃之下，我們就不會有五金工業，不會有機器製

造，不會有耕種機、汽車、飛機、以及戰車了，我們就要赤手空拳站在我們國外敵人的前面了，那我們就要沒滅我們國內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了，那我們早已做了國內外資產階級之囚犯了。

很明顯的，我們要在這兩個計劃中選擇一個走，向使社會主義失敗的退却的計劃，和已經引導我們走向國內社會主義勝利的進攻的計劃，我們選擇了進攻的計劃，並進向列寧所指示的道路，撇開了那些只能看見腳面前而不能望到我們國家直接前途，社會主義之前途的同志。

並且這些同志，不但常常對我們下批評並消極抵抗，他們用反中央委員的黨內反對來威脅我們。不但這樣，他們還用槍彈來威脅我們當中的同志。很明顯的，他們以為用此可以嚇退我們，並逼迫我們離開列寧主義的道路，這些人們根本忘記了布爾什維克黨人，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忘記了布爾什維克黨人不是困難和恐嚇所能嚇退了的，他們忘記了偉大的列寧已鍛鍊我們。我們偉大的領袖，我們的導師，我們的父親列寧，他在鬥爭中不知道恐懼，並且也不承認什麼是恐懼。他們忘記了

「布爾什維克」黨人，儘管敵人愈猖狂，黨內反對派愈橫烈，而他也就愈加團結，從事新的鬥爭，並勇猛的向前進展。

不消說；我們沒有離開列寧主義的道路，我們不但已在這一道路上穩定地站住了，並更加勇猛的前進，掃除了一切困難。不錯，我們同時也對我們這些謬誤的同志加以打擊。但除此也就沒有其他的辦法，我必須也承認我自己也會這樣做過。

那麼同志們！我們很自信的走上工業化與集體化的道路，現在這條路可以說已經走過了，任何人都承認我們已有一種强有力的第一等工業，強有力而機械化的農業，向上發展的運輸，一種有組織而設備精良的紅軍。

這是說：我們大體上已誇過了技術上的貧困時期，而走入一個新的時間，我還要說這一個貧困時期，就是能駕御技術的工人幹部之缺少，我們有工廠，製造廠，集體與國家農場，這是事實。我們有各種經營的技術，但我們沒有充分經驗的人才，我們從技術中找不出人才，雖然這技術中應該養成最低限度的人才。

過去我們常說：『技術決定一切』這一口號幫助我們消滅了技術上的貧困，並

建立了極廣大的技術基礎。爲要使技術運用起來，便要有能駕御技術的人員，便要有能完全使用技術的幹部。技術而沒有能駕御他的人員，那就是死的技術，由這樣人員所駕御的技術，能夠並應該造成神奇的功績。如果我們第一等工廠與作廠中，我們國有農場與集體農場中，我們的紅軍中，能有充分的駕御技術的人員，那我們國家就能從這技術中獲得比現在還大三倍或四倍的利益，現在我們必須集中精力於發展男女人才，發展能駕御技術的工人幹部。這就是何以舊的口號技術決定一切，祇反映着已過去的時期……現在我們拿另外一個口號來代替他，就是『幹部決定一切』，這是現在的主要事情。

我們能說我們大家已認識這個新口號之偉大意義，並完全了解了嗎？我們不能這樣說。如果大家也能這樣，那我們也不應該對於實際上我們時常觀察的男女，幹部，工人，有這一種不正確的態度，『幹部決定一切』這一口號就要我們的領導者對於我們的工人要加以最大的注意，『大的和小的』事情，不管他們在那一方面工作，小心的教育他們，並幫助他們的一切需要，激勉他們完成第一次的成就，推動

他們……」。同時我們還有許多人對於工人行着無心肝的，官僚主義的，以及簡直不可原諒的態度。這是說他們并不研究男女工人的情況，就是研究了，也還是把工人當作棋盤中的小卒一樣看待。看我們已經知道必須寶貴機器，並報告我們工廠與作場中有多少技術人員。可是我毫不知道究竟那裏有這熱忱的人，報告每一時期中有多少人已受教育，以及我們如何幫助他們發展，使其和工作密切聯繫起來。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原因是，我們不曾了解尊重民衆，尊重工人與幹部。

我記得西伯利亞有一件事情，我曾在這裏逃亡過幾年。有一年春天，江河都已氾濫，有二十人到河裏去，想把隨水溜捲去的舉本木料取回來。在晚間他們已回村，但當中少了一個同志。失蹤者究在何處？爲了回答這問題，他們却很不關心的說：「他還在後面呢？」我就問：「你們說在後面是什麼意思？」他們同樣不關心的回答：「你要詳問的話，那就是他已經淹死了。」同時他們當中有一個跑來跑去，說他必須要打水給母馬喝。當我看他們不應視牲畜重於人命，他們當中一人回答道，其餘的人也完全同意：「我們爲什麼要悲傷一個人命：我們還可以再生人

類，但馬……我們就要設法養活一個母馬。」這裏你們可以有一個例子，這意義雖小，但是很特色的。我恐怕這種對於人類，對於幹部毫不關心的態度，在我們當中，有些人還是有的，並且他們不知道如何尊重人類，他們是我們說的西伯利亞那種人和人的特別關係之殘餘的繼承者。

所以同志們：如果我們希望勝利的克服了人類方面的貧困，如果我們希望我們國家有充分的能運用技術的幹部人才，那麼我們就要知道尊重幹部，並尊重每一能推進我們使命的工人。最後，我們必須了解世界上所有一切寶貴的資本，最寶貴而最能決定一切的東西，就是男女幹部。我們必須了解在我們目前情況之下，『幹部決定一切』。如果我們在工業，農業、運輸、與軍隊，只要有充分的好幹部，我們的國家，便成爲無敵的國家了，如果我們沒有這些幹部，那我們的兩隻腿，將變成瘋癱了。

同志們，你們在學校裏畢業了，並在這裏學到初次的鍛鍊。但學校也只是預備的階段，幹部之真正的鍛鍊，是要求之於校外的靈活工作，在克服各種困難的過程

中。

你們記住：同志們！只有那些不怕困難，不躲避困難，反而能迎接困難，而克服並消滅了困難的幹部，才是好的幹部啊。如果我們的紅軍中，能有充分的真正的受過鍛鍊的幹部，那我們紅軍，也就成爲無敵的了！

我祝你們健康，同志們！

（狂熱的鼓掌，全體起立向斯大林同志歡呼致敬。）

斯太哈諾夫運動的歷史意義及其今後的任務

——在第一次全聯那斯太哈諾夫運動大會上的演講——

同志們！關於斯太哈諾夫運動，大會上已經講得那麼多，並且講得那麼恰當，留下來給我說的，實在已經很少了，可是既然要我講，我就應該說幾句。

斯太哈諾夫運動，不能看做男女勞動者的普通運動。而是斯太哈諾夫運動構成了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史上最光榮的一頁的男女勞動者的運動！

一 斯太哈諾夫運動的意義是什麼？

從開始時，斯太哈諾夫運動便含有一種事實，即它是社會競賽之新的高潮的表現。新的和較高階段的表現。為什麼是新的，較高的階段呢？因為作為社會主義競賽之一表現的斯太哈諾夫運動，在順利的意義上，和社會主義競賽的舊階段不同！

在過去大約三年以前，社會主義競賽在經歷其第一階段時，並沒有必然的和新技术關係。沒有新的，較高的技術，斯太哈諾夫運動將成爲不可想像的了！

在我們的面前，是具斯太哈諾夫同志的典型的人，布西金（Busyysin），斯梅大寧（Smetanin），克里瓦諾斯（Krivanos），普格寧（Pegonin），維諾格拉多夫（Vinogradov）以及許多其他的人，新的人民，已完全精於他們的工作技術的男女勞動者，都已在斯太哈諾夫運動中成爲熟練的勞動者，而且更能向前推進技術。三年以前，我們沒有這種人民，或者說連很少的都幾乎沒有。這些人民都是新的和特殊的典型人物！

再者，斯太哈諾夫運動，是男女勞動者把牠作爲目的，以超越現時的技術水準，以超越現時所有的工作容量，以超越現有的生產計劃和不均衡的運動。要超越這些——因爲這些水準對於我們的時代，對於我們的新的男女，已經成爲太舊的了！這一運動打破了關於技術的舊見解，打破了舊的技術水準，舊的工作容量。舊的生產計劃！并要求較高的新的技術，工作容量和生產計劃的創造。因此在我們的

工業界提出實行革命。正因為這個緣故，斯太哈諾夫運動在其本質上是有深奧的革命性的。

在大會中已經說過了的，作為新的，較高的技術水準之表現的斯太哈諾夫運動，代表那唯有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所能提供的，較高的勞動生產力的模範。這是完全正確的。何以資本主義能夠戰敗並克服封建主義呢？因為他創造了較高的勞動生產力的水準，因為他給予社會以獲得在封建制度下多得不可比較的生產物的可能性，因為他增進布爾喬亞社會的財富。何以社會主義必須而且一定不可避免地戰勝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呢？因為它能夠提供比資本主義制度較好的工作模範和榜樣，較高的勞動生產力，因為它能夠提供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更多的生產力，並會使更加富裕！

有人相信社會主義能夠在貧乏的生活水準的基礎上，由人民之一定的物質平等而團結。這是下等的布爾喬亞觀念！

實際上，社會主義唯有在高度發展的勞動生產力——比資本主義制度下較高的

勞動生產力的生產基礎上，在豐足的生產物和豐足的各种消費品的基礎上，在富裕的和全部社會成員的文化生活的基礎上才能夠致勝。然而爲使社會能夠達到這目的，並使我們的蘇維埃社會成爲最富裕的，那麼在我們的國內便須有這樣的勞動生產力，才能夠超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內的勞動生產力；缺乏這一點，豐富的生產物和豐富的各種消費品便不可想像。

斯太哈諾夫運動的意義，含有一種事實，即它已打破，那已不適用了的舊技術水準，并在許多場合之下，超越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生產力的運動，從而展開了在我們國內社會主義愈加堅實的實際可能性，展開了將我們的國家改變成最好的國家的可能性。然而尙不盡於此，斯太哈諾夫運動的意義更含有一種事實。即它準備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各種條件。

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在社會主義中各項工作相當於工作者的能力；而所領受的消費品不相當於工作者的需要，祇相當於它爲社會而從事的工作。這意味着勞動階級的文化和技術水平尙未提高，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勞動

生產力尚未提高足以保證豐足的消費品，其結果社會迫不得已分配消費品，不相當於社會成員的需要，祇相當於它們為社會而從事的工作。

共產主義代表更高的發展階段。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各項工作相當於工作者的能力，而所領受消費品不相當於他所從事的工作，却是相當於他所有的需要，好像文化發達的人一樣。這意味着勞動階級的文化 and 技術水平已經提高到足以鑿除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矛盾的基礎。當勞動生產力已提高到足以保證消費品的完全豐足的這樣一個高的水平，由是而能夠使社會分配這些物品相當於其成員的需要時，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矛盾已不存在了。

有人相信能夠在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智力勞動的實踐者——的文化和技術水平，降低到中等資格的工人水平的這一基礎上，由於體力勞動者和智力勞動者之一定的文化和技術的劃一，而達到廢除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矛盾。這是絕對不正確的！

唯有下級布爾喬亞的預言家會用這一種方法去理解共產主義。實際上唯有把勞

動階級的文化 and 技術水平提高到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水平這一基礎上，方能達到消滅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矛盾。

如以為這種提高不能實行，那是可笑的！在蘇維埃制度的各種條件之下，國家的生產力已從資本主義的鐐銬中解放出來，勞動已從剝削者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勞動階級已取得政權，勞動階級的後嗣已能有一切可能為自已提供適當的技術教育，這種提高是完全可能的！

唯有這麼一個勞動階級的文化 and 技術的高潮，足以沖除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矛盾的基礎。足以保證那為遂行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的高度勞動生產力和豐足的消費品，這是沒有理由可以懷疑的。

在這一點上，斯太哈諾夫運動在我們國家勞動階級的這一文化和技術的高潮的第一步開始（仍是脆弱的，它實在祇不過是開始）包容於其自身之內的意義上，它是值得注意的。而且親切的看一看斯太哈諾夫的同志們（“Staharov Comrades”，意指參加斯太哈諾夫運動，或使用斯太哈諾夫技術水平的同志們），他們是怎樣的

人呢？他們大多是男女勞動者，少年或中年，是具有健全的技術準備的有教化的人。在工作上建立準確和迅速的榜樣，在他們的工作中能夠珍惜時間的要素，已不僅學習用分而且用秒來計算時刻的人民，他們大多數是經過所謂技術上最低限度的考驗，並仍在繼續他們的技術訓練。

他們都從工程師，技術人員和事務管理員的守舊主義和拘執中解放出來。他們勇毅前進，破壞不合時的技術水準而創造新的較高的水準。

他們正在矯正我們的工業領袖所提出的產額預算和經濟計劃，不斷的在矯正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時常教給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督促前進，因為他們已是完全精於他們的工作技術的勞動者，並知道如何從技術中得到所能得到的最高限度。今日雖祇有很少數的斯太哈諾夫的人民（“Stakhanov people”意指參加斯太哈諾夫運動，或使用斯太哈諾夫技術水準的人們），但是誰能懷疑明日將有十倍那麼多呢？那末，斯太哈諾夫運動是我們工業的前途的具體表現，他內中孕育着勞動階級之將來的文化和技術高潮的胚種，他為我們開闢了一條為唯一能夠到達勞動生產力高度水

準的道路，這一水準是爲要遂行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與廢除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矛盾所必需，那不是明明白白了嗎？

同志們：這是斯太哈諾夫運動在我們社會建設上的意義。

當斯太哈諾夫和布西金開始破壞舊的技術水準時，他們是否想及斯達哈諾夫運動的這一可驚的意義呢？自然他們未曾想及，他們有自己的意願——在他們作業的產額中努力征服其落後性，努力超過經濟計劃。然而爲到達這一目的，他們破壞舊的技術水平，并使高的勞動生產力發達，以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生產力，可是如不相信斯太哈諾夫運動的偉大的歷史意義，這一境况便能滅除到很微小，那便說謊了。

人家可以說，在一九〇五年，同樣的工人在我們國家內第一次組織工人代表的蘇維埃。那實在是他們不會想到工人代表的蘇維埃，是供給作社會主義社會秩序的基礎的，工人們只是爲創立工人代表蘇維埃保護自己，反抗沙皇主義，反抗布爾喬亞。然而這一情形毫不否定這無可懷疑的事實，即一九〇五年列寧格勒和莫斯科

工人代表蘇維埃運動，結局必然擊破資本主義及建設地球上六分之一的社會主義的勝利。

二 斯太哈諾夫運動的根源

我們現在正當着斯太哈諾夫運動的誕生發端的時候，指出斯太哈諾夫運動的幾個特徵是必要的。

第一，這一運動，同樣像其他主要運動一樣，自然而然從下面發生，在作業的指揮位置上並沒有加任何壓力，這件事實是多麼明顯。不僅如此，而且這一運動的生出和開始發展至一定的範圍，是為反抗作業的指揮的意志，甚至於是鬥爭的！莫洛托夫同志已告知我們一件憂鬱煩惱的事，便是阿爾昌其爾鋸木工廠工人，穆卒斯基同志，當她不願經濟組織和指揮者而秘密實行新的，較高技術水準時被拘留起來。斯太哈諾夫的運氣也不會稍好，因為他在努力向前推進這一工作當中，為了他的改革，他不僅反對好些行政部的官吏，甚至反抗好些嘲笑他的工人，以護衛自

己，而且鼓動別人反抗。至於布西金，那是大家知道的，在她將要以喪失廠內的職業來做他的『改革』的代價時，幸賴部長梭科林科的干涉，得以留在廠內。

如你們所見的一樣，假如我們的工廠指揮厲行某種限量的權力，那便不會推進斯太哈諾夫運動，寧只是妨礙他。結果斯太哈諾夫運動真是一個從下面興起發展的運動。而且很明顯的，因為他自然而然的興起，從下面出現，它才是今日最有力的無敵的運動。

關於斯太哈諾夫運動之另一特徵再說幾句。這一特徵在於斯太哈諾夫運動不是慢慢地而是以一種無比的速度，像一種狂風傳播至我們聯邦似地，這一運動如何開始的呢？斯太哈諾夫建立起至少是五——六倍的煤礦生產的技術水準。布西金和斯梅大寧也一樣，一人在工程業，一人在鞋襪業。報紙記載這些事之後，斯太哈諾夫運動的洪流突然瀰漫全國。什麼事情發生了呢？斯太哈諾夫運動散布的迅速性從何而來呢？斯太哈諾夫和布西金，是不是或者在蘇聯各區域各地方有很多僚屬的大組織家呢？不，自然不是。抑或斯太哈諾夫和布西金，是需要我們的工業界大露頭

角，需要讓他們自己在全國傳播斯太哈諾夫運動的火星嗎？這也不確實。你們在這裏已看見斯太哈諾夫和布西金。他們在會議中發言，他們是誠樸謙謹的人，並不希求做特出的人物得到遍滿蘇聯的聲譽。實在，我覺得他們對於那在我們國內發達了的，違反他們的宿望的這一運動的擴展，是有八分驚訝的。雖則斯太哈諾夫和布西金所擦燃了的火柴是細微的，但以足使一切事物着火了，那意味着斯太哈諾夫運動是一件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唯有一種完全成熟了的運動才需要一種爲自由發展所必需的毅力，也唯有這麼一個運動能夠那樣迅速傳播，像雪溶化那樣迅速長生！

斯太哈諾夫運動，已證明爲完全成熟了的這一事，怎樣解釋呢？這麼一個迅速的發展怎樣出現呢？那至少有四點原因！

一，斯太哈諾夫運動，第一，是以工人物質地位的澈底改善爲基礎。物質地位更適於生活了；生活也更舒快了。當你過着舒快的生活時，工作更進行得頂快。從而發生了產額的高度水準，從而產生了英雄的男女勞動者。在那裏便存在着斯太哈諾夫運動的根源。

假如我們的工業中存有危機，有成爲勞動階級之災禍的失業，人民過着壞的生活，他們的生活陰暗痛苦，那就不會有斯太哈諾夫運動！（鼓掌歡呼）我們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是世界上唯一的革命，已經不能夠向人民顯示其政治的效果，而且顯示其物質的效果了。所有的工人革命中，我們只知道一個獲得某種限度的政權；就是巴黎公社。但它不能經歷長久，實在，巴黎公社是企圖打破資本主義的鐐銬，然而不能成功，並且能顯示人民以革命的物質效果的恩澤也還很少。唯有我們的革命，不僅打破資本主義的鐐銬而給人民以自由，甚且再給與人民物質條件以求豐滿的生活中完成了。這中間存在着我們革命的強力性。自然，驅逐資本家地主沙皇的軍警，奪得政權和自由，都是快意的。然而不幸，自由不是可以單獨長久滿足的，假如缺乏麵包牛油脂肪和織物，假如住居很壞，人便不能單單有什麼自由。同志們在孤立的自由上過活是十分困難的！（鼓掌，歡呼）如要能夠過好的快樂的生活，必須依物質品料的優越來補充政治自由的優越。我們革命的特徵在於不僅給予人民以自由，甚至給人民以物質品料和繁榮的可能性，以及文化生活。所以我們的

生活是快樂的，在這一基礎上斯太哈諾夫運動便生長起來。

二，斯太哈諾夫運動的第二個根源在於我們的工業界沒有剝削者。我們的人民不是爲剝削者工作，以使怠惰者致富，都是爲着自己，爲着他們的階級，爲着他們自己的蘇維埃社會！在這社會中勞動階級的最好的人民，是能取得政權的。從而在我們國內，有社會意義的工作，是一件光榮有名譽的事。

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具有私有和個人的性質。假如你工作的多，那麼，便領受的多，你能夠做什麼便過什麼的生活，沒有誰知道你，也沒有人需要知道。你爲資本家工作使他們富裕。

要怎樣才能不同呢？他們正爲那個理由，爲要使剝削致富而僱用你，假如你不滿意，便淪入失業的隊伍而自己坐食。資本家會找到別的更會服從的人。這是在資本主義下人類勞動所以沒有高的代價的原因。在這種狀況之下，不能有斯太哈諾夫運動是十分明白的。在蘇維埃制度下便不同了，在這裏工作的人被人尊重，他不是爲着剝削者工作，而是爲着他自己，爲着他的階級，他的社會。

在這裏作工的人，不會覺得他自己沉悶和孤寂，相反地，在我們國內，作工的人覺得他是國家的自由公民，正當當是一位大衆人物。而且假如他工作得好，把他一切所能的貢獻給社會，他便是一位勞動的英雄而滿載榮譽。斯太哈諾夫運動僅在這種條之下才能產生，那是分明的。

三，斯太哈諾夫運動的第三個根源，可以視爲我們國內新技術的存在。

斯太哈諾夫運動是一開端便和新技術聯繫着的。沒有新技術、沒有新工場和新工廠，沒有新設備，我們的國內便不能產生斯太哈諾夫運動。沒有新技術，我們所能增加的技術水準一〇〇——二〇〇%——但不能再多。假如斯太哈諾夫運動的人民已經提高技術水準至五——六倍，那便意味着他們完全依靠新技術。與此相隨伴着的，我們國家的工業化，我們的工場和工廠的改造，新技術和設備的存在，也是產生這一斯太哈諾夫運動的一個原因。

四，然而僅有這種新技術還是不夠的，你可以有第一等的技術，第一等的工場與工廠，但假如沒有能夠精於這種技術的人民，那你的技術依然是技術，再沒有別

的東西，因為新技術之能產生效果，必須再有男人和女人，能夠站在技術前頭而向前推移它的男女勞動者隊伍。斯太哈諾夫運動的產生和長成，意味着在我們國內這種隊伍早已在男女勞動之中產生了。二年前黨曾說過，在建設新工場工廠和設備我們的事業當中，我們僅有做到一半的工夫。

黨那時曾說建設新事業的熱心，必須有精通工業的熱心以為補助，而且惟有這一方法，我們才能夠完成工作。很明顯的這二年中，這一年技術的獲得和新隊伍的產生已經出現了。我們自己國內，在這些條件之下，這種隊伍早已存在，現在是清清楚楚了。沒有這種隊伍，沒有這些男人和女人，便沒有斯太哈諾夫運動，也是清清楚楚了。在男女勞動者之中，獲得新技術的新人民，便是構成並促進斯太哈諾夫運動的力量。

這些便是產生和驅策斯太哈諾夫運動向前的諸條件。

三 新人民新技術水準

我說過斯太哈諾夫運動不是慢慢發展，而是向一種爆炸，像穿過堤堰的決口。很明顯地，它已克服若干障礙，有人阻梗它，有人抑制它，嘿！看哪！斯太哈諾夫運動集合他的力量，擊破這些障礙而泛濫全國了。

誰實際上阻礙這一運動呢？舊的技術水準和在這些水準之下的人民阻礙了這運動。九年前我們的工程師，技術人員和經濟領袖，建立了適應於我們的男女勞動者之技術的落後性的一定技術水準，迄今九年已經過去。在這時期當中，人民已經培植和獲得技術訓練了。然而技術水準仍是很低。這些水準現在已不復為我們的人民所使用，那是十分明白的。現在每個人都對現存的技術水準而怒吼。可是這些水準不是從天上跌下來的。不是在建立的時候便已奠定了。事情的真相是這樣的，現在當這些水準要廢置不用時，人民正以如是適合於今日的水準而企圖保護他。人民固執着我們的男女勞動者之技術的落後性，他們把自己朝向這一落後性，他們從這一落後性出發又在這一落後性上兒戲以終，假如這一落後性正在轉變為不合時的東西，那將怎麼樣呢？我們要真的把我們落後性作為偶像，神物而膜拜嗎？假如男

女勞動者已超過這一水準而進步並已獲得技術訓練，那將怎麼樣呢？假如舊的技術水準已不適用於現實，以及假如我們的男女勞動者已實實在在超過它五倍或十倍，那又將怎麼樣呢？或者我們在無論什麼時候，都要矢志於我們的落後性嗎？同志們，似乎不應該這樣。（全座大笑）或者讓我們男女勞動者永遠落後而我們却來假裝前進嗎？假如我們這樣冒充前進，則我以為不然。（全座大笑）困難在那裏呢？我們真的缺乏勇氣來打破我們的一部分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守舊主義，來破壞舊的傳統和水準，來為勞動階級的新勢力爭地位嗎？

人民說科學，說科學的事實，技術的參考書和教科書的論據否定了，斯太哈諾夫人民為求新的，較高的技術水準的要求。然而這裏我們所涉及的是什麼科學呢？科學的論據常為實踐和經驗所試驗。那一種科學不會與實踐和經驗相交連呢？假如科學是為某些守舊的同志們所代表的一樣，那麼為了人性緣故，它必很久以前就已消失了。科學之被稱為科學，是因為它不承認任何偶像，是因為它敢於動手抵抗那不可復用了的，舊的東西，是因為它以銳感的耳朵，聽取實踐和經驗的話的。假如

事情不是這樣，我們便沒有科學！例如我們老是將時間化費在舊制度的托勒密（托勒密是古代埃及的天文家，今用以代表非科學的天文家說）上，則我們便沒有天文家。我們若以創世紀自安，則我們便沒有生物家。再我們若以練術者之言的智慧自足，則我們便沒有化學。

爲了這一理由，我想信有意停落在斯太哈諾夫運動之後的我們的工程師技術人員和經濟領袖們一定好好地不再抱緊舊的技術水準，而是真正的，科學的糾正自己以適合於斯太哈諾夫水準（Stahanov Standards）。

人民一定說得對。但我們一般地要以怎樣的態度對待斯太哈諾夫水準呢？斯太哈諾夫水準是爲我們的工業所不可缺的呢？抑或有人可以完全不要任何水準而能處置事情呢？

有人說我們可以不再有技術水準的任何需要。同志們，那是錯誤的，不僅是錯誤，而且是愚蠢。計劃經濟缺乏完全是不可能。而且要把落後的大衆拉至前進的大衆的水平上，技術水準是必要的。技術水準是在生產中把環繞着勞動階級進步份子

的廣大的勞動大眾組織起來的制約力。結果我們需要技術水準，不過不是今日所存在的，而是較高的水準。另外有人說技術水準是必需的，但現在他已經是提高到爲斯太哈諾夫，布西金，維諾格拉多夫以及其他人們所達到了的水準。這同樣也不正確。這種水準不適用於現時，不適用於男女勞動者，在技術不會如斯太哈諾夫和布西金一樣受過很好的訓練，不能幹上這種水準，我們是要一種在某種限度上得中於現存的與斯太哈諾夫和布西金所達到的技術水準之間的技術水準。例如瑪麗亞德姆琴科 (Mayia demchenko)，她每百英畝 (hectore) 的甜菜收成五百倍的衡量。在烏克蘭，有人能使一生產成爲整個甜菜耕作的標準生產嗎？不，定不能。談及這件事尙是太早。瑪麗得姆琴科，生產收穫物也是每百英畝出五百倍的衡量。然若以烏克蘭甜菜的平均收成爲例，則這一年總計爲每百英畝一三〇——一三二倍的衡量。如你們所見，這不是少的差異。有人能爲甜菜的收成設定一個三百——四百倍的衡量的水準嗎？一切老練的人民說，現在沒有人能夠做出這麼一件事。很顯然的，烏克蘭，須有一個二百——二百五十倍的衡量以爲一九三二年的水準。這一水準并不

低，因爲那如能實行，一定能爲我們產出二倍於今年生產的糖。工業界也是一樣。斯太哈諾夫已顯然超過現存技術水準十倍甚至不只十倍。然而要這一成績作爲那些使用氣壓錐（Prennajeđrič）以工作的一切人們的技術水準，那便沒有理由了。很顯然的，任何人都必須設定一個在現存的與斯太哈諾夫同志所達到的技術水準之間的水準。

無論在任何場合之下，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即是現在的技術水準已不適合於現實，這些水準在我們工業界中落伍而爲障礙物。可是爲要避免我們的工業退步，這些水準必須爲新的和較高的技術水準所代替——新的人民，新的時代，新的技術水準。

四 今後的任務

從斯太哈諾夫運動的各種利害關係的觀點看來，什麼是我們今後的任務呢？爲使不致牽涉得太多細瑣的話，我們可以約束成兩個其次的任務。

第一個任務是幫助斯太哈諾夫的人民以更進一步發展斯太哈諾夫運動并把它推展到蘇聯的一切地方和區域。這是事情的方面，在另一方面非制止那存在於經濟領袖，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之間的各種要素不可。因為他們頑固地抱緊舊的，不願前進，而且有系統地阻礙斯太哈諾夫運動的發展。自然，單單斯太哈諾夫的人民不足以使斯太哈諾夫運動普及於我們全國。必須我們黨的機關負起責任并幫助斯太哈諾夫的人民實行這個運動以至於成功。在這一方面多賴茲（Donetz）地方機關已展開了重要的端倪。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地方機關在這一方面也做了很好的工作，別的地方又是怎麼樣呢？分明他們尚在「固步自封」。例如雖然大家都知道烏拉爾（Ural）是極大的工業中心，但並沒有聽見什麼聲息，或者也是極少，西部西伯利亞於庫斯巴斯（Kuzbas）也是一樣，那裏從一切現象看來，他們連「固步自封」的時候都不會達到，至於其餘的，我們黨的機關無疑是負起了這一責任，決意幫助斯太哈諾夫的人民以克服這種困難的。至於這事的別一方面——制止存在於經濟領袖，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之間的頑抗的守舊者——在這一方面事態多少較為錯雜，第一應該說

服這些工業上的守舊要素，應該忍耐友愛地，以斯太哈諾夫運動的進步性，以糾正自己使進至於斯太哈諾夫方法之必要，去說服他們，但假如說服沒有效力，便必須訴諸較為猛烈的方策。

我們可舉運輸人民委員會為例，在這一人民委員會的中央機關裏面，不久以前曾有一羣教授，工程師和其他的專家——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他們意欲說服每個人，說一小時十三至十四基羅米突的速度構成一個界限，越過這個界限，要使『運輸學』不陷入困難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真正的權威的集團，他們用言詞或文字宣佈判斷，他們訓令從屬於運輸人民委員會的機關，而且全體是運輸專家『決定人物』，不是專家的我們，基於全體的鐵路實踐工人所製的計劃而致力於說服這無權威的教授們說，一小時十三至十四基羅米突不會構成一個界限，假如把事件加以組織，多少是可以擴大這一界限的，這一團體對於這點的答覆，不是聽從經驗和實踐的話，和改正對於事件的態度，而且陷於反對鐵路的進步要素的鬥爭中，並更進一步增加他們的守舊觀點的宣傳，我們手內已把握着一小部份博學的人民，溫和地使

他們離開運輸人民委員會的中央機關了。（鼓掌歡呼）現在如何呢？我們有一小時十八至十九基羅米突的速度！（鼓掌歡呼）同志們，我以為在我們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假如守舊者不停止阻撓和怠慢斯太哈諾夫運動，最後還必借助於這些手段。

第二任務是要幫助那些不願阻撓斯太哈諾夫運動，雖同情於這一運動而不能使自己適合於這一運動，不能置身於這一運動的前頭的經濟領袖，工程師和技術人員——要幫助他們，使他們適合，安置他們於斯太哈諾夫的前頭。同志們，我可以說，我們有不少這樣的經濟領袖，工程師和技術人員，而且假如我們幫助這些同志，則無疑的我們可有更多和更和他們相似的人物，我相信若是我們實行這些任務，斯達哈諾夫運動一定發展到圓圓滿滿。一定展開到我們國家的一切地方和區域，而且由新的戰績的途徑而達到奇績。

五 幾句話

再說幾句關於這次大會和它的意義，列寧常教訓我們說：『唯有不單知道如何

教導工人和農人，兼且從工人和農人去學習的那些領袖，能夠成爲真正的普羅列塔利亞領袖和布爾塞維克。有些布爾塞維克不滿意列寧這些話，但在這一方面歷史表明了列寧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事實上，千萬的勞働者，工人和農人在受苦，在求生，和在鬥爭着。誰能懷疑這些人民不是過着有意向的生活，當他們生存和鬥爭時，蓄積可驚的實際經驗呢？領袖們忽視這種經驗則不能視爲真正的領袖，這能夠懷疑的嗎？這麼一來，爲黨政領袖的我們，應該不僅教導工人，並且要向他們學習。

我並非反對你們說，這次大會的參加人，在大會中從政府領袖學習到一些東西，可是我們政府領袖從你們，從斯太哈諾夫的人民，從這次大會的參加人學習了很多，這也是不能反對的，這樣，同志們！我謝謝你們，因爲這個緣故，我非常感謝你們！（鼓掌，大聲歡呼）

最後說幾句我們要如何慶祝現在的大會，我們在會議中已討論過，並已決定這次政府的領袖和斯太哈諾夫運動領袖大會，並該用些什麼方法來表現，這樣我們便

達到一個結論：即大約你們中一百或一百二十人將被呈請黨予最高獎的（鼓掌，歡呼），同志們假如你們許納，我們一定照辦。

（斯太哈諾夫運動大會的參加人給斯大林一個喧囂而熱情的歡迎。全座發出囂采的回聲，歡呼的響聲，座上處處可以聽見無數向斯大林問候的叫聲，熱烈的歡迎達到極點時，由三百人參加唱國

際歌。）

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派及其他兩面派份子的辦法

的辦法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號斯大林同志在聯共中央會議上的報告——

同志們！從全會上的報告和討論中，很明顯的，我們遇到下面三種基本的事實。

第一：外國偵探機關的危害工作和偵探破壞工作：在他們裏面，托派是起了很積極的作用，差不多在我們一切的組織中，經濟的行政的和黨的組織中，或多或少

的都受到了影響。

第二：外國的代理人，托派也在其內，不僅是混進了我們的下層組織，而且佔了一些負責的位置。

第三：我們中央和地方上的一些領導同志，不僅沒有認清楚這些危害者破壞者，偵探和兇手們的眞面目，而反是如此的麻木，疏忽和幼稚，甚至有時幫助了提升這些外國的走卒，來担任這種或那種負責的工作。

從大會的報告和討論中，必然得出上面三個不可爭論的事實。

一 政治的麻木

我們的領導同志，同一切反黨反蘇維埃派別的鬥爭中，有了豐富的經驗，爲什麼在這次是這樣的幼稚無能呢？我們沒有能認識人民之敵的眞面目，沒有認清蒙着羊皮的狼，沒有能揭穿他們的假面具，這是什麼道理呢？

能否說，外國走卒在蘇聯境內所進行的危害與偵探破壞工作，對於我們是突然的奇異的事情呢？我們不能這樣說。關於這一點，在最近十年來，已經發現破壞者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的活動，自從沙黑金鑛山事件以來的事實，都已記在正式的文件上了。

托派和季洛維也夫派的法西斯蒂黨徒們的破壞活動，偵探活動和恐怖主義的活動，在最近的時期內，難道說對於我們沒有任何的警報和預告嗎？我們不能這樣說。許多這樣的警報，我們布爾塞維克，是不應該將他們忘記的，基洛夫同志的被刺是第一個嚴重的警告，他說明了我們的敵人，現在和將來都要採取兩面派的態度，用布爾塞維克和黨員名義的偽裝，取得信仰，打入我們的組織裏面來。

「列甯格拉總部」的審判，以及對「季洛維也夫和加米尼夫」的審判，使我們從基洛夫同志被刺事件，所得的教訓，加上了新的根據。

「季托聯盟」的審判，更充實了以前審判的教訓，證明季托派，聯合一切敵對的資產階級的份子在他們的周圍，變成了憲國警察的偵探機關，進行偵探破壞和恐怖的工作，兩面派和偽裝的態度，是季托派份子混到黨組織裏面來唯一的辦法，我們的警覺和政治上的透視，是防止季托匪徒們混入和消滅他們的最可靠的辦法。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號，聯共中央，在他的秘密信上對於基洛夫同志的被刺，嚴重的警告過：我們黨的組織，防止政治上的鬆懈和市僧的偷安，在這封秘密信上

寫道：

「一種錯誤的想法，以為隨着我們力量的發展，敵人似乎也就變得更無能更善良了，這種想法是完全不正確的，應該立即克服這種機會主義鬆懈的觀點，這種觀點是右派的反映，右派相信敵人是能夠安靜地轉到社會主義裏面來的，並且他們最後還能成爲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悠遊自在和清淡，這不是布爾塞維克的事業，我們不應該鬆懈，應該是很警覺的，我們要有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革命警覺性：我們要記着，敵人的情況愈壞，則他們更要採取極端的手段，來同蘇維埃鬥爭，這是他們唯一辦法，這是我們要記着而且要警覺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號的秘密信上，對於「季托聯盟」偵探和恐怖的活動，聯共中央，又號召過黨的組織，應有高度的警覺性，不管敵人是如何的偽裝得好，我們都要能認識他，在這封秘密信上寫道：

「現在證明季托匪徒們，在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聯合了蘇聯人民一切最兇惡的敵人——偵探，內奸，破壞者，白黨，富農等等，這些份子同季托派間的一切

界限都消沒了，在這個時候，我們一切黨的組織和每個黨員都應該記住，在任何的地方和任何的環境下，共產黨員的警覺性，都是必需的，在現在的條件下，每個布爾塞維克必須具備的質量，就是說，不管敵人是如何的偽裝得好，我們都應該認出誰是黨的敵人。」

這就是說，警報和預告都是有過的，這些事實，警覺了我們的應該注意什麼？這告訴我們，要克服黨內組織工作的薄弱，並且要把黨變成不可摧毀的砲台，使任何一個兩面派都不能混進來。

這告訴我們，應該結束對於黨內政治工作的估計的不足，而應該進行堅決的轉變，加強這種工作。提高政治的警覺性。

事實證明我們同志對於這些警報和預告的認識也簡直苦得厲害，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在黨證檢查和調換的運動中，有許多事實，也清楚的說明這一點。

爲什麼這些警報和信號，沒有得出什麼具體的效果來呢，我們黨的同志，有了

同反蘇維埃份子鬥爭的經驗，有了許多的警報和預告，爲什麼對於敵人的偵探和破壞工作還表示出我們政治上的近視呢？

是否說我們黨的同志，比從前差了呢？沒有從前那樣覺悟和有紀律呢？自然不是這樣一回事。

是否說他們變質了呢？自然也不是的，這樣的想法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那末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這些苟且偷安、麻木、鬆懈、和盲目是從何而來的呢？

問題是在這個地方，因爲我們黨的同志，都注目到經濟動員和經濟建設偉大的勝利上面去了，忽視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實，這些事實，布爾塞維克是不應該忘記的。

在蘇聯國際形勢的問題上，他們忘記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忽略了兩件很重要的事實，這些事實，對於現在的危害者，破壞者，偵探和匪徒們，是有直接關係的，這些人是用了黨證的掩護和布爾塞維克名義的偽裝的。

二 資本主義的包圍

我們黨的同志所忘記了的，或者沒有注意到的，究竟是什麼事實呢？

他們忘記了蘇維埃政權，只在世界上六分之一的領土上勝利了，還有六分之五的領土，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他們忘記了，蘇聯是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中。我們的同志，也常常會談到資本主義包圍的問題，但是沒有仔細的考慮，究竟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包圍，資本主義的包圍，這不是空洞的詞句，這是一種實際的不好現象。資本主義的包圍，這就是說，有一個蘇維埃的國家，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制度，除此以外，還有許多資本主義的國家，繼續保持着資本主義的生活秩序，並且包圍着蘇聯，他們等待着機會，來進攻蘇聯，消滅蘇聯，或者用盡一切的方法來破壞牠的力量，來削弱牠；我們的同志，把這個基本的事實忘記了，而這個事實，恰是決定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間關係的基礎。

拿資本主義的國家來說罷，有些幼稚的人們，以為他們都是同樣性質的國家，

他們相互間的關係，一定是很好的，但是只有幼稚的人們，才會這樣想，事實上他們相互間的關係，離開友誼兩個字是太遠了，一再的事實證明，資本主義的國家，也是派遣他們的偵探、破壞者、危害者、以及暴徒們到另外一些國家的後方去，混到那些國家的企業和機關裏面去，組織他們的偵探網，以便在必要的時候，破壞那些國家的後方，削弱並摧毀那些國家的力量，過去的事實是這樣的，現在的實事也是如此。

譬如拿破倫一世時的歐洲，在法國匿藏着有俄國的、德國的、奧國的和英國的偵探與破壞者，同時在英德奧俄這些國家的後方也有不少法國的偵探和破壞者，英國的偵探，對於拿破倫，進行過兩次的謀刺，在法國挑起了幾次農民的騷擾，來反對拿破倫的政府，究竟什麼是拿破倫的政府呢？他是資產階級的政府，撲滅了法國的革命，所保存着的僅僅是對於大資產階級有利益的那些革命的結果。

用不着說，拿破倫政府，也不會放過他的友邦，他也是用過他的破壞辦法。一百二十年以前的事是這樣，拿破倫以後，一百三十年的事情，也是這樣的。現在的

英國法國，都藏着德國的破壞者和偵探；而英國法國也有他們的偵探和破壞者，在德國進行活動。日美之間也是同樣的情形。

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規律，我們要問，難道資本主義國家，對於社會主義的蘇聯，是應該比對付同樣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更客氣更友誼嗎？爲什麼他們派到蘇聯來的偵探破壞者危害者和暴徒們，應該比派往資本主義國家去的要少些呢？這是從何而來的道理？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看來，我們說，資本主義國家派到蘇聯內部來的偵探破壞者，搗亂者和暴徒們，要比派到任何其他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去的多兩三倍。是否這樣說更爲正確呢？當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着的時候，外國就會派偵探、破壞者搗亂者暴徒們到我們的內部來難道這還不明白嗎？

這是我們同志所忘記了的事，因此便以爲是突如其來的事了。

德日的警犬托派份子，他們的偵探破壞工作，對於我們某些同志，完全是突然的事情，理由正在於此。

三 現在的托洛斯基主義

當我們的同志，同托派的偵探進行鬥爭時，忽視了現在的托洛斯基主義，已不是七八年前那樣的了，在這個時間內托洛斯基主義和托派份子，有了重大的演變，托洛斯基主義的面目，起了基本上的變動，因此同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以及同牠鬥爭的方法，都應該根本上改變過。我們的同志，還未了解托洛斯基主義，已不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個政治派別了，他在七八年以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現在已經變成了外國偵探機關所僱用的匪徒偵探，破壞者危害者和殺人犯的卑污的，無原則的狗黨了。

什麼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呢？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就是這樣的集團或黨派，他有一定的政治面目立場和黨綱，他們的觀點，並不躲開工人階級，相反的，他們在工人階級中間，公開的宣傳他們的觀點，並且不怕在工人階級面前，暴露他的政治面目，也不怕在工人階級的面前宣佈他們真正的目的和任務，他們在工

人階級中間，公開的提出自己的口號，說服工人階級，證明他們觀點的正確。托洛斯基主義，在七八年以前，是工人階級中間的一個政治派別，雖說他是反列甯主義的錯誤的派別，但那時總還算是一個政治派別。

現在的托洛斯基主義，一九三六年的托洛斯基主義，能否說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個政治派別呢？不能。爲什麼呢？因爲現在的托洛斯基派，怕在工人階級中間，暴露他的真面目，怕暴露了他真正的目的和任務：他不願意叫工人階級知道他的政治面目，他知道，如果工人階級知道了他的真實企圖，工人階級，將會咀咒他們是異己的份子，將會趕跑他們，托派份子現在進行工作的基本方法，不是在工人階級中間，公開的坦白的宣傳他們的觀點而是卑鄙無恥地在表面上讚揚和誇耀他們所反對的觀點，虛情假意的糟踏他們自己的觀點，這樣來把他們自己的觀點，隱蔽起來。

一九三六年的審判，他們雖然有充分的可能，在審判中來說明他們的政治綱領，可是，加米尼夫和季諾維夫，堅決的否認他們有什麼政治綱領。

很明顯的他們說沒有政治綱領，這顯係騙人的話，現在就是瞎子也可以知道他

們是有政治綱領的。那末他們爲什麼否認他們有政治綱領呢？因爲他們害怕暴露自己真的政治面目，他們怕說明他們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綱領，因爲這樣的綱領，將要引起工人階級的憤怒。

一九三七年對拉狄克，比達可夫和索柯兒尼可夫的審判，他們沒有否認季托派是有政治綱領的事實，他們承認了季托派有一定的政治綱領，並且在他們的供詞中發揮出來了，可是他們並沒有號召工人階級和人民，起來支持季托派的綱領，相反的，他們咒罵睡罵這種反人民的反無產階級的綱領。

拉狄克、比達可夫和索柯兒尼可夫，他們所說明的現在托洛斯基主義的政治綱領，就是恢復資本主義，消滅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恢復剝削制度，同德日進行聯盟，以便加速反蘇聯的戰爭，擁護戰爭，反對和平政策，分割蘇聯，將烏克蘭讓渡給德國，沿海洲讓渡給日本，在敵對國家進攻蘇聯時，促成蘇聯軍事上的失敗，而執行這些任務的方法，就是破壞，搗亂，對黨國領袖的個人恐怖，幫助日德法西斯主義的偵探工作。

明顯的，這托洛斯基派在人民和工人階級的面前，就不能不瞞住他們自己的綱領，不僅不讓工人階級知道，而且也不讓他們自己的羣衆——托派羣衆——知道，而且他們中間，甚至連三四十個上層人物，也不能知道，拉狄克和比達可夫，曾要求托洛斯基，召集一個三四十人的托派會議，說明這個綱領的內容，可是托洛斯基派禁止開這個會，並且說，就是要在極少數人中間，來解說這個綱領的真實內容，也是不適當的，因為這種『手續』將會引起分裂。

『政治行動者』，將他的觀點和綱領，瞞住工人階級不說，瞞住自己的羣衆不說，連自己的領導人物也瞞住不說，這便是現在托洛斯基主義的面目。因此現在的托洛斯基主義，已經不能叫做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了。

現在的托洛斯基主義，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破壞者、搗亂者、偵探奸細、劊子手之流的無原則的無思想的匪黨。他們是工人階級的兇惡敵人，他們是受外國偵探機關所僱傭指揮的。

這便是最近七八年來，托洛斯基主義演變的真實結果。

這便是過去和現在托洛斯基主義的區別。

我們同志們一個很嚴重的錯誤，就是沒有認清楚過去和現在托洛斯基主義的區別，他們沒有了解，托派份子老早已經不是有思想的人，托派份子，老早就變成大道上的匪徒了，一切卑污下賤的方法，如偵探背叛祖國等，只要能破壞蘇維埃政權和國家的話，他們都是採用的，我們黨的同志，沒有看到這些，因此也就沒有適時的改變方法，同托派份子，進行新的更堅決的鬥爭，在最近幾年來，托派份子的卑劣行爲，對於我們某些同志，完全是意外的事，理由就在於此。

最後我們同志，還沒有認清楚的就是法西斯所僱傭的托派份子，他們在現在的破壞者和搗亂者的中間，是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和沙黑金礦山事件時代（一九二八年）的破壞者，搗亂者，比較起來，是根本不同的。

第一，沙黑金事件和實業黨，他們都是顯明的階級異己份子，大部份是以前的業主經理，公司裏的股東，或是從前資產階級的專門家，他們在政治上是公開仇視我們的，我們大家都了解這些人的政治的真面目，他們也並不隱藏仇視蘇維埃制度

的態度。對於現在的破壞者危害者托派份子，便不能這樣說了，現在的破壞者，危害者，托派份子，大部份是黨員，他們荷包裏面，都帶得有黨證，這就是說，這些人形式上並不是異己份子，過去的破壞者是公開反對我們的，而現在的破壞者呢？他們對我們很恭維，贊揚我們尊敬我們這樣來取得信仰，這就是他們兩者之間根本的區別。

第二，沙黑金事件和實業黨的份子，他們都是或高或低的具有一定程度的技術，那時我們的同志還沒有這樣的技術，不得不向他們學習，這種情況，使得沙黑金時代的破壞者有着優越的條件能夠自由無阻地進行破壞，在技術上也能欺騙我們，現在的破壞者和托派就不同了，現在的破壞者，和我們的同志比較起來，技術上並不比我們強，相反的，我們的同志，比現在的破壞者托派訓練得還更好，從沙黑金事件到現在，我們訓練出了整千整萬的，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技術幹部，我們有着上千上萬的具有充分技術的布爾塞維克的導指者，而那些比達可夫，李夫雪茨，薛史托夫，波古斯拉夫斯基，莫拉洛夫和特洛比尼斯之流的人物，從技術的素

養上來說，都是些空談家未經深造的人。那末現在的破壞者——托派，他們的力量在什麼地方呢？他們的力量是在黨證上，在握有黨證的上面，因為黨證給了牠們政治上的信任，替他們開闢了打入我們機關和組織裏去的道路，他們的特點，就是有黨證，有蘇維埃政權的掩護，他們在政治上欺騙我們，濫用威信，偷偷的破壞我們，並且將我們國家的秘密，報告蘇聯的敵人，這種「特點」，在其政治的和精神的價值上雖然是可懷疑的，但是這總實是他的「特點」罷！這種「特點」也就是說，托派的破壞者，是有黨證的人物，他們有了混入到我們一切機關和組織中去的路條，成了外國偵探機關直接的代理人。

我們某些同志的錯誤，就在於沒有認清沒有了解以前和現在破壞者中間的這些區別，托派和實業黨間的區別，因為沒有了解這點，所以不能適時的改變方法同這些新的破壞者進行新的鬥爭。

四 經濟勝利的黑暗面

上面所說的，是國際和國內基本的形勢，我們很多的同志，是忘記了或是不了解這種形勢的。因為這種理由，在最近幾年來，破壞和危害的事實，對於我們的同志，是出於意外的了。

我們可以問，為什麼這些同志忘記了或者不了解這些問題呢？

這些健忘，盲目，麻木和疏忽的現象是怎樣來的呢？

這是否我們同志工作的有機的缺陷呢？不是，這不是有機的缺陷。這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只要我們稍許加以注意，就能迅速的克服這種現象。

那末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因為在最近幾年來，我們黨的同志，完全是忙於經濟建設去了，他們高度的注意力，是使用在建設的勝利上面去了，於是就忘記了另一方面，拋開了其他的一切問題，因為他們專注意到經濟建設的勝利，所以他們一天到晚，都是注意在這一問題上，而對於蘇聯的國際形勢，資本主義的包圍，加強黨內的政治工作，同破壞者進行鬥爭等，不僅是沒有注意，而且認為這些問題是次要的或更次要的問題。

我們的成績和勝利，自然是很大的，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上面的勝利，確實是很大的勝利，但是像世界上一切事情一樣，也有它的黑暗面。不大注意政治的人，因為大的成績和勝利，常會使他們麻木疏忽，自滿自信自驕自大等等，在近來的時候，你們不能否認，拍馬屁是有形無形的是在增長着，在現在的情況下，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的勝利，形成了高慢的情緒，慶祝勝利的情緒，對敵人估計不足，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高，因以上這些情形的結果，遂產生了政治上的盲目，這完全不是奇怪的事。

現在我想來講幾句，與我們的成績和勝利有關的一些危險性。

在困難中的一些危險性，我們在經驗中是知道的，我們同這種危險作鬥爭，已經有好幾年了，而且是有成績的，在困難中的危險性，對於意志不堅的人，當會發生消沉，不相信自己力量和悲觀的情緒，當我們在某個地方，同困難中所產生的危險性作鬥爭時，那末，大家在這個鬥爭中，都鍛鍊了自己，而且鬥爭的結果，使我們都變成了堅強的布爾塞維克，這就是困難中的危險性的本質，和克服困難的結果。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成功和勝利中的危險性。是的，同志們，成功和勝利中的危險性，這就是說有些人對於政治不大關心，眼光很是窄狹，看着不斷勝利的情況——節節勝利，處處成功，計劃實行有了超過——他們看了這些遂產生了麻木和自滿的情緒，造成慶祝勝利和相互恭維的空氣，這樣，便減低了我們的靈敏性，使我們的政治感覺，遲鈍起來，使人們迷惑，使人們去尋找清閒自在。並不奇怪，在這種空氣下面，自驕自滿，慶祝歡呼，衝昏了大家的頭腦，以致對於國家的命運，有頭等意義的一些基本問題，也忘記了，對於一些不好的現象，如資本主義的包圍，破壞的新形式和勝利中的危險性等等也忘記了。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包圍呢？這算不了什麼事，如果我們執行並超過我們的計劃，那末資本主義的包圍，能夠有什麼意義呢？破壞的新形式是對於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這都是小事，如果我們執行並超過我們的經濟計劃，這些小事，能有什麼意義呢？我們有黨章，黨的機關是選舉的，黨的領導者向黨只作報告，那我們怕什麼呢？難道還要注意那些嗎？如果我們經濟是在發展，工農的物質生活，是在不斷的改善，難道我們還要關心這些小問

題嗎？這都是無關緊要的。我們超過計劃，我們有堅強的黨，中央也不差，還要什麼呢？在莫斯科，在黨的中央，坐着一些奇怪的人，亂想一陣，講什麼破壞，自己不安靜，還要擾亂人家睡覺。

這就是明顯的例子，說明有些沒有經驗的同志，因為經濟建設的勝利衝昏了他們的頭腦，所以結果受了這種政治盲目病的傳染。

這就是勝利和成績中的危險性，我們的同志，忙於經濟的建設，忘記了對於蘇聯有重大意義的國內和國際的形勢的事實，沒有看到的許多危險，原因就在於此。我們的麻木、健忘、疏忽、政治上的盲目，其根源就在於此。

五 我們的任務

怎樣來克服這些工作中的缺點呢？我們要作些什麼呢？我們要必須實行以下的辦法：

一、首先必須使我們黨的同志，因為這種或那種的職務，脫離了對於時事問題

的注意，而現在應該轉變過來，注意國內和國際性質的大政治問題。

二、必須將黨內的政治工作，提高到應有的水平，政治教育任務的中心，是對黨的蘇維埃的和經濟的幹部，應該施行布爾塞維克的鍛鍊。

三、必須向我們黨的同志說明，經濟上的勝利，無疑義的，是有他偉大的意義，我們還要繼續不斷的努力，可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却不僅就限制在這些上面。

應該要說明，經濟建設成功所引起的黑暗面，表現在自滿麻木和政治警覺遲鈍等等的上面，只有把經濟建設的勝利和黨內建設的勝利及開展黨內政治工作的開展連繫起來，才能克服這些黑暗面。

應該說明經濟上勝利的鞏固和永存，完全要依靠黨的組織工作和黨的政治工作的勝利，不然的話，那末經濟上的勝利，是建築在沙土上的。

四、必須要記着，任何時候也不應該忘記，就是資本主義的包圍！是決定蘇聯國際關係的基本因素。

要記着而且不應忘記，當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着的時候，外國的偵探機關，就會派遣破壞者、危害者、偵探、恐怖主義者到蘇聯的內部來。

應該記着這些，而向那些對資本主義包圍估計不足的同黨，對破壞意義和作用，估計不足的同黨，進行鬥爭。

應該要向黨的同黨說明，不管經濟上的勝利是如何的偉大，但這並不能取消資本主義包圍和由此產生的結果。

應該採取必要的辦法，使黨內和黨外的布爾塞維克，能夠認識外國偵探機關的目的和任務，他們破壞危害和偵探工作的實際和技術。

五、必須向黨的同黨解釋，托派份子，是外國偵探機關，進行破壞搗亂和偵探工作的積極份子，他們老早已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了，他們老早已沒有任何合於工人階級利益的理想，他們變成了破壞者、偵探暴徒們所組成的無原則的無理想的匪徒，他們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傭的。現在同托洛斯基主義鬥爭的方法，不是舊的爭論的方法，而是新的根絕消滅托洛斯基主義的方法。

六、必須向同志們說明，現在的破壞者和沙黑金時代的破壞者是不同的，如果說沙黑金時代的破壞者，是在技術上欺騙我們，利用我們技術上的落後，而現在的破壞者，却握有黨證利用政治上對他們的信仰，來欺騙我們，因為我們把他們當黨員看，使我們政治上麻木起來。在沙黑金時代的口號，是掌握技術；而新的口號，必須是加強幹部政治教育，掌握布爾塞維克主義，消滅我們政治上的放任，這便是完全適合現在時期的口號。

或者有人要問，在十年以前，在沙黑金事件的時候，為什麼不同時提出兩個口號：第一個口號是掌握技術，第二個口號是加強幹部政治教育來呢？不，不能這樣，在布爾塞維克的黨內，不應這樣做，在革命運動轉變的時機，常常只能提出一個基本的口號，這是中心的一環，把握着這一環以後，來轉動整個的鎖練，列甯告訴我們說，你們需要抓住工作鎖練中基本的一環，然後轉動整個的鎖練前進。革命運動的歷史，證明這種戰術，是唯一正確的戰術。沙黑金的時代我們的弱點，就是技術上的落後，那時我們的弱點，不是政治的問題，而是技術上的問題；那時我們

對於破壞者的政治態度，是明顯的，是布爾塞維克對政治上異己份子的態度，那時我們提出的口號，是，掌握技術，在這個時候，我們教育了整千整萬技術上有素養的布爾塞維克的幹部，這樣克服了我們技術上的落後，現在的情形就不同了，現在我們在技術上，有了有素養的布爾塞維克的幹部。現在的破壞者，不是公開的異己份子，也沒有任何技術上的特長，但是他們有黨證，並且享受黨員一切的權利。現在我們的弱點，不是技術上的落後，而是政治上的麻木，盲目的相信別人，對於偶而得到黨證的人，缺乏對於他們實際工作的檢查，而不是對他們政治言詞上的檢查，現在我們的中心問題，不是消滅我們幹部中技術上的落後，因為技術上的落後，基本上已經克服了，而現在是要克服政治上的麻木，克服對於破壞者的政治上的放任，對於這些偷巧得到黨證者的放任。

在沙黑金時代為幹部而鬥爭的基本口號，和現在的基本口號的主要區別，就在這裏。

在十年以前，我們不能同時提出兩個口號，不能提出掌握技術和幹部政治教育

的兩個口號來，其原因就在於此。所以從前掌握技術的口號，現在必須加上新齡，掌握布爾塞維克主義，幹部的政治教育和克服我們政治上麻木性的口號。

七、必須粉碎和拋棄那種腐朽的理論，說我們每一個進步，似乎使階級鬥爭，逐漸的熄滅下去了。說因為我們的勝利，階級敵人也似乎逐漸的變成善良了。

這不僅是腐朽的理論，而且也是危險的理論，因為這樣，可以迷惑我們，使我們中計，使階級的敵人，能夠重整旗鼓，來反對蘇維埃政權。

我們應該說，我們愈是前進，我們的勝利愈多，則被推翻了的剝削階級的殘餘，將要更加瘋狂，將要更快的採取更尖銳的鬥爭方式更加緊的危害蘇維埃的國家，他們將要利用絕望的鬥爭方法，最後的來挽救他們。

應該知道，在蘇聯被推翻了的階級的殘餘，並不是孤立的，他們有蘇聯外面敵人的直接幫助，如果說階級鬥爭，僅限制在蘇聯的範圍以內，這是錯誤的，如果說階級鬥爭的行動，一端是在蘇聯的範圍內，那末另外一端，則在我們周圍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內，被推翻了的階級的殘餘，是了解這點的，正是因為他們知道這種情

形，所以他們要繼續絕望的掙扎。

歷史這樣教訓我們，列寧主義這樣教訓我們，我們必須這樣記着，而且應該要嚴密注意。

八、另外一種腐朽的理論，就是說，有的人，不是經常的破壞者，或者在他的工作中有時還表現出了一些成績，這樣的不能叫做破壞者的。對於這種理論，必須加以堅決的粉碎和克服。

這種奇特的理論，宣判了這種理論作者的無知，如果在短期內不願被揭發的話，那麼任何的破壞者，是不會經常進行破壞工作的，相反的，現在的破壞者，經常在工作中表現他的成績，因為這是他們能夠存在的唯一方法，這樣來取得信仰，以便繼續其破壞的工作。

我想這個問題，已是很明顯的了，勿須再來解釋。

九、必須粉碎並克服第三種腐朽的理論，就是說我們有系統的執行經濟計劃，將要使破壞的行動和破壞的結果等於零。

這樣的理論，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說我們的工作同志，養成潔身自愛的性情，緩和並削弱他們對於破壞者的鬥爭。

有系統的執行我們的經濟計劃，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證明我們的經濟計劃，原來的估計是比較低的，因為在國民經濟中所蘊藏着的巨大來源和可能性，沒有被估計到。

第二，總的完成各人民委員部的經濟計劃，這還並不能說，在一些重要的部門裏面，也都完成了計劃，事實告訴我們，有些人民委員雖然執行並超過了全年的經濟計劃，可是國民經濟中的某些重要部門，常常是沒有完成計劃的。

第三，如果破壞者沒有被揭發沒有被驅逐的話，那末毫無疑問的，經濟計劃的執行，也不知要糟到什麼程度，這點對於上述理論的近視作者，是不應忽視的。

第四，破壞者常時不是在和平的時候，進行主要的破壞工作，而是在戰爭的前夜和戰爭的中間，進行主要的破壞工作，上述理論的創造者，不想一想，『有系統的實行經濟計劃』的這種腐朽的理論，蒙蔽了我們，我們沒有去對付這些破壞者，

那末在戰爭的時候這些破壞者將要給與我們國家以如何重大的損害。

這種『有系統的執行經濟計劃』的理論，是對破壞者有利的理論，難道還不明顯嗎？

十、必須粉碎並克服第四種腐朽的理論，就是說，斯太哈諾夫運動，就是消滅破壞者的基本方法。

這種異想天開的理論，在高談斯太哈諾夫者和斯太哈諾夫運動的掩蓋之下，實際上就是使我們打擊不到破壞者。

莫洛托夫在他的報告中，指出了很多的事實，說明在庫滋巴斯和頓巴斯，托派和非托派的破壞者，利用我們政治上麻木的一些同志，對於他們的相信，不斷的妨害斯太哈諾夫運動者，從中擾亂，故意的造成許多困難，使他們無法順利的進行工作，直至最後，將他們工作弄得坍台。

他們在『有系統的執行經濟計劃』這種腐朽理論的掩護之下，暗藏在國民經濟的內部，舉例說，如果在頓巴斯煤區破壞者，實行破壞大規模的建設工作，使產煤

的一切準備工作，因為速度的落後，而與其他的工作相破裂，這時僅僅靠着斯太哈諾夫運動者，能有什麼作用呢？

斯太哈諾夫運動，要求我們實行反對各種破壞陰謀的鬥爭，去幫助他們，以便他們能夠執行其偉大的使命，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對於破壞者的鬥爭，消滅破壞活動的鬥爭，摧毀破壞者，這是斯太哈諾夫運動，能夠充分發展的必須條件，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我想這個問題也已經明白了，不須再來解釋。

十一、必須粉碎並克服第五種腐朽的理論，就是說托派破壞者，已經使用了其最後的幹部再沒有更多的補充了。

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只有無知的人，才會想出這樣的理論來。托派的破壞者，是有他們的補充的，首先便是蘇聯內部被推翻了的統治階級的殘餘，還有就是在蘇聯外面的，許多仇視蘇聯的集團和組織。

例如托洛斯基反革命的第四國際三分之二的成份，是偵探或危害者，難道這不

是補充嗎？這個偵探的國際將要分派他們的幹部，到蘇聯來進行偵探和破壞的工作，難道這還不明白嗎！又如挪威的塞夫洛派，他們把托洛斯基招待在他們的家里，並且幫助托洛斯基來破壞蘇聯。這難道也不是補充的來源嗎？誰也不能否認，這個反革命的集團，以後還要替托派的偵探破壞者服務，另外一個例子，在法國也有同塞夫洛派相類似的蘇法林派，難道這不是補充嗎？在反蘇聯的偵探破壞工作中，誰能否認蘇法林派也要給托派的幫助呢！德國的魯特菲雪爾，馬史洛夫，烏爾班斯之流的先生們他們把自己的身體和靈魂都賞給法西斯蒂，難道這不是托派偵探破壞工作的補充嗎？又加以著名流氓依斯特曼爲首的美國一小羣作家，用他們發狂的筆尖來專門誹謗蘇聯工人階級，並且以此爲生，這難道他們不是托洛斯基主義的補充嗎？

我們要拋棄這種腐朽的理論，說托洛斯基主義者，是使用了他最後的幹部。

十二、最後必須還要粉碎並克服這樣一種理論，就是說，我們布爾塞維克很多，他們破壞者很少，我們有千百萬羣衆擁護，而托派的破壞者，只是少數人的集

團，那末我們布爾塞維克，對於這少數的破壞者，用不着大驚小怪。這是不正確的，這是想得非常奇妙的理論。有些領導的同志，在工作中不會同破壞者進行鬥爭，喪失了警覺性，爲得要消閒自在，便這樣來安慰自己。

我們布爾塞維克有廣大羣衆的擁護，托派的破壞者，只有少數人的幫助，這自然是對的，但是這並不能說，破壞者不能給我們以大的損害，爲要進行破壞危害，並不需要很多的人，爲要建設得尼泊爾（水電站——譯者）需要幾萬的工人，如要破壞它的時候，則只要幾十個人就夠了。在戰爭的時候，爲要取得作戰的勝利，需要幾個軍的兵力，爲要使得戰線上失敗，只要幾個人就夠了。少數的偵探，混到我們的軍團司令部或是師的司令部，偷去我們作戰計劃，交給敵人就行了。爲要建造一座鐵道的橋樑，需要上萬的工人，但是要破壞這座橋，只要幾個人就夠了，我們可以舉出無數的這樣的例子來。

我們不能這樣來安慰自己，說我們的人多，他們的人少。

應該要做到在我們的隊伍中，沒有一個托派的破壞者。

對於我們一切組織無論是經濟的，政府的，行政的或是黨的組織所共同的工作缺點，我們就應當用這種方法去消滅他，息滅這些缺點的辦法，就是像上面所說的那樣。

關於黨的組織及其工作的缺點，以及克服這些缺點的辦法，在發給大家的決議草案中，已經詳細的說到了，因此在這一方面，沒有重複說明的必要。

關於黨內幹部的政治教育和訓練問題，我簡單的來說幾句。

我想如果我們能把黨的幹部從下到上在思想上加以訓練，在政治上加以鍛鍊，使他們能夠自由的判斷國際和國內的形勢，如果我們能把他們都造成爲有遠見的列寧主義者、馬克斯主義者，能夠解決領導國家的問題而不會有重大的錯誤，那末我們就已經解決了我們整個任務的十分之九了。

我們黨內的領導幹部是如何的呢？

在我們黨的成份上，負領導工作的大概有三四千高級領導者，也可以說，這是我們黨內的將領。其次是三四萬的中級領導者，這可說是我們黨內的校官，再其次

就是十萬至十五萬，黨的下級領導幹部，這就是我們黨內的尉官了。提高這些指揮幹部的理論水平和政治訓練程度，提拔新的力量到幹部中來，擴大指導幹部的數目，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應該怎辦呢？

首先必須向我們每個黨的指導同志提議，從支部書記區委書記，直至每個聯邦共和國黨的書記，在一定時間之內，都要找到兩個黨員，能夠成爲他的真正的代理人。

大家或許會問：到那裏去找呢？每個人找兩個副手，我們沒有這多，沒有適當的同志，同志們！這話是不對的，我們有無數的有能力有天才的人，應該知道他們，並且提升他們，不要使他們停在老的地方發酵。同志們！我們要尋求這樣的幹部。

爲要進行黨的教育和支部書記的重新訓練，在每個省必須組織四個月的「黨的訓練班」，黨的支部書記都應該派去受訓練，訓練完了，派到原來的地方去，然後

把他的副手（副書記）代理人和基本組織內的進步黨員派去受訓練。

爲要進行對於區委書記的政治訓練，必須在蘇聯十個中心的地點，成立八個月的「列寧學校」，區委和省委的書記，應派去受訓練，他們受完訓練回去以後，再把他們的副手（副書記）和區委州委有能力的幹部，派去受訓練。

爲着對於各個城市的黨的書記，進行思想的訓練和政治上的鍛鍊，必須在聯共中央的下面，成立六個月的訓練班，研究黨史和黨的策略，城市黨的書記，都派去受訓練，他們受完訓練以後，城市黨的組織把有能力的黨員派去受訓練。

最後必須在聯共中央的下面，成立國際和國內政策的研究班，時間是六個月，省委和邊疆黨部的書記，各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書記，都要去受訓練，這些同志應當輪流受訓練，他們應該成爲黨中央委員會領導同志的代理人。這點我們必須而且應當做到。

我所講的快要完了。我們已經說明了我們工作中基本的缺點，有些是我們一切經濟的行政的和黨的組織所共有的缺點，有些是特別表現於我們黨內的缺點，這些

缺點，被工人階級的敵人所利用，來進行破壞危害偵探恐怖的工作。

我們也指出了基本的必要的方法，來克服這些缺點，並消滅外國偵探機關的法西斯走狗托派的一切破壞危害偵探恐怖的工作。

我們是否有可能實現這一切步驟呢？是的，完全是可能的，因為我們有一切必須的條件，來實現這些步驟。

我們所差的，是什麼呢？只有一種東西，就是準備好消滅我們自己的麻木，疏忽和政治的近視。

障礙就在這裏，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主義，舉起了世界共產主義的旗幟，難道我們還不能克服這點可笑的精神病嗎？沒有任何的理由使我們懷疑，只要我們願意，我們是可以克服這個病的，但是這也不是簡單的事，而要認真的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去做。

當我們克服這種精神病的時候，那我們就可以很自信的說，我們不怕任何國內和國際的敵人，我們不怕他們任何的襲擊，因為我們在將來能夠粉碎他們，正好像

我們在過去和現在粉碎他們一樣。(鼓掌)

在聯共中央全會上的結論

——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

在我的報告中已說到了所討論事項的基本問題了。各個發言中已表現了，我們現在有着完全的明確的，對於我們的任務的了解，並且有着克服我們工作的缺點的準備，但是發言中亦表現了，對於組織的政治的實際工作底一些具體問題還未有充份明顯的了解。我計算了七個的這樣的問題，容許我對這問題說幾句話吧。

一、現在大家已經了解了，承認了，如果過於被經濟工作與經濟成績過份吸引住而同時忽視與忘記黨的政治的問題，那麼必會走入一種死巷。因此需要使黨的工作人員的注意力向着黨的政治的問題，使經濟的成績與黨的政治的工作底成績聯繫起來，向前並進。

怎樣實際地來加強黨的政治的工作的任務，怎樣實現使黨的組織從經濟的小問

題上解放出來的任務呢？從發言中看出，有些同志抽取了錯誤的結論，現在應該根本離開經濟工作。總之有着這樣的論調：我們現在，謝天謝地，離開了經濟事務了，現在可以從事黨的政治的工作了。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嗎？不，它是不正確的。當我們的同志被經濟的成績沖昏，而離開了政治時，這是使我們有着許多犧牲的一個極端。如果現在一些我們的同志從事於加強黨的政治的工作而發生離開經濟工作的思想，那麼這樣的另一極端將使我們也會受不會比前者少的犧牲。不要從這一極端陷入另一極端去。不應該把經濟與政治分開。我們不能夠離開經濟，一如我們不能夠離開政治一樣。爲了便於學習，人們通常在方法問題上把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分開。但是這只是在方法上的，只是人爲的，只是爲了便於學習。相反地，在生活上與實際上政治與經濟是不能分開的。牠們是共同存在着，互相影響着。誰若認爲在我們的實際政治中把經濟與政治分開，以損害政治工作的代價來加強經濟工作，或者反過來說，以損害經濟工作的代價，來加強政治工作——那必然陷在一種死巷裏。

決議草案中關於使黨的組織從經濟的小問題下解放出來，以及關於加強黨的政治的工作那一條文的意思，不是說脫離經濟工作與經濟領導，而只是說不能繼續容許黨的機關代替經濟機關，特別是農業機關，因而脫却了牠的責任的那種實際工作。那麼應該掌握經濟機關底布爾塞維克領導的方法，他是系統地幫助這些經濟機關，系統地鞏固牠們，不是離開這些經濟機關而是經過這些經濟機關來實現經濟指導。應該給與經濟機關，主要是農業機關，以最優秀的人員：應該以新的能夠實現付於他們的任務的優秀的人員來充實這些機關，只有實行了這個工作，才能夠使黨的機關完全從經濟的小問題中解放出來。明顯地，這是一個嚴重的物事而需要相當時期的。但是當這個還未實現之前，黨的組織還要繼續在一定的短時間內直接從事各農業事務以及各種小問題如耕耘、播種及收穫等等。

二、關於破壞份子，誘惑份子及偵探份子等等再講幾句話。我相信大家都已明瞭，現在的破壞份子及誘惑份子，不管他們是掩藏在托洛斯基派或布林派的旗幟下，在工人階級中早已不是一種政治派別了，他們早已變成破壞份子，誘惑份子，

偵探與兇徒們底無思想無原則的匪團了。明顯地，應該無情地被視為工人階級的敵人與我們祖國的叛徒來粉碎與剷除這些傢伙們。這是很明顯的，不需要再加以繼續解說的了。

但是問題是：怎樣來實際地實現粉碎與剷除托洛斯基主義底德日代理人的任務？是不是說，不但要打擊與剷除真正的托洛斯基主義者，而且連曾經在托洛斯基主義方向內徘徊過，但早已就脫離了托洛斯基主義的那些同志也要剷除呢？是不是不只打擊破壞工作底真正托洛斯基主義的代理人，而且也要打擊曾經在馬路上散步，而偶然遇到過這個或那個托洛斯基主義者的那些人們呢？總之這種意見在全會上是發現了。這樣來解釋決議案是正確的嗎？不，不能把他認為是正確的。在這個問題裏，如同在一切其他問題裏一樣，個人的分別的待遇是必要的，不應混為一談。這樣的總計方法對於反對真正托洛斯基主義的破壞份子的鬥爭，只能是有害的。

我們的負責同志中有一些舊日的托洛斯基主義者，但他們早已脫離了托洛斯基

主義，他們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并不壞，甚至比我們那些從不會在托洛斯基主義方向內動搖過的尊貴的同志們還要好些。現在把這些同志們擠斥出去，那簡直是愚蠢。

我們的同志中間也有這樣的人們，他們思想上是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却與個別的托洛斯基主義者還保有個人關係，但是當他們明白了托洛斯基主義的實際性質以後，就毫不遲緩地與之斷絕關係。他們與個別托派的個人的友誼聯系沒有即刻斷絕，而是遲緩了一些，這自然不大好。但是把這些同志與托洛斯基主義者混為一談，也是愚蠢的。

三、怎樣是正確的選擇工作人員與分配以正確職務呢？這是說，第一根據着政治觀點，根據着他們是否擁有政治信仰的觀點來選擇工作人員，第二根據着實際的觀點，他們是否能作具體工作。

這是說，選擇底實際方法不能轉成爲事實上的狹隘方法，只偏重工作人員的實際質量，而不顧及他們的政治面目。

這是說，政治的選擇不能成爲唯一的方法，只着重工作人員的政治面目而不顧及他們的實際性質。

是不是能夠說，這種布爾塞維克的規則已經被我們的同志們注意到了呢？可惜不能夠這樣講。這兒的全會上已經討論過這一問題。但是沒有說完全。問題是這個實驗的規則，在我們的實際中顯然被破壞了，並且弄得極糟糕。工作人員的選擇大部份不是根據着客觀的觀點，而是根據着偶然的主觀的庸俗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多半都是選取所謂熟人、朋友、同鄉、服從個人的人，以及崇敬上司的能手——不問他們的政治的與實際的能力。

明顯地，在這個方式上是以狹窄的民族關係的人們代替了領導的負責的工作人員，形成一種朋友的家庭，他的工作人員們企圖和平地生活着，大家誰都不管，連房子的垃圾也不打掃，互相讚賞，而且關於他們的成績只寫些非常空洞的嘔氣的報告給中央。

那麼不難了解，在這樣一個民族環境裏既沒有工作缺點的批評，更沒有工作指

導者的自我批評。

明顯地，這種民族環境對於阿諛者及不自重的人們的豢養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基礎，因此這些人們與布爾塞維克主義毫無共同之點。

拿密爾索延同志與韋諾夫同志的例子來說。一個是卡薩克斯坦地方委員會的書記，一個是鴉羅斯拉夫的省委書記，這些人們在我們中間算是不壞的幹部。但是他們怎樣選擇工作人員呢？一個是從他以前工作的地方——阿塞爾白茨汗與烏拉爾帶了三十到四十「他的」人員到卡薩克斯坦去，給以負責的職位。另外一個從他以前工作的頓巴司同樣帶了一打多「他的」人員到鴉羅斯拉夫去，同樣給以負責的職位。那麼拿密爾索延同志有着一個自己的舖子，韋諾夫同志也有着一個這樣的舖子。是不是應該根據着選擇與分配人員的布爾塞維克著名原則從當地吸引有能力的人做工作人員呢？自然可以這樣做。爲甚麼他們沒這樣做呢？因爲選擇工作人員的布爾塞維克原則排除了庸俗小資產階級的待遇的可能性，排除了以親屬關係與小團體關係的觀點來選擇工作人員的可能性。此外，這些同志提拔服從個人的人們作爲工作

人員，他們顯然地造成一種對於當地人員以及對於黨中央不生關係獨立的環境。假設密爾索延與韋諾夫同志因爲這種或那種原因，從他們現在工作的地方調到任何一個其他地方去，他們在這種場合下對於他們的朋黨將怎樣辦呢？是不是又要把他們帶到新的工作地方去呢？這樣的無意義舉動破壞了正確選擇與分配工作人員的布爾塞維克原則。

四、甚麼是監督幹部與監督職務底執行呢？監督幹部，不是根據着他們的諾言與聲明，而是根據着他們的工作的結果來檢查。

監督職務的執行，不只是在辦公室裏，不只是根據着形式上的報告，而主要的是在工作的地區根據着執行底實際結果來檢查。

這種考查是必要的嗎？無條件的，他是必要的，第一因爲這樣的考查給與了一種可能來認識一個工作人員與確定他們真實性質。他是必要的，第二因爲只有這樣的監督給與一種可能來確定執行機關的優點與缺點。這是必要的，第三因爲只有這樣的監督給與一種可能來確定工作本身的缺點與優點。

一些同志們認爲，如果指導者根據着工作的結果來考查他所指導的人員，只可以從上層來考查他們，上層考查是監督工作人員與監督工作底執行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上層考查還不是全盤的考查。還有另外的考查方式，下層的考查，羣衆與被指導者考查他們的指導者，揭發他們的錯誤，指給他們改正的途徑。這樣的考查是考查工作人員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黨員羣衆在會議上，代表會議上與黨代表大會上考查他們的指導者與幹部，以聽取他們的工作報告，批判他們的缺點以及以選舉或不選舉這些或那些領導同志到領導機關中去的等等方法。

黨內民主集中制底嚴格執行，如黨章上所要求的一樣，黨機關底絕對的選舉，提出與拒絕候選人的權利，不記名的選舉，批判與自我批判底自由——一切這些方策以及類似的方策都應該執行，以使黨員羣衆易於實行對於黨的領導人員的考查與監督。

羣衆在羣衆底活動份子會，以及各種的羣衆討論會上考查他們的經濟指導員，

工會指導員以及其他的指導員，在那兒他們聽取他們的指導員的工作報告，批評缺點與指出改正的途徑。

最後人民在蘇聯國家機關的選舉時以一般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的投票來考查國家領袖。

任務是把上層考查與下層考查聯系起來。

五、甚麼是從他們自己的錯誤中教育幹部呢？列寧教訓給我們，正直地揭發黨的錯誤——檢查發生這些錯誤的根源，指出必需改正這些錯誤的路徑，這是正確地指導與教育黨的幹部以及正確地指導與教育工人階級與勞動羣衆最有保證的方法之

一。列寧說：

『一個政黨對於他的錯誤的態度是對於黨的嚴肅性與在他的階級及勞動羣衆前實際執行他的義務之最重要最有保證的標準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發它的根源，分析錯誤之所發生的情形以及注意討論克服錯誤的方法，這是一個嚴肅的政黨底標識，這是他的義務底執行，這是階級以及羣衆底教育與指導。』

這是說，布爾塞維克的義務不是掩飾他的錯誤，不是迴避他的錯誤底問題，一如我們這兒常常發生的一樣，而是誠實地公開地承認他的錯誤，誠實地公開地指出校正這些錯誤的途徑，誠實地公開地改正他的錯誤。

我不能夠說，許多我們的同志，樂於從事這個事情。但是布爾塞維克，如果他們真正願意是布爾塞維克，應該有勇氣，公開承認他們的錯誤，揭發它的根源，指出改正錯誤的道路，而幫助着黨給與幹部以正確的訓練與正確的政治教育。因為只有在這個途徑上，只有在公開的誠實的自我批判底空氣裏才能夠教育真正布爾塞維克的幹部，才能夠訓練出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者。

舉兩個例子來說明列甯底這個提綱的正確性。譬如拿我們的建設集體農場的錯誤來講。你們大概還記得一九三〇年，我們的同志認為可以在三四個月的期間來解決把農民們引上集體農場軌道去的這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當時黨中央被迫着制止這些太狂熱的同志。這是在我們黨的生活中最危險的時期。那時的錯誤是，我們的同志忽視了建設集體農場的自願性，他們忘記了不是以行政的壓方便可以使農民轉到

集體農場的軌道上的，他們忘記了集體農場的建設不是幾個月的事情而是需要多少年的審慎的熟慮的工作。他們忘記了這些而不願意承認他們的錯誤。你們大概還記得，中央的關於被成功衝頭腦，以及我們的各省同志不應該看不清楚真正的形勢而亂沖的指示，是被他們以頑強的反抗來接受的。但是這并不能使中央退却，我們逆流而上，把我們的同志挽回正確的路來上。怎麼樣呢？現在大家都明白了，黨已達到了他所願意達到的，他把我們的同志引回正確的路上來。現在我們對於集體農場底建設與指導有着數萬農民出身的優秀幹部。這些幹部是在一九三〇年的錯誤中生長與教育出來的。但是黨如果在當時不能認清他的錯誤與屆時地克服他，那我們今天不會有這些幹部的。

另外一個是工業建設中的例子。我說的是礦山工程師破壞活動時期的我們的錯誤。我們的錯誤是，我們在工業中不注意我們同志的技術落後底整個危險，甚至我們對於這種落後性還自滿，認為可以經過敵視我們的專家底幫助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底偉大建設，而把我們的經濟幹部的作用縮小到單是監督着資產階級專門家的委

員。你們大概還記得，我們的經濟幹部當時是怎樣不願意承認他們的錯誤，怎樣不願意承認他們的技術的落後性以及怎樣憤慨地接受「掌握技術」的口號。怎麼樣呢？事實證明了，「掌握技術」的口號盡了他的効能與獲取了良好的成績。現在我們有着數萬以至數十萬高尚的布爾塞維克的經濟幹部。他們已經掌握了技術而驅使我們的工業前進。但是黨如果屈服於不願意承認他們技術落後的經濟家底反抗性，黨如果當時未認清以及未能屆時克服他們的錯誤，那我們現在不會有這些幹部的。

有些同志說，公開討論錯誤是不方便的，因為公開承認錯誤會被我們的敵人視為我們的弱點而來利用我們的錯誤。這是胡說，同志們，真正的胡說。相反地，我們的錯誤底公開承認以及誠實的改正只能加強我們的黨，在工人、農民與勞動知識份子的心目中增加我們黨的權威，只能增厚我們國家底力量與勢力。這是主要的。只要工人、農民與勞動知識份子在我們這邊——其他的一切就自己會來的。

另外一些同志說，公開承認錯誤不會是教育與鞏固我們的幹部，而是引起他們的削弱與解體，應該寬容與保護我們的幹部，應該注意到他們的自愛與安靜。因之

他們提議、掩飾我們同志的錯誤、減輕批評或者更好一點——讓過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不但是根本錯誤、而且非常的危險、特別是對於要想「寬容」與「保護」的那些同志危險。以掩飾他們的錯誤來寬容與保持幹部。這是有保證的斷送這些幹部，這我們必會斷送了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集體農場幹部，如果我們不能揭發他們在一九三〇年的錯誤，如果他們不能從這些錯誤中學習。我們必會斷送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工業幹部、如果我們在鑛山工程師底破壞活動的期間，不揭發我們同志的錯誤，如果我們的工業幹部不從這些錯誤中學習。誰要以爲用掩飾錯誤來寬容幹部底自愛，那他便是斷送了幹部以及幹部底自愛，因爲掩護錯誤使他易於重複新的或者更嚴重的錯誤，而這——應該這樣認識——將會引起幹部底完全破產與損害了他們的「自愛」與「安靜」。

六、列寧教訓給我們，不但要教育羣衆，並且要跟着羣衆學習。這是怎樣講呢？第一這是說，我們當領袖者不應自高自大，我們不要自己以爲當了中央委員或人民委員便具有正確領導的一切必要的知識。職位本身不會給予知識與經驗的。名

義更是不會給予這些的。

第二這是說，只是我們的經驗，領袖們的經驗，還不足以來正確領導的。因之我們的經驗，領袖們的經驗，該以羣衆們的經驗，黨員羣衆的經驗，工人階級的經驗與人民的經驗來補充。

第三這是說，我們與羣衆的聯系，不應該有一分鐘的削弱，更不應該破壞。

第四這是說，我們應該細心聽取羣衆的意見，簡單的黨員的意見，所謂「小人物」的意見以及人民的意見。

甚麼是正確領導呢？這絕對不是說，坐在辦公室裏草擬指令。正確的領導是：

第一，找求一個問題底正確的決定。但是如果不顧及到羣衆親身感受我們領導的結果的經驗，是不可找到正確的決定的。

第二，組織一個正確的決議底執行，這沒有羣衆之直接幫助是辦不到的。

第三，組織對於這一決議底執行考察，這沒有羣衆的直接幫助也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領袖們，只是從一方面，我想說是從上面，觀察物事，事件與人員；因

此我們的視線是或多或少地被限制了。羣衆相反地從另一方面，我想說是從下面，事件與人員；他們的視線在某種程度上亦同樣地被限制了。爲了保持一個問題底正確解決，應該使這兩種經驗聯系起來。領導只有在這個場合內才能夠是正確的。

這是說，不但要教育羣衆，而且要根本羣衆來學習。

舉兩個例子來說明列寧底這個提綱的正確性。

是數年以前了。我們中央委員討論改善頓巴斯礦區情形的問題。重工業人民委員會所擬就的方案草案顯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這個草案被駁回了三次。我們從重工業人民委員會得到了三次不同的草案，但還是不能認爲滿意。最後我們決定，從頓巴斯調來一些工人以及下級教育的經濟幹部與工會幹部。我們同這些同志談了三天。我們中央委員大家都應該承認，只有他們這些簡單的幹部，這些「小人物」，能夠給與我們一個正確的決定。你們大概還記得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關於增進頓巴斯礦區石炭生產的方案的名決議。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的這個決議被一

切我們的同志認為是一個正確的深有意義的決議，但他是羣衆中的簡單的人員所給與的啊。

另外一個例子。我說的是妮科拉茵科女同志的例子。妮科拉茵科是誰呢？她是一個簡單的黨員，是一個平常的「小人物」。她警告了基也夫黨部的弊害有整整一年之久，她揭發了親屬的關係，對於幹部的小資產階級的庸俗的待遇，自我批判底盜殺以及托派破壞份子的優勢。人們對於她，如同一個蒼蠅一樣，毫不重視。爲了去掉喉中的骨鯁，迅速把她開除了黨籍。基也夫的黨部以及烏克蘭的黨中央都不能幫助着她闡明真理。最後聯共中央的干涉才理清了這種混亂的情況。調查了這個事件以後發覺了甚麼結果呢？發覺了妮科拉茵科是對的，而基也夫黨部是錯了。事情就是這樣。但是妮科拉茵科是甚麼人呢？他自然不是中央委員，不是人民委員，不是基也夫省委的書記，她甚至不是任何一個支部的書記，她只是一個簡單的黨員。你們看到，簡單的人員對於真理有時比一些高級幹部接近的多。還可以舉數十個數百個這樣的例子。

這表示出，領導我們的事業只是我們的經驗，領導的經驗，是不夠的。爲了正確地領導，領導者的經驗應該補充以黨員羣衆的經驗。工人階級的經驗，勞動羣衆的經驗與所謂「小人物」的經驗。

甚麼時候才是可能的呢？只有當領袖們最密切地與羣衆聯繫起來，與黨員羣衆、工人階級、農民以及與勞動知識份子聯繫起來的時候才有可能。

與羣衆聯繫，鞏固這種聯繫，虛心聽取羣衆意見——布爾塞維克領導底強力與無敵便是在這裏面。

這可以當作規律來觀察：當布爾塞維克與羣衆保持着聯繫時，他將是無敵的。反過來說，若是布爾塞維克脫離了羣衆，與他們失掉了聯繫，若是生滿了官僚主義的鐵鏽，它便失掉了任何力量，而會變成一種空虛。

古代的希臘人在他們的神話中，有一位著名的英雄安韜伊司，他，如神話上所說的一樣，是海神波賽頓與女地神蓋姆的兒子。他對於他的生養他與教育他的母親有着特殊的親愛。沒有一個英雄，這個安韜伊司，他沒有任何英雄不能戰勝的。他

是一個無敵的英雄。他的力量在那兒呢？他的力量是，當他每次與一個不易對付的敵人鬥爭時，他就接觸他的教養他的母親——大地，便會生長出新的力量。但他亦有着他的弱點：如果他在任何方式下脫離了大地，便是他的危險。敵人們算計到他的這種缺點，這樣窺伺着他。有一個敵人利用了這個弱點打敗了他，這是海爾庫雷。但是怎麼打敗他的呢？他使他離開大地，把他舉在空中，切奪了他接觸大地的可能而在空中殺了他。

我以為布爾塞維克使我們回憶到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韜伊司。布爾塞維克與安韜伊司相同，是這樣壯大的，因為他們與教養他們的母親——羣衆保持着密切聯系。當他們與他們的母親——人民保持着聯系時，他們是無敵的。

布爾塞維克領導底無敵性的鎖鑰就在這裏！

七、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我說的是一些我們的同志對於個別黨員的形式主義的無心肝的官僚主義態度的問題，開除黨員的黨藉以及開除者重新恢復黨藉的問題。問題是，一些我們的領導幹部有着一種病態，對於人員黨員與工作人員缺乏注意

力。不只這樣；他們根本不注意黨員，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情形以及他的發展如何，他們根本不清楚工作人員。他們個人不到黨員中去，不到黨的幹部中去。正是因為他們無從判斷黨員與工作人員，他們通常只是這樣漫然地做；或者他們無標準無邊際誇獎他們，或者同樣無標準無邊際地打擊他們，最後把他們成千成萬地開除黨籍。這種領導者只是在名詞上『成千成萬』地想，而根本不顧及到『個人』，個別黨員及他的命運。成千成萬地開除黨籍，他們認為是一件小事，而還自慰着說，我們的黨擁有二百萬黨員，這數萬被開除者并不能變更我們黨的情況呵。但是只能是根本反黨的人們，才能這樣待遇我們的黨員的。

因為對於人員、黨員與黨的幹部的這種無心肝的態度在黨的一部份中引起了不滿與憤慨，托洛斯基主義的兩面派却很好巧地接近這些憤激了的同志，而把他們拖到托洛斯基主義的破壞工作的泥坑裏去。

托洛斯基派自身在我們黨裏從沒有表現過大的力量。你們還記得一九二七年我們黨內的末一次爭論。那是黨的真正的總表決。當時八十五萬四千黨員中有七十三

萬黨員參加了表決。其中七十二萬四千黨員贊成布爾塞維克中央，反對托洛斯基主義者，贊成托派者——四千人，這是說只有千分之五，同時還有二千六百黨員投懷疑票。未參加表決的有十二萬三千黨員。他們未有參加表決，因為他們或者出外去了，或者正在當班。

把投懷疑票的人們——假定他們同樣與托派表示同情——與四千贊成托派的人們加在一起，再加上未參加表決的人們的千分之五，或加上百分之五，這便又有六千人；那麼在這個或那個方式下與托派表示同情者，共有一萬二千黨員。這便是托派的全部力量。再顧及到他們中間許多人失望地脫離了托洛斯基主義情形，你們便可看到托派力量的空虛。除此以外，如果托派在我們黨的周圍還有一些後備力量時，那便是一些我們的同志在開除黨員黨藉與恢復被開除者的黨藉問題中的錯誤政策，一些我們的同志對於個別黨員與個別工作人員的無心肝的態度，人為地引起了一些不滿者與憤慨者而在這個方式下給托派開闢了後備力量。

許多人都是因為所謂的消極而被開除的。甚麼是消極呢？有人認為——如像所

表現出的——如果一個黨員不通曉黨的綱領便是消極，便被開除。但是這是不正確的呵，同志們！不是把我們黨的黨章這樣逐字地來解說呵。要通曉黨的綱領，這只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有歷練有理論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我不知道，我們中間是否能夠找到許多已經通曉我們的綱領的黨員，已經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歷練有理論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我們在這個途徑上繼續下去，那麼在我們黨內只能留下知識份子與有學問的人們，誰需要一個這樣的政黨呢？我們關於黨員有着一個有保證的列寧的公式，一個經歷了一切試練的公式。根據着這個公式，承認黨的綱領，交納黨費與在黨的一個組織內參加工作者便可成爲黨員。注意：在列寧的公式內不是說的通曉黨的綱領，而是承認綱領。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事情。這兒列寧是正確的，而不是我們那些高談通曉綱領的同志們，這用不到再多加證明了。這是很明顯的：如果黨這樣出發，黨員只能是已經通曉綱領以及有理論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那麼便不必要在黨內創設數千個訓練班與數百個黨校來教育黨員以馬克思主義與幫助着他們學習我們的綱領了。明顯地，黨在黨員中間組織了

這樣的訓練班與學校，因為它知道，黨員們還不能夠通曉黨的綱領，還不能夠成爲有理論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

那麼在黨員問題與調整開除黨籍的問題中，我們的政策應該結束那消極性底這種蠢笨見解了。

在這一區域上我們還有其他的罪惡，我們的同志不承認兩個極端間的中間性。一個工人、一個黨員只要一兩次遲到黨的會議或由於某原因未交納黨費，便把他們開除黨籍了。根本不注意黨員的錯誤的程度，不注意不到黨會以及不交黨費的原因。在這些問題中的官僚主義簡直聞所未聞。不難了解，由於這種無心肝的政策把非常熟練的工人與優秀的斯太哈諾夫運動者開除了黨籍。在開除一個人以前能不能夠先給他一個勸告，如果不能生效，給他一個警告，或嚴重的警告，如果還不能生效，給他一個留黨察看或在特殊的場合裏使他退到候補期去，但是不必一次便把他開除黨籍呢？自然可以這樣作。這兒需要對於人員、黨員與黨的命運加以注意。但是恰恰我們的有些同志缺乏這個。

是時候了，同志們！是克服這種混亂現象的時期了。（鼓掌）

列甯主義問題

每冊實價壹元貳角

著者 斯達林

譯者 莫師古

經售處 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出版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code, appearing as a series of stylized characters and symbols.

\$1.20